

中共历史民间版

习梦撕人

在这个世界上，人人都有一个梦。当然，靠下岗父亲夏俊峰卖烤串供自己上学的强强，决难与贪官薄熙来的儿子瓜瓜的梦一致。在当代中国只有共党党魁们才能做强人梦。比如，毛泽东做的就是一个权力无边的帝王梦，他做成了，但是压在他这个梦下的，竟然是 8 千万冤魂屈鬼。邓小平做的是一个要“摸着石头过河”的救党梦，河虽没有摸过去，却用八九六四的枪声，给中国人留下了一个死亡的梦魇。到了江泽民、胡锦涛，做的便是“腐败治国”和“腐烂倒退”的梦。中共大搞世袭制，让“太子党”习近平上台后，把“共党球王梦”伪装成为“中国梦”。习近平以反和平演变为纲，举毛旗，走老路，倒行逆施，甚至比毛泽东还左。毛还遮遮掩掩说，不搞资产阶级民主，要搞无产阶级民主，而不敢直接地否定民主。但习近平就敢于赤裸裸地否定宪政民主，提出“七不讲”，反普世价值、反英语、反洋货；以铁血手段镇压不同声音。李洪林指出：现在的政治生活还不如辛亥革命以前，那时还有民办报纸，民营书局，老百姓可以出书，可以办报。当前中国贫富差距过大，社会矛盾激化到了临界点。官员不仅贪污腐化、权钱交易、权色交易，而且权无制约、无法无天。公检法、国安、武警、城管队都成了权贵的帮凶和打手。整个社会不可调和、日益尖锐的矛盾和广大人民的反抗怒火象地下的滚烫的岩浆在地下奔突，正在聚集着力量，并最终将汇聚起冲天而起的、排山倒海的力量，奔涌出地面燃成巨大的火球，烧毁这邪恶的制度。

上篇：“共党梦”吃人

1. 最黑的黑帮
2. 最是邪恶共产党
3. 国民党主席没公车没有公款吃喝
4. 吃人的党性
5. 吃人的“妈妈”该当何罪？
6. 嗜血的五星红旗
7. 恐怖的少先队队歌
8. 吃人的中共国的国歌
9. 周恩来的遗产——周公汤
10. 中共饿杀长春 30 万
11. 中共制造大饥荒饿杀 6000 万

12. 人比牛马还贱
13. 广西人吃人运动
14. 广东“婴儿汤”摆上桌面
15. 人肉胶囊
16. 垂尾臣服习猴王
17. 习近平的“猪”栏梦
18. 被吃的“雷锋猪”
19. 吃人不吐骨头的共产动物社会
20. 屁民喝毒奶，权贵吃人奶
21. 四害之首——冗官
22. 中国是权贵的国家，美国是人民的国家
23. 中国梦——权贵吃人梦
24. 中共高官早已抛弃了共党
25. 外交官们在美圆中国梦
26. 共党成了腐败的代名词
27. 俄罗斯抨击中共 两极分化全球第一
28. 儿子做梦花大钱，老子入土被崇拜
29. 前中纪委书记尉健行险遭炸死
30. 中共害怕财产公开引发革命

中篇：几家世袭中国梦

1. 邓卓棣、衣俊卿的风流梦

2. 共产狼奶哺育的畸形儿
3. 习近平报复高扬
4. 习近平在福建被捉奸
5. 假博士习近平
6. 江泽民给李先念的二奶送蛋糕
7. 胡锦涛、胡春华的“投名状”
8. 江湖暗斗
9. 彭丽媛一曲《江山》为习上台奠基
10. 江泽民力保习近平
11. 习近平抢班夺权羞辱胡锦涛
12. 胡锦涛企图紧握军权操控习近平
13. 蠢驴胡锦涛 保朝殃民丧权
14. 习近平击败“竞选派”薄熙来
15. 薄熙来指示杀海伍德
16. “死亡威胁”保习家
17. “法拉利车祸”剥夺胡锦涛的大权
18. 习近平“神隐”对抗胡锦涛
19. “习八条”拒绝江泽民干政
20. 习近平的自信与胡锦涛的悲哀
21. 习近平、李小鹏“拼爹”
22. “红二代”都“裸官”了，还有信仰？
23. “两个不能否定”的出笼

24. 中共继续邪教似的“唱红”
25. 人民唾弃屠戮了亿万生灵的共党
26. 兔死狐悲——“竟无一人是男儿”

下篇：中 国 梦 回 文 革

1. 谎言大国谎言党 温家宝被骗夜失眠
2. 共党为了权力（利益）而说谎
3. 共党伪装术
4. 共产主义就是假大空
5. 共产体制导致假大空泛滥
6. 从马英九的统一条件看中共的欺世盗名
7. 崔永元：我曾相信谎言
8. 漏网大地主与四大恶霸地主
9. 奥巴马驳共党“先进性”之画皮
10. “双规”凸显了超级法西斯的黑邦政治
11.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没有自由平等
12. 共党是典型的金字塔形的等级官僚制
13. 中国政改的三个错误认识
14. 人民为大 反党无罪
15. 废除反人民的共党宪法
16. 中国政府是个不合法的“临时政府”
17. 大骗子胡锦涛习近平
18. 习帝击碎宪政梦

19. 共党是民主宪政的死敌
20. 习近平给国人穿“破鞋”
21. 习总宰制羣众
22. 共党对抗普世价值
23. 习近平拒绝政改
24. 图穷匕见的意识形态战
25. 中宣部已把媒体逼回“甲骨文”时代
26. 习近平愚民 《南方评论周刊》被迫停刊
27. 美国副总统称中国无自由
28. 习厉王搞网络文革

尾声：习总梦霸全球

1. 共党的“球王”梦伪装成“中国梦”
2. 中共颠覆美国却倒打一耙
3. 共党的唯一目的就是永远垄断政权
4. 共党的霸权罪——垄断国家权力罪
5. 耍“两杆子”的中共
6. 习近平——拿破仑三世转世
7. 习近平的联俄压美梦
8. 中国越来越不和平 混乱加剧
9. 人类发展指数——中国越来越落后
10. 中国将成全球最穷的国家

11. 习白痴骂“屁民”二百五
12. 中国永远赶不上俄罗斯，一百年后也赶不上！
13. 英商：我的中国梦已碎
14. 共产制度把人变成鬼 自由制度把鬼变成人
15. “三自信”掩盖三大危机
16. 习近平剽窃中国梦
17. “习胖”学“金胖”，“强军”仿“先军”
18. 习天子梦霸全球
19. 中共帮苏共摧毁对手
20. 毛泽东妄图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做地球王
21. 江泽民的超级法西斯梦
22. 中华世纪就是中共霸地球 然后赤化全球
23. 中共霸权梦必然被粉碎！
24. 中共是人类最大威胁
25. 中西方之间的根本区别
26. 国民素质低下是怎样炼成的？

上篇：“共 党 梦” 吃 人

1. 共党是最黑的黑帮

共产主义（党）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共党不仅公开抢劫人民财产，而且还直接奴役人民的身体，这就是共产共妻制。它迫使广大群众从内心里自愿沦为共党权贵的玩物，而且在被权贵糟蹋之后还要感恩戴德。共党上无天理、中无人性、下无底线，集汉奸、流氓、强盗的特征于一身，是人世间最黑的黑帮。

共产兔子爱吃窝边草，专拿熟人的老婆下手。这就是共产共妻。在苏共、中共早期比比

皆是。1917 年俄国十月政变后，不仅对财产而且对性资源实行公有化。共党获得“全面解放”，以“性革命”方式“公有化”资产阶级及非革命妇女的行为十分普遍。十月反革命时期践踏性道德的行为，比比皆是，两性关系的基本规范荡然无存。苏俄的小说中亦曾有女革命者充当妓女筹措革命经费的描写，卖淫被理解为对革命的献身。

曾志（1911-1998）15 岁加入共匪，16 岁参加共产战争。有一次她和几个年轻人去抢一个大户，抢完了，有家的就想回家去。她当时思想斗争了很长时间，终于对同伴说，“你们不用回家了，我们可以共产共妻”，自己也献身于乱交乱伦之中！1932 年 1 月曾志与丈夫一道，抱着未满 3 个月的小铁牛从福州来到厦门，结果被中共党组织卖了 100 块大洋。

江姐本名江竹筠，地下党一般都称她“江姐”。江姐同时代的川大学生说：江姐思想活跃、不安分，很风流，她每和一个男同学上床后，就要求对方入党，闹得满城风雨，当时川大的校长说：江竹筠你风流一点是你自己的事，但你用这种方式强迫信仰是不对的。后来，江竹筠担任重庆市委第一委员彭咏梧（《红岩》中彭松涛的原型）的助手，当了他的二奶。

史沫特莱说：“当我被一位陌生的男人强奸的时候，忽然，我感悟了人生，这个世界也许就要在痛苦中获得重生！我有种凤凰涅槃般的感觉，良好极了”，不过强奸她的不是的资本家、大地主或街头流氓，而是一位美国共产党员，这次强奸居然点精成怪地使她走上了共产共妻之路，真是太变态太下贱了。加入共匪队伍后的史沫特莱，竟然在各种聚会上一边酗酒，一边将自己脱的一丝不挂，然后振臂高呼“革命”口号！她这种大胆的举动在西方世界都引发舆论的强烈谴责。最后被共产国际派遣到中国来了，名义上成了宋庆龄的秘书，事实上她才是真正的领导，很快宋庆龄的私人存款被她用光了，宋庆龄以后向共产国际告状，说史沫特莱借钱不还，还把她一条珍贵的翡翠项链和三个戒子都拿去当了。最后共产国际给宋庆龄送来了一张十万美元的支票。沫特莱在上海喝醉了就全裸睡在鲁迅家里，并将鲁迅周围的作家拉入到共产共妻道路上来，她让那些人抛弃家庭，集体居住在一起。结果因为太吵闹被隔壁邻居举报，男男女女二十多个“革命”家全体被捕。以后史沫特莱到了延安，帮助毛泽东朱德闭关修炼交谊舞，贺子珍因此大闹延安。1950 年，史沫特莱的骨灰埋在了中国。

毛泽东在其撰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津津乐道痞子们也可去“少奶奶的牙床上滚一滚”，并称赞为“好得很”。井冈山时期，更有煽情的“革命”标语曰“你想睡地主的小老婆吗？请来参加革命”！直到后来所谓土改中，同样任意欺辱、霸占地、富家的年轻女性。美籍华裔女演员白灵 2005 年凭《饺子》夺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配角。白灵在美国有线电视节目中，说，1980 年代，她 14-17 岁时加入共军当文艺兵，被派到西藏，期间曾遭军中上级们强奸。她指一名女同胞也同样被迫当性奴，又经常被人灌酒。

请看中国的黑社会：刑警队，案子未破人先醉。防暴队，朋友都在黑社会。巡警队，街头巷尾看阿妹。女警队，天天陪着局长睡。交警队，躲在树下等机会。扫黄队，赶走嫖客自己睡。治安队，吃喝嫖赌样样会。常委会，吃喝嫖赌全报销。

尚 黑党魁闹鬼斗。“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这是《共产党宣言》的首句。幽灵在英语中原文是恶魔、魔鬼、鬼魂之意。《共产党宣言》直言不讳的标榜自己是魔鬼邪教，肆无忌惮的挑战人类的优秀文明。很多中国人不知道：马克思大学时代就加入了魔鬼撒旦教，成为魔教成员。马克思在《人之傲》（Human ride）一诗中，马克思直白露

骨的表白，他的目标并不是改善、改组、或革新世界，而是要毁灭世界。在剧本《Oulanem》中，马克思则宣称，他要暴烈地握住并抓碎人类，和人类同时落入黑暗的无底地狱。马克思要毁灭人类，当然蔑视人类包括所有的不同人种、不同信仰的各种文化。马克思于 1853 年 6 月 14 号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的文章《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在第 4 自然段结尾的地方，用（hereditary stupidity）来形容中国人；也就是用“天生蠢货”来形容中国人。不过这篇谩骂中国人的文章，共产党人在翻译时，却用“历来的麻木状态”加以掩饰。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狂妄地叫嚣：“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也就是要与人类文明的价值——同情心、博爱心决裂，对“阶级敌人”格杀勿论。

被称为“国际劳动节”的每年 5 月 1 日，其实只有共党国家实行。共党给出的解释是，“五一节”源于 1886 年 5 月 1 日美国芝加哥城的工人大罢工。1889 年 7 月，第二共产国际为了纪念这个日子，宣布将每年的 5 月 1 日定为国际劳动节。然而真实的情况是：共产党是为了庆祝光照帮成立于 1776 年 5 月 1 日。光照帮是德国的一个极其秘密的政治颠覆性组织。光照帮从建立那天开始就是邪恶的，从他的建帮宗旨就见其本质了。其建帮纲领可归纳为：废除私有财产及继承权（即“共产”）；废除家庭婚姻与伦理道德（即“共妻”）；废除所有宗教信仰，用一个所谓的“新宗教”代替（这个新宗教就是基于唯物主义的无神论）；废除国家，用国际主义替代爱国主义；最终摧毁一切社会秩序的世界革命而建立一个由光照帮控制的、完全独裁的、没有人权和道德的世界性政府，并且建立一个无所不在的特务系统。它一上来就反对人类的传统道德，破坏家庭婚姻与伦理，并宣称要与所有传统正教为敌；从其建立那天起，就注定了是一个坏乱人世间的魔教；欺骗、不择手段是其基本特点。

共产党来源于光照帮，马克思在光照帮已有的文件基础上起草了《共产党宣言》。光照帮选择马克思充当写手，是看中了马克思的撒旦教思想：对神与人类的仇恨。苏共的党徽是由一个五角星和镰刀、锤子组成。“镰刀锤子”源于光照帮（共济会）的标志。锤子是石匠干活用的工具，表示着建设和破坏之意；镰刀代表着毁灭，意味着杀人如割草，代表了草菅人命的反人类的价值观！“镰刀锤子”是恶魔的象征。中共的党旗、党徽、国旗、国徽等，都由苏共徽章演化而来。“五角星”与“镰刀、锤子”被中共继承来，只是被分开使用而已。撒旦教的标志“五角星”出现在中共团旗上，成为团的标志。“镰刀锤子”成为党的标志。五星标志撒旦教会，镰刀锤子是光照帮的标志。中共正是撒旦魔教与“光照帮”黑帮魔教的二者合一。人们对着团旗宣誓的时候，就等于是宣誓加入了撒旦魔教；人们对着党旗发誓的时候，就是发誓把生命献给魔鬼。共党入党仪式与组织原则也都来源于光照帮。光照帮具有金字塔形和军事化的组织结构，从入帮开始，就发毒誓：把生死交给组织，无条件服从上级，忠于组织；严格保密，如果泄密将会受到严厉惩罚；定期向上司汇报思想等等。共产党员入党时，要发毒誓把生命献给共产主义；无限忠于党，永不叛党；服从上级，严守党的机密。都执政 60 多年了，几千万党员对十几亿非党群众，还能有什么“机密”可守？

毛泽东要人追随他如追随黑帮老大那么忠于主子，不在乎忠于主义。所以，胡绳临终说：“没想到我们这共产党，竟变成现代青红帮了。”这是抬举了共党！共党是比黑帮还黑的集团。以上海杜月笙为例，他这上海滩黑社会的青帮首领，也有战国春申君纳士招贤的古风，辛亥元老章太炎及名士杨度，都是他座上客，抗战时与戴笠共谋在上海滩组织万人游击队。日本拉拢他遭拒，他迁居香港，传承了司马迁在《游侠列传》里的侠义。临死前，他将保险箱打开，许多民国大佬要人给他写的借据，一张张，尽是数万数十万的，他全烧掉。这种古

道侠义，这种人性与人格，共党那里有？共党贪官全将贪得的民脂民膏藏到海外去了！

中共就是撒旦魔教、黑帮恶魔的集大成的邪恶组织。共党极权政治乃是一小撮党阀兼军阀的寡头政治、宗派政治、黑帮政治、法西斯政治、骗子政治。黑帮政治典型体现是中共的档案制度，中共官员撰写的每个人档案从不与当事人见面；其他如指定接班人、操纵选举、财政经济事务的暗箱作业都是黑帮政治的体现。总之，没有公开性、没有透明、没有光明，因为没有言论自由。与其官僚特权阶级在经济上的剥削方法相一致，这种政治只崇拜进行极端无耻的欺骗宣传的笔杆子和标志着超级法西斯血腥专政的枪杆子。中共就是一个丧尽天良、作恶没有底线的魔鬼杀人集团，恶贯满盈，罄竹难书。在当年发生大饥荒、饿殍遍野的时候，不但不予救济，反而派出军队封锁道路，禁止百姓逃荒要饭，致使约 5 千万人活活饿死；1989 年“6.4”在天安门广场用坦克来血腥屠杀手无寸铁的请愿学生……

共党黑帮政治以神化党强化官僚军事机器、实施恐怖政策来压制下级的批评并镇压人民的抗议；用经济“成就”来掩盖其“成就”背后的劳动者牺牲的血肉，用今天“成就”来掩盖其过去对人民的疯狂折磨、掠夺和屠杀；用国外的灾祸来掩盖其更大祸国殃民；用伟光正的漂亮词藻来掩盖其假丑恶的嗜血本质……因而这种政治是标准的超级法西斯寡头、骗子政治。官僚特权阶级愈是大张旗鼓地将共产特权对广大劳动人民的奴役剥削宣布为是“为共产主义而奋斗”或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体现，就愈是更加可耻、可鄙、可恨、可恶！极权政治愈是打上虚伪透顶的“人民”“以人为本”的灵光，则愈是到处散发着特权屠刀的恐怖血腥气。杀人和谎言是共产极权、超级法西斯寡头、骗子政治的本质特征。这种极端落后、极端反人类的荒谬政治，不管它披上了怎样华丽的外衣和涂上了多么鲜艳的色彩，都无法掩盖它内心的肮脏、黑暗、残忍和虚弱。共产主义在世界上已为世人所不齿，它已经成为暴政、专制、斗争、邪恶的代名词，它已经是被全世界正义力量扫地出门的政治邪教。

2.最是邪恶共产党

实践证明，财产公有、权力私有的共产制度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坏的制度。因为财产公有了，你没有了私产，没有了存款，就等于失去了自我生存的保障，只好受制于他人。而国家权力党私有了，党魁说了算，你失去了自由，不得不服从共党。这两者一结合，你就只有做奴隶的份了。2013 年 5 月 3 日中共《求是》颠倒黑白地说“中国政治模式全球最佳”。

2013 年 5 月 22 日孙临平在《共军报》发表《中国梦的自信在哪里》，宣称“首要的是始终同心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仰，笃信‘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宇宙真理”来源于恐怖分子方志敏（1899-1935）。方志敏 1924 年加入共匪，并于 1925 年在弋阳领导农民运动，毫无人性地杀害了他的亲叔叔、地主方雨田。1932 年 6 月 28 日，方志敏派军星夜攻下了廿八都，绑架 200 多人勒索财物，有些人被赎回了，有些人则被撕票。9 月 5 日方志敏的红军第二次攻打廿八都。这次除打死守军 30 多人外，再绑架士兵、地主和富绅 30 多人为“肉票”。繁华了几个世纪的富饶古镇从此萧条冷落。共党嗜杀成性，在夺权时杀人如麻，掌权后仍大肆杀人，以恐怖手段维持非法统治。1949 年后，这个不过 3000 余人的古老小镇，竟有 86 户被划为地主，被枪决的历史反革命有 30 多人，不可谓不骇人听闻。1934 年 12 月 6 日，方志敏率部绑架美国传教士达能和史文明夫妇，勒索巨额赎金 2 万元未能得逞，2 天后达能夫妇人头落地。此恶行引起全世界的强烈谴责！1935 年 1 月方战败被俘，民国政府以谋杀达能夫妇罪判其死刑，同年 8 月处死。方志敏在狱中写下：“敌人只

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军报》此话一出当然一言九鼎，十分权威。所以大陆的各官网在转载该文时，索性将文章标题改为《共军报：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叫嚷“中共乃天命所在”。人类社会至今只有两类真理，一类是科学真理，比如牛顿定律、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等；另一类是宗教真理，即只有上帝才能掌握、宇宙所有生物必须服膺的终极真理。

“宇宙真理”与洪秀全的“天语”。中共宣称自己掌握宇宙真理，等于宣称自己就是上帝。1863年冬，天京被湘军包围，城中弹尽粮绝，李秀成建议“让城别走”，以图东山再起。洪秀全严加驳斥说：“我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为天下万国的唯一真主，有什么害怕的。我的铁桶江山，你不扶，自然有人扶。你说没有兵，我的天兵比水都还多”。此后，中国的“太平天国”灭亡。商纣王无道，他的大臣劝他改邪归正，否则老百姓就要造反了，他竟说“我有天命在身，看哪个敢造反？！”不久，他就葬身鹿台。

一帮弱智，说弘扬“普世价值”就是诋毁中国。啥叫普世价值，就是全人类都认可的价值，到中国就不认可了，看来共产党魁是脱离人类的非类？他们连“宇宙”的概念也没有弄明白。首先，“宇宙”是一个时间与空间相结合的概念。“宇”者上下左右无穷的空间；“宙”者古往今来无尽的时间。而所谓“真理”只是在一定的时间阶段里，对一定范围里的事物的认识，如果这种认识能真实反映出该事物的存在及其运转的规律，那么可以视此认识为一个真理。由此可见任何真理都有一定的时空局限性，只适用于一定范围，一定阶段，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无不如此。以自然科学为例，即便是牛顿定律，虽为举世公认但也只适用于宏观世界低速运动的物体。对于微观粒子高速运动的物体，则须要用爱因斯坦方程才能加以解释了。至于社会科学、尤其共党所谓的“我们信仰的主义”，更只是一部份人的主张。即使在一个国家、一个社会里也不可能获得一致的赞同。2001年中共的人民网发表了《邪教的十个特征》，其中称：“邪教的关键在于其‘精神领袖’都一致地自称掌握着宇宙最终真理，且‘法力无边’”。古语云：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我们不妨以子之镜，照子之容。现在共党公然自称“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这不是邪教是什么？！

1999年12月李鹏主持的全国人大通过了一项关于邪教的法律，一时间全国掀起一股反邪教热。按照李鹏邪教法的定义，邪教即是“冒用宗教、气功、或者其它名义建立，神化首要分子，利用制造、散布迷信邪说等手段，蛊惑、蒙骗他人，发展、控制成员，危害社会的非法组织。”而中共恰好属于这一范围。

第一个特征：“冒用……或者其它名义建立”。中共的建立和维持就是冒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1946年1月焦裕禄入党时，他并不知道什么是共产党。连党是干什么的都不知道，怎能说是同意党纲呢？焦裕禄土改时被定为中农，1961年填写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登记表》，焦裕禄又自填“雇工”。中共以撒谎者焦裕禄为楷模，难怪一直谎言治国！

第二个特征“神化首要分子”。共党头子通常都自封为导师、先知、首领或宗师等，宣称自己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还能预知一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都被捧为人间尊神，受到愚民的狂热崇拜；他们的话就是“真理”；对他们的任何怀疑批评，都会招致杀身之祸，许多说实话的人士都受到了残酷迫害。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毫不掩饰的要求信徒和民众：“崇拜毛必须到盲从的程度，信仰毛必须到迷信的地步”。他们大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及至文革大肆造神，毛泽东竟可称为“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任何报刊、书本首页

最上方，必须先印上毛语录为“最高指示”。举国之人戴毛头像，举毛语录，搞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爹娘只生我的身躯，毛主席给了我生命”；所以，可以六亲不认，为教主义灭亲。天大地大不如毛主席的恩情大，所以要为毛主席献出自己的一切。男信徒为教主献心献力，毛肚子大，不喜欢裤子变得太紧，不舒服，无论教主在哪里坐下来，男信徒（如李银桥）就赶紧去替教主解松裤子。当教主春风得意性欲来，女信徒就毫不犹豫为教主献身，她们感到能为教主献身是光荣，并引以为自豪，由于教主从不冲浴洗澡（只由信徒替他擦身），一时间宫廷蔓延传染性性病。毛死后，这种邪教狂曾一度消沉。但因未得到清算与批判，毒根未除，遇到合适的气候，阴风一吹，这种邪教之风又兴盛起来。所谓“拥有宇宙真理”，无非就是当年“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的“最高指示”改头换面。所谓“相信党性如同基督徒相信上帝”，不过就是当年拜毛泽东为神，“三忠于”、“四无限”这类邪教式“箴言”的翻版而已。这表明决策高层正在酝酿一场类似当年“文革”中所谓的在“意识形态领域，实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大动作。如其阴谋得逞，全国将再现“反右”“文革”式的以言治罪，遍地文字冤狱！

第三个特征：“制造散布迷信邪说”。马克思主义充满了迷信邪说。中共一致坚持做为立党基础的“枪杆子出政权”信条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在今天已被证明是迷信邪说，正是这一迷信邪说造成了中共的残暴本性，今天这一迷信邪说已经不得人心，所以中共不好意思拿到桌面上宣传，但它的血染党旗仍旧显示它坚持红色恐怖的残暴本性。

第四个特征：“蛊惑蒙骗他人”。古今中外，最能蛊惑蒙骗人民的，最能一手遮天，最能让世人跟着转的，莫过是中共了。它不仅在中国牢牢抓住“党禁”和“报禁”，用“党的喉舌”一手遮天剥夺人民的知情权，控制广大人民的思想，而且对国际社会进行洗脑，硬是要人们面对它的磨刀霍霍和穷兵黩武而相信它爱好和平。

第五个特征：“发展控制成员”。在中央没有夺得控制权的地方，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中共都是通过地下活动秘密发展党员，这早已是公开的秘密。至于控制其成员，中共远胜于其它教派，定期思想汇报，党的频繁“组织生活”和党和纪律，都是控制党员的手段，如果谁被戴上“叛党”的可怕帽子，他的一辈子就都完了。

第六个特征：“危害社会”。中共对中国人的危害罄竹难书，且不说中共执政 60 年来造成的 8 千万人民非正常死亡，也不说毛泽东的人口政策造成中国的人口危机，也不讨论中共的“地球王”计划可能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而摧毁人类文明，只看看中共造成的专制制度复辟。辛亥革命在中国推翻了专制制度，据史学家的研究，在辛亥革命初期，中国的民主得到蓬勃的发展，据 1920 年统计，注册的政党有上百个之多，民办报刊有几百种之多。中共夺权前，宣称中国的民主和自由而战，但它夺权后，实行党禁和报禁，事实上逆历史潮流而动，在中国复辟了专制制度，建成了比传统专制制度邪恶千万倍的一党极权制度。

传销的基本方式是“杀熟”。共产党搞阶级斗争不仅“杀熟”，还杀亲人。最著名的是共产党搞土地改革，晋西北兴县有个好心的开明绅士叫刘象坤，因为有财富，被当作地主活活打死。他的儿子为了表示自己与父亲一刀两断，竟一把夺下民兵手里带刺刀的步枪，在其父尸体上补上两刀。文革时期更是相互揭发，搞得夫妻反目、父子反目，到处人吃人。

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就是群体迫害、群体灭绝。从战争年代的大清洗，到和平年代的大清洗，哪个共党国家都有。共党消灭私有制、消灭地主、资本家，消灭历史反革命是更严重的有组

织的群体犯罪。如果说传销是“经济邪教”的话，共党更是地地道道的霸权邪教。

第七个特征“非法组织”。贺卫方说，一个组织是否合法，最起码的常识就是依法登记。一个没有注册登记的组织，就是一个非法的组织。中共未在本国注册，也未在其它国家注册，是非法组织。“整个党的权力结构”违反了宪法，因为，它本身可以赦免自己，无视宪法的控制。”任何逆人类历史潮流而动的党派和政治势力都是反动的，因而都是非法的。

3. 国民党主席没公车，没有公款吃喝！

无论是中国南街村的共产教、还是“人民圣殿教”，或是日本的奥姆真理教，都有着共同的特征，一是教主崇拜，二是对信徒实行全面地精神控制，三是信徒的财产全部充公，不保留私人财产。如果说传销系统里的上线都是靠下线来养活的，那么，早期中共是靠苏联豢养的汉奸党；执政后的中共是剥削人民的流氓党。据国务院 1982 年 62 号文件，1937 年 7 月 6 日前参加革命工作的每年增发 2 个月工资，1937 年 7 月 7 日到 1942 年 12 月 31 日参加革命工作的增发一个半月，1943 年 1 月 1 日到 1945 年 9 月 2 日参加的增发 1 个月。2011 年 7 月 1 日，中共给老干部发钱 36 亿元，基层党员无分文。1937 年 7 月 6 日前参加匪党的“红军干部”得到每年 15 个月的工资；1937 年 7 月 7 日至 1945 年 9 月 2 日参加匪党的“抗日干部”获得每年 14 个月的工资以及补贴；“解放”战争干部每年获得 13 个月的工资。文件原来是年底才给的，七一前就提前发了。据估算，上述三种离休老干部总数 90 万，若以每人平均获得 4000 元计算的话，总共是 36 亿元人民币。一位已经拿到这次七一钱的离休老干部说：“如果中国现在是多党民主议会制的话，这 36 亿元绝对不可能白白的给任何一个党的老党员。看看台湾的马英九在民国 100 周年时敢公开给哪个老国民党钱？”

自从结束一党专制后，国民党断绝了政府拨款，活动靠党费和捐款。所以，国民党主席没公车，没有公款吃喝！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说：“大陆人可能很难想象，国民党主席在今天是没有公车可用的，请客也需要自己掏钱。你去参观我们中央党部了么？大家都可以随意进出，我们只是普通的民间社团。”

马英九当选之后，除妻子周美青辞去兆丰银行董事以外，大姐马以南辞去中国化学制药公司副总经理，周美青的二哥周伟奇为了避免产生利益冲突疑虑，也辞去联合液化石油气公司董事长的工作。马英九的夫人、舅子以及大姐 3 人的月薪加起来少说至少 85 万，为维护公平正义，他们坚决放弃了。其实，无论是坐地铁的卡梅伦和布隆伯格还是坐公交车的周美青，无论是乘经济舱的骆家辉还是吃快餐的马英九，人家做的只是一个日常的习惯动作而已，充分地体现了人家的核心价值观。马英九身边的工作人员说，马总工作繁忙，十餐有九餐不能与家人一道吃。他在“总统府”或下去视察，全部吃便当（快餐），一年要吃 700 多盒便当。有的便当，就是一碗面。马英九说：“国家的首要职责，不是发展经济，不是强大军事，而是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保障社会弱势群体不被淘汰！此为国之根本！”

4. 吃人的党性

民主国家讲人性，专制国家讲动物性。民主国家在信仰方面经常自由争论，没有标准答案；专制国家在信仰方面不允许有争论，只能信奉一种主义。2013 年 6 月 1 日《人民日报》发

表刘亚州的奇文：“党员相信党性如同基督徒相信上帝”。“把党性当作做人的地，把党性当作为官的天”。“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以党性为自己作保，在神圣性上丝毫不压于基督徒向上帝发誓”。刘亚洲无异代共党党魁宣称：“我是光，我是盐，我是真理，我是神”；服从党魁就象服从神。中共要求全体党员无条件地服从上级（党魁）的党性，这是由其黑帮性质所决定的。因此，中共特别强调，不仅人性即使每个人的个性也要服从党性。党性所强调的服从性，就是对组织的服从、对主义的服从和阶级立场的服从。这就是人性必须为政治牺牲的中共党性。中共如此杜撰党性，就是为了独裁需要而借助于意识形态来扼杀人的自由本性，以便从党组织内部向社会辐射主奴状态的“支配-服从”模式。这是一党专政的实质。

现代汉语词典说，党性“特指共产党员的党性，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性的最高最集中的表现”——共党分子最集中地表现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即高度的纪律性和大公无私性。高度的纪律性就是对领袖的服从性，而大公无私的“太监”才会让党魁放心。工人阶级不可能有“高度的纪律性和大公无私性”，这全是共党领袖集团杜撰的。其目的无非是要求广大党员象“工蜂”一样为其“蜂王”——党魁集团服务。即中共大肆宣传的吴运铎的“把一切献给党”，当然包括把生命献给党。这就是共党意识形态的灵魂：党比人的生命还重要，这就是赤裸裸地反人类啊！可见，“先进”的“党性”就是灭绝人性，就是反动的法西斯性、野蛮落后的兽性。共产党最喜欢讲“大公无私”，实际上是要“共产共妻”。吴运铎鼓吹“把一切献给党”，实质是“把一切献给党”，就是把自己的一切的一切，包括身体器官，毫无保留地、干干净净地、一丝不挂地献出来，“共产共妻”，群交滥交。党魁们要别人大公无私、放弃自己的个人利益，把一切献给党，献给党魁；自己则损公肥私、化公为私、无公大私。共党极权“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黄宗羲在《原君》）。于光远说：“大公无私”不是共产主义的口号，而是奴隶主的口号；“‘大公’应该提倡，‘无私’则可休矣。”几十年来，共党反复地告诉屁民：把一切献给党！当他们把一切献给党后，他们就像小草一样地被糟蹋、踩死！农民的一切被公有化后，饿死了6千多万；历次整人运动，整死人无数！事实上，共党党魁个个冷血残忍，今天的党魁习近平就是个冷血的白痴！不冷血残忍的党魁胡耀邦、赵紫阳、戈尔巴乔夫都是习近平眼里的叛徒！

中国的许多大学生不知道“斯大林”是什么意思。必须告诉他们，“斯大林”就是“钢铁”的意思。“钢铁”意味着残忍和毫无人性，正因为毫无人性，斯大林滥杀了3千万人而毫无负罪感。毛泽东说邓小平是开“钢铁公司的”，意味着邓毫无人性，所以邓制造了举世震惊的64大屠杀。共产分子都是人性稀薄的“钢铁”怪兽，《钢铁是这样练成的》这部苏共炮制的小说就是要把你的人性扼杀，使你成为毫无人性的超级法西斯怪兽。

周孝正演讲说：有一本坏书叫《钢铁是怎么练成的》。其中有一句名言说：“我这一辈子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碌碌无为而羞愧，我这一辈子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人类最伟大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你有什么资格解放全人类。“解放全人类”就是输出“革命”，就是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不赞同我的价值观的人就是“革命”的对象，必须予以消灭，这不是赤裸裸的法西斯主义吗？这种反人类的恶毒语言，中共却要求学生背诵。保尔·柯察金其实是一个傻小子。他修那个路，那路是干什么呢？现在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就说斯大林是一个暴君，他的残酷程度超出了你的想象。比如说苏共中央委员会100人，下一次开会杀掉70个，杀掉70%的苏共中央委员；他杀掉苏联各类的精英，往少的说400万，往多的说6000万，那时候苏联才1亿人，不像中国10亿人。保尔·柯察金不知道他所修筑的公路是用来流放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这些人被流放到北极冻死了。保尔·柯察金如果有觉悟，应该组织罢工，没有觉悟应该偷懒，这傻小子得病都不休息啊，你着什么急啊，

那路早修一天，人家精英就早到西伯利亚受一天的苦。当年的保尔柯察金就在为人类最黑暗最野蛮的政府而积极的工作，是多么地可悲可鄙！一部讴歌法西斯的著作还在今天中国大陆肆虐，还在毒害孩子们（包括 1 年级的小学生），洗脑啊！这是逆天行事！

党性就是灭绝人性的奴性。1994 年克拉玛依大火的“同学们不要动，让领导先走”是“党性”灭绝人性的最鲜活的体现，“党性”压倒了关爱孩子的天赋“人性”；导致 288 名名学童葬身火海。“让领导先走”命令的背后就是共党权贵只把自己当人，平民永远都是牺牲品。喊出“让领导先走”的、一心为党的好奴才况丽出狱后又入党做官了。奴才文化是中共的精髓。林彪说：“党性乃尊命性也”。胡绩伟说：中共形成了一种“党性原则”，即“听党的话”、“做党的驯服工具”的彻底奴性。党说什么就是什么，甚至可以为党撒谎或卖淫、贩毒、卖命。在这种党奴制下，当然不可能有“人权”、“平等”和“独立思考”！

一个违背人性的政权绝对是非法政权！因为合法性就是合乎人性，非法性就是违反人性。林立果在《五七一工程纪要》中，把中共比喻为“绞肉机”，民众遭到无情压榨，任何异己势力都受到无情绞杀，人的一点点良心、一点点正气、一点点人味，都要放到绞肉机无情搅碎。林彪的悲惨下场，其实就是所有投共、亲共者的下场，只是形式各异。中共这样一个充满阴谋、暴力、恐怖和血腥的集团，他们对自己人尚且斩尽杀绝，毫不手软，不留余地，又如何能对人民宽容仁慈？共党政权就是绞肉机，只要它还叫“共产”党，就决不会对人负责！在毛心目中，权力至上，“人”只是夺权与掌权的工具，而工具是随时可以被抛弃毁灭的。1957 年，毛在莫斯科全球共产党大会上说：“有人说穷是坏事，我看穷是好事。越穷越要革命。”也就是说，穷人不怕死，好充当炮灰。他还向赫鲁晓夫建议：你们只要挑动美国人动武就行了，你们要我们出多少师来引诱美军，我们就会给你们多少个师——100 个，200 个，1 千个，都行。然后，你们投原子弹消灭美帝。“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 27 亿……”这就是为了他的“世界革命”把中国人当炮灰的证据。新世纪的朱成虎将军鼓吹中国西安以东国土任美国核弹轰炸就是毛的阴魂不散！正是这种把“人”当作工具的观点，导致中共执政后在全国建立农奴制。出生于农民的毛，极端歧视农民！梁漱溟说“工农九天九地”的悬殊，戮穿毛泽东的欺世盗名。毛却倒打一耙地辱骂梁先生，到不堪入耳的地步。

雷震说：共产党没有人性。共党只讲爱党爱领袖，不讲爱亲爱友爱人。皇权时代，境内出了孝子案（即忤逆欺凌父母），县官有失民风教化之责，要被贬。可薄熙来踹断其父肋骨三根，却是共党的好儿子；老婆贴丈夫大字报，叫站稳革命立场，称好干部。如此撕裂亲情友情，败坏人情人性者，却是共党的栋梁。共党的党性就是以兽性不如的奴性奠基的，难怪他们要反普世价值！“马列主义乃以阶级斗争之理论，使同一地方，同一民族，都要发生内部斗争，甚至主张家庭革命，使父子兄弟乃至夫妇之间，都有极激烈的斗争，甚矣。人之不仁也！吾恐自有历史记载以还，从来没有如此‘违反人性’‘违反自然’之教义，这不是邪说诬民是什么？”雷震在 1951 年 9 月的一篇文章中痛斥：“今日大家骂共产党徒是‘共匪’，然匪犹‘人’也，盗亦有道也。盗匪尚有父子兄弟夫妇之亲，朋友之义，人类之爱，而共产党徒的一切作为，简直是禽兽之不若，岂能与盗匪相比拟哉！”他还说：“我们和共党之间，有一根本差异，绝对不能相容之处，即共党把人们当作工具，当作物料，一切计划设施，不以人性为出发点。”雷震在 1955 年还提出：“为保持人类尊严而反共”，“反共即是为了人类尊严，则反共事业的本身，就是一个人权运动。”雷震曾把共党喻为“人类底公敌”。他在 1958 年指出共产党杀人不是因为冲动，而是有哲学基础、有计划性的。

五四时期，鲁迅呐喊：“打倒吃人的旧礼教”，现在我们要呐喊：打倒吃人的党性了。

5.吃人的“妈妈”该当何罪？

人民应是党的妈妈！党是人民的儿子，是人民养活了党！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是第一位的。人民在党之上，是理所当然的；把党凌驾于人民之上，是万万不能允许的。违反这一点，正是中国人民受苦受难的根源，也是国家发展步履艰难的根源。

一部人类政治史，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掌权者的驯化史。中共对人民群众的驯化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但人民对中共的驯化却是负数！共党一贯说，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是人民公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是主人翁，是主公。但是，这种主仆关系，就象汉献帝和董卓，人民成了他们练拳愚弄的沙袋玩偶。任何一个政党都是脱胎于人民，人民是党的爹妈。可共党却把这类最最简单的常识也忘了，几十年来，这个恶仆可以随心所欲地欺凌弱主，开口就欺诈，出手就暴打，蛮不讲理，弑父杀娘。更邪恶的是，共党还厚颜无耻地要人民喊它“亲爱的妈妈！”这是本末倒置，而且称谓上的乱伦。亵渎人间最神圣的名词感情——母子之情。

《国际歌》说“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东方红》却说共产党象太阳、是“大救星”。一个唱歌无神论，一个唱有神论，互相矛盾，愚弄中国人几十年，把国人弄成了鹦鹉！

还有许多红歌把党比母亲，说党养活了人民。共产制度把人民所获得的一切都说成是党的恩赐。其理由是：世上所有的人都是由工人农民养活的，而党是他们的代表，还恩赐给他们生产资料；所以，任何人都是党养活的，只许感恩戴德。屁民喝毒奶，权贵吃人奶。追究毒奶就必须追究中南海，中南海是毒根。没有了这个毒根，中国的有毒食品就会少到几近于无。其实，明眼人早就知道：中国社会的万毒之源不是别人，正是这个表面上“伟光正”，实际上恶毒无比的中共。党妈妈的奶才是最毒的奶。中共这几十年从来都没改“狼外婆”的本性，却总喜欢要别人唤自己是“妈”。1950年代有首肉麻歌叫《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1980年代殷秀梅的那首《党啊亲爱的妈妈》“你用乳汁把我养大”！肉麻得人起鸡皮疙瘩！80多岁母亲的甘甜的乳汁怎么抚养五千多岁的儿子？党哪有乳房嘛！退一步讲，中共以娘自居也可以，就一定要最基本的舐犊之心，起码要爱护子民，但这个党却不是这样，而以虐民为能事为爱好，对自己的“孩儿”百般蹂躏。以致在这“妈”乳汁哺育期间，上亿的国人非正常死亡。中共这个“妈”连“后妈”都不如，分明是不折不扣的“毒奶妈”。它欺压人民，不讲人权，还不许别人说，既象泼妇，又象悍妇，既虐待公婆又残害子女，还说这是她的家事，不要别人管。殊不知，在现代法治社会里，父母有生儿育女的权利，却没有虐待子女的权利，即使是亲生的也不行！如果这样做了，便是犯法，外界有权干涉这种家庭暴力。2013年9月18日，江苏22岁的年轻妈妈乐燕饿死了自己2个女儿，被中共的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中共在1958-1962年饿死了5千万中国人，文革又整死2千万中国人，依据同样法条，中共至少要被判亿万次死刑！

真正的母亲不求孩子回报她，更不会强迫孩子天天唱歌赞美她；真正的母亲总是把好的东西省给孩子吃，而不是自己把好吃的全吃了，把残羹剩饭给孩子；真正的母亲为了保卫孩子可以献出生命，而不是老让孩子为自己去打架。真正的母亲听得进孩子的批评，不会孩子一骂她就把孩子关起来。真正的母亲只有一个。可许多中国人一出生就有很多共党“妈妈”，难道他们是弃婴吗？所以，“弃婴”殷秀梅移民美国了。

流行的“母亲打孩子”的论调来自于被平反了右派刘绍棠、丁玲、景克宁、提钟政、张贤亮、王蒙、朱镕基、张贤亮、曲啸。他们竟说当初共党把他打成右派是“娘打儿子”。共党说他们是地地道道的反动派，要给他们踏上千万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共党何曾当他们是儿子。这些奴才竟说人家当初打他们是“娘打儿子”。这样说，好像不那么恶劣了；实际上，母亲打孩子有这样故意往死里打的吗？奴才竟奴才到这个地步，真是万劫不复了。

朱镕基 1957 年被误划右派；1988 年是反思文革最深入的时候，他却在上海讲话中宣称“我是个孤儿，党就是我的母亲。”可见，他不过是另一个曲啸。所以，在人性 and 党性出现矛盾时，他坚定地站在党性一边；在民众和党魁产生冲突时，他坚决维护党魁的权威，把民众的利益丢在一边。至于推动中国的自由民主，从来不是他追求的目标。相反，当有外国记者问及中国的民主问题时，他傲慢地说，我在年轻时就在争取民主了。言下之意，当时你还不知在哪里呢？搞了 60 年“民主”仍坐在专制龙椅上的人说出这话，真不知羞耻。退休后的朱镕基在 2011 年年 4 月，借母校清华校庆与师生座谈，怒目敛容地用手拍着《中国农民调查》说，作者在书中攻击分税制造成农民贫穷，是无知透顶！他还特别说明，“这本书受到很多国外异见分子的吹捧呢”。此语充分显露了朱镕基反对民主的坚定立场。

电影《牧马人》的主人翁许灵均被打成右派，流放内蒙古 20 年。早年移居美国的父亲回国看望他，邀请他去美国生活，可是被他坚决地拒绝了。理由是：自己和千百万中国人民的苦难是“一场历史的误会”，是“母亲错怪了孩子”。孩子是不会埋怨母亲的，因为母亲爱孩子，希望孩子好，尽管有时方法不对头。中共宣传“爹亲娘亲不如党亲”，要人们始终信赖、跟随“比爹娘还亲”的中共。然而推崇孝道的中国人一直把乱认父母看成是奇耻大辱，“认贼作父”是骂人最重的一句话。主人公许灵均的原型就是曲啸先生。

1980 年代中期，当了 20 几年的右派、吃了很多苦的曲啸，平反出来后到全国各地去演讲，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讲：“党就是妈妈，妈妈打错了孩子，孩子是不会也不应该记仇的！”“我出来以后啊，我对共产党更热爱了”。这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不是用法律讨回公道，而是到处辩称甚至跑到美国宣称：“母亲错打了孩子，孩子怎么能怨恨母亲？”听完曲啸的故事，美籍台湾人汪荣祖发言说：“我过去只知道蒋介石国民党是如何独裁，如何玩政治，不诚实，专门欺骗台湾人说共产党毛主席是多么独裁、多么血腥、多么残酷地对待不同政见者。对国民党的宣传我从来都反着读，绝不相信国民党的骗子把戏，而真心相信大陆共产党的报纸，因为那些报道都是跟国民党的说法相反的。可是今天，曲啸教授的演讲，当真是血泪的控诉，句句血，声声泪！一个青年学者平白无故就坐牢 22 年！而这些，我在台湾时也看到过类似的报道，但报道的事件没有这么邪乎，没有这么真切，没有这么令人愤怒。”听到这里，刘中海先生已经坐不住了，他的脸色苍白，表情显示着后悔、吃惊、恐惧与遗憾。而曲啸的嘴唇在颤抖，他的腿也在颤抖，突如其来的打击如同晴天霹雳打得他晕头转向。在汪荣祖教授停下来的一刹那，刘中海便立刻站立起来，想停止汪教授的评论。可汪教授继续评论道：“什么党是亲娘，可如此长期地打自己的孩子，那还是亲娘吗？比后娘都残忍，还有什么资格要求被虐待的孩子忠诚于她？母亲这样对待自己的孩子，在任何文明国家都是非法的，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的。”汪教授如此愤怒令在场的人震惊。中共随后停止曲啸的演讲。曲啸回国后基本上不再参加活动了，不久就脑瘫了，半身不遂，失去了说话能力。

“母亲错打了孩子”是党文化经常用到的比喻，也是党奴们的普遍心态。中共无视公民的独

立和平等人格，硬要把党与公民关系变成“母子”关系。中共一而再、再而三地把公民比做“不懂事的小孩子”，把自己封作“母亲”。他们沉醉于这种封建专制主义的自大狂，简直不知人间还有羞耻之事。共党把自己比喻成“母亲”，这是其它的政党很少有的无耻现象，以此骗取国人的依赖、顺从和供奉。一个政党怎敢自称是人民的妈妈呢？完全是厚颜无耻的流氓无赖作风！把中共政权比喻为“母亲”，完全颠倒了人民和政权的关系。其实，母亲跟孩子是一种天然的关系，而共党跟百姓根本没有这种关系。统治阶级把社会关系中的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与家庭中的长幼关系混为一谈，掩盖了政治中吃人的事实。

2012年5月9日中共广东省第11次代表大会在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隆重开幕，汪洋代表中共广东省第十届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他指出，“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也是建设和享有幸福广东的主体。追求幸福，是人民的权利；造福人民，是党和政府的责任。我们必须破除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认识，切实维护并发挥好人民群众建设幸福广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尊重人民首创，让人民群众大胆探索自己的幸福道路。”

2013-9-309:06 只看该作者
6. 专制又血腥的五星红旗

中共的第一党旗的图案是镰刀锤子，它自我标榜它代表了工农利益，这是弥天大谎。共党在野时诡称代表工农，煽惑工农大众为其火中取栗。它持续使用暴力，以数千万民众为炮灰，颠覆了亚洲第一个共和政权，建立起所谓的“工农”政权。共党马上变了个戏法，说：工人阶级是通过它的先锋队来领导这个社会的，先锋队就是共党自己。这样一来，工人阶级就靠边站了，农民也降为二等公民了。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共的党再也没有唱赞扬工农的高调了，工人和农民都沦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因此，镰刀锤子旗的出镜率也大为减少了。

五星红旗其实是共党的第二党旗。相比中共直接盗版苏共血旗作党旗，中共国旗显得更有欺骗性。这面旗用1颗大星代表中共，用4颗小星代表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大星的外接圆直径为小星的3倍，每颗小星各有一个星尖指向着大星的中心点，好似向日葵朝拜太阳，表达了群众对党的卑躬屈膝、俯首称臣！谁是主子，谁是奴才，这面旗子上表现得一清二楚。这面国旗表现的是党大民小、人轻官重、一党独尊、一党专政的党天下；它丝毫没有表现平等自由的普世价值，也没有表现“人民最大”的民主理念。所以，“五星红旗”根本不是什么国旗，而是象征中共一党独大、一党独裁的第二面党旗。

泱泱大国之旗，突出的是一个泱泱大党，党把自己放在国旗之上。真是恬不知耻！那颗高高在上的大星（党星）告示人们，这个暴力集团凌驾于国家和人民之上，所以，中共张口就来“党和国家”、“党和人民”；这就意味着“国家”、“人民”永远是党的尾巴，只能跟在党的后面。中共建政时，中共党员不过3、400万，全国人口有5.4亿多，中共尚不及全国人口1%，而按毛泽东解释代表数亿“中国人民”的4颗小星之体例却远小于大星，四颗小星加起来尚不足大星之一半。数亿华夏子民在中共党魁眼中份量尚不及共党一半，不过是党的仆从而已。血旗展现了中共打天下、坐天下、吃天下的流氓造反心态和帝王意识。

五星红旗铺天盖地满面红，向人展示的是暴力流血——格杀勿论的红色恐怖主义。仅在1927年至1936年的国共第一次内战中，江西一省人口便从2千余万陡降至1千余万，在其暴力篡政夺权期间，已有数千万计的中华百姓成为共产运动的牺牲品。毛泽东早在1949年，就

着手削弱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推出一党独大；到了 1957 年，通过反右整倒了民主党派，实现了一党专制；最后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又摆脱党内制约，成了至高无上的终身领袖，终于实现了做到了彻底的个人独裁，又害死了 8 千万中国人，堪称反宇宙的魔王。因此，可以说，这面五星红旗是中共一党独大实行血腥独裁统治的象征符号！

总之，血旗只代表共党，它不代表中国，也不代表中国人民。血旗代表的是中共的嗜血、残暴、杀戮、独裁、专制、谎言、洗脑、奴役与罪恶！

《红旗飘飘》这首歌讲：“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五星红旗，我为你自豪。为你欢呼，我为你祝福。你的名字，比我生命更重要！”

一个将党置于人民之上的“国旗”，一个由人民的鲜血染红的“国旗”，一个将中共狰狞面目宣告于天下的“国旗”，中国人有什么理由可以五星红旗为骄傲？

五星红旗，你的名字真的比生命更重要？一块腥红的、血淋淋的布，怎么竟比人的生命更重要？一个流氓政权的可耻标志，难道真的比人的生命更重要？怪不得，为了建立社会主义红色政权，竟不惜大开杀戒地挑起内战，以数千万中国人的死亡为代价终于铺平了登上天安门城楼的红地毯；怪不得，为了保卫共党政权，竟连绵不绝地搞起了一波紧似一波的颠三倒四的毛式运动；怪不得，为了反修防修、警惕出现中国的赫鲁晓夫而轰轰烈烈地搞起了文革十年浩劫，致使全国山河鲜血淋漓地腥红一片；怪不得，1989 年六四大屠杀，中共对手无寸铁的人民杀得是那么有理、杀得是那么酣畅、杀得是那么痛也快哉、杀得是脸不变色心不跳；怪不得，为了抢救一根被洪水冲走的电线杆大木头，竟不惜牺牲人的宝贵生命；怪不得，怪不得——，却原来：“五星红旗，你的名字比我的生命更重要”！

《红旗飘飘》这首歌极端无耻地表达了共产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人的生命不重要！中国人的生命更是不重要！只有五星红旗最重要！中国人是欢呼五星红旗没有人权的猪！为了五星红旗的高高飘扬、永远飘扬，哪里还有人的生命？哪里还有生命的价值和人的尊严？哪里还有人权？《红旗飘飘》有如妓女一般自得其乐地和献媚邀宠地反复咏唱着如此恶毒的语言，宣泄着杀气腾腾的中共暴力：“五星红旗，你的名字比我的生命更重要”！

为了五星红旗江山一统、万世一系、在整个地球各处飘扬，人的生命是无关紧要的、是根本就见不到的；为了保卫中共党权压倒一切，就要砍掉遇罗克似的泱泱人头、要割掉张志新一样说出真话的广大喉咙；就要封网抓捕刘晓波！哪里还有人的生命的价值？哪里还有人的尊严、人的地位？哪里还有人权？哪里还有自由？在这飘飘然忘乎所以的歌词里，只有五星红旗最重要，而其他的一切，包括人的一切统统地不重要！

难道人的生命，真的就不如五星红旗重要吗？难道人的生命，竟如此这般地大打折扣、如此这般地一败涂地、如此这般地卑贱下作吗？在这里，《红旗飘飘》的词作者表达了极端邪恶、丑陋思想——蔑视人性、否定人生、戕害生命。《红旗飘飘》是愚弄人民的精神砒霜！这是为残民以逞且草菅人命的暴政助纣为虐，是为虎作伥！这是超级法西斯共党的狂妄叫嚣！所以，2002 年浙江诸暨农民吕伟先在公共场合撕毁、焚烧中共国旗，被当地法院以“侮辱国旗罪”判处有期徒刑 4 年。1984 年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的共产青年约翰逊等多人在达拉斯市厅前，焚烧美国国旗，美国法院认定这是一种表达他们观点的“言论”，无罪。

在这广袤的人世间，在这浩瀚的宇宙中，人是最可宝贵的，人的生命是最可宝贵的！与任何其他事物相比，人的生命应该永远地摆在第一位！没有人的生命，其他的一切都是毫无意义的！在人的生命面前，其他的一切都不能不失去应有的重量！五星红旗算什么？五星红旗的名字算什么？与人的生命相比，五星红旗可以说什么都不是，顶多只能算作是鲜血淋漓的一块破抹布而已！五星红旗，又怎么能够跟人的生命相提并论？

中共为重要首领和外国共产党领袖死亡下半旗外，几乎未对百姓的重大伤亡下过半旗。1949年后，中共国一共降半旗 52 次，其中为中国领导人降半旗 30 次；为外国元首降 17 次，其中为中共的干爹斯大林居然降了 2 次！为在国外的烈士降了 2 次。骇人听闻的是唐山大地震，联合国总部为遇难的 24 万国人降下半旗，我们的五星红旗依然高高飘扬。2008 年汶川大地震后，秘鲁政府 2008 年 5 月 16 日颁布最高政令，宣布 5 月 19 日为“全国哀悼日”，以悼念中国在汶川地震中的遇难者。如果中国政府让外国政府率先降半旗哀悼，而自己却无动于衷，岂不成了国际大笑话，也无法向国内舆论交待。所以，中国政府不得不决定 19～21 日为下半旗的全国哀悼日，五星红旗终于向普通中国民众低下了高贵的头颅。

2010 年甘肃舟曲发生特大泥石流灾害，造成 1471 人死亡，数千人受伤。国务院把 2010 年 8 月 15 日定为全国哀悼日，举国降半旗志哀。这天，12 点 10 分，中央电视台一位男主持说出了一句叫人怦然心动的隽永之语：“当五星红旗缓缓降落时，人性的尊严冉冉升起。”此语一播出便激起人们的热议：“那么‘当五星红旗冉冉上升时’呢？”“当五星红旗再次高高飘扬时，人性的尊严不知又跑哪里去了。”“尊严？对谁尊？对谁严？”“生时如草木一样低贱，死了倒有尊严，结论是生不如死。”“原来我们的人性一直在低谷。”

“当五星红旗缓缓降落时，人性的尊严冉冉升起。”中国人已经清醒，他们心里念叨的不再是瞬息的降半旗，而是什么时候降全旗，不是降一天、两天，而是降下去了就永不升起。唯其红旗落地，改旗易帜，中国人民才有希望拥抱民主、法制、人权，才有希望获得独立、平等、自由、尊严。台湾作家三毛曾经坦承“我只认土地，不认旗子”。对于台湾人来说，五星红更是一个强烈刺激：既然你共产党把一党专政标示于国旗，列之于法典，容不得异党异派，那还和我们谈什么呢？海峡两岸谈判的契机在于，江泽民和一些中国领导人在不同场合表示，只要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都可以谈，包括国号、国旗、国歌等。这表明中共若干人还是有自知之明，他们认识到在国旗上公开张扬一党专制理念，炫耀党大民小，已经不得人心。正如一切独裁政权最终都会被埋葬一样，中共独裁政权最终也逃脱不了被埋葬的下场，这是毫无疑问的。五星红旗作为血腥独裁的象征性符号，也最终会被中国人民唾弃，就如纳粹的国旗，苏联的国旗，最终被这两个国家的人民唾弃一样。

7. 习总愚弄国人，给少儿洗脑——恐怖的少先队队歌

中共在对人民的洗脑中，反复强调红旗是用烈士的鲜血染红。儿童少年先锋队的标志符号红领巾中就明文规定，红领巾是国旗一角，是用烈士鲜血染成，可以说中国的儿童从小就被灌输暴力革命观念，其对流血的嗜好、对人命的贱视遂深入骨髓。从 1983 年开始，中共便下达了一系列关于加强对中、小学生进行国旗教育的指示与通知。《国旗法》也在 1990 年出台并于当年 10 月 1 日实施。《国旗法》强制规定学校必须悬挂国旗，并要求举行升旗仪式时，必须面向国旗肃立行注目礼。港、澳“回归”后，升旗仪式又成为对民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

重要工具，血旗更以“国旗”之名，大行驯化民众之实。当民众面对“冉冉而升的五星红旗”肃然起敬、热血澎湃、为爱国热情支配之时，不知不觉中便认可了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当民众以五星血旗为爱国寄托之时，不经意间便认同了反天反地反人类的党文化。

2013年“国庆节”，习近平引导许多儿童在天安门广场观看升国旗的仪式，随后，少年儿童唱少先队队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其歌词云：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爱祖国，爱人民，鲜艳的红领巾飘扬在前胸。不怕困难，不怕敌人，顽强学习，坚决斗争……沿着革命先辈的光荣路程，爱祖国，爱人民，少先队员是我们骄傲的名称。时刻准备，建立功勋，要把敌人，消灭干净，为着理想，勇敢前进，前进！

一位家长听后谈到：“女儿给我唱少先队队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消灭敌人，勇敢前进……’。我问女儿，假如爸爸是你的敌人，你怎么办？女儿毫不犹豫地握紧拳头，‘说，消灭！’大有一种大义灭亲的架势。”任何一群人在世界上总有与之相对立的另一群人的存在，是否就一定要消灭对方？能否求同存异、和平竞争？这让人很容易就联想到奥斯威辛、南京大屠杀、焚书坑儒和文革。在这首歌里听不到和平、宽容、自由、友情、亲情、母爱、善良和真诚的声音，听不到对大自然的赞美，听不到对生命神圣的歌颂；听到的只是血腥的仇恨、狭隘的偏见、恐怖的专政。这种灌输仇恨、宣扬杀戮的歌，远远落后于时代，可是，中国的孩子们就得这样一遍一遍地唱下去……陈独秀指出，共产主义是法西斯之母，难道要让我们的后代都成为毫无人性的法西斯恐怖分子？

中共一诞生把少年儿童当炮灰使用，何等的草菅人命，何等的邪恶！从1926年“3.18”首都革命，可以感知托洛茨基所声称的“铁与血”，中共用学生的身体去撞军阀的枪杆而在军阀的枪下倒下。而从容不迫的李大钊却把中共北方领导机关迅速地迁入了苏联大使馆。“3.18”那天，有一位校长却令一个虚岁13岁的中学生“前往执旗，遂遭击毙”。这是最小的遇难者，此童名朱良钧，1914年出生，祖籍江苏江都县，北京清明中学初一学生，枪响后被人群践踏致死，年12岁。“3.18惨案”死难者中，初中生占了相当大的一部分。如：谢戡，男，祖籍江苏武进县，1912年12月生，北京会文中学学生，未满15周岁。陈时棻，男，祖籍广东文昌县，北京艺文中学学生，年15岁。这是中国政治童工史上悲惨的一幕。首都革命的指挥者陈毅却从这少年儿童血海中杀出，成了共国的元帅。中国青年党宣称“这是中共故意借刀杀人”；陈西滢在《现代评论》上发表《闲话》一文，指出：运动的领导者是故意领人去死以造成改朝换代之势，并指责鲁迅煽动学生。鲁迅反过来指责陈西滢造谣，写了《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主张“痛打落水狗”，而狗在陆地上跑时，他却躲得远远的。

中国现代史上最有名的政治童工就是刘胡兰。刘胡兰，1932年10月8日出生于山西省文水县。1946年6月，这位不满14周岁的小女孩被吸收为中共预备党员，并被派到云周西村领导当地的土改运动。按照当时党章年满18岁才可入党，吸收未成年人入党，并要他们为党献出一切，属于拐骗性质。同年12月，未经任何司法程序，刘胡兰配合共党武装工作队处死了该村村长石佩怀。一个13、4岁的花季少女，如果不是听信了歪理邪说而走火入魔，她怎么会成为杀手！1947年1月，刘胡兰被阎锡山的军队判处死刑，阎军逼迫几名老乡把刘胡兰铡死，死时14岁3个月。一个完全没有民事行为能力的小姑娘，不仅被拉进了暴力团伙，还因此被铡了头。工厂、作坊使用童工都是违法的，中共却使用童工，教唆未成年人犯罪并导致其悲惨死亡。不仅如此，毛登基后，竟残忍地让刘胡兰的二妹刘爱兰在戏剧《刘胡兰》中扮演其姐，刘胡兰的继母胡文秀在文革中竟被怀疑为出卖刘胡兰的凶手而受到摧残。

1947年2月，毛泽东为刘胡兰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就是在号召没有辨别力的未成年人为党牺牲，何其毒也。1957年1月12日，刘胡兰陵园在云周西村落成并对外开放，1959年改称刘胡兰纪念馆，占地面积63000多平方米，位居全国个人纪念馆首位。“使用童工”是不代表的先进文化；因此，建议将刘胡兰纪念馆改为“国耻纪念馆”。

论政治童工的规模，当属文革期间的红小兵为最大。当时，数以亿计的小学生被毛泽东组成红小兵，参与各种政治运动，要参加各种游行和群众大会、唱语录歌、贴标语、呼口号、挥舞小红旗（或者红宝书）、跳忠字舞，等等，为毛泽东迫害政治异己制造恐怖气氛。

宣传、鼓励、组织、训练、强迫、诱惑儿童从事非常危险的敌对活动，是恐怖组织和法西斯政党的一大特征，纳粹、苏俄、中共都长于此道。刘少奇有一个著名的“驯服工具论”，即号召大家都做共产党的“驯服工具”。在中共历史上，从“‘红小鬼’少共国际”再到“儿童团”政治童工一直被津津乐道，是有目共睹的。什么小兵张嘎、潘东子、刘文学、小铁锤、草原英雄小姐妹等。毛之所以要立刘胡兰这道“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忠义牌坊，就是要自己地盘上千千万万个人像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刘文学、雷锋等那样有“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为党坐江山献头颅，做人肉炸弹、当牺牲品去塞枪眼。中共十分重视对未成年人的宣传教育，从1949年前的所谓儿童团，到49年后的少先队，文革时期的红小兵、红卫兵，再到如今的少先队，其实质都是在培养一个又一个刘胡兰、潘东子似的冷血杀手。中共之险恶用心，不外乎是对少年儿童施行偷心换脑术，让他们永远失去独立思考能力，失去判断是非的能力，成为唯党魁是瞻、无条件恪守“君要臣死，臣不能不死”的冷血动物。

8. 吃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

中国由国家颁布的国歌，最早产生于19世纪末。1920年段祺瑞政府命教育部专设了一个“国歌研究会”，征集曲谱。最后采用是虞舜所作的《卿云歌》：“卿云烂兮，纪漫漫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1920年10月，这首歌曲由当时的教育部报请国务院批准，定为国歌，并下令于1921年7月在全国施行。1924年6月孙中山为黄埔军校题词词：“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建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1927年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以此为国歌。

1949年中共建国时，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被定为国歌。文革时期，《东方红》成了国歌，1977年《义勇军进行曲》的曲被定为国歌的曲，歌词更新为“高举毛泽东的旗帜，前进”；1982年歌词又恢复到田汉的原词，2004年写入宪法。

在中共的伪歌咏活动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充斥着草菅人命的价值观和消灭仇敌的狭隘意识。“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这段由田汉写于1930年代的《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作为那个全民抗战年代的特殊时代，确实需要“舍生取义”的牺牲精神，起到它应有的作用，达到了抗日的效果；但把它永久化、普遍化，作为一种信仰和价值体系强加给每一个中国人则是错误的。这是因为：

第一，国家或政府无权把一种价值观强加于人、强加于国民。

第二，“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违背了“人命关天、生命神圣”的基本原理，这只会使人想起人肉炸弹或想起孟姜女在长城脚下哭诉那当局草菅人命后的凄凉——“长城”比人的生命还重要！？田汉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不可能有人权至上、人命至上的价值观。1957年田汉没有被打成“右派”，但在文革中受迫害，被逼喝尿吃屎，1968年12月10日死于狱中。这首歌要求国民交出的不仅仅是他们的财产，而且是他们的“血肉”，即要求他们为国家为集体——“长城”牺牲自己的生命。中国人都像田汉一样做了共党的牺牲品。

在邓小平“发展就是硬道理”鼓噪下，中共又用民工的“血肉”筑起了带血的GDP长城。中国每年至少有18万人死于生产事故，平均每天有350人死于工业、道路、航海及航空事故以及火灾。《参考消息》报道，中国每亿元GDP工伤死亡1人，2003年死亡达13.6万人，以此推算，2006年工伤死亡人数将达到20万，“是名副其实的带血GDP”。这个死亡数字只是冰山一角，能统计到的死亡数字，要么是国有企业，要么是死人较多的特大事故，私企和外企平常死个把人根本到不了统计部门，而私企和外企用工数量远远超过国企，如果考虑到这个因素，每年死亡人数至少相当于一场南京大屠杀。

2000-2005年，全国煤矿死亡10人以上的矿难平均每周一次，中国每年生产8000万吨煤炭的代价，就是每年平均死亡6000多人，相当于每天死亡近17人，这还是政府部门的统计数字，实际死亡人数肯定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即便按照这个数字，中国每百万吨煤的死亡率是美国的100倍，是俄罗斯和印度的10倍，死亡人数超过世界其它各国的总和。2010年，智利不但发生了地震还发生了矿难，33名矿工在井下呆了两三个月都没死，不但证明了大地可以“孕育”人类，更像是在提醒某些国家，矿难不一定要死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前所长资中筠女士曾讲过一个有趣的故事：“前几年一次会议，我碰到一个德国人，他说中国将要成为世界经济的引擎。会后我跟他谈，你过高估计了中国的发展，中国还有很多困难。他说，你们连工人的工资都可以不发，我们怎么竞争得过你们？！”举个例子，好比一场田径赛跑。所有的队员都遵守各项赛跑规则，公平竞争，但却有辽宁“马家军”的运动员私下喝了兴奋剂，不惜以严重损害自身的健康为代价争取奖牌，要是不超过别人、名列前茅、创造“中国奇迹”，那就没有天理了。

第三，“万众一心”属于一种特殊的战时体制，是一种古罗马式的独裁体制，人民的个人财产自由往往得不到保障，是一种应付战争的紧急状态。若把这种战争体制长期延续下去，人民就成了国家的奴隶。毛执政时就一直强调全国人民学习共军，其目的就是如此。在中国，个人永远成了实现某种主义的手段、工具、甚至是牺牲品。《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中共的目的就是强调全国人民都要像战士一样无条件地服从共党。在共党的主导下，将《义勇军进行曲》由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曲上升为国歌，将全国人民集结成一支义勇军、集结一支战争敢死队，把人民变成扼杀敌人的工具、炮灰时，致命的灾难就发生了一一镇反、肃反、杀地主、反右、打走资派、64……人的权利随意被践踏，个人随时被奴役……

第四，这首歌充斥着不共戴天的敌我意识。在抗战年代是可取的、有意义的；在和平年代则是不可取的、有害的。这首歌不仅要求国民为国家献出生命之躯的“血肉”，而且要求他们献出整个灵魂。因为，既然要求“万众一心”，那么谁有了“二心”，就成了异端、汉奸或敌人，自然而然地成为整肃和消灭的对象。而“敌人”的标准具有很大的弹性，而判定“敌人”的任务则由党的领袖来担当。这样的敌人，可以是敌对的政治党派如“AB团”、“托派”、“国

民党反动派”；可以是阶级的“敌人”如地主富农资本家；可以是民族的“敌人”（如“抗美援朝”时的美国）；可以是和党有“二心”的知识分子群体（反右）；可以是党内路线斗争中的失败者（如彭德怀、刘少奇）；这个敌人有时也可以是大自然（这叫征服自然）。对于敌人往往消灭了之，这就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这不利于博爱价值观的建立，没有“爱你的敌人”的博爱价值观，不可能建立宪政民主社会。

对每个中国人来说，最大的危险原来并不是党所指的那些敌人，而恰恰是这个时时要求所有的人交出自己的“血肉”和灵魂的共产极权体制本身。这一点，仅在毛泽东发动的和大自然搏斗的大跃进中，就得到了充分的证明，在这场完全由人为因素导致的大饥荒中饿死了 5 千多万人，仅四川的死亡人数就达 1200 万人（一说 2 千万）。

9. 周恩来的遗产——周公汤

早在红军时期，特权在共党内就理所当然。毛在井冈山住了 15 个月，进山里只有 3 次，总共待了不到 1 个月。他拥有众多的仆人或称“勤杂人员”、“工作人员”。里面有司务长、伙夫，有专烧水挑水的，有马夫照管他的坐骑小黄马，有专门送信的，还有一位被毛授予“两大任务”，一是买烟，一是收集书籍、报纸。在井冈山时曾流行一句顺口溜，朱老总挑米上坳，毛泽东在后方“打炮”（泡妞）。毛在福建古田时每天享用牛奶、一公斤牛肉炖汤，外带一只母鸡。毛发明了“绝对平均主义”这顶帽子，来压制不满的声音。文革搞臭刘少奇的“罪行材料”向全国散发，弄得全国都知道刘少奇在战争年代仍然吃鸡。

其实，延安时期的中组部部长陈云做报告时说：“刚才这位同志问，既然共产党是讲平等的，为什么我们大家的生活这么苦，毛主席却每天吃一只鸡？”“是的，毛主席每天吃一只鸡，这不是毛主席愿意的。毛主席希望和我们大家过一样的生活，但同志们想想，毛主席的健康对中国革命多么重要！所以，毛主席不愿吃鸡，党中央的命令一定要毛主席吃鸡。和我们每一个革命同志一样，毛主席吃鸡也是一种革命任务。”可见，毛泽东“代表”人民吃鸡；当然他也“代表”人民玩美女，那都是党中央的命令。陈云这是在为毛打掩护，用子虚乌有的中央命令，来掩护贪吃的毛每天奢侈地吃鸡破坏了共党形象的事实。陈云能够成为中共高层的不倒翁，顺应毛的一切所作所为并且为之涂脂抹粉是不可缺少的基础。

当年延安不但有明确的等级，中央干部还享受特供产品，这些产品都要从敌占区甚至香港冒着危险长途贩运来。王实味称延安是“衣分三色，食分五等”。随后毛泽东把延安的这些愤愤不平者打成也“特务”并枪杀了王实味（此前，毛执意要和江青正式同居结婚时，遭到政治局成员的反。但时任军中要职的贺龙挺身而出，为毛保驾护“淫”，他用土匪腔说道：“堂堂一个大主席，讨个女人有什么了不起，谁再议论我枪毙了他”——连中央政治局委员都被威胁要“枪毙”，何况文人王实味乎）。如此凶残、血腥，让人至今谈虎色变，从此再也没人敢对中共的特权制度说三道四。这段历史事实就说明，共产主义“革命”是不择手段的，它压倒了共产主义的“平等”原则，他要求普通党员充当领袖的工具或奴才。这样，共党领袖就既可以吃鸡，也可以乱搞女人甚至吃人，著名的周公汤就是证明。

在中国的很多落后地区，食用新鲜的人的大脑被称为大补，尤其是年轻的少男少女的新鲜大脑被称为补品中的极品。这些人的大脑被取出后经过加工在中共领袖的厨师手中变成了民间传闻的玉仙羹。因为传闻玉仙羹可以延年益寿，因此，在中共领袖内非常流行，提及玉仙羹

一定要讲周恩来，因为，玉仙羹还有一个别名，叫周公汤。

1962 年正是大饥荒人吃人的时候，因贺龙将玉仙羹的制作方法告之周恩来，而周恩来制成后食用并呈给毛泽东而得名周公汤。毛泽东自从吃了周公汤之后，性欲一发不可收拾，可谓老当益壮。所以，毛几乎每几天都要喝周公汤。这件事是高度机密，厨房的人都不知道，以为是普通的什么食物。做出来的东西，看不出来是人脑子做的。毛高兴的时候也会拿来招待其它中央领导，包括刘少奇和几个老帅都吃了。只有两个人没有吃，一个是彭德怀，他是当时就瞪眼拒绝了。另一个是林彪，他形式上的吃了一口就跑到厕所去吐掉了，恶心得不得了。为了这个事情，后来林彪在背后大骂毛。在文革末期，周恩来病疾缠身大量食用玉仙羹，但依然回天无术。这样的事，当年是大量的在做，但是自从毛死后几乎就停止了。厨房里知道这个事情的人一般就是一、两个人，而且讲明白了：说出去，就死无葬身之地。所以就像李志绥这样一直在毛身边的医生，都不知道这件事情。江泽民知道吃了这个之后能够增强性能力，一直心里痒。让厨房做了几次。后来广东献上婴儿汤之后，才算是有了替代品。

1970 年代，柬埔寨的波尔布特政权兴起的时候，波尔布特到北京朝拜，毛泽东曾多次用此汤款待他。他对周公汤很爱好，结果就学去了。后来柬埔寨头目食“玉仙羹”成风，在红色高棉大屠杀的纪念馆里就有照片为证。红色高棉垮台后，柬埔寨修建了红色高棉罪恶馆。该处原是一所高中，被波尔布特改造成专门对付思想犯的 S-21 监狱，大批知识份子以酷刑致死。馆中除了监狱及各种刑具，还陈列所有牺牲者临死前拍下的黑白照，许多令人毛骨耸然的酷刑：割喉、钻脑、活摔婴儿等，皆传自中共援柬的“专家与技术人员”！为了给柬共领导人进补，竟然特制了钻脑机，就是把要被处决的思想犯绑在一个固定在座椅上，置于钻脑机前，钻头就从被害者的后脑钻入，快速有效的进行活体取脑来制成玉仙羹。

缅甸的残暴也是他们的亲人无意透露的，1986 年前来广州生产的缅甸党魁的妻子李氏，当说到其夫性情暴烈时，小声说其在缅甸时，那些缅甸将俘虏的脑浆就着酒食。

由于玉仙羹制作残暴血腥，因此，非常隐蔽，但是在中国、朝鲜、越南、柬埔寨等国依然大量存在。尤其是中国和柬埔寨，许多的共产党领袖食玉仙羹成风，导致大批民众被杀，仅为取其大脑制作食物。在中国，被取脑子的人并不是什么样的人都行，他们的要求是年轻力壮，不能够有病，绝对不能够精神不正常什么的。一般的老弱病残那是根本就不要的，他们也怕吃出病来。另外，对于头骨的处理是很干净利索的，绝不会像柬埔寨能够找到那么多头上有洞的骷髅的，他们有专用的处理设备来做的。

周恩来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鬼，其残暴与狠毒超过了苏联的杀人魔头贝利亚几千倍，甚至上万倍。当顾顺章出卖了中共地下党时，周恩来曾于 1931 年亲自指挥杀手勒毙顾顺章全家与亲友 37 人，分别掩埋三处民居庭院。为了杀人灭口，连顾家幼童都逃不过他的毒手。都不是因为你已经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你可能会做什么：出生决定了未来，关系决定了前途。“世袭制、血统论”统统成立！连在顾顺章家的牌友(其中有周恩来的救命恩人斯励)都不放过。其野蛮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列宁枪杀俄国沙皇尼古拉全家的野蛮。

匪酋陈毅谈到当年如何在江西劫掠民财时曾经不打自招：“若捉住了豪绅家里的人固然可以定价赎取，这个办法比较难，因为红军声势浩大，土劣每每闻风而逃。此时只有贴条子一个办法，就是估量豪绅的房屋的价值，贴一张罚款的条子，如可值一万元则贴一百元，余类推，限两日内交款，不交则立予焚毁，每到期不交，则焚一栋屋以示威。这个方法很有效力，红

军的经济大批靠这个方法来解决”（见《陈毅军事文选》，共军出版社 1996 年 3 月第 1 版）。就是这样一个恶贯满盈的土匪组织，居然会有郭沫若、冯友兰、黄炎培、张东荪、储安平、章伯钧、罗隆基等一大批饱学之士与之称兄道弟呼朋唤友，为之鞍前马后鸣锣开道，实在令人百思而不得其解。想必这帮无耻文人的良心全喂狗了。

1934 年红军“长征”逃亡前，为了不暴露西窜行踪，担任红军总政委的周恩来悍然下令杀害了上万名伤病号以及“政治不可靠”份子，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万人坑事件”。1955 年 4 月，周赴印尼万隆出席亚非会议前，已获悉印航克甚米尔公主号专机被放置了定时炸弹，却还下令中国代表团其他成员按原计划登机，他为了迷惑国民党特务机关不再更改计划以确保他自己的安全，硬是把自己的部属与外国记者等 11 人葬身于太平洋之中，让别人给自己当替死鬼。1950 年代末，他下令残酷镇压抗暴起义的藏民，拆寺院、斗喇嘛、毁菩萨、烧经书；1960 年代中期他派遣红卫兵入藏“把喇嘛制度彻底打碎”，甚至强迫班禅喇嘛吃屎。

周恩来创建了中共的情报暗杀绑架体系；这些系统在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制造混乱、暴乱、暗杀。周恩来的情报体系遍布全国各地，在中国境内一切居民的一切活动、言论等都在周恩来系统监视之下。中共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周恩来都是实际执行人，捏造假事实、罗列历史罪证、诬陷等方式都是周恩来的看家本领。已解密的档案资料显示，迫害刘少奇、贺龙、彭德怀、陶铸致死，制造彭、罗、陆、杨冤狱等，周恩来都直接插手。他曾在把刘少奇定性为“叛徒、内奸、工贼”的专案审查报告上批示“此人该杀！”四字。在文革中，周恩来为保住自己的地位，不断地出卖别人，连自己的干女儿与亲弟弟都不放过。

周恩来、李鹏都是俄谍。周恩来是尼克尔斯基直接领导的苏共特工。在法国他已经每月领取俄国人经费，衣褶光鲜，手头阔绰。死后银行还有巨额外汇存款。金融机构 20 多年前清理账目时候偶然发现他有巨额外汇存款。大汉奸周恩来 1929 年帮助斯大林打击中华民国张学良的军队，他还把云南省最肥沃的江心坡(相当于安徽省面积)赠与缅甸；他出卖了外蒙，他不放过一切机会鼓吹“琉球属于日本”……

周恩来很淫乱。周恩来早年在德国搞共产活动时搞了一德国情人并生下了儿子。北京高层人士都知道，艾蓓是罗青长的女儿，而艾蓓的相貌完全不像罗青长，却像周恩来。中共建国后，贡献给毛泽东的享乐用的美女实际上都必须经过周恩来的同意，周恩来也是享用的一员，中南海既是办公之第，也是淫乐之宅。周恩来身边到底有过多少女人，永远没有人知道，周说：“保密的事非同小可，回家后，不要一时高兴就说出来”，“我老婆是老党员，中央委员，不该说的我对她就是不谈”。邓颖超也在一篇回忆周的文章中说，他们结婚后，聚少离多，他到那儿去，“去干啥、呆多久、从没有讲”。周一向“守口如瓶，滴水不漏”，“我们之间相互保密的事是很多的”（1982 年 6 月 30 日人民日报）。

10. 中共饿杀长春 30 万

1948 年 5-10 月，中共进攻长春，采取的是“围城困死”战术。当时的长春有人口 60 万，部队 5 万多，为了更长久地固守，守长春的郑洞国将军要平民离城。而共军却严禁城内百姓外出。8 月间，长春街头已有了弃尸，成群的野狗出去啃人尸体，然后人再杀狗，以狗肉充饥。那是当时的珍品。在饥饿无法忍受的情形下，人们潮水般涌向城外，但到了洪熙街的国军卡哨外，共匪仍不放行，有许多人向前冲，共匪就用机枪扫射，想回城国军也不准许，于

是留在洪熙街地区的近 10 万市民，形成了一个人吃人的世界。从市区出来，带着少许食品的人，一下子就被抢光，老弱妇孺，常被人践踏而死。当时的情势是先出市区的人，抢后出市区人的东西吃，饥民被迫喝死人脑壳水。

长春围困前有居民约 60 万，经过 5 个月的无情围困，至中共“解放”该城时，城中只剩下了 17 万人，减去逃走的，饿死了 30 多万人，实堪和“南京大屠杀”媲美了！参加围城的中共官兵说：“在外边就听说城里饿死多少人，还不觉怎么的。从死人堆里爬出多少回了，见多了，心肠硬了，不在乎了。可进城一看那样子就震惊了，不少人就流泪了。就连当时一些被迫执行围城命令的士兵都问：咱们是为穷人打天下的，饿死这么多人有几个富人？”

中共的粟裕大将说，利用饿死平民来迫使守城的国民党投降这一长春模式，在“若干城市采用”过。只是粟裕大将没有说是哪些城市。共军作家张正隆在《雪白、血红》里说饿死了 15 万；因这一部书，王震差点儿要毙了他。他本来就不敢在书里披露太多的实情，所以他所说的 15 万是缩小了的数字。当时日本新闻界估计在包围长春期间饿死约 20-30 万人，留在长春的日本人也大部份都被饿死了。因为日方已经无条件投降，与国共双方都无关系，再加上日本新闻从业人员的敬业精神较好，报道比较客观，日本人所说的数值是比较准的。

11. 中共制造大饥荒饿杀 6000 万

毛意识到大跃进政策会导致“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1958 年 11 月 21 日，毛对高层讲：“大办水利工程、大炼钢铁，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像铜、铝、煤碳、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 1/3 或者 1/4 或者死 5 千万人。”以当时全国 6 亿人口计，毛预计大跃进造成死亡数字是：3 亿、2 亿、1.5 亿、5 千万。毛明白这样说话太露骨了，犹抱琵琶半遮面地说：“死 5 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甚至掉脑袋）。”但他没有下令不干，反而示意要下面的人干，把责任推给他们：“你们议一下，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当人们死亡时就不能怪我。”可见，毛是故意要饿死人。事实上，大饥荒至少饿死了 6 千万。

1961 年 1 月 21 日胡适说：“大陆上人民饿死的约 6 千万。在梅县一个村庄里本有 4 千人口，已经饿死了一半，只有 2 千多人了。”金剑平指出：大饥荒最少饿死 6288.93 万人，总人口减少 6595.55 万。有学者估计大饥荒饿死了大约 7600 万人。宋美龄在美国说：中国饿死了 8 千万。刘少奇的儿子说：饿死了 8 千万。按官方公布的人口数推算，山东饿死 800 万；民间认为山东饿死 900 万；安徽饿死 700 万；民间推算饿死达 800 万。河南饿死 500 万（其中 1960 年约 190 万）；民间认为河南饿死了 900 万。四川省（包括重庆）1960 年底比 1957 年全省人口减少 1000 万。铁流指出：四川实际饿死了 2 千多万人。金剑平保守计算：仅天府之国四川，官员承认饿死 1250 万，实际高达 2616.52 万。甚至连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饥荒的西藏 1959 年到 1963 年也饿死了 70 万人。而根据最近的研究报告显示，西藏饿死的人数远远高于 70 万人，而且青海藏民死亡率高达 50%。

1958-1962 年的大饥荒，是中共对中国人民的有计划的群体灭绝。毛泽东在 1950 年初就在莫斯科就同斯大林商定要淘汰中国一亿人。从 1953 年秋开始，中共搞了先军计划，大量出口粮食换取苏联军援，从而与农民展开了全方位的粮食争夺战。毛泽东说“要教育农民少吃，吃稀一点，国家则要尽可能减少销售，以免在一般农民有粮季节吃得过多”；饿就用“薯叶

填补”。薄一波承认，“农民绝大多数粮食均被强制抢走，被驱向死亡的境地”。1953年10月2日，毛泽东在决定统购统销的政治局会议上说：“我们正在为粮食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展开一场战争，一面对付出粮的，一面对付吃粮的”。毛特别说：“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说过农民是好的”。当时的政府已摆出一副你农民要死就死的架式。几天以后，陈云向各省领导干部传达毛的指示，全国即使十万个村子出现“逼死人”的事件，仍然要征粮。1955年4月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的秘书长杜润生透露：浙江农村卖家具、吃种粮、要饭、卖子女，请愿、老弱者躺在床上饿死等现像已发生。一些有正义感的人上书毛泽东。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黄炎培给毛写信说，他的老家江苏，“一般居民生活苦，尤其是农民特别苦，农民说：我们吃不饱，哪有力气去种田呢？”毛不为所动，反说：“黄炎培，得意得不得了，整他一下。”毛还理直气壮地说：“缺粮户，也不是一年到头都缺粮，顶多缺4个月”，“顶多缺6个月”。有的高级干部用“良心”来恳求毛手下留情。毛斥责：“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的确没有良心，马克思主义是残酷的，良心是不多的”，“良心少一点好。我们有些同志太仁慈，不厉害，就是说，不那么马克思主义。”可见，马克思主义就是吃人主义！

此后，毛泽东在农村推行合作化，1958年初建立了人民公社，实行了生产资料的全部公有化，为大饥荒做了准备。毛为了名正言顺地夺粮，强迫下面大吹、特吹亩产万斤、十多万斤。于是上级要粮食，下级没有理由不给，连种子全上缴都不够。当大饥荒刚开始的时候，毛在各种大小高级会议上大讲特讲中国历朝历代如何饿死人，告诉干部饿死人是正常现象，不饿死就不正常了。让干部们对饿死人习以为常、麻木，让他们草菅人命。1958年10月9日，毛泽东就对他的亲信圈中人说：“死人有好处，可以肥田”。1958年12月9日，毛泽东在八届六中全会说：“人要不灭亡那不得了。灭亡有好处，可以做肥料。”河南固始县期思公社党委第一书记蒋学成，当过土匪，1959年创造了熬人油当化肥的办法，据反映熬了100多个小孩，经调查证实熬了20具尸体。余习广的家乡湖南澧县，在几个公社和县城所在的城关公社，都发生过用饿死的人尸骨，来炼化肥的惨案。1958年12月，下面饿死人的电报象雪花般地打到中央，毛用铅笔在电报上写着：“教群众吃稀一点，渗着树叶吃”。其实早就没有稀的吃了，如果还有稀的吃，怎么能饿死人呢？连树皮都啃完。当彭德怀想阻止中共饿死人的流氓计划时，结果彭德怀死得很惨。1959年庐山会议后，饥荒告急，毛反诬蔑农民“瞒产私分”，于是开展了“反瞒产运动”，对农民捆绑吊打，逼交粮食；仅在700万人口的河南信阳地区，共党干部就打死逼死群众8万余人，100人中活活打死1个多人，其惨烈程度可见一斑。1960年中央警卫团战士回到家乡听社员反映说：毛主席是不是叫我们饿死？中央警卫团因此受到狠狠的清洗。毛泽东故意大量饿死人的目的太明显，连老百姓都看出来了。当大饥荒大面积的发生后，各级干部往往象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中国这么大，哪朝哪代没有人饿死？！”用这样的话来继续中共的害人政策，让更多的民众饿死。

毛泽东明知大饥荒饿死人，却没有采取任何救灾措施，反而落井下石加重大饥荒。大饥荒时苏联不要中国的鸡蛋、茶叶、粮食，周恩来下令全部倒入黑龙江，说他们不要我们也不要。赫鲁晓夫要援助中国低价粮，毛泽东拒绝，反而把中国的粮食卖给了苏联。中共向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廉价出口粮食474万吨、向匈牙利赠送3千万卢布的货物、350万英镑现款，向东德赠送5千亿卢布的食品，还无偿的援助越南200亿美元、阿尔尼亚100亿……因为斯大林曾经把粮食卖给希特勒，把乌克兰农民的粮食抢干净，使乌克兰饿死了700万人。毛泽东那一套完全从斯大林那学来的，用物质制裁的手段消灭落后人群——农民。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认定：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是保守的、反动的。所以“落后”的农民阶级只能被“先进性”的共党无情地淘汰掉了。因此，众多的共党国家都经历了大饥荒的历程，大饥荒是共党在消灭落后阶级、消灭阶级异己分子的最好武器，是杀人不见血的软刀

子。毛提出“丢农村保城市”的说法，灾民去城市要饭都不行，打的主意就是将农民饿死。毛说：“中国有八亿人，太多了，饿死一半，让剩下的一半人吃饱。”毛一边把大把大把粮食送到外国，同时把粮食囤积起来，由军队和民兵把守仓库，宁可将食品烂在仓库也不准开仓济贫，当百姓接近粮仓就开枪扫射。这种做法只有在共产党极权暴政下才存在。甚至干部民兵封村不让人逃荒，逃荒者被关入监狱饿死。饥荒发生时，贸易部官员建议，在国际市场抛售黄金以进口粮食，周恩来反对，并指示，趁国际金价走低，大量吸纳黄金，用中国几千万人的生命换回了一堆黄色的金属。毛在“信阳事件”有过内部指示，指出：“饿死人的问题是高指标、高征购造成的”（乔培华《信阳事件》，开放出版社 2009 年版 275 页）。但是毛泽东依旧在 1961 年的 8、9 月份在庐山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再次提高征购粮食数目，让饥荒继续下去。刘最后看不下去，在不知道内情的官员的帮助下，扭转了局势，而且还逼得毛在“七千人大会”上检讨，并由此引发了文化大革命。不是刘少奇拼死一搏，把毛的计划打破，饿死将达一亿人。中国的大饥荒完全是共党造成的灾难，而不是什么自然灾害。

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党校校长杨献珍认为：“社会主义是人吃人的社会”。中共的人为大饥荒，导致中国在和平年代，出现大面积的人吃人的事件。河南省农民往往集体决定吃小孩，以保大人的命。此时，匪酋们过着荒淫糜烂的生活。1960 年中国，人吃人。茅台酒厂无米酿酒，周恩来特批 2200 吨粮食给茅台酒厂酿酒，以满足官僚们的奢侈需求。《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一书描述毛“纵情声色犬马”，“过的是糜烂透顶的生活”，“一贯以女人为玩物”，他征召大批美丽、年轻的女孩入宫，“女人像上菜般轮番贡入”。

刘小枫之流说当时毛泽东营养不良得了水肿，完全是造谣！果真如此，其侍寝的嫔妃，生活秘书，勤务人员，一个都得挨整。偏安延安的时候，中央都要命令毛泽东每天吃一只鸡，“登基”十年反到饿出了水肿，更加伟大的党能允许吗？编造出这样拙劣的谎言，谁信？

12. 人比牛马还贱

在旧社会，中国人做牛做马；在腥社会，中国人做牛马的牛马，真正过上了牛马不如的生活。在奴隶主看来，奴隶不如他们的牛羊猪狗，在中共国尤其如此。早在五四运动前，李大钊写下《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一文，对唐山工人“尚不及骡马”的悲惨生活表示深切同情。李大钊所创立中共在建国后使广大人民不仅做了中共的奴隶，而且还做了骡马的奴隶。

1958 年大跃进时一般的农民还没有刷牙的习惯和条件，而河南却给牲口刷牙。登封当时是全省土法炼钢铁的“先进县”，从除“四害”（苍蝇、蚊子、麻雀、老鼠）和大搞卫生开始，《河南日报》就登该县的照片。农民为驴刷牙，带上口罩。当时几个农民给牛、马刷牙都还算顺利，刷一匹骡子时出了事。骡子脾气很怪，不听话。那几个人见骡子总是扬着头不肯刷牙，就硬拽着缰绳，掰开骡子的嘴，那个拿刷子的社员就把手伸进去刷。那匹骡子受了强迫，突然把嘴一合，当场把那个刷牙的农民胳膊咬住，疼得他“哎呀娘啊”地大叫。等骡子张开嘴把他放出来，大家一看，骨头被咬折了。

1960 年 3 月 3 日，湖南澧县闸口公社三元大队三队女饲养员戴友姑养的一头猪病死了。大队书记苏海清责令饲养员戴友姑给猪戴“孝”，并规定：(1)要做一付棺材和一丈二尺高的墓碑，上写“故显考猪讳饿死之纪念坟墓”，写上年月日和喂猪人名字；(2)要请道士开路，后请学校老师打秧歌锣鼓送上山；(3)要八大金刚送猪上山（即八人抬棺送葬）；(4)养猪人带路

抱灵，边走边哭：“我的猪爹，这就把你作了孽，只怪我跑快了，抢了一张人皮，你跑慢了，抢了一张猪皮，把你饿死了，我还你来世帐”。(5)猪坟要埋一人多高；(6)养猪人送烟火（烧纸钱香烛）3天，送一次哭一次；(7)见干部一来就要大哭猪亲爹。并交代说，“明天公社生产大检查，有四个大队书记来检查，要哭的特别伤心些”。(8)要搭棚守灵，守一个月。

事件轰动全县，老百姓怒不可遏：全县饿死了几万人，没见干部过问。从古到今，没见过死了一头猪，竟然要活人给死猪当孝子的事！

中国社会一直是牛马不如的社会。鲁迅说：“中国历来只有两个时代：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中国人大抵只有两种前途：1)解放了的人们“做稳了奴隶”，其实连猪狗都不如。按照成吉思汗的法令，杀个汉人只需赔头驴的价钱。鲁迅说：“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屡见不鲜的”。“在万恶的旧社会，吃的是猪狗食，穿的是破烂衣”；一直如此，甚至今不如昔。2)没有解放的人们“想做奴隶而不得”，一切抗争都只为获得奴隶的身份。这就充分说明中国的“国家”奴隶是猪狗不如的，当代尤其如此。

中共自吹中国享有最先进的社会制度吗？怎么老百姓会牛马不如？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把人定义为“制造工具的动物”，而列宁主义把先进分子定义为特殊材料做的，而毛泽东号召人们学雷锋，变成党的“砖头”“螺丝钉”。无论是蚂蚁、蜜蜂，还是“砖头”“螺丝钉”，肯定比牛马猪低数个档次。由于人被定义成了“劳动的动物”，所以，大跃进年代没日没夜地连续炼钢铁，导致6千万农民被活活地饿死；正是由于把人当成劳动的“螺丝钉”，所以，黑砖窑老板残酷地迫使奴工没日没夜地连续劳动直到把他们扔进水泥搅拌机！

问苍天问大地：

人民啊，

为什么连猪狗都不如？

托洛斯基说

人要象狗一样为党冲锋陷阵

斯大林说

人是钢铁，党要咱炼就咱炼

刘少奇说

人是木头，党要咱劈就咱劈

吴运铎说

人是砖头，党要咱搬就咱搬

雷锋说

人是螺丝钉，党要咱拧就咱拧

何祚庥说

民工要发展生产力做牺牲做贡献

锤子镰刀旗啊，

怎把人当铁一样的锤、当草一样的割呢

13. 广西人吃人运动

广西全省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人数”近 20 万人。文革的广西出了一件奇事：那就是省委第一书记和广西军区第一政委韦国清是全国 29 个省市中唯一没有倒台的省委第一把手。广西群众组织在文革初期分为反韦的“四二二派”（造反派）和保韦的“联指”派（保守派）。广西大屠杀的源起便是韦在 1968 年重新出任广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后，对反对他的造反派大肆报复，动用军队和重炮、机枪进行镇压。1967 年 3 月 13 日，韦国清在广西已处于“靠边站”状态。但是周恩来提出让他来当广西的“军管主任”。1968 年 7 月 3 日，周直接参与起草了把广西“四二二派”在韦国清的武装镇压下被迫抢劫武器的错误打成“反革命事件”的所谓“七.三”布告，并在 7 月 24 日接见广西两派时严厉地指责造反派和肉麻吹捧韦国清。正是周恩来对韦国清这个广西的文革大刽子手的力挺，才使韦无所顾忌地向反对他的干部群众祭起了血淋淋的屠刀。1968 年 7 月以后，广西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广西军区以“贯彻执行‘七.三’布告”为名，调动军队，共杀了近 10 万人！

在广西支左的军队干部，从军区司令员到各公社武装部部长，绝大多数都策划直接指挥过大规模的杀人事件；而且这些军代表们则动辄公开诬陷、杀戮、甚至淫人妻女，无恶不作。例如，广西军区司令员欧致富伙同韦国清在 1968 年 6 月制造了一个莫须有的“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并把它诬陷为“四二二派”的黑手，因此而大开杀戒。“凌云县人武部政委、县革委会主任王德堂阴谋策划，杀害县委书记赵永禧等 11 名干部、教师和学生。而且利用职权，先后多次强奸被害者的妻子及受批斗的女学生共 6 人。如此罪大恶极的王德堂，曾被封为‘支左’的好干部。”《永福县“文革”大事记》载：1968 年 6 月 2 日，“在乱打、乱杀成风的情况下，永福县堡里大队革委会召开的群众批斗大会上，发生斗打死黄广荣后，又逼其子黄明新用菜刀将其父的头割下祭奠，然后又将黄明新打死的惨剧。”

广西全省有近 5 万共产党员是杀人凶手，在 1984 年后“处遗”工作中，全省共有 2.5 万名党员被开除党籍。更令人震惊的还有：共产党员不仅是杀人凶手，还是吃人肉的先锋。整个广西文革中，有武宣、上思、灵山、天等、贵县、横县、武鸣、隆安、都安、大新、上林、浦北、崇左、容县、钦州等近 20 个县发生过惨无人道的吃人肉的野蛮事件。

当时广西出现了人吃人的群众运动。最惨无人道者，首推剖腹食肝了。武鸣县华侨农场有 2~

3 万人，有 100 多个干部群众被凶手挖肝割肉吃个精光。据《钦州地区文革大事记》记载，仅钦州地区的灵山县坛墟、新墟两公社就有 22 例，合浦县石康公社有 18 例，浦北县北通公社定更大队有 19 例，钦州市小董茶场有 3 例。挖人肝、吃人肉，分明是虎豹豺狼的野蛮行径！中国人，你怎么叫人？1968 年 4 月 25 日，浦北县北通公社定更大队分 4 批杀了 180 人，并剖腹取肝煮食饮酒，策划者和凶手还对剩下的寡妇、女儿勒令改嫁，并征收改嫁费(证明费)。北通公社博学大队刘继秀、刘家锦等九人把刘振坚打死后，对其未满 17 岁的女儿，强行轮奸，然后打死，并剖腹取肝、切下奶子和生殖器回去煮着吃掉。4 月 13-15 日，北通公社旱田大队革委主任策划杀害 22 人，杀人前，搜刮死者的家产，杀人后，规定地、富寡妇及其女儿出嫁需经批准并交纳费用。张玉使、符冠英、何迁兰、卢秀珍等 4 人改嫁时交改嫁证费和两女出嫁费 894 元。旱田大队杀人前后共索取受害者钱物 3066.41 元。文革中资源县革委会共收“看守费”、“关押费”、“专政费”、“改嫁费”等罚款 8.3 万元，其中向死者家属征收的达 3.5 万元。这些钱又全部被杀人凶手们大吃大喝花掉了……。

上林县一位杀人而食的支书在游击队时就吃过人，文革时也吃了人。一个叫邓记芳的农民，唯一的罪名是地主的儿子。在清澈纯净的滩江水畔，他被五、六个人用松枝压住手脚，支书一人用菜刀把胸膛剖开，掏出心肝切细由众人分享。作家郑义问：“人肝怎么做最好吃？”他答道：“烤着吃最好吃，香。煮的有腥味。”——上帝啊，他们吃过多少人呀？

1968 年 9 月 7-17 日，上思县革委会召开“农业学大寨”四级干部会，会上贯彻“七.三”布告，以三代会（农代会、工代会、红代会）名义在上思中学召开“群众专政”大会，公开杀害 12 人，并将部分死者剖腹取肝，拿到县革委饭堂煮食。食人肝者竟然也有县、社领导干部。该县思阳公社武装部长王召腾下到和星大队布置杀人，当晚杀了邓雁雄一人，并开腹取肝与凶手一起煮食。他还勉励大家都要吃，说吃了人肝胆子就大。次日，王召腾又布置杀害四人，剖腹取肝，传令每两三个生产队分一人肝吃，以致“共同专政”。

广西吃人狂潮经历了三个阶段：1) 开始阶段：其特点是偷偷摸摸，恐怖阴森。某县一案卷记录了一个典型场面：深夜，杀人凶手们摸到杀人现场破腹取心肝。由于恐怖慌乱，加之尚无经验，割回来一看竟是肺。只有战战兢兢再去。……煮好了，有人回家提来酒，有人找来佐料，就着灶口将熄的火光，几个人悄悄地抢食，谁也不说一句话。次日晨，唤同伙来吃剩下的；怕人们不敢吃，诡称是牛肝牛心。待吃完后才得意洋洋宣布吃的是某某的心肝……

2) 高潮阶段：大张旗鼓，轰轰烈烈。此时，活取心肝已积累了经验，加之吃过人肉的老游击队员传授，技术已臻于完善。譬如活人开膛，只须在软肋下用刀拉一“人”字形口子，用脚往肚子上一踩，如受害者是绑在树上，则用膝盖往肚子上一顶，心与肚便豁然而出。为首者割心、肝、生殖器而去，余下的任人分割。红旗飘飘，口号声声，场面盛大雄壮。有的村庄则别具特色：将人肉与猪肉切作大小相同的块儿煮熟，将大锅置于视线之上，村人每人过来一块。1968 年 6 月 15 日武宣县发生了大规模吃人肉的野蛮事件。五星大队“联指”民兵李坤寿、彭振兴、李振华等将“造反大军”刘业龙、陈天掌等 4 人拉到三里圩游斗。在车缝社门口，刘业龙、陈天掌等四人被凶手打死。李坤寿等拔起尖刀，挖死者的肝、割他们的肉，拿回大队部去会餐品赏。6 月 23 日，武宣街墟日，约中午时分，武宣镇对河生产队李炳龙等人用铁线把黎明启、黎中元、黎中杰的脚扣住（只能艰难的走动），还用绳子捆颈绑手。……李炳龙等人片刻即被游斗者活活敲死。将尸体拖至黔江边，黄启焕等人剖腹取肝、割生殖器后，弃尸于黔江。同日夜间李炳龙伙同韦炳文、左伯洪、韦志华轮奸黎明启之妻，并抄家洗劫财物一空。“七.三”布告下达后，“联指”又调动贵县、桂平县“联指”武装民兵 500 多

人前来武宣支持“剿匪”，打死杀死 523 人，其中被吃掉肉肝的 75 人。这是中共武宣县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撰的《武宣县“文革”大事件》的数据。据官方调查：参与吃人肉的有名有姓的工人农民、国家干部共有 130 人。其中共产党员有 91 人，非党干部 18 人，非党工人 21 人。换句话说：84% 的吃人者是中共的党员或干部！据民间的统计，武宣县有 200 多人被野蛮吃掉。其中：被吃肉后砍头的 1 人，挖心肝的 75 人，割生殖器的 13 人，全部吃光（连脚底板都被吃光）的 18 人，活割生剖的 7 人。

3) 群众性疯狂阶段：其特点可以一句话概括——吃人的群众运动。如在武宣，象大疫横行之际吃尸吃红了眼的狗群，人们终于吃人吃疯了。动不动拖出一排人“批斗”，每斗必吃，每死必吃。人一倒下，不管是否断气，人们蜂拥而上，掣出事先准备好的菜刀匕首，拽住哪块肉便割哪块肉。某老太太抢割了一叶人肝，高高兴兴拎回家去。其时正下微雨，人血和着雨水从肝上流下来，在老太太的身后留下长长一条淡红色的血痕。还有一老太太听说吃眼睛可补眼，她眼神儿已不好，便成天到处转悠，见有“批斗会”，便挤进人丛作好准备。被害者一被打翻在地，她便从篮子里摸出尖刀，剜去眼睛掉头便走。有几位老头子则专吃人脑，每人在人脑上砸进一根钢管，趴下就着钢管吸食，如几个人合伙以麦管吸食一瓶酸奶！有妇女背着孩子来，见人肉已割尽（有时连脚底板的肉全割净，只剩一副剔得干干净净的骨架），万分失悔：孩子体弱多病，想给孩子吃点人肉补补身子。

一般群众都卷入了吃人狂潮。吃人的大瘟疫席卷武宣大地。其登峰造极之形式是毫无夸张的“人肉筵席”：将人肉、人心肝、人腰子、人肘子、人蹄子、人蹄筋……烹、煮、烤、炒、烩、煎，制作成丰盛菜肴，喝酒猜拳，论功行赏。吃人之极盛时期，连最高权力机构——武宣县革命委员会的食堂里都煮过人肉！在武宣县武宣中学，甚至出现了大批学生批斗完老师、校长之后，在校园内就地架起简易炉灶，将他们剖腹离割、煮熟分食的惨剧。吴树芳老师在批斗中被打死后，肝被烘烤药用”（见《北京文学》1998 年 9 期）。

桐玲中学副校长黄家凭，曾任游击队桂支 18 大队长。解放后，他任苍梧县副县长。在五十年代中期的一次政治运动中，查出他曾有变节行为，遭到打击。事情是这样的：一次国民党军队将他及村人包围在一山洞中，喊话要他出来缴枪。本来山洞中有足够的粮食，完全可以长期坚持，但为了洞内外大批群众的安全，黄某只好出来缴枪，村民得以平安。没过几天，他又上山拉起了队伍，转战于桂东山区。调查核实：他并未出卖同志、出卖机密。1962 年，他得到平反；但留了个小小的尾巴：在困难时期产生动摇。县政府于是给了他个级别大致相当的重点中学校长。文革开始，黄家凭被打成“叛徒”，大小会批斗，1968 年 7 月 1 日晚被杀死。翌日晨凶手黄佩农、张继锋等学生挖他的肝、剥他的肉，以示与之划清界限。割肉很快形成风潮，整个中学校园内，到处是用瓦片烘烤人肉人肝，火烟缭绕，腥风飘荡。收尸的“牛鬼蛇神”教师后来追述，黄校长被割得只剩下一副骨架子，用两个挑土的竹簸箕一装便挑去埋了。第一个割肉者谁？竟是校长大儿子的女友！此人原来狂热追求校长公子，此时为摆脱关系，竟恶狠狠第一个操刀割肉而食！吃校长肉的学生们至今当官掌权。

7 月 17 日上江大队“联指”头头组织批斗“造反大军”廖天龙等 4 人，一帮凶手把廖天龙等 4 人杀死后，拉尸体到平昭码头，有李灿熙、徐达财、樊荣生等人割下死者的肉肝和生殖器，拿回大队部煎炒、猜拳喝酒会餐。参加吃人肉宴餐的有陈达财等 23 人。

某头头被擒，被剖腹挖肝，分食殆尽。后将被剔得只剩副骨架子的残骸挂在闹市示众，逼他妻子跪地请罪。一凶手执匕首在她背上划了一刀，惋惜道：瘦了点，不好吃！然后逼问：

这是你男人吗？是。你男人是反革命吗？是。女人已身怀六甲，血汗如雨。折磨够了，最后说：你不是爱你男人吗？你就抱着他人头睡觉！于是将早已砍落的人头塞给她，硬逼女人抱头睡觉。在这种毫无人性的折磨下，女人精神分裂。

某案，村支书将对立派某人妻子奸污，怕日后报仇雪恨，遂煽动村人将其全村同姓人家不分老幼悉数捉拿，并威胁利诱村人押解这些无辜者乘船渡过黔江，在县城墟亭附近的闹市区批斗致死，割食殆尽。这便是武宣独有的一例“灭族”案。

某案，一女民兵因参予杀人坚定勇敢，且专吃男人生殖器，并因此入党做官，官至武宣县革委会副主任。但该女革委会副主任拒不承认专吃生殖器，只承认一起吃过人。最后的处理是开除党籍，撤销领导职务，现已调离武宣。县处遗办人员谈此案时，称：她当年还未出嫁，估计也干不出那种事……当然，你可以估计她干不出那种事，我也可以估计在吃人狂潮到立案侦查这长达五、六年的时间里，她完全可以凭借权力和关系把罪行掩盖得天衣无缝。

仅广西省被吃掉的 1 万多人中，吃人者很多是为补自己的身体。广西有人想起人肝能滋阴补肝，竟在“无产阶级专政”对象中，专门选取年轻体壮的，将其杀害后选新鲜优良的人肝，精心制做了一广口瓶用瓦罐培炙的人肝粉，要敬献给“伟大领袖毛主席”，以“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后来一看形势不对，于是自己一天几勺给吃了个干净。贵县的一个杀人凶手还深藏了两个人肝多年，直到 1982 年文革处遗时才被迫交出来。……

11 届 3 中全会否定了文革，唯有广西继续坚持派性，拒不处理武宣等县吃人肉的野蛮事件，后来中央几次追查过问，区党委竟有人说“武宣历来有吃人的习惯”。广西群众曾强烈要求“吃过人的人不能再当干部”！而广西最高当局韦国清的回答是：“为什么不能继续当干部？对吃过人的人也要作具体分析！”可见，参与吃人的党员、干部数量之多。

[本帖最后由自幼于 2013-11-708:30 编辑]

3#大中小发表于 2013-9-309:12 只看该作者

14. 广东出现人食人，“婴儿汤”摆上桌面，丧尽天良

意大利总统候选者宣扬中国人用婴儿汤作肥料，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九运会期间，江泽民暗示说：“听说广东有进补的新方法……”李长春立即心领神会。从珠海专门订送“十全补气汤”。据知情者称该汤由嫩鼠(小婴儿)、胎盘外加各种高级中药材等慢火煨成。李长春又专门派人到清远、从化山区捕捉江泽民喜欢吃的蛇、蝎、蛙、雀等山珍。还专门请来花枝招展的大歌星陪吃，陪喝，对歌；那用专车从深圳送来的百年法国酒，一瓶就过万元。据宾馆人士估计，这几桌起码好几十万呢。

自 2004 年开始，中国大陆流传著一个骇人听闻的进补潮流婴儿汤。花三四千元人民币，就吃到一盅用六七月大的(婴儿)炖成的补汤，台商则形容是壮阳圣品。东莞王姓台商，自诩是(婴儿)汤的常客，几个月大的婴儿，加入巴戟、党参、当归、枸杞子、姜片，加入鸡肉排骨，炖八小时，很能补气养血。他一边紧搂身旁十九岁的湖南二(奶)，一边洋洋自得的说：以我 62 岁的年纪，每晚都可来一回，还不是靠这个。眼见记者满脸狐疑，他自告奋勇，带

记者见识见识。第一站，他带记者到广东佛山市，找到吃开(婴儿)汤的餐厅，谁知主理的黎师傅却说：排骨（他们的暗语，指婴儿）不好搞，现货没有，胎盘倒有新鲜的，这东西不能冷冻，新鲜的好。黎师傅说，真的要吃那个，有个外地来打工的夫妻，现在怀孕 8 个多月，由于两胎都女儿，再过几天准备盐水催生，如果又是女儿，到时候就可以吃了。

记者还是半信半疑，调查采访几个星期，还是听的多，没有亲眼见过，以为就此打住，谁知过不了几天，王姓台商来电：东西找到了，天气转冷，有几个朋友正想进补。

高师傅说女婴尸是朋友从乡下找来的，他不肯透露这女婴的收购价，只说价钱是依据月份大小，死胎活胎而定。台商亦说，吃这一盅要三千五百元人民币，其它细节，他不说了。记者听他们在聊，流产或堕胎的死胎，中介人就包给产婆几百块红包，若是接近足月引产的活胎，则要付两千元红包给女婴的父母，当是收养。至于婴儿交到餐厅时，都已死亡，之前是死是活，已无从细考了。这顿补汤记者无胆一尝，经厨房一役，久久无法吃东西，佯装不适离去。吃的都是女婴，是一子政策之害，还是中国人好进补的习性，已到了天谴的地步！

现在的人除了天上的飞机、水中的轮船、陆上的机车，还有什么不能吃的？！还有什么是人不敢吃的？！看见了吧！我们的同类就这样上了餐桌，变成了壮阳极品——婴儿汤！

这位据说是北京一个前卫艺术家，吃婴儿纯粹是一种行为艺术。他自称基督徒，并宣扬圣经以及法律都没有禁止吃婴的条令。打着前卫艺术的旗号，却做着丧尽天良的事情！

15. 人肉胶囊

韩国各大媒体纷纷披露，中国大陆医院与黑市交易，利用地下工厂将死胎加工成“人肉胶囊”。韩国海关查获了一批入境的“人肉胶囊”。据韩国国立科学搜查研究院此前的化验结果显示，这种胶囊粉末中，化验出的 DNA 和基因，与人类组织的相似度高达 99.7%。而且在胶囊粉末中可以辨认出婴儿毛发和指甲等。韩国主流媒体之一的 NBS 电视台记者亲赴中国调查暗访，并于 2011 年 8 月 6 日晚以《惊人曝光：人肉胶囊的真相》。NBS 电视台表示，他们在中国见到一位生意人，对方告知了婴儿尸体的交易地点，记者循踪找到了贩卖婴儿尸体及人体胎盘的医院，并拍下了医院方面与黑市人员匆匆“交易”的镜头。随后，记者找到加工“人肉胶囊”的地下工厂，亲眼目睹了把胎儿尸体制成胶囊的过程，并拍摄了制作过程。胎儿尸体从家用冰箱里取出后，利用烘烤药材的微波炉烘干，随后用粉碎机等自制设备将尸体粉碎，最后制成胶囊。另据报导，一名参与“人肉胶囊”黑市交易的中国朝鲜族人士说，这些胶囊从延边送到韩国后，透过中药材业者送往市场，以“婴儿胶囊”、“胎儿粉”的名称对外销售，100 粒的销售价格高达 80 万韩元（约 748 美元）。

中国“人肉胶囊”的内幕曝光后，引发韩国民众强烈震憾和谴责。“他们是人吗？”、“昨天看这个特别报导，就惊愕人竟然能做出这样的事来。”“真让人生气，难道说只要有钱什么都能干？只要对身体好什么都能吃吗？”“用这种方法挣钱，能活的长久有什么好的呢？”“吃这个的人都是什么人？难道希望得到遗传病？真是什么事都能做出来啊！”“希望这种不像话的事千万不要再发生了！”等等，韩国网民的谴责大量涌现。

16. 李长春：垂尾臣服习猴王

人权与平等的反面是特权与等级。人类社会为什么会有特权与等级呢？这可以从动物生态中找到答案。结群生活的动物有两种生态，一种以猴子为代表，称为猴型生态；另一种以大雁为代表，称为雁型生态。猴型生态是一种特权与等级的生态，猴群里分为猴王、上等猴和下等猴三个阶层，猴王里还分大猴王、二猴王、三猴王等级别，上等猴和下等猴的阶层里也还有上位和下位的区分。两只猴相遇时，立即可以看出其上下等级关系。级别较低的猴目光向下，不能直视级别较高的猴；下级猴要给上级猴让路，还要给上级猴搓背搔痒。猴群里的猴王是靠武力产生的，最强壮的公猴打败其他挑战者作猴王。猴王有很多特权，美食他先吃，母猴他先挑等等。与此相比，雁群中的领头雁不是靠武力产生的。年富力强、经验丰富的大雁被推举为领头雁，有些类似于人类社会的民主选举。领头雁病倒或死去后，雁群中会根据经验与见识选举出新的领头雁，不会出现争夺领头雁地位的暴力冲突。领头雁虽然领导整个雁群，它的待遇却与其它大雁一律平等，没有任何特权。雁型生态是一种均权与平等的生态。人类社会中的独裁体制类似于猴型生态，民主体制类似于雁型生态，所以也有人形象地把独裁社会称为猴型社会，把民主社会称为雁型社会。猴的天性是独裁的，让猴群搞雁式民主就很难；雁的天性是民主的，让雁群搞猴式独裁也很难。

不同品种、不同产地猴子的猴性也有所不同，听说亚洲的猴子相对更独裁一些，而非洲的猴子相对较民主一些。2011年1月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介绍海南猴岛里的猴王独享食物和众多的母猴，残羹剩饭才为其他公猴分享。

2013年7月30日，隶属河南省委的《大河报》发表了一篇原中共常委李长春（笔名“永春”）所写的《观猴有感》的文章，引发国内广泛关注。这是一篇以小喻大、以猴喻人来达到歌颂专制、美化强权的奇文，是一篇为中共独裁政权进行涂脂抹粉的自我告白。

作者通过观察太行上3000多只猕猴群发现一个定律，必须让猴王吃饱后，才能轮上别的猴子进食。于是作者判定：“在猴群中并没有产生公平正义的意识，更不可能形成公平正义的分配机制。通过这一现象可以推测，原始社会初期，在生产力低下和食物极为短缺的情况下，人们可能也很难遵从公平正义的原则分配食物，只能靠强力来解决食物分配问题。”

原始社会之所以被马克思作为是原始共产主义，因为这是人类进化后的第一个以平均分配为基础的公社制度，并认为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形态。但猴子是猴子，猿人是猿人，根本没有可比性，这正如狼与狗已经成为习性截然不同的两类动物一样。而中共却强不知以为知，妄加比拟，以一个猴群观察来质疑原始社会形态，真可谓荒谬绝伦！

作者赤裸裸地用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为权贵利益集团呐喊张目，并警示世人说，从原始社会至今天都不可能公平分配的。换言之，强权与强力天然合理，今天的中国不可能有公平公正的平均分配，当下中国的贫富悬殊与两极分化，都是自然法则的体现。可见，中共高层也不相信自己天天所宣讲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不过是欺哄老百姓的。

李长春曾于1990年调任河南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直至1998年调任广东省委书记，在河南任职长达8年之久。他以发展“血浆经济”为借口，让无数河南人罹患上致命的艾滋病。直到今天，李长春在河南造下的这个冤孽都没有得到清算；而曝光艾滋病惨状的医生高耀洁，却横遭迫害，已80多岁的衰老之身了，竟不得不亡命海外。省卫生厅的一个科级干部，因

为涉嫌披露河南艾滋病患者的真实数字，竟被判处 4 年徒刑。吃人的“血浆经济”害死了无数人，却为李长春积累了飞黄腾达的本钱。2002 年，一家富豪投资将近 3 个亿，在河南鲁山县开建 208 米高、号称世界第一的中原大佛，而 5 年后这座大佛建成开光时，传说这尊大佛的法相，就是比照李长春的相貌制作的。一个手上沾染了无数艾滋病人鲜血的中共高官，居然成了慈眉善目的西土圣者，这是对佛门的最大亵渎。江泽民乃共产党之党魁，为什么愿意去一个千年佛地去题这“灵隐寺”三字？足见，共党持无神论，却去信佛拜神之地“涂鸦”。其伪善伪装，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自己打自己耳光均乃登峰造极、可笑之极！

有人认为，这篇文章暗喻中南海权斗，“成则王侯败则贼”。文章写道：“野蛮时代，是靠惨烈的拼杀产生群体领袖的。如果发现哪只猴子不懂‘规矩’，猴王就会对它进行严厉惩罚，其‘特权’意识非常明显。经过激烈厮杀，胜者为王。挑战失败了的公猴，便垂下尾巴，表示臣服，而猴王则时刻翘着尾巴。”所以，也可以这样理解为：习近平胜了，翘起尾巴，而“挑战失败了的公猴”薄熙来就应该“垂下尾巴，表示臣服”。而社会稳定的最佳手段，就是要有猴王的强力教训与群猴的“垂尾臣服”。既然如此，那当下中国所上演的一出“暴力维稳”的大戏，都是可作为“猴戏”来看了！如网友所言，这说明共党集团还处于动物水平，离政治文明和文明政治有很长距离。这劝人“夹着尾巴做猴”潜台词，真是笑死人！

民主是人的事业，专制是兽的习性。中央电视台报道：每年春季，江苏大丰的麋鹿都要通过公开的打斗决赛出鹿王，所有的母鹿都为鹿王所有，鹿王享有优先交配权。这就使人想起中国皇帝鼓吹天下一切包括女人都属于皇帝所有，皇帝享有优先交配权。秦始皇、晋武帝、隋炀帝的后宫的女人都好几万。如今权贵们的二奶数量远远超过皇帝的后宫。

猴王虽能统治一个猴群，而不至于天天混乱，但每隔几年，就要发生一场你死我活的武斗。年青公猴之所以要造反，并不是猴王已年迈失德，而是利益分配制度是不合理的，但它们又想不出更好的办法，结果唯有通过武打产生猴王。如果猴子懂得选举，那猴子就变成人了，人如果不懂得用选票取代刀枪，人跟猴子又有什么区别？有人说：中国社会不如猴王社会，猴王社会的“猴王”是容许公开竞争的，中国社会的“党魁”是不容许竞争和觊觎的。

中国各朝各代将国家收入的 1/3 用于帝陵建设。秦始皇建骊山陵，动用 70 万工匠，历时 38 年，耗费国家税赋 1/3 而建成，收尾时 3 千多工匠不让出陵被活埋。大唐皇帝李治陪葬品的价值占大唐一年税赋的 1/3。武则天死后，又有同样多的金银珠宝被她带进了乾陵。“1/3”这个数字使我想起了 2011 年 1 月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介绍金龙鱼养殖的节目，扬州的养殖人 XXX 介绍，金龙鱼原产于印度尼西亚，相互之间很容易咬伤而死亡，必须让年龄一般大的鱼从小一起长大，彼此熟悉后才能和睦相处，他的拳头产品叫“9 龙戏水”，9 条金龙鱼共处于一玻璃鱼缸；其中有一条金龙王鱼，它处在鱼缸的上面，并占有鱼缸“1/3”的容积。这说明：被儒教化几千年的中国专制社会是一个动物社会！今天的红朝占有中国的 2/3 的国民收入，每个中国人交给政府的钱达到自己工资收入的 66.3%！更是不如动物啊！

17. 习近平的“猪”栏梦

习近平全权负责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筹备工作时，与周永康共同编织了以“六张网”为主干的“奥运安保模式”，对北京实行 24 小时全方位覆盖的严密监控，对此，国外曾因此强烈指责中国践踏人权。他在 2009 年 2 月 11 日访问墨西哥时，展示了中共储君最愚蠢、最粗暴的

一次讲话。当时，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举行的会议上，中方代表团拒绝了包括德国在内的若干国家提出的一些关于改善中国人权纪录的建议，如，承诺禁止酷刑、保障宗教自由、尊重少数民族等。习近平在当地对华侨说：今年是中国经济发展最严峻的一年，我们会从容面对，挺过今年就能看到曙光，看到转机，当然也离不开国际环境，但关键是办好我们自己的事。在国际金融风暴中，中国能够基本解决 13 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已经是对全人类最伟大的贡献。“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痞子相十足，宣称“坚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他是要带共产党沿着死路走到底。这样一个“吃饱了撑的——放屁”的口无遮拦、心浮气躁、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给中国带来的只能是灾难。

习近平这一席话，显示他是一个扼杀言论自由的骂大街专制君王。因为按照习的逻辑，那么现在的北朝鲜，也没有向世界输出革命（他们想输也输不出来），也没有输出饥饿和贫困（只是饿死自己的国民），也没到外面去折腾（没有本钱），那么国际社会是不是就不能批评金正日的专制统治，不可以过问那里的大众死亡？过问了，就是吃饱了撑着没事干？

一位中国网民调侃说，按照这个逻辑，任何一个暴政产生的人道灾难，只要是国民死在境内，别人就得闭嘴；如果我是个暴君，那我 100%支持这种理论。习近平的逻辑，就是这样一种暴君逻辑。如果它可以成立，那么斯大林的暴政、希特勒的大屠杀、毛泽东的文革浩劫等等，外界就都不可以过问了吗？在人类进入 21 世纪的今天，中国的领导人还公开宣扬这种暴君的逻辑，这在全世界领袖中真是罕见，实在是一大丑闻。

习近平这个讲话显示了他的“猪”栏理想——吃饱了说话就该遭骂，吃饱了象猪一样睡觉做“中国梦”就好。他不仅把中国人当猪，还要世界人民也当猪。另外，“吃饱了撑的”这种口气，哪像个国家领导人讲话？哪有一点文化修养？简直是个泼妇或“山大王”骂大街，岂能登大雅之堂！真是中南海大餐吃饱了撑的，才撑出这样一种闭关锁国的井底之蛙。

中共真如习近平所说的那样吗？自中共建党的 90 多年来，几时曾停止过输出革命？尤其在亚洲、非洲和南美洲更为猖狂。如果中共不输出革命，今天尼泊尔的毛派政权是怎么来的？连其外交事务都交由中共全权代理。港人记忆犹新的是多年前中共全国政协某副主席的一位公子因走私两万枝 AK-47 去贫困的非洲，被美国海关抓获，最后转为控方证人的新闻。这不是输出革命、输出战乱、输出贫穷又是什么？据说俄国知道后还放风要追收 AK-47 的版权费呢！看官别以为这不可能，几年前中共在（设在中国的）苏-17 引擎厂偷偷多生产了 16 对引擎，被俄国发现后罚了一亿多美金。中共还输出污染，明里暗里支持包括南美等地的毒枭、军阀、土匪难道不是间接输出贫穷？这不算折腾人家？难道要像当年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柬埔寨、越南那样明刀明枪、赤膊上阵才算折腾？怎么可以这么快就赖账了呢？

“三天不做贼就扮乡绅”是所有政客共同的嘴脸，却也没有无耻到像中共政客那样——不但一边在做贼一边在高调扮乡绅，还要谴责批评、揭露他干坏事的（美国等）人。天安门前有座“革命英雄纪念碑”，排第一名的是禁毒英雄林则徐，树碑者竟是曾当大毒枭的中共。中共干的事情就是如此荒谬、虚伪和可悲。相信习近平站在纪念碑前不会脸红吧？

习近平还把中国人贬低为“猪”！张雪忠说：国家主席习近平“鞋合不合脚只有脚知道”和“空谈误国”的表态，透露出一丝不祥的预兆。前者代表了习“脚”拒绝变革的立场，后者表现出习对公共舆论的敌视。实际上，“空谈误国”作为专制政治文化中的一种说法，不但

和现代政治文明格格不入，而且本身也是站不住脚的。人是有理性的生物，人的行动主要不是出于本能的反应，而是出于理智的考量。人在行动之前，首先要确立一项行动目标，并相应地规划达成目标的手段。在公共生活中，一项公共政策是否正当和合理，本来就必须通过自由和充分的公共讨论才能明确。所谓“空谈误国”的说法，在排斥公共讨论的同时，也等于是把中国人贬为缺乏理性的“猪”类动物。

18.被吃的“雷锋猪”

“中国梦”强调的是集体主义、民族主义；美国梦强调的是个人主义、普世主义。美国个人主义最早根源于清教主义的理性原则和清教主义对个人自主的追求。个人主义思想的第一次发展时期是以自由、平等、权利为中心的杰斐逊个人主义时期。

普世理论认为，个人之权利是天赋的，是第一性的，即是原生性的；国家权力是委托的、第二性的，即是派生、从属性的。没有公民的委托(授权)，哪有国家权力？国家的目的只是为了维护公共秩序、保障公民权利，此外不应当再有什么别的目的，因此，它的权力是有限的。国家的权力以宪法、法律授予的为限，不能自我扩张。国家如果不能有效地维护公共秩序、保障公民权利，那就是一个失职的政府；如果它侵犯公民的权利，那么就是一个非法的政府，人民就有权收回其所委托的权力，另组新的政府。法律与公民权利的关系也是如此。不是法律赋予公民各项权利，而是公民的天赋权利才产生了宪法和法律；不是统治者造就了法律，而是法律造就了统治者；统治者只能遵循法律而不能左右法律；只有政府官员守法才是法治国家。总之，法律的基本宗旨在于保障公民权和防范政府的特权。

共党国家的情形正相反。共党宣传说：党是神圣的，没有共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党那有个人呢！可见公民是第二性的。公民对党的服从是无条件的，不仅在行动上而且在思想上都应当服从（称“保持一致”）。如果与党有不同的意见，那就是罪恶，随之而来的便是无可逃循的惩罚。公民对党的奉献是无保留的，除了生命、财产，还有人的良心。一旦党需要（不管这种需要是否正当），人们就应当站出来让党挑选，去为党牺牲。即使是最低限度的个人权益，如果与党利益相矛盾，你就得放弃它。共党统治阶层藐视个体的独立性，鼓励为集体献身，为国家牺牲，这就好比利用宗教行骗的人，使劲说服你把钱给他，说钱是不洁净的，只有把钱给了他，你才安全；结果他拿着你的钱逃亡到国外去了，花天酒地享受去了。

中国贪官潜逃到外国人数之多、转移财产到外国之巨，世界第一。2009年中纪委副书记李玉赋透露，近30年来，我国外逃官员数量约为4000人，携走资金约4000亿元人民币，平均每人卷走约1亿元人民币。未逃的贪官又从每个中国人身上抢了多少钱呢？要知道无官不贪啊！110人涉案，中储粮河南多个粮库骗7亿粮食资金。吉林省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前书记、主任车世刚等多名官员，联手侵吞公积金逾11亿元人民币。“通化公积金案”涉案金额则是“郴州公积金案”的18倍，是“兰州公积金案”的10倍，该案虽历经十多年番查处，涉案官员都安然无恙，民众质疑有高官幕后保护。中国农村的党支部书记99.9%都是恶霸、流氓。温州市永嘉县新桥村10名村官瓜分了价值18亿元的316套安置房，此案被称为中共建政60多年以来村级官员集体贪污的第一大案，这些村官还有其它犯罪行为。

在法律方面，不像西方国家那样，法是公民权利的靠山，而是党国的奴婢；权力驾于法律之上，而不是置于法律之下。法是共党意志的体现，因此，共党既是法律的制定者，也往往是

法律的破坏者——当这种法律已妨碍共党需要的时候。是共党造就了法律，而不是法律造就了共党。公民的权利与义务虽载入宪法，但在实践中往往无端地遭到排斥。老百姓必须守法，党国官员则可以守法，有的甚至在公众面前明目张胆地违法。国家权力就是建立在无视、甚至无端侵犯公民权利的基础之上的，可想而知，给它统治下的人民能带来什么？！

众所周知，“强扭的瓜不甜”。不能退出的“集体”就是监狱、就是假集体。如果“集体”在人们的心中与监狱类似，令人厌恶，那怎能够唤起人们对集体认同感？所以，就弄出“集体主义”理论来蒙人，让那些群众随领袖人物的指挥棒而运动，从而保障干部们的利益。

如果说中国的家长制是集体主义的传统形式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则是集体主义的现代形式。这种现代的集体主义往往喜用“科学”来论证其自身的正当性。它断定，个人的利益不是由个人的自由选择来确定的，而是由“科学的”、“客观的”历史规律决定的，而且这种规律只被少数导师和领袖所掌握。计算利益的单位是抽象的“集体”，而不是具体的个人。具体的个人是否有能力认识这种客观规律并不重要，只要肯听从导师们的教导就足矣。领导者要求他人对自己尽忠；把他人当手段、当工具、当资源，从来没把下属当人。他们强迫别人放弃个人权利，为集体而牺牲个人，表面上看是为了整体利益，但强调者的真正目的，不过是以国家民族的名义将一切利益都攫取到自己手中垄断成特权而已。

1942年5月23日，毛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文艺从属于政治，必须为党的政治服务；“创作自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革命的文艺家应心甘情愿地做革命的“螺丝钉”，也就是做党的“螺丝钉”。在毛泽东看来，革命=党=领袖=毛泽东。毛泽东喜欢的是农民追随者的驯服、盲从和愚忠，毛讨厌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知识分子是实行愚民政治的障碍，因而被视为异己分子，处处受到刁难打击。毛希望知识分子象农民一样做毛泽东的“螺丝钉”，做马克思主义的奴才，死后好去“见马克思”。为此，他开展延安整风把延安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打成“特务”，其中，批评了共党等级制的王实味被枪杀。1949年以来，又开展“思想改造”、“反右”等一系列的整知识分子的运动。

中共提倡集体主义，否定个人主义。中共的榜样雷锋就是一个反对个人主义的极先锋。“雷锋日记”中的名言是“对待同志要象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要象夏天一样火热，对待个人主义要象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要象严冬一样残酷无情。”

“对待个人主义要象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要象严冬一样残酷无情”是大错的。

什么是“敌人”？即一切对共党独裁不满的人士。“对敌人象冬天一样严酷无情”等阶级斗争至上的“豪言”，就是后来文革中武斗的先声。周恩来给雷锋的题词是“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学习雷锋“对敌人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按照雷锋这种精神，只要定性为“敌我矛盾”，任何残酷的刑罚都可以使用，张志新可以被割喉管，地富及其子女可以斩草除根、挖心吃肉，国家主席刘少奇也可在没有正式法律手续前就关押迫害致死。

中共特权阶级为了一己的私利，通过学雷锋运动肆意煽动个人迷信和阶级仇恨，是违反人性的、不得人心的，所以不得不加上一层“助人为乐”等社会公德的包装。其实，“雷锋”的“助人为乐”只不过是欺世的幌子罢了。中共当局捏造的典型“雷锋”，属于假大空宣传的典型。据了解，真人雷锋确有过在社会上做好事的事实，但他往往是在忽视本职工作和军队纪律前提下进行的。比如他请假去卫生队看病，途中就可能在某建筑工地作义务劳动，结果

是没有按时归队。雷锋作为一个军人，不守军纪，离军营到火车站去接送一个不认识的妇女，这种事允许吗？“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雷锋在火车上擦桌子，领导是怎么知道的？难道说雷锋连这么点小事也向组织汇报？更加荒谬的是：毛泽东一边号召别人学雷锋，一边给自己大修行宫，美女伺候，极尽享乐之能事，可见毛泽东和中共当局提倡学习雷锋的“助人为乐”，“艰苦朴素”等道德规范是何等虚伪。

习近平当政的今天，共党亡党在即，“敌对势力”被无限夸大；由于社会矛盾激化，官民、警民冲突此起彼伏，当局藉“敌对势力”之名打压正常的维权活动；三是官员借口敌对力的攻击，推卸责任，在他们眼中，虚无的敌对势力是宝不是害。

个人主义这个词是一个正面的概念，是讲“个人”本位的重要性，强调人本身的独立、价值和尊严。这“个人”是有人权的、有尊严的，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这和损人利己、自私自利不是一回事。个人主义强调的是维护自己的人权并尊重他人的人权，就是今天的普世价值的人权。“个人主义”是从西方翻译过来的，这个词在西方叫 Individualism。在启蒙主义的视野里，每一个“个人”的私有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一切“个人”都享有种种个性自由并担负社会责任。所谓“天赋人权”压倒了“君权神授”。我们百分之百的把握说：雷锋是一个人权盲。由于雷锋头脑里个人迷信和阶级斗争狂热作祟，政治冲击一切，使他不能在技术上精益求精，训练场上倒汽车居然撞倒电线杆，他还不知怎么回事，打开车门一看被倒下的杆子砸个正着，在这完全不应有的驾驶事故中丧生。

请注意，1960年10月26日，新华社辽宁分社、《人民日报》辽宁记者站副社（站）长甄为民定稿的雷锋首次报道，见报时题为《毛主席的好战士》，表述的雷锋精神是“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其时正是毛泽东闯下大祸，大跃进饿死5千万人，毛泽东威信面临大滑坡的时候，而雷锋这个学毛着积极份子的出现，让林彪1959年发起的学习毛着造神运动掀起了高潮。其时的“学雷锋”热潮，既为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为毛泽东开脱提供了一个典型依据，证实饿死5千万人是因为没有真正照毛的指示办事，让毛泽东免除了下“罪己诏”的困境，更为毛发动文化大革命制造了个人崇拜的强大基础。可以说，始于1960年、高潮于1963年的轰轰烈烈“学雷锋”其实就是文革的序曲。没有“学雷锋”运动促使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普及到亿万人心，文革是难以发动的。历史无情的证明，“学雷锋”只会带来文革浩劫，而不可能推动改革。

《雷锋日记》是北京的人民出版社加工整理的否定个人主义、提倡奴隶主义的精神毒品。下面引用几句雷锋日记（括号内的字是编者的评注）。1961年10月1日：今天是国庆节，我格外地高兴。在这伟大的节日里，我加倍地惦记着英明的领袖——毛泽东。敬爱的毛泽东呀！毛泽东，我天天想，月月盼，总想见到您……雷锋还写了一首诗：“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生下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母亲只滋养了我的肉体，我的精神是靠党管的，缺乏一种精神上的独立性，是彻头彻尾的“心奴”。1960年2月×日雷锋写道：“为了忠于党的事业……今后，我一定要更好地听从党的教导，党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决不讲价钱”（文革时让你批刘、邓，你一定是个造反派；让你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你一定去打砸抢）。1961年4月×日：毛泽东著作对我来说好比粮食和武器，好比汽车上的方向盘。人不吃饭不行，打仗没有武器不行，开车没有方向盘不行，干革命没有毛泽东著作不行。后来，发展成文革中的“三忠于”，“四无限”，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一句顶一万句”，“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一切为了毛主席”等等肉麻的膜拜，使毛泽东能“指挥一切，调动一切”来胡作非为。随后，一些偏执的口号纷纷出笼，如“毛主席的话就是真理”、“跟着毛

主席就是正确方向”、“毛主席每一句话都是最高指示”、“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等，都在社会上流行开来。学雷锋运动内涵的个人迷信和阶级斗争至上，只会把国家和人民引向灾难的文革深渊。

学雷锋是神化党魁、愚弄民众的工具。雷锋这一榜样所代表的象征性意义主要在于无条件的服从和牺牲。在歌曲《学习雷锋好榜样》中，“忠于革命忠于党”、“毛主席的教导记心上”、“愿做革命的螺丝钉”等等，道出了雷锋的本质。他忠于的是党魁，是永不会思考的“螺丝钉”。雷锋的“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精神强调的服从即党叫干啥就干啥；强调听党的话；不仅从行为上不要造反，而且还要从思想上“无限热爱”，“无限忠于”党魁。如果谁和毛泽东不一致，他就要“立场坚定斗志强”，而且要“秋风扫落叶一样无情”！在普世价值中，人应该具有善良、仁爱、慈悲、明礼、正义、智慧、宽容、信用等等品质才是一个好人；而在“雷锋”中，只有所谓的“党性”“阶级性”的仇恨，“秋风扫落叶一样无情”的凶狠。总而言之，“学习雷锋”和唱“红歌”、跳“忠字舞”没什么两样，可以说是最早的“唱红打黑”。今天，“雷锋精神”依然在“教导”着人们充当党的工具、螺丝钉或炮灰。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一样搞学雷锋运动，一样是个人迷信、个人独裁，而贪污腐败更上一层楼。

个人主义价值观是公民社会的基础。人首先是个“人”，然后才有其它的社会关系，人是国家的基础和根本，人是国家存在的目的，国家是为人服务的手段。目的高于手段，人的位置高于国家。现代的公民社会，如果离开了对“个人”本位的确立，离开了对每一个人的独立、尊严的承认，就不可能建立，必然还会回到臣民社会中去。因为臣民社会不承认“个人”，所有的人在统治者心目中都是工具和炮灰。中共有一位元帅曾说：“我打仗就是往锅底填柴火。”填的这些柴火就是士兵，所以战争里是不允许个人主义的。在战争思维、阶级战争的敌对思维之下，就不可能有个人主义，个人主义的合法性必然是在和平的、开明的、自由的时期才能有。个人主义因与传统的专制主义针锋相对而成为专制社会的“万恶之源”。自由平等以个人主义为基础，自由平等与民主宪政相联系，这些都是建立现代公民社会的价值支撑。习近平说：“我们继续要学雷锋，就是要加强集体主义，就是要反对自由主义。”毛泽东就是以反对自由主义而知名的。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1958年周扬总结这场运动，写了《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此文经毛泽东修改），他说：文艺界犯错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个人主义，他说：“个人主义在社会主义时期是万恶之源。”多可怕啊，是万恶之源！

在传统的臣民社会，完全没有“个人”的地位。“个人”被工具化、奴才化，只是权势者专制下的“子民”。然而，在1949年以后中共的教育当中，个人主义却是一个坏东西。否定了个人主义，只承认集体主义，使个人完全失去自觉，人人都成了“驯服工具”。个人服从“集体”，大家都一致，高度一致，一言堂那就谈不到个人，也谈不上个人主义。从电视上看到，全国人大代表到北京开会，记者采访他，有什么感想啊？有的人大代表说：“我第一次到北京，住得很好，吃得很好，非常感谢党、感谢国家……”，他完全不知道他作为人大代表应有的权利和义务。他是“臣民”，不是公民，是被掌权者吞噬了“个人”的愚民。愚民的悲剧也就在于，他们为成为权力的附着物而感到无限的自豪、风光和荣耀，他们在舔舐权力者靴子的同时脸上露出的是幸福荣光，成了自豪的心奴——党奴。

原中宣部部长朱厚泽把共产党所搞一套叫做“党文化”。“党文化”的实质就是消灭一切个性，以“集体”名义实现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在集体主义那里，个人没有地位，人不是目的只是手段。集体主义以整体的思想、整体的价值观，灭人性、宰制人性。它以脱离人性的方式把人变成兽性，以崇高的方式把人变成不能独立思想之人。每个党员必须用党性来替换自

己的人性，用党性来武装自己，来指导自己的一切行动，就是刘少奇说的“作党的驯服工具”。“党文化”对整个社会来说，就是垄断所有的思想、政治、经济、文化资源，建立起一个无所不包的一党专政，控制全社会，和现在人类的普世文明完全是针锋相对的。在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开展的党化教育运动中，个性、个人主义全被否定了。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人们不可能把自己的个性完全地消灭，结果人性就被扭曲、变形，所以学生就讲假话、空话，专讲那些符合党的要求的大话。假大空流行，导致道德崩溃，遍地人祸！

集体主义也讲自由，但那不是个体的自由，而是讲阶级的自由、政党的自由，权力的自由。集体主义也讲思想，但那不是自由的思想，而是群体意志、权力意志。集体主义的自由是伪自由，它所阐述的思想是充满了谎言与欺骗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经常以人民的名义、以代表人民的方式强奸群体的尊严、民族的尊严、国家的尊严，并以此来取代个人的尊严。集体主义与绝对权力有着天然的亲和力，集体主义如果和绝对权力结合，就会成为红色恐怖。

所以，讲个人的思想自由，讲个体的尊严，就必须反对绝对权力，反对集体主义，更加警惕和反对二者的结合。马丁·路德·金警告人们：“历史将会记录在这个社会转型期，最大的悲剧不是坏人的嚣张，而是好人的过度沉默。”如果你在不公正的情形下保持中立，那你其实已选择站在压迫者一边。不要以为你不作恶就是好人，不要以为不害人手上就没有鲜血，不要以为没有当走狗就不是帮凶。在强权面前，每一个沉默者不是懦夫就是帮凶。如果说强者对弱者的容忍是一种美德，那么弱者对强者的容忍只是一种苟且。权力对权利的容忍是自由，而权利对权力的容忍就是奴役。自由主义之父穆勒说：“一个国家把国民变成侏儒，以便使他们成为更加驯服的工具，就算是为了有益的目的，但这样做只会发现，与侏儒在一起是没法成大事的。”正如胡适所强调的：“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19. 吃人不吐骨头的共产动物社会

共党奴隶制是奴隶主义的最高形态。人类历史上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不仅仅只有奴隶制度、封建制度、原始资本主义制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已出现了一种新型的、比以往任何剥削制度更为黑暗、更为狡诈、更为贪婪、更为毒辣和残酷的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吃人不吐骨头的社会制度。这就是苏联所奉行的超级法西斯制度。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存在奴隶制如当代中国黑窑奴隶制，而且比美国的奴隶制要黑暗得多、血腥得多。譬如，俄国，过去就一直实行的大规模的农奴制，而且被奴役的都是自己本民族的同胞，境遇比之美国的黑奴要悲惨得多。列宁用组织和纪律，接受德国的资助，创造出全世界最大的共产奴隶制国家。事实上，共产主义奴隶制是奴隶制的最高形态，共党所奉行的社会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最狡诈、最贪婪、最毒辣的特权奴隶制度——共党霸权奴隶制。

自从苏联解体以来，中共总结的经验可谓车载斗量，独独忘记了从苏联政治制度本身找原因。俄共中央书记久加诺夫说：苏共垮台的原因在于它违反了人民意志的“三垄断”制度，即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制度、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以及垄断利益的封建特权制度。

中共从毛泽东时代开始直至今今天仍然保持三垄断格局，即：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中国至今仍然维持一党专制格局，中共国的政府享有不受任何监督、任何制约的权力。

政治上，共党挂着无产阶级民主的招牌，实际上，劳动者无权选举领导人，也无权监督执政党。在共产奴役制度下，实行的是人类历史上最反动、最腐朽、最落后的干部任命制。共党奴隶主任命官员的准则是“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那些善于投机、媚上压下的干部总是被一再提拔重用，而对现行政策的批评者却被百般地打击。陈洪潮说：“在今天共产政权的大粪坑中，任何人都没法做清官，只能做贪官，要么同流合污，要么被淘汰出局。”这种自上而下的任命制导致干部只对上负责，不用对下负责；只怕领导批评，不怕群众反对；必然带来官员奴役民众的极权主义。中共的官场就是一个靠马屁与裙带连接成的淫邪窟窿，官员不似世袭却胜似世袭，太子党横行官场，连毛新宇这样的弱智儿也能弄个将军当当，有的县市官场几乎被一些家族垄断。尚黑党魁是官僚集团拥戴的利益总代表，不可能推行触犯官僚利益的改革。因此，任何期盼党魁进行“主权在民”、“人权至上”、“人是目的”的改革，都是不可能的美梦罢了。因为这种改革违反了共党极权制度控制人、剥削人、奴役人的本质。官僚的饕餮之口岂能吐出含在嘴里的民脂民膏？中共不允许反对党的存在，禁止持不同政见者活动。共党牢牢地控制了一切权力，共党通过控制居民的偏好、监视他们的行动和限制他们的自由等方式来干预公民个人生活。共党的支部组成了一张无所不在的网络：自上而下，从宏观到微观，延伸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在每个车间、村镇和连队都建立了党支部，构成了全社会唯一的神经网络，操控了每个社会细胞，控制了每个人的一切活动。后来，墨索里尼曾模仿列宁建党的办法组建意大利的法西斯党。所以陈独秀说：共党是法西斯之母，其罪恶远远超过法西斯，共党是超级法西斯。

垄断经济利益的特权制度。这种新型的剥削制度是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生产资料的党官所有制。名义上为全体劳动人民所有的资源，实际上统统成了官僚垄断特权阶级的私有物。共党国家注重发展军工和重工业，忽视民用轻工业，因而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这种官僚垄断特权阶级所有制，在前期是在“公有制”的神圣袈裟的掩蔽下，以官僚特权阶级集体垄断共同占有的方式反映出来；后期以改革的名义化公为私，实行官僚对权力和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或垄断。共党垄断了所有土地、矿山、工厂、江河湖海、草原、森林，人民沦为了彻底的无产者，只能象奴隶一样乖乖地劳动，做一个任由领导摆布的螺丝钉。政府掌握着资源分配大权，形成了向权贵集团倾斜的分配制度和特供制度，官员的工资、食品、住房分配、医疗条件、交通条件、子女上学条件、出国旅游以及享受多种文化娱乐……平民都望尘莫及。而干部却拥有各种特权，如：不受人民监督，有豪华别墅，有专车，有司机，有警卫，有特供商品，他们贪污受贿，欺压百姓，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在平民子女一职难求的情况下，官僚特权集团还垄断了社会上升管道，红二代、官二代接班已经成为公开现象。

在这种制度下，人与人的关系处于极度紧张状态，人民时刻提心吊胆，以防被吃、被欺、被整，可是他们总免不了被吃、被欺、被整。因为他们不仅是丧失了一切防卫手段，而且是丧失了一切，只能沦为官僚们的工具或性奴，劳动者必须一切听从党官安排，处于毫无人权、毫无保障的水深火热的苦海中。尽管如此，苦难的人们还被逼着强装笑颜永远对党感恩戴德。古代的奴隶主用奴隶的人身来殉葬，以显示其永恒的统治；今天党官们则以劳动者的尊严、权利和创造精神的丧失以显示其绝对的支配权。这种现代奴役制度，使得劳动人民和官僚特权阶级经常处于白热化的矛盾状态之中，以至于爆发了杨佳“7.1”杀官案。

在思想上，共党垄断了真理、垄断教育、垄断思想、垄断了言论。中共一直坚持在学校教育、文艺活动、电视电影中灌输中共意识形态，习近平上台半年，其喉舌居然敢将中共信奉的理论称之为“宇宙真理”。全世界都可以收听中国的广播，但中国听不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广播。境外电台严禁收听，让你的俩耳成个摆设。全世界都可以观看中国电视节目，在中国

不可以观看外国的电视节目。中国的卫星电视被严格管理着。全世界都可以买到中国的报纸，在中国买不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报纸。全世界都可以浏览中国的网站，在中国浏览不到世界上大多数的网站；互联网负面消息一律被屏蔽，让你成个睁眼瞎；这是什么样的国家，光一年封锁网络的花费就几百亿。中共当局雇佣 200 万人，对中国民众在互联网的舆论实施监控，每天数百万个社交媒体和微博网站发布的消息都在严密监视之中。

作家张抗抗说“你似乎看到了许多报纸，其实你只看见了一种报纸；你似乎听到了无数声音，其实你只听到了一种声音，你似乎想到了无数答案，其实他们只给你一个答案。……他们就是一部高效的机器，几十年如一日地制造一种叫作奴隶的产品！” 共党一切言论源于其领袖或《真理报》，统治者掌控了所有媒体，凡事由党来定论，民众只有鹦鹉学舌的义务，只能按中共口径说话。公共场合不许你说话，党要让你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陈桂棣敢为最下贱的农民鸣冤叫屈，被告上法庭；姚立法敢于推广人大代表竞选，就多年被毒打年被软禁。共党用统一的思想教育人民，人民没有言论、新闻、出版、集会、结社和组党的自由；共党把那些敢于讲出良心话的人抓起来投进监狱……表面上一片宁静，实际上酝酿着火山。

美国政府对哪个国家都不怕得罪，只是怕得罪本国人民；中国政府对哪个国家都不想得罪，就不怕得罪本国百姓！慈禧赤裸裸地扬言“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中共将其发扬光大。2000-2011 年，中共已向 38 个国家无偿援助了总共 3 千亿美元。中共一位高官访美，学者劳斯问道：我 68 岁了，走了 96 个国家，很不理解中国政府这样搞的！中国还有一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还有 90 万山区小孩没学上，还有 150 万乞丐……这些问题你们不解决，每年却向外国支持几千亿，难道中国民众在你们眼中不是人？

是的，国家动物园化、人民动物化，可以说是专制统治的传家法宝。法国思想家爱尔维修说：政府垄断教育、垄断思想，而且绝对只为极少数的极权专制者服务，其结果，必然造成全社会思维器官的严重衰退。爱尔维修又说，“禁锢思想压制言论，就会使人民成为瞎子、聋子和白痴，瞎子的东西比明眼人的东西更容易偷，一个白痴民族要比一个开明民族容易哄骗、容易统治。”王亚南说过：专制国家就是疯子+骗子+聋子+哑子。专制国的人员构成=残暴的疯子似的皇帝+骗子似太监、官僚+聋哑的螺丝钉化的百姓。统治集团希望人民是瞎子、聋子、哑巴，听凭他们任意的摆布，不要有任何不满、抗议、争辩。经过多年共党教化，中国早已成了地球上最大的人形动物园。螺丝钉化的百姓成了官员们任意宰割的家畜。红朝公然把一部分国人称之为兽的是毛泽东：“要消灭一切牛鬼蛇神”。这些牛鬼蛇神就是黑五类地富反坏右，他们实际上是各个领域里的精英。文革的时候，全国的样板——昔阳县大寨大队有一个婴儿，刚刚一周岁，不会说话，却能表现出鲜明的爱憎：只要他的父亲一喊“亲亲毛主席”，他就举起手做出笑的样子，如果父亲喊出“恨恨刘少奇”，他就会做出咬紧牙关的痛恨之状。这个孩子的表现让来大寨参观的观众啧啧称奇，被当时的报纸广为传播，这说明当时中国就是“动物庄园”，婴儿的爱憎分明的表演就是伟光正共产党的“马戏团”成果。

老百姓都不是人。2008 年 10 月 29 日晚，在深圳南山新梅园酒楼，中共深圳海事局党组书记林嘉祥以请带路去洗手间为由，卡住一名 11 岁女童的脖子欲将其拖进洗手间内强奸。女孩挣脱后跑回找到父母，在父母回头与其讲理时，林竟然说道：“我就是干了，怎么样？要多少钱你们开个价吧，我给钱嘛！”在场众人愤怒难耐，林更加张狂，手指着女孩父亲叫嚣着：“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北京交通部派下来的，级别和你们市长一样高。我掐了小孩的脖子又怎么样，你们这些人算个屁呀！”“你们这些人算个屁呀”——揭示了中国人不是人。网民怒吼“民工被压榨得象牲口一样，矿工每天都在死亡，我们和你们就是不一样，我们是

屁，你们却越来越狂！”“你们的办公楼奢甲一方，你们的公车横冲直撞，你们的老婆孩子多在西方，……你们的眼里百姓是待宰羔羊……”曾任周口市市长的张海钦睡了一对姐妹花，3人睡一床。张海钦提拔其情人程晖为某单位副局长，他对程晖讲：“抓住上游（上司）吓死下游（部下），天下大吉。什么公检法都是党的打手。叫他们打谁就打谁，就是不打主政领导。什么人大政协，那是腐败分子集结地。我算是‘金正日’（今天正日着），现任。一到了人大政协，也就是贪足捞够了，算是‘金日成’了。人大、政协、工会都是党的花架子，让他们摆着‘代表’人民的，其实人民连屁也不算，一亿人的话不顶一个官的话。在中国除了官是人，老百姓都不是人。人大政协里贪官多，名人多，富人多，开发商多，矿主多。你见过有老百姓在人大政协的吗？30年了，你见过人民选举过人大政协和官员吗？”

毛后时代，“动物庄园”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动物们被屠宰命运丝毫没有改变。2000年9月6日，四川眉山县城管将杜某乱拳击伤，唐德明被甩下货车身亡。2001年5月29日，宁夏灵武市城管强行没收锅灶时，将杨文志打死，并打伤杨建荣夫妇等人。2001年11月12日，安徽宿州市个体工商户张福才在多名执法人员的推搡与踢打中身亡。2002年1月18日，重庆市沙区城管开执法车从余波腹部碾过致其死亡。2002年11月18日，26岁的郭战卫在西安被莲湖区数名城管打死，与他同行的一名跟车青年也被打成重伤。2003年1月2日，广东潮州市庵埠镇一名三轮车夫在与几名城管人员争执中丧命。2003年2月，西安市雁塔区城管竟将摆摊的孕妇金昌艳推倒在地，并在金的肚子上踩了两脚，胎儿不幸死亡。2004年7月20日，广州天河区城管将外来商贩李月明打死。2005年7月20日，经营蔬菜的56岁江苏农妇林红英被城管打死。2006年2月16日，上海普陀区城管将李秉浩打死。2006年10月9日，广西来宾市像州县的一名流浪汉被城毆打致死。2007年1月8日，山东济阳县经一路宏伟酒业经营部老板李光春被11名城管打死。2008年1月7日，湖北天门竟陵镇湾坝村魏文华路过该市竟陵镇湾坝村时，发现城管毆打村民。他掏出手机录像时，被城管人员当场打死。2008年7月30日，重庆市渝中区的4名城管将小贩刘建平毆打致死。2009年3月30日，江西萍乡市的陈某被该区城管一、二十人群毆致死。2009年10月27日，昆明市福发社区城管将三轮车夫潘怀打死。2010年6月1日，深圳城管活活碾死老太。

2013年7月17日在湖南郴州市临武县的“模范瓜农”邓正加被廖卫昌、袁城等6名城管用铁秤砣活活打死。临武县政府竟在光天化日下出动警力强行从现场将邓正加尸体抢走，强行火化。这就是中国大陆盛行的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夏俊峰是沈阳一小商贩。2009年5月16日，夏俊峰和妻子在马路上摆摊被沈阳市城管执法人员查处和毆打。在勤务室接受处罚时，夏俊峰与执法人员发生争执，再次遭到城管猛烈毆打。就在这个时候，他用随身携带的切肠刀刺死了两位个头一米八以上的城管，重伤一人。一审法院的死刑判决确认说夏俊峰被打才防卫杀城管，没有见证人。正是这句话意味着夏俊峰不该获死刑，既然没有目击者，凭什么就一定说夏俊峰先杀人？而三级法院一致阻止有利于夏俊峰的证人出庭作证。2011年5月9日上午，夏俊峰刺死城管案终审宣判，辽宁省最高法院作出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夏俊峰因涉故意杀人罪被起诉，判处死刑。律师们认为，这样的判刑是不符合程序，也不合乎事实。据悉，争议很大社会反响强烈的小贩夏俊峰案是否执行死刑，最高法院不敢作主，最后是习近平亲自拍板，下令杀人，以示其铁腕执政。2013年9月25日最高法院核准死刑。夏俊峰行刑后，妻子张晶表示：夏俊峰不认罪，死前拒绝在死亡书上签字，并对妻子说：家里只要有一个人活着，都要上诉。此次夏俊峰突遭死刑，甚至不让家属见全尸，定是有哪位高层需要移植器官，因此夏俊峰必须得在这个时候被处死。执法机关何时有了尸体处置权？家属连尸体的处置权都没有？器官到底可以

卖多少钱？1995 年聂树斌被冤杀，器官被移植给了章含之。活摘人体器官和杀人贩尸是中共灭绝人性的党性！温家宝总理 2012 年在中南海内部会议上说：“不施麻药，摘活人器官，还拿去赚钱，这是人干的事情吗？这种事情发生多年了，我们要退休了，还没解决。”

夏俊峰之死，死于人治的黑帮政治！至少因防卫杀死城管的北京小贩崔英杰没有被判死刑，他还是退伍的前共军信息部队优秀士兵，现在还在监狱服刑。三聚氰胺害了那么多儿童，最后抓了几个养奶牛的；央视大火烧掉 10 几亿，抓了几个运烟火的；上海静安大火烧死 53 人，是 4 个电焊工的责任！跟西游记一样，有背景的妖怪都被带走了，没背景的妖怪都被乱棍打死。至少杀死英国人的薄熙来妻子薄谷开来没有被判死刑，难道因为她是红二代、是薄熙来的妻子？中国的刑法就是因人而异啊，非常的不公平。

中国很多城市开辟了很多停车场，为什么不开辟一个场地让小贩们摆摊，讨个生活，为什么？因为中共代表是有钱人的利益，所以，他们要砸穷人——小贩们的饭碗。为了以后能大规模的镇压民众的反共运动，习近平要把武警和城管训练成“手黑心狠”的杀人屠夫，于是纵容鼓励他们平时大打大杀，这就是中共从不追究杀李旺阳和瓜农邓正加凶手的真正原因。否则以后民众起来反抗中共时，那个武警城管敢向民众开枪挥刀？

2010 年 12 月在突尼斯，因为一个小贩被城管欺负，把他的摊位砸了、没收了，这个小贩是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而自己卖水果，尊严高于面包，最后回家自杀了。一自杀引起了突尼斯全国的罢工游行，把突尼斯政府推翻了，引起了整个中东的“茉莉花革命”。

共党争利于民，不惜流血强制拆迁。2003 年 8 月 22 日南京市玄武区邓府巷翁彪因房屋被强制拆迁而自焚。据《华西都市报》2004 年报道，重庆市江津双福镇古桥村发生惨剧，拆迁部门在一块被征地居民迁出前提前动工，巨大的推土机推倒房屋，将屋内熟睡的三岁幼童活活砸死。2005 年 9 月 14 日，湖南农业大学一员工解淑兰因不满自家房屋被强制拆迁而自杀。重庆商报：2007 年 9 月 16 日，钉子户的独生子在开发商员工指使下，被刺身亡。在广州，百条毒蛇夜袭居民区，疑地产商“逼迁”。2009 年 11 月 13 日唐福珍抗强拆自焚。

开发商在没有取得上海浦东新区拆迁户沈勇签字的情况下，在他家自留地上建了商品房，并以暴力手段将他和他母亲赶走和软禁，强行施工建房。2013 年 10 月 24 日沈勇被公安六里派出所活活勒死，死后遗体遭抢。而静安区新闻路拆迁户到动迁办查询被打伤。

中共还以“和谐”之名残酷地镇压维权人士。2002 年 4 月 27 日倪玉兰因拍摄北京西城区新街口大四条 55 号强拆现场，而被警察殴打，致其“大小便失禁、多次昏迷”。后警方以倪玉兰“阻碍办公秩序”为由，将其拘留 75 天。随后倪玉兰开始上访多次被警察殴打，致其摔断尾骨。11 月 27 日，西城区法院以“妨害公务罪”判处倪玉兰有期徒刑一年，其律师资格被吊销。因为伤势没有得到救治，此后落下残疾，双腿无法行走，生活已不能自理。2003 年 7 月 12 日，倪玉兰获释，此后继续上访，也继续受警方非法拘禁。2008 年 4 月 15 日，因瘫痪的倪玉兰阻拦了自己家的房子被强拆，她被警察多次刑讯、毒打。12 月 18 日，北京西城区人民法院以“妨害公务罪”，判处倪有有期徒刑二年。在狱中：“我有拐他们不让我用，扶着凳子也不行，每天让我在地上爬行，每天还让我到车间去干活，装一次性的筷子，从早到晚不停的干”，“我每天从五层的楼上往下爬，爬到楼下，再爬五百多米到车间，再从楼下爬到楼上，这种每天要爬四个来回，算起来一天要爬六个小时，正常人每次走十分钟的路，我要爬一个多小时才能到，天热的时候我是这样爬的，地非常的烫，我的手和腿全都烫出了

大血泡，所有的辅助工具都不让我用”。“就是我上厕所他们都不让我上，我上去了，进去了，把裤子扒下来往下蹲，结果他们看到我蹲就强迫把我拖出去，不让我解手，说是队长不让我解，他们从厕所里给我拖出去，我的牙撞到门板上掉了一半。我经常的被从厕所里拖出去，警官说这就是对你不认罪的惩罚。他们白天不让我们解大手，晚上也不让……” 2012 年 4 月，她再度被以“寻衅滋事”罪名判刑 2 年 8 个月，而她的丈夫也被判刑 2 年。

俄裔美国哲学家、小说家艾因·兰德《流氓政府的性质》中说：“政府不再是人们权利的保护者，而是成为最危险的侵犯者；不再是自由的保护者，而是建立奴役的体制；不再使得人民免受武力的威胁，而是首先使用武力对付人民；不再是人民之间关系的协调者和基于社会准则的服务者，而是成为用威吓和恐怖手段控制人民的工具；它不倚仗法律，对社会资源的支配来源于官僚机构的任意决断……我们发现了一种奇怪的颠倒：政府可以做任何它想做的事，而公民只能在得到政府同意的情况下才可以做。这是人类历史上由野蛮力量控制的最黑暗的时代。”共产党实行的是比公开的帝制还专制独裁千万倍、还黑暗千万倍的党天下帝制！毛泽东解放的仅是他自己或者是他那个集团的一小部分人，广大的工人、农民、商人、知识份子等等，在毛统治下实际上沦为了新的奴隶，是不可能得到什么“解放”的。他们不但没有言论的自由，甚至连基本的人权都没有保障，随时都有可能被批斗、被抓、被监禁、劳改，乃至被迫害致死，被饿死，被枪杀的可能——铁流先生和他的难友们的苦难经历都充分说明了这些。中国人吃透了共产怪兽的苦头，这批现代的吃人怪兽，他们是一批整人狂、迫害狂，中华民族因为有他们的存在而身陷绝境，成了任这些魔鬼们任意宰割的羔羊。必须彻底清算这些共党魔鬼们的滔天大罪，才能告慰那些九泉之下的无数冤魂。

20. 屁民喝毒奶，权贵吃人奶

2009 年《南都》周报发表过调查新闻，皮革废料是怎么摇身变成食用明胶的。石灰浸泡、清洗搅拌、盐酸浸泡、熬煮融胶、冷却漂白、晾晒粉碎，就这样简单直接，从惨不忍睹的垃圾变成看了就想啃一口的明胶，像变戏法一样。短短几天内，用皮革废料做成的有毒胶囊已经被曝光，但其余制成品公司坚决不认账。这说明：官府早就知道了毒明胶和毒胶囊在全国泛滥成灾，但是却装聋作哑，置之不理，让亿万人中中毒！直到 2012 年 4 月才开始装模作样地查处：内地有厂商以废皮革提炼工业明胶，制作药用胶囊，当中重金属铬最高超标 90 多倍，伤肝害肾并致癌。全国儿童哭唱新儿歌：“两只皮鞋，两只破鞋，一只变成老酸奶，一只变成毒胶囊，真奇怪！真奇怪！”共党官府一面严惩曝明胶内幕的举报者，一面假惺惺象征性让工商公安抓几个制毒企业，这种瞒天过海的伎俩早就用过。因为共党可以没有举报者，却不能离开各类制毒企业——它们是已中共维稳费用的提供者！

在共党“特色”政权的统治下，国有企业公然在奶制品中添加毒品三聚氰安，不仅毒害婴幼儿，而且毒害了全世界的消费者。政府大叫食品安全，而监管又形同虚设，毒奶粉事件爆出，假疫苗又出现；瘦肉精刚去，又来地沟油……中国官员队伍如此庞大，执法部门如此之杂多，早已是举世无双，但是政府监管因为官员腐败而依然是处于“无政府状态”。

导致无数儿童患泌尿系统结石病的主要原因是患儿服用的奶粉中含有三聚氰胺。路透报导说：“石家庄政府和新西兰恒天然公司在 2008 年 8 月 2 日正式被告知三鹿毒奶粉问题。市政府等了 38 天才正式通知省政府官员”，为了保证北京奥运直到 9 月 9 日才向省政府报告，而宣布公开回收问题奶粉一直拖到 9 月 11 日。据卫生部通报，截至 2008 年 11 月 27 日 8 时，全国累计报告因食用三鹿牌奶粉和其它问题奶粉导致泌尿系统出现异常的患儿有 29.4 万人。截止 2008 年 10 月底，中国大陆实际上报的与食用三聚氰胺毒奶粉有关的病例超过 375.2821 万例。其中，10 岁以下占 66%，10-18 岁占 7%，18-35 岁占 3%，35-55 岁占 10%，55 岁以上占 17%。2009 年估计，毒奶粉使 39 万儿童肾脏受害。因食用三聚氢胺而死亡人数为 33989 人；其中，10 岁以下占 77%，10-35 岁占 4%，35-55 岁占 6%，55 岁以上占 13%。

中南海的高官们早知道中国生产的食品有毒，就象他们知道中共的每个官员都腐败一样。“高科技”的假奶毒奶泛滥成灾的消息于 2005 年 3 月刚刚见报，第二个月即 2005 年 4 月就成立了“国务院中央国家机关食品特供中心”，足见权贵对自己的健康安全何等重要！中南海的官员们吃的是没毒的国务院中央国家机关特供食品，被甄选为“中央国家机关特供”产品的著名品牌有十几个。所选用的有机食品均来自严格按照国际、国家食品生产规范和标准生产的有机食品。他们有独立的供应管道，吃的牛肉是以内蒙青草牧养，绝对不打荷尔蒙；喝的是从云南来的极品有机好茶，一磅的价钱高达 100 英镑(183 美元)。供应的所有食品都必须通过最严格安全检验，其中特权阶级食用的米，部分由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精心培育，特别用长白山的融雪灌溉，据说口感极佳，产量很少，9 成供应北戴河，其余的才在市场上贩售，售价比一般白米贵 15 倍。《泰晤士报》特别强调：“大陆的小孩可能因为喝了毒奶粉而死亡，但是，这个国家的领导人正吃着纯净的有机食品。就像是古时候的帝王，新的共产党菁英享受着来自于全中国大陆的绝佳食品，来源是一个高度安全的政府单位”。

中南海的官员们自己吃“特供食品”，就说明他们知道中国食品有毒！可是，他们偏偏要老百姓吃毒食。2004 年三鹿产品就因为发现有毒被拿下货架，后来经各级政府行政干预、中共操控媒体宣传而使三鹿度过危机。没有中共的支持和保护，三鹿怎敢一再下毒？2008 年 8 月初三鹿问题就被揭出，为了保奥运顺利进行，又是中共高层隐瞒真相，使毒奶继续毒害中国人。如果不是新西兰揭出事实真相，中共就会一直隐瞒下去。2013 年夏天，中共又报复新西兰，官媒大肆造谣新西兰恒天然奶粉有肉毒杆菌，检查结果子虚乌有。

中南海的官员们把“以民为本”写在纸上，说在会上，一次次哄骗善良的中国民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本来中中国人几千年来的古训，中共的官员却连这样最起码的道德也不讲，让民众吃有毒食品，自己吃无毒的“特供”食品，中国历代可有过这种现象？帝王的御膳房也要到民间采购食品原料，也不让民间吃有毒食品。

山西绛县法院原副院长姚晓红是一个三盲法官：文盲、流氓加法盲；连自己的名字都写错，令人震惊。这位姚副院长患有糖尿病，听说人奶对身体好，便命干警找奶供他喝，输液用的瓶子每天两瓶，喝了两个月。一瓶 500 毫升，两瓶就是 1 公升，“喝了两个月”，那就是 60 公升。这不是 60 公升水，不是 60 公升油，也不是 60 公升血，而是 60 公升人乳！羊有跪乳之恩，鸭有反哺之情，喝了人民的奶，就应该为人民做事。可是，这位姚副院长却把绛县法院变成了“阎王殿”，他 5 年里先后打了 400 多人，其中打死两人，打伤几十人。难怪当地群众气愤地把法院对面的县畜牧局的牌子挂在法院门口，称法院养了一群畜牲。对于姚晓红来说，他哪里配得上畜牲。畜牲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姚晓红吃人民的奶，挤出来的是毒汁，简直禽畜不如！别看姚晓红不识字、没文化，只是一个科级干部，可他神通广大、

案发后对他的审查先后 4 次“流产”，直到总书记龙颜大怒，中央专案组亲自派人去抓捕，这才把这个人抓到。姚晓红因犯有贪污受贿、刑讯逼供等罪，2000 年初被判处死缓。

2010 年以来，中共官员们是亲自接受“美女人奶”哺乳了，边吃边与奶娘上床“裸战”了。中共政府最喜欢“特事特办”这一套，什么特权车、特供食品、经济特区、中国特色……而这种“特”，其本质就是特权。官员习惯性地“视百姓为乳母，视法律为儿戏”。

中央警卫局的一内卫说：“主席的卧室是两张大床，坐上去很舒服，是夫妻双睡，两张大双人床并排摆着。灯光是金黄色的，照在大床上很有品位。床头向着南面，床前依然有个大液晶电视。一共 5 个洗手间，主席只在 2 楼上厕所，我进去之后看见水龙头都是镀金的，马桶，浴缸都是水晶的，透明的；瓷砖都是蒙那里沙……每个首长家有 3 名保健医，和厨师一起配合保证领导吃的好，吃的健康。他们吃的东西都是 1008 专供。大米是天津小站大米，特别的一块田地里种植的，含有硒；茶叶也是杭州的龙井，上好的龙井；还有大红袍，据说喝完了还壮阳。他们吃的熊掌、天鹅、鲍鱼，都是最好的野生的。我认识万里的厨师，还给我偷出一个熊掌，我给 1000 块钱，回家之后找厨师做了，红烧熊掌，东北黑熊的熊掌，肉很肥，很稠，非常好吃！！他们喝的牛奶都是人奶，据说是一些女的刚生完孩子把奶挤到杯子里，他们就喝。中南海还养了好几十只鹿，他们还经常喝鹿茸血……常委们常有无数的美女陪侍……温喜欢喝茅台 60 年特供，胡酷爱法国干红。习近平喜欢喝洋酒，而表面很土的贾庆林则喜欢竹叶青。领导们很少抽烟，但李克强抽烟，都是从上海卷烟厂特殊制造的大熊猫香烟，价值 100 美金一盒。胡的弟弟胡锦涛在上海开一家大饭店，专门做鲍鱼、鱼翅的，材料完全都是中南海的东西，就连大米也是、油也是。并且他还做别的买卖，什么都做。胡的儿子在北京，女儿在纽约表面低调。但其实非常奢华，住在北京、纽约的偏僻的地方有着很多警卫员，名车无数。有一次我站岗就看见一辆黄色法拉利进入中南海，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太子。他们经常去一些只有内部人能去的派对，里面有无数美女，酗酒唱歌跳舞……有时候在玉泉山 8 号楼，有时在北京长安街长安俱乐部，有时在某度假村……”

中央常委有特供，县委书记找特供。2008 年 11 月 16 日，山西省垣曲县原县委书记高峰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大概平时“一方诸侯”惯了，正好当时喝醉了酒，就错把“中央党校”当成自己的衙门或行宫了，于是殴打保卫干部，甚至侮辱、调戏楼层女服务员，口吐狂言，动作下流，震惊全院，最后在一个老教授的强烈呼吁下才被撤职。

21. 四害之首——冗官

官本位造成官民比例失调。薄一波说：解放战争时，一个县委就七八个人，带个板凳，就是书记，有一个通讯员，就完了嘛。外国那些执政党，它都靠党费嘛。1962 年 7 月 7 日邓小平说：“有的农民讲：过去我们养一个保长，现在是好多保长。……这部份人是大量的，据说是 1600 万，有的估计是 2500 万”。按这个数字计算，平均 20-30 个人养一个“保长”或“地主”。有些“保长”比过去的更坏。1960 年，被打倒的彭德怀元帅蜗居京郊，一位警卫战士的家属前去探亲，曾对彭诉苦：“下边的干部比过去的地主、保长还凶，动不动就打人骂人。这日子怎么过啊！”1998 年财政部部长助理刘长琨说：汉朝 8 千人养 1 个官，唐朝 3 千人养 1 个官，清朝 1 千人养 1 个官，现在是 12 个人有 1 个官，世界第一。

中国铁岭市，人口 300 万，GDP46 亿美元，人口是东京的 1/5、纽约的 1/6，GDP 是东京的

0.1%、纽约的 0.18%，但是“市领导”却有 41 名，是东京和纽约的 6 倍。话说四川有几个国家级贫困县，每个县竟都有 44 个正副县长，吃着皇粮，无所事事，个个都有最高的县级特权和待遇。邓小平搞了百万大裁军，过两年又恢复了。一个离退休老干部，他就占了两个兵的名额，这全国又多了多少万。军中有一个政治系统，军官的 1/3 是政治系统的官，这就得多少？国外没有。政治系统的官相当于明代的东厂派的监军，就是看住你，怕你造反。我们现在的军官，都是自己培养出来的，为什么还要用这种制度呢？中国副职多。国外没有副职，或者只有一个副职。英国部署在西德的莱茵军，5 万多人——相当于中共的一个军，它只有一个司令，一个参谋长。要是中共得安排多少官啊！1980 年代在宁夏，县太爷的儿子、姑娘，六岁的小孩就是公务员，吃空饷。2011 年 12 月报道：山西省疾控中心的王烨被指连续五年“吃空饷”累计 10 余万元，并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待遇，大学 5 年期间学费共计近 2 万元也由单位报销。王烨的父亲是山西省忻州市静乐县县委书记杨存虎。

2004 年中国 GDP 达 12 万亿，可其中 10 万即 GDP 的 83% 掌握在政府手中，供政府投资、消费（如公车、吃喝、会议、旅游、工资等开支）之用。政府已成了典型的高价政府、奢侈政府和不作为的懒政府了。2013 年湖南一个青年被车撞伤在路边，路人电话打到三个行政部门均不理睬。最后伤者在路旁躺了整整 4 天被活活冻死。这事要发生在美国，会有一大批人包括高官丢掉公职并被起诉，不会像湖南只是让几个当事干部“停职反省”休息几天。

中国历代民、官的比例：西汉 7945：1；唐朝 2927：1；明朝 2299：1；清朝 911：1。中共的官民比例已由解放初期的 1：297 猛增至目前的 1：17。由财政供养的官员和准官员超过 7000 万人。仅养活官员，每年需要 22.5 万亿，占到全年 GDP 的 50% 了。2011 年夏季，各级政府部门的办公电费开支就高达 3200 亿元。机关人员人均办公电费 530 元。由于严重超编，地方政府债台高筑，公务员和教师的工资被拖欠。有资料显示，地方政府的债务至少在 16 万亿以上，其中乡镇政府负债总额 1 万亿元。2010 年中国政府负债至少 36 万亿人民币，要还多少利息，一年 2 万多亿，利息都还不起。2013 年中共政权全部债务是 GDP 的 200%，约 100 万亿人民币。美国政府所欠的钱 16.7 兆，也就是美国的 GDP120% 不到。

自 1990 年到 2000 年，美国几乎实现“零通胀”，自 2000 年至 2010 年，其 CPI 一直在 2% 上下浮动，换言之，在经济高速发展、个人收入逐年提高的同时，“低通胀”也始终相伴左右，一个细节是，自美元诞生百余年来，美分作为最基本的货币单位，始终在市场上流通。在美国，即使算上房租，一个人的正常工资（月薪两千美金）足够养活一家三口。通过半个月的走访，时寒冰的调查结果是：除非涉及到人工服务，比如理发，或涉及知识产权，比如图书音像外，美国商品的价格普遍低于中国国内，即便“MADE IN CHINA”的商品，常常也比国内便宜 50% 以上。相对于购买力和人均收入水平而言，中国物价明显高于美国，在绝对价格上，也在局部商品上出现了中贵美贱的情况。原因是：中国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投资导致商业银行贷款急速膨胀，致使国内广义货币供应量已经远远超过美国，从而导致货币相对商品过剩；同时，中美贸易顺差不断拉大，从而再次增加了货币流通量，推动物价上涨。

2008 年中国财政赤字首次超过 1 万亿。雪灾、地震、奥运、毒奶、基建、腐败等等因素耗尽民财，社会四处动荡，民不聊生。此后，中共以印钞来填补国库的巨额耗空。自 2009 年以来，中国央行的货币供应量先后超过日本、美国、欧元区，成为全球最大的“印钞机”。

2011 年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说：2008-2010 年，美元的增发量折合人民币后，为平均每年 25332 亿元，而人民币的增发量为平均每年 121669 亿元，是美元增发量的 4.8 倍！不要忘

记：美元在全世界流通，而人民币主要在国内流通。中国 GDP 平均每年增加不到 3 万亿元（2008 年 GDP 是 30 万亿，2009 年 33 万亿，2010 年估计为 36 万亿元），货币发行量平均每年增加 12 万亿元，货币发行量的增加远远超过 GDP 的增加，竟是 GDP 增加量的 4 倍有余！2008 年 10 月-2010 年这两年内，尽管国家赖以生存的出口商品生产出现萎缩，但是货币发行量却比前两年猛增一倍，这显然不是出于对货币的需求增加，而是用增加货币来刺激市场需求。如此滥发货币令人震惊！2011 年美国的 GDP 比我国多两倍半。我国印的钞票是 78 万亿，换成美金之后等于 12 万亿，比美国的 9 万亿钞票还要多 30%。美国不但没有比我国多两倍半的钞票，我国反而比美国多 30% 的钞票。2012 年全球新增货币供应量超 26 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占近 50%，中国新增货币 13 万亿，如果去掉这个因素，中国经济是负增长。2012 年中国的 M2 人民币是 97 万亿，美国的美元 M2 折合成人民币不到 70 万亿，中国的钞票比美元还要多，但中国的 GDP 只有美国的 1/3 强。这些多出的钞票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

五年印钞 66 万亿，其中，国企拿了 20 万亿，地方政府 20 万亿，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每年的实际通胀 20%，全世界最高。佛山财政局局长黄福洪揭秘：中国 35 年来通胀率高达 30 倍。“以 1978 年作为基数，中国财富增长了 300 倍，但中国货币投放已增长 9000 倍，也即是说当年的 1 块钱等于现在的 30 块钱。”从 2009 年央行印钞开始，人民币实际购买力急剧下降，现在的 100 万人民币实际购买力不如 30 年前的 1 万元。人民币对内贬值，8 年间 1 千元缩水至 576 元。有百姓表示，实际缩水度更大，现在的 1 万元也就是 10 年前的 1 千元。

根据购买力来看，人民币应该是相对美元在贬值，而不是升值。但是从货币兑换的情况看是人民币在升值，主要的原因是跟贸易顺差有关。人民没享受到升值的好处，只遭贬值的难。中国每出口 1 美元商品，国内就要按照汇率比大约 1 比 7 来增发 7 元人民币来平衡，目前中国外汇储备大约 2.3 万亿美元，国内由此增发的人民币超过 16 万亿元，相当于 2008 年 3.4 万亿市场货币流通量的近 5 倍，这些由出口结汇投放的巨额货币，全部以通货膨胀的方式转嫁到了老百姓头上，造成人民币对内贬值。郎咸平举例说，我国的 97 号汽油价格是美国的 1.3 倍，汽油在中国是 6.83 元每升，在美国 4.56 元每升。电影票是美国的 2 倍，阿玛尼西装 3 万是美国的 3 倍，松下 54 寸的彩电是美国的 3.4 倍，宝马 24 中国国内卖 9 万美金，美国是 3 万美金（20 万人民币）。Levis 牛仔裤我们是美国的 7 倍，我们什么都比美国贵。诺基亚 1661 型的手机，在中国买大概需要 300 美金，在美国买就只要 85 美金，差了近 4 倍。笔记本电脑呢？中国买一个笔记本 6000 块，在美国换算成人民币只有 3406 元。Samsonite 的旅行包，在美国是 27 美元，到中国价格就是 250-270 美元。

最令上海马女士辛酸的是，不久前，她想买件保暖的鸭绒衫，质量稍好的就要两千多块，后来朋友从美国给她买了件更好的，并告诉她，折合人民币才 200 多块。“他给我带来的这件鸭绒衫是中国制造的，在国内起码买到 6、7 千块以上。我们中国老百姓的工资和欧美不能比，但是我们的物价要远远超过欧美先进国家。”

左小蕾告诉记者，在美国，不仅中国制造的产品远比国内售价便宜，即使是美国制造，也出现了相同的情况，比如她曾在美国加州一个机场商店购买的美制风衣，价格不到北京赛特商场里同款风衣的 2/5。同样的成本，同样的产品，如果产自中国国内，即使算上“出口退税”的部分，也不该出现高于国外市场两倍的情况。反之亦然，如果产品来自国外，在 WTO 框架下，即使是制裁性关税，也绝对不可能出现超过一倍的价差。

中国国内商品价格被推高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中国政府的税负过高。中国现行的税制格局下，

70%以上的税收来自于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等流转环节，剩下不足 30%的税收来自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等项目。中国的增值税被称为政府的摇钱树，机器一开（投资）就得交税，不管赚不赚钱。国内是公司每笔交易都缴税，不管你是否营利；“见发票就征税”，一个企业还不知道是赚还是赔，国家就先拿走了一块，这就相当于在投资者面前放上一个“门槛”，甚至形成投资的“壁垒”。国外是等公司有营利再缴税。国内有个说法，如果按照正规纳税，任何企业都会破产或者做不起来。这就意味着，无论是哪国的制造品，只要流入中国，就将背负上这些间接税。依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府财政统计年鉴(2007)》公布的 2006 年数据计算，倘若国家征税的总量均为 1000 元，“排除其他方面要素的影响不论，那么，作为价格构成要素之一、直接嵌入各种商品售价之中的税收数额分别为：中国 700 元，美国 168 元，日本 186 元，欧盟 15 国 300 元。”其中，中国商品中所含的税比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高：是美国的 4.17 倍，是日本的 3.76 倍，是欧盟 15 国的 2.33 倍。

中国税收占消费品价格的比重竟然高达 64%，中国人每购买 100 元的商品中就包含有 64 元的税收，超过商品本身近 1.8 倍。如此高额税收加到商品价格里，自然造成了高物价。

如果换一种比较方式，中美差距或更显眼：在美国，一杯咖啡 2 美元，看场电影 10 美元，分别占美国人均月收入万分之六和千分之三。而在国内，这一数据分别是 1.3%和 3.5%，相当于美国居民负担费用的 45 倍和 12 倍左右。2009 年国际油价跌破 50 美元，中国油价却仍高高在上。网友蓝天根据油价与百姓收入之比推算，中国油价的相对价格实为美国的 58 倍多。蓝天还没有考虑到中国道路上的高收费，若加上这个因素，中国的油价便更高得离谱。与油价类似，中国的电话费、上网费、电视费等相对价格比，也都明显高过美欧等发达国家。国外尼康单反相机折合人民币 24000 元，在国内的价格是 4 万元。

郎咸平指出：中国税赋率为世界第一高，2010 年中国人交的直接税加上间接税占到了中国企业税前利润的 70%；政府 2010 年向个人抽的税高达平均所得的 81.6%，1.2 元菜价的 75%为政府的税费（包括进场费、摊位费，城管工商卫生税务加在一起，上海市一斤菜要付九毛钱。香港的菜市场只象征性的收一点水电费，香港的菜价比上海低九毛钱）。五常大米作为中国知名品牌，市场卖价高达 199 元一斤，可从农民手里的收购价不到 2 元。我有个学生，在深圳卖了 38 万元大米给家乐福，到了结账的时候，不但没有收回 38 万，反而倒欠家乐福 8000 块，为什么，就透过各种费用把你扣光了，什么进场费、摊位费、营业费什么什么，法国国庆都要交费。我们老百姓已经没有活路了，税太重的结果，只有家乐福、沃尔玛的存在，而把这些小商店消灭的结果，这些可怜人只能做什么，只能上淘宝网做可怜的直销。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网购销量全世界排第一，因为税太重。中国消费者每购买一辆国产汽车，所承担的税负大约占车价的 40%（进口车综合税负最高可达 144%），是美国消费者的 7-10 倍，为世界之最。中国路费全世界最重，全世界收费的公路只有 14 万公里，中国就占了 10 万公里，70%都在中国，而且中国还挺贵，美国这么富裕的国家一公里收费一毛七人民币，我们这么穷的国家收费四毛五到六毛，是美国的 3 倍以上，而且收的还特长。欧美各国，路费收回成本之后，取消收费，然后呢，免费用路。我国路费是各级政府的敛财工具，收个没完没了，广东河源市一个收费站准备收费 756 年。燃油税是美国的 6 倍。各种税费加在一起，占到了西安牛肉干零售价的 95%。房价的 50%到 90%统统被政府拿去了。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韦森说，一个中国制造的产品，尽管不需要承担远渡重洋的交通成本，却要在国内一路承担重重收费甚至罚款。一个统计数字显示，1 千克货物从上海运到纽约只需 1.5 元，而从上海运到贵州却需要 6-8 元。商品进入超市、商场后还要面临上架费、月返

费、广告费、促销费、年节费等费用，这些费用最终是消费者埋单。

习梦斯撕人--中共历史民间版（2）

中国国富民穷，政府宁愿牺牲民生，也要去买美国的贬值国债！中国实行政府主导投资拉动为主的发展策略，税负的增加无可避免；中国神奇的税收体制，不但造成了两极分化，也造成了“政府富百姓穷”的极端不公正的社会。中国的每月 3500 元人民币的税率相当于在美国 5 万美元年薪的税率，可生活质量差别巨大！美国高工资、低物价；中国低工资、高物价。美国 5 万美元一年已可养家了，中国大城市里，3500 元/月永远都买不起房子，税一扣，每月交通和房租一交，给父母 300，吃饭 500，连自己都养不活。美国三亿人有两亿人有枪，连政府门前都不设岗；中国十三亿人口只限军警有枪，老百姓买一把菜刀都要实名制。官权压倒民权，国富压倒民富，官方喉舌压倒人民声音，这是腐败与两极分化的根源。

美国国穷民富，政府没有钱可是老百姓有钱，政府宁愿借中国的巨款，也要去保民生的福利。美国通过减税的方式藏富于民，走的是民富国穷的发展道路。美国总统小布什为了连任，为美国人民端出了一道 10 年内减税 1.6 万亿美元的大餐。所有的美国人交给联邦政府的个人所得税，在 1950 年的时候占 GDP 的 6%，到 2010 年上升到 6.5%这样的水平。

德国学者戈得谢德有句名言，只有穷政府才会是民主政府。原因是一个缺乏专制工具去榨取人民血汗的政府，只有靠良好的公共服务来换取人民的信任，换取纳税人对政府的支持。既然政府及其行为得依靠选民支持的才能成立，民主政府如果人民不支持它就无法存在。专制政府是不需要人民支持的，它只依靠枪杆子。不过他们有一样没明白，有了枪杆子只能暂时拥有一切，绝不可能永久拥有一切。因为时间久了枪杆子会流失的。

根据美国房地产协会 2009 年统计，美国中价房每平米约 5700 元人民币，纽约房屋中价与家庭年收入中值之比为 5:1，而北京上海约为 40:1，中国因此成为“房奴”。美国人买房，迈阿密需要 4 年，纽约需要 5.7 年，洛杉矶需要 5.9 年。中国人买房需要 100 多年。

中国的房价为什么这么高？一是由于政府垄断土地抬高了地价，致使土地出让金飙升，地王频现。中央党校专家说：房价里 70%是政府税费。据专家估算，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利用低价征地高价出让，从农民手中拿走的资金约为 2 万亿元。2013 年上半年，北京土地总收入已达到 664 亿元，而土地成交面积为 813 万平方米，平均价为 8167 元一平米。北京市面积为 16410 平方公里，若将北京土地全部变卖，总价为 134 万亿人民币。美国商务部公布 2012 年 GDP 数据为 16.3 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100 万亿。美国一年的 GDP 不及北京的土地总市值。中国房地产价值已经超过 GDP 的 400%，而中国的 GDP 本身是有水分的，按实际 GDP 来算，房地产价值可能已经超过 GDP 的 500%，甚至是 600%，这是很恐怖的事。在巴西当时只有 260%，日本房价泡沫最大时也没超过 300%，后来东京房价跌去 80%。二是过去放任了房屋投机，中国 70%的购房是投机需求甚至是腐败需求。2010 年 4 月 20 日深圳一人抛售 680 套住房；上海浦东新区副区长康慧军夫妇名下拥有 24 套住房；浦东外高桥规划建设处处长陶建国名下拥有 29 套住房；上海房地产局副局长殷国元拥有 30 套住房。据报道，国家电网公司在全国 660 个城市的调查显示，有高达 6540 万套住宅电表连续 6 个月读数为 0，这些空置房足以供 2 亿人居住。处处鬼城，遍地空房子。中国富人手持 13 万亿美元正在满世界买房。而发达国家对于住房保有征收房产税，美国、德国对二套房征收 80%的销售所得

税，这些都有效地抑制了房地产投机和投资的需求。所以，在发达国家除非大富翁，否则很少有人拥有两套以上的住房，这样房屋回归了它的居住属性。三是房地产开的暴利，如 2009 年中国房地产业平均毛利达到 55.72%，抬升房价，但这是个次要因素。房价高导致房租高。广州每月 46.6 元/平方米的租金创下了 2013 年的房租历史新高。

国内房地产泡沫屡禁不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保基金被挪用而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炮弹”。国家审计署对全国社保基金审计后于 2007 年 1 月宣布，在全国范围内，除上海和西藏以外的 29 个省市自治区共有 71 亿元社保基金被地方官员违规使用。2008 年上海养老金账户巨额亏空 170 亿，而上海市财政支出不到 900 多亿，用于弥补社保的窟窿是 170 多亿，占 18%，全国没有，上海独此一份。陈良宇有 3 亿存款，为帮在传媒公司的儿子筹资，大手一挥，就从社保基金拨款 10 亿人民币。陈良宇风流腐化。从 1991 年开始，他先后有两名相好多年的情妇，其中一人曾 3 次堕胎。陈良宇从 1993 年 5 月以来，先后和 11 名女青年、有夫之妇有染，另有 4 起控告陈良宇以欺骗手段奸污。陈良宇尽管已贵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但东窗事发后发现其拥有 13 本外国护照，为随时开溜做准备。2006 年 9 月 21 日晚 10 时，经过 9 个小时的马拉松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以六票赞成、三票弃权，决定打倒作恶多端的陈良宇。9 月 24 日，陈良宇被官方宣布“双规”。陈良宇事件牵涉 2500 多名高干及家属。中纪委进驻上海后，已查到从市、局、区，有销毁、转移一批原始单据档案情况，增加了工作展开进度。至 2006 年 11 月初，上海市已有 40 多名干部外逃、失踪，7 名干部自杀，涉及资金资产达 38 亿多元。2006 年 9 月 26 日，社保基金案的主要责任者——黄菊要求辞去政治局常委、委员、中央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2007 年 5 月 9 日黄菊逝世，6 月 2 日公布死讯，传系自杀。当局没有为黄菊举行告别仪式，7 月，其秘书王维工被捕。

官员们说：中国为什么以房地产为支柱产业？为什么要快速开动印钞机？因为中国有太多官员要养。据称中国实际官员数量是美国的 500 倍，按人口对比是美国的 120 多倍。这么多官员要养，不但让中国人的税赋是世界第一，而且也是让中国人很少福利。即使这样，仍然养不起这么多官员，政府卖地搞房地产和城市化就成了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很多地方财政收入的一半，或者七八成是卖地和房地产收入。印钞票也是将人民财富转移到官员手里的一个办法。政府开动印钞机，政府的钱多了，人民口袋里的钱就变薄了。

从这个角度讲，冗官是最大的害，是四害之首，是高税收、高物价和雾霾三害之源。

22. 中国是权贵的国家，美国是人民的国家

“劫贫”是中国税收的最大特点。增值税、营业税等流转税大致占我国税收收入的 70% 以上，流转税可以看作是针对穷人的税收。就好比前一段时间，大家讨论的 1 元钱的馒头包含着两毛钱的税收，就属于这一类，因为购买馒头的主体是穷人。全国人民每天早点吃一个馒头，中共的税收就增加 2、3 个亿。中共国税收的特点说明了：以中共为代表的权贵资产阶级在剥削广大的无产的平民阶级。就像薄熙来徐明联合起来赚国人的钱！

发达国家针对普通民众征收的流转税（欧洲收的是增值税、美国收的是营业税）占税收的比重：美国是 16%、日本占 18.6%、欧盟占 30%。而所得税却是发达国家的税收大头，一般都在一半以上。发达国家财产税收占地方税收的比例分别是：美国占 80%、加拿大占 84.5%、英国占 93%、澳大利亚则高达 99.6%。发达国家房产税是很高的。所以，美国有人 1 元钱卖

房子，因为养房子的费用实在太高。买得起养不起啊！这也是近年来美国的房价一直涨不上去的原因。美国也不是所有的商品房都征收房产税的，具体的征收还要根据房子地点、居住的人口和房子面积来定税，超过的部分才征收，所以房产税确是针对有钱人的税收。为什么发达国家的富豪那么热衷于捐献自己的财产？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遗产税。在发达国家占了 50%以上的财产税，在我国国内税收所占的比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由此对比就会发现，我国是以向穷人征税为主，70%的税收收入由普通老百姓贡献。而发达国家税收的来源主要来自富人。这就说明了：中国是无产阶级受剥削的国家，美国等发达国家是资产阶级受剥削的国家。英国《金融时报》2013 年 3 月 8 日报道，中国本届人大政协代表中有 83 名超级富豪，人均财富 33.5 亿美元；而美国国会两院的 83 名最富有议员的平均财产为 5640 万美元；两者相差近 60 倍。中国富豪偷税逃税少缴税，外国富豪多缴税还向社会捐遗产。这就说明了：中国是专无产阶级政的国家，美国是专资产阶级政的国家。

中国的贫富差距是全球平均水平的至少 10 倍！中国 0.4%的人口掌握了全国 70%的财富。美国 5%的人口掌握全国 60%的财富。与世界相比也是如此。人民银行有个统计，1 千多万人的银行存款占整个银行存款的 80%以上。也就是 1%的人掌握着 80%以上的财富，而 99%的人只掌握着不到 20%的财富。张宏良先生说：占全民人口 0.02%的中共干部及其家属占有全民财富的 70%。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财产集中！在美国：最富的 10%占有 66.4%的财富，最富的 1%占有 30%的财富。在印度：最富的 20%占有 70%的财富，最富的 1%占有 16%的财富。中国是多少？0.02%！这 0.02%的中国富人比美国 10%的富人财产占有率还高，相当于印度 20%的富人财产占有率。中国的富人太厉害了！比美国富人厉害 500 倍（ $10/0.02$ ），比印度富人厉害 1000 倍（ $20/0.02$ ）。0.02%中国人是多少人啊？按 13 亿计算，那只是区区 26 万人，相当于中国一个小镇的人口。也就是说中国 70%的财产控制在一个小镇上的人们手中。他们个个都是暴发户，如内蒙书记储波让他的儿子与亲属在内蒙巧取豪夺两多亿元，被中纪委追缴 2000 万了事；再如呼和浩特前市委书记牛玉儒在北京二环动用公款 200 万为自己购买高档住宅，死后其妻子在北京向国外转款 3 千万美元犯案被网民暴光……5 个最重要的工业领域——金融、外贸、地产、大型工程、安全业，85%~90%的核心职位掌握在高干子女手中。

特权集团掌握的巨额财富与他们对国家的贡献不成比例。中国穷人的收入中 25%交税，富人只交了 18%。中国富人缴纳的个税不到个税总额的 10%，而美国 10%的富人缴纳了 60%多。占人口 20%的美国富人缴纳了 80%的个人所得税，而占人口 20%的中国富人缴纳的小于 10%。我国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为 45%，达到了世界最高水平。目前的个人所得税制度让大多数中等低等收入者缴税，而理应多缴税的高收入者却缴税很少。占有 80%以上巨额财富的中共特权阶层缴纳的个税不到个税总额的 5%；占有不到 30%的社会财富的美国富豪承担了 30%以上的个税。中国的工薪阶层缴纳的个税比例高达 50%；美国的同一数据则不到 5%。

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人均 GDP 在 10000 美元以上的高收入国家，最佳宏观税负为 30%。而我国 2009 年人均 GDP 才 3700 美元，但实际的宏观税负已经达到 35%。2011 年前 3 季度，中国税赋已占 GDP 的 40%，已超过“1/3”了。说白了，中共国想要收多少税，就能收多少税。过去 30 年，OECD 国家的平均宏观税负水平约为 24-27%，日本、韩国和美国的宏观税负相对较低，过去 20 年约在 20%左右。美国总税率为 GDP24%。

中国人的被剥削程度勇夺世界第一。欧美国家职工的工资收入一般都占其 GDP 的 50-60%，南美洲平均 38%，东南亚是 28%，中东伊朗土耳其这些国家大概是 25%，非洲国家都在 20%

以下，中国是 8%。全世界最低。世界多数国家的工资占企业成本的 50%，中国只有 8%，中国工人的工资是菲律宾工人的 1/3，是马来西亚工人的 1/4，是南韩工人的 1/10，就连非洲莫桑比克的黑人工资也比中国工人高一倍。中国人均收入世界排名：1960 年第 78 名，1970 年 82 名，1980 年 94 名，1990 年 105 名，2008 年 106 名，2010 年第 127 名。

发达国家的钱袋子是掌握在议会的手中，官员每花一分钱都要经过议会的批准。而中国的财政是官员化、随意化、秘密化的财政，一切支出由官员说了算。2006 年中国政府的总收入约 4 万亿人民币，与人民生活直接有关的教育、医疗和文化支出只占政府总收入的 2%。那么，政府最大的开支在哪？据中纪委调研报告：全国党政机关系统挪用侵占、公款吃喝、休假旅游、出境出国、公车私用、送礼滥发奖金福利，2006 年度高达 2 万亿元。相当于当年全国税收收入 3 万 9800 余亿元的 50.5%，相等于 2006 年 GDP18.5 万亿元的 11.5%。也就是说，中国的财政收入超过一半用于行政公务人员的工资、“三公消费”等。

一年全中国仅公车挥霍上万亿元，极大地加重了人民群众的负担。共产党这也能，那也能，“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就是管不住公务车。前广东省长黄华华说：“过去副省长以上才有专车，现在有的股长屁股后面都‘冒烟’”。公车私用耗费了无数国脂民膏，其情形与王朝时代当官做老爷，出行要人抬轿，没有什么两样，反映的是体制性腐败。

意大利法律规定：禁止公务员公车私用。西西里岛墨西拿市市长朱塞佩·布赞卡，曾经让公务车司机开车将他和妻子送到巴里市港口，回来时又让司机接他们回家。2002 年 2 月，当地法庭以“侵吞公款”罪判处布赞卡 13 个月徒刑。布赞卡以自己支付了往返汽油费为由，提出上诉。2003 年 10 月 21 日，意大利最高法院作出裁决，布赞卡因私与夫人乘坐公务车，被判六个月监禁，即日起在狱中服刑。人家的司法很公正，你付了费了，减刑七个月，但公车私用就犯法，还得判半年。香港 16.5 万公务员，专车仅 20 余部。

中国官方吃喝招待费更是无法计算，全国政协副主席说：公款吃喝都通过做假账解决了。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在出席 2012 年全国人大会议时指出，内地官员胡乱报销接待餐饮、出差住宿等费用，几乎是无法管制。他称单是公费报销的酒量便多达 1400 吨，相当于杭州西湖的容量。调查显示，某些地市级干部每年职务消费在 40 万元以上，经济发达的地市则要 100 万元以上。山西省临汾市纪委书记沈庆华，在临汾宾馆“贵宾楼东楼”包住总统套房三年，仅房费一项就消耗民脂民膏 400 余万元。2011 年国税总局公务接待费，全年吃了 6.6 亿元，平均每天 182 万元！中国人寿 2012 年全年业务招待费为 14.18 亿元。党干们吃、喝、嫖、赌、贪、全部公款报销，不用自己掏一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多少下岗职工就着一杯白水吃顿饭，多少农民为筹集学生的学费愁白了头！党国的公仆们却在那里狂掷千金、万金，日日笙歌，夜夜歌舞，花天酒地，醉生梦死！

被中共妖魔化了几十年的资本主义国家却是另一番景象：2010 年韩国外相因为自己的女儿被招工到自己工作的部门，而引起国民不满辞职；日本外相因接受政治献金，类似于接受贿赂，只有区区 5 万日元，相当于人民币仅仅 3900 元，便被迫辞职。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自任职以来，基本一日两餐自备盒饭，一年能吃上 700 个盒饭。

“三公”之外还有另一公，即公款私藏。各级党政机关的小金库是一个巨大的黑洞。中央党校的周天勇教授保守估计，2007 年至少 4 万多亿元的预算外收入实际上成了各级政府的“小金库”，这些纳税人的血汗钱被各部门的首长任意支配，大肆挥霍，为所欲为。

工程建设腐败严重。中国高铁建设至 2020 年将达 1.6 万公里，总投资达 1.8 万亿人民币，称之“1 亿 1 公里”十分贴切，“1 公里腐败 1 千万”亦属正常。丁书苗为猎取铁路建设项目中介费 8 亿元，为刘志军介绍了多名年轻女子与之发生关系，其中包括由她投资拍摄的《新红楼梦》剧组全部女演员，不仅 12 钗一个不漏，而且连漂亮点的丫鬟仆妇和电视剧剧组女职员，全部“逐一幸过”。睡几个明星容易，但要将一个剧组全日光，堪称前无古人！国务院发改委 2013 年两会后传出下达超过温家宝 4 万亿一倍的“8 万亿投资救市”计划，与其说振兴经济，不如说再培养无数个刘志军吧。刘志军是第一个“完全公开财产”的中央委员，他非法获得 6460 万元人民币，拥有 374 套房子，价值超过 8 亿元，而厦门被指控纵火至少烧死 47 人的上访户陈水总一家 10 口住 28 平方米的危房——与其让刘志军们贪死，也不给陈水总一个活路，这样挥霍“8 万亿”，究竟追求的是饮鸩止渴，还是暴病而亡？

腐败的天价采购在政府采购中普遍存在，回扣率少于 12% 几乎不会成交。2009 年的政府采购规模为 7400 亿，其价格水平超过市场均价 37%。据测算：2011 年度全国政府采购规模将达到 1.2 万亿，其中腐败规模至少有 1400 亿。全国的城市和农村信用社系统约有两万亿的资金被权贵导入民间高利贷市场，其中以佣金表现的腐败规模已经突破 3 千亿。

以“大三公”来算：从 2007 年初到 2010 年底，每人每年大约被“大三公”剥夺的利益在 5 千元人民币，中国官员获得腐败利益总额就高达 6.5 万亿。

王小鲁指出：中国社会每年有高达 9.26 万亿的巨额隐性收入为官僚占有，其额度竟已占了中国 GDP 的 30%！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说：中国的腐败租金总额达到国民财富的 30%，世界上很少有国家达到这么高的水平。一项最新的调查显示，2011 年中国的灰色收入达 6.2 万亿元（实际数远远高于此数），约占 GDP 的 12%。灰色收入是指正式工资、津贴以外的一些透明度不高，介于合法收入和非法收入之间的收入。它往往是权力腐败的结果。

中国官府征的税高达 GDP40%，是中国打工者收入占 GDP 的 8% 的 5 倍。也就是说：中国的 GDP 蛋糕，官府拿走 40%，官僚贪污 30%，老板拿走 20%，工人拿走 8%，余下的 2% 为农民等群体拿走。像这种悬殊的收入比例，即使 GDP 增长，对于老百姓来说也没有什么价值！

政府和极少数人占有了绝大部分社会财富，广大民众占有的财富少得可怜。即便如此，中国官府还通过财税体系把穷人的钱送给富人。本应提供给普通消费水平的老年人的养老地产，被中共地方政府和保险企业合谋低价圈地、拿补贴，享受多重优惠后再将养老地产推向高端化，建设高端养老社区。入住的老年人都是中共各部委退休干部以及著名演员。

中国老百姓缴的税率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福利待遇极高的法国，在法国等税收重的国家是富人收的税太重了，而中国是穷人收的税太重罢了。而中国老百姓享受的福利才占税收的 8%，而美国是 42%。美国的财政收入年均增长率远低于中国的 19.5%，但美国政府给人民的福利却是中国政府给人民福利的五倍还多。日韩、欧美的行政开支只占税收支出的 1% 至 2%，中国却高达 46%，也就是说中国政府从纳税人身上收一百元钱的税，就被政府的行政开支用掉了 46 元，而欧美、日韩政府只花一两元钱。你看惊不惊人。

在国家开发银行工作的陆德，用 2004 年人口普查后“相对较准的数字”，揭露“三公”经费（即“吃喝玩乐费”公款吃喝 3700 亿、公款用车 4083 亿、公款外出旅游 3000 亿）的数字

为 11000 多亿，占整个财政的 37%（2004 年数字）。若加上官员们公款境外赌资上万亿元，占当年财政收入的 67%！无论是绝对数还是相对数，“三公”数字都在逐年增长中；而美国的“三公”却只有 9%，加拿大是 7.1%，法国是 6.5%，韩国是 5.06%，英国是 4.19%，日本是 2.28%。中国这方面的支出是多少？同志们，37%，是美国的 4 倍。为什么？没有监督，没有制衡，这种现象再发展下去怎么办？”他大声质问：“这难道是共产党——工人、农民的党干的事？”陆德是老资格的中宣部长陆定一的儿子，出生时瘦弱难养，是朱德总司令将自己那份牛奶省给他吃，才活了下来，为感谢朱老总其父给他取名陆德。

这样的“官二代”把腐败性“三公消费”归结为“严重的封建残余”，仍是在为体制开脱。共党体制自建立伊始就没有“先进性”可言，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都无可避免地出现“国家官僚制”病症。“旧社会残余说”把责任推给了别人，其发明者是布哈林，意指先进的苏联不是官僚体制，诸多官场恶习乃旧社会遗留，其表现为官僚主义而非体制，以后会加以克服会越来越来好；多数共产党人本质也是好的，个别党员腐败是受资产阶级侵蚀，经教育可以恢复其“纯洁性”。据此毛泽东在开国之初也提出“糖衣炮弹说”，重复布哈林的论调，说共产党人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人”，个别人腐败是被阶级敌人的“糖衣炮弹”击中，所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好吃懒做等都是旧社会的遗留，属于剥削阶级。这类自欺欺人的说教现今是不值一驳，既然是旧社会剥削阶级“遗留”，那么建国都 60 多年了，随着时间的推移，“遗留”本当越来越少，为什么反而越来越多了呢？可见绝非什么“遗留”。

2011 年的公车消费为 9865 亿，公款吃喝为 8963 亿，公费出国旅游为 8800 亿，举办各类活动招待贵客为 8900 亿，“三公”总计 36528 亿。凤凰卫视的杨锦麟主持的电视节目《天天读》第十期透露，2012 年中国三公消费高达 3.9 万亿。央视说美国总统大选花了 60 亿美元，但没说美国 3 亿人口平均每人 20 美元，人家是四年选一次，20 除以 4 是 5 美元，也就是说，每个美国人平均每年花 5 美元来选总统。而 2012 年中国官员的三公消费 3.9 万亿，除以 13 亿是 3000 元，就是说每个中国人每年被收缴 3000 元供官员吃喝玩乐！

江泽民、李鹏等离休高干 11 人一年开销 10 亿元，平均每个高官 1 亿

目前中共中央委员以上离休高干，每年公款开销就高达 1000 亿人民币。2012 年江在上海住了 150 天，住宿、交通等开支由上海市政府列作行政开支外，仅宴请签单 237 万 7000 元，相当于上海市职工年收入中位数 7 万元的 33.5 倍，平均每天公费宴请一万五。这种“签单权”，在公私一笔糊涂账的制度下，哪个“笼子”敢管他，哪个“笼子”管得住他？

最高级离休官员，包括江泽民、李鹏等 11 人，享受至高无上的特权待遇，包括各地行宫、专机、专列、高级轿车、专家医疗组等。每年耗费公款 10 亿元，平均每人近 1 亿元！

以江为首的 12 人中共最高一级离休领导人，他们拥有北京共军总医院 3 组医疗专家、上海华东医院 2 组医疗专家、广州军区总医院 1 组医疗专家，随时待命；还可随意享用两架国航和两架军用专机，3 列有 7 节车厢的专列。专列所经沿线，都有武装保护，所有快慢旅客列车，都要停站让行。即使是同方向行驶的特快列车，也必须停下，让专列超越而过。另外，他们在全国各地都有自己的多处行宫。仅江泽民一人最少有 5 处，分别是：北京钓鱼台国宾馆、玉泉山中央军委招待所 5 号楼、上海西郊宾馆、大公馆、苏州太湖等等。李锐曾披露：江泽民效仿邓小平在上海建了一个非常豪华的别墅，该豪宅被列为高度保密的“上海一号工程”。此外，上海当局还在瑞金宾馆以及浦东地区，为江泽民修建了别墅。灵通人士表示，

江泽民退休后，每年有一半时间呆在上海，这些养老豪宅和别墅，成为江泽民在上海的“地下中南海”。其它人也不例外，如李鹏在北京、青岛、成都；宋平在北京、上海；尉健行在北京、珠海；李岚清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地都有行宫。

其他 105 名政治局委员、副总理等一级的离休高官，享受的待遇包括：每人都配备两名警卫、一名司机、两名工作人员、一名厨师、一名保健医生；两辆汽车；乘飞机，包头等舱或公务舱 6-8 个座位；乘火车，包一节软卧或加一节专门车厢。

报导披露，2004 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大委员长、国家副主席、中顾委副主任一级的离休高干，公费开支高达 3 亿 2600 万元，平均每人 2725 万元；政治局委员、人大副委员长、副总理、国务委员、中顾委常委、中央军委委员一级离休高干 105 人，公费开支 6 亿 7100 万元，平均每人花费近 640 万元。

美国赡养 4 位前总统年支出 370 万美元。2012 年美国政府在依旧健在的 4 名前总统身上花费了 370 万美元，包括总统退休金、补贴、办公室工作人员福利，以及旅游、邮费等其他费用。此外，前总统遗孀享有每年 2 万元的退休金，但前总统里根的妻子南茜去年放弃领取退休金，只接受了一年 14000 元的邮资补贴。

2010 年 6 月 24 日上午，美国总统奥巴马与到访的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举行会谈，敲定：美国将向俄国出口总价值 40 亿美元。当天，奥巴马邀请俄总统去一家汉堡店就餐，花了大约 10 美元左右。中共媒体嘲笑这两大国总统太节俭。对于中共来说，越奢华越有面子，越挥霍国库越表明有权力；而民选政府却恰恰相反。

2011 年 8 月 14 日，美国新任驻中大使骆家辉上任抵达北京。没有随从，没有警卫，全家 5 口，乘坐普通客机。美国大使馆方面没有安排欢迎场面，骆家辉一行 5 人全都自扛行李，肩背手提，乘大巴前往大使馆履新。中国哪怕是一个“七品芝麻官”，诸如县长、镇长、乡长之类，出行也都要摆个大阵仗，前呼后拥，大摇大摆，出尽风头，穷尽“人模人样”。

2011 年 8 月 18 日，正在中国访问的美国副总统拜登，上街吃炸酱面，一行 5 人，只花了 79 元人民币。每人平均花了 16 元。顿时引发中国人热议，贵为一个大国的副元首，竟如此节俭！美国导演理查德·安德森却说：“他花我们的钱，他还想怎么样？”

德国政府官员没有三公消费，还不能随便吓唬老百姓，民众见到官员没必要害怕，反而是官员要拍老百姓的马屁。如果这届政府干得不好或者你无缘无故不喜欢，可以投票给另外一个政党。甚至如果你有雄心壮志，也可以自己去参加竞选。当然，如果没有政党支持，选上的概率几乎为零。但不管怎样，你总是可以去尝试的，不会担心有人请你喝茶。

德国的空气质量很好、环境很干净、自来水可以直接饮用、奶粉无毒、食品水果无农药残留、交通便利准时、人与人之间诚信礼貌相待、医疗和教育（从小学到大学）免费、退休后有钱花、而且还死得起。在这个国家：没有发改委，所以企业不必为了上项目而讨好政府；没有城管，所以小贩上街摆摊不必提心吊胆；没有专门的工商局，所以不必劳神应付什么执法检查；警察不能无缘无故到企业转悠。至于吃拿卡要，行贿受贿，想都别想，一旦发现，不仅丢官，而且等着进班房。因此，对于德国企业而言，政府的任务是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鼓励市场竞争、规范市场秩序。德国女总理默克尔几次访华，低调、朴素、谦和，不进 VIP

包间，不住总统套房，吃自助早餐。曾经在南京不小心把面包掉在地上，就捡回盘中，谢绝工作人员的服务。据了解，德国公务消费奉行“零容忍原则”，任何铺张浪费都不可容忍，都可视为腐败，总理也不例外。可是在南京，这一切都是慷慨无私的招待，她完全可以心安理得尽情享用，她却节俭如常。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因为到西班牙公干，让其夫人顺便搭乘了政府的公务飞机。这下可让媒体揪住了，媒体质疑，你的夫人又不是政府的高级公务人员，怎么可以这样假公济私占公家便宜呢。没办法，强硬的施罗德只好乖乖地补交了夫人搭飞机的机票钱，说来也不多，不过是 3700 欧元，这总理当成这样。德国前经济部部长莫勒曼犯的错，只不过用了政府的公务信笺为其做建材生意的小舅子写了封推荐信，这件事不知怎么被媒体知道了，媒体纷纷以此作为他以权谋私（以权力干预了商业）的证明，甚至还说用了政府的信笺，就是贪公家的便宜，一定要他下台，结果他只好被迫辞职收场。

23. 中国梦的实质——权贵吃人梦

“中国梦”的本质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那就是要永远维护中共权贵的既得利益！即永远维护和坚持中共“一党独裁”，“一党专政”！！

严家伟说：“中国梦”不过是权贵的发财梦罢了。哪有百姓的份？！美国彭博新闻社 2012 年 12 月 26 号披露，中共八大元老后代控制整个中国经济命脉，聚敛巨额财富。中共八大元老是指：邓小平、王震、陈云、李先念、彭真、宋任穷、杨尚昆和薄一波。报导说，八大元老的子女们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利用父辈们手中的权力大量聚敛私人财富。王震的儿子王军、邓小平的女婿贺平、陈云的儿子陈元，仅这三人就掌控着 1.6 万亿美元的国有资产，超过中国年经济产出的 1/5 以上；在八大元老的儿子辈中，至少有 26 人在大型国有企业担任高级职务，他们操纵着整个中国经济；在 31 名“红三代”中，至少 11 人经营自己的企业或是占据企业高管职位，多数是在金融和技术领域。

《外参》2010 年 9 月报道：中共高层十大权贵家族：

第一家当数温家宝家族，100 亿元人民币。若再加上温家宝弟弟温家宝数十亿的资产，温氏家族资产约在 300 亿人民币左右。《纽约时报》爆温家宝家族坐拥 27 亿美元财富。总理夫人张培莉在“国际珠宝展”上一出手就花费两百多万人民币购买私人首饰。在场的台湾珠宝协会理事长余忠达说“温总理夫人手上戴的一款戒指至少要值 200 万人民币以上”。

第二家族荣毅仁家族。荣智健，中信泰富主席，荣毅仁之子，公司市值 476 亿元，个人资产在 120 亿元。他在香港住豪宅、驾名牌车、赛马一注百万，其生活之奢侈，西方世界的王公贵族都望尘莫及。

第三家族是曾庆红家族。曾氏家族资产约在 120 亿左右。山东最大型国有企业鲁能集团 1100 亿的财产被曾伟以 37.3 亿元买下。曾庆红之子曾伟斥资 2.5 亿元买悉尼第一豪宅。

山东最大型国有企业鲁能集团在“转制”中悄然易主，两家名不见经传的北京私人企业竟以 37.3 亿的收购价，获得总资产 738.05 亿的鲁能集团 91.6% 的股份，导致 700 多亿国有资产的流失。700 多亿被曾庆红、俞正声、王乐泉三家分净。

曾庆红名下有四幢别墅：江西南昌，北京西山，上海青浦，广东珠海各一幢。曾庆红任职期间收受名人、部门赠送的字画 47 幅，包括齐白石、徐悲鸿、傅抱石等名家。曾庆红退休后，在江西南昌居住，和省委党校办公室一名女青年关系不正常，被告到中央政治局。曾庆红退休后，亲自为家属、亲属在上海、浙江、江西、湖南、湖北等省市党政国家机关部门安排职务，户籍转到大城市的人数达四十多人。有的在省农林部门任副厅长，有的在武汉市任保密局副局长，有的在上海市委办公厅任处长等职务。

第四家族李鹏家族，其资产约在 100 亿左右。李鹏是中国当代的和坤，李鹏家族贪污的总数，少说也在 6000 亿以上。李鹏凭着自己的权力和冲天的色胆把中央电视台的老婆娘邢质斌给睡了。李鹏的亲信高严逃亡境外造成了原国电公司国有资产流失 45 亿元。李小鹏的华能电力公司市值 1600 亿元。李小琳的中国电力集团总资产近 14 万亿。2012 年 3 月，引人注目的李小琳出席全国的两会，脖子上一根项链就上千万元。李小琳自己穿了价值几万块名牌的衣服，居然说要给老百姓建立道德档案，要大家过勤俭节约地生活——这不是荒唐嘛！李小琳是国际大保险公司的秘密捐客，1995 年因为她牵线搭桥，有一批巨款 1690 万美元被打进她设在巴哈马群岛的瑞信帐户作为回报。

第五家族王震家族，其家族目前资产约在 100 亿元左右。王军，中国中信集团董事长，王震之子，公司市值 7014 亿元。

第六家族周永康家族，家族资产约在 80 亿元左右。

周永康之子周斌敛财至少 200 亿，周斌在北京就拥有 18 处房地产，包括东郊北郊西郊的宫殿式建筑，其中一处不装修的价值就 2 亿人民币。他在香港、巴黎、上海、无锡等地均有房产，而且在瑞士、美国、香港均有存款。周斌受贿 2 千万后，让涉嫌杀人且开膛剖心的甘肃黑帮头目得以出狱。最高法院的案件也任其摆布，一名警察用热水烫死疑犯，但周斌拿到 1 亿元好处费后成功摆平此事。周斌将拥有固定资产 17.28 亿元的四川古蔺县郎酒厂蓄意搞垮，然后低价评估贱卖，变相掠夺为己有。周斌在原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的帮助下，利用拥有部份五粮液和国窖白酒股份的四川信托，用 2 亿元“投资”就窃取了 70 亿的国有资产。周斌在美国生活 8 年，其妻王婉比他更早定居美国，全家人都入了美国籍。

周永康曾在石油部门任职 38 年，周家父子被指把中国“两桶油（中石化、中石油）”当作自家的摇钱树。中国石油四川石化 1 千万吨/年炼油与 80 万吨/年乙烯炼化一体化项目是由惠生工程（中国）有限公司承建，2009 年 8 月开工。消息称，惠生工程正是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之子周斌的公司。国资委主任、中石油董事长蒋洁敏向“石油帮”帮主周永康家族输送庞大利益，金额高达 100 亿美元。蒋洁敏交代辽河油田 3000 亿的石油储备以 1000 万元贱卖给周永康之子周斌，周家第一年就获利 17 亿；到第三年，一共赚取了 40 亿。云南 3 千亿的兰坪铅锌矿，以 10 亿的低价卖给了四川富豪刘汉，刘汉与祖籍江苏的周永康相关。

周家的另一个金库在四川，是由李春城与周永康的另一个秘书郭永祥联手。两大金库将周氏变成了中国真正的首富家族。李春城贪污贿赂赃款高达十亿。

第七家族江泽民家族，家族资产估计在 70 亿左右。江泽民的情人黄丽满陈至立李瑞英宋祖英。宋祖英曾是曾庆红的情妇。2007 年的中国证券市场有史以来第一大案：金额高达 1.2 万亿人民币的“招沽权证案”（招商银行认沽权证），直接将江泽民之子江绵恒、江之外甥吴

志明，以及中共高层贾庆林、黄菊等卷入其中。此案使得约 50 多万大陆股民倾家荡产、血本无归，直接损失 228 亿元人民币，间接损失 500 多亿元人民币。党政机关内的硕鼠们利用职务之便肆意窃取股民的财富，把股市变成了权贵集团的提款机。

第八家族朱镕基家族。其子女资产加起来，约在 50 亿左右。朱镕基之女朱燕来——中国银行（香港）发展规划部总经理，公司市值 1644 亿元。朱镕基之子朱云来 2007 年年收入为 1.2 亿元人民币——1700 万美元。

第九家族吴官正家族，资产约在 50 亿左右。

第十家族李瑞环家族，资产约在 40 亿左右。

2011 年 11 月，广东省长黄华华深涉经济腐败问题被汪洋抓住把柄被迫辞职。2013 年 1 月下旬原广东省省长黄华华曾向王岐山递交一封致中共中央政治局、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中纪委的信件及附件，长达 4 万多字，举报中共高层在广东贪腐情况。至 2011 年底，曾培炎、唐家璇、肖扬、李长春、贺国强、刘淇、张德江、张高丽、李建国、杜青林、李鸿忠、朱明国、李斌、刘伟、吴志明、周小川、蔡武、陈雷等在广东持有多处别墅、豪宅。2003 年至 2011 年，每年退离休党政、国家副总理、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一级领导人及家属和退离休省部一级领导人及家属到广东休假、避寒的有 7500 多人次，接待开支 35 亿多。此外，“退离休党政、国家领导人曾庆红、李长春等高官亲属在广东设立 3270 多家公司，操控百分之 70% 的地产、基建工程项目，操控 60% 金融、证券业。”他还指：“在广东省发迹并拥有十亿元以上资产的党政、国家干部家属有 6000-6200 名以上。”

官员是权力的主人，企业家是权力的仆人；官员自己不生钱，企业家是他们的钱袋子。徐明拥有巨额的财富，只是因为他是一个“保姆”，他是薄熙来家日常生活的服务员和买单人，尤其是薄瓜瓜的大管家。薄瓜瓜需要零花钱，徐明给钱，薄瓜瓜想去非洲玩，徐明出机票，薄瓜瓜请同学来中国，徐明安排，薄瓜瓜想买一个玩具，也是徐明买单。一面是强势的富豪，一面是卑微的仆人，甚至在法庭上被薄熙来公开羞辱，徐明也唯唯诺诺，不敢当面顶撞。这种鲜明的反差和可悲的对比，正是中国式的权贵资本主义的主奴的写实照。

中共在中国推行比西方原始资本主义还要残酷的流氓资本主义。2001 年江泽民推出“三个代表”，公开容许资本家入党后，中共统治集团迅速和劳工阶层划清了界限，因此，现在当权的中共和“无产阶级先锋队”没有任何关系，它甚至不能代表它自己的基层党员，因为这个党的领导层已经不来自普通党员，而来自早已资产阶级化了的党官僚集团（子女家人及其关系网）——即所谓的“500 个家庭”及其亲友和附庸。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的报告表明：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五大领域中担任主要职务的，有 85-90% 是高干子女，实际上已形成了官僚资产阶级。至 2006 年 3 月底，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 5 千万以上的有 27310 人；超过 1 亿元以上的有 3220 人，其中 2932 人是即超过 91% 是高干子女，他们拥有资产 20450 余亿元；也就是说：3000 名高干子弟拥有的资产达 2 万亿元人民币，平均每人 6.7 亿元。推行“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中共，实行了瓜分国有资产的政策后，500 个“太子党”家属拥有了全国资产的 70%，使中国的恩格尔系数达 0.61，他们富可敌国，是民众苦难的根源。

在当今中国，数以万亿计的国有资产，960 万平方公里国土，都是官有制下的囊中物，想拿

的话，探囊取物即可。“打下来的天下，自然由我们来坐天下，这天下的财产不传给子孙又传给谁？”所以当今中国亿万富豪中 90%以上是高干子女，也就不足为奇了！

权贵资产阶级——8000 万党员中掌权的仅约 2000 万左右的官僚集团。官僚集团中的 99%以上属于贪官淫吏，他们组成了利益联盟，维护他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位在中国居住了 20 多年的美国官员，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那么大约 500 个特权家庭的问题。这 500 个家庭，加上他们的亲友及身边工作人员，构成了约 5000 人的核心体系。他们垄断了政权、形成利益集团，竭力维护现状，反对任何改革，特别反对政治改革。十几亿中国人都已经沦为这个小集团的人质。权贵们制造了“一旦民主，就会天下大乱”的谎言，还说：如果中共垮台了，就会“千百万人头落地！”中国人民已经不再相信他们了，因为台湾已经给我们作出了最好的典范，周边国家的“颜色革命”也给我们树立了范例，他们的政权和平更替，不但没有“人头落地”，甚至没有人坐牢。

24.中共高官早已就抛弃了中共

中共政府把每年财政收入的 60%以上用来供养这群吃财政饭的公务员们，但这并不能满足他们的贪欲。黑色的、灰色的收入 10 倍、100 倍于他们的实际收入，他们还要千方百计的把国民财产转换成他们的私人财产，然后再转移到国外去。据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的一个专题调查，百姓辛辛苦苦创造的 GDP 的 1/3，都被中共贪官偷偷转移到海外。

“裸官”指称那些配偶、子女均不在国内的公职人员，尤其是那些高级公职人员。据报道：我国有 118 万“裸官”。也就是平均每个省有 3 万多名“裸官”，如按全国 2000 多个市县算，每个市县也有 50 多人。一些专家将“裸官”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到国外留学，把配偶和子女都带到国外，最后自己学业有成回国又被提拔做了官，但配偶和子女仍留在国外的；第二类是自己在做官的时候，配偶和子女在国外深造、工作或定居；第三类是指贪腐官员先把自己的配偶子女送到海外，再把贪腐的财产一点一点转移出去。但是从以上各种“裸官”构成来看，“裸官”不可能一心一意的为中国人谋利益。

裸官犯罪路径一般呈现“三步走”模式，首先是“亲属先行”，让子女、配偶、情人移居海外，自己“留守”国内，第二步是转移资金，最后择机外逃。“裸官”们把配偶子女秘密送到国外，自己则在国内工作，不断地把钱输送到境外。

在俄罗斯的斯诺登 2013 年 10 月 20 日公布：中国官员在国外存款达 4.8 万亿美元，约为 30 万亿人民币。主要分布在美国、加拿大、澳洲、欧洲和南亚。按现金持有占总资产（现金/房产/股份/基金/收藏证券等）的 1/3 算，贪官们的海外资产达 100 万亿。中国搞全民免费医保每年需要 1600 亿，贪官们的海外资产可以搞中国全民免费医保 625 年！

“裸官”们卷走了多少公款？据有关方面披露，中国外逃官员数量约为 4000 人，携走资金近 4000 亿元人民币，算起来人均席卷约 1 亿元赃款。这 118 万“裸官”，到底有多少退化或成贪官，卷走多少财富，无可统计，但绝对是惊天数字。

历届中共上海市委、市府的主要负责人，欺骗人民，炒卖土地，疯狂掠夺人民财产。将 350 万市民从中心城区赶到郊区，但领导人的家庭一个个搬到海外。1990 年代初黄菊的女儿急

嫁美国，黄菊死后，遗孀也去美国养老了。徐匡迪的俩个女儿到美国当博士加入美籍，陈良宇的儿子在美国办公司，江泽民的孙子留在美国。新老局级以上干部 80%都在海外建立家庭。而共军总参情报部原部长姬胜德，更以假离婚名义，将妻子先行移民美国。如此位高权重、国家安危系于一身之人尚且如此，那些基层的官员岂不有样学样？2006 年 6 月，涉案金额高达亿元的周金伙，在被中纪委“双规”前逃往境外。周金伙之妻早已移居美国，并有美国绿卡；为其生育一子的情妇也早已移居香港，一家人及情妇现在都在境外享福了。2008 年 10 月 22 日，上海市卢湾区副区长忻伟明随团在法国巴黎考察时“失踪”。

人口不足 600 万的海南省，更是外逃贪官重灾区。在海南，常听到各种讥讽官僚腐败的顺口溜，其中有一段流传很广，内容是：“中国有个海南岛，六个厅长往外跑；三个市长坐大牢，两个处长卖情报”。陕西省在 2006 年的一年之中，竟然有近 9000 共党狗官们卷款外逃。就连江西这样的穷省，也有 3、4 千狗官们携款外逃。把最多和最少的两个数字加起来除以 2，那就是 6000 多。全大陆地区的 30 个省、区、直辖市，仅 2006 年一年，就有 20 万的共党狗官们卷款外逃。截止到 2006 年，共党狗官们贪污抢劫的脏款是 14.2 万亿人民币。

改革以来，“中国每天有一亿美金流入美国，也就是说每个月有 30 个亿的美金，一年有 300 多个亿的美金流入美国。”这里说的还仅仅只是流入美国一个国家的数额。那么，流入英国、德国、法国、澳大利亚、日本……，没有人敢算。据 1995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份期刊的报道和 2000 年北京大学的一份研究报告，从 1978 年到 1994 年，从中国大陆流失到海外的财富达 2400 亿美元；从 1997 年到 1999 年，从中国大陆流失到海外的财富将近 1000 亿美元。二者相加，达 3400 亿美元。相当于 3 万亿人民币。这些钱绝大部分是被各级官僚和太子党转移到海外去了，他们用这笔钱在海外办了实体，购置了豪华别墅、汽车、游艇及房地产。这些钱可以为中国建 300 个第一汽车制造厂；可以建 300 座城市；可以建 3000 所大学，相当于目前美国大学的总数；可以用它建 30 万公里铁路，相当于目前美国铁路的总里程数……1996～2003 年外逃资金流入境外中共干部及其家属账户 2.2 万亿人民币。

2002 年朱镕基总理说：国有资产资金外流“势头迅猛，触目惊心，举世无双”。1980 年代，国有资产每年流失 500 亿，1990 年代以来，每年至少流失 800-1000 亿，2000 年资金外流 5500 亿人民币，2001 年 6000 亿元人民币，占国民生产总价 62%。扣除这些外流资金之后，中国 GNP 年增长率只有 1%。至今已有达 3 千亿美元被侵吞、挪用、外流……腐败案件案发率一直居高不下，2001 年后，年案发量均在 4 万件以上；100 万元以上的案件也从 1993 年的 57 件持续上升到 2000 年的 1335 件，2001 年后则在每年 1300 件左右波动。

2000 年中国吸收的外资有 407 亿美元，但贪官外逃资金却达到 480 亿美元，也就是说，中国出逃的资金在 2000 年就超过了外国所有对华投资。仅 2004 年，就有硕鼠搬家、携家眷外逃贪官 2035 人，卷资 500 亿美元，一天以 1.5 亿美元的速度流出，超过当年外商在华投资总额。每年外逃资金高达 500 亿美元，也就是 4000 亿人民币，中国 2000 年的国民收入总额不过 1 万亿人民币，也就是说，40%的国民收入都被卷到国外了。有人提起清政府割地赔款恨得咬牙切齿。但当时才赔了多少银子，那才多少钱？共党腐败的比清政府更严重，中共国的贪官们每年从国库就盗走了这些银子带到国外。截至 2005 年底，仅海外高干亲属经营的中国进出口贸易每年就达 1000 多亿美元，拥有财产 6000 亿美元以上。

2012 年全年仅从北京机场海关出逃的处级以上官员已达 354 人，合计共携带走逾 3000 亿元人民币。仅 2012 年中秋节和十一期间出境的公职人员有 1100 多人没有按时返回，其中 714

人确定为外逃。2012 年最后两个月外流的款项超过 238 亿美元。据中纪委估算，2012 年的非法资金外流将突破 1 万亿美元；2013 年资金外逃将达 15000 亿美元。而容易接触大笔金钱的金融行业成了“裸官”重灾区。截至 2013 年 6 月底，仅流入韩国的中国热钱总数超过 20 万亿韩元（约合 180 亿美元），占韩国去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1.7%。这些热钱主要投资在证券市场（股票和债券）和房地产等方面。每年偷漏税损失 1100 亿以上，国有企业的呆死账及银行不良资产至少在 12000 亿以上。经济学家茅于軾预计，由于堆积如山的坏账以及巨大的房地产泡沫，中国将在未来一至三年内面临一场“不可避免的”金融危机。

从 2000 年到 2009 年，中国非法转移出境的金钱高达 2.7 万亿美元，是墨西哥移转资金的 5 倍之多。这其中包括中国的贪腐官员、国营企业主管等，这些钱落脚地点的首选是美国，又以洛杉矶为最大站。美国加州警方称，中国反贪局和公安部已向美方列出了 1000 多个外逃贪官，要求协查。在这 1000 多个外逃贪官中，100%是以权谋私，大部分住在洛杉矶和纽约。由于贪官妻子儿女情妇移民境外成风，还形成了北美太平洋西海岸卓有特色的洛杉矶“二奶村”、温哥华“大奶屯”。这两个地方的女人们有一个共同特点：豪宅、名车、没男人。洛杉矶的“二奶村”以妙龄美妇为主，温哥华的“大奶屯”则以中年怨妇为主。

这些逃美贪官的手法，大都是投资空壳公司、开设地下钱庄、以个人名义在美国注册公司、然后用中国国有资金在美国购买物产作抵押转移巨额脏款。另外，有的以进口公司购买设备为名将巨款转至海外，然后以“美方商业欺诈”的苦肉计报销损失。还有的人先将货物发到在美的家属手中，然后以“无法追讨海外资金”的方式瞒天过海。

许多口头上拚命反美反西方的太子党，在国外都有秘密账户。维基解密说，中共高官在瑞士银行拥有多达 5000 个账户，其中，2/3 属于中央级大员，几乎所有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人人有份。目前还有 150 个名字尚未确认，疑为家眷账户。江泽民把 20 亿美元存入了瑞士银行，胡锦涛的儿子胡海峰也卷入了纳米比亚行贿案（中方承揽的该国机场港口扫描设备专案）。中共高官为了给自己留后路，搞“狡兔三窟”，几乎人人都在瑞士或其它国家银行开设账户。“裸官”一边在西方法治国家将自己的子女和财产安排好出路，一边向国民宣传西方是罪恶的；一边宣扬共产党人没有自己的利益，一边拒绝财产公示。

西方制度不适合中国人民，却非常适合中国官员——六万干部外逃，两年侵吞万亿。中共 17 大期间，给代表参阅了一份很保守的内部资料，表明 15 年外逃干部 6.1 万多人。从 1992 年至 2007 年 6 月底，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驻外机构的公派人员学习、工作期满不归，或随代表团外访、探亲、旅游逾期不返的，共有 61577 人。这里并没有包括那些已经有定居权的亲属，也不包括盗窃国库后以合法身份出境的。

从 1980 年代中期至 2003 年底的 20 年间，中共党政干部配偶、直系亲属，在境外、外国定居的人数为 120 万人，其中高干配偶子女 20 多万。120 万中共官僚及亲属子女早已移民海外的事实充分证明：中共当权者皆知中共暴政行将灭亡，故皆欲最后狠捞一把，“那怕我死后洪水滔天！据美国政府的统计显示，中共部級以上的官员（包含已退位）的儿子辈 74.5% 拥有美国绿卡或公民身份，孙子辈有美国公民身份达到 91%或以上。因此美国人说：现在的中国其实是被一群美国人的父母在领导着。显而易见，中共高官子女及后代选择当美国人，而不是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恰恰是对中国现行制度是否优劣的最佳回答。

请看中共 2012 年 3 月 31 日内部的调查报告，90%的中共 17 大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

纪委委员 90%以上，都把自己的子女亲属和财产送到西方国家去了。中共人大常委会审议出入境管理法草案时披露：已移居外国的中国公民，在取得外国国籍后大多不报告，而保留中国居民身份证，享有国内福利和退休金，估计有 800 万人。省部一级官员的直系亲属持双重国籍的超过 7 万人。中共中央委员高官 90%以上都是裸官。政协代表 76.77%、人大代表 57.47% 有外国护照，有的人手上有 10 几本护照！老百姓说，中共高官们对中国的未来没有信心，他们做好了一切准备，随时准备逃跑。中共貌似强大，实际上是非常虚弱的。

高官们的直系亲属在西方居住、工作、持居留权、已加入当地国国籍等状况如下：

职称人数在北美亲属数在欧洲亲属数在其他国家亲属数

中央委员 204 人 247 人 6 人 96 人

候补委员 167 人 122 人 361 人 108 人

中纪委委员 127 人 202 人 276 人 104 人

必须剥掉共产党的画皮，揭掉共产党的伪装：中共自称“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完全是一派谎言！事实上：中共不是中国人民的“代表”，而是中国人民的死敌！它以占有、牺牲人民生命财产来达到其永远垄断政权的目的！

25. 外交部长的家人在美圆中国梦

曾以一句“中国人权比美国好 5 倍”而轰动一时的中共前外交部长李肇星，就中国经济现状日前又爆出新雷语：“有人说中国是世界第二，谁信？只有傻帽才信！”

中共前外交部长李肇星 2013 年 9 月 12 日在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主办的清华紫荆大讲堂作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演讲和互动活动。《羊城晚报》报导，李肇星在演讲中谈到中国精英人士移民问题时说，他在美国见到一个从大陆转过去读书的中国小孩，问他在两个地方上学有什么不一样。小孩说他喜欢美国的小学，因为同学看到他，会帮他推车、搀扶他，但在国内，同学见到他就喊：“瘸子来了，瘸子来了。”在谈及当前中国大陆在世界中所处地位时，李肇星说，“现在有人说中国是世界第二了，和美国并称 G2。谁信？只有傻帽才信！”

李肇星所说的中国（GDP）“世界第二”的说法，却是自 2010 年后在中共官媒经济报导中不可或缺并反复渲染的论点。如今，这个让中共爱不释手且拿来支撑其执政合法性的“帽子”，却被中共前高官李肇星讥讽为“傻帽才信”的“假大空”。许多网友说：“其实，中国的许多人均水平在第三世界也是差的。特别是人的思想层面。”

李肇星曾以一句“中国人权比美国好 5 倍”雷语而令人嘲笑，但这个在公开场合常常讽刺美国的人被曝其子女全部在美国发展。李肇星工资是多少？他何以供养儿子到美国读书打工？其子李禾禾哈佛毕业后又经习近平夫人彭丽媛介绍，与歌唱家阎维文在加拿大留学的千金阎晶晶相识，2008 年 12 月回京成婚。李肇星子女孙子甚至包括李肇星 15 名朋友的子女都去了美利坚，他自己和老婆在大陆在继续享受优厚的待遇。虽然李肇星在公开的场合常常讽刺、批评美国，但在私下里，他最爱的是美国而不喜欢中国。李肇星的侄儿在山东青岛市依仗其

叔的地位及权势，横行乡里、欺压百姓、强占大片农田，搞所谓“开发”项目，中饱私囊，侵吞农民财产达数十亿元人民币，失地农民既不给补偿又不进行安置，生活无着落、数万“难民”背井离乡、流落街头，甚至被打死。上访多年无人过问；情况十分凄惨。

公共情妇李薇日记里对各位高官的性能力有所比较，而李肇星的能力是最差的，刚进去就出来。外交部的人解嘲说，我们李大人是外交部长，不擅长内交，情有可原。

李肇星言词粗鲁，海外媒体讥讽他为“红卫兵大使”。江泽民当政后，李肇星投到江的怀抱，从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一路被江提拔至中共外交部部长。不过，在他仕途顶峰之时突然被胡锦涛免去外交部部长职务并由杨洁篪接任。维基解密指与胡锦涛访美不顺有关。2006年胡锦涛任国家主席首次访美很不愉快，胡未获国宴招待，在白宫草坪的欢迎仪式上被法 L 功人士抗议而失态，美国司仪又把中华人民共和国误说成中华民国，宣布：“现在演奏中华民国国歌”。胡锦涛一肚怨气全算到外交部头上，导致次年外交部长李肇星突然下台。

杨洁篪的女儿杨家乐作为一个外国人，拿奖学金读耶鲁，难上加难。但这个女生就有了这样的幸运。不仅如此，她的中学也是在美国上的，上的是昂贵的私立学校——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为女儿切尔西选择的、当今白宫主人奥巴马为女儿萨莎和玛利亚选择的中学：希德威尔友谊学校(SidwellFriendsSchool)。这样的私校，一年的学杂费、食宿费与耶鲁大学相差无几，而她也是得到了全奖！加起来，她从中学到大学，得到的奖学金早已是 6 位数了。杨家乐有何出色成绩，人们并不知道，但是人们知道，她有一个好爸爸：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杨女初长成，全奖读耶鲁。这极有可能是出卖“国家机密”的结果。

维基揭秘泄露，曾出任中共外交部长 10 年、后转任国务委员、副总理的钱其琛，竟然是美国政府线人！起因是，法国军售台湾，台湾政府（时任总统为李登辉）为削减中共压力，默许从法国卖给台湾的幻影 2000 新型战机的交易中拿到了 10 亿美金的回扣从香港汇往美国，直接进入钱其琛儿子钱宁开设在芝加哥的帐户。这一巨额不明财产来源，遭到美国国税局调查。“鸟为食亡，人为财死。”为保下儿子钱宁，钱其琛不惜放下老脸，亲自出面，承诺与美国政府合作，向美方提供中共高级机密。鉴于任职中共外交系统的，多为钱其琛旧部或学生，凡事向钱请教。于是，不论钱在任、半退休或退休，都能牢牢掌握中共外交命脉。从 2001 年起，钱经常差遣手下心腹，向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密报中共内情。

26. 中国梦腐败梦共产党成了腐败的代名词

中共执政 60 多年就腐败到了要亡党的地步，气数不及国民党。透明国际 2012 年全球腐败排行榜显示，在汉语世界，中国大陆最腐败，排名 80；远甚于国民党执政的台湾（37）、尚未共管的香港（14）和澳门（46）。新加坡名列第 5，在全球最清廉之列。

中国的腐败黑数即没有被查出的腐败金额占 99%。研究表明，世界平均的贿赂额占 GDP 的 3%，就取世界的平均值吧，那么中国应查出腐败金额为 7000~8000 亿元，而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 2005 年查出的腐败金额仅为 74 亿元，约为应查出的 1%，即腐败黑数为 99%。另据测算，我国 2004 年全部的租金价值包括灰色收入为 56952 亿，占 GDP35.64%，照这样算，中国的腐败黑数就是 99.8%。可见，中国的腐败是世界第一。据统计：贪污腐败数额是 25000 亿/年，其总和超出了教育经费养老基金和医疗经费支出的总和！

中国大陆地区腐败黑数已经达到了 99%，也就是说共党团伙这支官僚队伍已经彻底烂透了。原中纪委书记吴官正在中纪委会议上说：“根据中央的考察、调研，不能说全部，也有 90% 的省市二级党委已经变质，至少有 80% 的党政一把手是不称职，不合格的。”十个指头坏了八九个，这双手还能依靠吗？还能信赖吗？这种腐朽的封建特色是决不会长久下去的。

专制的中共在世界腐败史上创造了奇迹。据估计，中国官员的年工资总额超过 7000 亿，而官员的腐败收入要比正式收入平均高出 3~5 倍，因此，中共每年腐败造成的经济损失达 25000 亿元人民币以上，按中国的贫困标准，这笔钱足可让 3000 万贫困人口脱贫 128 年！

自江泽民、胡锦涛登上最高权阶以来，腐败不但普遍化、公开化了，也合法化了。郎咸平先生说：中国公务员是天底下最无耻的群体。蔓延中国的，是全民的腐败。芦笛说，共党前 30 年教人残酷，后 30 年教人贪婪。此言不虚。民国年间的“四大家族”还没有现在的县团处级干部有钱。美国有四大自由：言论，信仰，免于恐惧和匮乏。中国有十大自由：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甘肃一县委书记东窗事发后抱怨：“反腐败只是隔墙扔砖头，砸住谁谁倒霉。”即：一院子人都在贪，砸中我，只能认倒霉；既然都在贪，为啥我不贪？傻啊？！在这些被揭露的贪腐案例中，党政第一把手都是为所欲为，不仅贪腐金额巨大惊人，而且旷日持久，贪腐行为甚至明目张胆，成群结伙。刘志军案的 300 多套房子，张曙光在美国的两千多平米别墅，中石油贪腐集团的巨额赃款，薄熙来的公然庇护老婆杀人，以及衣俊卿对局内女员工的“潜规则”，其实都不是一两个人在暗地里可以偷偷完成的。

号称山西煤炭领域反腐“第一案”的蒲县煤炭局原局长郝鹏俊，家产逾 7 亿，全国各地有高档房产 35 处。一个小小的科级官员竟然敛财 7 亿，中共着实先进。“中国当代焦裕禄”四川达县县委书记李春存款 17 亿，19 处房屋产，情妇 9 名，家属全移民法国，县中学多名女生被他强奸。浙江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原湖州市市长黄萌在 1998-2011 年间，睡了 510 个美女、拥有 84 套房产，贪腐 2 亿！广东省茂名市委书记罗荫国贪污、受贿 16 亿后的雷语：“要说我是贪官，说明官场都是贪官！你们凭什么专整我？你们有本事，真让我交代，那我能交代三天三夜甚至三个月三年，我能把茂名官场翻个底朝天！中国不就是腐败分子提拔腐败分子，腐败分子反腐败吗？像我这种级别的，谁不能供出来百十个人？这个太平常了！男人就得‘提钱进步’，女人就得‘日后提拔’；除了这，眼下谁要能当上官就不属人类，谁不服气？”浙江杭州滨江区区委书记尚国胜对买官者说：“不花钱当个小科长叫我看！真有那本事，我喊他大爷！”做过云南麻栗坡县委书记的赵仕永说，“我在县委书记这个职位上，在时下的社会环境中，不犯罪是不可能的。”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青说，“做到副省长这个位置上，基本就是牛栏关猫、天马行空了，没人敢管你了”。

原广东省委书记、深圳特区第一任市委书记、市长吴南生说：“中国这种体制，鬼都会腐败”。也就是说：共党体制是腐败之源！源于一权独大，没有对权力的扎实的监督制约。表面看我们有很多监督机构，党内有纪委，行政有监察，有审计署等等。由于是同一体制内的监督，利益相同，利益悠关，因此不可能实现有效的监督；更由于都是在中共之下，当然也就谈不上制约中共书记和纪委书记了。哪有自己监督自己的，自律在现实生活中仅仅限于道德。因此权力必须受到制约，要监督一种权力只有依靠另一种权力。以一种权力制约另一种权力，其实质就是分权，实行分权制。实施国家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的三权分离，三权分离——相互独立相互制约，各司其责，各享其权。任仲夷说：“我们现在是自己监督自己，如同用自己的左手来监督右手，是远远不够的。”“同一身体、同一体制、同一利益，谈何监督？”为什么中国反腐败会越反越腐败，腐败“前腐后继”，根子即在于此。

腐败的总根源是“一党专政”，是“权力私有”，是俄共中央书记久加诺夫所说的“三垄断”：垄断真理，垄断权力，垄断利益。在党专政、党私有、党垄断的体制下，执政党，政府机关，遂可肆无忌惮地放纵腐败；因为他们没有竞争对手（反对党）的挑战与压力，没有优胜劣汰的更新机制，也没有权力的分立与制约，没有新闻舆论的监督与批评，没有民众的抗争与表达，没有民间社团的协调与沟通。当这一切都没有了之后，大大小小的权力持有者就“大干快上”，明目张胆、有恃无恐地腐败，叫做“现在不腐败，何时腐败！”在这种体制下，腐败是合乎情理的，不腐败倒是不识时务了。在这种体制下，权力与腐败一体化了，或者说，制度本身就是腐败发臭的泥潭，寄生于这一制度的机构、人员能不腐败！

王守业在 2001 年升任海军副司令员后，用写血书的方式，劝江泽民果断解决台湾问题。以战争状态为名，中止向胡锦涛交权的程序，从而继续掌握党军最高权力。胡锦涛掌军权后，王守业因涉贪 3 亿元或 1.6 亿元于 2005 年 12 月被“双规”，后被判死缓。王守业先后花了 1200 多万元，包养了 8 个情妇，有 8 个私生子。王最后栽在包养的情妇蒋雯身上。王守业妻子曾在总后勤部设计院总承包部担任领导职位，两个女儿也已移居海外，一个儿子在美国。王守业的直接后台就是任江泽民办公室主任的贾廷安中将。王守业案涉及高级军官多人，包括少将 4 人、大校 7 人，其中 5 人已被责令退伍，6 人遭降级处分。

2012 年底被逮捕的原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贪污 200 多亿，开有三家美容院，有 300 余套房产，住 7000 多平米小楼，护工 60 余人管理房院。包养 23 名情妇，有歌星、影星、主持人等高级白领。家属已移民德国。谷在其濮阳老家的市中心，有一栋占地超过 2 公顷的“将军府”，极尽奢华。一处中国传统四合院式的建筑：“紧闭着的大门旁悬挂着巨幅山水画，另外还摆放着大象和龙的石雕。”他在寸土寸金的北京朝阳区 CBD 商务区繁华地段耗资上亿元为自己营造了一个销金窟，名曰“将军府”，占地 20 余亩，里面竟然有 3 座别墅群，铺金盖银，“白玉为堂金作马”，奢侈胜过皇家，院子里种了几棵树，每一棵树的价值都达 40 万人民币。谷俊山长期担任基建营房部部长，倒买倒卖军用土地而大发横财，把上海市中心的一块估价 2 千万元一亩的军用土地，以 20 亿元一亩的价格卖给了地方老板，差价进入了他个人的腰包。这样的事情他在全国十几个省都干过。他连出差都享用专机，享受国家领导人待遇；还把给退休干部盖的 400 栋高级住房以个人名义送给私人。

谷俊山称：“中央清楚，我们拿小钱而已，大份都是领导的。中国没有干净的官员，不贪不色你在党内就没法混。”中国军队各级贪官，窃走公款 3000 亿元。“中国的女星我都玩腻了，用钱搞定她们”——被称作谷俊山“名言”在网路上热传。谷俊山送给徐才厚一辆 12 缸的宾士轿车，里面装了 100 多公斤黄金，还奉上著名女歌星汤灿。徐把持的共军总政治部早已成了军中最大肥缺，对军中职位和军衔腐败到了公开挂牌出售的程度。陈知建是中共大将陈赓之子，是重庆警备区副司令，军衔是少将。2003 年陈知建应升为司令，但由于不肯出大价钱“买官”，于是司令一职挂到了别人头上。2011 年已年满 65 岁的陈知建希望退休时能够挂上中将军衔。然而他被告知，中将军衔不成问题，如果钱能够到位。如果连太子党陈知建都被公开地要求出钱买官，那么那些平民背景者则更是出头无路。

众所周知，中共官场腐败成风，贪腐遍地，党官们从贪污受贿、权钱交易、性贿赂、包养情妇到买官卖官和三公消费（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款旅游）等等，应有尽有。在这样一个无官不贪、官官相护和不贪不为官的国度里，中共要想根治其官员的腐败，真可谓是异想天开。中共内部被当作“老虎”来打的人，要么是派系和权力斗争的牺牲品，要么就是运气差

撞到枪口上去的。中共反贪腐有个惯例，即：大官反小官，上级反下级，正职反副职，中央反地方，反贪腐人员从反腐中变得更贪腐或成为反腐暴发户，等等。于是，反腐倡廉成了中共各级官员和派系相互蚕食和打击异己的有效政治手段。中共越反腐，权力就越集中在更少的人手里，越反腐，掌权的官员就越腐败，越反腐，政府和官员的贪腐就越难被根治。中共之所以越反越腐，就是因为中共权贵利益要确保其特权利益。以官员公布财产为例，在 1980 年代的邓小平时期中共高层就曾准备实施，然而直到现在，反对势力愈来愈大。为什么连俄罗斯和越南，政府总理下一道命令，官员财产就能公布了呢？这只能证明中共是世界上最专制独裁、最穷凶极恶、最无法无天、最贪污腐朽、最反人民的政权。

中共既然顽固坚持一党专制，腐败就是必然的。“一党专政”必然使权力腐败不可遏制，愈演愈烈。“一党专政”的权力是一种排斥制约的权力。它排斥来自党外力量的制约。在党内，中央的权力排斥来自下级组织及党员个人的制约。毛时代，毛的权力则排斥任何制约，是绝对的、无法无天的权力。这一时期绝对权力危害的特点是以权作恶！毛之后的时期，绝对权力危害的特点是“权力寻租”，权力与金钱的交易。中共任何时候都不可能真正的反贪腐。打老虎苍蝇的目的一是为了权斗，二是迫于民众压力，抓几个老虎苍蝇做做样子。以上海法官集体嫖娼为例，就如同将苍蝇暂时轰走一样，完全不像警察抓捕薛蛮子的凶狠。腐败对中华的危害更表现在对中华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全面专政、全面奴役。祖国的大好河山、丰富宝藏全部被它霸占，摧毁与掏空；十几亿的各族民众完全被他绑架、奴役与强暴。党魁以此资本为筹码与中国人要无赖；与世界人民要流氓，还在梦想永员掌权。

27. 俄罗斯抨击中共，两极分化全球第一

2013 年 8 月 1 日新华网奉命转发了王小石的博客文《中国若动荡，只会比苏联更惨》，此文为中国宪政描绘了可怖前景，不但引起众多中国网友批评，也令俄人惊愕。王小石骂俄罗斯搞宪政后很“惨”，已沦为“在经济上无关紧要的世界三流国家”，公然拿俄国当“反面典型”来“教训”国人，等同粗暴干涉俄国内政，这与中共一向自我标榜的“尊重别国人民的选择”岂不大相径庭？于是很快惹出涉外风波。俄罗斯之声官方微博在王小石文章发表后立刻回应：“中国微博：嘲笑别人裤子拉链开了，竟然忘了自己还光着腚！”

后被查出，王小石是假名，文章真正作者是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李慎明。李慎明的文章在批判俄国时，用的基本是 2000 年或之前的数据。讨论这么重大的问题，怎么可以用 13 年前的旧数据做论证，而不用最新的？俄国的民主之路才走了 20 几年，再用十多年前的资料，怎么能证明其今天的真实呢？即使文中引用的几处新“数据”，也明显有错误。例如王小石说俄罗斯的军费开支可怜到每年只有 50 亿美元，就是编造的。网上显示研究全球军费开支的权威机构是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据它的最新报告，俄罗斯 2012 年军事预算是 719 亿美元。可是到了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那里，楞是被改成“50 亿美元”，这种编造也太明显、太愚蠢、太学术流氓了点吧？

王小石还说，俄罗斯民主之后，人均寿命还不如苏共时代高，现才 58.6 岁，这也是明显的谎言。网上可查到，俄国男子的平均寿命 2012 年是 64.04 岁。文中这种误导数字比比皆是，例如说俄罗斯 2001 年外汇储备只有 200 亿美元，但却绝不提截至 2013 年 5 月的数字，俄国外汇存底已达 5184 亿美元，排全球第五，是美、法、德三国的总和。

这种编造事实，玩弄数字，文字流气，口气野蛮的人，居然能当上中国最高研究机构“社会

科学院”的副院长。仅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中国学界是多么黑暗。在当今中国，能步步登上高位的，其人品都值得质疑。这不仅在官场，学界也同样。李慎明是社科院党组副书记，曾任军头王震的秘书，原是军队少将，摇身一变，成了学界的社科院副院长。当然了，中国的人民日报社长也有军队中将（邵华泽），党不仅指挥枪，也指挥笔，指挥所有大脑；现在指挥不灵了，就加强洗脑，李慎明的文章，就是要把中国人的脑浆变成浆糊。

王小石文章强调，中国国民生产总值 GDP 有多高，俄国根本没法跟中国比。但实际情况是，俄罗斯的 GDP 有两万亿美元。中国 GDP 是俄国的四倍，但中国的人口 13.54 亿是俄国 1.48 亿的近十倍！如果按人口比例计算 GDP，中国人均 GDP 只有俄国 1/3。中国的年人均收入是 4700 美元，而俄国已达 12700 美元，是中国人均收入的一倍以上！而且中国的人均收入显然没有这样高。中国的统计数字有水分，是公开的秘密。2012 年底统计出的全球 130 个国家人均收入排名，中国排第 127 位，倒数第 3；俄罗斯排第 77 名，远在中国前面。

不仅是俄罗斯，另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抛弃共产体制的前东欧所有国家的国民年收入，在 2006 年就全部超过 5000 美元。绝大多数苏东国家的人均收入比中国的人均收入要高很多。就人均产值 GDP 而言，2008 年捷克国民人均产值是 2.1 万美元，匈牙利达到 1.55 万美元，波兰 1.38 万美元。而中国的国民人均产值只是波兰的一个零头：3300 美元。2011 年，克罗地亚的人均收入已达 14,488 美元，立陶宛 13,339 美元，拉脱维亚 12,726 美元，都已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世界银行预测，在 2020 年左右，东欧国家将全部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俄国的经济不仅走向市场化，而且在税率方面，还走到了美国前面。2001 年，俄国把个人所得税从 30%锐减至 13%（爱尔兰的税率 12.5%），企业税从 35%减至 24%。俄罗斯实行单一税率后，税收反而增加，因缴税底座扩大，逃税者也减少。看到俄国单一税率的好处，很多国家跟进，现全球有 53 国实行单一税率，其中 29 国的税率还低于俄国，而且很多是原东欧共产国家，他们深知共党专制时代百姓遭重税之苦。

中国每千人有 83 辆汽车，俄国每千人有 270 辆汽车，是中国的 3 倍以上。如果一个家庭按三口计算，那俄国人每一百个家庭差不多就有一百辆汽车，等于家家有车了。俄国的住房私有化了，军队国家化了，土地也私有化了（1.68 亿公顷农业土地全部可自由买卖，外国人也许可租用，租期 49 年），至今已有四次总统选举，两次全民公决，数十次的国会及全部 89 个地区的州长选举。俄国还实行教育免费，全民医疗保险，18 平米的住房不要钱，连日常所需的冷、热水也免费。而这些数据都是王小石的文章中回避不提的。中国人不仅根本没有这些福利，更存在巨大的社会不公！更有人称“俄罗斯的魄力岂是中国能比？从庇护斯诺登就可以知道，俄罗斯仍然有和美国平起平坐的底气，而中国只敢一边正面舔美国屁股，一面背后扎美国小人，就这德性，还有脸说俄罗斯是三流国家，可笑可怜至极”。令当局好不尴尬！今日的俄罗斯虽不像当年的“苏联老大哥”那样是中共的“太上皇”，但“习总”亲俄之态可掬则是有目共睹的。不但首访就是俄罗斯，更与俄没完没了地搞军演，而且还把俄国强占的“自古以来属于中国领土”的海参崴，作为军演基地之一。如此挟俄自重，也不怕“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王小石一心只想恐吓中国人，却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可悲、可卑的是，头脑被阉割了的王小石（李慎明）们，却在清晰地昧着良心为中国专制政权的延续而唱“俄国悲惨论”。他可以在短时间内继续蒙骗一部分中国人了。

王小石（李慎明）的文章强调，俄国军费只有 50 亿，虽然是编造的数字，但俄国军费下降，

是个事实。但这恰恰体现俄罗斯的进步。当年苏联有军队 400 万（中国现在是 230 万，美国 140 万），军费开支高达 GDP 的 3 成。现在俄国军队被削减到 100 万，俄国人把军费转移到教育上。早在 2003 年时，俄国的教育经费就超过了军费开支！

面对中国媒体贬低俄罗斯，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真理报》上说：“一个把老百姓的居住权、健康权和受教育权拿来拉动经济的政府，一定是个没有良心的政府；真正执政为民的政权，一定要把这三种东西当作阳光和空气来给予人民；因为一个国家不能变成弱肉强食的动物世界”。正当中共以为普京在讲俄罗斯的状况时，谁知他竟然含沙射影地批评中共权贵说：“人占几十套房，有的人住不起房；真要那样，执政当局就没有任何脸面赖在台上；因为民生问题，就是政治问题；就是执政者的责任。一个国家的执政文明，就表现在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上；而不是表现在富人有多富，也不表现在经济增长的数据”。

习近平访问俄罗斯后，连说了三个没想到，其实是五个没想到。

第一个没想到是俄罗斯的居民住房不收费，人均 18 平方米以下的部分无偿转给个人；18 平方米以上部分也只收很少的钱。中国城市人均住房面积 30 平米，农村 33.6 平米。但这个人均 32 平米是不真实的。据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休伦学院终身教授徐滇庆的研究，中国的数据“反映的只是有房者的平均住房面积”，中国“约 2.2 亿城镇常住人口则没有自己的住房”，实际上中国人均住房面积只有 20 平米。1991 年，俄国人均住房面积是 16.5 平方米，现已增至 22.8 平方米，超过中国的实际平均 20 平米。俄国房产不仅私有化，而且很多俄国人拥有别墅（普通人也很多在郊外有个房子），因为俄罗斯国土广阔，有 1700 万平方公里，超过中国近一倍。中国人口密度每方公里 140 人，俄国 9 人。而且俄国的城市人口比例（73.7%）接近美国（82%）；而中国城市人口官方宣称刚超过 50%。

第二个没想到是在俄罗斯用水竟然没水表，因为用于日常生存所必需的自来水、热水（一天 24 小时供应）、供暖，从来就不收费；索性连水表都省了。

第三个没想到的是俄罗斯看病竟然不花钱。俄罗斯人住院救护车免费、手术免费，床位免费，治疗免费，就连吃饭也免费，唯一不免的只有药费。在俄罗斯，医和药是分开的。类似感冒的常规病，都是医生开处方，然后到药店凭医疗保险卡号去买药，医院和药厂、药店之间没有任何关联，药价都是国家限制的基础药价，里面绝对没有药厂药店给医院的“关系维护费”，更没有给医生的回扣费、旅游费、论文发表费、嫖娼费……

更为重要的是俄罗斯的救护车也免费，所以中国人在俄罗斯得了病从不敢要救护车到主动要；而在国内的救护车可是天价，通常只有危重病人才敢叫救护车。

在中国国家支出的医疗费用的公费部分中，80%的被中国的官员们享受了。刘洪波揭秘中国官员医保高于市民 40 倍。《了望东方周刊》2006 年第 39 期的一篇文章指出：“在中国政府投入的 1122 亿元的医疗费用中，80%（约 900 亿元）是为 850 万以上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这意味着每名党政干部每年人均可享受 1 万元的公费医疗，而其余 13 亿人民大众总共能享受 2.22 亿元公费医疗服务——人均每个老百姓每年只能享受 6 分钱的公费医疗，官民差距为 17 万倍。一方面是老百姓看不起病，另一方面离退休高干却长年占据 40 多万套宾馆式高干病房，中共对高干实行的是“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治疗”，甚至可以用年轻的健康人的器官、血液来维持高干们的性命。301 医院高干病房一个老干部的医疗费用，可以超过

一个乡一个镇几万人所费，对已近植物人的高干的护理，可以不计成本。《中国经贸聚焦》2012年12月刊报道，在卫生系统内，一直设有专门的“保健委员会”或“保健办公室”，为领导干部的医疗服务。高级干部保健是一套庞大而细致的服务体系，由专职副院长和专职主任负责，定期带领专职人员进行巡视，例行系统体检。若身体指标发生任何异常，则及时召集学科专家会诊，造成对医院正常临床工作的影响。高级干部保健科室里专用的医疗设备比对外开放的质量更好，但是利用率很低。在干部享受特权的同时还出现了“夹带”现象：一人开药，全家享受，亲友沾光。多开的药品用不完，就出现一批回收药品的药贩子。而中国医院却乘机敲诈老百姓的血汗钱，无钱的危重病人只好惨死在医院门外。

在中共30多年的医疗改革中，创造了无数的人间奇迹。河南农民张海超在郑州振东耐磨公司打工其间接触到大量粉尘，2007年8月开始咳嗽，他到郑州、北京多家医院检查，都诊断为尘肺病，但职业病法定机构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鉴定张海超无病。在多次上访无果后，他到医院要求开胸检查，以此证明自己确实有病。医生劝他说，从胸片上就能判断是尘肺，再动手术没有必要，也很危险。在张海超强烈要求下，医院最终为他做了开胸验肺手术，露出了被沙尘包裹的肺部。重庆下岗工人吴远碧（53岁）身患“大肚子病”，医院诊断“布查氏综合征”，因家里拿不出5万元手术费，2011年5月8日，吴远碧趁着丈夫外出，举起菜刀划向自己的腹部，肚子里50多斤黄水流了出来……在做出挥刀自剖这一惊世举动后的第26天，她死在了重庆市中医院重症监护室。就在门户网站注销俄罗斯免费医疗新闻的网页上，还有一条新闻：河北男子无钱手术家中自己锯腿。身患“烂腿病”的保定农民郑艳良把妻子支到西边卧房内睡觉休息，而自己找来家中的一把小水果刀、一把钢锯，再把毛巾缠在一把痒痒挠上咬在嘴里，就在东卧房的床上开始给自己做截肢手术。20多分钟后，被呻吟惊醒的妻子回到东卧房时，被眼前一幕惊得目瞪口呆：丈夫的右腿已从距大腿根约15厘米处被锯断，桌子上一根钢锯条崩断成两截，还有因疼痛咬掉的4颗槽牙。

第四个没想到的俄罗斯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学生上学一律免费，教科书均由学校无偿提供。而且所有的学校一律免费供应全体学生一顿丰盛的、营养充分的早餐或午餐。

第五个没想到的是俄罗斯竟然失业还要3个月的政府批准时间，而我国的下岗却是当天通知就立刻滚蛋。俄罗斯女人55岁、男人60岁，就可领养老金，不论是否为国家工作过。

世界银行专家在2007年4月17日公布的关于俄罗斯经济状况的报告，称俄罗斯经济增长是“符合穷人的利益的经济增长”。俄罗斯从1999年至2006年，年均增长速度约6%，经济总量增加了70%。然而，俄罗斯的工资和人均收支却增加了500%，扣除通胀后，人均收入实际的增长超过了200%。俄罗斯的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速度比人均GDP的增长速度多出二倍。俄罗斯的老百姓，实实在在地分享了经济增长的成果。而且俄罗斯各级政府，将1/3的财政支出，用于教育、医疗、救济等社会领域的；从而建立和维持了一套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让退休、失业、儿童、学生等等弱势群体，也扎扎实实地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民选的官员，拼命讨好选民，除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外，俄罗斯政府补贴、救济项目，共有几百项之多。这样情势下，在俄罗斯想当穷人不容易做到。

世界银行专家在2007年12月1日公布的分析报告说：在2001-2003年间，中国经济以每年接近10%的速度增长，但13亿人口中最贫穷的10%人群实际收入却下降了2.4%。中国的穷人却更加贫穷了，不是相对贫穷，而是绝对贫穷。世界银行说，中国的贫穷人口已经不再集中在一些特定的地区，而是分散在从农村到城市的全国各地。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经济的发

展，中国的贫富差距也在迅速扩大，社会财富也在迅速的向权贵集团聚集。朱镕基之子、中国国际金融公司首席执行官朱云来在央视财经金融晨会上表示：“中国经济保持稳步增长，但中国居民实际收入增长 10 年来一直在下降，个人储蓄只占国家储蓄的 10%。”

两极分化。中俄贫富差距不可同日而语。根据 2002 年中国的数据与 2003 年俄罗斯的数据相比，中国的基尼系数是 0.453，俄罗斯是 0.336。基尼系数是国际公认的衡量一个国家贫富差距的指标，通常将基尼系数定于 0.4 作为贫富差距的警戒线。从 2000 年开始，我国基尼系数已越过了国际普遍公认的危险警戒线 0.4，并逐年上升，2007 年达到 0.48。2009 年我国基尼系数超过 0.49。西南财大的研究报告显示，2010 年中国基尼系数已高达 0.61。美国的基尼系数为 0.45；日本为 0.25；德国约为 0.3。北大一位历史学教授曾做过大概的估算：明末李自成揭竿而起时中国的基尼系数约为 0.62，清朝太平天国起义时约为 0.58，20 世纪国民政府时期约为 0.53，而今天中国的基尼系数约为 0.61。

中国的特权阶层富可敌国，而穷人却无法生存。中国的贫富悬殊令世界震惊，2012 年全国人均收入 2.7 万元，而央企“联想集团”CEO 杨元庆年薪高达 9000 万，二者相差 3300 倍以上。中国人社部劳动工资研究所发布的《2011 年中国薪酬发展报告》说，部分行业企业高管年薪已经上千万元，2007 年平安保险总经理年薪即为 6616 万元，农民工年薪不到 6000 元，是当年全国企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 2751 倍，相当于农民工平均工资的 4553 倍。中国收入最高的 10%的家庭与收入最低的 10%家庭的人均收入相差 65 倍。中国城市人口中最穷的 20%只有最富有的 20%的人的收入（不含灰色收入）的 4.5%，即约 22 倍左右，远远超过美国。若含灰色收入，则可能百倍、数百倍！原来说拉丁美洲贫富悬殊是资本主义恶劣本性的写照，而现在中国的两极分化已远远超过拉美。可见，社会主义更邪恶！

[本帖最后由自幼于 2013-11-7 08:50 编辑]

TOP

8#大中小发表于 2013-10-15 15:26 只看该作者

28.儿子做梦花大钱，老子入土被崇拜

习皇一做中国梦，中国处处都挂梦。还是一句顶一万句啊！据说有的地、市、县还成立了“梦办”，当然也就有人升迁为“梦长”。又不知又有多少人升官发财了。在西安市区以及周边的地县，处处可见大幅的、色彩鲜艳的中国梦宣传画，非常抢眼，不想看都不行。虽然没有文革时期的红色宣传画、大字报那么鲜红，无处不在，但也是铺天盖地地强加灌输给每一个居民、路人、孩子、游客。招牌上写着：“我的中国梦”“社会主义好，子乐中华”“共产党好，百姓乐”“唱支山歌给党听”“经常洗心，不使染尘”。中国梦里唱红歌！

文革中，全国各地效忠表态，大修猛建毛泽东像，石头水泥，最高几十米高，不知浪费掉多少人工资金，保证了毛在世时的红太阳形象，没有人胆敢造反生事。到了这个时代，习皇帝是万万没有胆量让人给自己造像了，就造出一个“我的中国梦”来，号召全国人民一起做梦。这下可好，一个中国梦的广告设计费、制作费、人工费、场地费等等就算合计 1 万元的话，仅仅西安市就要花费数千万元，陕西省就是数十亿元，全国 36 个省市所花费的“做梦费”就是上万亿了！足够修建万里长城，或者多少个三峡水库吧。真是皇帝一梦，黄金万两啊。这些钱帮帮失学的孩子，艾滋病人，孤寡老人不好吗？

习父盖陵园，香火红过韶山村。2007 年前习近平一进入中常委，西安——富平，习近平老家黄土飞扬的公路修成了宽敞平坦、绿树成行的现代化高速公路，并悬挂出“习仲勋故里”的招牌。有人投资数亿修建了师资俱佳的兰光中学——陕西出皇帝，富平成福地，已经传为佳话。习 2002 年任职浙江时，陕西省委就搬迁了县城附近的数千户人口，征用了两百多亩土地，投资上千万元修建了富丽堂皇的习仲勋纪念墓园，还树立起了数米高 60 吨花岗岩汉白玉坐式雕像。习仲勋的骨灰原来是安放在北京八宝山的，2005 年雕像落成后被迁移回乡。陵园周围松柏翠绿，鲜花环绕，草坪宜人，有月薪六、七百元的园艺工人修剪和浇灌。老年妇女戴着草帽背着篮子蹲在地上拔去杂草，以让地面显得完美。这个情形看起来很像出自朝鲜，但是它实际上是在中国。人们沿着一条长长的甬道走近这个坐姿雕像并向它鞠躬。在甬道的另一端是展示他生平的博物馆。每逢重大节日，都有西装革履、油头粉面的高官、中官、芝麻官，抬着公款消费的花圈，一脸悲痛状、虔诚状地前来鞠躬祭典，有时也举拳宣誓。算算吧，一个花圈少算 300 元，听说最多的一次送了 300 多个花圈。花费是多少？谁出的钱？腐烂后运到那里去污染环境？儿子做梦花大钱，老子入土也花钱，反正是公款。习近平登基后，这里马上悬挂起了“陕西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红色旅游基地”的硬牌子，有保安人员 24 个小时守卫。2013 年 4 月，富平县政府宣布正在筹资修建一座耗资 30 亿美元的红色旅游主题公园，占地 2700 亩，包括娱乐、文化和展览中心以及一座水疗馆，并将竖起一个更大的习仲勋雕塑。不过县政府称，这只是为了纪念“老一代革命家”，与其儿子无关。习仲勋纪念陵园如今比毛泽东纪念堂、韶山村、宝塔山有名气，红火的多。带动富平县的房价飙升。有一名西安的教授发牢骚说：“征农民的地给习仲勋修墓就不对，还每年不给国家交税。太不象话。现在普通一个墓地都要十多万。”当地农民来到陵园的不多，他们说：“我没有时间看，一个死人坟，一个石头人有什么看头？我还要种地养猪呢。”

富平县 2013 年 7 月爆发震惊中外的妇幼保健院产科主任拐卖婴儿案，有 50 多家报案被拐卖婴儿。在富平县流曲镇的编织厂污染太大、太臭了。在场的一个人家说：“这村上现在怪病多得很，这些污染迟早要把人害死。但是谁敢说？前几天我隔壁就害癌症死了一个，才刚六十一岁。现在这人都是为钱，再啥事都不管。为了钱心就坏了。”人们不禁仰天长叹：皇父仲勋住花园，乡下农民吸毒气。西安贵妇养的狗吃龙眼，是泰国运来的，一斤 15 块，天天要吃 100 元的。如今，该狗又吃新鲜荔枝，这可是杨贵妃当年吃的岭南佳果。“你看，有钱人的狗比人值钱，城市里有些打工的一个月一千多块，都吃不起龙眼荔枝。人家狗窝里还有空调呢。”富人吃肉，穷人跟着喝点清汤寡水。近几年，国家给农村每个 60 岁以上的老人每个月几十元补贴，有的地方 80 元有的地方 60 元，有的地方被当地狗官苛扣，只有 50 元。中央开政协会议时，李鹏的女儿李小琳强调中国人要有幸福感，她开会时穿的名牌时装是两万多元一套，首饰、化妆品、手袋、私驾就不说了。在陕西省户县渭元乡，一个老妇人摘一斤豆角的手工费是两毛五。她已经 86 岁了，儿子不管，中国梦的政府发的 60 元补助不够用，她得花多少力气才能摘下 100 斤豆角，不值城市里的贵妇狗的两斤荔枝钱。

做梦不用花钱，做中国梦却要花大钱。生不起、养不起、吃不起、住不起、学不起、病不起、死不起已经成了老百姓的发愁梦、熬煎梦、恶梦。那些没有成长快乐的孩子、没有时间玩要看课外书的孩子、看不到蓝天风筝云彩的孩子，会做中国梦吗？

29.前中纪委书记尉健行 2001 年 1 月险遭炸死

知情人透露 99%的官员反对财产公开，说明 99%的官员是贪官。反对最厉害的是前朝政治局

常委和八大元老。周永康、曾庆红，贺国强、贾庆林、吴邦国等家族的敛财，早已不是新闻，邓小平、江泽民、李鹏、王震、陈云等元老家族的敛财更是众所周知。

2000 年 12 月 24 日尉健行在中纪委第五次全会上宣布，从 2001 年起将实行省部级干部家庭财产申报制度，当时知道这个消息的仅有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国务院党组、人大党组、政协党组的成员，但 10 个工作日内全国竟出现非正常提取现金 421 亿多元人民币、25.8 亿美元外汇的情况，尉健行想要阻止或冻结有嫌疑的大额存款户的帐号，但由于直接牵扯江泽民及多个政治局常委高官，最后财产申报不了了之。

就在尉健行宣布公布财产几天后的 2001 年 1 月 2 日，他收到一封从沈阳军区政治部某处寄来的挂号信，内附音乐贺年卡。该信经过了中央警卫局邮件安全处检查，没有发现爆炸物，但因检查人员对贺卡重量有疑便启了封，开封时发生剧烈爆炸，二名检查人员当场被炸至重伤，由于炸药里掺杂了剧毒物，两人不治身亡。

一年后的 2002 年 3 月中旬，尉健行个人在中国银行的帐户突然收到 1000 万巨款，是由 20 单无名汇款、每单 50 万元、从同一城市汇来的。尉健行随即要求立案调查并指出：“这不是一宗失误事件，是一宗有政治动机的陷害事件。”具备知道尉健行银行帐号的能力和条件，非权力无边的政法委莫属，是政法委欲罗织罪名构陷政敌。

多位高官被袭中南海惊恐万分

早在 2001 年 11 月 29 日，朱镕基召开国务院紧急社会治安保卫工作会议，当时尉健行、温家宝、罗干、贾春旺、刘丽英、何勇、周子玉、曹庆泽等人，都成了暴力暗杀攻击的对象，令中南海头目们草木皆兵、惊恐异常。据朱镕基在会上披露：从 2001 年 9 月以来，发生了 40 多宗特定暴力攻击纪委、政法、公安的案件，相应党政官员接获暴力死亡威胁信件电邮 470 多宗。如有人策划用重型货车冲击公安部，搞自杀式炸弹攻击；在国庆前夕破坏发电厂，破坏北京地铁线路，预谋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欢迎外宾仪式时制造爆炸和骚乱等。

朱镕基称：“有证据证明，这是来自党、政、军、警内部一些被清除、受处理、制裁的人及其同党、包括一些有严重经济政治等问题、待审查的人所策划的，他们在社会上收罗了从武警、军队、公安、政法中的败类，和社会上黑社会组织相勾结，雇佣、组织暴徒、亡命之徒，进行有计划、有预谋、有组织的暗杀。”比如 2001 年 11 月，中纪委书记尉健行、副书记何勇等一行到山西省太原市突击检查该省行政开支亏空 50 多亿元的悬案，尽管他们临时改变住所住进省军区招待所，但当晚还是发生两起突然中断电源事件，随后山西省委安排尉健行到森林公园参观，在保卫部门的劝阻下，他俩没有去，后来发现有人在森林公园准备了请愿活动，而且在路边水沟里安置了燃烧瓶等爆炸物。

同月，温家宝到湖北调查防洪设施经费及该省政府出面借贷搞基建拖欠 400 多亿元坏帐情况，在温家宝下榻的省政府迎宾馆内发生了武警枪击事件，温家宝秘书所住房间的窗户被枪击碎，温家宝住的房间多台电话遭阻塞，此外还发生了多名假冒便装特警闯入迎宾馆事件，幸好他们被发现而遭拘捕，但拘捕期间 3 人逃离。

30.中共害怕财产公开引发革命

2012年11月18日，习近平当选总书记后首次主持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要求全党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防变”就是防止和平演变，看来，习近平以和平演变为纲。12月24-25日，习近平走访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时说：“物必先腐，而后虫生”，“从善如登，从恶如崩”。2013年1月9日，中纪委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薄熙来、刘志军、李春城案的审理情况，习近平强调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1月22日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宣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任何人都没有法律之外的绝对权力”，必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在中国并非没有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的先例。香港人靠法制和媒体监督政府，而台湾人则是把公权力管住了，让公务员变成了服务员，人民成了大爷，让公权力成了孙子。所以龙应台说：不要去盼什么英明之主，而要去争一个可将权力关进笼子的制度。不要跪什么青天大老爷，而要去争一个可监督问责官员的制度。不要歌颂什么伟大领袖，而要去争一个可选举弹劾当权者的制度。不要说什么拥护感谢，而要去争一个可言论迁徙自由的制度。

习近平上台后，第一把火反腐，首先打击的高官就是四川省副书记李春城。而李春城案同周永康家族利益密切相关。李春城1980年代他就行贿4万给当时黑龙江省委组织部长韩桂芝，买得哈尔滨市副市长一职，调入四川后，投靠在周永康麾下，官至省委常委、成都市委书记、16大中央后补委员。韩桂芝贪腐案发，李春城买官现形。由于上面有人罩着，17大仅抹去中央后补委员称号，其余职务不变，未曾伤筋动骨。18大上再次成为中央后补委员。如果周永康不退，四川省省长非李春城莫属。像李春城这种带病提升很多。用此类人物掌权，岂有不贪污受贿之理。这次所谓“反贪”，主要是习近平、王岐山等针对“石油帮”中以周永康为首的“胜利系”，亦即山东胜利油田出身的人马（除蒋洁敏外，还包括原中石油副总李华林、原中石油昆仑天然气总经理陶玉春、原四川省委秘书长郭永祥等，均在中国石油集团占有重要地位），企图顺藤摸瓜，慢慢抓住周永康的小辫子。换言之，这波行动既不是针对江泽民、曾庆红、胡锦涛、温家宝这些老奸巨贪，也不是审查或清算整个“石油帮”。只不过是顺便敲打周永康。中共十八大后落马高官李春城、衣俊卿、周镇宏、刘铁男、倪发科、郭永祥、王素毅、李达球等都是草根，人们质疑这是假反腐！

2013年2月6日在中南海邀请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茶话新春，习近平指出：要继续加强民主监督。现在，“把权力关进笼子里”逐渐已被官方接受。问题的关键，在于同体监督还是异体监督。同体监督，即自己监督自己，那就是沿袭旧制，往纸笼子上再加上几道纸绳，看起来密实一点儿。这“笼子”不要说关“老虎”，就算是狐狸、黄鼠狼之类也关不住。民主党派在共产党的控制下，是假异体监督。如果习近平真正想根除腐败，他应该引入独立的监督机制，对中共权力加以制衡，解除对媒体的严密管控，让媒体自由报道官方的不当行为，还应该在国家治理以及由谁治理的问题上给予公众更大的发言权。习近平效法毛的统治手法，不久前才说过要让人说真话，一翻脸就变成引蛇出洞，打击“普世价值”、“自由宪政”和“网络谣言”的“严打”运动。在当今中国，最恼怒、恐惧网上曝光的就是腐败的权贵集团。中共不断控网的事实，再明白不过地印证了他们已经彻底丧失了自信心。在如此中国特色的党管新闻生态下，新闻媒体包括互联网都无法独立、无法自由。新闻工作者与网民的表达权、采访权至今没有法律上的明文规定，体制内的编辑、记者们稍不留神就将面临打击报复。中南海的“戈培尔们”严管媒体新动向，再一次验证了习近平的反腐运动针对的只是官僚阶层内一些特定的、本届政府本已决定清除的目标。反腐败，体制内监督体制内，本身就是个笑话。官员们有着共同的利益，会互相包庇，就如同让嫖客揭发嫖客，最终会达

成一致，默不作声，各嫖各的——中国官员就在群 P 中！中宣部长刘奇葆说：推动“官员公布财产是境外反动势力的阴谋”；鼓吹“宪政”是“敌对势力要颠覆现政权”。权贵的良知叫狗吃了。人们要求公开的，他们都觉得不该公开；人们希望寿终正寝的，他们又死死维护。人们希望依宪治国，他们说那是资产阶级的；人们要求官员财产公开，他们说不符合国情，甚至认为那些在街头打出横幅提出这种要求的国民是在破坏社会秩序，得到的回应是拘留。至于像南京 2013 年取消公费医疗制度，“副厅级”却肆无忌惮地可以“除外”。

中国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前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被查出在 25 个银行账户中有存款 1900 万澳元，并有超过九公斤的金条和 25 只罕见的钻石。这一计算显示，1900 万澳元相当于 1.06 亿人民币；9 公斤黄金约为 232 万人民币；25 颗罕见钻石大约相当于 7.64 亿人民币。结论是“保守估计，刘铁男约有财产 8.723 亿以上”。按照他的工资水平，“刘铁男要工作 8529 年才能赚到 8.7 亿。”此外，他和家人还有其它巨额资产。这些资产包括人民币 7100 余万元、美元 265 万余元、欧元 87 万余元，以及各种有价证券 1.33 亿元。此外还有白金条 1400 余克，钻石翡翠珠宝饰物 25 件，名贵手表九块，齐白石、傅抱石真迹 5 幅。刘铁男在北京、杭州、太原、青岛、苏州等地还包养了八名情妇。

习近平袒护大贪官半年。《国家能源局：对刘铁男的举报纯属污蔑造谣，正在报警》消息则证实，早在 2012 年 12 月 6 日，《财经》杂志罗昌平副主编向中纪委实名举报了刘铁男涉嫌学历造假，诈骗国营银行 2 亿元，对他人恐吓威胁等腐败问题。但几小时后，国家能源局新闻办公室有关负责人回应称：“上述消息纯属污蔑造谣。我们正在联系有关网络管理部门和公安部门，正在报案、报警。将采取正式的法律手段处理此事。”当时网民就愤慨不已：国家能源局不可能在几小时内就查清罗昌平实名举报不实。如此迅速袒护贪官刘铁男，显然得到高层包括习近平总书记的支持。后来因为全国网民齐心合力坚持举报，中纪委不得不对其双规。可见，没有民众持续地网络反腐，习是不可能真正“打老虎”的。这再次证实习政权是以辟谣压制真相的谎言政府。弄虚作假已是积重难返的痼疾，共党不说谎就无法执政。

习近平登基大半年，烧了 9 把火：一仿邓南巡示意保党保国；二紧急任命上将示军权已稳；三出台“习八条”以“中共梦”伪装中国梦，下令全党“洗澡”一年；四令中纪委发誓“既打苍蝇又打老虎”，立反腐“圣谕”；五访俄求援，学毛泽东联俄抗美；六大秀夫人借歌声争民心；七接见大庆大寨模范人物为重评文革作准备；八强调“干部读史”坚持“三自信”；九严打“网络谣言”搞恐怖。如同王莽改革，“民有七条死路而无一条生路”！

习近平一抓典型反腐忽悠百姓，让你信任共党；却以拒绝公开财产维护党贵腐败。贺卫方说：“一个国家的腐败已经到了可怕的程度”，可是习近平反腐却要“靠洗澡、照镜子、正衣冠、学习、整风”，贺说，“多少年来就这么整过来的，越整越严重，这条早就已经不灵了”，如果实施新闻自由，有效监督，公布财产，由中立机构进行严格核查，特别是司法独立，腐败问题就能解决。但灵的办法，当局不愿采用，不灵的办法却不断重复，反腐哪里有希望！曾以美德廉政感动百姓上位的王莽，登基后不是推进政改和恢复民营经济，而是以道德至上的德治推行“国进民退”，结果得罪了几乎所有的社会阶层，终被拥护过他的民众造反杀死。今日中国很像西汉晚期，声称为百姓利益而改革的政府，实际上与民夺利，暴政谎言无以复加！贫富差距史无前例！今日大肆宣传自己勤劳爱民忠厚博学的习近平，恰恰让人想到，公元 8 年时，全国各地近 49 万人分别上书要求圣人王莽执政，但这并不能保证 15 年后他可以不在百姓刀下惨死。滥用百姓信任，一再以空头支票欺骗人民，绝不会有好结果。

袁红冰说，现在有的人一直在对共产党抱者幻想，以为共产党能改革。其实，共产党已经丧失了自我改造的能力，它已经跟邓小平要赵紫阳去进行政治改革的时代都不一样了，那时候邓小平讲：你不进行政治改革，经济改革的结果会丧失。他讲得非常清楚，一定要搞政治改革，至于改革到什么程度那是另外一回事。可是现在共产党不敢讲要搞政治改革了。习近平上台后，总在那里兜圈子，不仅不改革，还恢复了毛泽东文革的一套，乱抓人！共产党现在是谁都不敢改，谁改就打谁，变成要死大家一起死了。

2012 年，王岐山在高层推荐法国作家托克维尔的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彰显了他的不改革之志。托克维尔提出，路易十六的统治要比路易十四宽松得多，人们也觉得自由得多，甚至该时期还是法国最繁荣时期，并已开始改革，可是偏偏爆发了大革命。其实，法国大革命之所以爆发，是因为改革失控。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提到的“经济的繁荣加速了革命的到来”，无疑是中共当前的噩梦。王岐山觉得，中国现状跟法国大革命前的现状非常类似，所以他害怕改革会引起一场大革命！王的意思是，当权者越改革、越开明，越容易招来革命。对老百姓保持高压，才是上策；不能对老百姓太松了，松了就爆发革命。

王岐山这位中纪委书记，被曝在美国加州拥有价值不菲的两栋豪宅，在其妻或妻妹名下。中国目前 90% 以上的亿万富豪来自高干子弟，而且很多人财产都在境外。王岐山的治本反腐“需要几十代人”的时间，成了中共迟迟不予公开官员财产的无耻口实。

习近平说：“我们现在存在理论和体制等各方面的信心的缺失。但我们现在找不到更好的理论和体制。我们也不能轻易改动。苏共垮台的经验教训，就是戈尔巴乔夫首先改革了党的意识形态和理论，结果一发而不可收拾。王岐山同志推荐大家读一本书，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就是这个教训。政治体制改革，一旦放开一个口子，就很难回头，很难控制了。到时候，我这个总书记是不是能做，党的领导地位是不是还能保持，就都很难讲了。所以，不是我们不改，而是确实不能改，不敢轻易的改。谁敢担这个责任呢？”

据说俞正声是迄今唯一表态支持财产公开的常委，他有利民政绩，有广泛人脉，如果普选，当选的一定是俞而非习。新任政协主席俞正声，强调：“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 俨然一语双关：可以把中国官员的财产搬到西方去，但绝不能把西方的制度搬到中国来。

“公示财产”已成为验证“习近平新政”是否制度反腐的一块试金石。2013 年 3 月 31 日，中国民间人士率先起来呼应中共新领导的“反腐”讲话而上街呼吁官员公示个人财产，结果当天在北京西单演讲的袁冬、张宝成、马新立等人被警方带走，随后被以涉嫌“非法集会罪”刑事拘留，随后被逮捕。4 月 17 日，北京维权人士赵常青、丁家喜、王永红等也被以涉嫌“非法集会罪”刑事拘留，后被逮捕；4 月底江西省新余市维权人士刘萍、李思华、魏忠平等也因要求官员公示财产而先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拘，后被改为涉嫌“非法集会罪”逮捕；6 月初，袁奉初、袁小华等人在湖北赤壁准备举牌要求官员公布财产及敦促人大批准公约时，遭到抓捕。之后陆续又抓捕了新公民运动倡导者许志永，公民维权践行者郭飞雄，热心公益的著名投资人王功权等等。这一波以要求官员公布财产与敦促人大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为诉求的活动，最后被当局剿灭。

香港人特别爱用“习总”这个称呼，因为在广东话中习总与杂种同音。

1.邓卓棣、衣俊卿风流梦

2013年5月2日，从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平果县获悉，邓小平唯一的孙子，邓小平最小的儿子邓质方的独生子——28岁的邓卓棣被任命为该县副县长。据悉，在广西平果县人民政府最近一次的领导分工中，邓卓棣负责发展改革、物价、政府法制、农业农村、扶贫和重大项目等方面工作。据当地干部群众介绍，邓卓棣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知识渊博、能力突出，但为人低调、谦虚谨慎、勤奋好学，从不接受记者采访。于是出现各种各样的评论，有赞成的，也反对的。赞成的认为他出身政治世家，受过高等教育，又留学美国，有良好的素质，任老少边区一个副县长（相当于副处级干部）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李鹏的儿子李小鹏还是省长呢！无论人品、学识，与邓卓棣相较差距很远。反对者认为这是中共“党天下”特权世袭制的表现，还说邓卓棣是美国人，在美国求学期“因性骚扰曾被美国警方拘留”。

原来，1952年出生的邓质方是邓小平最小的儿子，就读于北京大学物理系。1983年，携妻子刘小元赴美留学，获纽约州罗彻斯特大学量子物理学博士学位。妻子刘小元曾与他就读于美国同一所大学，获得生物物理学博士学位，并在留学期间产下一子邓卓棣。

邓卓棣是出身在美国，但不是美国权力能管辖的地方，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国大使馆内的中国地方。在他出身后的三天，即送回中国。是他伯父邓朴方亲自去接的机。邓小平曾说过：“谁说我的孙子是美国公民，他回到中国就是中国公民。”邓卓棣高中毕业后再去美国求学，在美改随祖母姓卓，英文名：David Zhuo；2008年从美国北卡州杜克大学法学院法学硕士毕业后，到纽约华尔街一间律师楼任律师助理，住在华尔街附近价值300万美元的高级公寓里，开奔驰房车，被称为“华尔街阔少”。2011年9月邓卓棣与一位中国人刘姓女同事外出办事，对后者实施性骚扰。这位女同事愤而举报后，邓卓棣被美国警方拘留，第二天获释。最后，邓卓棣以20万美元的代价，庭外与这名女子达成和解。也算一个花边新闻呢。之后，两人双双辞工，邓应聘另一家律师楼，女方则去了德国。所有这些，拼图出又一个红二代、官二代、富二代的形象：奢华、荒淫、腐败，典型的“中国制造”。

邓质方1980年代末自美国返国后迅即进入商界。很快在荣毅仁力邀下，进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直属的中信兴业公司，任副总工程师，最后自然是担任董事长。邓小平1992年南巡后，邓质方趁势而起。他在深圳盐田黄金海岸的沙头角海涛路口零地价圈地30亩；以低价在上海的虹桥开发区“圈地”，成立四方房地产公司，隶属于建设部名下；接管大连立港房地产公司；还将势力范围扩充到还在英国辖下的香港。1993年5月他伙同北京首钢董事长周冠五之子周北方、香港巨富李嘉诚以5.8亿港元收购了香港玩具大王丁氏兄弟的开达集团，用40亿港币成立首长四方有限公司在香港上市。其中，“首”是首钢（首钢用3亿美元收购价值1亿美元的秘鲁铜矿，再付800万美元给美顾问公司为酬谢）、“长”是李嘉诚的旗舰企业“长江实业”，“四方”则是邓小平幼子邓质方的房地产企业。香港一些富豪为了讨好邓小平而纷纷认购，使四方集团的最大股东兼董事长邓质方赚得盆满钵满。据知情人透露，邓小平家族以权敛财，光邓质方就积累了150亿财富，把当时的我国的外汇财富都掏走了近1/4。周冠五、周北方父子2人在四、五年间非法所得即有33亿人民币。周北方动用首钢5000万美金在法国为自己做生意亏损。这只是官方的说法。其实，周北方当时动用首钢巨额美元完全是为了邓质方在澳门葡京赌场过一把赌瘾而已。当时，邓质方一掷亿金，一夜之间输掉1.9亿人民币。何厚铨于是连续宴请3天邓质方，直到最后周北方把钱打入法国然后转往澳门的户头后，邓质方才得以脱身回到北京。周北方与陈希同关系密切，陈倒台后，周北方被控行贿900万元，周北方罪该枪毙，1996年9月被判处死缓，后保外就医。江泽民

靠此案搞掂以邓家为主的太子党。据悉，周实际在监狱只待了两年。

周北方只是他邓小平家族的替罪羊而已。周被判后，迅速被邓家动用关系转到邓家嫡系人马、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所在的武汉监狱服刑，以感谢周北方救邓质方有功。周北方在武汉名义上服刑，实际上是帮邓质方管理开发武汉东西湖区的土地项目。邓质方因为觉得对周北方不起，让他承担了那么大的苦头，于是将武汉东西湖区已开发土地中的 1 万亩划给了周北方 3000 亩，以弥补对周北方的为自己替罪之功。与其说周北方是受贿被惩处，不如说是因权力更迭，太子党们被迫从前台走入幕后，换个活法而已。

邓质方闻听邓卓棣被拘留故事后大怒，心想在大陆要搞个女人还不容易，搞一个连、一个团都没有问题的，就美国律师行里的女律师，要长相没长相，要身材没身材，怎么儿子还会对这样的女人有兴趣？实在是见识太少了。故而命儿子回国，好好爽一下再说。他还给邓卓弟搞了一个挂职锻炼的美差事，邓卓棣出任广西百色市平果县副县长。

1929 年，邓小平在那里发动百色起义，建立起中共最早的军队之一，红七军。邓卓棣被空降到那里当官，理由直白：前人打江山，后人坐江山，符合封建王朝的逻辑。今日共产党，大大方方地承认：我们建立的，就是一个封建王朝；我们实施的，就是封建世袭制。

朝鲜的世袭制，已经进入红三代；中国的世袭制，正从红二代向红三代过渡。排队接班，中共世袭序列，已经计划到三十年之后。这群踩着他人尸骨而爬上权力高位的“成功者”，竟然把中国拉回到封建世袭制！中共搞得是 500 家人轮流世袭，金家搞的是一家世袭。

无独有偶，叶剑英的曾孙叶仲豪，是 1983 年在美国出生的美国公民，2011 年 6 月，叶仲豪出任云浮市发改局副局长，2012 年 8 月升任正处级的广东云浮市共青团市委书记。此外，中共前党魁毛泽东 43 岁的孙子毛新宇现任军事科学院少将，朱德 60 岁的孙子朱和平是空军少将。有网民讽刺说，中共的“世袭制”已经预排到了“重孙子辈”了。

民主国家的总统是人民公开讽刺幽默的对象；专制国家的领袖是仅供人民顶礼膜拜的偶像。民主国家的国家有总统（如里根）的子女失业；专制国家的领导人的子女是金枝玉叶、将门虎子，当然衣食无忧。邓卓棣、叶仲豪都可算处级官员，他们的任命，暴露了中共体制内的一条潜规则，一定级别以上的官员，其子女工作后定级从正科级开始。如果其子女 22 岁大学毕业，27 岁就是正处级了，这样的例子不少。一般人的子女从科员做起，熬到正科级也要 5 年。在这个拼爹的时代，普通人子女的上升渠道受阻，德才兼备的选拔标准形同虚设，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社会不公日益严重，必将危及社会稳定。

2013 年 1 月 17 日，中共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曾任黑龙江大学校长及该省宣传部长）因生活作风被免职。衣俊卿为马列理论家、中共十八大代表，教授、博士生导师，头衔一大堆，还是中共 18 大政治报告里的“三个自信”发明者。“三个自信”即“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实际上就是“习近平思想”。衣俊卿被情人常艳揭出难看的贪腐案，习近平还是“用人唯才”，罢了官位，却保留专家的禄位。

邓卓棣、衣俊卿都犯了玩弄女性的风流错误。前者因为是太子党，可以从国外风流到国内，而且可以公权力来玩弄中国女性；后者因为不是太子党，用公权力玩弄中国女性后，就只得

下台。这就是太子党的老一辈的厉害，草根官员自叹不如。

2012 年 12 月 12 日，中央编译局博士后常艳在网上实名发表 12 万字长文，题为《一朝忽觉京梦醒，半世浮沉雨打萍——衣俊卿小 N 实录》，网民简称为《编译局言情录》。常艳女士把自己和编译局长衣俊卿的艳史，事无巨细原汁原味全都抖了出来。从 2011 年 3 月她接受面试时相识衣局长开始，一直写到 2012 年 12 月 3 日的这段艳史，写出了衣俊卿喜新厌旧的风流嗜好，她花了数万元才得以陪睡，详细记录他们 17 次在酒店开房的时间及地点。

1978 年出生的常艳女士是山西师范大学副教授，红色家庭媳妇，有老公孩子，她报读中央编译局博士后想脱产专职读书后留在北京工作。为达此目的，她傍上了局长衣俊卿。一个博士后小情妇若不陪睡，局长就不会录用她，也根本不可能获得到北京工作的机会和北京户口。衣俊卿即使在中央开会或下基层调研期间，也不忘与情人发情色短信调情，甚至在开“两会”期间，还争分夺秒与美女开房寻欢作乐。奉献了几万人民币和自己身体之后，常艳发现衣局长还有其它情人，而且并无诚意帮她达到目的。与她情人老师衣局长闹翻后，常艳说出一段大实话：“编译局的博士后，还不如叫情妇团呢！以后面试，不要比学术，就比谁漂亮，谁会发嗲。为局长献美妾者，赏！赏官位，赏俸禄。现代版《甄嬛传》在中共中央编译局火热上演，马恩列斯老人家们已经挂在墙上了，可他们不忍心错过人间大戏，就差从展览馆蹦出来与局长大人抢女人啦！”这就充分说明：中央编译局这个马列研究圈，已经堕落成一个挥霍纳税人血汗钱的情色纵欲地。马列主义不过是一个臭粪缸，甚么污秽、烂泥都要往里面装。刚刚闭幕的中共 18 大不是大谈特谈“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吗？话音未落，《实录》就全盘托出这些中共意识形态的鼓吹者其实没有人真正相信自己所鼓吹的东西。衣俊卿在台上大谈坚持马列主义，实际上却是“满嘴马列，满腹盗娼”的荒淫之徒。今天中共官员们不顾廉耻地纵欲声色，共产共妻，财色全收，反证了中共宣传的荒谬与虚伪。

其实，类似衣俊卿这样的双面人，在中共官场比比皆是，而且在东窗事发前早已成为中共政坛的主力。这些官员满嘴仁义道德，实际上一肚子坏水；他们既要做婊子，又要树牌坊。直接承传了老马的衣钵嘛！这既不是走老路，也不是走邪路，而是走上了一条具有中国“淫”红色的正路。而且，衣局长和常博士的“卧谈会”，开创了马列研究的一条新途径，在被窝里、浪笑中就可以把马列主义推向一个崭新的高度。如果马列毛能够活到今天，听说了中国的马列第一权威玩女人，一定会会心地一笑：“哈哈，这小子是我们的好学生啊！”

共党领袖们都是淫鬼。马克思酗酒严重、没有家庭责任感、强迫女佣 Helen 充当性奴、还生有一个私生子。此后，马克思为维持自己的“领袖”声誉，又把私生子说成恩格斯所生。恩格斯把婚姻视为牢笼，公开地共产共妻，玩弄其工厂的姊妹花并占有她们的表妹。列宁尽管有妻子加上两个情妇，列宁仍然经常出入巴黎妓院，于 1902 年染上了梅毒。列宁还是德国间谍，是个性虐待狂和吸毒成瘾者。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列宁 28 岁就与克鲁普斯卡娅结婚，但却终身没有子嗣。诺贝尔奖得主生理学家巴甫洛夫说：“列宁是一个带有梅毒大脑的疯子”。而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历史学家海伦·拉帕波特在研究列宁的死因后说：“俄罗斯‘伟大’的革命者列宁死于梅毒，这是他在 1902 年在巴黎滥交招妓的结果。”

有人说“大家都说共产党一件好事没做，可是它起码消除了娼妓啊。”李志绥驳道：“共产党消除娼妓是表面的，可骨子里那些共产党高干却为所欲为，在他们的暗中操作下，那些文工团员还有一些护士就是娼妓，定时的搞。中南海定时开舞会，舞厅旁边的屋里就有床，毛可以任意选来跳舞的文工团员。”据毛泽东的私人医生李志绥透露，毛泽东在全中国招来大批

年轻漂亮的女孩，像上菜般轮番供上。毛泽东奸污刘少奇老婆王光美，邓小平、李维汉共妻金维映。李伯钊共夫杨尚昆和王观澜，张闻天、刘伯坚共妻王淑贞，张闻天与大破鞋刘英姐妹俩同居。细探共产党领袖的光辉人生，发现玩女人本来就是马列的特色。中国人很久以前有“富贵不能淫”的说法，但在马列主义中没有这一套老皇历。“淫”是马列的一个组成部分。《共产党宣言》讲得非常清楚，传统的家庭就是私有制的产物，它就是要打破这种传统的夫妻关系，搞共产共妻的。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就指明，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一夫一妻制未必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必须消灭家庭，共产共妻。延安时期男女关系很随便，叫“一杯水主义”，这就是从马克思那儿继承来的。

今天的中共每一个官员都是一大堆情人，包二奶、找小三。江西省政府原副秘书长吴志明收受他人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 4748 万余元，吴 2011 年被抓时正与两个情妇在床上激战。双规后，从他身上搜出避孕套、壮阳药和两本“快乐日记”。第一本是淫乱史：记述了其 136 名情妇的简介，情爱的次数、地点、以及每一次感受——满意度。第二本是快乐见证，内页竟黏贴有 100 多位“情妇”的阴毛，一个情妇占一页。仿佛在向世人炫耀其持有主人的“辉煌业绩”。其奋斗目标是 5 年即到 2015 年前睡 1000 个女人，其中良家妇女的比例不低于 1/3。

从其随身携带的避孕套、壮阳药和两本“快乐日记”，可见这位“高级先进干部”用心之良苦：为了让被服务对象“满意”，不但时时刻刻深入裙中，还不惜透支自己的身体日夜操劳，回家还得写心得体会，可见其“三个戴表”和“糊涂发展观”理论学习的多么深刻彻底，其“中国梦”的“先进”性意识水平有多么的高！这位档的优秀干部真的是做到了与裙中打成一片身贴身、心贴心、肉对肉！同时，这种服务意识很强先进优秀干部的层出不穷，更体现了档组织的先进性教育有多么的成功！再看其为自己定下的 5 年 1000 个目标任务，平均不到两天要完成一个新的目标任务！真是日夜操劳、无私奉献，为性时代的楷模！

2010 年 3 月 21 日，安徽省安庆某镇事业单位科室负责人王成因受贿落马，他的几本日记与 1 个移动硬盘被查获，移动硬盘里竟是王成与许多陌生女子发生性关系的视频。2003 年，王成的月工资是 1600 元，可他在日记中定的计划是每月要赚 8000 元，确保年净进账 10 万元。“2003 年至少要与 56 个女性发生性关系，确保有两名良家妇女。”王成在第一本日记首页就写明了玩弄女性的年度计划。这本日记结束时，与王成发生过性关系的女性就达 250 多个。所有的日记加起来，他曾先后与 500 多个女子发生过性关系。他还透露“总的目标是 600 个至 800 个不同女性。”王成供述，这些年花在淫乐上费用的有几十万。

裙中（群众）图。原江苏徐州市委组织部长陆正方卖官，上百美女官员为了得到升迁同他上过床。中共的原河南开封市委组织部李森林居然接受多名男性下属妻子的性贿赂，私下收藏 300 多名女性阴毛，并且喜欢亲自操剃刀！据说李部长向来办事有条理，明察秋毫，事事都要留下详细纪录，他将“贡女”的阴毛分门别类，有以颜色区分的，也有以粗细区分的，下面标上每位佳人的姓名，便于查询和回忆。甚至想在日后做一支价值连城的“贡女阴毫笔”。相比之前被曝光的任何淫官，李森林的做法，可谓前无古人。之前海南省纺织工业局原副局长李庆普以“另类收藏”闻名，他记录自己每次跟女人发生关系全过程的日记本多达 95 册，另收集的女性阴毛多达 236 份。但李庆普最多只是入门级的阴毛收藏家，而李森林却算得上是阴毛收藏艺术家。最关键，李庆普只为收藏而收藏，而李森林却准备通过艺术加工，制成“贡女阴毫笔”，品味也高许多档次。如果制成后，李森林每天用此笔在文件批上“同意”两字，个中的心满意足及春风得意，又岂是外人所能道也。这位阴毛部长被网民称为“深入裙中（群众）的好干部”。李部长经常接受性贿赂而不替她们升官。说明他在人事问题上还

是有一点组织原则，怪不得领导上任命他为组织部长。

前广州市委书记罗志明除了疯狂玩弄女性，竟还收藏了 58 条沾有女性阴液的内裤。

张家界一黎姓工商局长死在一 20 岁女性肚皮上，家属竟要求法医修改鉴定，市民们愤其无耻，写一挽联，不知道贪官污吏努力在女人肚皮上工作的公务员作何感想。上联为：赤条条来，深入裙中，海棠树上梨花颤。下联为：光溜溜去，牡丹花下，嫩草尚绿老牛归。横批：畜生入死。一医生更幽默，在其家属要求更改法医鉴定时，竟写上：舒服死了。

朱瑞峰透露，他手中共有七段重庆官员不雅影片。除去雷政富和孙立达的视频外，还有五名重庆高官，也被永煌集团旗下 18 岁女子赵红燕拍下。重庆情色风暴席卷 16 高官。他说，之所以先曝光雷政富，是因他长相好认，特别是上嘴唇有颗黑痣，这是铁证如山。

一名山东官员写了一份保证书，承诺和妻子离婚，和情妇结婚。但保证书却被捅到了网上。其他一些事例有点像权贵性骚扰。如电视台女记者王德春实名举报一名国营公司负责人孙德江，持续数年对她性虐待，后来她把情况公布到网上。2013 年的英国《金融时报》嘲笑中国进入了金瓶梅时代，中国社会今天生活在西门庆的后院里。

2006 年中原油田多名领导干部接受性贿赂，奸污了油田 17 中学的几十名中学女生。2008 年 8 月，贵州省习水县的 5 名公职人员嫖宿 10 多名未满 18 岁的女学生，其中还有 3 名未满 14 岁幼女，但该案处理竟要依赖于省公安厅长的批示。2008 年前后，浙江丽水碧湖中学几十名中学女生被强奸，施暴者有商人、教师、乡村干部、公务员，甚至还有司法人员。

陈希同挪用公款 180 亿养情妇，一掷 6 千万，私人挥霍花掉 20 亿。

河北省的省委书记程维高在任省长时，家眷未跟随在身边，该省一位县委书记及时送上“下厨上床”的女保姆。省长改任书记后，一个月内将“孝心可嘉”的某县委书记提拔为一个化工大市的市长。程维高后来倒台（因严重违纪而被开除党籍），女保姆被送进省委党校脱产学习，学习未完又进中央党校，三年下来，摇篮身一变成了某地级市的妇联副主席。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贪污、受贿了多少钱，政府一直没有公布。政府只公布了仅他的秘书李真个人就“落”了六千万而后被枪毙灭口了。程维高在职期间就一直有人向中央告他，告他的人坐了近十年的牢。而程维高最后也只是受到了“双开”，一天牢也不用坐。

中共十七大代表、全国十大女杰、全国劳模、全国三八红旗手、“铿锵玫瑰”陈光明承认她是文强的情妇。当初陈光明是跟刑警大队大队长吴国光通奸，之后是攀上公安局长郭元立，郭退休后就做刑警万总队长的情人，再后来，做文强的二奶。陈光明从警 30 年，是一步一步睡上副厅级。陈光明付出的是青春与肉体，收获的却是光环与职位。原四川省教育厅付厅长汪风雄被双规，涉案金额达 4000 多万元，被正式逮捕。汪风雄养了 4 个情妇，其中就有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苏洪曲。苏洪曲收受现金 10 万元。“全国三八红旗手”是全国妇联表彰的各个时期所谓的“先进妇女典型”，也是中共专项表彰妇女“先进人物”的所谓最高荣誉。因此，有网友表示，原来中共的女干部都是陪人家睡出来的……

湖南的蒋艳萍用“肉弹”放倒过 40 余位干部后也睡成了副厅级；蒋艳萍在关押期间，使汉寿县看守所副所长万江栽倒在她的裙下。蒋艳萍最后被枪毙，杀人灭口，中共放心了。

原黑龙江省政协主席韩桂芝受贿达 2 亿多！韩桂芝用床上功夫拿下了黑龙江当时的几位领导：陈雷、孙维本、王海彦、周铁农及中央常委尉健行。头号警花王菲交代说：自己和至少 40 位高官有染；她庞大的情夫队伍中，除了公安部已落马和未落马的领导，还有中南海里的好几位人物。著名歌唱家汤灿外号小花猪，她的床上男人有戴玉强、孟庆云、赵安、陆川、李东生、周永康、薄熙来、谷俊山、许宗衡、刘斌、周以忠、徐才厚。

李薇曾被时任云南省省长的李嘉廷揽为情妇；1996 年献身广东省公安厅刑侦局长郑少东并获得广东户口；1990 年代末，李薇攀上巡视广东的国务院财经高干，获调北京，成了金人庆的“二奶”，并结识了俞正声。时任建设部长的俞正声，一度被李薇的混血丽质和聪明迷得神魂颠倒，在部长办公室内频频颠鸾倒凤，玩得一双金鱼眼都浮肿了起来，俞正声见她聪明能干，就把她弄到建设系统的企业中任职公关，让她游走于高官之间，作为发展势力、打通关节的“特殊武器”。2001 年俞正声调任湖北省长，特将李薇介绍给同为高干子弟的陈同海，中石化老总陈同海付给李薇的“肉金”高达逾十亿元。其后，俞正声又把她托付给建设系统的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在首创集团获得一份闲职。继而，俞正声又把她介绍给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杜世成向李薇输送利益“至少 1 亿元”。在李薇床“单”中有近百名厅局级以上干部，副省级以上高官就有 11 人，与她“体贴入微”的有张高丽、俞正声、陈同海、财政部长金人庆、农业部长杜青林、外交部长李肇星、国安部长许永跃、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北京副市长刘志华、最高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王益、公安部长助理郑少东等。湖北部分报纸因转载《公关裙带》李薇案而受到湖北省委宣传部的处分。2007 年李薇被中纪委招去，知道她性力无边，中纪委的自己也来享用，最后李薇平安无事，连赚到的钱也一分不少。如今依然风光无限。毕竟“名器”可遇不可求呢。后来中纪委的人作了一首打油诗，曰：仙人洞里好春光，乌龟王八排队赏。做官不上李薇床，十年常委也白当。可见：中纪委乃最腐败的机构！因为没有有一个机构能制约这个机构了，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最腐败了。譬如：2013 年 10 月正被调查的海南省长蒋定之欲花 2 亿贿赂中纪委官员。蒋定之和周永康及其家族关系密切，算得上是周永康帮中最新被调查的高官。据悉，戴成书为周斌和蒋定之提供美女，还用不同公司的名义为蒋定之、周斌掌控土地和收益。

2012 年 1 月 25 日，大年初三晚，胡德平一个反腐帖子：“我们所有的媒体都充满谎言！没有一句真话，到处吹嘘歌功颂德，我们的官员 96%都贪污包二奶，这样搞很危险。我们欠人民的已太多！不要总是拿人民当傻瓜！奉劝一些人不要过于迷恋权力，卡扎菲满脸鲜血被打死还沥沥在目……人民不跟我们玩了，我们就玩完了！”

2. 共产狼奶哺育的畸形儿

习近平 1953 年 6 月 1 日生于北京，陕西富平人。其父国务院秘书长兼副总理，其童年时代自然是在“蜜罐”中长大。跟一般太子党不同的是，他的父亲习仲勋早在 1962 年 9 月就被康生、毛泽东打下了台。当时康生在中共八届中全会上藉小说《刘志丹》之事陷害习仲勋，把习仲勋等人定为“习仲勋反党集团”，企图置他于死地。康生认为，小说《刘志丹》中的虚构人物罗炎就是高岗，小说是在为高岗翻案，是在反党。结果作者李建彤被开除党籍，监督劳动，刘景范被打成“反革命”，审看过《刘志丹》的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被撤消职务，“下放”到洛阳一家工厂劳动。习仲勋被审查、关押、监护居住长达 16 年之久。

文革爆发时，习近平是北京最出名的“太子党”学校——八一学校的初中生。习近平只因为说了几句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话，就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被列为敌我矛盾，在中央党校的院子里关押了起来。中央党校召开批判六个“走资派”的大会，最后一个人就是习近平。前五个是大人，第一个是杨献珍，六个人戴着铁制的高帽子，帽子重，压的受不了，近平只好用两只手托着。他妈妈齐心就坐在台下，台上喊打倒习近平时，妈妈齐心被迫也要举手喊口号打倒她儿子。批斗完了，近在咫尺，母子也不能相见。一天夜里下大雨，趁看守不注意，近平跳窗户跑回家，想让妈妈给弄点吃的，然后进房间换衣服。近平万万没有想到，妈妈不但没有给他做饭吃，反而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冒着大雨向领导报告去了。近平又绝望地跑进了雨夜。最后，颐和园一个看工地的老头儿收留了他，让近平老哥在一张连椅上熬过了一夜，第二天，就被抓进“少管所”劳动改造。

1969年1月13日，未满16岁的近平到陕北延川县梁家河生产大队插队，艰苦务农。1969年8月，他刚返回北京，就被当成“倒流人员”关进公安局，送往劳教所6个月，一直关到1970年。回到梁家河之后，他帮助修建灌溉沟渠。习近平1971年入团，由于习仲勋的政治问题，习近平申请入党九次被拒。他写了第十次入党申请书，终获批准，1974年1月入党，并当上了陕西省延川县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还成了延安地区上山下乡先进知识份子的代表。习近平后来在1992年曾经回到梁家河一次，他给每一户人家送了一个闹钟。

3. 习近平报复高扬

1975年10月习近平被党组织“推荐”进了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学习，这样的学生当时被称为“工农兵学员”。1979年4月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工系有机合成专业。

1978年12月11日，习仲勋被中央正式任命为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习仲勋到广东后的第六天，叶剑英就来到广东视察工作和休息。此后还多次到广东视察。1979年习近平清华大学有机化学专业毕业后，习近平靠父亲习仲勋的推荐进了国务院办公厅，随即调入中央军委办公厅任秘书，给他父亲的老战友、国防部长耿飚做秘书，可谓一步登天，自由出入权力中心中南海。这背后牵线搭桥的就有叶家的因素在里面。而习仲勋也投桃报李，让叶选宁以及耿飚的女儿在广东省身居要职。1982年耿飚退二线，改任国务委员，习近平如果要保留军籍就得重新安排，1982年3月他索性转业到河北正定县担任县委副书记。

习近平在正定的事迹：1.他眼见县内道路脏乱落后，于是强制全县1/10人口约4万多人就如何养护公路上课学习。2.他在1983年全国清除精神污染运动雷厉风行时，协助开展一场针对重大犯罪的“严打”运动，并且在1983年夏秋之际，践踏司法程序，大搞“公审公判”，有一次更公开处决4人，跟唱红打黑的薄熙来是异曲同工。3.他在1983年底升任县委书记，严厉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对全县3万多名妇女强制进行绝育手术，再给另外3万多名妇女强制安装宫内绝育器。4.他当年也是“形象工程”的祖师爷之一，不顾当地官民反对，毅然宣告把正定县变成电视拍摄中心，花费原定成本3倍价钱，建成了包括荣国府等大型园林在内的影视基地，并且动用高层政治人脉，迫使《红楼梦》电视剧的摄制组人员开车6小时南下正定拍摄荣国府戏份，声称外景场地将会成为一大旅游景点，但事实上少有游人造访，也没人拿它来再拍外景。由此看来，这显示出习近平跟风枉法、好大喜功，往往把自己的幻梦和前途放在第一位，没有把人性尊严和程序公义放在首位。说到底，这正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奴化教育和一党专政体制下的胎毒。后来的30年，他之所以能步步高升，平步青云，

当然跟他的政治后台和伴随的权钱交易脱不了关系。

在正定县他遭遇的第一个困境，是妻子柯小玲要求习近平尽快出国聚会。柯小玲是中国驻英大使柯华的女儿，其母张明也是陕西人。他们在北京夫家“几乎日夜吵架”。习近平当时还不到 30 岁，正在奋力提升为县委书记，要“土仕途”，还是去“洋插队”？想来如此人生决断，不是他个人能做出的，大主意当然是其母齐心拿出，最后是“孔雀东南飞”。

习在正定 3 年多的时间里，高扬是省委第一书记。其间，胡耀邦强调在开国元勋中的后代中培养人才，但这些青年同志一定要有地方、部队基层生活锻炼的经历。由习近平主导审核的 6 集文献纪录片《习仲勋》，透露了习近平能从村支书升级为总书记的全部秘密，在于父亲习仲勋自 1981 年起曾主管中央组织部 9 年。1982 年 9 月习仲勋当选为 12 届中央政治局委员，负责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习仲勋给省委书记高扬打过一个电话，请省委关照一下儿子习近平。没想到高扬在省委会上把习仲勋的电话公开了。这是习近平终生难忘的教训。乔石在 1982 年至 1985 年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并在 1984 年 4 月至 1985 年 7 月兼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乔石曾派中组部青干局负责人赴河北和正定县对其进行了考察和外调。习近平进入了中组部 1984 年的第三梯队——省部级干部后备名单。中央组织部屡有建言，让习进入河北省常委，但都被高扬婉言拒绝。高扬的意见是习才 30 出头，在基层还没干上几年，不急于提拔，这样对年轻人发展有好处。最后由习仲勋和项南酝酿，中组部就于 1985 年 6 月直接将习近平空投到福建省厦门任市委常委、副市长。以至于，1985 年 5 月习近平到省委向“高扬伯伯”辞行时，快人快语的高扬语近调侃地说了这样一句话：“你是中央管的干部，来去自由，不用向我辞行了。”习近平听了这番话，感到十分尴尬。

此后，高扬在中央的会议上曾数次提及此事，语言犀利，不留情面，认为中央这样选拔干部太不正常，是不正之风的表现。高扬非常清廉正直。河北某县盛产一种羊角椒，是闻名中外的特产，曾有一个中央大佬的儿子找到他，想不经过外贸部门，自己搞一批便宜的羊角椒出口换汇，高扬却说：“能为我们省农民种的特产找到出口门路，我们欢迎，但这么大的买卖，我这省委第一书记怎能管呢？请你通过外贸部和我们省外贸联系吧！”这就是盛传一时的“辣椒事件”。高扬 1987 年任中央党校校长，当 100 岁老校长高扬 2009 年 3 月去世时，正在担任中央党校校长习近平却不闻不问。正可谓恩怨分明，有仇必报。

4. 习近平在福建被捉奸

1988 年习直接被任命为厦门市长。可惜习近平名声不好、政绩不佳，居然没过厦门人大的等额选举所需的 50% 选票。结果被迫易地为官，1988-1990 年任宁德地委书记和宁德军分区第一书记。在那里荆福生和周金伙成了他的死党。荆福生得到习近平的一路提拔，直至出事，被丢车保帅。2005 年 10 月，原福建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荆福生被中央纪委“双规”。荆于 2007 年 9 月被法院认定受贿 766 万余元，判处无期徒刑。

习近平 1990-1996 年任福州市市委书记，起初提出了福州人的“福州梦”——到 2000 年福州市整体经济实力达到同期的广州市水平。然而，八年后福建人大失所望！据国家统计资料，福州市 GDP（国内生产总值）2000 年为 1003 亿元，而广州市 GDP 2000 年为 2492 亿元：福州经济总量只是广州的 4 成。深圳市 1992 年 GDP 是 317 亿元，2000 年为 2187 亿元，基本接近广州。可见，如下真功夫改革，“福州梦”可以实现。但习近平主政福州，媒体雷区处处，官员争相腐败。习近平在福州的政绩平平，1996 年全国卫生大检查，在三天的卫生大

检查中，福州市几乎关掉所有的小吃店和大排档，以应付检查；在轰动全国的“福州首富”陈凯涉毒案，习近平更是难辞其咎。1997 年，为配合当地政府开展“禁赌月”活动，福州晚报社文化部记者顾伟采写了多篇有关老虎机泛滥的报道，陈凯的“地下”老虎机游戏厅被曝光。当年 11 月 29 日晚，在顾伟一家人外出时，他家阳台上的一块玻璃被子弹击碎，一个塑料衣架被打断。顾伟的爱人还接到一个匿名电话：“请转告顾伟，不要再乱写‘老虎机’的报道了，今天算是个警告！”说完，对方就把电话挂断。尽管在全国媒体报道和关注后，这个案子成为福建省督办案件，但直到今日仍未告破。福州市民普遍认为此案与陈凯有关，但 1998 年陈凯依然成了福州市第九届政协委员。看来，共产党确实代表富翁的利益。2003 年 5 月，号称福州首富的福州凯旋集团董事长陈凯被批捕，福州市委原副书记吴文达等一批福州官员因为与“陈凯案”有牵连而纷纷落马。这类腐败大案在当时的福州频频出现，如“亿元公安局局长”——福州市公安局副局长王振忠携带两个女警察二奶和绝密文件于 2001 年 9 月逃往美国；福州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宋立诚 2003 年被双规。

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迷上佛教和气功并相信超自然力量。习近平 1996-1999 年 8 月任福建省委副书记、1999 年为代省长、2000 年 1 月任省长。1999 年底，一些老年人在省政府前请愿，而警卫并没有干预，这些都是已经退休的老干部，在省政府前请愿，表达他们反对习近平出任福建省省长。习的政绩不如贺国强（1996—1999 年任福建省省长）。习近平在福建的得票记录一直不佳。1997 年 15 大时他候补中央委员得票倒数第一，2002 年 16 大时他中央委员倒数第二，福建代表很多都没投他的票。早在 2000 年 1 月，远华案清查还未有阶段性结果之时，习近平就以省长的身份向一家亲共港媒发布消息：境外有媒体报道原福建省委书记贾庆林的夫人林幼芳涉案，“纯属无中生有”！此言立刻被国内官媒迅速报道。

被捉奸。习近平妻子彭丽媛是军旅女高音歌唱家，为共军总政治部歌舞团(妓女团)团长。彭比习小 9 岁，1962 年生，山东菏泽人。1986 年底经赖昌星的朋友介绍与习近平相识，1987 年 9 月 1 日两人在厦门结婚。她工作单位在北京，每周两次飞福州与习近平交配，维持所谓的“夫妻”关系，专车接送，也不知道耗费了多少民脂民膏。1991 年习近平看上了梦雪，关系发展迅速。1991 年底，梦雪和习近平曾被突然回福州的彭丽媛捉奸在床。从此，开始了习彭的长期分居生活。而梦雪与习近平也就更明目张胆，索性假戏真做起来，相传她为了习近平和丈夫离婚了。梦雪 1989 年在沈阳人民广播电台开始了她的主持生涯，她主持的《热线点播》成为收听率极高的一档节目。1991 年梦雪只身南下福建，在中国华艺广播公司主持的《华广服务台》获得了全国对台宣传广播大赛一等奖。1997 年，她获得了全国主持人金话筒大赛的铜奖。《梦雪时间》后改名为《相约名人坊》，是福建东南电视台收视率最高的节目之一。自 1997 年创办至今，它一直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与欢迎。这些事福州人都曾津津乐道。不过后来也许政治前途要紧，此事不了了之（钱肯定没少花）。

5.假博士习近平

芦笛说：习总是个文盲。他因为家运国运两不幸，少年失学，甚至据说一度流落街头，饥寒交迫，混到十七八岁都还跟明朝那几个太子一般，什么文化都没有。后来上大学是所谓“工农兵大学生”，过来人都知道那是咋回事，与扫盲班也差不多。可就这种文盲，居然也是“博士”，虽则博士论文的枪手是谁早已被网民“人肉”出来，连照片都高悬网上了。

这个“工农兵学员”拥有“法学博士”头衔，因为他在 1998-2002 年在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

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在职研究生班”学习而获得“博士学位”。在此期间，习近平正担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省长，2002 年被调任浙江当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等。有这些重要职务，一定公务繁忙，他怎么到北京听课？繁重的省务和党务，习近平即使夜以继日、废寝忘食也不会有足够时间自己完成博士论文。按照《清华大学授予博士学位实施办法》明文规定：“申请博士学位的人员必须已获得硕士学位，并在获得硕士学位后工作 5 年以上。”习根本不符合条件，怎么拿了博士学位？1954 年出生的福建人陈希是习近平大学同学，两人不仅同班，而且同一宿舍，睡上下铺。毕业后，两人各奔前程，陈希之后担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习近平则在福建打拚。习近平作为省级干部，要捞个论文博士，易如反掌。别人为了拍他的马屁，也会送个“博士”给他。陈希在习近平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后，立即被调到教育部当副部长。此后，习又让陈希当了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就是想通过他掌握人事任命的主动权，打造自己的队伍。网友们认为，习的博士就是利益交换的产物，完全是似三鹿奶粉一样的产品。而这样的“伪人”就当上了中国的“国家领导人”。

习近平的博士论文从未正式发表过。据习近平生平履历介绍称，他于 2002 年 10 月在出任浙江省副省长、代省长，并于同年，在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在职研究生班获法学博士学位。2002 年是习近平仕途中关键性的一年。此外，这份题为《中国农村市场化研究》的论文也似乎与法律、法学毫无关系！

按惯例，在中国获得博士学位，在国家图书馆都可查到其博士论文。网友查出习近平的法学博士论文是《中国农村市场化研究》。习近平的博士论文指导教师是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负责人刘美。这位女教授一生研究马列，怎么能“指导”“法学博士”？网上没有查到习近平的“博士论文”全文，只有一个不到 500 字的中文介绍，其中说，习近平的博士论文“通过对农村三大现实难题（货往哪里卖，钱从哪里来，人到哪里去）产生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由此揭示了研究和解决农村市场化问题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刘美教授真是有能耐，居然从农村的“货往哪里卖”里，就能“指导”习近平“分析”出一个“法学博士”来。有学者分析还发现，仅从学术角度讲，长达 161 页的博士论文不但漏洞百出，而且缺乏原始调研结果；论文很可能是综合一些中共官方调查报告和一些外国研究成果之后，由一组人汇后合成的。习近平在博士论文中感谢了三名学者和一名研究员“给与极大帮助”。论文还注明参考了 97 本中文和 26 本英文书籍。而且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职研究生班”，怎么就可以授予正式的“法学博士”学位？除此之外，习近平是否真正拥有独立完成博士论文的学术能力也遭到质疑。习近平在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失去了正常就读中学的机会；而后来获得的只是一个“工农兵学员”大专学位。

习近平的博士论文被指疑由福建学者刘慧宇代写。从香港移居挪威的作家钟祖康在香港的《主场新闻》网站撰文指出，经过他详细审视覆阅之后发现，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博士论文《中国农村市场化研究》，与现今福建江夏学院经济学院教授和副院长刘慧宇的博士论文《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农业发展》，有至少 3 处惊人相似的地方。钟相信，刘慧宇当年是习近平出掌福建时的一个小下属，“以其学术专长帮了习近平一把”，因此两篇论文惊人雷同，绝非是巧合。钟祖康指出，习近平在出任福建省长期间，日理万机，但仍可以按时在 2001 年年底呈交博士论文并获通过，并且早于 2001 年 7 月就已经把与该博士论文的定稿极其接近的 16 万字初稿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不仅如此，他还在这段读博期间，出版了另外四本署名著作，其个人魄力令人赞叹之余，亦让不少人怀疑习的论文是抄袭之作，只是苦无证据。

钟祖康表示，习的论文与刘慧宇教授的论文至少有 3 处惊人雷同的地方。雷同之一：习文第

102 页：“三是要减轻农业税赋。近年来农业“四税”增长幅度有过快的趋势，以福建省为例，2000 年全省农业“四税”为 16.89 亿元，比 1998 年增长了 12.9%，农业税赋增长幅度高于同期全省财政收入增长幅度 1 个百分点以上。在农业“四税”中，农业特产税达 8.60 亿元，占了一半以上，所占比例也在全国居高。农业税赋过重，增长过快，农业特产税比重偏大，不仅影响农产品的出口创汇，也影响农业发展后劲。要结合农村税费改革，对农业“四税”特别是农业特产税作适当调整。”刘文第 208 页：“（3）要减轻农业税赋。近年来有些地方农业“四税”增长幅度有过快的趋势。如福建省 1999 年全省农业“四税”为 16.78 亿元，比 1998 年增长了 12.1%，农业税赋增长幅度高于同期全省财政收入增长幅度 1 个百分点，也高于全国农业“四税”占财政收入比重的平均水平（全国为 4.3%，福建为 5.4%）。要结合农村税费改革，对农业“四税”特别是农业特产税作适当调整。”

雷同之二：习文第 102 页：“四是要建立农产品贸易风险防范机制和农产品出口生产发展基金、出口风险基金及储备金等，及时帮助广大农民和农业企业及其他经济组织防范参与国际农产品市场竞争可能遇到的风险。”刘文第 208-209 页：“（4）建立高效的粮食安全储备系统，将粮食依存度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提高粮食安全水平；建立农产品贸易的风险防范机制，为广大农民和农业企业及其他经济组织参加国际竞争提供可靠保护。”

雷同之三：习文第 102 页：“扩大农业对外合作与交流，利用国外的资金和先进技术促进农产品国际市场竞争力的提高。扩大农业对外开放和交流，是能够利用国外的资金和先进技术促进农产品国际市场竞争力提高的有效措施。加入 WTO 后，在扩大农业对外合作与交流方面要突出抓好以下几项工作：一是要抓住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受农产品生产成本上升和资源不足的制约，寻求到国外去投资建设生产基地的有利时机，进一步加大农业的招商引资力度，积极改善农业投资环境，因地制宜地制定吸引外商投资农业的政策，吸引外商来我国投资举办农业企业和参与农业综合开发。”刘文第 209 页：“扩大农业对外合作与交流，利用国外资金和技术促进农村市场化建设扩大农业对外开放和交流，是连接国内外两个市场、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的重要措施，能够有效地促进国内农产品市场和农业要素市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进一步加快农村市场化建设的步伐。加入 WTO 后，我们要抓住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受农产品生产成本上升和资源不足的制约，寻求到国外去投资建设生产基地的有利时机，进一步加大农业的招商引资力度，积极改善农业投资环境，因地制宜地制定吸引外商投资农业的政策，吸引外商投资兴办农业企业和参与农业综合开发。”

钟祖康又说，习近平的博士论文呈交日期是 2001 年 12 月，初稿很不寻常地先在 2001 年 7 月出版，刘慧宇教授的文章出版日期是 2002 年 9 月（封面的名字也很奇怪地变成刘惠宇）。表面看来，刘教授的著作稍微后出，似乎是她有抄袭习总著作之嫌，但钟祖康认为，情况未必如此，而且可能恰恰相反。钟特别指出，刘教授曾在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人民政府、宁德市政协和宁德市人大先后任职 10 年，而就在这个期间，时为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在职修读清华大学的博士课程。而习近平 1988-1990 年期间，曾担任宁德市地委书记。通观全局，当时习、刘二人因而结识，绝不出奇。钟表示他曾尝试“百度”一下两人有何关系，搜寻结果是“搜索结果可能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未予显示。建议尝试其他相关词。”他说，中国雅虎、搜狗、搜狐等中国搜寻器情况一样。

钟祖康指出，习近平当时在福建省已经呼风唤雨，而刘慧宇只是他的一个小下属，按常理，除非关系极其亲密，刘岂敢抄袭习近平的博士论文。其次，刘本身是科班出身的经济金融科研人员，在这方面应不太把习近平这方面的著作放在眼内。钟的结论指出，较合理的解释是，

当时刘小姐以其学术专长帮了习近平一把，但在处理自己的著作时，在把文字搬来搬去时，对自己曾为他人做枪手代写的文字失去警觉性，以为还是自己的。

习近平的这篇大作匿名寄给一位理论界的朋友评价该文的质量。他的回信，全文如下：“一龙兄：这是一篇典型的中国式博士论文，套话连篇，空洞无物，言不及义。农村市场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可以说囊括农业经济中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各个领域。论文实际上只讲了农产品市场化问题，根本不谈农业经济中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人（劳动力）和土地（所有权）。城乡二元化的户籍制度限制了农村劳动力的市场化，土地的公有制限制了这一主要的生产要素的市场化。翻不过这道坎，现代化市场只是一句空话。你说呢？”

6. 江泽民给李先念的二奶送蛋糕

江泽民的扶摇直上完全是靠溜须拍马达到的。1986年，他曾在雪中站立4小时给国家主席李先念的二奶送生日蛋糕，获得李先念的赏识。

政坛上的人都知道这样一个规律，凡是对下级对民众越狠的人越是巴结上级。其实这两个截然不同的表现都是为了达到同一目的——掌握更大的权力、控制更广的地盘。

做为上海市的市长有着得天独厚的上爬优势，就是中共党内大佬中的几个重量级人物都喜欢到上海休养。江泽民要上北京觐见这些人，求爷爷告奶奶也不容易见上一面，这送上门来的好机会江又怎肯放过。1986年冬季，国家主席李先念又来上海，住在宾馆里。一天晚上召见了江泽民，并且一起吃了饭，席间无意中提到那天过生日。江泽民对中央几位大老们的生日早都牢记心中。江泽民边吃心里边纳闷，李先念的生日他背得滚瓜烂熟的，明明是“1909年6月23日”，怎么在冬天过起生日来了。当时中国还没有“包二奶”这个词汇，但如《毛泽东的私人医生》中所记载的高级干部的生活作风问题却非常普遍。有人说彭德怀被打倒并不是因为大跃进的问题，而是他反对“中南海文工团”。彭德怀公开讲“我不反对毛主席和周总理跳舞，虽然我自己从来不跳舞。但是跳舞就跳舞吧，干嘛一定要为陪中央首长跳舞就组织一个中南海文工团，尽弄些年轻漂亮的姑娘成天关在这里。老百姓知道了是要骂娘的！”中央一级的高干几乎人人如此，李先念自然也不例外。他在上海有个小老婆，是护士出身，不但对李体贴周到，还为李生了个儿子。江泽民明白了，原来不是李先念的小老婆过生日就是小儿子过生日。江泽民当然知道这份礼非送不可，谁都知道“枕边风”最硬，尤其是“偏门风”更硬。江泽民本来是为了讨伐胡耀邦的事而来的，没想到又出了这么件事。他压住自己的懊恼情绪，边吃饭边小心翼翼地打探李先念对胡耀邦的看法，当他听明白李的态度后，马上态度诚恳地表示李老的话使自己终生受益，自己坚决按照李老的指示办。李先念大悦。饭后江泽民不敢久留，因为还有一件“天大的事”没有办。

当司机送江回家后，问他还有什么事情可办，江说没有了，让他回家。望着车子渐远，江料定司机不会再看到他，连家门也没进，立即偷偷出去买了一个大蛋糕。虽然天色不早，江还是毫不犹豫，未带任何人，自己坐计程车再次去宾馆。这时李先念正在接见别人，警卫看见江又来了，好心叫他进去，江摇摇头，恭立在门口。不巧的是那天天气寒冷还飘着雪花，而江泽民历来车接车送，第一次去只穿了一件薄大衣，而第二次没想到会在外面站那么久，所以冻得哆哆嗦嗦。警卫看江冻成这样子，多次叫他进去，江只是笑笑一言不发。江知道这样更能讨得李先念和他的小妾对自己的好感。手提着蛋糕的江站了整整四个小时，被接见的人

还是没走，江后来在警卫的多次劝说下，只好把蛋糕留下，失望地回去了。

李先念的访客走后，警卫把蛋糕送进去并说江在外面恭恭敬敬站了数小时之久。李先念一时感动得不行，连声说：“小江不错，现在这种人很少啦！”库恩在《江泽民传》中写道：“江对李照顾得异常周到，以至于出现了一个毫无根据的谣言——说江泽民是李的女婿。”这样的付出最终使江泽民在“六四”前夕替代赵紫阳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中共无官不贪，权钱（色）交易比比皆是。前公安部部长助理郑少东抓住了 57 位副部长级别高官的把柄。文革中，有人揭发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乱搞女人等问题，林彪为之辩曰：“要注意政治大节，不要纠缠于生活小节。”周恩来称邱会作是最好的后勤部长，这也是毛主席的意见。通奸不论职位高低权力大小都会被谴责，通奸面前没有特权，这就是普世价值。中国人被灌输，领导通奸是小节。这就是中国特色。可见，中国特色维护的就是特权。

生活上放荡淫乱的李岚清当中共十五届政治局常委期间，跟着江泽民干了很多坏事，而且利用职权乱搞男女关系外界反响太大，多次被迫做检查。2001 年江泽民当政期间，山东泉城济南揭发出一起涉及 40 亿人民币的大案，此事轰动全省，惊动了中南海。经查其中至少有 10 亿元被李岚清的儿子吞掉。这贪腐大案死罪，在江的干预和保护下化为乌有。

7. 胡锦涛、胡春华的“投名状”

共党入伙者，必须有血债、有人命，必须贪腐，必须贪婪，必须久经考验，必须以强暴民意来捍卫党意。他们均递了“投名状”。1983 年 8 月，胡春华入藏，并先后在共青团西藏自治区组织部，《西藏青年报》社，西藏饭店工作；1987 年出任共青团西藏自治区副书记。杨振宁、胡锦涛的父亲都被中共整死，二人都媚共！况且，胡锦涛早就与其父划清界限，得以荣入清华学府，文革中毫发无损，仕途一帆风顺。1985 年 7 月胡锦涛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1988 年 10 月下旬，胡锦涛通过对话平息了贵州大学游行怒潮。

1959 年十四世达赖喇嘛引领 8 万藏人，翻越喜马拉雅，走上流亡之路，开创了西藏自由运动。当雪域藏地蒙受千古未有的大劫难的时刻，班禅大师选择与族人一起承受沐浴在血海泪滔中的地狱之苦，不弃不离，同生共死。1962 年 24 岁的十世班禅写出《七万言书》并交给中共。这是一本用藏人的血和佛的泪写成的藏人大悲苦之书。《七万言书》中记述了中共在灭佛运动、大屠杀、大逮捕、大饥饿过程中犯下的人性泯灭、魔性如炽、兽性疯狂的反人类罪行，也记述了藏人经受的地狱之苦。1964 年在拉萨举办的一次万人宗教祈福大会上，班禅大师乘共产党给他的所谓最后挽救机会，向世人宣示“西藏曾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达赖喇嘛是西藏的国王；现在，西藏人民有独立的权利；西藏必将恢复独立。”班禅大师当场被中共逮捕，遭受了 15 年的地狱之苦。胡耀邦 1980 年在视察拉萨郊区时，亲眼目睹西藏人民极为恶劣的生活状况，骇异万分地问：“中央援助西藏的专门拨款都扔到雅鲁藏布江里去了？！”他留下这么一句话：“这完全是殖民地的做法！”胡耀邦对西藏的指示是，苦干几年，将西藏人民的生活水平恢复到 1959 年水平。在胡耀邦力主之下，中共恢复了班禅大师的政治地位。十世班禅大师承担起当代西藏佛教复兴运动领袖的天职。十世班禅是当代西藏佛教复兴运动、藏文化复兴运动、西藏复国运动的精神领袖和发起人。自 1984 年以来，他一直在各种场合表示，希望中共能彻底地检讨数十年来在西藏地区的种族灭绝政策。

中共寡头集团很快就意识到班禅大师的所作所为威胁了共党的集权统治。他们对班禅大师的忌讳如下：1.班禅大师在藏人中有崇高的威信，此威信建立于班禅亲自关怀藏人的命运之上，比如，亲手为当时 85%以上的藏人摸顶祈福。班禅大师在藏人中的威信甚至达到了一呼即应的高度。2.中共对班禅大师的政治立场一直有深刻的疑虑。比如，班禅大师撰写《七万言书》，1964 年高呼西藏复国，1987 年在人大会议上公开建议实施“藏区自治”。3.班禅大师一直关心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并多次插手拉萨的示威游行事件，从轻发落参与者等。

1987 年 11 月在邓小平家的客厅里召开了决策杀佛会议。会议的参加者有邓小平、陈云、李先念、薄一波、宋平。杀佛会后不久，中共元老寡头集团就确定两名主持执行“特别处理班禅”方案的人员，即温家宝和胡锦涛。温家宝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和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候补）。恰恰这两个机构是中共中央的执行机构，温家宝的职位则横跨中共中央两大执行机构。宋平向邓小平推荐胡锦涛出任西藏自治区书记。胡锦涛依靠胡春华协助。

中共决策杀佛后，邓小平指示对班禅大师进行最后的拯救工作，即放弃自己的主张而回到中共的立场上，但遭到班禅大师的拒绝。因此，对班禅实施“特别处理”的方案已经开始有条不紊地启动。1988 年一年中，中共官方媒体都围绕“班禅大师同我党同心同德，坚决反对分裂主义”的主题，作出大量报导；中共还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名义公开发布决议，为 1964 年曾加在班禅大师头上的“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蓄谋叛乱”三项罪名平反。这是他们采取的完全抹去把将来班禅之死同中共的政治阴谋连接起来的所有可能的疑虑。

1988 年初秋，温家宝、胡锦涛、由温家宝推荐的中共高层主治医生王敏清、胡锦涛推荐的胡春华在北京召开了一次关于“特别处置”行动的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最终确定了王敏清选择的对十世班禅大师的用毒方案。王敏清推荐周美珍承担施放毒药的任务。

1988 年 10 月 30 日，阎明复专门电召胡锦涛从贵阳进京，一同进藏考察半个多月。1988 年 12 月 18 日，中共对外宣布胡锦涛为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1989 年 1 月 17 日，班禅在日喀则扎什伦布寺主持迎接五至九世班禅遗体入灵塔仪式，22 日又主持了班禅东陵扎什南捷开光大典。在一次款待胡锦涛的晚宴上，十世班禅痛斥了中共在西藏的统治，胡锦涛对此深感震惊。1989 年 1 月 27 晚，胡锦涛、温家宝主持，孟宏伟、胡春华执行，周美珍对班禅大师直接实施下毒行动，51 岁的十世班禅大师于 1 月 28 日凌晨在西藏日喀则扎什伦布寺圆寂。因为死得很突然，西藏人心震动，传闻四起。据透露，辞世后的班禅大师怒目瞪天，现大威德金刚状；肤色乌黑，似经火焚；面如紫檀，鼻孔流血，显系被鸩而亡。

中共的西藏书记胡锦涛、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共青团的西藏副书记胡春华以及现任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当年冷血合作谋杀了十世班禅大师，暴露了中共的黑手党本质。1992 年，胡锦涛的杀佛助手胡春华被胡锦涛提拔当了共青团西藏的书记。2006 年 12 月胡春华调回共青团中央，接替周强出任团中央第一书记。2008 年 3 月胡春华任河北省省长。在胡春华就职河北省长不久便发生了李家洼煤矿特大矿难瞒报事件。紧接着又发生了震惊全球、影响深远的三鹿奶粉事件，因事件最初被河北省政府掩盖，胡春华成为媒体和舆论质问和抨击的焦点。胡春华不仅没有受到惩罚，反而平步青云，被内定为习近平的接班人。2009 年 11 月胡春华任内蒙区党委书记。在内蒙任职期间，内蒙发生了因牧民被卡车轧死而爆发大规模的抗议，胡春华施行铁腕镇压。2012 年 11 月胡春华晋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2013 年 8 月，台风使广东各地洪水暴涨多成泽国，京广线因洪水和泥石流中断。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和省长朱小丹带队考察广西、湖南，对省内灾情不闻不问。胡春华之所以深得太子党信任和倚重，

全在于他为中共杀佛，即毒杀十世班禅的过程中立下“不世之功”。杀佛之“功”使胡春华获得了中共赐与的“铁帽子王”。胡春华的例证表明一条中共官场的潜规则——每一个登上高位的中共官员，都要以为中共犯下不可饶恕的反人类重罪作“投名状”。薄熙来被囚之后，立刻发出威胁，声言如果判处他死刑，他就将在法庭上揭发胡锦涛、温家宝、胡春华等人毒杀十世班禅的罪行，并要求以杀人罪对这群“杀佛”罪犯实行逮捕，提起公诉。薄此言一出，中共庙堂震撼。中共当局遂以薄熙来之子的生命作筹码，与薄达成黑幕交易——中共当局留薄熙来一命，薄熙来则在中共毒杀十世班禅大师的问题上保持缄默。

1989年2月7日清晨，拉萨大昭寺正殿上檐上挂出了“雪山狮子旗”，引来许多人围观。这一事件使中共政府极度紧张，胡锦涛于次日召开了西藏党政军负责人紧急碰头会，商量对策。2月8日夜，拉萨市武警二分队受命前往大昭寺摘除“雪山狮子旗”，当他们到达时，旗帜已经消失，武警方面遂下令二分队进入大昭寺“追查反革命”。9日清晨，武警从寺中带走了20余人，并警告寺内堪布主持：如果再有挂旗事件，将查封大昭寺，全寺僧人将悉数被逮捕。10日上午，大昭寺派人召集了哲蚌寺、乃穷寺、色拉寺的堪布主持及西藏宗教界头面人物数十人前往区政协，要求1）尽快释放被捕僧人，2）向大昭寺赔礼道歉，3）将武警闯寺时拿走的寺内物品归还大昭寺。4）对于拉萨武警部队勾结拉萨工商局人员在八角街的违法乱纪行为，再次提出了大量证据，要求有关方面从严查处。

由于当局未及时做出良性回应，1989年2月13日到3月初，拉萨又出现了4次反共示威，西藏的日喀则、那曲等地也出现骚动，气氛异常对立，街头巷尾的甜茶馆渐渐成为藏民“谈论国事”的场所，诅咒30多年来中共对西藏的残暴政治。1989年3月2日上午，拉萨大昭寺正面的人民广场上群众示威，并用藏语高呼：“坚决要求严惩迫害宗教人士的凶手！”“处死杀害藏人的武警”（指在1988年3月5日被武警打死的7名喇嘛和13名藏人）！……

3月5日中午12时，由13名喇嘛和尼姑组成的队伍正沿着转经道走向人民广场。在人民广场上，由一名喇嘛打开雪山狮子旗，慢慢地举了起来。这时，从八角街里涌出了无数藏人，估计有好几千人，加上以同情态度围观、喝彩的，有上万人之多。广场上沸腾起来，人们跟在旗帜后面，声嘶力竭地呼喊反对中共的口号。居高临下的武警士兵们也握紧了冲锋枪。中午1:40，武警部队开始向人民广场发射催泪弹，人群大乱，骚乱的人群集中反击了八角街与北京路上的政府机关、学校与商店，特别是汉回个体户，商品与设施几乎全部被砸抢烧。胡锦涛未事先请示中央，就以西藏党委名义，强令西藏军区警备团和驻拉萨武警总队开枪镇压。他下令开枪的时候还恶狠狠地说“出了问题我负责。”3月6日凌晨，武警临时指挥部向各镇压单位下达开枪令。6日上午，武警用自动火器“铺天盖地地向八廓街藏人射击”，密集的枪弹把藏人当作活靶。1989年3月7日国务院下令从3月8日零时对拉萨地区施行戒严。胡锦涛以文职人员的身份，头戴军用钢盔、手执自动武器，赫然出现在大屠杀第一线，视察了戒严部队。邓小平看到报纸上胡锦涛头戴钢盔的照片称赞说：“他在原则问题上立场站稳，决不手软。”拉萨屠城，杀了4千藏人，其暴烈程度为古今中外所罕见。

胡锦涛，这个平常拘谨呆板，微笑总像不会凋谢的塑料假花一样挂在脸上的人，竟会如此凶狠，连一些中共的老军头都感到惊叹。其实，胡锦涛的表现完全符合奴性人格的逻辑。在长期尊严被践踏、情感被压抑的奴性人格中，都如深海暗流一样涌动着盲目报复的阴狠兽性。事后，中央军委和武警总部的一些高级将领对于胡锦涛未经请示中央就调动部队十分不满，要求对胡锦涛作出处分。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当1989年北京发生民主运动时，邓小平把胡锦涛的拉萨屠城经验复制到北京。“六·四”屠杀后，胡锦涛是最早表态支持党中央的三位

省级领导人之一。六.四事件不仅使胡锦涛完全摆脱受处分的可能，而且使他受到邓小平的垂爱。邓小平决意用自己沾满六.四之血的手，把权力交给手上沾满藏人之血的胡锦涛。西藏大屠杀显示胡锦涛无所不用其极的魔鬼性格。正因为锦涛敢于镇压人民，所以，邓才把负有血债的锦涛选作第四代接班人；只有如此，邓死后才不会因六.四血债受到清算。

胡锦涛进中南海后为保住接班人地位，六亲不认，甚至置其从小养大的孤独养母于不闻不问，十几年未去探望她。江泽民当权时代，当地政府要拆其养母刘秉霞住房，刘抗议说是胡锦涛住过的房子希望保留。当局请示胡锦涛，他不施援手，不近人情地说“你们要拆就拆，房子不是我的，是她的。”可见其人性泯灭到了什么程度，只有老奸巨滑的周恩来可比。

随后，中共当局制造伪十一世班禅，并失踪了达赖喇嘛扶植的真正的十一世班禅根敦曲吉尼玛及其家人。习近平说：“达赖现在穷得只剩下转世灵童这个‘宝贝’了”。根据习近平的指示，中共当局正在设计和实施一个政治阴谋，即将达赖喇嘛诱骗回中国，以便将来控制达赖喇嘛的灵童转世过程。一位中共太子党核心成员声称：“现在我们已经控制了十一世班禅，如果再能把达赖喇嘛诱回国内，我们就等于捏住了西藏这头野牦牛的两个睾丸……”

2009 年以来迄今为止，已有 122 位藏人点燃自己，把燃烧的生命作为神圣的祭品，献给自由西藏的理想；自焚藏人有许多是花季的少年男女。从藏人自焚中腾起的一团团金焰在拷问人类的良知；艾未未评论说：“西藏是拷问中国、国际社会人权和公正标准的最严厉问卷，没有人可以回避，可以绕过去。目前为止，没有人不受辱蒙羞。”藏人为什么自焚已成了世纪之问，《杀佛——十世班禅大师蒙难真相》作出了明确回答——藏人不得不用燃身献祭的方式争取自由，根源在于中共的国家恐怖主义统治和文化性种族灭绝政策。

自焚是当地人对中国在藏区实施高压手段的一种自发性抗议。自 2012 年，在甘南藏族自治州内有 20 多人自焚，其中许多是在拉卜楞寺所在的夏河。在该寺附近的几个商铺内，悬挂着达赖喇嘛的肖像。悬挂达赖喇嘛像从前是严格禁止的。店主说，因为藏人不满，当局 2013 年春天放松了管制。嘉措的堂兄说：“我们藏族同胞多数想法是达赖能回来，见个面，我们磕个头，这样我们心里放心。所有人的想法都是一样。”中共曾通过一纸和平协议，允诺在西藏实行“一国两制”。然而，中共统治西藏 60 余年，藏人的命运在血海尸山间伸展。十世班禅大师曾经发出“勿使佛教灭亡，勿使雪域之人灭绝”的大悲之声，然而，藏人正濒临文化灭族的大劫难。现在，中共又企图再用“一国两制”来诱骗台湾放弃主权。藏人的前车之鉴，台湾人不可不察；“今日的西藏，就是明日的台湾”。

8. 江湖暗斗

中共 13 大有一条“秘密决议”：“党内重大问题最终由邓小平掌舵”。正因为是“秘密协议”，所以要求中共党内不得外泄。而当年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曾对外透露了幕后决策人是邓小平，因透露了不该透露的消息，而最终成为被邓整下台的原因之一。

众所周知，中国老百姓手中没有选票，中共领导人的上任一贯采取暗箱操作，邓小平不仅指定了江泽民作为自己的接班人，还隔代指定了胡锦涛。

邓小平为了证明自己在党内地位的合法性，不惜自降辈份，把自己称为共党世袭王朝的“第

二代”，御赐江泽民为“第三代”接班人。严格地说，应称为第几届政府才合情合理，因为这一个“代”字的称呼，整整隐去了胡耀邦、赵紫阳的十年执政，让中共改革的黄金时代成为历史的空白。中共现在每天都在高喊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其实中共才是最大的历史虚无主义者。1992年初春邓小平在乔石的安排下乘专列南巡深圳，准备在中共 14 大更换高层，撤换江泽民、李鹏，让乔石当总书记。江泽民立即转舵效忠邓，邓小平随后中了江泽民和曾庆红的阴谋毒计，加上陈云和薄一波反对撤江，邓小平也只好放弃了原来的主张，打消了撤换江泽民之意，并且废除了杨氏兄弟的军权。但邓小平内心深感江泽民靠不住，就给江泽民安排了接班人——49 岁的胡锦涛。邓破天荒地确定了双接班并相互制约的制度。邓小平于 1992 年 10 月 6 日给中央政治局写过一封信，谈到了对中央军委人事安排的意见：“今后主要由刘华清、张震两位同志在江泽民同志领导下主管军委的日常工作。将来挑选接班人的工作，需要熟悉军队的人来承担责任。”这条指示为江泽民钦定习近平做了铺垫。

1992 年 10 月 19 日，邓小平与出席中共 14 大的全体代表见面，领着政治局其他常委与胡锦涛握手拍照。照片中邓胡居中，江泽民居后。但江泽民对胡锦涛的这样一张私人照也受不了，觉得自己遭到矮化，有失总书记形象，因此派人把自己和其他人物都抹掉了。中央办公厅后来交给胡锦涛的照片背景成了一片黑，照片中只剩下邓小平和胡锦涛两人。14 大后，横空出来一个胡锦涛，各界议论纷纷。江泽民和曾庆红密令情报部门对胡锦涛的一举一动进行严密监视，同时收集有关他的所有资料，以备后用。胡锦涛自然深知自己所处位置上所面临的风险，处处小心，从此过着漫长的谨小慎微的“王储”生涯，艰难地熬着日子。

按照 1992 年中共 14 大的内定，江泽民在 2002 年的 16 大上要全面交权给胡锦涛。可是，2002 年的 16 大上江泽民却当起了太上皇，军权未交给胡锦涛。团派气愤填膺。

田凤山 1983 年在中央党校学习时与胡锦涛同寝室，二人遂结为兄弟；田凤山不仅给胡锦涛出谋划策，而且亲自出马替胡皇储找二奶妃，最后找来了黑龙江电视台的女主持王艳萍。田凤山不仅给胡锦涛拉皮条，为了能拉住胡锦涛，不失时机地给胡锦涛的秘书令计划拉皮条。黑龙江歌星陈红先后同田凤山、原全国人大秘书长曹志及令计划睡觉，才保住了其父的官帽。

2003 年 1 月 17 日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在黑龙江遭遇的那场广为人知的车祸，实际上是胡锦涛策划的。胡锦涛原打算让自己死党田凤山在 16 大当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组织部长，控制高干人事升迁，将省部级干部全部换成青帮人。谁知江泽民提拔了西部地区的重庆书记贺国强当政治局委员兼中组部长，胡锦涛无可奈何之下，便打算让田凤山转道国务院，在 3 月人大当副总理取代曾培炎并兼管发改委，从而有效监控温家宝和国务院，必要时踢掉温家宝让田凤山取而代之，使胡能“政令畅通”。令计划接旨后找了在黑龙江经营多年的田凤山，以及田凤山在黑龙江的铁杆老部下、黑龙江公安厅厅长陈有财（陈有财女儿陈红也是令计划的二奶），制定了详细的暗杀计划。当曾培炎的车队行至绥化附近时，黑龙江省公安厅警卫局负责保护曾培炎的警卫车队早已跑得无影无踪了，只剩下一台警备车在曾培炎的座车前护卫。突然，走在曾培炎车队前的那辆警备车发现前面公路上停着一辆四轮大货车，由于速度快，刹车已来不及，于是，警备车与那辆大货车相撞，随后，曾培炎的座车也由于速度快而与前面的警备车发生猛烈相撞而翻出了公路。曾培炎和随行警卫生命垂危。幸亏抢救到位，才保住了生命。主谋之一的田凤山，最终被以贪官名义查处而坐牢。田凤山曾求过黑龙江电视台女主持人、胡锦涛的二奶王艳萍救命；湖北某报刊报道了此事，结果湖北那家报刊被惨遭停刊。胡锦涛便将田凤山原先贪污受贿上亿元的数字缩水到 500 万都不到。2011 年，胡锦涛亲自批示将服刑不到 7 年的田凤山以脑出血的名义“保外就医”。田凤山被双规、坐牢后工

资照发、中办国办配给的房子、车子待遇都没有取消，因家在万寿路住，所以最近找他买官的人又陡然增多。这可真是：“买官卖官不要命，只因总书记是后台。”

1989 年六四前夕，江泽民在当时泰安市委书记宋法堂（后高升至黑龙江省省长、省委书记）的陪同下去了泰山，泰山碧霞寺当时正好挂有牌匾“宏德泽民”，其道长更预言江有帝王之像。江回上海后不久即上任总书记。江退位后就来到泰山还愿。

2000 年 2 月，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在广东考察，并在茂名高州市首度发表“三个代表”讲话后，随即赴深圳考察，张高丽被江泽民看中。张高丽从深圳市委书记被江泽民一路提拔到山东、天津直至政治局。张对江自然是感激零涕。2006 年已退位的江泽民要登泰山，主政山东的张不顾正值“五一”假期，下令泰山“封山两天”，不仅主峰不能攀登，在登山线路以内的未进山的景点也不许人靠近。当时泰安空前紧张，几条街道戒严，造成交通阻塞，公交车线路更改，人们假期出行苦不堪言。张当时将整座泰山封闭，并让泰安市全套班子成员，以及济南所有的厅级以上干部列队欢迎，更称“江泽民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最敬爱的伟大领袖”，将江与伟人毛泽东放在同等位置。又特备八人大轿，抬江上山，自己则紧跟其后“护驾”，恍如古代皇帝出巡。当时胡锦涛本打算将张先调往中石化后再双规，无奈考虑到江还实际掌握军权，只得忍让。从这件事可以看出，胡称不上一代帝王，只能属于“江泽民后期时代”的人物。盲人陈光诚因揭露野蛮计划生育，2006 年被山东地方法院判刑 4 年 3 个月。山东的中共头子张高丽及其得力帮凶，针对一名坚持说真话的盲人一家所干出的丑行，将成为人类未来有记忆的时代的永远被唾弃的丑恶记录。

2001 年 5 月 17-24 日，时任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在安徽考察工作，期间江登上黄山写了首诗，以下为最后几句。《登黄山偶感》：“遥望天都倚客松，莲花始信两飞峰。且持梦笔书奇景，日破云涛万里红。”这首诗的问题就落在结尾一句：“日破云涛万里红”！此处的太阳是江泽民自比，而他心中欲破的“云涛”无疑就是胡锦涛。也只有他破了胡锦涛，才会有曾庆红的“万里红”。而此时的江泽民，尚未卸任总书记，却已经有此想法。

2006 年“五一”期间，退而不休的江泽民在山东省委书记张高丽的陪同下出游山东泰山等地，胡锦涛也在这个时候秘密到达青岛，视察北海舰队的一场军事演习。当胡乘坐北海舰队最先进的一艘导弹驱逐舰到黄海时，突然有两艘军舰同时向胡乘坐的导弹驱逐舰开火，当场打死驱逐舰上 5 名海军士兵，导弹驱逐舰立即载胡疾速驰离舰队演习海域。胡锦涛立即换乘舰上的直升飞机飞回青岛基地，胡未作停留，也未回北京，直飞云南，新华社曾报导胡的行程，11-15 日胡锦涛在云南考察。胡锦涛 5 月 16 日回北京后，采取的第一个行动是保外就医陈希同，旨在反击江泽民上海帮；胡第二个行动就是以反腐败搞倒海军副司令王守业。事后调查发现，攻击胡锦涛的命令是时任海军司令员张定发下达的，而张定发是江泽民在军中的铁杆亲信。同年 12 月，军方低调披露海军司令张定发病逝的消息。

2006 年 9 月拿了陈良宇，下一步就是江泽民的长子江绵恒了，这可是要命来了。江泽民的手下就反击了，派人暗杀胡锦涛的儿子胡海峰未果。胡锦涛退缩了。2006 年，胡锦涛儿子胡海峰所注册的公司，轻易“中标”中国民航总局机场安检扫描工程价值数十亿的合同，进而在北京奥运会前，席卷全国 147 个机场的安检扫描工程；2009 年，胡海峰公司卷入纳米比亚贪污案件，该公司三名负责人被纳国警方逮捕，曝光胡氏父子利用对外经贸合同收受巨额贿赂的国际丑闻；维基解密披露，胡锦涛本人“包二奶”，对象是中央电视台一名女主播，年龄比胡的女儿还小；而四川大地震之日，胡锦涛因与二奶午睡过头而耽误救灾 4 小时！

共党集团内部黑帮似的争权夺利、相互倾轧和殊死格斗从来就没有停止过。2007 年 10 月 2 日，上海世界夏季特殊奥运会在上海隆重开幕。胡锦涛出席开幕式并宣布运动会开幕。港媒披露，这次又发生了对胡的暗杀未遂。保卫部门在胡锦涛下榻的上海西郊宾馆地下车库内发现在食品专用车的司机坐垫下藏有 2.5 公斤装有定时器的烈性炸药。

自江泽民 2002 年延任两年后，其全部精力放在培植军中实力上。江还霸道地在军委“八一大楼”里常设“江泽民办公室”，不仅保持庞大编制，而且一天 24 小时全天候运作。军委任何的决策，从军事驻防调动到人事任免，都必须在“江办”汇报及备案。相比之下，同一幢楼内的胡锦涛“军委主席办公室”则异常冷清。

到了 17 大，2007 年 10 月 22 日，在 17 届 1 中全会上，政治局常委中的江氏马仔再次提出“秘密决议”，内容复制自十三大的“秘密决议”，只是把“邓小平”三个字换成了“江泽民”：党内的重大问题，必须向江泽民请示。秘密决议最终在政治局常委会“全票通过”。

9. 彭丽媛一曲《江山》为习近平上位奠基

一直被视为胡耀邦、赵紫阳盟友的习仲勋，其子习近平为何能讨得中共一大班保守老人欢心支持他作胡锦涛的接班人，放心将中共的江山交在小习手中？这个谜，最近在北京有解答，说是他老婆彭丽媛唱了一曲歌，向老人们交了心，保证会为中共坐好江山。

这首歌就是中共主旋律电视剧《江山》的主题曲，演唱者是彭丽媛。2003 年，中共建党 82 年，中央电视台制作了向党献礼的 29 集电视连续剧《江山》，是一部鼓吹“打天下，坐江山”的封建专制主义剧作，它讴歌了流氓党打败蒋介石，获得政权的历史。主题曲也名叫《江山》，整首歌词是：“打天下，坐江山，一心为了老百姓的苦乐酸甜；谋幸福，送温暖，日夜不忘老百姓康宁团圆。老百姓是地，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共产党永远的挂念；老百姓是山，老百姓是海，老百姓是共产党生命的源泉。老百姓是地，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共产党永远的挂念；老百姓是山，老百姓是海，老百姓是共产党生命的源泉。生命的源泉。”

据说，中共老人们听了这首歌很受用，觉得唱出了他们的心声。而且彭丽媛采用的又是民歌唱法更是讨好。这是延安出来的土嗓子传统，是所谓工农大众的音乐，具有政治正确性。最主要原因是老红军、老八路们喜欢这样的唱法，西式的洋嗓子他们听不惯。所以大陆被官方肯定在政治上大红的歌手都以民歌唱法起家，例如深得中共高官之心的歌手宋祖英，也是以民歌唱法见长。北京政界传，中共老干部中很多是彭丽媛的粉丝，因此习近平能被老一辈认可，老婆的公关作用也不容低估。

江山，也就是国家政权即公共权力。把“江山”视为中共的私产，这是对国家政权本质的背叛。由于“江山”变成了暴力集团的猎物，缺少应有的庄重性，“坐江山”时，自然就可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任意妄为。而且，“坐天下”就是做“老爷”，将人民踩在脚下，或是说一套、做另一套，将人民玩弄于鼓掌之上。人民为“老爷”服务，人民是“老爷”的奴隶。在这样党权无约束、人权无保障的特权社会里，要统治者“一心为了老百姓的苦乐酸甜，谋幸福，送温暖”，要各级领导“日夜不忘老百姓的康宁团圆”，无异于南辕北辙、痴人说梦。为了还共党本来面目，特为彭丽媛改动一下歌词：“打天下坐天下，一心为了黑帮党的一党独大，谋私利争特权，日夜不忘格黑帮里的富贵荣华，老百姓是猪老百姓是牛；老百姓任流氓

党盘剥鞭打；老百姓是犬老百姓是马，老百姓供共产党奴役欺压。”

两千余年来，江山仿佛一种美味猎物，所以古人称打江山争天下为“逐鹿中原”。打江山者坐江山传江山，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共党虽打着社会主义民主的旗帜，实质上奉行的仍是“打天下，坐江山，传江山”的暴力传统。“杀二十万人，保二十年政权稳定”、“要共党下台，可以拿一百万人头来换”等等杀气腾腾的话，就是这种思想的无耻暴露。2009 年国庆，原定请彭丽媛唱《江山》歌的，后来不唱了。因为这帮领导人并没有“打江山”，凭什么要“坐天下”呢？血统世袭？个别人指定接班？还是人民或党内投票的结果？21 世纪的中国，“打江山、坐江山”的思维方式仍顽固地存在，但大多巧为包装，以精心装饰的形态出现，如“四个坚持”、“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之类，企图永远“执政”。就在 2011 年中共庆祝 90 周年举办的大型文艺演出中，重点演唱了《江山》一曲，它典型而通俗的告诉人们，中共“革命”的实质是“改朝换代”，而不是使人民主宰这个国家。

数千年来，中国主导性的政治传统是，打江山者坐江山，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它只承认两种江山：“祖宗的江山”和“打下来的江山”。而所谓“祖宗的江山”最初也是打下来的。江山是打江山者的江山，天下是夺天下者的天下，打江山者传江山，夺天下者坐天下，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独占江山的理由之一，是因为曾为夺江山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而今天的大陆，中共的统治地位是靠 60 多年前的一场国内战争的胜利而取得的，这当然不能成为永久掌权的根据。中共以 28 年流血牺牲作为执政的合法性理由，无法服人。你能暴力打江山，新一代也可以以你们为榜样再搞暴力打江山。那只会导致暴政循环。

况且现在的中共当权者已不具当年战争参与者的资格；仅仅凭借于前辈武功的荫庇而永久地把持政权是违背现代社会基本政治伦理的。父辈们的流血奋斗，和现在执政掌权的人没有直接关系。现在掌权的人自己没有流一点血，所以不能把前人的牺牲奋斗作为自己掌权的理由。中共一直对全党发出的所谓“政权兴衰周期律”这个政治警醒，实际上，“政权兴衰周期律”是专制王朝的政治规律而不是民主政治的规律。“政权兴衰周期律”隐含着一个前提：“打江山坐江山”，权力姓张姓赵还是姓李，即家天下的政权不能丢。拿这个说法警告党员干部防止政权丢失，恰恰反映了传统专制政治文化对中国共产党的深厚影响。

20 世纪以来人类政治文明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根本否定了“打江山坐江山”的意识形态，用“打江山坐江山”的逻辑来说明垄断政权的合法性，在当代很荒谬。

宪政的理念彻底改变了这种江山与天下观。按照宪政的理念，“打江山”者并不能自动取得“坐江山”的天然权利。夺取江山时不论付出多少人命或物力的代价，都不构成可以垄断权力、不征求被治者同意而独霸江山天下的理由。因为每个人的生命属于自己，不属于任何组织和团体，任何人的生命牺牲都不应该成为党魁永久掌权的理由。人人生而平等，没有一个集团天生就“先进”到有权统治人民。民主革命不是将夺取国家权力作为胜利品占为己有，而是把它回归社会所有。江山即国家政权不是某个人或某些集团的私产，而是全体公民的公器。江山人人有份，它事关每个公民的命运，江山所涉及的一切事务皆应由全体公民通过和平、理性的途径协商决定，绝不可由某个人或少数人垄断全体公民的命运。

根据人民主权论，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天下是人民的天下，任何江山都是大家的江山，任何人、任何组织都无权暴力抢夺人民的天下！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有权决定国家由哪

一个党来领导！国家的权力暂时授予谁，由选民说了算！任何政党或个人想要获得执政权，就必须向选民提出申请，并获得多数选民同意才能执政。因此谁治理天下要由特定地域范围内的天下人通过自愿表达来决定，表达意愿的方式是自由公正的投票与定期的竞争性选举。政党存在的价值不是领导人民，而是服务于大众；政党应接受民意的选择，而不是相反。国家是否由某党执政，这只能由人民自愿抉择，决不能用所谓的宪法来限制人民选择执政党的自由。宪法的权力来源于全民，那么共党领导人民的权力是从哪里来的？从“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原则根本推不出。1982 年中共国的宪法第 2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载明了“人民主权”条款，而不是宣布“一切权力属于共产党”。这意味着民大党小、民主党仆，党只有服从人民选择的义务。一个党能否执政、执政多久，是不应预先在宪法中规定的。宪法和法律中不得规定某个政党拥有未经全民选举就有领导全国的霸权——强盗权。廖祖笙指出：中共的江山是抢来的。“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这好比说有人在大街上抢了一家店铺，就自订了一条店规：凡是在我这个店铺屋檐下的男女，就必须遵从我的颐指气使。这一“必须”，是一种强盗逻辑，对国人不具说服力。

10. 江泽民保习近平

习近平和贾庆林二人都是 1985 年到福建任职，当时习是厦门市副市长，贾庆林是福建省委副书记，贾是习的顶头上司。从 1986 年始，贾以省委副书记之职兼任省委组织部部长，他对中共高层重点关注红二代可谓心知肚明。正是在贾庆林的直接提拔下，习在福建政坛急速提升。习在 1990 年任福州市委书记，只有 37 岁；1993 年跻身省委常委，只有 40 岁；1995 年贾又提拔习担任福建省委副书记，奠定了此后在政治上腾飞的基础。

太子党曾庆红、习近平都是北京 101 中学的校友。在曾庆红的大力提携下，2002 年 10 月习近平从福建省省长的位置上，直接调到中国经济重地浙江，担任浙江省委省党委副书记、代省长，并被推荐给了江泽民。习近平 2003-2007 年任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习近平任浙江省委书记时曾有镇压杭州萧山家庭教会的人权劣迹。2006 年 7 月底杭州萧山基督教家庭教会的教堂被当局强行拆毁，3 千民众在场抗议，和警方发生冲突。当天，共有 50 多人被扣留，许多人遭到殴打。6 名教会领袖被关押。其后 8 人被控“煽动暴力抗拒法律实施罪”等罪名分别判处三年六个月到一年不等的刑期。事件迅速成为国际头条新闻，根据报导，在中国几千万基督徒与当局之间的长期抗争中，这次冲突是最剧烈的一次。家住杭州的记者咎爱宗因为在网上揭露了这一事件受到牵连，后来被报社开除。

习近平 2007 年调往上海任市委书记前，新华社浙江分社披露杭州湾跨海大桥出现建筑偷工减料问题，可能危及大桥质量。杭州湾跨海大桥 2008 年北京奥运开通，是全球第三长的跨海大桥，是习近平最自豪的政绩。习近平看到这则新闻后大怒，深夜招记者问话。记者知道闯祸，向家人同事做了可能坐牢的交代。习近平面色凝重，斥问他为何要写这篇报导？记者回答据专家所说，杭州跨海大桥一、二十年内不会出问题。习近平马上转怒为喜，说不再追究。这件事似乎说明习近平无非也是一个庸俗政客。只关心个人的仕途政绩，而不在乎百姓的长远利益，挟如此心态，哪会有勇气与中共利益集团决裂？

2004 年，江绵恒被查出肾癌，在上海摘除了一个肾。尽管钱他是贪足了，但是在中共政治权力的角逐上，他却落成了一个让江泽民扶也扶不起来的残废，这对江泽民原来的权力如意

算盘是致命的打击。据说，江绵恒住院的一个多月期间，陈良宇竟然一面儿也没露过。直到出院那天，才匆匆赶来，说这么大事怎么不告诉一声，又抖落出一堆借口，说自己忙得不可开交。江泽民冷冷回答，孩子生病没必要惊动市委书记。陈良宇当然听出了话里有话，急忙申辩，自己确实不知道动手术一事，并表示今后在治疗方面，他全力而为，绝无二话。不久，江泽民带着儿子到杭州去养病。据说，在 4 个月里，陈良宇没有去过杭州探望过帮主，而且更加急切、露骨地上海组建以自己为中心的新上海帮。江帮主对此感觉窝囊透了。习近平却格外殷勤，每天向江泽民嘘寒问暖，豪爽地用珍藏 80 年的茅台酒，招待江泽民全家一行。这酒一瓶零售价就是 8 万元人民币，他们一宴能喝几个 8 万尚不知道，反正不会自己买单。江泽民此后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上海度过。江在上海期间，习近平每两周一次，一定会从杭州奔赴上海，说是看望老人家，向江讨教与汇报，对江来说，毫无疑问，习忠心可鉴，手腕圆滑，可以保护党内不同派系，值得重用。后来陈良宇翻船，是江通过政治影响力表明态度，希望习近平到上海任职。2007 年 3 月习任上海市委书记。

习近平无论是主政福建，还是浙江工作时期，习近平留给当地干部的印象，是平庸，没有太多的主见，更不要提有什么洞察力。如果硬要找出习近平比他人有什么较突出特点的话，当地干部对他的唯一评价，就是食不厌精。此人好美食，这一点，可以从其大腹翩翩上看出，虽然人只有 5 多岁，但腰围已经赶超江泽民，自己低头是看不见自己的裤腰带与脚尖。就是这么一个在能力上与见地上十分平庸的人，十七大竟然可以越过政治局，直接进常委会。

习当时既非江系，又非胡系人物，因而双方认为他是一个可以接受的妥协对象。一般认为：习近平的上台是基于中共元老与江泽民的一场交易：1992 年邓小平要废掉江泽民另立总书记，陈云、薄一波、李先念、姚依林等元老把江保下来，但要求江让元老子弟接班，在胡锦涛退位之后由一个元老后人接任总书记，因此习是中共元老安排的保江山的人选。

从 2003 年到 2006 年，中共内部开始酝酿下一任总书记的人选。这一时期，李克强将接任总书记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在 2006 年以前，一般认为，李克强一旦出任政治局常委，则陈良宇会继续任黄菊留下的国务院常务副总理的空缺，并可能在 2013 年出任总理，如朱镕基当年的政治路径。然而由于陈良宇案东窗事发，原来江、胡两大派系已经形成默契的政治格局被打破，胡提前打掉了未来的总理人选，造成了江也不可能容忍胡定下的总书记人选顺利接班。2007 年，在太子党官僚当中，符合年龄段的，当上部长的就是习近平和薄熙来。江派本意要推薄熙来上位，但在 2007 年 6 月 23 日邀请 200 余名权贵假设性投票中，薄在最后几名。习近平得高票，李克强的得票连前十名都没有进，李克强的支持率连张高丽都不如，江泽民即以此为理由提出习近平是下任总书记的更好人选。习近平上位虽然受到江泽民力撑，但不同于邓小平钦点胡锦涛为隔代接班人，而是党内高层以一人一票推举未来领导人，是中共“党内民主”的一次突破。可以说，没有江的支持，习近平不可能坐上这个位子，因此习近平新任总书记首篇讲话提江泽民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表达感恩。

11. 习近平抢班夺权羞辱胡锦涛

17 大时薄熙来也变成政治局委员但是发配出北京。薄熙来对习近平上位不服，在重庆“唱红打黑”，闹出后来的薄熙来事件。胡锦涛手下的团派大将，李源潮、李克强、刘延东、令狐计划、汪洋、刘奇葆等，内心里不会服习近平。官场内已经有许多对习的不利传言，说什么习近平在福建、浙江的政绩平庸，讲话没水平。甚至传出习阳痿（或梅毒），所以与太太

彭丽媛长期分居，但却极好美食。这分明是骂习近平是个吃货、饭桶、无用之辈。

习近平进入中央后的表现欠佳。第一，习近平为了树立自己老婆未来第一夫人的形象，来达到树立自己伟大领袖形象，竟然唆使老婆彭丽媛做公益广告；第二，连地震天灾也不放过，习近平夫妇竟然教唆自己只有十六岁、生活还不能完全自理的女儿，到地震灾区去什么支援救灾，并让媒体大肆宣传；第三，2009年初，墨西哥访问爆粗口，毁了胡锦涛精心在世界舞台上树立的彬彬有礼谦和的国际形象；第四，习近平为了挽回自己外交败笔，竟然策划上海国安局在李克强访澳前夕抓捕澳洲国际矿业公司力拓的高管胡士泰，破坏中澳关系。

习近平在2009年6、7月间，突然写信给中央，说，自己来中央工作感到不堪重负、力不从心，想来想去还是觉得适宜在地方工作，希望中央能作出安排，使自己可以集中精力造福一方。这当然是面子话，实际是向胡锦涛索要军委副主席之位。2009年9月15-18日，中共17届4中全会召开，北京军区司令员房峰辉因为没得到军衔的提升而发难，改变全会确认的议程和习近平担任军委副主席共识，显然与胡锦涛团派利益不谋而合。《苹果日报》的评论员说，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17届4中全未能晋升中央军委副主席，意味着胡锦涛在2012年的中共18大只会半交班，只交总书记和国家主席。香港《明报》孙嘉业的评论认为，虽然江泽民在胡锦涛接班后延任了2年多的军委主席，但从他1989年就接任军委主席起，任军委主席长达15年，以此标准，胡锦涛的军委主席延任到2017年，似也不为过。

2009年10月1日国庆60周年大典，江泽民的风头盖过了胡锦涛。

2009年10月12日，正在德国进行正式访问的国家副主席习近平12日同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了会谈。会谈开始前，习近平向默克尔转交了江泽民撰写的有关能源和信息技术问题的两本英文版专著，并转达了江泽民对德国国家领导人的良好问候和祝愿。真是咄咄怪事：现任党和国家领导人胡锦涛和温家宝与默克尔有过多次交往，习近平以国家副主席身份访德会见总理默克尔，理当转达胡锦涛和温家宝的问候。可是习近平以国家副主席身份转达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从未谋面的、早已下台的江泽民的问候。这不公然羞辱中国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吗？习近平这一行为等于向全世界宣布：无任何领导职务江泽民才是中国真正的最高的领导人，说一不二；胡锦涛不过是个摆设、是个花瓶而已，不值一提。

有一个十几年前的老段子名曰“五子治国”为证。大意为，江泽民是个戏子，李鹏是个傻子，朱镕基是个疯子，李瑞环是个痞子，胡锦涛是个孙子。胡锦涛在江泽民时代自然是忍辱负重当“孙子”，然而在他执政的十年中又何尝有一天真正摆脱“江核心”的乌云罩顶？江泽民吹拉弹唱样样行，李鹏又蠢又笨。胡锦涛既呆且狠，人称“面瘫帝”。江泽民哪是戏子？分明是个婊子！朱镕基也不是疯子，他分明是装疯卖傻，乃是一个真戏子。温家宝作秀功夫精湛，被誉为“中国影帝”，似乎比江“戏子”提高了不知多少段位。吴邦国什么“五不搞”六不碰的，流里流气。李长春、周永康一文一武，满嘴谎言，杀气腾腾。

《三国演义》中诸葛孔明骂死王朗的那段精彩之语，恰可作为今日中国的写照：“庙堂之上，朽木为官，殿陛之间，禽兽食禄；狼心狗行之辈，滚滚当道，奴颜婢膝之徒，纷纷秉政，以致社稷丘墟，苍生涂炭。”极权社会逆向淘汰，劣币驱逐良币，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这个体制容不得良心，正人君子难免沉沦下僚，边缘化，被排挤。

2010年1月5日，习近平出席全国基层党建工作手机信息系统开通仪式，并通过全国基层

党建工作手机信息系统，向全国 100 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大学生“村官”发出问候短信：“全国基层党建工作手机信息系统今天正式开通！我代表党中央，向全国的基层党组织书记、大学生村官致以亲切的问候！习近平”。当年早就是政治局常委的军委副主席胡锦涛哪敢擅自公开说“我代表党中央”！习近平现在连军委副主席都不是，居然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说“我代表党中央”！胡锦涛只能保持沉默，很容易被理解为“默认”。习近平擅自盗用党中央名义一事绝非孤立的偶然事件，是他背后的后台实力雄厚、藐视胡锦涛、力推习近平 18 大接班党总书记军委主席的一步棋，一次社会舆论。

在 2010 年 10 月 18 日的五中全会上，习近平被宣布当选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习近平出任军委副主席之后，很快形成了军中太子党势力，提拔刘少奇之子刘源为共军总后勤部政委，提拔李先念女婿刘亚洲为国防大学政委、原国防部长秦基伟之子秦卫江出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委任胡耀邦女婿刘晓江为海军政委，习仲勋老部下陈仿仁之子陈勇被提拔为总参谋长助理。在自己的几位军中铁哥们儿协助下，习近平马不停蹄出入军中。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就走访了七大军区中的六个军区，还密访了武警及二炮总部；他不但亲赴成都指挥了最先进的“歼 20”战机的试飞，而且登上即将出海试航的航母考察。身为军委副主席同时又是沈阳军区出身的徐才厚，陪同习近平到沈阳军区走了一圈，暗中指示沈阳军区干部向习近平效忠。叶选宁曾主动把习近平和徐才厚拉到一起，请徐才厚多多关照自己的“哥们儿”习近平。到 2011 年下半年，军方就开始不断传出“欢迎习副主席领导军队”的声音。用军方的说法，习副主席曾经当过兵，了解军人，说话实在，不玩虚的。从 2011 年起已响起了一片反对胡锦涛继续留任军委主席的呼声。特别是 2011 年春天南海危机爆发，军方指责胡批准给越南的 500 亿美元低息贷款被越南用来购买大批先进俄制战机，从而改变了南海军力对比，导致越南对中共采取强硬立场。为此，军方总参谋部、海军、空军相继发声要求胡引咎“裸退”。在倒薄熙来事件中，叶选宁又将海外 3000 太子党伏兵名单移交给习近平。

12.胡锦涛企图紧握军权操控习近平

胡锦涛、江泽民恶斗进入白热化，团派定下“僵尸行动”计谋，准备毒死逼死累死江泽民。2009 年国庆，江泽民阅兵中计累成一场大病，生命垂危。2011 年 6 月下旬江泽民高烧，因为治疗不当，病情恶化。正是中南海吹风会向人民日报、新华社，透露消息，让这两家龙头媒体在 301 医院周围租房子，等报“特大消息”。2011 年 7 月 1 日是中共 90 周年党庆，中央退休的大佬都出来亮相，唯独江泽民没有出来。海内外媒体猜测：中共前领导人江泽民去世了而秘不发丧。7 月 6 日晚间，香港亚视报导江泽民死了，山东省委马上在官网首页显著位置以黑底白字公开刊登“敬爱的江泽民同志永垂不朽”，并配了江泽民的照片。7 月 7 日中午，新华社英文版发布消息称“江泽民病逝消息系失实报道”，被看作是中国官方正式对外辟谣。随后，亚视正式承认报导错误和道歉，山东新闻网的领导都受了到了处罚。香港亚洲电视台事后除了撤下报导还公开向观众、江泽民和其家人致歉，而且撤掉撤职了该台新闻部主任的职务。该新闻部主任说，是北京内线爆给他的消息，他以前报道北京内线提供的消息都没有失手，这次却被忽悠了。外界估计是胡锦涛团派以此假消息吓唬江派。10 月 9 日，江泽民出席辛亥百年大会，且身体状况未如传闻般差。原来，江泽民高烧的原因——是江泽民在家乡吃的野生鳖携带的寄生虫所致，药被立即从日本送来，江泽民便痊愈了。

2011 年 7 月 10 日，胡锦涛乘江泽民病重之机，将多位年轻的将领调升高职。新任总政副主任吴昌德是胡锦涛宿意培植的军中团派人物，胡锦涛希望在习近平之后由胡春华接任党国元

首职位，而吴昌德则是辅助胡春华执掌军中大权的重臣。

胡锦涛借此机会稳固自己的大权。在 2012 年 1 月 10-15 日，中共军队一些高级将领纷纷出来讲话挺胡锦涛。1 月 10 日主管总政治部的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到“全军纪律检查工作会议”作总结讲话，明确地要求全军“旗帜鲜明地坚决维护党中央、中央军委和胡主席权威，一切行动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胡主席指挥。”梁光烈在北京军区、国防大学强调，确保部队的安全稳定，并要求深入学习贯彻胡主席国防和军队建设主题主线的重大战略思想，严密防范各类事故案件的发生。总政治部主任李继耐也公开强调，要做好党的十八大有关军队组织的人事准备工作，坚持不懈地抓基层打基础保稳定。这些将军们都是江泽民提拔出来的，直到 2011 年，这些将军都不会讲这些话，现在突然之间一批将军都出来讲话，为什么？

胡德平说：“因为江泽民要死不活了，而这些军人又要跟着一个新的主子走，新的主子就变成胡锦涛了。从这些报导里面感觉到，江泽民与胡锦涛的斗争恐怕现在在下降，而胡锦涛跟温家宝的斗争正在上升。这些将军们为什么要跟着胡锦涛走呢？因为这些将军在江泽民手下这么多年，手脚都是不干净的，各有各的一本帐；你现在要换届了，换届了以后中央政治局要换，连中央军委都要换，换过以后那这些现任的中央军委、头头脑脑们他们担心退下去了以后的安全问题？谁能保证他的生命财产？所以要赶快找个主子，投靠胡锦涛。那么人们问为什么不去投靠温家宝？他们不敢，因为温家宝要求的是政治改革，一政治改革的话，你这些将军、头头脑脑们所有干的肮脏的事都会曝光，所以军队就靠到胡锦涛这边来了。胡锦涛拼命压制温家宝，但又不敢公开整他；因为老百姓要求改革，胡却停在那里不想进行全面的改革，一些教授们就号召大家支持温家宝，用社会的力量推动政治改革。”

温家宝在 2012 年 3 月 5 日首次直接提到“党对军队的领导”。胡锦涛在两会上再次强调“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胡、温还要军队人人表忠心，“听从胡主席的指挥”。以此来压周永康。3 月 12 日，胡锦涛出席人大共军代表团全体会议，同行的还有中央军委副主席习近平，各大军头全部出席。胡在讲话中强调：“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为此，胡锦涛准备在军中清除江派，确保未来可以操控习近平政权。

13. 蠢驴胡锦涛保朝殃民丧权

1992 年后，邓小平奉行抛弃朝鲜的政策，不顾朝鲜反对抓狂，中国 1993 年与韩国建交；江泽民追随邓小平，也没给朝鲜多少援助。但胡锦涛却睁眼无视现实的巨变，仍然恪守毛泽东时代的“抗美援朝”过时信条，一切从共产意识形态出发，处处强调“鲜血凝成的友谊”。胡锦涛上台不久，就下令对朝鲜大施无偿援助。邓小平对朝鲜基本不闻不问，江泽民时期，朝鲜内外交困濒临崩溃，中国也只是每年以 3/4 市场价，定量供给朝鲜粮食和能源，较少无偿援助。2002 年金正日秘密访华，开口就要 30 亿美元，江泽民大怒，未予接见。2003 年金正日再访北京，受到胡锦涛的拥抱和极度热情的接待，胡、金订立中国援朝第一阶段 5 年协定：从 2005 年起到 2011 年，中国每年无偿援助朝鲜 20 亿美元，其中 10 亿美元能源、粮食、轻工业产品，另 10 亿美元由朝鲜自行选货，其中还不包括供金家在中国购买奢侈品的数亿人民币提货券；中国也只是每年以 3/4 市场价，定量供给朝鲜粮食和能源，追加 150%。

江泽民对胡锦涛与金正日订立巨额援朝协定一事不满，江打电话告诫胡锦涛说：勿与朝鲜走得太近，以免影响中美关系，胡锦涛当时虚心地满口接受，但阳奉阴违。

袁腾飞：“新华社的稿件全世界都不予采纳，只有两个国家，伊朗和北朝鲜。我们和地球村的几个无赖关系特好。”在胡锦涛巨额无偿援助的骄纵下，朝鲜骄气日盛、贪得无厌，金正日死后，新上台的金正恩要求把每年的无偿援助增加到 36 亿，遭到习近平的拒绝。

朝鲜 1985 年就加入了《核不扩散条约》。1993 年 2 月，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曾发出过一个决议，要对朝鲜核设施进行强制性的“特别检查”。但是这个时候朝鲜以“国家安全”为由宣布退出《核不扩散条约》，3 个月后正式生效，“朝核危机”第一次爆发。美国还是很对得起朝鲜的，就是说，拿一系列的援助和补偿来换取朝鲜不研制核武器。

2002 年，饿死两百万人、内外交困的朝鲜宣布要发展核武器，引发国际轰动。在胡锦涛的授意下，中共国于 2003 年在北京推出马拉松式的“六方会谈”，胡锦涛当局打着朝鲜半岛“和平”、“非核化”的幌子，一方面为放松对朝制裁、为朝鲜捞取外援斡旋，另一方面以朝鲜为战略棋子，威慑韩、日，牵制美国。在胡锦涛的忽悠下，美国总统小布什对中南海的诚意深信不疑，认认真真地当着中、俄、韩、日四方，在北京与朝鲜举行了六轮会谈，一直谈到 2007 年，朝鲜通过会谈搞到了大量的韩国援助，为显示诚意，小布什还于 2007 年作出了朝美关系正常化的承诺，并将朝鲜从“邪恶轴心”国的名单中划去，但收获的竟是：朝鲜于 2006 年、2009 年两次核试验、变本加厉地印制美钞，并向中东反美势力输出武器和导弹技术并出尔反尔退出“六方会谈”！小布什政府的对朝政策遭受耻辱性的失败。

2002 年时朝鲜还没有核武器，“六方会谈”后三年就成功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朝鲜的核武能力何以能在西方国家的严厉制裁中突飞猛进？中南海的深喉透露：2005 年胡锦涛密令中国国防科工委特遣人员，援助朝鲜制造核武器和开发导弹技术。当时下令出台“反分裂国家法”，预备对台湾陈水扁当局动武的胡锦涛认为：朝鲜核武取得突破性进展，能够把美国牵制在东北亚而不敢卷入台海战争。这就是为什么朝鲜第一次核爆后，国际社会反弹强烈，而中国胡锦涛当局一味干嚎“各方克制”且始终强烈反对国际制裁的根本原因。

2006 年朝鲜撕毁“六方会谈”协议第一次核爆后，正在上海疗养的江泽民大怒，打电话质问胡锦涛，此时陈良宇已垮，胡锦涛的口气硬了起来，振振有词地说：“朝鲜与我们有共同的意识形态，朝鲜拥有核武器，美国就不敢轻举妄动，这有利于中国的国家安全！”江泽民气得撂下电话当着身边人大骂：“糊涂！什么共同意识形态？国与国之间只有利益！他拎不清把原子弹给朝鲜，还不被人家吃定吗？蠢！”

为什么在朝鲜问题胡锦涛荒唐若此？据透露：胡锦涛的思想观念，完全停留在 1950 年代，他对毛泽东的对朝路线深信不疑；而且胡锦涛对朝鲜有一种类似于宗教的情感，胡上台伊始，就号召干部学习朝鲜的一党专制和领袖独裁，学习它的党员“党叫干啥就干啥”，学习它对社会的严格控制，学习它对公民言论自由和人身自由的完全剥夺。他曾在私下里说：朝鲜饿死两百万人照样稳定、士气高昂，中国经济发展这样快还出了“六四”事件，现在整个社会思想混乱，党员干部的信念丧失，党的权威受到空前的挑战，事实证明朝鲜政治上是正确的，我们在意识形态上是失败的。从此种信念出发，胡锦涛不仅坚决反对政治改革，甚至否定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他唯独钟情于朝鲜、古巴。2004 年 9 月 19 日，胡锦涛发出指示：“管理意识形态，我们要学习古巴和朝鲜。朝鲜经济虽然遇到暂时困难，但政治上是一贯正确的。”胡锦涛因此被自由人士鄙视：“政治白痴，人权恶棍，法盲，政治精神分裂症患者”！但胡锦涛又是非常现实的政客，在没有取得绝对的权力之前，他从不会高调推行他的理念，

以免招致党内强烈反弹。这就是为什么他的一切倒退政策，都低调实施的根本原因。

胡锦涛一厢情愿地把朝鲜用作战略棋子，但朝鲜却不甘心充当中国对抗西方的走卒，通过与胡锦涛的接触和了解，朝鲜高层决心吃定胡锦涛的恋朝情节，于是于 2009 年宣布退出“六方会谈”，开始两边讹诈：对中国“出轨”频频，我行我素，勒索更多援助；对美韩则加大挑衅力度，以加大谈判筹码，换取西方“息事宁人”的让步。2009 年，朝鲜悍然再次试爆核弹，激起国际社会更加强烈的谴责，胡锦涛当局果然硬不起来，在继续反对制裁朝鲜之余，只是弹唱“各方克制”的旧调，不痛不痒地呼吁朝鲜“回到六方会谈的轨道上来”。

2009 年的朝鲜核爆，令奥巴马意识到“六方会谈”的骗局，并立即与日、韩密商对策，完全把中南海抛在了一边。为了掩盖外交失败，胡锦涛索性撕下“斡旋”的假面具，对朝鲜的力挺有增无减。2010 年 5 月金正日访华，胡锦涛竟亲率 8 常委接待和宴请，礼遇规格之高，中朝外交史上空前。在胡锦涛当局的纵容下，金正日气焰万丈，2010 年 3 月 26 日夜，朝鲜军方以潜艇袭击韩国海军，击沉韩国护卫舰“天安号”，韩国海军官兵死亡 46 人。事件发生后，胡锦涛当局一方面竭力强调“证据”，另一方面却对韩国所出示的确凿证明选择性失明，明确地抵制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议案，流露出赤裸裸的袒护朝鲜的流氓立场。

由于胡锦涛的纵容，金正日父子又于 2010 年 11 月 23 日制造“延平岛炮击事件”，动用海岸炮基地向韩国延平岛发炮 170 多发，把延平岛炸成一片火海，韩军也还炮 80 多发反击，双方多人伤亡，延平岛居民沦为难民。事件发生后，美、韩决定在黄海举行联合军演威慑朝鲜，隶属美军第 7 舰队的乔治·华盛顿号航母以及 9600 吨级巡洋舰考佩斯号、9750 吨级驱逐舰夏洛号、斯特蒂姆号驱逐舰、菲茨杰拉德号驱逐舰等将组成航母战斗大队参与军演。在黄海显示如此强大的战斗力量，美国向中南海施压的意思很明显。在“天安舰事件”和“延平岛炮击”事件中始终拒绝谴责朝鲜的中国胡锦涛当局，这时候却异常强硬地表态：强烈抗议美韩军演；外长杨洁篪中止原定于 2010 年 11 月 23 日对韩国的访问；胡锦涛还霸王硬上弓地纵容共军鹰派放话：美国航母胆敢驶入黄海，就将成为中国导弹的靶子！

奥巴马忍无可忍、怒不可遏，亲自通过元首专线电话，以最后通牒的语气警告胡锦涛说：朝鲜这样下去很危险，中国支持朝鲜，也同样很危险！奥巴马还告诉胡锦涛，如不改变对朝政策，美国将重新考虑次年元月胡锦涛的访美安排，甚至重新考虑中美关系。面对奥巴马愤怒的诘责，一开始胡锦涛念叨着党八股套话还欲抵赖，奥巴马早撂了电话。胡锦涛这才害怕起来，尤其担心奥巴马取消他的访美，导致他党内威信扫地，影响到“18 大”抓权。

一时间，中美关系不妙，中南海内早有人通报江泽民，江泽民闻讯大怒，自上海亲自打电话给胡锦涛说：朝鲜问题上你这样做，正在把中国重新拖回对抗美国、国际上自我孤立的深渊，势必葬送“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大好局面！时值胡锦涛急于访美树党内领袖形象，不好与江泽民红脸，而且自己也急于恳求美韩，给自己访美开绿灯，遂不得不屈服于江泽民的批评，请江泽民来主导善后。于是在江泽民的亲自指挥下，求和特使团由国务委员戴秉国匆匆组队，绕开外长杨洁篪，紧急奔赴韩国，以恳求的姿态向韩美求和。下榻首尔后，戴秉国等人摇唇鼓舌地说明：朝鲜炮击延平岛决不是中国支持的行为。因为“六方会谈”和朝鲜两次核试验，早已不信任中国的韩国官员对此种说法，自然深不以为然，于是展开咄咄逼人的质问：既然你们不支持朝鲜，为什么每次事件后都袒护朝鲜？问得戴秉国张口结舌、额头冒汗，退会后紧急向“江办”请示，在江泽民的授意下，戴秉国使出“泄露国家机密”的招数，让手下人向韩国官员透露：中国除了军队系统之外，无论是外交、经贸甚至宣传等系统都已经厌倦了

朝鲜，多次要求和朝鲜做一个“切割”，但问题甚至不在于比较强硬的军队，而在于胡锦涛。目前唯一不松口的就是胡锦涛。胡锦涛对朝鲜情有独钟，死死不肯放手，可他自己又想发展同美国的关系……戴秉国的随从官员还伸出两个手指对韩国官员说，还有两年时间胡锦涛就下台了，习近平上台后，对朝鲜政策会完全不同。知晓中南海的老底之后，美国终于作出让步，把美韩联合军演改在韩国东海（日本海）进行，胡锦涛按计划访美。

2011 年元月，北京寒风刺面，天色阴沉，江泽民在侍从的簇拥下，突然驾临胡锦涛的中南海办公室，与访美刚刚回国的胡锦涛当面沟通朝鲜问题。果然，已经成功访美、且在“十八大”上志在必得的胡锦涛，一改访美前的低调谦和，绷着脸念叨党八股一板一眼地说：“泽民同志，中朝友谊是志愿军的鲜血凝成的，中朝关系是毛主席奠定的，只要中国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抗美援朝的大政方针就不能变。”早有准备的江泽民说：“锦涛同志，你是小平同志指定的接班人，我相信你不会辜负邓小平的托付。小平同志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中国的综合国力能有今天，得自于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路线。对朝鲜的政策也是邓小平路线的一部分，1990 年代小平同志明确地指示：为了改革开放大业，必要时可以放弃朝鲜……”

锦涛争辩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毛主席缔造的，新中国六十年的历史不能割裂来看，不能以小平同志否定毛主席……”江大怒道：“这六十年由前后两个三十年组成！前三十年是教训，“大跃进”、“文革”……统统是教训，后三十年才是成就！关于毛泽东的错误，1981 年中共中央已有了明确的结论，你难道要否定中共中央的决议？”没料到江大发雷霆，胡一时傻了眼，江不依不饶地掷出王牌：“关于朝鲜问题，中央文献室有小平同志在 1994 年 1 月与我谈话的备忘录，我手头也有备份，你和其他同志如果有疑问，我们就有必要组织政治局全体成员，学习小平同志在朝鲜问题上的这个讲话，我们也有必要让报纸公布这份文件。”胡很清楚，江一旦这样做的后果——他将在党内威信扫地，甚至如赵紫阳那样提前下台，忙说：“不用不用，你的批评很有道理，朝鲜问题搞成这样，责任在我……”江乘热打铁说：“今后朝鲜的事情你就不要亲自管了，具体事情让习近平负责，你有更重要的事情要管。”

胡锦涛只得屈从。习近平任事后，对朝大政方针上采取“无为而治”的策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不是因为习近平认同胡锦涛的对朝政策，而是习近平实在不愿接朝鲜问题这副烂摊子，因为“十八”大前费力“纠偏”，功劳是胡锦涛的，费力不讨好不算，还开罪胡皇，危及自己接班人地位。于是索性“无为而治”，反正出了差错由胡锦涛顶着。于是十八大前一年多，中共当局对朝鲜再次微妙起来，既不亲近、也不疏离，态度仿如凝固了一半。

习近平对胡锦涛的对朝政策，早就深为不满。2005 年胡锦涛秘密核援朝鲜的时候，习近平尚在浙江省委书记的位置上，完全蒙在鼓里。“十七”大飞升中南海后，习近平方从刘源那里得知此事，心中大怒，私下里不点名地抨击说：这是养痍遗患、祸国殃民！

比核援朝鲜更令习近平痛恨的，是胡长期掩盖和纵容朝鲜向东北三省输出毒品。朝共种鸦片、贩卖毒品，走私军火、暗杀、绑架外国人，投毒、爆破车辆桥梁，无恶不作。原来，苏联解体后，朝鲜失去了经济靠山，又遭逢特大水灾，效益低下的共产经济体系倒塌，举国大饥荒；为了逃脱灭顶之灾，金家动用国家力量制售毒品，赚取巨额外汇，1992 年金正日亲自将毒品事业命名为“白桔梗事业”。自 1997 年起，北韓在平北、慈江道、两江道、咸北每个市、郡的合作农场都种植了 10 町步（1 町步约合 1 公顷）鸦片，称之为为赚取外汇的“政策事业”。1990-2005 年，政府要求每个集体农庄都要划出 125 英亩土地，专门种植罂粟。朝鲜每年生产 40 吨鸦片，是世界第 6 大鸦片出口国和第 6 大海洛因出口国。朝鲜通过种植罂粟

活动，每年赚取 5-10 亿美元。朝鲜国家制售毒品的最初十年，产品以鸦片和海洛因为主，近年，迫于国际舆论、制裁的巨大压力，朝鲜有计划的缩减了罂粟种植面积，但同时大力发展冰毒(甲基苯丙胺)等新型毒品的生产加工，令毒品生产结构发生根本变化，毒品输出大升级：从 2005—2007 年间中朝边境缴获的不同类型毒品数量变化来看，海洛因从 15.88 千克下降到 3.25 千克，冰毒却从 13.33 千克一跃到 59.87 千克。

由于朝鲜毒品的严重威胁，2000 年江泽民当局投入巨资，在延边地区边防一线建了观察哨（楼），安装大量高科技数字化监控设备，大力加强缉毒警力和防毒教育工程。但胡锦涛上台后，以维护“中朝友谊大局”为由，消极对待针对朝鲜的防毒工程，把中朝边境防范的重点局限在封堵朝鲜“脱北者”方面，并刻意压制一切与朝鲜贩毒有关的报道。2003 年胡锦涛特别指示中宣部，媒体上不能出现批评朝鲜的声音。随后，一切有关朝鲜的负面东西、甚至学术刊物上否定朝鲜的文章，都遭“和谐”。例如：2006 年，辽宁省禁毒总队破获列为公安部毒品目标案件的“4.03”特大跨国走私贩卖冰毒案，摧毁了一个涉及境外及国内多省的毒品走私、贩卖、运输网络。官方报道称，抓获 6 名犯罪嫌疑人、对中国、和日本的嫌犯均公布国籍，独对朝鲜的主犯称“境外某国嫌犯”。胡锦涛上台后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当局高调涉及日本和东南亚等国的贩毒案件，而唯独对远为大量的朝鲜贩毒保持奇怪的沉默。

在胡锦涛的掩盖和纵容下，从 2003 年起，朝鲜对中国输出毒品急剧增长，东北沦为朝鲜毒品的重灾区。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为例，首府延吉市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从 1995 年的 44 人增加到 2010 年的 2090 人，增长了近 47 倍。新华社承认，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人文环境，已成为毒品主要走私通道、中转站、集散地和消费地”。由于深感朝鲜毒品的巨大威胁，从 2003 年到 2010 年，韩国反毒品调查局多次主动寻求与中国政府合作，胡锦涛一直不批准。胡为了扶助朝鲜，不惜让中国替朝鲜背贩毒的黑锅。例如，截至 2006 年初，日本已连续三年没有缴获来源于朝鲜的兴奋剂；但是 2006 年的 1 月，日本警方在横滨，在来自中国大连的轮船上缴获 14 公斤海洛因，最终被认为来源于朝鲜。

对胡锦涛的做法，习近平表面不吱声，背地里痛心疾首。因此，习近平接手朝鲜的第一件事，就是于 2 月下令国家禁毒办与韩国反毒品调查局合作，加强对朝鲜输出毒品的防范；第二件事，就是在习近平的支持下，东北毒品泛滥问题的报道开始见诸报端媒体。

习近平在朝鲜毒品问题上的异动，令胡锦涛大为光火，他担心朝鲜毒品问题的蔓延，会危及到自己“十八大”权力部署。2011 年 2 月份，胡锦涛紧急行动起来，一面再次邀请金正日 5 月访华，并给予高规格接待；一面于 6 月密会刘云山，面授机宜，要求严厉封堵朝鲜毒品上“揭盖子”的任何苗头。2011 年 12 月金正日突然病死，胡锦涛终于按捺不住以朝鲜为师的深情厚谊，披黑戴孝地亲自率领其他 8 常委高规格悼念了一番，哀惜之情如丧考妣，有失大国之风范。2011 年 9 月，胡锦涛密会薄熙来，当面称赞“重庆模式”，并以翌年视察重庆、支持薄熙来“十八大”进常委、出任总理为许诺，暗示薄熙来采取行动搞掉习近平。但目空一切的薄熙来一面满口答应，一面暗中行动起来，买通令计划，拉拢军中将领，监控习近平等多个常委的红线电话。一时间，中南海红墙内，杀机四伏。胡锦涛还当面告诫习近平说，朝鲜毒品应当治理，但问题不能向社会公布，否则会影响稳定大局，甚至影响“18 大”的顺利召开。胡锦涛话中有话，语带威胁，立足未稳的习近平不得不暂时收起对朝新政。

古话说：“人算不如天算”，王立军事件的爆发，引发江泽民、曾庆红、温家宝、习近平的联手干预，薄熙来的政变计划功亏一篑；继而爆出的“法拉利车震门”事件，又扯出令计划勾

结周永康操纵“十八大”的阴谋，导致胡锦涛在“十八大”前夕彻底失败。

14. 习近平击败“党内竞选”的薄熙来

薄和习，一个张狂跋扈，一个阴狠腹黑，但本质相似，有共同背景和思维方式。薄想树立“左派领袖”历史地位，习想“左右通吃”，做新的政治强人，但都是黄粱一梦。

薄熙来 1949 年生，文革初期是北京四中的红卫兵头头曾上天安门被毛接见，在造反狂潮中踢断其父肋骨；文革后毕业于社科院研究生院，文学硕士；1984 年任大连市金县的副书记，1988 年他担任了大连市委常委和宣传部长，1993 年任大连市长。1999 年 8 月 11-20 日江泽民应薄熙来市长之邀走访大连。江泽民的随行秘书和司机，薄熙来以购买土特产经费的名义（一点小意思）给他们每人一张存有 8 万元人民币的银行卡。大连到处挂满了江的大幅画像，但江刚走，其画像就被撕下；更让江不满的是，薄在大连星海广场居然矗立一个大华表，这华表高达 19.97 米，号称是为了纪念 1997 香港回归；远远高过北京华表，其问鼎高位之心，江泽民那时已有觉察。薄熙来于 2000 年 12 月被提拔为辽宁省委副书记，2001 年 2 月任辽宁省省长。2004 年 2 月薄熙来成了商务部部长。原来是准备薄熙来从商务部当副总理，然后接任总理的，这是江泽民给薄一波的承诺，因为 1992 年江泽民差一点被邓小平拿下，是薄一波等政治老人说了好话，江泽民欠了薄家的人情。2007 年 1 月薄一波在 17 大召开前 10 个月去世，江泽民的人情债一风吹了。原来预定李克强当总书记、薄熙来当总理的安排被江泽民推翻，另一个太子党习近平被江选中当总书记（等于江向邓报了自己不能选接班人的箭一仇）。李克强只能当总理。薄熙来的总理梦吹了。再加上温家宝、吴仪都不喜欢薄熙来的专横跋扈，薄熙来只能在 2007 年 11 月到重庆就任市委书记。

薄熙来不甘心被如此安排，开始唱红打黑。薄原计划要在重庆杀 3 千人。他说，不狠狠地杀他一大批，不能建立我们的威严，无法镇服猖狂的黑社会；六四就是杀人太少才使得现在还有人敢于翻案，这种教训必须接受。于是，“打黑”变成了“黑打”，一个 3200 万人的城市，一口气抓了 600 多个“黑社会”，3.1 万人被迫逃亡，当局捕了 5 万多人，被黑判的人数达到了 1.7 万多人。其中大半是合法企业家，这些企业家被判重刑甚至惨遭杀害。这一套恰恰是毛泽东的“打土豪、没收资本家财产”的新世纪再版。薄没收了私有企业上千亿的资产，送到国库只有 9.3 亿，900 多亿的财产在他手里，以此收买要人试图重新入常。

薄熙来的行为受到了胡锦涛的暗中支持。胡锦涛是个非常左的人。正是在胡当权的时期，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基础工程学院”；2006 年在广东视察教育时，他指示要把“文革革命样板戏”列为中小学的必修课；在中共国庆 60 周年大典上又推出了“毛泽东思想方阵”；“唱红”和复辟文革的噪音开始响遍中国大陆……薄本人实际上并不支持毛泽东，他很小的时候家里就受到毛的迫害，他就非常反感毛泽东。他们家甚至做了一个毛泽东的纸人，然后用针扎这个纸人，诅咒毛。那他为什么要搞唱红打黑呢？完全是为了迎合胡锦涛，还迎合一批对社会不满的人。薄熙来的“唱红打黑”是彻头彻尾地做了胡锦涛想做的事。胡锦涛暗中默许和支持薄熙来多次公开顶撞温家宝。胡锦涛不仅在内部会议上屡屡批评温家宝，坚持反对温家宝所提出的反腐败以及政改提议，甚至在公开的场合也多次宣称“一定要非常警惕中共内部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以影射温家宝。但打到温家宝的政治风险是非常巨大的，胡锦涛根本无法承受。这就是胡锦涛一直维持着与温家宝斗而不破的原因所在。

薄熙来对江泽民在 17 大时不提拔他做副总理，早已心存不满，因此薄熙来在 2009 年和令计划建立同盟关系。薄熙来在重庆给令计划的家人一些工程项目。薄熙来和周永康的盟友关系更密切。在薄熙来的关照下，周永康的儿子周斌以及他的伙伴们获取了至少 100 亿人民币的财富。薄谷开来曾向海外转移了 60 亿美元。李长春每次到重庆，薄一定安排至少两个美女陪夜。薄入主重庆期间，在他的办公室更强奸了 20 多名女子。据中纪委所接到的揭发薄熙来淫乱的人民来信统计，被薄熙来所强暴的女性就有 491 人。不过虽然有数以百计的检举揭发信，可是薄熙来根本没有受到任何调查，而且这些检举揭发的信函最终都被转给薄熙来，揭发者要么就是被薄的手下收买，要么就是受到严重威胁而不敢再揭发，要么就是被薄关进监狱。一位被薄熙来下属骗到酒店的未满 16 岁的女子，遭到薄强暴后回家就告诉了她的母亲；这位寡母非常愤怒，找到薄熙来的下属大吵，并写信揭发薄熙来，结果寡母及少女均被说成是法轮功关进监狱，没有几天，女儿便被折磨成神经病，至今还在医院；而母亲则含冤去世。还有一位著名节目主持人，因拒绝与薄熙来苟合，没有几天就失去工作，不久被公安机关以卖淫和贩毒等罪名重判。商人徐明一直为周永康和薄熙来提供女人。在 8 年期间，徐明安排提供了超过 100 女子给薄熙来，其中一些薄熙来和周永康共享。徐明则和她们的多数上床，并支付有关费用。这包括被曝光的明星章子怡。让人吃惊的是，徐明和王立军秘密将周、薄在徐明的北京私人会所进行性交的过程录像。这些录像的复制版由王立军保管。谷开来称自己曾和周上床来换取薄熙来的提拔。原来周生性好色，在辽宁做小吏时，就常欺负女下属，后来官大一些，连男下属的老婆也不放过，被称为“百鸡王”。

事实上，周永康通过薄熙来在 2009 年开始已成为令计划的“三角”同盟。周永康已经做了完整的计划，让薄熙来先在 18 大接任政法委，然后在习近平的任期到一半时，令计划和薄熙来发起党内竞选运动，以薄熙来取代习近平的总书记职务。令、周、薄在互相协助上达成默契，令计划承诺安排胡锦涛支持薄熙来；周、薄则帮助令计划进入常委。

胡锦涛与薄熙来亲近源于令计划。令计划的父亲令狐野和薄一波象兄弟一样亲近，当时薄一波还想把令计划收为养子。四人帮倒台后，薄一波重回政坛掌握大权，1979 年就把令计划从山西弄到团中央。等到胡被小平钦点的时候，1995 年末薄一波把令计划提拔到胡的身边，所以令计划和薄熙来的关系亲如兄弟。2000 年令计划从中央办公厅调研室主任提升为中办副主任，这正是江泽民企图废储、胡锦涛胆战心惊的时期，若没有薄一波权势家族的力挺，令计划不可能在权力中枢挺进。令当中央办公厅主任，使胡锦涛和薄熙来的关系变得更近。胡锦涛是政治局常委中唯一没有去重庆的人，外界认为这显示他不支持重庆，实际上这是误会。薄每到北京总要经令计划安排拜会胡锦涛，向胡汇报重庆改革的进展，如果不是王立军闯馆事件发生，胡锦涛会于 2012 年 4-10 月间访问重庆，给薄以支持。2011 年夏，胡锦涛和周永康都私下里同意薄熙来入常，他们承诺为薄熙来做工作强力挺薄入常，希望借此牵制习近平。若没有王立军事件，重庆模式将按照李源潮定调，左右十八大路线的制定。

薄熙来在这个时候，开始变得小心谨慎，他否决了一切对他入常不利的活动，比如，否决了徐明和海伍德搞的一个房地产项目，否决王立军当常委和让他帮王摆平辽宁铁岭的丑闻的要求。为了万无一失，薄熙来曾买通中办警卫局人员，打探中央高层讯息。此时的王立军受到了中纪委的强大压力，因为打黑，王立军被重庆的一些受害人告到中纪委，这些受害人拿着重庆市委常委刘光磊的条子，直接找贺国强，贺国强指示何勇查王立军在辽宁的旧案，让王立军后院起火。未料，薄的美梦竟因王立军叛逃美国驻成都领事馆而破产。

王立军叛逃事件发生后，常委中有七人认为应该追究薄熙来责任，但是胡锦涛和周永康不同

意，偏偏这两个人都握有重权，因此，薄熙来一时没有大碍。胡在多个场合说，王立军叛逃是“一个孤立事件”，暗示与薄熙来无关。在王立军被国安部高官押回北京后，令计划曾令共军 301 医院对王立军进行诊断，结果为间歇性精神病，令计划此举意在为薄熙来解困。周永康、令计划竭力试图让薄熙来在 3 月两会期间“安全着陆”，2012 年 3 月 7 日常委曾对如何处理薄熙来发生争议，胡锦涛打算让薄熙来当政协副主席。王立军被带到北京后，胡锦涛曾亲自致电薄：“重庆任何动作，都要经过中央批准。”3 月 8 日上午，薄熙来暗中乘坐徐明的私人专机回重庆处理要事（胡锦涛以为薄逃出了中国，命令中央警卫局到机场查询所有航班的乘客），中午又飞回北京。3 月 8 日下午周永康参加了重庆代表团的审议，他赞扬“重庆去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新成绩”，同时肯定了薄熙来这几年在重庆的工作。薄熙来被打到的原因和赵紫阳有些相似，都是因为口风不紧道出了“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赵紫阳对戈尔巴乔夫说出了邓小平是太上皇的“国家机密”；薄熙来则在 2012 年 3 月 9 日的“两会”记者会上，为自己的老婆孩子高调辩护，就王立军事件为自己辩白，说自己是用人失察，重庆打黑“是由政法委协调的，并不是王立军一个人的事”。最严重的是：薄透露了胡锦涛是重庆模式幕后推手的“国家机密”，薄说：“我们深信总书记会去重庆，而且看了后他会高兴的。”中央领导特别是胡锦涛，对薄不按内定稿子发言十分震怒。于是令计划给薄熙来打电话，要薄熙来立即设法挽回，补上这个政治漏洞，可是薄熙来却没法挽回。

3 月 14 日中央常委会开会，七常委一齐指责胡锦涛姑息养奸，胡锦涛只好同意薄熙来免职软禁。当天，谷开来被捕。可见，胡锦涛拿下薄熙来是迫不得已。周永康是唯一反对撤薄熙来职的常委，他甚至建议，将薄熙来调任西藏第一把手。他认为只有薄熙来才可以用铁血手段解决西藏目前的混乱局面。周还声称，王立军根本没有出逃美国领事馆意愿，他出逃是被反对薄熙来的人逼迫引诱，且这些人为王出逃提供了大量国家绝密级档案和交通工具。因此非但不应该撤薄的职务，相反还应该揭开内幕，对威逼王立军出逃者立即清除出政治局。

温家宝 2012 年 3 月 14 日在中外记者交流会上说，重庆的“唱红打黑”实际上是一场由地方官员发起的“二次文革”，王立军叛逃事件是“二次文革”失败的标志。温家宝反对薄熙来的原因是他害怕一旦薄成为最高领导者之一，很可能对自己的家庭不利。他的儿子温云松大玩帽子戏法，从平安公司香港上市中，坐收数十亿暴利，夫人张培莉则是珠宝业的大姐大，全家爆富。仅总理的母亲就拥有价值 1.2 亿美元的股票。这就使得朱镕基怒不可遏，上书中央斥其为最大伪君子。所以，在清除薄熙来这件事上，并非所有领导人的意见都是一致的，但为了大家的共同利益，薄不得不除，如果他们不这样做，所有人都可能丑闻缠身。

胡锦涛一直迟迟不愿给薄熙来定罪，企图以此要挟党内各派同意他留任军委主席，恋栈不退。3 月 31 日《北京日报》社长梅宁华竟以头条发出炮打胡锦涛的文章，扬言：总书记不能凌驾于党中央之上，显然梅宁华是习近平在后面撑腰。《北京日报》炮打胡锦涛后，一周内 180 度转弯，连续刊登对胡表忠、声讨谣言的文章，这显然是胡锦涛、令计划一伙在反扑，胡锦涛还让《共军报》连续表忠文章，强调“不为谣言所惑”、坚定忠于胡主席，企图挟军媒以令诸侯。看起来好像胡锦涛得到军队的牢牢支持，这盘棋是要赢定了。

熟料，4 月 9 日公安部发言人武和平突然发炮，宣称：“掌握信息的人越封堵，越不告知，谣言就越盛行”。这简直是公开地和胡锦涛的“清网”主旋律唱反调。武和平表达的当然是公安部长孟建柱的意思。孟建柱的后台是曾庆红，而曾庆红是习近平的恩公。

薄熙来在 2 月得知王立军闯入美领馆，感到大事不妙，曾向江泽民求救，但江拒绝了。江在

2012 年 4 月通过接见军队将领和政治局常委，批评胡锦涛，主导对薄熙来事件的定性，增加了他的政治影响力。习近平是他推出来的，他首先要保护习近平的权力不受影响。薄一波是江泽民政治上的恩人，他当然希望保护薄熙来，但江泽民就像皇帝一样，一旦确定一个皇子作为他的皇储，别的皇子要挑战的话，他就不得不牺牲其他皇子，否则江山就会乱。为了维护习近平的权力，江泽民就不得不放弃他曾经欣赏也试图报恩并保护的薄熙来。江泽民在评价薄熙来时说，薄熙来夫妇做的事突破了人类文明底线。其实，中国今天整个政治都在文明底线之下，大家都在文明底线之下，不只是薄熙来突破了文明底线！

据说江泽民选择了胡锦涛仍在海外访问的 2012 年清明节前突然回到北京。江泽民对共军高级将领表示，中央高层内部有人要在 18 大上整垮习近平同志，只不过要整垮习近平接班的人并不是薄熙来与周永康二人（指的是胡锦涛）。薄熙来有薄熙来的问题，中纪委可以调查，可以搞清楚，但薄熙来的问题不是要整垮习近平。而周永康同志，与其他的每一个常委一样，在工作当中都会有失误，但周永康同志总体是好的，政治立场坚定，与中央高度保持一致，在习近平同志接班的问题上，周永康是积极支持的。有一个标准可以作为判断，在中央里到底谁要整垮习近平，谁真心支持习近平的，那就是看谁支持习近平在十八大上接班军委主席与总书记的职务，谁是要找各种借口推迟习近平接班军委的，谁就是党内要整垮习近平同志的罪魁祸首。在场的高级将领听到江泽民如此高调的讲话，无不胆战心惊、冷汗淋漓，当场表态，共军坚决与中央核心保持一致，坚决支持习近平同志十八大全面接班。

清明节前后，江泽民与各常委就“弃薄”分别谈话。当时薄熙来面临四宗罪的指控，一，“颠覆国家政权罪”除了取代习近平外，这项罪还包括对来渝的国家领导人的窃听，都是由王立军完成；二，温家宝指责的政治错误，路线斗争；三，腐败，巨额财产不明罪。是 60 亿美金，还是 80 亿美金，国外媒体一直咬着不松口；四，杀人包庇。薄利用行政职权，把调查的公安局长免职，一直把他挤兑到成都美国总领事馆，是进攻性的包庇。江泽民提出按刑事处理。2012 年 4 月 9 日，薄熙来被押送西山中纪委安全屋审查。4 月 10 日深夜 11 点，新华社终于播发了《中共中央决定对薄熙来同志严重违纪问题立案调查》和停止其担任的一切职务。4 月中旬，胡锦涛才改变到打击薄熙来的立场。7 月 26 日，薄熙来被告知，只要他认罪悔改，可以保留党籍。因此他写下悔过书，承认两笔受贿。6-7 月份，跟薄关系密切的令计划翻船，连带李源潮也丧失了入常资格，胡锦涛丧失了发言权。

薄熙来在重庆把“打黑”没收的上千亿资金，拿了一点点出来，修了一些廉租房，确实让一些贫民住了进去。也修好了一些多年无人管的烂路，为了市容美观也免费给一些市民整修了一些临街的阳台，也确实抓捕了一批抢劫犯，盗窃犯，令重庆秩序大为好转。所以许多老百姓认为薄熙来好。这说明当今许多官员，只知当官，捞钱玩女人，享福，根本不给民众办一丁点哪怕“作秀”的好事。薄熙来也捞钱玩女人，也享福，但他能把捞来的钱中哪怕百分之一、二、三拿来去作点哪怕是“作秀”是“收买人心”但总算是好事。

加上国内反日浪潮汹涌，2012 年 9 月的抗日游行，重庆公然有人打出“永远支持人民书记薄熙来”“钓鱼岛是中国的，薄熙来是人民的”等横幅，重庆的老百姓支持薄熙来，是因为薄为他们带来了诸多福利。人民支持薄熙来让常委们痛下决心干掉薄熙来。2012 年 9 月 28 日常委一直通过，薄熙来被双开，移送司法解决，至此，薄熙来的政治生命终结。

薄熙来案从 2013 年 8 月 22 日济南庭审至 9 月 22 日宣判这一过程，无论是中国当局还是薄熙来的庭辩，都集中于薄是否贪污腐败，刻意回避了薄案的真正缘由，即薄案是权力斗争的

产物。中南海极力要抹去薄案政治斗争与权力斗争的色彩，自有其难以言表的苦衷。

其一：利益分裂与党内政治竞争

中共奉行“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一元化政治，权力传承也是上一代党魁们协商后指定。薄熙来为中共所不容的就是他高调挑战了这一党内游戏规则。薄熙来说：“我们的党有这样的制度，我愿意向全国党代会阐述自己的信念和追求，和中央培养的接班人做和平理性的辩论，通过中央电视台的直播，由全国人民投票表达意愿，胜出者出任总书记主持政治局会议并综合各方面意见组成新的常委会。”2012年前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向中共中央上万言书，大胆批评“胡十年”以“维稳”替代改革，“其结果适得其反，使矛盾积累和加深，甚至使民心失散，矛盾激化。厉有为要求总书记差额选举，实施党内民主竞争上位；建议撤销中纪委和政法委，让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运作。薄熙来在《最后陈述》向中央输诚说：“说我有做总理之心，这完全是不实的。……说我想做中国的普京，这也完全是不实之词。”“说我”？谁说？当然是中南海诸公向薄熙来的问罪之“说”。为什么一个公民，一个党员，一个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就不可以有“做总理之心”？为什么就不可以想象自己像普京一样去争取得到人民的拥戴和选票“做中国的普京”？薄熙来不外呼想“入常”而已，何罪之有？争取出任“总书记”也无可厚非！所谓“政变”之说，所谓“篡夺最高领导权”之说，其手法就像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可惜小习不是老毛，薄熙来也绝非刘主席。

共党政治不允许政治竞争，认为竞争的存在就意味着党的分裂，不再是一个团结的整体；高层接班人也只能由最高层“集体商定”，谁要主动争取则是无视党的组织纪律，藐视最高领导层的权威。因此，党中央无法公开解释：为什么薄熙来这么多年能够“特立独行”不受干预，为什么薄的“重庆模式”曾红透一时，吸引党内高官蜂拥捧场。如果中共想解释这些，只会加剧党内分裂，导致更大的政治麻烦，所以还是祭出反腐法宝比较省事。

更麻烦的是，薄熙来的支持者并非被党视若寇仇的自由知识分子与异议人士，而是党内的太子党以及由党大力扶持起来的专门对付民主自由人士的新老左派。让党尤其不开心的是，西方社会也有人对薄十分称许，不少人意犹未尽，希望薄熙来还有可能复出。对于党内高层的挺薄势力，即陈元、刘源、张海阳等一干太子党成员，习近平采取了恩威并施、打击与给出路并用的方式，或是从原来的岗位被调走，比如曾贷款百亿巨款支持“重庆模式”的陈元，已从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位置上调离；或是在原岗位上等候退休“荣养”，如刘源、张海阳。陈、刘还分别赐予了一个全国政协的职务以示安抚。这些人支持薄，其实各有盘算，比如刘源一直惦记着恢复其父刘少奇的新民主主义。2013年8月31日《纽约时报》在《薄熙来称依照中央命令处理王立军》一文透露的细节颇值玩味：“王立军被送到北京后，令计划负责的中央办公厅秘密地命令首都的一家部队医院对王立军进行精神病检查。……该医院确认王立军患有间歇性精神问题。如果这个消息传播开来，可能会让人们质疑王立军关于谋杀的言辞，还有他提出的其他指控。”刘源等在薄熙来倒台时不伸援手，竟无一个是男儿。

其二：薄向下汲取社会支持符合中共意识形态

薄熙来还努力向下汲取社会支持，“唱红”与“分蛋糕”，前者是用左派那套自称代表底层人民，反对资本主义压榨的话语系统加以包装，后者是动用薄熙来运用关系网络借来的巨额资金，如从国家开发银行借来巨额贷款，改善重庆的公共服务与民生，比如建立交巡警平台、改善治安、为底层提供廉租房，进行福利补贴等。“打黑”打击的是民营企业主，虽然其中

有不少是被冤枉的，但在被贫富悬殊撕裂的中国社会，大多数民众对这些有“原罪”的企业家并不同情。可以说，薄熙来的“唱红打黑”，挑起的乃是中国改革 30 余年以来不断积累的深层矛盾，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社会分配不公与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中共当年起家时号称“穷人党”，以“剥夺剥夺者”为号召，发动底层革命。薄的“唱红打黑”，完全占据了中共意识形态的制高点，利用社会底层的“穷马克思主义者”，为自己政治竞争增添筹码。

薄熙来的“打黑”变成“黑打”，表明他是一位坚决主张用毛泽东的专制高压手段维护现存统治的专制者。问题是，习近平上任以来的所作所为，让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他实行的其实只是一条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路线”：严格控制思想言论，反对民主宪政、打压资本，唯一不同的是，习没有花力气改善公共服务系统，用福利安抚社会底层。习没有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他与薄处于不同的位置：薄位在督抚，用的是朝廷的银子，如国家开发银行那无硬性偿债责任的巨额贷款；习位在“主君”，朝廷的银子用得太多，不好交代。

其三，习近平“审薄”，实则审全体中央委员，审中共。试问哪个中央委员的子女不在国外留学？又有哪个政治局委员的工资能够支付子女的豪华留学费用？如今网民看得清楚，习近平实为薄熙来之翻版——薄熙来的儿子留学英美，习近平的女儿留学哈佛，二人皆隐瞒子女留学费用来源；薄“唱红”，习吹“三自信”；薄“打黑”，习“封网”！

15. 薄熙来指示杀海伍德？

合肥工业大学的退休教师鲍锋实名举报：谷开来审判用替身，真实的谷开来未出场。

2012 年 8 月 20 日，薄谷开来因故意杀人罪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但案情很多疑点仍然未能解开。因此支持薄熙来的毛派分子至今仍说这宗杀人案是王立军在他入（薄熙来政敌温家宝或当时的中纪委书记贺国强）支使下为谷开来设下的一个陷阱。更有人认为，习近平、贺国强都是福建帮。贺国强的中纪委威胁王立军，可以视为习在威胁王！因为薄熙来才华一直盖过了习，习担心薄哪天会颠覆自己而采取措施剪除对手。海伍德见过习近平后，威胁要透漏薄熙来谷开来的秘密而被杀。海伍德是习的替死鬼。海伍德死后，王立军叛逃引发中共高层激烈内斗。输家除了薄熙来之外，还包括周永康、温家宝、党魁胡锦涛及大内总管令计划，太上皇江泽民貌似赢家，其实也输了，而习近平是唯一的大赢家。

王益在北京大学上学的时候，和薄熙来的妹妹是同班同学，曾任职中顾委办公厅，担任薄一波的秘书，被视为薄家“家臣”。大连许多企业改股上市，是薄熙来求助于王益办成的。2008 年 6 月中国开发银行副行长王益被“双规”。薄家找中纪委负责人贺国强求过情，请求减轻些罪责，但是无济于事。薄熙来进行针锋相对的报复。他命令对文强实施逮捕。

2009 年 8 月 7 日凌晨 1 点，正在北京参加全国司法行政工作会的文强，在所住的宾馆被重庆市纪委和公安局的人抓捕。在文强被抓之前的 7 月 21 日，王立军就抓捕了文强弟弟文兵之妻谢才萍，给她罗列的罪名是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开设赌场、容留他人吸毒、非法拘禁、妨害作证等，当时这些媒体铺天盖地渲染这位“女黑老大私养 16 个男人”，还说是文强纵容其弟媳这样干的。文强曾与贺国强关系融洽。薄熙来命令王立军要从文强那里查出对贺国强不利的证据来。刚开始，文强拒绝合作，但是在王立军动刑，又逮捕了文强的独子之后，文强屈服了，提供了一些有关贺国强一些腐败的指控。薄熙来把文强的供词交给胡锦涛的中办

主任令计划，想毁坏贺国强作为全党全国反腐总指挥的声誉。于是，贺国强拿王益的生死，来和薄熙来做交易。当时王益被查出收受贿赂达 1200 万元，而且私生活上极其糜烂，按理可以判死刑；贺国强与薄熙来私下协商，薄判处文强死缓，贺也判处王益死缓。2010 年 4 月，北京中级法院以王益犯受贿罪，判处死缓。当贺兑现承诺后，薄却不守约定，2010 年 4 月 14 日，重庆市第五中级法院判处文强死刑。同年 7 月 7 日文强被执行注射死刑。这让贺国强非常恼怒，他对薄三的言而无信、自己的“被开涮”耿耿于怀。文强被处决以后，他的亲属在许多场合表示，文强罪不该死，他是政治斗争中不幸的牺牲品。2012 年 12 月，香港一家报纸披露，文强家院子里鱼塘下发现的现金是王立军栽赃所致。

王立军戴的手表价值 50 万人民币；他喜欢收集限量版名牌西装，一件就要 20 万元。在他搬出办公室时，工人准备了 40 个纸箱来装他的私人物品，结果用了 80 个纸箱，绝大部分都是贵重礼品。2010 年，王立军用没收或敲诈的钱，设立了“英烈救助基金”。这一基金赞助了王立军宠爱的项目。有一次，他用这一基金为一次宋祖英的音乐会买了几百张票。王立军每次出去视察，都会动用直升飞机，哪怕路程不到 30 公里。他在城里活动的时候，总是有大队的警车护送。住酒店的时候，他的保镖——大多是身穿红制服的女警察——便在走廊里布岗。人权组织宣称，在王立军当政时期，有 1300 多人被关进精神病院。

王立军 2011 年 5 月当上重庆副市长以后，便一心想进入市委常委，他要谷开来为他游说。按照他的意愿，谷开来吹了枕边风，薄熙来却被王立军没完没了的要求弄得很恼火。2011 年 5 月，王立军在铁岭的两名部下被调查后，他意识到这一案子是直接针对他来的。他再去找薄熙来，恳求他出面干预，薄熙来却拒绝了。王立军感到既愤怒又失望。王立军和北京高层中的反薄势力一道，设计了这一扳倒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阴谋。他大概跟薄熙来在北京的对手谈成了条件，来换取对他政治上的保护，因为王立军自这个时候起，对薄熙来的私人生活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小心地把薄熙来的婚外情和家庭财务情况都留了记录。

“吸烟基本靠送，喝酒基本靠贡，工资基本不动，老婆基本不用”——新四项基本原则。薄熙来在外面淫乱，还喜欢奸幼女，哪里有功夫陪老婆，故谷开来只能自己想办法了。谷开来的面首包括法国人德维尔、英国人海伍德，中国人周永康、王立军、徐明、张晓军等。海伍德受到中纪委的指派，想用威胁波瓜瓜的手段来套出薄熙来谷开来的惊天计划。

薄熙来遂决定灭了海伍德，谷开来还与王立军商量如何杀掉海伍德。2011 年 10 月，王立军积极参与了对付海伍德的阴谋。由于谷开来让他直接监控海伍德与薄家的通讯联系，重庆官员认为他夸大海伍德对薄瓜瓜的威胁，驱使谷开来去杀掉他。王立军对法庭承认，11 月 13 日，随着海伍德到达重庆，他“以海伍德有可能进行与毒品有关的犯罪活动，而对海伍德安排了监控”。当天晚上 8 点，就在要动手之前，谷开来非常紧张，想打退堂鼓。王立军再次来到她家。“当晚我身体不舒服，他问我怎么还没去，”谷开来后来说，“我表示不想去，王立军说那不行。”根据谷开来的同谋张晓军的证词，王立军在谷开来的卧室呆了大约 20 分钟。据说谷开来恳请王立军去动手，但王立军坚持说，这事她才是合适人选，因为海伍德对她不会起疑心的。王立军还对谷开来说，她正在为国家除掉一个危险的英国间谍。谷开来出门前，王立军还让厨房的勤务员给她煮了碗面条，让她吃掉。然后，他又令谷开来的司机去备车。谷开来按照事先计划，带着张晓军，大约 9 点到了酒店。她把海伍德用烈酒加舒缓剂灌醉，在海伍德的水里加了几滴毒鼠药。王雪梅很怀疑薄谷开来用来毒杀海伍德的毒药是否真的致命，不排除系他人用柔软物衬垫在死者的颈部导致的机械性窒息死亡。王立军有可能自己后来又去了一趟海伍德房间，用其专业手段，亲手“了结”了海伍德，而没有留下痕迹。

调查人员在阳台上发现的无名脚印，有可能就是王立军的。海伍德一死，王立军就更好控制谷开来了，而且也更有资本去要挟薄熙来了。11月14日王立军来到谷开来家，哄骗谷开来描述了谋杀海伍德的过程，她的话被王立军秘密录了音。谷开来痛快地宣称她杀了海伍德，因为她生怕王立军会怪她说了不做。而且，如果手软，就会给她对海伍德有感情谣言添油加醋。海伍德被火化、侦查工作结束之后，王立军再一次跟谷开来提起铁岭的话题，以及他想进市委常委的要求。谷开来再次跟丈夫游求薄熙来考虑王立军的要求。薄熙来没有理会谷开来，据说谷开来跟薄熙来为此吵了一场，好几天没说话。

武宜三说：李公朴、闻一多是中共特务杀死的，然后嫁祸给国民党。王立军对共党的嫁祸他人之术早已滥熟于心。王立军从1992年到2011年的历次打黑运动中，共造成800多人被处决，在对付那些被他指为与黑社会有关系的人时，王立军时常使用栽赃和伪造证据的手段。王立军曾把谷开来要杀掉尼尔·海伍德的计划报告给一位政治局常委。这位高官一定默许了这个计划，不然，王立军哪来那么大胆子。国安部人员同王立军于2011年10月在北京的会面，说国安命令王立军找个办法杀掉海伍德，因为海伍德企图向党内高官渗透。王立军便利用谷开来把海伍德诱到重庆。海伍德昏睡在床上，王立军给他注射了有毒化学药品。然后，他与薄的敌人合作，捏造了谷开来谋杀案，以报复薄熙来拒绝帮他的铁岭朋友。

2011年12月中旬，中纪委终于找到了王立军以权谋私的确凿证据，元旦前，中纪委秘密约谈了王立军。王立军立即感到了自己罪大恶极，难以逃脱。但随后中纪委让他交代为薄熙来工作期间的所有谈话与会议记录，包括有关打黑与具体案件的通话记录。王立军答应配合，就有将功折罪的希望。谁知这事情被贺国强的人故意泄露给了薄熙来的人，于是薄、王二人开始内讧。王立军以谷杀人要挟薄熙来：要求保护他免于被中纪委追究；结果被薄打得耳膜穿孔，满嘴吐血。王立军最初打算逃到北京谋求见到周永康和李克强，二人都是政治局常委。王立军在北京的一些朋友警告王立军，薄熙来有一张巨大的权势人物关系网，他是碰不得的。若是薄熙来发现王立军上告，王很可能会像过去被他自己秘密关押起来的人们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王立军很清楚，如果他逃到了北京的重要部门，只要重庆警方的人一到，他也会像李庄一样被立刻抓走，甚至被立刻灭口后说他畏罪自杀。王立军认为自己符合申请庇护的条件——他有证据表明自己有生命危险，因为他试图揭露英国公民的谋杀案。另外，作为一名高官，他能够向美国人提供有价值的情报。如果他的庇护申请被拒绝，他的企图叛逃和对海伍德谋杀案的揭露，也会成为西方国家的头条新闻，这样就会引起北京的关注。

于是，2012年2月6日，王立军以洽谈工作为由，于当日14时31分私自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在美领馆内，王立军称因查办案件人身安全受到威胁，请求美方提供政治避难。这就充分地说明，王立军根本不相信中共中央还有什么“正义公道”。由于美方拒绝了王的政治避难请求，王于2月7日被迫离开美领馆，并向有关部门反映了薄谷开来涉嫌故意杀害尼尔·伍德的问题和薄、周企图夺权的情况，并曝光“活摘器官”黑幕。随后薄熙来调动警车跨省越界追至成都，大约有700名警察包围了美国总领事馆。当时重庆公安局副局长郭维国曾带着重庆武警总队的一支反恐突击队狙击手在领馆附近伺机击毙王立军。如此重大的“政治风波”，早已闹得全国、全世界舆论沸腾。有传闻，薄曾与其在中共党政军内的同党密谋搞政变，以武力夺取中央最高权力。徐才厚和吴胜利等人都是薄熙来的铁哥们。徐的原籍是大连市瓦房店，其表弟徐长源在那里搞房地产开发，薄熙来没少帮忙；而吴胜利以前在大连水面舰艇学院任职，也与薄有旧。王立军出逃后，薄熙来竟然跑到云南参观14集团军军史陈列馆，而这个集团军就是其父薄一波创建的部队。

2012 年 9 月 24 日：王立军因徇私枉法、滥用职权、叛逃以及受贿 305 万元，被判处 15 年有期徒刑。法庭文件里表明，王立军在重庆性侵犯了八名女警官。此外，2012 年 4 月，铁岭的一名警察在网络的帖子上称，王立军在家乡工作期间强奸了一名女警察。那个女警察后来怀了孕，便起诉王立军，但是当地法院出于对王立军的惧怕，拒绝受理这一案件。王立军还暗中把薄熙来讨论其政治计划的多次谈话都录了音，并把磁带送给了薄熙来的政敌以求宽大。在一次谈话中，薄熙来把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比作软弱无能的汉献帝，骂前主席江泽民是垂帘听政的“现代慈禧太后”，骂未来的主席习近平是“习阿斗”。

事实证明，王立军赌赢了——他保住了自己的命，而且毁了薄熙来。“在中国，一个令人悲哀的现实是，一位公民，只有求得西方国家的帮助，才能自救，得到保护。”博主李刚写道：“王立军的轻判给我们上了很有价值的一课。共党高官们白天发表反美言论，晚上回家以后别忘了弄清楚离你们最近的美国领事馆的确切地点。如果哪天你们得罪了顶头上司，党是没法保护你们的。跑到美国领事馆去吧，才能有效地打垮上司，保住自己的性命。”

江泽民打倒陈希同和习近平打倒薄熙来，是因为他们学历、资历、历练和政绩都不如陈希同和薄希来，害怕自己的领导权威受到干扰和威胁，天不容二日。于是乎，从王宝森和王立军下手，最终以贪污罪将陈希同和薄熙来打倒。实现了巨贪审判小贪的中国式人文奇观。薄熙来的悲剧在于企图改变邓小平创立的“隔代钦定接班人”制度搞党内竞选总书记。

1938 年苏联特别军事法庭指控政治局委员布哈林为帝国主义间谍，检方以其妻儿性命相要挟，布哈林被迫承认一系列莫须有的罪行，甚至在法庭上声明外界关于他遭刑讯逼供的说法是异想天开的反动言论，他最终被以叛国罪枪决。由苏共一手扶植的中共早已把这一套下流手法玩得炉火纯青。2010 年薄熙来整重庆公安局长文强便以其儿子的安危胁迫其认罪并处以极刑；王立军诱骗律师李庄认罪后覆手将李庄判刑收监。如今，风水轮流转，中纪委以保留公职保留党籍为诱饵套取了薄熙来的口供，便翻手将他“双开”后交付司法审判。

薄熙来处死文强在权贵集团中产生了巨大的副作用。可以想见，一但薄进入领导核心，定会对不同派系采取非常手段进行清洗、甚至杀掉，这使中共元老们不寒而栗。而且窃听中央高级领导人的电话是“犯上作难”，是任何一个政权都不允许的勾当。杀高官与窃听高层这两大忌讳表明薄熙来在党争中可以不按牌理出牌，并且有胆量有行动。有鉴于此，从自身利益考量，为确保权贵利益集团的稳定，中共高层最终决定对薄熙来公审。

针对薄案，中共高层头疼得很：如果拿权力斗争来说事，指控薄篡党夺权、抢班夺权、另立中央，权威日衰的中南海，实在说不出口；如果拿经济问题来说事，老百姓正好议论纷纷：看看，这还了得，光一个薄家，就向外国转移资金达 60 亿美元！马上又联想到：中共高层，几代太子党，何人不贪污？哪家不腐败？中南海不免尴尬。但又该如何办理薄熙来呢？幸好，还可以拿刑事问题来说事，薄妻或薄本人犯了杀人罪，这便足够了。人们仍然可以追问：薄家是被抖出来了，那些没有被抖出来的，中共高层或太子党家族，又隐瞒了多少刑事犯罪？事实上，作为腐败集团的中共，本身就是犯罪集团。

2012 年 9 月 28 日给薄熙来双开时是定下了 6 项罪名；即：薄熙来在担任大连市、辽宁省、商务部和重庆市委书记期间，严重违法违纪，主要是指 2 月 2 日不经过公安部同意就根据一己之私擅自免去王立军公安局长职务，两会期间的 3 月 8 日擅自离京回重庆；在王立军事件

和薄谷开来故意杀人案件中滥用职权；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利，直接和通过家人收受他人巨额贿赂；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用人失察失误，造成严重后果；指与有国外情报组织背景的外国商人关系密切，危及国家安全。虽然还留了一个活口，即“调查中还发现了薄熙来其他涉嫌犯罪问题线索如监听、用网络攻击中央领导人，但只算备而不用。

济南法院于 2013 年 8 月 22 日审判薄熙来时，习近平正式批准了只审判薄熙来的三宗小罪，受贿罪 2000 万、贪污罪 500 万，以及滥用职权罪。对薄生活糜烂、唱红打黑期间滥捕滥杀、活摘人体器官的重罪避而不谈。冯.哈根在大连办尸体加工厂，那是薄熙来亲自批的。这尸体是从哪儿来？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调查？薄熙来的贪腐与人们本来预期和估计的他的受贿金额被大大减少，薄瓜瓜看到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开心极了，除去 2500 万，其余变成他的合法钱了。可见习是用保薄和保薄二来保党，薄的罪越轻，党越伟光正。

类似的有：铁道部长刘志军被传家族涉案 100 亿，结果刘志军仅被认定收受人民币 6460 万余元。刘志军真是大傻瓜，帮助丁羽心大赚 40 亿，自己竟仅贪几千万？山东副省长黄胜共贪污 90 亿美元即 500 多亿，包养 46 名情妇、购置 46 处房产，家人已全部移民海外。结果贪腐金额仅被认定为 1223 万余元。黄胜妻子几乎包揽德州一切市政工程的啊？那 1200 万余元能买一线城市几套房，又能养得起几个情妇？国家档案局副局长范悦包养电视节目女主持人纪英男就花 1 千多万元（相当于 164 万美元），黄胜 46 名情妇至少得上亿才能摆平？

这次薄熙来案审判向世人昭示了由中共政治局委员挂帅的直辖市重庆市委，竟然是一个乌烟瘴气、蛇鼠一窝的山大王朝廷，围绕着薄熙来这个专制暴君的全是无耻奸臣、佞臣与奴才，没有一个称得上是人！薄熙来一面说他与谷开来感情很深，为了保护她，自己不惜违心招供，一面又骂她是疯子，说的话当不得真。薄熙来为了推脱王立军逃美领馆罪责，主动爆料王立军与谷开来性丑闻，却故意隐瞒周永康与谷开来的床上关系。

薄熙来认为：在这三宗小罪的问题上，大家都是彼此彼此，大同小异。于是，薄当庭翻供，全盘不认，让当权者下不了台。更严重的是，薄以家书为名，流露翻案和复仇心态。宣判前夕，从薄家传出薄熙来家书，声称“爸爸一生坐了多次监狱，我会以他为榜样！”众所周知：薄父薄一波，曾坐过国民党的大牢，出狱后，继续参与了共党的夺权大业；文革中又坐过毛泽东的大牢；毛死后，薄一波出狱，参与审判江青，实现了“甜蜜的复仇”。薄熙来要效法乃父，显露东山再起、矢志复仇的心计。在薄案宣判之前，中共中央理论刊物《求是》杂志网站竟刊登文章，将薄熙来暗示为“高举起共同富裕大旗的民族英雄”。

2013 年 9 月 22 日，薄熙来终于以受贿、贪污、滥用职权罪被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薄表示要上诉，10 月 25 日山东高院维持原判。判薄无期，主要体现了习的意志：一山不容二虎，不得纵虎归山。倒薄，是习近平的最高权力保卫战，习近平借薄案，对江泽民逼宫。挑选起诉薄熙来的三桩罪中，滥用职权罪，连接了周永康（处理王立军的“六点指示”）；贪污罪，则牵扯了江泽民（大连江泽民别墅），至少让老江出了洋相。习敲打老江：敬请养尊处优，勿再妄加干政。习近平也许担心自己向胡锦涛“隔代钦定接班人”胡春华们交班后，会不会被清算？所以接下来，习近平大可乘胜追击，直捣周永康。如果能扳倒周永康，习近平权位才算真正巩固。试想，连前政治局常委都敢拿下，党内，还有谁敢叫板？

就在薄熙来 2013 年 9 月 22 号宣判这天，新华社播放了王立军在庭审出庭作证时的一段视频，

王叙述他向薄汇报谷开来杀海伍德被薄熙来打了一拳这个情节时，说薄熙来当时“走过来指我鼻子说，你必须把这话收回去，并且拍自己的胸脯说，我是杀人犯吗？”薄这个反应很奇怪，因为王立军说的是谷开来杀人，并没有指他薄熙来杀人，他为何要揽上身？薄在盛怒之下冲口而出的这句话是否泄露了什么隐情？张思之怀疑是薄熙来指示杀人。

中国资深律师张思之接受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访问时，指谷开来杀人案是个错案。他作为律师，从法律的角度看，该案只审理了四五个小时，除了审清楚海伍德确实被杀害外，其它情节都没有讲清楚，缺乏细节，连谷开来到底有没有杀人没有任何证据呈堂，比如此案的凶器，即谷开来灌海伍德喝下毒药的那个酱油壶。他说，此问题最关键的是杀海伍德的动机不清楚。据谷开来供词，因为海伍德经她介绍，参与了重庆一个土地项目的前期规划，但这块土地最后没有开发，但海伍德向她的儿子索要报酬 1400 万英镑，与薄瓜瓜通电邮威胁他，谷开来害怕儿子被绑架于是决定将海伍德邀请到重庆毒杀。但张思之不相信薄瓜瓜受威胁之说，并称在美国的薄瓜瓜已经否认。而公布的海伍德与薄瓜瓜的电邮也看不出有多严重。前重庆公安局副局长郭维国，在海伍德死前曾经接到过谷开来关于受到威胁的报告，他看了所有这些电子邮件，在他的证词中说，他从中没有发现任何针对薄瓜瓜性命发出的威胁。

谷开来的法国情人已是海伍德好朋友的德维尔证词称，当他听说海伍德索要 140 万英镑作为他曾管理别墅的报酬时，“我当时惊愕不已，说不出话来，而电话那头的尼尔（即海伍德）则满腔愤怒地边骂边走，发泄着对谷开来的不满，说他被她蒙骗了（法律上的蒙骗），威胁说：如果他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就‘全部揭发’……那天是 2011 年 5 月 11 日。”

王立军在美国领事馆对美国外交官说，谷开来已经向他承认她杀了一名间谍。后来谷开来受审时，徐明的供词说，谷也曾告诉他，海伍德是间谍，她是为民除害，是英雄，跟圣女贞德一样。很显然，海伍德很有可能是因为其英国秘密情报局背景才惹来杀身之祸。他威胁到的不是薄瓜瓜的安全，而是薄熙来的前程。有望进入中国最高权力核心的重庆市委书记，如果其家人竟然有一位英国特务密友，这对薄绝对是一枚定时炸弹，因此必须提前引爆。说杀海伍德薄熙来是幕后黑手，也就很合乎逻辑了，至少比说海伍德威胁薄瓜瓜安全更令人信服。张思之认为，这个杀人案审得如此不清楚，主要是为了与薄熙来切割。以他的判断，这个案子的主谋应该是薄熙来，是薄熙来策划杀海伍德。

王立军事件后中国警方对海伍德死亡重启调查，居住在伦敦南郊的海伍德的母亲否认儿子死于谋杀，她对英国独立电视台（ITV）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谣传。我儿子死于心脏病突发。其余的我就不想说什么了。”张思之说，谷开来庭审时，海伍德的家人当时不远万里从英国赶到合肥旁听，“但他们坐在法庭上居然一言不发。这正常吗？”“一定是王立军等人采用了经济手段把家属收买了，双方达成了妥协，让家属承诺海伍德是因为心脏病猝发而死。”据传是用政府的名义付了 5 千万英镑。他说，这笔巨款可能有三个来源：一，重庆政府出（重庆政府打黑没收的民营企业资产上千亿，最后不知下落）；二，谷开来个人小金库；三，薄熙来家的钱，但不论是哪一个渠道，5 千万英镑的巨款，薄熙来不可能不知道。张思之认为谷开来承担了本来应该让薄熙来承担的责任。

言由心生，薄熙来打骂王立军时，因为情绪失控，竟冲口而出：“我是杀人犯吗？”一时不留意竟然泄露自己一心想掩盖的主谋杀杀人真相。但中共当局为何要把薄熙来从这宗杀人案剥离出去？恐怕还是内政和外交上的考虑。薄熙来是中共要员，主谋杀外国人，造成的政治震撼肯定要比一个家庭妇女谷开来强烈不知多少。权衡轻重谷开来就成了牺牲品，何况人是她

亲手杀的。而英国一方，由于海伍德的敏感身份，也就深究了。不过海伍德母亲已向中国政府要求 800 万美元的赔偿，这笔钱比起薄家给的 5 千万英镑，只是一笔小钱而已。

16. “死亡威胁”保习家

自习近平上台以来，境内外媒体都看不到对于他私生活和家庭财富的质疑，尤其是他的私人领域，很难听到小道消息。这一点，胡温从来都没有做到过。

曾在 2012 年 6 月撰文讲述习近平亿万身家的彭博资讯驻北京记者傅才德(Michael Forsythe)夫妻曾遭习近平家族人士发出死亡威胁。

彭博社报道：习近平的大姐齐桥桥（63 岁）、姐夫邓家贵（61 岁）、齐桥桥之女张燕南（33 岁）财富最多。他们都是加拿大人。1990 年代，习近平姐姐齐桥桥就开始以港商的身份在京城、深圳等地开发最暴利的房地产。她成立北京中民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自任董事长，在京城黄金地带兴建豪华楼盘，取名“观缘”。2009 年 10 月，香港《壹周刊》爆料两宗和习近平亲戚有关的房地产交易。第一宗是 09 年初成交达 1.5 亿港元的豪宅，其买家是北京中民信房地产总经理邓家贵；2009 年 8 月成交的另一豪宅，其买家也与习近平有亲戚关系。海外媒体称，以邓家贵或齐桥桥名义注册的房地产公司仅现在查到的就有 10 家。报道还说，齐桥桥家的公司是设在深圳的远为公司，该公司投资内地和香港的房地产还有其它项目，总价值有 2.8 亿，远为旗下其它他家的全资公司，资产也有 8 千多万。而邓家贵间接持有江西稀土稀有金属钨集团 18%股权，该公司市值 17 亿美元。而两人女儿、即习近平外甥女张燕南，早在 2009 年就投资 300 多万元（人民币）于北京合康亿盛变频科技公司，后来股价升值 40 倍，令张持有的股份市值达 1.2 亿元。

彭博又指习另一胞姊齐安安的丈夫吴龙是广州新邮通信公司的董事长，该公司与中国移动有数亿元合约；在中移动历次 TD-SCDMA 设备招标中屡屡中标，金额累计超过千亿。

习近平的弟弟是澳大利亚人。习家一些成员很贪婪，到处搞钱。有趋炎附势者想见习近平一面，其家人竟要收取中介费，见一次面几十万，给人相当恶劣的印象。

习近平的女儿习明泽，生于 1992 年 6 月 27 日，曾经在杭州外国语学校读书，2008 年保送入浙江大学，2009 年 7 月，习明泽进入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同声翻译专业，她开着一辆上海产的别克车，牌子是南 K 的牌子，有一名警卫员送她上下学。2010 年 5 月前往美国哈佛大学读本科。习近平的女儿有中国大陆派来的保镖 24 小时保护，美国联邦调查局也加派人手暗中保护她。一般来说在校学生无法申请绿卡，但习近平女儿已经有美国的长期居留签证，而且随时可以申请加入美国国籍。据说习近平今年要其女儿回国，被其女拒绝！

17. “法拉利车祸”剥夺了胡锦涛的大权

令计划曾任团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团中央宣传部部长，是货真价实的团派出身，在胡锦涛 14 大进入政治局常委会后，团派势力崛起。1995 年，作为团派的后起之秀，令计划调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从此平步青云，担任中办副主任、主任，兼任胡办主任等职，被称作胡锦

涛的“大总管”，为胡锦涛打理一切事物，巨细无遗，胡锦涛出巡，他陪侍一侧，须臾不能离身，胡锦涛的公关形象亦由他设计（胡锦涛有面瘫之疑）。可说是胡锦涛的第一心腹和智囊。无疑，是胡锦涛退休后在中共权力班子中理想的代理人。甚至一度传说，他和胡春华是胡锦涛暗中培养的隔代接班人人选。由于中办主任位于权力中枢，是总书记最贴身的幕僚，能参与中共核心机密，并负责中共中央机关日常运作，权势很大而地位敏感，既是被人巴结的红人，也容易成为权力斗争的靶子，所以令计划行事低调。尤其在十八大前权斗激化，令计划更是步步为营，避免犯错误。但是处心积虑，也有一失。一步走错，全盘皆输。

2012年3月18日凌晨4点，在北京海淀区西四环路保福寺桥东辅道，发生一宗神秘车祸，一辆560万元的黑色法拉利跑车失控猛撞桥墩，车身断成两截，车上一位23岁的男司机当场死亡。男子完全赤裸，一名全裸的藏族女生坐在他的腿上；另外一女生坐在后面，半身赤裸。事故原因是，法拉利在转向时，坐中间偏左的女郎因离心力关系，在强大的惯性下，身子自然偏向左边压住了男子，致使该男子无法操作，酿成惨祸。两女生重伤紧急送医。据称，车祸原因是开得太快，又碰到下雪。很快各大网站都有这则车祸的报导，《新京报》和《北京晚报》《环球时报》不但报导了新闻，还发表了车祸现场照片。随后怪事发生了，消息刚上网不久即纷纷撤下，最后全部消失。网友议论纷纷，猜测车祸的肇事者一定身份敏感，而记者们怀疑是国家领导人之子。随即网上传死者姓贾，说可能是政治局常委贾庆林的私生子。那时没有人会想到，这宗车祸肇事死者不是贾庆林的私生子，而是胡锦涛的大内主管令计划的公子令谷。而更想不到的是，这场车祸的后果会严重影响到中共高层权力斗争。

原来，令计划让花花公子的儿子令谷以“王子云”化名入读北大，要求他不可透露身世背景，避免给他带来麻烦。王子云爱穿名牌衣服，不住宿舍而独居校园外私人寓所，上课经常迟到早退。他经常夸口说赚钱的事，似乎很多钱，朋友也是非富则贵。他曾向同学透露他在北大创办了一个类似美国耶鲁大学的“骷髅会”学生组织，邀请权贵子弟和学业优良的同学加入，但他知道，中国是不会容忍学生秘密结社的，所以他将这个组织命名为“战略与国际研究议会”。同学们说，王子云曾经有两个女朋友，但都不是藏人。

北京交通管理局在事发后15分钟内到现场，不到一小时，三名中央警卫局（又称九局）的副局长，以及一名中央办公厅的副主任赶到现场。车祸发生时，令计划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封锁消息，防止丑闻扩散影响到他。当时新闻记者和警方已到场，令计划竟然以中办主任身份调动中央警卫局去封锁现场，北京街头出现坦克车队，大量军人入城，惊动市民，网上有人惊呼军车进京是有政变发生。当局指是造谣，大举清查，拘捕造谣者6人，抓捕了上千网民训话，并查封16个网站，多达3100多家网站遭行政处罚。

中办主任私自调动中央警卫局的御林军对中共来说，是犯了大忌。中办警卫局俗称“中南海警卫军”，主要负责中央政治局、全国人大、政协领导人和来访重要外宾的安全工作。中共九名政治局常委前五位，每人相应配有一位副局长，专责安保。中央警卫局直接负责在京中共党政军头子的安全，其调动有极严格的程序，以防有人用御林军发动政变，抓捕政敌（据已故历史学家高华讲，文革发动后，林彪被毛泽东指定为接班人，但毛对林彪始终不放心。林彪的毛家湾住地原先是由军委办公厅警卫，但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加派由汪东兴直接指挥的8341部队，两个单位共同警卫林彪住所）。老毛对中央警卫团的控制，使林彪不敢有所动作。文革后华国锋抓四人帮即是由汪东兴的中央警卫局动手。

而令计划作为中央警卫局的政委，实际上无权调动这只御林军。但一向谨慎的令计划这次却

突然胆大包天。3月19日令计划亲自带了3个中央警卫局的副局长和8341部队的人马，包围北京市公安局，称其子被政治谋杀，要求北京市公安局交出尸体并立即对车祸展开调查。周永康很快知道了真相，他立刻赶到北京市公安局。周永康同令计划达成协议：周永康帮令计划进入常委；作为回报，令计划确保胡锦涛不再追究周（家）的犯罪，停止中纪委已开始的调查；确保薄熙来和谷开来的谋杀案彻底“切割”，免除谷开来的死刑，借口是海伍德是英国人，英国没有死刑。对王立军则只指控“叛国罪”，不做腐败上的指控，因为会牵出周永康的腐败；王立军和周永康自辽宁盘锦开始就是合作的关系。

周永康同意成立一个来自周、令阵营的两人小组，其职责是与北京公安协作掩盖丑闻。这两人是中央政法委的秘书长、中央综治委副主任周本顺和令计划的妻弟谷源旭。谷源旭曾是央视保卫科的科员，但在周永康和令计划的亲信、黑龙江省委书记吉炳轩的帮助下，成为黑龙江省公安厅的副厅长。周永康、令计划同意各自承担车祸赔偿费用的50%给受害女孩的家属，让他们保密。赔偿金额在3000-4000万，一半由周永康的儿子周斌出，一半由令计划的小舅子谷源旭出。《南华早报》引述消息人士说，在法拉利车祸发生后，蒋洁敏将数千万元人民币从中石油的账号转到了车祸两名受伤女乘客家人的账号上。

谷源旭和周本顺在24小时内让北京警方三次改换了令计划儿子的证件上的名字，甚至将北京居住地也修改了。他们还强迫重伤女孩在救护中签字，确认死者的身份“假名字”，姓变为“贾”。他们还威胁受伤女孩和家属，签订协议，永远保密，不对外讲事实真相，作为每人得到1500万赔偿的前提。如果不答应，将被开除，并性命难保。甚至威胁，她们家人也会逐一失踪，尸体都找不到。他们还将处理现场事故的警察记录全部销毁。事发后，有人将信息发到微博，也有两名记者到场，但微博信息全部删除，报纸报道在印刷前被撤稿。为了掩盖真相，“法拉利”都成了禁止词，不许搜索。为了转移视线，周本顺和谷源旭特意将死者的证件改为姓“贾”，使得公众认为死者是贾庆林的私生子。同时动用网监手段，派人操纵令谷的各社交网络帐户，在网上以“王子云”名义发短讯给北大同学，做出令谷仍然在世的假象；同时有令谷的北京大学同学被告知，令谷已出国，暂时无法取得联络。据说，中办的人甚至在6月对香港一家刊物放消息说，令计划儿子已在网上报了平安。

但要命的是，令计划却将整个事件瞒着胡锦涛，其后随同胡锦涛出巡办事，他一直若无其事，神情轻松，甚至谈笑风生，毫无丧子之痛，而儿子的遗体也一直摆在殡仪馆的冷冻停尸间，毫无举行丧礼之意。有人分析，令计划以为可以一手遮天，但也可能是利令智昏，十八大临近，权欲压倒理性和亲情，胆子大了。负责领导人安全的中央警卫局同样被鼓动协助令计划掩盖真相，这激怒了该警卫局前局长（江派）以及现任局长曹清，曹清此前就对令计划存在疑虑。令计划瞒主遮丑花钱免灾适得其反，为胡锦涛的政敌送上了炮弹。

贾庆林对网上传他私生子出车祸非常愤怒，他派人进行了秘密调查，很快就发现死者是令计划的儿子。薄太子、曾太子等虽然也开着法拉利招摇过市，但还不至于猖狂糜烂到在飞驰的车上玩一拖二“PK”的地步，“法拉利事件”反映出：令太子平时在床上乱搞名模、校花、演员、舞星二P、三P……都嫌不过瘾了，要一边手掌方向盘飙车，一边胯下夹着女人玉体“嘿咻”才够刺激，在生死时速之间如醉如死，“玩的就是心跳”，此是何等的荒淫、空虚、无聊！令太子超乎想象的猖狂、荒淫、糜烂，暴露出令计划对儿子的超级放纵护短，强烈地反映出令计划的卑鄙庸俗。调查报告被悄悄地呈送给江泽民。兵变传闻惊动中共高层。一位公安部门的“深喉”，将3.18车祸内情报告给王岐山，王岐山转告朱镕基，朱镕基嘲讽地说：“畜生不如！”朱镕基等元老要求中央严肃处理，其中对令最严重的指控就是擅自调动中央

警卫局。6月，江泽民把胡锦涛叫到家里，问：江泽民曾亲自问胡锦涛：北京发生了法拉利车祸事件，你知不知道？胡锦涛说“不知道”。江泽民又问：令计划在儿子车祸事件发生后，动用警卫局抢尸体知不知道？胡锦涛回答说“不知道”。“令计划把儿子尸体放在太平间几个月，不让妻子和亲友去看，生怕人们发现，一个人自己的独生子死了，连个追悼会也没有，连个悲痛的表情也没有，第二天还嘻嘻哈哈的大笑，这还是人吗？这人有点人性吗？”胡听了，大气也不敢出。江又大声呵斥道：“没有人性，哪里来的党性！这样的人在我们最高领导人的身边工作，你说危险不危险啊？你说我急不急啊？！”

除了车祸事件，选举事件也引发胡锦涛政敌的愤怒。2012年5月7日，令计划说服了胡锦涛召集300多中央委员到北京进行了一次秘密的政治局常委初选投票。这个投票本来是定在6月25日进行的。提前初选是周、令共同策划，以避免令公子车祸事件造成的巨大后果。在他们努力下，令计划在5月7日的初选中名列第三，为以后取代习近平打下基础。但初选投票没有按中共的常规举行，例如向退休的领导人征求意见，以及对现任的9常委进行彻底解释。多数退休的领导人以及现任的领导人都不清楚为什么突然提前进行初选。

超流氓“预选”不仅大大地得罪了江泽民、曾庆红和常委会的众寡头，也激怒了中南海元老帮。导致宋平、李鹏等力挺胡锦涛连任的顽固派元老，再也挺不下去了。据闻：令计划出事后，江泽民给胡锦涛恩师宋平打电话说：重庆的事他（指胡锦涛）都推到薄熙来身上，令计划的事情他难道也能推到别人身上！？宋平一时无言以对。贪腐根本不是惹他们发火的原因，薄熙来和令计划调动军队使他们感到刀架在自己的脖子上，才是怒火冲天的原因。

2012年8月北戴河会议讨论18大人事，众元老要求对令计划彻底调查，将令计划革职。一位大佬当面批评胡锦涛：“令计划会不会成为第二个薄熙来？”“你看人到底准不准？”“薄熙来做重庆市委书记，你也是说非常可靠的呀？”但是，薄熙来的案子还悬而未决，政治局常委觉得，十八大会议前，同时处理两个备受瞩目的案件，政治上风险太大。“一个薄熙来就已经够我们受的了，如果再出一个，还能收拾局面吗？”作为折衷方案，令计划被逐出权力中心。于是，9月1日胡锦涛的第一亲信、胡的大内总管的令计划已不再兼任中央办公厅主任，调任统战部长。纽约时报评论说，令计划处理儿子车祸失当打乱中共的接班安排，让江泽民的人马得以主导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胡锦涛则提前交出党权和军权。

十八大后，传出令计划家族因腐败在新领导人第一波廉政风暴中遭到清算的各种传闻。其妻谷丽萍据说在2012年12月3号被调查人员叫走询问，同时被限制活动。谷丽萍弟弟谷源旭被捕。令计划哥哥令政策也被调查。北京知情者说：“令家垄断了整个山西的煤炭行业，她的老婆谷丽萍光从刘志军的高铁建设中就赚了40亿。令家和薄熙来控制了山西一年400亿元的煤炭利益。”令计划收受了山西运城专员兼全区渗灌工程总指挥黄有泉的1000万贿赂后，就下令山西抓记者高勤荣，并以莫须有的罪名判了12年有期徒刑。谷丽萍借令之名，操控团中央，对外以团中央名义成立基金会，借青少年教育之名，在全国各地大搞房地产，数年间已积累财富达数十亿规模。令计划本人在统战部的活动有报导，但镜头都是一晃而过，与他职位应该享有的报导待遇不相符合。据传：令计划与薄家有渊源，与薄熙来有勾结，涉嫌与薄熙来、周永康、李源潮密谋向习近平夺权。但也有人指这个说法就像当年，把林彪集团与四人帮硬性连在一起，是没有事实的政治指控。其下场如何尚待观察。

日前网上出现为令计划翻案文章，指其子是阴谋的受害者，他是遭到暗杀，有人制造车祸以扳倒胡锦涛的团派势力。还有人认为这场阴谋的幕后老板很可能就是习近平。

原来陈昊苏的儿子陈小虎和令计划的儿子令谷；二人都是北京城有名的纨绔子弟，不学无术，吃喝嫖赌毒，无所不为。二人发生矛盾不为别的，只是因为一个女人，就是那天晚上法拉利赛车的藏族美女杨吉。陈小虎和杨吉发生一夜情之后，神魂颠倒，意乱情迷，很想长期包养她。没想到扎西卓玛根本看不上他，只是拿他做征服男人的实验品，以便打败情敌，俘获真正的猎物令谷，临走时还甩给他六百美金作为补偿。太子党后代陈小虎不知是自己有意还是受人指使，反正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一直跟踪他们，并趁令谷带两个女学生在三里桥酒吧寻欢作乐时，指使人在他的跑车刹车系统上作了手脚。结果车祸事件的发生。

身受重伤的二位女子都是十分貌美的 25 岁的藏族姑娘，已经大学毕业，而非在校学生。其中一位是青海省公安厅副厅长的女儿名叫扎西卓玛，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另一位藏族姑娘亦来自青海藏区，是一位享有声誉的活佛女儿，毕业于政法大学，名叫杨吉。事发后，连当时死亡的驾驶员三人，都一起被送往医院，青海省公安厅副厅长女儿扎西卓玛算幸运，伤及腹部，肚破肠流，治愈后回青海疗养了。杨吉伤得比较严重，腿断成三截，手臂折断，半身被火烧焦，头发都烧光了，生命一度垂危。她昏迷了两个星期，但性命保下来了，除了失去两腿，腰以下瘫痪了。杨吉醒来，听到法拉利驾驶者不幸去世的消息，却冷漠而愤愤地说：“随他去，不关我事！”2012 年 8 月，杨吉逐渐恢复。在北京接受理疗期间，她开始感到寂寞，就给朋友们发短信，聊到车祸的事。一个月后，杨吉感到不舒服，医生给她打了一针，杨吉昏睡过去后就再也没有醒来。医院宣布她突然死亡，家属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本来，家人已打算过了冬天就送杨吉回青海西宁疗伤，如今一切成空。

有人向亚洲周刊表示，中共的高官家属连外国人都敢毒死，还有公安高官参与隐瞒，一个中国公民又算得了什么？北京知情者对透露：“令计划谋杀了在其子车祸中幸存的一个藏族女孩杨吉！杨吉去世后，政府将其藏区的亲属从青海接到北京参加葬礼，所有食宿交通费用均由政府包办，但所有亲属都被严格控制，不能随便乱跑，在京用车都由政府提供。丧礼上不能拍照，并要求所有参与丧礼的人士严守秘密。丧礼结束遗体即刻火化，没有进行尸检，而且骨灰不能带回家乡。尽管杨吉的父亲在北京有藏传佛教中心，在青海也有寺院，但在杨吉的后事办完以后，当局即派人护送杨吉父母出京，到四川成都暂住。据说，远离京城是为确保十八大稳定；杨吉父亲没有任何指责和要求，他表示不会追究，一切认命。但有京城朋友见过只有一个独女的杨吉父母后说，两夫妇看上去一夜间变得十分苍老。

杨吉在政法大学读书时就是大学公认的校花，长得出众。她大学毕业后仍留在京城补习外语。因为早前她父亲在美国的一位华人弟子已帮她办妥去美国西部一所大学的读书申请，正办理出国护照，原本 2012 年 9 月要出国赴美深造。现在却悲惨的随鹤西去。

18. 习近平“神隐”迫使胡锦涛“裸退”

胡锦涛 2002 任总书记后，胡与江泽民在权力继任人事上斗得相当厉害。胡锦涛本来有双李接班的安排，即十八大李克强接班任总书记，而李源潮任总理。胡锦涛为此曾作了大量造势。但如意算盘的第一步在十七大被江泽民打乱，由习近平抢了李克强的位子。

王立军事件后，胡锦涛和习近平的矛盾骤然尖锐了起来。因薄王案的牵连，周永康失势，习近平加盟，胡十年执政只到 2012 年才开始真掌军权，他不甘心刚掌权就交权，于是抓住几

个即将退休军头的贪腐痛脚加以要挟，军头们就知趣地公开表态：军队要听胡主席的指挥。让军头一再表态拥戴，目标是针对习近平，希望他同意胡仿照江泽民的先例再当两年军委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前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首长董建华于 2012 年 9 月 19 日间接接受 CNN 访问时说胡锦涛会继续担任军委主席；事实上胡锦涛已派他的私人秘书陈世炬出任军委办公厅主任，替自己的延任作部署。胡锦涛想打破党内惯例搞习、李“双接班”，让李克强进军委，废除邓小平的“一个核心”原则。更重要的是，“双接班”的背后是胡做“太上皇”。

胡锦涛想当太上皇继续驾驭习近平，习近平不愿意，内心极度反感。8 月初的北戴河会议做出了两个决定性的人事议案，一是常委“9 变 7”作为党内共识被最终确定下来，二是“储君”习近平正式接过神权力大棒，并与胡锦涛商榷决定。而江泽民作为人事安排的最高顾问将被咨询全部人选。这意味着习近平已经提前接权，统筹整个十八大人选，为自己上任后的班底开始铺垫。《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宁要微词，不要危机》，痛斥某些领导思想僵化到了极点，面对危机一味镇压、蛮干，玩“击鼓传花”的游戏，故意把危机推给下一任。“十八大”前发出的这篇社论，抨击胡锦涛到了露骨的程度，比点名的效果更佳。

2012 年 8 月底、9 月初，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发表题为《胡温的政治遗产》的系列文章，分上、中、下三篇。上篇总结胡温十年的成绩，中篇列举胡温十年的问题，道出“问题比成绩还多”；下篇提出换届后新领导人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该文罗列胡温时代十大问题，突出三条：社会道德体系崩溃，意识形态破产，没有建立一个能有效说服人的主流价值观；救火和维稳式外交缺乏大视野、大战略和具体思路，未能有效利用国际大变动带来的机遇，导致自身被动；政治改革和民主化推进不力，与还权于民的期望有相当大距离。这组贬损胡锦涛的系列文章的出台，必定得到中央党校校长习近平本人的首肯。

习近平还反对将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写入 18 大政治报告和党章一审稿。习近平在 9 月 1 日在中央党校讲话时，就对“科学发展观”绝口不提。随后未公开露面。习近平“神隐”两周是由于 18 大人事摆不平，与胡锦涛发生激烈争执，因而发脾气以养伤为名拒绝见外宾。习突然呈上“辞职书”，不愿接班总书记。18 大临近，换马已不可能。胡只得请出元老和场，习乘机“上书”党内元老及常委，隐然抗议两“太上皇”干政，并提出自己的执政纲领，等于向大佬喊话：“同意我的主张，我接班，否则另请高明。”终获支持，同时，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得以写进 18 大文件，习近平才在两个星期后的 9 月 15 日终于亮相。

胡锦涛希望十八大常委有较多的团派人物。在胡锦涛执政的最后几年，令计划联合团派高官李源潮，安置团派的人进入中央委员会以及各省的负责人，在人数上超过太子党和其它的派别。李源潮在文革中发起的“红卫兵红旗支队”是鼓吹血统论最激烈的组织，他破四旧、抄家、武斗等等。随后他到苏北的大丰农场插队 4 年。1978-82 年他在复旦大学数学系学习。其后，父亲的老领导、前上海市负责人陈丕显，改变了他的命运，让他进入共青团系统，并踏上仕途快车道。1983—1990 年他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1989 年天安门事件时，他主管的《中国青年报》发表了大量同情示威大学生的文章。随后被降职为中央对外宣传小组一局局长的李源潮在此后的十年里又陆续担任了国务院新闻办副主任、文化部副部长等闲职，2000 年担任江苏省委副书记，2002 年 16 大当选中央候补委员；两个月后，接替回良玉，出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另外李源潮曾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接受过“发展中的领导者”培训，他在江苏执政期间太湖污染丑闻频发，“太湖卫士”吴立红以莫须有被判刑。还传江苏老干部对李源潮心生不满，认为他魄力不够，政绩不突出。2007 年李源潮从江苏省委书记任内，被胡锦涛调入北京出掌中组部，并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李源潮的小舅子 2011 年

在澳门赌博，输掉 2 千万，人被赌场扣住，是广东军区动用军款才把人赎回来。明镜网报导李源潮有“国外情妇”、有受贿、得罪左派等问题。原来，李源潮任中组部部长后，只是把李鹏任命为山西副省长而得罪了李鹏。李鹏数次告状的直接原因，是李源潮数度在高层会议上提党内民主，提出要将干部选拔方式改革作为政治改革的前导进行试验，并已着手进行了相关方案的研究工作。李鹏认为，抛开党所坚持的行之有效的干部任用方式，是想从结构上彻底改变共党，是打算“刨根”。李鹏指责李源潮在六四之后在共青团保护了一批人，“同情六四分子”，担心一旦李源潮成为常委，会使中共政治天平会进一步向平反六四倾斜。

汪洋未入常也与此有关。因为汪洋得罪了广东豪门叶剑英家族，据悉叶家的叶选宁（叶剑英次子）在北京向元老们及太子党中打小报告，散布消息说汪洋政治不可靠，此人绝对不能入常。李鹏认为汪洋有支持“六.四”的反党言论。汪洋 1955 年工人出身，38 岁前没有大学学习经历，唯一的学习经历是 1979-80 年，在中央党校学习。1993-95 年，在中国科技大学管理科学系管理科学专业研究生班在职学习，整到了一个工学硕士。此时，汪洋任安徽省委副书记、副省长，而科技大学就在他辖下的合肥市，这个文凭是不是贡品？

江派看准了胡的意图，派人与胡主动接触，双方密商达成口头协议：江支持胡再当两年军委主席，胡默认江的人选进政治局常委，“只好对不起李源潮、汪洋了。”2012 年 10 月 22 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 18 大政治报告及党章修改稿，实际上讨论最激烈的是常委名单。江泽民未出席，但会议传达了他自称代表一些老同志对十八大人事的三点意见：一，少用共青团的人；二，少用高干子弟；三，多用第一线工作的同志。江的目的是要他的人来挤走团派的李源潮，因为李源潮既是高干子弟也是团派核心人物。次日海外即第一次出现了李源潮和汪洋出局的七常委名单。胡开始操控十八大兑现这“口头协议”。按例，设主席团及其常委操控大会，后者是决策机构。胡让 12 位前常委进入主席团常委，占比 29%，希望他们是劝进胡再当两年军委主席的主力。会议最后推选政治局常委，胡让李源潮、汪洋主动退让，于是江派人马当选。会上有人提议胡再当两年军委主席，可是无人响应，元老中有人反对，军中高层也有意见，经过内部讨论，才逼使胡锦涛被迫放弃。当然，事后人们可以说，胡的裸退为今后权力交接树立了榜样，使以后退位的总书记都不能霸占军权不交，成了习所称赞的高风亮节。只是这“高风亮节”是形势所迫，并非出于他自愿。

中共 18 大召开的一个月前，习近平把自己的人马安排到军中的重要部门，以加强他在军队中的领导地位。他把几大军区的司令召集到北京，组成中央军委新班子，领导全国武装力量。18 大常委基本上是江泽民安排的，政治局胡锦涛团派居多。朱镕基在国务院金融系“分猪肉”，李鹏力保儿子升省长，其余大佬向人大、政协都塞“代理人”。18 大结束时，老人帮对 18 大 1 中全会还都有各自的要求。江泽民提出把徐才厚留在军委，以老带新。胡锦涛对胡春华、张春贤等团派大员，也有特殊要求。据悉，习近平会前协商时，对江胡的要求都满口答应，但是一中全会选举出的军委名单满不是那么回事。习近平的原则是，18 大你们做了主，一中全会我得做主，就体现在军委成员我说了算。

江泽民 2004 年卸任中央军委主席后，一直在“八一大楼”保留了他的办公室和几名专用秘书，江泽民不时到访办公室，与现役军官和军方首脑会晤，行使他对军方的影响力。胡锦涛的大秘陈世炬在七中全会召开前夕的十月底出任军委办公厅主任，江泽民关闭了他的军委办公室，人们以为胡锦涛会循江泽民模式再任两年的军委主席后，突然，胡不但裸退，陈世炬连中共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还惨过令计划；因为令计划还保留了中央委员，只是丢掉了书记处书记的职位。前全国人大代表、烟台大学教授王全杰对《苹果》记者说，令计划 2013

年任政协副主席是胡锦涛交班的条件，“我让你习近平上，你就要保证我的人上也上；这是一种平衡。党内要讲信用”。王指，自邓小平时代开始，每代领导退位，都要安排自己人上位，这是中共党内规矩。“现任人大副委员长李建国就是李瑞环(前全国政协主席)安排的，李瑞环退位时说，要三个正省级指标。李鹏走（退位）时也说，要把儿子李小鹏提起，现在（李小鹏）当山西省长了。”62岁的王全杰是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曾连续三年向人大提议案，要求官员财产公示、废除两会“举手表决、鼓掌通过”庸俗做法，甚至提出“军队国家化”，惹当局不满，当时有官方人士暗示他：“想继续连任就少说点。”他不从，终被踢出全国人大。

据北京一些分析家指出，习近平上台执政，当时面临两方面的威胁，一是野心勃勃虎视眈眈的薄熙来，一是想在十八大后仍然垂帘听政的胡锦涛。但习近平运气好得不得了，薄熙来因王立军事件不但入常梦断，还搞得身败名裂。而胡锦涛则因为亲信令计划之子一场车祸而被打乱权力部署，被迫在十八大黯然落台。妨碍习近平大权独揽的两个主要障碍被清除。

实际上，习近平已成为自邓后权力最大的新君，他获得了拥有“最后否定权”的毛泽东似的权力，以致毛似语言又一次主导中国。习囊括的权力有：1）中共的领袖；2）中国的领袖；3）国家军队大统帅；4）中央警卫团大统帅——中央警卫团控制中纪委；5）司法大部长，由习近平统领下的新一届政法委，就涵盖了公、检、法、司、军、武等所有对民众实施专政的机构，其维稳功能得到了进一步加强。薄王事件发生后，当时的十七大领导班子立刻果断地对周永康采取了几项紧急措施。一是不让他主持政法委常务工作，由政法委副书记孟建柱接任。第二，中央军委取消政法委可调动武警的权力。到十八大时候，为了不再养虎为患，政法委恢复十六大之前的体制，政法委书记也不再由政治局常委担任（现任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只是政治局委员）。6）无神论宗教教皇——中国的唯一宗教是共产主义无神论，习近平是教皇；7）教育司长——中国的教育全是共党控制的，以爱共党为核心内容，随意篡改历史，不仅如此，习近平等中共高官每个人都有博士学位，虽然习近平在福建做官，从来没有去北京上过课，一样拿个响当当的清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

19. “习八条”拒绝江泽民干政

年近九十李洪林说，毛泽东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暴君，专制独裁是共党的“命根子”。邓小平在向江泽民交班时说：“毛在毛说了算，毛死了我说了算，今后你说了算。”江泽民自退下直至今日，之所以一直能以太上皇自居，诸事指指点点，是共党独裁制度造成的。与江同届退休的元老田纪云曾暗批江泽民：“要明白，到了眼睛睁不开了，嘴巴合不拢了，腰也直不起了，头脑也不清醒了，还赖在台上，是不讨人喜欢的！”18大主席团常委江泽民在亮相之后，便立即遭到李锐的猛烈抨击，几次揭发关于江的丑事，称“以前领导人不得干预现任领导人的工作”。18大会议后，前二任中纪委书记尉健行、吴官正批评说，从2007年11月以来，中共党内、社会各界对江泽民违纪违法、践踏党章、凌驾党中央等行径，曾向中央政治局、中纪委反映的信函累积近2500多件，全部被压下，形成“三无”，无一件作过回复、无一件在会议上讨论过或有过批阅、无一件有转告给江泽民或江泽民办公室。

2012年11月15日中共新班子亮相推迟了近一个小时。当时的原因是胡锦涛“突然袭击”。主持者依程序即将宣布散会时，已身为“前总书记”的胡锦涛突然站起了身：“主席团的同志们，我请求即席发言。”胡锦涛忽然要求即席发言，这是会议议程中没有的程序，出乎所有与会人意料，称之为“突然袭击”绝对贴切。包括江泽民在内，众人面面相觑，一时不知

失措。但是，一世循规蹈矩的胡锦涛突然间变了一个人，视众人惊愕反应如无物，不待主持人“批准”，面容冷峻地从衣袋里抽出两页稿纸……念道：

“同志们，十八大顺利召开，党的新老交接工作顺利完成。今后，和大家见面机会可能要少了，所以，想借这个宝贵的机会向同志们说几句话，一共三个问题：第一，我当总书记十年：心中牢牢记小平同志的教诲，惟恐辜负七千万党员的信任……我已经尽了力，希望大家能够谅解。我退下来以后，坚决做到对下一届的领导不干预、不批示。第二，在十八大上，我交出党的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明年三月的人大上，我将交出国家主席和国家军委主席职务。然后，我立即搬出中南海，撤销以我的名义的办公室，也不会再在军委设置办公室。希望从我开始，已经退休的领导人，都不能再干预新领导人的工作。第三，习近平同志党性强，能力强，有魄力，有原则，善于团结同志……是一个合格的党的总书记，一个合格的党和国家的军委主席。每一个老同志，都应该支持他的工作，而最好的支持，就是信任他，不干预他的工作，让他放手统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我的话完了。”胡锦涛说毕，谁也不看，谁也不打招呼，就在霎时凝固的空气中，噙泪愤然转身，誓不回头，疾步离场。

胡总的身影消失，会场立刻就炸开了锅，“老同志”们愤愤不平，纷纷质问习近平：“他什么意思？他话中有话骂谁啊？”“我们来开会干预吗，咱退休可没退党呀！”“习总书记，你得给个说法……”。习近平先与随员说了几句，然后站了起来朗声说道，“请大家安安静，请大家安静，我现在宣布两条纪律，也可以说是两条决定。第一，胡锦涛同志的即席发言不向党内传达。第二，这件事到此为止，请大家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发言内容不得外传，不得外泄。如果有人入作了记录，请自觉销毁。我宣布，主席团会议现在散会，大家可以去休息了。”老人们在习不容置辩的宣布后，一个个悻悻然地离开了会场。习近平急招随员出去找胡锦涛，但胡的座驾已驶离。习近平终于放弃了等待，11点54分，率领尚未从心灵震荡中走出的新常委，鱼贯而出，幕前亮相见记者，第一句话，便是为由于自己决定造成的延误道歉。这就是十八大一中全会后，新常委“集体迟到”的真实经过。

18届1中全会闭幕当天，江泽民给习近平和政治局写了亲笔信，提出“今后，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礼宾顺序中，我和其他老同志排在一起为好。请予同意。”

2012年11月29日，中共7常委在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习近平说：“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历代以来最大的梦想。”习近平的“中国梦”——“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是江泽民在2000年提出的。新任总书记首篇讲话提江泽民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向江表达感谢提携之恩。但习近平讲话却对胡温十年的政绩及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只字不提，对前任胡锦涛明显不恭，显示习和胡之间有心结。

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率领6名常委，到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提出“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口号。在12月4日中共的第二次政治局会议上，习提出了“改进调查研究（基层探访“轻车简从”，不得封路）、调控会议活动（开短会、讲短话，力戒空话套话；未经中央批准，领导人一律不出席各类剪彩、奠基活动和纪念会、表彰会）、精简文件简报、规范出访迎送（外访不安排使馆和华侨留学生到机场迎送）、改进警卫工作、压缩会议报道（政治局委员出席会议和活动应根据工作需要、新闻价值、社会效果决定是否报道，进一步压缩报道的数量、字数、时长）、限制出书题字（除中央统一安排外，个人不公开出版著作、讲话单行本，不发贺信、贺电，不题词、题字；此条被认为是胡锦涛的“政治遗产”——结束老人干政尤其是江泽民的干政）、厉行勤俭节约”的“习八条”。

据说 18 大一中全会刚结束，江就在北京玉泉山寓所（隶属中央军委）设淮扬菜家宴招待俞正声、张德江、刘云山、张高丽以及李长春、曾庆红、李岚清等。江以 30 年陈酿黄酒祝四位当选政治局常委，并给四人鼓劲：“不要自我约束。要好好干，不要患得患失。”

12 月 15 日江致信政治局、中宣部，提出要加大力度对新晋升政治局常委、委员的经历宣传报导。21 日，江还购一批优质苹果慰问海军、空军、二炮部队，同时致信中央政治局、中央军委，要求“关心”全军生活，把职业军人薪酬提升比地方党政干部高。21 日晚江泽民携夫人，亮相国家大剧院，观看政治密友李岚清成立的“三高乐团”（高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高级军官）的新年音乐会。次日，音乐会正式演出之后，李岚清宣布乐团解散。

2012 年 12 月 22 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绿竹神气——中国一百首咏竹古诗词精选》首发式，江为该书作序，江的《七律·竹园》一诗及手迹也收录在该书首次公开发表。居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刘延东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出席首发式并为有关单位赠书。这本鸟书居然要出动两位政治局委员的，溜须拍马也太过了吧？

紧接着 12 月 24 日，江泽民题写书名的相册《黄菊》的出版座谈会在上海举行。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出席会议。死了好几年的黄菊有这样重要，需要此时为他出书？当然不是。黄菊生前，传出不少他的贪腐丑闻。显然，这是上海帮内部的相互取暖、相互打气，加强内部凝聚力。而在陈良宇被揪出来时“背叛”上海帮的韩正自然要出来讲话，“立功赎罪”。

12 月 25 日江又替竣工启用的长江四桥题字；27 日，江又为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江泽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20 年回顾》小册子做出了批示。30 日，新华社发表 15 大常委们的退休生活组照，江泽民居首，大有“送君送到大路旁”的依依不舍。其中人民网刊登上海前市委书记陈良宇陪同江泽民视察的照片，而陈因为贪污罪名还关在监牢里。这是否表示陈良宇已经平反或表示对胡锦涛的否定？

更意外的是，年龄已过 60，失去上海市委常委职务的上海市副市长杨雄，突然被任命为市委副书记兼代市长。杨雄是真正的上海帮，在上海的经历与地位与重庆市长黄奇帆相若，是扶持江大公子绵恒进入商界“闷声大发财”的功臣。这是江泽民的回报，也期望他会保江家族的利益。由韩正、杨雄两个上海本地人出任市委书记与市长，违背了中共内部的潜规则。习近平为何做出这样的妥协？原来被视为“上海帮”的俞正声，其实与江泽民也有矛盾，习、俞先后出任上海市委书记时，就排除了杨雄的晋升道路，如今出现反复，是习近平有把柄被江泽民抓住？而俞正声因为江推举进入政治局常委而需要报答？

江泽民公开背离“习八条”，就是有意拆习近平的台，让他言而无信，失去威信。江胆敢这样做，显然也不是他一人之力，还有一个亲信曾庆红，在太子党内还有相当能量。曾庆红如此为江卖力，显然与江想保护他的儿子江绵恒一样，也想保护他的儿子曾伟，因为他们都是太子党中捞钱的能手。这些中共元老们的子女搜刮民脂民膏无所不用其极，因此需要联手，共同对抗来自民间的改革压力，来捍卫特权集团的利益。

2012 年 12 月 26-29 日，胡锦涛前往江苏南京、无锡、泰州、盐城等地考察。在其母校江苏泰州中学时，胡锦涛称“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胡锦涛语带双关，再次表达反对“老人干政”（长江后浪推前浪），同时力挺习近平（一代更比一代强）。胡锦涛此番讲

话被大陆媒体广为报导，众多民众大骂江泽民干政。为消除江不断兴风作浪造成的严重后果，习近平借助中共元老来制衡江泽民及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等江系势力。

中共元老万里、乔石致信中共中央委员会、中纪委提议召开中央委员会特别会议或中央政治局特别会议来正视、解决江泽民在党内外非正常性活动及其造成的影响。信中明确表示，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和中纪委应当阻止、批评有关宣传部门、地方党政为江泽民搞不适当宣传活动及造神活动；中共政治局及有关部门就江泽民对中共中央方针、政策、人事等方面意见、建议列作正常信函处理，不应列作特殊性、凌驾性来处理等。

2013 年 1 月 21 日，杨白冰葬礼，江泽民在杨白冰花圈排名首次排在现常委和十七大还有职务在身的 4 常委之后。1 月 22 日，新华社发表“江泽民请求在礼宾排名中与老同志排在一起”的电讯，称赞“这体现了一名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和宽广胸怀。”

2013 年两会结束后，习近平、李克强政府全面上位掌权。2013 年 7 月官方新闻高调报道江泽民会见基辛格的消息，表示信任、支持习近平政权。

“习八条”出台之后，中国一改曾经那种令出不行，“政令出不了中南海”的前朝恶习，而是马上在全国得到执行。这彰显了新领导的权威与强劲的执行力。应该说“习八条”对于扼制业已泛滥的吃喝之风具有明显的效果。2013 年 8 月 27 日，河北日报头版发表《习近平正定工作纪实》，回忆三十年前习近平担任正定县委书记不久，就出台《中共正定县委关于改进领导作风的几项规定》，从 6 个方面要求正定干部转变衙门作风，抓大事、干实事。网民嘲讽：原来今日的“八项规定”“转四风”，是重复 30 年前的“正定经验”。当年没听说正定县在习治下成为改革先进，今日的刻舟求剑，能让中国克服内忧外患？

自从 2012 年 12 月 4 日“习八条”出台，中共的党风政风是否有了根本转变？百姓的回答是否定。《共军报》2013 年 4 月 29 日《师政委蹲连，士兵怕打呼噜影响其休息戴口罩睡觉》消息，透露了体制不改，“习八条”只能是谎言。不仅闹出“习近平打的”假新闻，制造“在机关食堂吃得比酒楼还奢侈”，而且让部队的士兵连舒舒服服睡觉的权利都被剥夺了！5 月 2 日多家网站刊登《北京军区回应‘豪车挂新军牌’：避免浪费继续使用》：一辆价格超过 45 万的大众途锐牌轿车挂新式军牌行驶在 106 国道，违反了中央军委新颁布的 40 万元以上“高档豪华轿车一律不准挂新军牌的规定”，北京军区竟然诡称：“豪车挂新军牌”是为避免浪费而继续使用！“习八条”成了废纸一张！5 月 3 日《新京报》有《河南男子两遭冤案自尽其母曾拦下温家宝车队》、《老鼠肉加入明胶等冒充羊肉售往上海江苏》，证实今日中国平民常常突然死于拆迁、上访、举报、冤狱、城管、假药、毒食、水土污染……

从 6 月 2-7 日，6 天 4 场大火——2 日，位于黑龙江大庆的中储粮库大火，5 万吨粮烧光光；同日，中石油大连石化分公司油渣罐爆炸，死伤悲摧；3 日，吉林宝源丰禽业有限公司突然爆炸大火，官方承认有近 200 人遇难！7 日，又有《上访冤民被迫制造厦门公交车爆炸大火致 47 人死亡》。由此引发朝野对习执政能力的全面质疑——习任国家主席仅仅两个多月，竟两度与夫人满世界表演情侣游，其重外交，轻内政，重虚荣，轻民疾！既不像“党鞭”，更不似公仆。此次东北“三把火”，也可说是习近平的新官上任三把负火，烧出了习治国避重就轻、避实就虚，“家丑不可外扬”的毛式思维。“习八条”转作风只是自欺欺人的形式主义，“习七不”禁止政改更是讳疾忌医。如此倒行逆施，焉有不长城内外水深火热？

20. 习近平的自信与胡锦涛的悲哀

习近平手握重兵，自傲狂妄，中外少见。他自言：治大国如烹小鲜。词的本意是治国应小心谨慎，他却意味深长地明言：治理中国犹如小菜一碟。言之太早，太狂。

习近平没有“三个自信”，倒是有一个自信：权力自信。身为太子党，接共党大位，似乎理所当然；由擅长权谋的江泽民推出，江系暂不至于威胁习的权力；而不善权谋的胡锦涛，已经裸退，胡派也再无构成危害。应该说，习上任，游刃空间远比当年上任的江、胡来得宽、来得大，岂能没有几分权力自信？观习近平，无论说话，走路，举手投足，都远比胡锦涛显得自信，也更比当年上任之初的江泽民显得自信，概因其权力来路不同。

值得品味的一个细节：2013 年两会结束时，习近平对胡锦涛“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特地转身回头，带头向胡锦涛鼓掌致意，胡则起身，鞠躬致谢。那一刻的胡，表情严肃得可怕，几乎是哭丧着脸，而对应的，习近平也表情严肃，竟无丝毫在那种场合应有的笑容。习、胡二人均毫无笑意的场面，反映了他们内心世界的紧绷，进而反映，胡裸退，并非心甘情愿。其幕后，权力斗争的惨烈与残酷，恐怕只有他们自己，才能体会个中真味。

胡锦涛本人在十八大上被江派耍弄后，失去所有原部下效忠，成为孤家寡人。卸任国家主席的胡锦涛，继去贵州旧地重游、回江苏故地寻根外，2013 年 8 月又到广西一行。胡锦涛在桂林曾有感而发的说，现在最想能清静平静下来。他称全退以后心情仍是很沉重，难以平静，更会失眠，甚至想在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定居下来。据胡锦涛身边的人说，“他的内心很苦，卸任后不但失眠，而且经常焦躁不安。”原因是权斗失败。

2013 年 2 月 23 日，元宵节的前一天，京城近千名红二代以“延安儿女团拜会”的名义，聚集在八一电影制片厂，表达对习近平的赞赏和支持。会上，原中共掌控思想意识形态、极具保守色彩的政治元老胡乔木之女儿胡木英发表新年贺词，竭力赞扬习近平带领中国共产党在生死存亡之际，摆脱了抛弃社会主义理想的危险。据消息称，这也是红二代聚集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就在去年，也是在这些中共老革命后代的春节聚会上，胡木英却公开指责当时的中共最高领导人把中国带入社会危机，失去社会主义理想，而且没有解决危机的能力。今天，当同他们一样出身的习近平入主大宝之后，给这些红二代们带来的是无限自豪与欣喜。

从习近平的“南巡讲话”的“男儿”论，再到千人团拜会所庆贺的“理想恢复”，从习近平“不能改的，再过多长时间也是不改。”再到胡木英的“我们能对这些无动于衷吗？能看着父辈流血牺牲打下的江山就这样和平演变的丢掉吗？”都令人惊悚地看到，原来这些太子党与红二代们所信奉的、所迷恋的、所维护的社会主义理想，依旧是充满着极权、杀戮、谎言和暴政的苏联模式。诚然，也只有这样的专制模式，才能够保住他们的特权与豪富，保住他们子孙相继、万年不变的红色江山。他们所要走的，才是真正的老路与邪路！在团拜会上高唱《我是一个兵》的那些红二代们，都是立场坚定的共党国卫士的。要知道，1989 年邓小平之所以下决心调动部队屠城，也是有不少太子党们在下面苦苦相劝的结果，说再不开枪，我们这些人的脑袋也会被民众吊到电线杆上的。习近平的“男儿”论，其意正在于此！

21. 习近平、李小鹏“拼爹”

习近平从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到总书记用 15 年时间。

习近平 1997 年 9 月只是中共 15 大候补委员最后一名时，他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也不知道自己的未来。正如 18 大候补中委李鹏的儿子李小鹏成为最后一名一样，李小鹏也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李小鹏是“拼爹”，习近平也是“拼爹”。因为年仅 15 岁的习近平在 1969 年下放到陕北农村时，当地人知道他是习仲勋的儿子，给予优待。媒体报导说习近平当年到延安背了一箱子书，只是与高官熟悉的朋友这样道出“谜底”：若不是习近平有这个爹，就是他背一百箱子书，也不过是一个“愣头青”，除非整天干农活混日子之外，不会有任何飞黄腾达的机会。有爹，就有一切。且看邓小平儿子邓朴方成为政协副主席，名列“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中。邓小平的儿女邓楠，也是靠爹当上了中央委员。有了爹，就可以接班，小地方的官僚可以把儿子接小地方的官，大地方的官僚就能让儿子接大地方的官，爹荫蔽了自己的子孙，红色江山当然要留给自己的“官二代”。

现阶段提拔接班人，基本上都是“拼爹拼后台”以及拼盘式的，前任政治局常委基本上都是现任政治局常委的后台，“你拍一，我拍一，大家一起玩游戏”，江泽民仍然是势力最大的一个。习近平在福建、浙江和上海工作时还没有想到自己将来会成为总书记，到了 2007 年底的 17 大时，他才越过李克强成为接班人，是死去的爹帮助他有了这样的机会。

从“储君”到成为“君”，只用了 5 年时间，他的背后有江泽民、曾庆红的力量支持，有了爹，又有了后台——能力一般便可，就等于有了号召的大旗，于是十八大后的政治局常委基本拼图完成。江、曾支持的有习近平、张德江、俞正声、王岐山、张高丽、刘云山，李克强算是胡的“团派”（李克强 1978-1982 年在北京大学法律系学习，校学生会负责人，1982-83 年任北京大学团委书记，1983-85 年任共青团中央学校部部长兼全国学联秘书长，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1985-93 年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全国青联副主席，1993-98 年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兼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院长，1998-99 年任河南省委副书记、代省长。）。中共的总理容易换，也最难当，如果李克强没有李鹏、温家宝的“不倒翁”功夫，可能就会像朱镕基一样干五年下台，因为张德江、俞正声的常委和人大委员长、政协主席职务，只干一届，五年后就要换人，当位子空出来，难以支撑下去的李克强就只能到人大去度日了。未来十年，若是习李的时局一直如胡温十年一样的话，习李也是维持，当好“挡箭牌”，只要大墙不倒，维持一天算一天。

习梦斯人--中共历史民间版（3）

22. “红二代”都当“裸官”了，还有信仰？

1966 年 7 月 29 日，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学生部的干部子女，贴出一幅引人注目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此世袭制对联被迅速复制到各个高校。普通学生们管这幅对联叫“鬼见愁”，确实是鬼见愁，因为对方的辩论根本不是严肃认真的讨论问题，只是要你表明支持还是反对的态度，对反对者的处理也很简单，一个字——打！这批“血统论红卫兵”的疯狂残暴完全超乎了人们的想象。他们在父辈的默许和支持下，开始用拳头、军用腰带、棍棒来对出身不好的“黑五类”（从前的地主、富农和资本家的子女以及知识份子的子女）进行殴打乃至残杀。

从1960年代初期，大学招生越来越“彻底”地贯彻阶级路线。很多人，从出身上就被决定了绝对进不了大学门。一般出身的人，则被大学的重重密级规定所限制，很多专业根本不会录取他们。他们只能报考师范或那些古老的、与国家发展关系重大的前沿理论技术无关的专业。清华附中在1964年有一位天才少年、名叫张明的学生，他刚刚16岁，功课极好，只因为父亲在台湾，而被拒之在大学门外。这一下子几乎使他神经崩溃。该校的学生章坚学习成绩优秀，只因为出身问题，就不能上高中而只能在家待学。阶级政策虽然越来越左，但是还是难以满足那些干部子弟的胃口，他们利用社会的政治形势，从小就要占据所有有利的位置。出身不好的人首先就要和自己的父母和家庭划清界限，深挖家庭对自己带来的坏影响，不同出身的子弟在不同的起点上，本身就已经意味着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就是为什么在当年对联辩论中有人跳上台，大义凛然地宣称自己是混蛋，有人举鞭打死自己的父母的原因。

1966年8月2日凌晨，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接见了辩论双方的代表，指出对联“不全面”，“老子反动，只要儿子是革命的就要团结他”，他建议将对联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横批：理应如此。”随后催生出更多如下对联：1.父母革命儿接班-----当然；父母反动儿背叛-----很难。横批：理应如此。2.老子枪杆打天下稳上稳；儿子皮带保江山牢上牢。横批：专政到底。3.老子闯江山革命革命再革命；儿子定乾坤造反造反再造反。横批：代代相传。4.老子革命打江山；儿子造反为江山。横批：代代红。5.老前辈降群魔大杀大砍；后来人伏妖崽猛镇猛斩。横批：谁敢翻天？

1966年8月12日，谭力夫贴出大字报主张将“血统论”作为党的阶级路线来推行，引发更大辩论。为了显示红色贵族的与众不同，在谭力夫讲话的影响下，他们相继成立了西纠、东纠、海纠等组织。后来的“联动”就是以这三个组织为核心组织起来的。

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简称西纠）成立于1966年8月25日，他的成立和活动，受到陶铸、王任重、廖承志等许多老革命的支持，就连周恩来都曾派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副秘书长雍文涛、许明指导他们的活动。“西纠”成立后，陆续发布了13道通令，内容庞杂，涉及中央党政机关、革命干部、国家机密、首都秩序、以至对资产阶级政策和外宾接待政策等许多方面，但核心只有一条——保护老爹。《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指挥部第八号通令：“这里，我们要严厉警告那些妄图反攻倒算、变天翻案的混蛋们：以前，我们的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出于对阶级敌人的刻骨仇恨，抄了你们的家，打了你们的人，给你们戴了高帽子，牵你们去游街示众，赶你们回原籍劳动改造。我们认为，抄了就抄了，戴了就带了，游了就游了，赶了就赶了，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们想利用群众运动中的一些缺点错误，疯狂地进行阶级报复。告诉你们，这只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们每一个纠察队员完全有权力、有义务协助革命群众，坚决镇压一切阶级敌人的反攻倒算！”

“红二代”文革时期的宣言——《告全国混蛋书》：“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混蛋——社会游民，社会青年，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狗崽子。中国人民从来就是勤劳勇敢的，一切好逸恶劳、游手好闲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败类。党中央号召我们听毛主席的话，走共产主义革命大道。党和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可多年以来，你们这群混蛋们，听了吗？没听，也根本听不进去。你们十几年来不喜欢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总是妄想发家致富，走资本主义道路，你们千条万条就是要兴风作浪，要想推翻共产党，恢复……你们太不自量力了吧！你们如果愿意革命的，就不要甘心当混蛋，必须立即与资产阶级彻底划清界线，站在革命人民一边走社会主义道路。否则，我们就要对你们专政、专政、专政到底！让你们这群甘当民族败类的混蛋们在无产阶级面前发抖吧！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我们伟大

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自来红们站起来了！我们是顶天立地的革命后代，我们是天生的造反者，我们到这个世界上来，就是为了造资产阶级的反，接无产阶级的大红旗，（我们的）老子拿下了这个政权，儿子就要接过来，一代一代往下传。

“有人诬蔑我们是‘自来红’，崽子们，你们的诬蔑是我们的无上光荣，你们说对了，要问老子是那（哪）个大名，就叫自来红！我们从小长在红旗下，长在红色部队。家庭环境中从小饱受了红色的革命教育。我们的老子跟着党，跟着毛主席从枪林弹雨中闯出来的，他们对党对毛主席特别热爱，并且从小就这样教育我们。所以，我们从小就对党和毛主席有最最最深厚的感情，最最最热爱毛主席。老子的革命精神时时刻刻渗入我们体内，我们从里到外都红透了，自来红正说明了老一辈的革命传统怎样传给了革命后代，我们是纯纯粹粹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血统，我们受的是地地道道的革命教育。……革命的重担落在我们的肩上，大权一定要我们掌握，这是毛主席给我们的最大光荣和最大权力。谁敢反，我们就坚决专他们的政，要他们的命。……谁他妈的敢反自来红，就让他尝尝“自来红”的厉害，而且要现在红，将来红，永远红，红到底，闹他个全球红，都红遍。敬爱的毛主席，您老人家放心吧！我们这些自来红一定读一辈子您的书，听一辈子您的话，一辈子按照您的指示办事，一定把红色江山保下来。（让）您的伟大思想红旗插遍全世界！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1966年10月1日，手眼通天的老红卫兵们在中南海政治局礼堂正式成立“联动”组织，这个组织当时并不叫“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它戴的是一顶更大的帽：中共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共军各军种、中央军委、国防部革命干部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它实际上是以“东、西、海纠”为核心，联合北京各高校干部子弟组织的一个联合体，其核心任务是“保爹”。“联动”成立后，更加疯狂地抄家打人制造混乱，甚至有人昼伏夜出杀害对立面的人，引起了社会治安的严重动荡。1966年12月18日谭力夫被逮捕投入监狱，中央文革成立了“谭力夫专案小组”，不断追问谭力夫的后台问题，想以此引起全国人民的公愤，借以除掉政治对手。可谭力夫毕竟不是普通人，他在狱中清醒地认识到中央文革“打孩子是为了整老子”的企图，学着革命先辈的样，咬紧牙关硬是一句不话，非常投入地表演了一翻。为了证明“血统论”的正确，他还在狱中写下了一首《铁窗歌》：“铁窗孤影对，深夜寒风吹。生当共产党，死作革命鬼。纵死亦含笑，问心无大愧。敬爱毛主席，万岁万万岁！”1967年5月29日，谭力夫被释放出狱，后来也当了故宫的副院长。

习近平与薄熙来，文革初期都是“联动”的红卫兵，那些平民出身的红卫兵哪个不是被他们打出去的。聂卫平的《围棋人生》披露，1968年北京25中红卫兵圈子里有“三平”之称，就是习仲勋之子习近平、刘震上将之子刘卫平以及高干子弟聂卫平。他们属于血统高贵的红卫兵“联动”这一派，而另一派是平民和“黑七类”子弟。据聂卫平回忆，他们这派要纠合起来去“铲平”另一方，数百人到38中的操场集合，怎知对方先下手为强，包围了操场乱棍齐下，一下子就把这些权贵子弟们打得四处逃窜。幸得习近平、聂卫平溜得快，逃过一劫，刘卫平则被打成脑震荡。聂卫平在他的书中还写道，1990年代他曾和时任福建省委书记的习近平见面叙旧，习近平感慨：“当初要不是跑得快，就没有现在的戏了。”

中共的权力中枢完全不可能正常吸纳普通的平民精英，只有那些有机会高起点入仕、并有人脉因缘不断得到越级提拔的人才有可能到达中共最高层。这样的特权人物只有两类，一类是从学生干部就进入团中央因而具有仕途高起点的“团派”，另一类便是具有血统优势、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太子党”。胡耀邦曾因重用平民出身的“青红帮”（此即“团派”之发端）而得罪了党内保守派，1986年，陈云针锋相对地提出，“还是我们自己的子弟比较靠得住”；“干

部子弟接班，不会掘祖坟”，能确保革命江山“代代相传，永不变色”。中共十七大政治局已产生了一个由“太子党”与“团派”分享政权的中央领导集体。习近平为地地道道的太子党；吴邦国之父吴忠性原是共军指挥学院院长，少将军官，吴邦国也是不折不扣的太子党。李克强之父李奉三原为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虽然只是地方官僚，但在地方有权有势，一定程度上为李克强的升迁架了桥、铺了路。李克强也属于一个典型的中共权贵子弟。周永康之父周一萍曾任国防科工委副政委，级别为正军级，周永康乃名副其实的高干子弟。

2012 年，这些“联动”“红五类”都“接了班”成了党国“栋梁”，被视为红色江山的东家和董事；江泽民和胡锦涛这些“红色工程师”只被视为管家和职业经理人。习近平在访问俄罗斯时说他最欢喜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可见读书水平之幼稚、落后与反动。稍微眼见高一点总要看《战争与和平》这类俄罗斯名著。从习近平思维、性情、行为来看，倒是一个标准的红卫兵。有他做榜样，央视在高调报道“清网”运动时，也用了大家已很陌生的文革语言。红卫兵的特点是思维简单，逻辑混乱，无知无畏，他们对文革反思不够，因此这些人由于年龄优势上到各级领导岗位，很容易思想中间偏左、再偏左。红卫兵这一代有“三个自信”：即“基因自信、资源自信、路线自信”。“他们对毛泽东的红色基因，认为比前几代要更加多；另外他们有资源自信，现在中国经济上成为第二大国，那么他们对经济资源也开始越来越自信。另外他们对自己拟定的路线也很自信，即上承毛泽东路线，同时也可以应付现实需要的唱红打黑，给社会底层以好处。”陈子明认为，习、王给已建立起“左派领袖”名声的薄熙来留生路，就是要为红色江山，留下一个超越于现体制的潜在可能性。

孔丹的父亲孔原（1906-1990）原名陈铁铮，江西萍乡人，1925 年加入共匪，原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妻许明是周恩来的秘书；文革期间，孔原夫妇遭到迫害，许明在 1966 年吃安眠药自杀。孔丹 1947 年生，1965 年，北京四中高三的学生党员孔丹已是“接班人的榜样”。文革时期的联动，本是鄙视劳动人民的纨绔子弟——如孔丹、薄熙来之流。文革结束后，不少市民上诉中央，要求清查文革中干尽坏事、欠有血债的红卫兵。中共枪杀、关押了很多平民出身的红卫兵，但对老红卫兵等“联动”分子却网开一面。当时在处理联动反革命分子孔丹等人案子时，中共元老陈云批示说：“孔丹等人是我们自己的子弟，是我们将来可靠的接班人，不是清查对象。”陈云这条批示成为高干子弟文革罪行不受清查反被培养作权力继承者的组织原则。孔丹于 1978 年考上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生，师从经济学家吴敬琏。不过，1981 年拿到硕士学位的孔丹并没有继续做学问。他在国家机关工作了一段时间，其间曾任国务委员张劲夫的秘书两年。至 1983 年，似乎有可能走上仕途的孔丹又选择了步入商海。他加盟刚刚成立的光大集团，前往香港，从此开始“红色资本家”的生涯。2006 年孔丹成了中信的掌门人，为正部级干部，年 59 岁。孔丹的公司市值 99 亿元。

在 2013 年 2 月北京四中同学会上，老同学之间爆发了宪政之争。原中共调查部部长孔原与国务院副秘书长、周恩来秘书许明之子，原中信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孔丹与原宋任穷秘书、原招商局集团董事长，博源基金会理事长秦晓就改革与宪政问题的交锋。特色派的孔丹和普世派的秦晓都曾是高干子弟云集的北京四中的学生，并曾共同发起组织了“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西纠），两人背景相似，并都在文革中上山下乡，并都在体制内的大型金融投资类国企如中信等任职高管。但现在，两人政见却南辕北辙。根据胡德华转述，在北京四中这批老三届的一次聚会上，一边是普世价值，一边是正统派各级官员，后来大家就吵起来了，吵起来之后，正统派就说你们这些普世派别给我们领导来添乱了。当时秦晓说，“百姓的呼声你们真的就不知道，真的就没听见？听见了也还能那么平静那么无动于衷吗？”孔丹则说，“你的意思不就是要共产党下台吗？”秦晓说，“同学啊，你怎么连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同

学的话都听不进去。”孔丹大怒说，“你他妈还是共产党员不是了，你还有信仰没有了”。后来，秦晓则说，“那你有信仰没有啊，你把你的老婆孩子全送到美国去，你这个裸官还有信仰？”最后，据说孔丹就挂不住了，直接上粗口，说我操你妈的……

孔丹认为：秦晓主张宪政，作为共产党员就是没有了信仰的体现。这种表述是暴露出孔丹已将中共的永远掌权看成自己的信仰。可见，权力才是真正的中共党员的信仰。

胡德华自称，“这个事对我刺激非常大，事情都知道，道理呢也都明白，但是不能说，不能商量，否则就老拳相加。”孔丹代表的利益集团认为：未来的中国会陷入混乱，老婆孩子和钱包必须放到境外安全地带。秦晓们试图改变政治体制，实行多党民主。结果，保守派要动粗武斗。在中国不能谈普世价值、谈宪政民主人权，否则离“颠覆罪”就不远了——你反对奴隶主的压迫啊，那还得了！看来，未来的中国很可能陷入短时间的内战。

在朝的中共特色派占据着官媒，包括光明日报、人民日报、求是杂志及红旗文稿；而在野的普世宪政派多只能通过网络发表言论，学习时报与南方报系偶尔也能发出一些观点。孔丹的声音，不是一个人的声音，而是习近平为代表的权贵利益集团的声音。甘肃省委书记王三运公开表示拒绝普世价值，湖北省委宣传部长尹汉宁指责宪政民主普世价值都是美丽谎言，《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揣测说主张普世价值背后有政治动机，还有所谓“不给普世价值留空间”等等。他们看到，要么实行一党专政，党规即法规，要么实行宪政，水火不可能兼容。如果宪法权威神圣，那么党的神圣权威在哪里？

23. “两个不能否定”的出笼

1999年江泽民搞国庆50年花了1千多亿。2009年，胡锦涛为了炫耀他的个人权力与声望，竟靡费5千亿公帑，大搞窃国60周年的阅兵典礼活动。就在这样的“辉煌六十年”的大型方队中，竟然还推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他自己的所谓“四大伟人”巨幅画像。

焰火晚会之后，江泽民连夜提笔给中央写了封信。信的内容大致如下：他称参加了60年的庆典，一晚上不能成眠，感到我们共和国的60年很不容易。前30年跌宕起伏；后30年稳步发展。前三十年有很多经验教训要总结。后三十年总的来说是成功的，我们有很多执政的经验可取，也有一些要总结的教训。信的大意如下：1.辉煌六十年的说法不准确，既然都辉煌，还搞改革开放干什么？2.四幅巨像有个人崇拜之嫌；3.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都是改革派，不能轻易否定。据传，当时作为江泽民隔代钦点的王储习近平拿到这几条意见后，竟然跨过胡锦涛，径直到中央党校紧急传达，并且不许记录，几分钟念完便宣布结束。

上面这段传言的真伪，尚待考查。但“辉煌六十年”的庞大方阵，在中共媒体上频频回放，给人深刻印象。而这被胡锦涛高调宣传的“辉煌六十年”，就是今天国内“两个不能否定”的起源，其始作俑者，就是当时的社科院副院长兼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国史学会常务副会长朱佳木。朱佳木的父亲朱理治（1907-1978），在中共党史上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他是陕北肃反的主使人，《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00页上一条注释中，就有他的大名。朱理治是江苏南通人，1927年4月加入中共；1935年，他作为中央代表和陕甘省委书记，口含天宪，偏听偏信，在陕北大搞肃反运动，让200多人冤死。1935年秋，陕北那里“大坑都挖好了，再迟一两天，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张秀山等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就被活埋了。”也

就是说，如果中央红军来晚一步，别说习近平了，连他老子习仲勋都没了。就是这样一个党史留名的极“左”人物，中共建政后仕途并未受太大影响，曾任东北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主任、全国核资委员会副主任、交通部副部长、中央财经小组成员兼国家计委副主任、河北省革委会副主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在他逝世后，家人对他所处的历史地位很不服气，屡屡上书为其鸣冤叫屈，连第一版毛选上的这条注释，后来都作了改动。这也是小说《刘志丹》几次被禁，连包括习仲勋、习近平父子也不愿意再去触碰的原因之一。

2009 年，是朱佳木一帮左派文人在建国 60 周年时，试图弥合改革开放前后 30 年的理论冲突所作的尝试。这个论调的基本观点是“不能用后 30 年否定前 30 年”，“绝不能因为前三十年有错误，就否定那段历史是新中国 60 年光辉历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朱佳木所讲，“新中国成立后的头三十年，为改革开放提供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基本的物质和技术条件、宝贵的实践经验和必要的国际环境”，而今天“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则是前 30 年的延续。这个毛派理论的要害，就是在宣示他们红二代世袭执政的合法性，就是要重走回头路，并拒绝任何形式的可能会危及他们自身安全的政治体制改革。

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蠹下，作为权贵利益集团的代表人物一个个都握手言和并且抱成了团来维护共党几家世袭制。习近平选择了朱佳木的“两个不能相互否定”，而朱的父辈正是整肃自己父辈的直接责任人；作为共军上将的刘源，亲自给毛新宇少将授衔并亲切握手祝贺，而毛的爷爷正是整死自己父亲的直接责任人。习仲勋被毛迫害之时，告诫孩子千万不要为此怨恨毛主席，你们是毛主席的孩子，要永远听毛主席的话，只有听毛主席的话你们才有出路。因此，对与习近平这些红二代来说，只有党妈妈，毛父亲，亲父亲母只是生物意义上的父母。即使父母辈被毛迫害之死，也是咎由自处，不会改变对毛的敬拜之情。红二代是一批没有亲情滋长起来的冷血动物，是一批权力的嗜血者，是一批不食人间烟火的怪胎怪物。习近平是这样，薄熙来、刘源也是这样，都是不计父亲被毛迫害之冤，认毛作父的不肖之子。

习近平、薄熙来们的知识结构是“学毛为主、兼学别样”的畸形结构，他们的精神世界是“以毛泽东思想为纲、其余都是目”。故此，去毛化意味着他们“世界观”的迷失，也意味着其政治信心和勇气的丧失，而这是如今大富大贵、意气风发的“红二代”所不可想象、也不能接受的。可以说，大多数太子党都成了毛泽东最忠实的孙子。因为没有睡在天安门广场上那个木乃伊毛泽东，他们这些一个个花拳绣腿但又炙手可热的“红二代”们，又安在焉！毛泽东之于薄熙来、习近平，正如秦始皇之于项羽、刘邦，其残暴虽令人畏惧，其威仪却令人神往，终究难以抗拒“大丈夫当如是”和“彼可取而代之”的帝王梦想。对于已经接了班、掌了权、得了毛家“红色江山”的习近平来说，不亲毛又亲谁呢？只有毛泽东的招数可以压制他们不喜欢的人，压制那些企图挑战自己权势的人；相同地，只有模仿毛泽东才可能稳定政权，对他们而言，政权稳定保证了个人利益和权力。这位决心以身家性命捍卫一党专政的铁血“男儿”，正如大家对他的评介，说他“不像是习仲勋的儿子，更像是毛泽东的孙子。”

何清涟说：“毛的好学生”具有的反人类、反人道、反文明、反理性特性。美国著名的文化新闻网络杂志“每日野兽”(thedailybeast)2013 年 10 月评选全世界过去 100 年 13 大暴君，毛泽东以害人最多、超越杀人魔王斯大林和希特勒而名列世界第一。1930 年毛泽东因李文林不服他的独断，利用反“AB 团”杀害了李文林等 10 万人；36 年后，毛泽东因刘少奇不服他的独断，利用“反修”整死了刘少奇等 2 千万人。实际上，毛泽东开创了整个国际共运恐怖肃反的先河。他教会了斯大林，教会了贝利亚，教会了阿尔巴尼亚的霍查，教会了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教会了匈牙利的拉科西，教会了波兰的贝鲁特，教会了捷克的胡萨克，

教会了朝鲜的金日成，教会了红色柬埔寨的波尔布特……波尔布特学习毛泽东的“成绩单”如下：在其执政的3年零8个月时间里，他杀害了全国1/3无辜的人民——200多万。波尔布特主要是用饥饿的办法来消灭人民的，他是向他的老师毛泽东学的，毛夸奖他一举消灭了阶级，做得好。这证明毛是用大饥荒消灭落后阶级的老手。柬埔寨共党同时杀害了18万越南裔，越南共党对柬埔寨共党实行报复，于1979年初入侵柬埔寨，消灭了极端邪恶的波尔布特共党政权。可是中国共产党，不但没有对柬共的杀害40万华侨滔天罪行实行任何制裁，连屁也没放一个，而反过来出兵打越南，这就是邓小平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

“毛的好学生”习具有怎样的特点？有人说：习是伪装成毛左派。因为：毛打倒刘、邓的罪名是“右”，打倒林彪的罪名是“形左实右”，邓打倒胡、赵的罪名也是“右”。当共党总书记的教训是，在取得事实独裁权前，必须先用“左”包装、武装自己，然后才能歼敌得胜。所以，习近平，要把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为纲”30年与邓小平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30年的两个政治资源统一起来，作为其未来执政十年的“思想路线基调”。习近平在建党一百年，要圆一个从毛到习的完美之梦，这个梦只能是中国人民的恶梦。

2013年1月5日，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发表讲话，强调不能否定前30年历史。他说：“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原来在习近平眼中，连“大跃进”、“文革”这些灾难都算是“社会主义探索”，那么人们还能期待什么？习近平的意思是不要用毛的三十年来否定邓的三十年，也不要邓的三十年来否定毛的三十年，也就是说，毛跟邓都是一党专制，都是不能否定的。这是习近平向权贵党的效忠宣言，他是要继续手握毛泽东这把刀子不放，按中共的家法执政，正如毛教导共产党不能放弃列宁斯大林2把刀子一样。他就是要坚持这种最落后最反动的制度。这显示，他想当一个新的威权主义者！习近平如上讲话再次引来国内左派和毛帮的万众欢呼，甚至用“共产党的中央政权终于重新回到我们自己人手中”、“事实已经证明习近平同志是毛主席的合格接班人”这样的语言来欢呼和称颂。

“两个不能否定”的出笼，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让中国老百姓像歌颂改革开放30年一样，歌颂前30年中共领导下对中国人民的贡献，来为中共党史继续营造虚假的“伟光正”形象。在此期间，民间对中共所犯下罪错的历史记忆，如镇反肃反、反右、大跃进造成惨绝人寰的大饥荒和无法无天的文化大革命等等，都统统被人为地隐藏泯灭了。

习近平主张“家丑不可外扬，党内丑事要保密”。2010年7月21日，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说：“研究和宣传中共历史，要旗帜鲜明地揭示和宣传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和核心作用形成的历史必然性”；并“坚决反对任何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习近平认为近年来很多暴露中共错误的党史回忆，都是所谓“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而要加以反对。习近平在历史问题上的极左思维，就反映在他2011年指导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党史第二卷》中，其中不但强化“毛泽东思想”，肯定“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正确的”，也肯定了“三大改造”。习近平说不能给党抹黑，所以只能贴金。

一党校教师说：“89年那场风波，我们就是不能再讲了，因为说不清，非要讲就是揭伤疤，更疼，还要流血。我们不讲，你们看，这二十年发展得多好。父母不讲，学校不讲，青年人不知道，这对大家都好。还有，59、60、61年三年困难时期，你要是正式告诉老百姓我党执政时期，三年里饿死5千多万人，成千上万的村庄成了无人村，哪还了得了！比日本人杀中国人还多，还省事，还省时，还省钱，还不用牺牲自己人。老百姓听了这些非反了不行。

所以我们讲党史要有底线，越过底线就犯规，就要受惩罚。习近平同志的意思也是这个。”

习总书记跟胡锦涛高歌“辉煌 60 年”，要求“两个不能否定”，谁敢“否定”谁就应倒霉！胡德华批判说：“不能否定前三十年，我们是不是文革不能否定？是不是反彭德怀不能否定？是不是反右也不能否定？是不是薄一波依然是革命的叛徒也不能否定？是不是毛主席所说的习总书记的爸爸习仲勋“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是不是也不能否定？如果说都不能否定那我们否定的是什么，否定的是三中全会以来的拨乱反正，否定的是改革开放，不就把我们自己给否定了吗？所以我也闹不清了……。”胡耀邦家族被习暗整。因为胡德华公开太子党的分歧，受到了一系列攻击报复，背后黑手就是往日情同兄弟的习近平。

歪曲历史事实、漠视社会公义，以确保“党能台上站得住”而垄断政权，撒谎“毛泽东成就巨大论”是注定失败的。只要把毛泽东的档案在阳光下揭开，任凭习如何大喊“不准继续侮辱毛泽东”，也是毫无意义的。历史事实早已宣示中国共产党根本没有统治的正当性，以前没有，现在也没有。毛泽东不是被人无端否定的，是他的所作所为否定了他自己，吟诗玩女，斗人杀人，把自己狠狠扔进历史的垃圾堆。百年风雨，乱中之乱，莫过于毛统治中国的时期。事实上：共党实行的是比公开的帝制还专制独裁千万倍、还黑暗千万倍的党天下帝制！毛泽东解放的仅是他自己或者是他那个集团的一小部分人，广大的工人、农民、商人、知识份子等等，在毛统治下实际上沦为了新的奴隶，是不可能得到什么“解放”的。他们不但没有言论的自由，甚至连基本的人权都没有保障，随时都有可能被批斗、被抓、被监禁、劳改，乃至被迫害致死，被饿死，被枪杀的可能——铁流先生和他的难友们的苦难经历都充分说明了这些。中国劳苦大众和知识精英吃透了共产怪兽的苦头，这批现代的吃人怪兽，他们是一批整人狂、迫害狂，中华民族因为有他们的存在而身陷绝境，成了任这些魔鬼们任意宰割的羔羊。必须彻底清算这些魔鬼们的滔天大罪，才能告慰那些九泉之下的无数冤魂。

24.中共继续邪教似的“唱红”

所谓“唱红”，就是唱某类特定的歌曲，其中的歌词具有政治倾向性，歌颂某一政党；经过反复歌唱，最后使唱歌者真的以为，这个政党确实有着歌词所歌颂的优秀品质和丰功伟绩。结果是，一个政党可以将“唱红”当作统治工具，即使自己在实际上并没有做到歌中所唱的那样，但仍能获得民众的拥护。这样，就会放松对自己责任的履行，甚至利用权力祸国殃民。例如，当中国社会承受着因毛泽东重大错误导致的大饥荒时，电台里却天天播送《东方红》歌曲，高唱毛是“人民的大救星”，使得中国不但没有对毛的错误加以纠正，反而走向了文革内乱。因此，“唱红”不仅误导民众，对统治集团并没有好处。中共执政后，有 4 次唱红高潮。第 1 次是 1950 年代大跃进时期，至今还留下一部《红旗歌谣》，“戴花要戴大红花，听话要听党的话”就出自于此。第 2 次是六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时期，从铺天盖地的毛泽东语录到小靳庄诗歌，农民不干活每天写诗。第 3 次就是 64 镇压后两年里反和平演变唱红歌；第 4 次就是 2009-2010 年唱红歌。事实上，唱歌主要是个人爱好，但非要唱一种歌，而且还要弄出高潮，就非国民之福。第一次高潮后，饿死 5 千万人；第二次再高潮，又斗死 2 千万人。第 3 次高唱，对抗世界潮流。第 4 次又唱了，光是拆迁就已经死了不少。

早在薄熙来搞唱红之前，中国的毛派和红二代已大力宣扬提倡红色文化，比如搞红色旅游之类。薄熙来不过是拿过来搞大而已。以陈毅长子陈昊苏为团长、聂荣臻独女聂力中将为政委的开国元勋后代合唱团，首先到重庆举行演唱会，掀开了山城唱红的大幕。CCTV 天天唱红；

而重庆的“唱红”，则一度形成覆盖重庆全市的 3200 万人的运动，连重庆的囚犯都被迫大唱“革命”歌曲。重庆市政府还花费巨资竖立一个巨大的毛泽东铜像。这种红色运动的动机，无非是借人们对已故领袖的膜拜，来树立当地领导人薄熙来的权威。2010 年，薄熙来默许市中心悬挂的两面旗帜，上称“人民的薄书记：全国人民向您的团队致敬”，“胡总书记英明，温总理卓越，薄熙来了不起”。一位挺薄的学者，还把薄熙来和市长黄奇帆比作毛主席和周恩来。薄熙来口口声声高举毛泽东旗帜，但他的本意并不是真的想要重走毛泽东道路，他只是想学中共的历来欺骗手法，借助群众运动达到窃取最高权力的目的。大刮文革风的“重庆模式”一时被看好，薄熙来炙手可热。中央常委吴邦国、贺国强、周永康，乃至储君习近平都亲往重庆，对“重庆模式”予以肯定。很多投机人物因看涨薄熙来而倒向他。

从 2008 年 6 月份“唱红歌”运动 3 年半来，重庆一共举行了具有一定规模的“红歌传唱”活动 23.58 万场次，参与市民达 2.87 亿人次，总共挥霍掉几千亿元。薄熙来在重庆发起所谓“‘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发红言’红色经典”活动，单单发短信 1 条，人民币 1 角 1 条，向 1600 多万手机用户发一次短信就是 160 万元。薄熙来挥霍民脂民膏，丝毫不含糊。薄熙来可以无视奉节县的小学生 8 小时翻山越岭去读书的电视画面，依然花费 1000 万元赴香港唱红。薄熙来为搞政绩，为进入 18 大常委增加筹码，搞什么“森林重庆”，搜刮全国的名贵树种，一年就花掉了重庆三年的财政收入 3000 亿，在鸿恩寺大兴土木，一棵桂花树要花 40 万，听说贵州的桂花古树都被薄搜刮光了。鸿恩寺搞得就跟当年慈禧太后搞的颐和园一样。如今又因薄免职而拔掉银杏，大概又要耗费上百亿元资金，这钱花得够冤的。

新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上任之后，对毛泽东的推崇又日渐公开。习近平重新抬高毛形象主要是为了加强自己的权力，以此作为手段打压要求宪政民主的力量，以此来避免亡党。

习近平一直推崇毛泽东。习曾于 1966、1997 和 2011 年三访韶山。第三次访问发生在 2011 年 3 月 20-23 日，当时两会结束不久，习近平赴湖南调研，专门到韶山向毛泽东的铜像献了花篮，参观毛泽东故居，同时还去了刘少奇和彭德怀故居。2011 年 8 月习近平和美国副总统拜登到四川都江堰青城山中学参观，习近平对学生们念毛泽东语录“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很多方面都显示，习近平是个坚定的毛分子。2012 年 11 月 17 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习近平实行了“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路线”。

在 2012 年中共 18 大前夕，曾是“四人帮”干将的毛侄儿毛远新与一伙毛生前勤务人员、退休干部高调造访南水北调工程源头河南淅川县，纪念毛提出“南水北调”构想 60 周年，呼吁民众“饮水思源”。显然是为抬出毛这块神主牌制造舆论。2013 年 2 月 3 日，白痴毛新宇在河北石家庄启动毛诞辰 120 周年系列纪念活动。他声称，毛泽东发展马克思主义并开拓社会主义国家，“为全世界提供了成功的先进经验”。因为智障，这些言论都是别人准备好的，他只是照本宣科而已。据云，这具不堪入目的痴孙在 2013 年内将被捧到一些“革命圣地”，来推展纪毛活动。毛泽东家乡湖南湘潭市 2013 年拨出高达 155 亿人民币，加快 16 个重大项目的建设迎接毛诞。相信这笔经费由中央补助，地方官员又可以趁机沾毛光而捞一把。湖南韶山市将纪念毛诞作为压倒一切的最大政治任务，12 个重点纪念项目建设投资 19.47 亿元。名为纪念“伟大领袖”，不知会有多少银子落进贪官的口袋。湖南当局宣布，已投资近 20 亿人民币来纪念毛诞辰 120 周年。如此铺张，大耗国脂民膏，与习近平倡导的“节俭”，显然是背道而驰的。这些钱还不如发给穷人改善生活！

从 1954 年就开始当“人大代表”的老妖精申纪兰 2013 年又成了红人而见报；她得意忘形到在清明节为毛泽东烧两个纸美人，以免毛在阴间寂寞；报答 60 年前毛对她提拔之恩。三宫六院的毛泽东居然在阴间也可享齐人之福。2013 年 4 月 21 日，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联合举行中央国家机关“强素质·作表率”读书活动 4 周年的纪念活动，莫言发表《文学创作漫谈》的演讲：“现在有很多人在否定毛泽东，把他妖魔化，把他漫画化，但我想这是在蚍蜉撼大树。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现在有些人去把他丑陋化、漫画化、魔鬼化，是缺少理智的。现在谁要肯定毛泽东，是要冒着很大的风险的。”莫言肯定毛泽东，照样名利双收，有何风险？如果他到天安门毛泽东画像前，呼吁当局兑现 60 多年前实现宪政民主的承诺，将认识到“风险”源于哪里？2013 年 4 月 25 日，位于河北邯郸市临漳县刘广营村的毛泽东铜像举行揭幕仪式。毛女李讷、女婿王景清以及毛勤务人员出席典礼。该尊毛铜像重 4.1 吨，像高 6 米，基座 4.1 米，虽由农民企业家捐款建成，当然也是经过政府核准，才得以污染华北大地。这是继毛一百寿时在韶山建成铜像后的第 3 座。

2013 年 5 月 4 日，一批红二代、红三代齐聚井冈山纪念朱德、毛泽东会师 85 周年。到场的有毛外孙孔继宁、朱德外孙刘建、陈毅之子陈昊苏、何长工之子何光晔等。毛左得意之际，必然要去打击非毛的人士。他们的共同目标就是“枪打出头鸟”，对付曾经在两年前发表讨毛檄文《把毛泽东还原成人》的经济学家茅于軾。于是，不论茅到哪里演讲，他们就在那里阻击。规模最大的一次是 5 月 4 日茅于軾到长沙演讲《看懂中国经济：如何让财富增长》，遭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左派抗议，他们拉起写着“汉奸过街人人喊打”、“茅老贼祸国殃民”等横额，挥舞“毛泽东思想万岁”的红旗，在市区聚众闹事。讲座被迫更改地点。腾讯燕山大讲堂 5 月中旬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茅于軾主讲《产权为什么重要？》也被迫取消。不论毛左们如何谩骂或要起诉“茅国贼”，真正的国贼是“毛国贼”，因为茅于軾只是一介平民，只有毛泽东才能祸国殃民，推行汉奸路线极左路线与红色恐怖，整死 8 千万人。

2013 年 5 月 5 日晚，一场云集太子党和毛派分子的“纪念毛泽东诞辰 120 周年”文艺晚会在山东济南举行。毛泽东的女儿李讷出席。不但陈云女儿陈伟力出席，连叶剑英女儿叶向真（凌子）也去捧场。这场由司马南和孔庆东主持的晚会座无虚席，红歌嘹亮，高调重现重庆的“唱红”场面。毛左们还组织“爱国联盟”，5 月在东博书院论坛发帖，准备起诉“攻击社会主义、否定共产党领导、颠覆现行政体、辱骂开国领袖和爱国人士”者。东博书院是孔庆东的个人网志，孔因骂一大学生“狗汉奸”，日前一审被判书面道歉、赔偿两百元。

2013 年 5 月 7 日，《光明日报》发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齐彪文章《“两个不能否定”的重大政治意义》；文章引用了习近平明确警告：“不能否定毛泽东，否则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不能站住，就会天下大乱”。文章说：“在作第二个决议时邓小平坚决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重大意义，指出如果当时全盘否定了毛泽东同志，那我们党还能站得住吗？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还能站得住吗？那就站不住了，站不住就会天下大乱。”

网友说：“对毛用不着否定，公开档案，出版自由，一切真相大白；是神是鬼还是人，立观原型。再说希特勒倒了、斯大林倒了、齐奥塞斯库倒了、波尔布特倒了，天下大乱了吗？”

5 月 13 日，《人民网》转载社科院副院长李慎明文章《正确评价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赞赏习的观点“深得党心、军心和民心，具有重大意义”。李慎明谎称：“大跃进饿死 3 千万是有人刻意编造的虚假数据、55 万右派中没有一人被处决”。

《求是》杂志社主办的《红旗文稿》刊文《有人妖魔化改革开放前的历史迎合西方图谋》，强调习的“两个历史时期”同一论，拒绝否定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反人类历史。有网友问，习是不是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大开杀戒，再搞一场文化大革命？

5月13日，由国防大学、中央党史研究室、共军电视宣传中心联合摄制的12集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苦难辉煌》，在央视综合频道、纪录频道、央视第七套农业军事节目隆重推出，片中复活了许多文革期间总结的路线斗争。5月15日，人大教授、具有神学博士头衔的刘小枫在“凤凰网读书会”上，用神学观造神：令人震惊地称毛为“中国现代的国父”，其功绩超过华盛顿、孙中山；公开为文革鸣不平，称“文化大革命是人民民主专政”。

2013年5月3日，习近平在出席中共中央、国务院各部部长一级座谈会上，再次谈及危机，承认中共当前面临着12大危机等待爆发，担忧中共步苏联后尘。2013年7月11日下午，习近平特意到西柏坡拜毛，习声称红色政权“接力棒”已在自己手上，要“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再次向社会发出他“奉天承运”，决心维系一党专政制度的政治信号。7月21日晚习近平参观了武汉东湖宾馆毛泽东故居陈列馆，并特意叮嘱李鸿忠、王国生：“今年是毛主席诞辰120周年，一定要把毛主席故居办成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基地，特别是在对青少年一代教育中发挥更大作用。”以此来愚弄下一代。

从群众运动治国的模式到“反动知识分子”的最新语录，就更能领悟习近平参拜西柏坡时所说的“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这句话，习近平的“两个30年不能互相否定”足以证明，在他眼中，文革也是中共史的一部分，而文革话语正是习近平最好的营养剂。

毛泽东死了，但他还活着。中国领导人不去反思毛泽东的错误，反而对他高呼万岁。观察家们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倒退”。2013年10月1日，豆大的雨点打在这位权力最高的中国领导人身上。不过，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参加国庆典礼的习近平却不动声色，将花篮端正地摆放在近40米高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当童声合唱团献上一首讴歌共产党的歌时，习近平打起一把黑伞，举目远眺。在偌大的广场另一头，毛泽东1949年用带着湖南口音的颤抖的声音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即便毛泽东的名字并不时时出现，但他其实无处不在。6米半高、5米宽的毛泽东画像高高地悬挂在通向帝王宫殿的天安门城门上。这是中国拍照最多的景点。毛泽东像被作为吉祥物挂在出租车后视镜上，在毛泽东逝世25年后，2001年发行的人民币纸币从1元到100元，正面都是毛泽东的头像。

2013年国庆期间，当年的文革重灾区广东汕头澄海很多新婚夫妇以红卫兵装束大搞革命婚礼，让人担心文革之风会卷土重来。继宁夏师范学院在校园树立毛像之后，国庆期间北京阴雨绵绵，但毛泽东侄女毛小青经营的北京红星韶膳国际餐饮养生会馆却红旗飘飘，为纪念毛诞辰120周年，一座据称高达12.26米、耗资百万元的毛泽东全身铜像由中国红色文化产业发展联合会、中国红色文化联合会及广东省东方红文化广场等单位联合主办了铸成仪式。毛泽东女儿、女婿、毛岸英生前妻子等毛家后人及大批“红二代”人士出席了铜像铸成典礼仪式。现场还出现大量“毛主席最亲”、“共产党万岁”等红色标语。目前在北京铸成的毛泽东挥手铜像也将被运往广东清远市，一座尚在修建的“红太阳文化广场”安放。

25. 人民唾弃屠戮了亿万生灵的魔鬼共产党

十月反革命一声炮响，给人类世界带来了五具水晶棺材，却屠戮了亿万生灵！“十月反革命”并不是推翻沙皇的专制统治，而是中断了俄国通过立宪会议实行民主宪政制度的道路。“十月反革命”后建立的苏联，推行的是一种比沙皇统治更黑暗的党权国家奴隶制。

俄罗斯中学历史教科书指出：列宁是依靠德国供给 5000 万金马克（约合 9 吨多黄金）进行秘密组织，成功发动了十月反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列宁充当了德国对俄国战争的秘密代理人，干脆宣称“无产阶级没有祖国”。列宁主义把共党的残忍性发展灭绝人性的程度：人性是党性的天敌，残忍的“职业革命家”形成了领袖层，实行铁的纪律即“部分服从整体，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组建一支行使暴力的党卫军；不择手段夺取政权。实质上是一个规模化的黑手党，党天下只能在猩红的血海中确立。从 1826 到 1905 年 80 年间，沙皇政府处决的政治犯共 894 人；但布尔什维克执政第一个月，死于政治原因的人达数十万。列宁夺取政权后在全国设立 610 个契卡工委，1000 多个革命法庭。1917-1918 年，苏共掌权 14 个月，就有 100 万人被共党处决。红军在内战期间(1917-1922)有十杀一法：战败的士兵，集合起来，每十名随意枪毙一名，以示惩戒。对于偷懒的工人，列宁说：“在每十个犯有怠工罪的人当中就地枪决一个。”俄罗斯充斥着以暴易暴的报复，人们甚至以革命的名义，未经审判而随意处死和枪杀无辜，其中包括未经审判便枪杀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全家，甚至包括未成年的孩子。1998 年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重新埋葬沙皇及其家属的骨灰，申言“革命不等于残暴”，后来在沙皇死亡的遗址上修建“鲜血教堂”，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共党的灭绝人性。共党的口号有“我们的一颗人头，要用你们的一百颗人头来换！”对此，连作为列宁的好友高尔基都看不下去了，他在《新生活报》上呼吁：“在革命期间已经有一万次‘私刑’了！中世纪曾经发生过的卑鄙残忍的一幕，又重新出现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时代，而现在，面对每天都发生的残杀人们的兽行，我们又该谴责谁呢？”1918-1922 年 2 月杀人不少于 200 万。秘密警察“契卡”奉指示“审问被告时不用找什么证据，只消让被捕者回答他是什么出身，受什么教育或职业；就能决定此人的死活。”苏俄档案多半被篡改，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仅是实际的 1/3。沙皇专制带给俄罗斯人的苦难与苏共造成的灾难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苏共实行公有制和军事化，导致国内 3000 万人非正常死亡。列宁和托洛斯基 1918 年就认为：在 6 个月内要完全消灭商品生产，真正的社会主义就会实现。所以“要强迫所有的工人吃苦受罪，”必须“把日常生活条件社会化；消灭家庭，吃大锅饭……实行军事化。全国 1600 万人被迫每天工作 12-16 小时，仅圣彼得堡一地，从 1917-1920 年有 1/3 人因饥饿疾病和政治原因死亡。如俄国中部省份在 1916 年人口有 6800 万，到 1920 年仅剩下 3800 万。对于农民中的违抗行为，列宁要求：“必须在农民中抓一些人质，如果不把积雪清除干净，就把他们枪毙掉！”列宁最爱说的话是“杀死他们”、“统统吊死”、“就地正法”、“当成最凶恶的敌人把他消灭掉”、“绞杀那些富农吸血鬼”等。列宁无情的指示枪毙和消灭那些在国度夺取粮食种子时，隐藏种子的农民。列宁丝毫没有想，没有种子将来农民怎么生存？因此，由于列宁下达的命令，在伏尔加河一带引起大饥荒，没有出路的农民，只好互相吞噬……”1922 年 8 月 19 日，莫洛托夫向列宁以及中央政治局委员汇报说：在很多发生饥荒的地方，人们互相吃人，在路边就散落着成百个（尸骨），如果不是成千上万的尸体，我们可以（或者是必须）进行最疯狂最无情的没收教堂贵重的物品行动，在任何阻力面前都不会停止。

《二十世纪俄国史》书中把 1920-30 年之交苏联的农业集体化称为“第二个农奴法”，说它是苏共开展的一场对付农民的斗争。马克思在《共产主义宣言》中认为农民阶级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1920 年代苏联估计有 200 万富农，150 万中农，800 万贫农。苏共认为：富农乃是滋生资本主义

的势力，所以要实行消灭政策：第一类，顽固反革命分子枪决；第二类，流放或强制迁移至边远地区；第三类，赶出原住地。1930年1月30日苏共中央记录显示，仅仅在一个多月就有20万富农被剥夺财产，60万被枪杀或遣至集中营，15万被强制迁移至边远地区。消灭富农就是摧毁了农业生产的中坚，苏联一直到解体也达不到沙俄时代的粮产量。

共产党是消灭私有制的土匪组织、强盗集团！共产党人原是土匪垃圾，土匪科巴（即斯大林）制造的著名的第比利斯银行抢劫事件。斯大林是个食人恶魔，是个非常残暴的抢劫犯，持枪扫射人群啊，他策划了多起武装抢劫银行的行动，为共党提供不少资金。俄罗斯历史学家拉津斯基总结了斯大林对列宁主义的理解：“一天不搞恐怖党危险，两天不搞恐怖党灭亡。”1925年9月，苏共中央确定送给冯玉祥部队800多万军火，另调拨价值741000卢布的毒气弹供冯调拨使用。毛说“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多好的朋友，在“731部队”之前，冯玉祥就用苏联生产的毒气弹毒杀中国人了。二战后，冯玉祥骗了一批俄国军火，他被“意外”死亡。1928年“6.4”苏共特务炸死了张作霖，在二战后的东京大审判上，苏联又通过威胁利诱迫使日本战犯做了“炸死了张作霖”的罪人。将俄国大间谍Sorge(1895-1944)举报给日本当局的日本女子，在上海夜总会驻唱，被苏共特务暗杀。斯大林书桌内有张纸条，是南斯拉夫共党党魁铁托写的，他说别再派人来暗杀了……1985年为营救被黎巴嫩真主党绑架为人质的苏联外交官，克格勃迅即逮捕绑匪头目家人并将其兄弟的生殖器及其母亲的乳房割下作为礼品送达绑匪总部，吓得绑匪立刻无条件释放所有苏联人质。

斯大林为强化其绝对权威，他首先迫害它的政敌；然后迫害他的同志；再迫害所有反抗的工农兵；继而迫害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教授、神职人员，对他们强制精神洗脑或逼迫其自宫。其迫害之残酷，令人发指。譬如：乌克兰共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柯秀尔受尽严刑拷打，被处决前仍拒绝作假交代。刽子手们把柯秀尔的16岁的女儿带到审讯室，当着父亲的面把他的女儿强奸了。此后，柯秀尔就在所有“交代”上签了字，可是他的女儿被放出来以后卧轨自杀了。特务头子贝利亚在审讯一位特别坚强的高干面前，当场用小皮棍将该高干无辜的少年儿子，一顿乱抽，活活打死。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重述了那个著名笑话：斯大林的烟斗丢了，贝利亚第二天就抓到了10个小偷，他们全都招供了，而斯大林则在自己的沙发下找到了那个烟斗。从1936~1939年至少有500万人被关在监牢及集中营；其中50万高级干部被枪决。解密档案显示，莫斯科审判采用了严酷的非刑讯和精神摧残手段，很多人是因为顾及妻儿的生命才认罪的。譬如布哈林不招供，他20岁的妻子和刚出生的儿子会立即没命，克列斯廷斯基如果不在审讯记录上签字，他的妻子和女儿就会被枪毙。布哈林的妻儿很幸运，1956年，在孤儿院长大的尤里打听到自己还有个刚出狱的妈妈，千里跋涉到了西伯利亚。在牢中当了20年“人民公敌妻子”的母亲告诉儿子，你的父亲叫布哈林。

麦德维杰夫感慨地说：“往昔的任何暴君都没有对自己的同胞进行如此规模的镇压，也没有消灭掉这么多数量人的生命。”但毛泽东却有自己独特的看法，认为斯大林搞肃反是“正确”的，只是“错判了一些好人”，犯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这种高论实在让人惊讶！

苏共统治74年间，苏联居然发生过3次人为大饥荒。苏联农民真是被共产党给害惨了，三次大饥荒加在一起，死亡总数至少超过3千万人，这是苏联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在斯大林1953年去世之前，全苏共有7400万人受到不同形式的处罚。在斯大林统治的1920~1953年，苏联被整死的人约2500万（不包括战争年代）。这些数字不包括由于1932~1933年大饥荒所造成的农民大量死亡，也不包括由于民族强迫迁徙而造成少数民族的大量死亡。1988年4月17日苏官方报纸《文学报》第一次透露在斯大林时期有5000万人被杀害或被判处劳

改，约占苏联人口总数的 1/4。斯大林在二战结束前对丘吉尔说：“死一个人是一场悲剧，死一千万人就只是一个统计数据了。”堪称野蛮党性之大暴露。一个苏共党员 1994 年在《自由思想》一书中写道：“斯大林专政是人类历史上最血腥最恐怖的专政，难道社会主义道路要用千百万人的尸骨来铺垫？难道人类要用头颅作酒杯，才能饮下文明的美酒”？

当苏共的权力必须依靠暴力和谎言来维持时，正义就已经离它而去。正如托马斯·杰斐逊所说：“当政府害怕人民时，就有了自由；当人民害怕政府时，就便是专制。”一个依靠暴力恐怖和权力谎言支撑的体制，几乎没有人能阻止它被正义和真相所灭亡。

求尊严和自由是人的本性。保障人人都能有尊严地生活是现代国家之本。但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以自由为敌，暴力专政，整人不止，直到自绝于人民。1953 年 6 月，东柏林发生民变，抗议遍及东德，要求共党下台，被苏军镇压。是东欧抗共最早的壮举。1956 年 6 月，波兰爆发波兹南起义，十万罢工工人和市民夺取武器，围攻共产党及秘密警察总部。军队弹压，致数十人死亡。1956 年 10 月匈牙利的革命使共产党政府倒台。苏军出兵干预，匈牙利军民武装抵抗多日。苏军伤亡 2 千多人（死 700 多）才平息起义；2500 名匈牙利人牺牲。1968 年初，捷共启动布拉格之春改革，废除新闻检查，开放民间组织，引进市场机制。8 个月后，华约 30 万大军，9000 辆坦克入侵。捷共改革派领袖呼吁不抵抗，宁可束手就擒，以免平民伤亡。1989 年 11 月，向往自由的东德人大逃亡，冲垮存在 28 年的钢筋水泥围墙。共产专制在欧洲全境的灭亡随之而来。人类彻底埋葬共产专制成不可逆转之势。

苏联的崩溃是历史的必然。1918 年亲眼目睹了十月反革命的普列汉诺夫也写下了他的 4 点政治遗嘱，其中有“布尔什维克的无产阶级专政将迅速演变成一党专政，再变成领袖专政，建立在欺骗与暴力上的政权，本身就包含有自我毁灭的炸药，一旦真相大白，便会土崩瓦解……”令人震惊的是，普列汉诺夫的预言果然言中，

苏联一夜之间崩塌，并非因为经济停滞，也非因为外部压力，而是因为丧失道德上的合法性。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总理尼古拉·雷日科夫说：我们监守自盗，行贿受贿，无论在报纸、新闻还是讲台上，都谎话连篇，我们一面沉溺于自己的谎言，一面为彼此佩戴奖章。而且所有人都在这么干——从上到下，从下到上。苏联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对普遍存在的目无法纪和腐败堕落痛心不已。1984~1985 年冬天，他曾对戈尔巴乔夫讲到：“每件事都已经腐烂，必须做出改变”。1986 年，苏共第 27 次代表大会召开时苏共党员为 1900 多万，但到 1990 年党员数却减少了 300 万。1989 年初苏共决定：建立真正独立的立法议会，引入竞选。1990 年 2 月苏共中央扩大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提出并通过了实行总统制的设置；1990 年 3 月的第三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设立苏联总统职位和苏联宪法（根本法）修改补充法》，确立了多党制原则；1990 年 7 月苏共 28 大又改革苏共政党体制，不再提党是“领导力量”和“核心”，叶利钦和他的大批追随者公开宣布退出了苏共。1990 年哈萨克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指责现实的“社会主义”是一种“非人道制度”。“在这样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还不如一袋水泥值钱”，“谁要证明这样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就是不道德的”。“我们的制度在国际舞台竞争发展中表现了自己的弱点，并遭到了失败”。

1991 年 6 月，叶利钦当选为苏联的俄罗斯邦总统。随后，就连苏共一向严厉控制的军队内部也刮起了退党风，一些军官当众撕毁了自己的党证。在苏联解体前，苏联科学院就“苏共究竟代表谁”进行调查时，就得出了苏共代表劳动人民的只占 7%、代表工人的只占 4%、代表全体党员的只占 11%，而代表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达 85%的结果。

1991年8月19日由当时苏联副总统、政府总理、国防部长、内务部长、苏军总参谋长、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等8人组成了紧急状态委员会，接管了所有党政军大权；软禁了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果断地调动由3个机械化步兵团、1坦克团、1侦察营组成的坦克师近4千官兵，到莫斯科戒严，并包围了叶利钦所在的白宫。当阿尔法特种部队司令向战士们下达击毙叶利钦的命令时，这些身手不凡的战士拒绝了。当叶利钦登上坦克，指出紧急状态委员会是非法的，要求红军撤回军营时，官兵们回答：谁要我们把枪口对准老百姓，我们就把枪口对准谁！于是炮口上插满鲜花和俄国国旗的坦克车队在白宫跑马广场上画了一道美丽的弧线，来一个华丽大转身，在一片欢呼声中，离开了莫斯科。当白宫被围困之际，千里之遥的列宁格勒竟然出现6个步兵营，500空降兵，10辆坦克组成的志愿军开赴莫斯科，保卫白宫。还有奉命率160空降师攻打白宫的空降兵司令格拉乔夫中将，公开抗拒杀人的命令。

在强大的民意面前，在人民的欢呼声中，坦克掉转了炮口，撤出了莫斯科。强硬派的政变3天后破产。戈尔巴乔夫恢复自由后辞去苏共总书记，并“建议”苏共解散。对此，苏共的书记处、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等所有机构及其领导人，乃至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组织和领导人均没有表示任何异议。第二天即1991年8月25日，苏共中央书记处便发表声明“自动解散”。1991年8月27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与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迫于当时苏联人民反共的强大压力，共同宣布苏共为非法：“马列主义这一套荒谬绝伦的邪说经过俄罗斯70多年的试验，从理论到实践都是彻底失败了，并用历史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是彻头彻尾祸害人类的谬论邪说。前苏共暴君斯大林为要奴化全人类自己做共皇，在世界上贫穷落后、文盲众多的民族和地区以饿死俄罗斯人民的血汗钱培养当地流氓恶棍文痞政客组织共产党，为推行这个极权暴力恐怖的社会制度给不少国家造成内战、饥荒与极大的罪恶和灾难，世界任何角落只要出现共产党就把烧杀、掠夺、暴乱、篡权、血流成河带到哪里。为此我们在克里姆林宫真诚地向全世界受害人民和国家赔礼道歉。现在郑重宣布：1.苏联共产党所有大小组织全部解散，从即时起原共产党任何活动都是非法并要受到法律制裁；2.一切参与政变暴乱的党徒立即到指定机关自首登记等候处理；3.没收苏联共产党全部财产为俄罗斯国家所有”。

1991年8月29日，共产党员占绝大多数的苏联最高苏维埃紧急会议以283票赞成、29票反对和52票弃权通过决定：停止苏联共产党在苏联全境的活动，责成内务部各机构保证苏共物资财产和档案的完好无损，责成各银行停止苏共的所有货币基金业务。根据这一决议，苏共在苏联全境的机构均被关闭，所属建筑物全部被查封，银行账户全部被冻结。苏共这个庞然大物自1898年开始的93年历史到1991年8月29日划上了一个句号。苏共退出历史舞台并非由于国内外敌对势力的谋杀，而在于失去民心。人民唾弃了共产党。

当苏共人员离开苏共中央办公大楼时，有成千上万苏联公民包括原苏共党员汇集到大楼前，把大楼围得水泄不通。但他们不是来保卫党的，相反，他们兴高采烈，并争相向撤离的苏共干部吐唾沫、发嘘声，如果不是警察严密保护，撤离者受到伤害也不是不可能的。苏共就这样在几乎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境况下不光彩地瓦解了。1991年9月中旬叶利钦指出：“共产主义是人民的悲剧。我认为共产主义在苏联国土上试验了70年，是人民的一场悲剧！遗憾的是这个主义发生在我们国家！共产主义只是一个美丽、愚蠢的乌托邦，虽然还有些国家虚伪地坚持，但是我相信这些国家的人民会慢慢发现这个事实的！”

1999年12月下旬，普京在《21世纪的头十年》一文中提到，过去百年来的“共产主义尝试”已经“失败”。同年12月30日，普京又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谈到：“在即将

过去的这个世纪里，俄罗斯有 3/4 的时间是在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标志下生活的，人民在这一社会试验中付出了那种巨大的代价：苏维埃政权没有使国家繁荣，社会昌盛，人民自由。用意识形态的方式搞经济，导致我国远远地落后于发达国家。无论承认这一点有多么痛苦，但是我们将近 70 年都在一条死胡同里发展，这条道路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

2006 年，普京总统提议为高年级中学生编写一部“非苏联味”的历史教科书。他希望被誉为“俄罗斯良心”的诺奖作家索尔仁尼琴完成这一大业。但终因索氏年事已高，最后由安德烈·鲍里索维奇·祖波夫主编了《二十世纪俄国史（1894～2007）》。索尔仁尼琴在出版前审阅并修改了相当一部分书稿。据报导，出版以后引起轰动，不到一年再版数次。2008 年，索氏去世，其遗孀索尔仁尼琴娜将三大卷《古拉格群岛》缩编为一个适合中学生的版本，建议国家将其列入中学生阅读书目。2010 年特意选在俄国“大清洗纪念日”（10 月 30 日）前夕，时任总理的普京会见索氏遗孀，感谢她的提议并准备了这本书，告诉她政府已做出决定，将在“大清洗纪念日”前一天向中学生发行这部书。他指出，“这是件里程碑式的大事”；“不了解书中所讲述的一切，我们就不会彻底了解我们的国家，也很难想象未来”。

2007 年 6 月 21 日，普京在接见出席全俄社会科学会议代表时说：“斯大林所进行的将 150 万人投入监狱和将 70 万人枪决的镇压是非常可怕的，但在其它国家还有比这更可怕的事”（这是在说中国，被关被杀的十倍于苏联）。2009 年 12 月他又说：“苏联在独裁者斯大林掌权时代所得到的进步，是用压迫百万人民这个无法接受的代价换来的。”俄总统梅德韦杰夫在 2009 年说：“任何理由都无法为生命的损失辩护”；“不能以人民的苦难和损失为代价实现国家的发展、成功和远大抱负。人类生命的价值高于一切。”

可是中国的红旗出版社原副主编黄苇町却称：“苏共亡党、苏联解体，是社会主义事业最大的悲剧，苏联党和人民，已付出惨痛代价。”在他眼里，列宁下令杀戮数十万民众、斯大林杀害数以千万计民众都算不得“惨痛代价”，倒是俄罗斯人通过和平变革否定苏联，走上自由民主之路，反成“付出惨痛代价”了，难道不是人性被野蛮的党性吞噬才可能如此不顾事实吗？俄人彻底否定了斯大林。而黄认为，“斯大林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革命前曾 8 次被捕，7 次遭流放，6 次在流放中逃脱。残酷的斗争炼就了他坚强的性格（即残忍性，编者加注）。”人性与残忍的党性，泾渭分明。倘若沙皇也像列宁主义者那样践踏人性，斯大林还可能有“8 次被捕，7 次遭流放，6 次在流放中逃脱”的机遇吗？那些在 1930 年代的“大清洗”的罹难者哪一个不是第一次被捕就杀掉的？即使延至 1970 年代，遇罗克、张志新能有“8 次被捕”的待遇么？斯大林得以“8 次被捕”，证明了沙皇时代的人性远胜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时代；证明“苏共亡党、苏联解体”是人类文明战胜兽性法则的历史必然，只有丧尽天良、丧心病狂者才会认为是“最大的悲剧”！尤其是，黄文接着列举了斯大林及其体制的一系列灭绝人性的罪行，却冷漠地说成“固然有领导者个人的责任，但本质上是权力缺乏制约监督的制度缺陷的产物。”相反，对“苏联解体后叶利钦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则憎恶毕现，人性被党性吞噬后那种变态心理，跃然纸上。

中共总是拿“亡党亡国”来吓唬群众，而事实是，苏联本来就是一个强制组成的国家联盟，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并没有亡国，仍然是一个联邦共和国，而亡的是苏联共党。苏联没有了，但还有“独立国家联合体”（简称独联体），目前还有 11 个成员国，2011 年独联体成立了贸易自由区。当年苏联是和平“颠覆”，老百姓并没有因为苏联的解体而遭到多大的灾难。1991 年 8 月 21 日，前苏联局势严峻，国防部长亚佐夫奉命调军镇压示威民众，他拒绝：“我不能派小伙子们去。”入狱 13 年后，普京总统向亚佐夫授勋，表彰他始终坚持不向民众开枪的壮

举。苏共亡党是俄罗斯人走向人性之路的决定性胜利。戈尔巴乔夫答记者时说：“在任何情况下，即使苏共下台，也决不能动用军队镇压人民。”仅此一点，戈尔巴乔夫是伟大的，俄罗斯配有人的称号。戈尔巴乔夫因为亡党有功，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2011年3月2日他80岁生日，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宣布颁给他象征俄罗斯最高荣誉的“圣安德烈勋章”，表彰他在前苏联末期担任国家领袖时所做出的贡献。俄罗斯民间出现了自发的“感谢戈尔巴乔夫”运动，俄罗斯人用各种形式对戈尔巴乔夫结束了苏共一党独裁统治表示感谢，称之为“自由俄罗斯之父”。不仅俄罗斯人民感谢他，前苏联各加盟国人民感谢他，东欧人民感谢他，唯有反人类的邪恶党魁骂他！而中国人不配人的称号，看看共产特权制度下受压迫的“屁民”的“冷血”，看看国人出口人肉胶囊并喝婴儿（胎儿）汤，中国哪里有人味？

26. 兔死狐悲——“竟无一人是男儿”

毛泽东有句名言，“十月反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马列主义”。以今天发现的史料来看，是根本不成立的。第一，十月反革命是列宁在沙皇倒台后、对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发动的一场政变，根本没有革命性与合法性可言；第二，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几万留日学生引进过来的，1906年朱执信就已在同盟会的会刊《民报》上连续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事迹，翻译《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部分内容了。不过，中共的建立，却是与苏共密切相关的。1921年一大建党，苏共和共产国际派出尼科尔斯基（即尼科罗夫斯基）和马林来到中国，亲自组织、指导组建了中共，可谓功不可没。所以，第二年中共就通过决议，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其中一个支部，并保证听从共产国际的指示。苏共则按照“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原理，不遗余力地对中共进行从理论、组织到金钱、物资、军火的大力援助与支持，还在苏联专门为中共开办干部训练班、特工训练班、“东方共产主义者劳动大学”和“莫斯科中山大学”。对中共金钱援助更是不计代价，不遗余力。当年自身经济都十分困难、捉襟见肘的苏共，曾不惜血本、大量售卖沙皇的珠宝作为中共的活动经费；列宁格勒全市的党费，也曾一度全部拿来供给中国的职业革命家。所以说，中共被人们称作“卢布党”，并不奇怪。在苏共和共产国际的羽翼下，中共迅速坐大，在一切重大路线上，无不是听命或模仿苏共的，如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帮助斯大林侵略军打击张学良军队、1931年在瑞金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此后的长征想打开与苏联的通道，都是把苏共视为亲爹亲娘的。

毛泽东是苏共的儿皇帝，奉苏联的年号，把“民国三十八年”改成“1949年”，宣布成立伪“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苏联的卫星国。中共定都北平，改名北京；又选择了皇帝的内院中海作政府所在地，并把象征皇权专制的天安门搬上了国徽，这是其独裁本质的流露。

1949年中共建国时，墙上挂马、恩、列、斯的像挂得高高的；而毛的像挂得很低，以示低人一等，全国各地高挂的斯大林像比毛像还大。毛是斯大林的干儿子，1953年斯大林死时中共高层都如丧考妣似地嚎啕大哭，痛彻心扉，毛下令全中国人都去公祭。赫鲁晓夫撕开苏联（斯大林）专制统治的黑幕，表明俄国人已开始觉醒，没想到毛泽东比任何人更钟情于“党权奴隶制”，不依不饶地大批赫氏的“修正主义”直到“苏修”动武；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彻底埋葬了苏共，是对“十月反革命”的拨乱反正，顺应了世界潮流和俄罗斯人的意愿。中共高层惊恐万分、恨得咬牙切齿，连夜开会寻找对策，继续走他们一党独裁之路。

2004年9月19日16届4中全会闭幕，从江泽民手中接过军委主席职务的胡锦涛发表就职演说，破口大骂：“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垄断资本搞垮苏联和苏共的主要手段是从意识形态入

手的。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绝不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失败，说到底，是其逐渐脱离、背离乃至背叛马克思主义的最终恶果。戈尔巴乔夫是苏东剧变的罪魁祸首，是社会主义的叛徒……正是他提倡公开化、多元化，使苏共全党和人民的思想陷入混乱，苏联、苏共正是在他‘西化’、‘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冲击之下解体的，这是苏共内部出现问题的最根本的原因。”胡的讲话印发成中央文件，传达到每一位党员，当时很多人听了，竟然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2009年9月24日，江泽民把中苏史专家沈志华等人请到中南海瀛台问学，他当时正在阅读沈志华等人所著的《中苏关系史纲》。江泽民首问：“苏联一个超级社会主义强国，一下子就垮台的原因是什么？”沈志华回答：“这个问题就连学术界的看法也不一样，有时对话都对不上。因为基本事实没有搞清楚……从孙中山到毛泽东一直学苏联，1960年代才跟苏联分岔，成了敌对双方，在国家体制、党的原则等等一些重要的方面我认为至今中国还没有摆脱苏联的模式。所以最终我们想要回答的问题就是：社会主义这条道路的选择是不是正确的？为什么苏联就走不下去了呢？”江泽民与沈志华等畅谈5个小时，临走请沈志华给社科院带话，是否能邀请戈尔巴乔夫访华。社科院院长陈奎元很快回话表示拒绝。

习近平出任总书记后，2012年12月7-11日第一次出外考察是去广东深圳。其南巡的抱负是全面否定邓小平、胡耀邦1981年6月27日主持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决议》认定的由“领导者（毛泽东）错误发动，被反动集团（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的文革列入保护对象。

避免亡党是习的首要任务。习“南巡”强调的是汲取苏共解体教训，紧握专政工具。讲话长达两万多字，并未公开发布；已层层传达到县团级干部，使许多人都感到意外。

习近平为什么要做竭力维护苏共模式的维护者。由于他红二代的身份，是吃这样的狼奶长大的，而营养他的狼奶，是比一般人还要丰富美味的，连他的上台，也与这样的苏联模式有着直接关系。所以，才让他对这样的专制模式有着天然的亲切感与同情感；就连他出国访问的第一站，都要选定俄罗斯，以表示个人和中共集团与苏联固有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1991年8月29日，苏共被迫宣布解散。此时此刻，拥有2千多万共党的苏共，占苏联人口的10%，表现出的是无动于衷。今日中国内忧外患，影响力和科技实力尚不及前苏联。即使以党员占成年人比例计，中共也逊于苏共；中共8千万党员约占全国人口6%多。

习近平提出要吸收苏联崩溃的教训，认为苏联崩溃源于很多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改革，最重要原因是失去了专政工具。他说：“苏联为什么会解体？苏共为什么会垮台？一个重要原因是理想信念动摇了。最后‘城头变幻大王旗’只是一夜之间。教训十分深刻啊！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一路否定下去，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有什么作用了。为什么我们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就是从苏联解体汲取的教训。苏联军队非政治化、非党化、国家化，解除了党的武装。出来几个还想挽救苏联的人，把戈尔巴乔夫弄起来，没搞几天又被反过去了，因为专政工具不在他们手中。叶利钦站在坦克上发表讲话，军队完全无动于衷，保持所谓‘中立’。最后戈尔巴乔夫轻轻一句话，宣布苏联共产党解散，偌大一个党就没了。按照党员比例，苏共超过我们，但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

习近平说，“否定斯大林，是历史虚无主义。”其实真正的历史虚无主义，正是中共这样的领

领导人，他们一门心思想的，就是如何“江山永不变色”，而这个江山曾经使数以千万计的人死于无辜，为什么发生？谁应该负责？是不是可以避免？一概不理。

习近平说：“我们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问题出现颠覆性错误，出现后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我们决不自乱阵脚。我们强调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就是要树立信心”。他强调改革必须建立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才不会迷失方向。他说：“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仰，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又说：“如果丢失我们共产党人的远大目标，就会迷失方向，变成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他强调，“中国梦”固然是一个理想，但“共产党人应该有更高的理想，那就是共产主义”。

2013年7月，广州军区41集团军参谋长李桥铭在《求是》杂志社子刊《红旗文稿》撰文《苏联军队“非党化”的历史悲剧》，露骨地将拒绝镇压民众的前苏联军人、克格勃阿尔法突击队等俄罗斯的真男儿，指责为苏联解体的罪魁祸首。他对苏联军人在决定国家命运的危亡关头站在人民一边甚为遗憾，恬不知耻地声称，苏军国防部和总参谋部“许多军官坚决支持紧急状态委员会，然而他们找不到忠实的部下替他们杀人”。

习近平要做“男儿”是愚昧造成的，他不知道苏联解体为何没有一个人挺身而出。现在有心人要给习近平补补课。拿出九二年俄罗斯拍摄的一部讲述苏共的影片“契卡”放到了网上，流传甚广。契卡的血腥残忍是超极限的，影片的每一个镜头都会折磨你的神经，电影一遍又一遍地出现杀人枪毙的场景，在地下室，那些被脱光衣裳的男女老少走到墙边，一批一批地被枪杀，然后赤裸的尸体被头朝下吊到地面，扔上卡车拖走。历史上搞屠杀当然不是苏共首创，但在屠杀时让被屠杀者脱光衣裳，是对人最后尊严的凌辱，说明屠杀者已异化为非人类的恶魔。契卡活生生的制造了一个人类的屠宰场，这样的杀戮，最后连刽子手也受不了发了疯。那些被枪杀的是什么人呢，仅仅是前朝的旧人员与贵族，知识份子，神职人员或那些不满政权的工人农民。这就是恐怖的共产革命，共产政权完全非人的嗜血野兽。“契卡”是俄罗斯自己拍的，不是海外敌对势力对他的造谣污蔑。对于“契卡”习近平可能还停留在“列宁在一九一八”中捷尔任斯基这个契卡英雄式的领导人身上。如果习近平没有看过“契卡”这部片子，应该去看看，看完了是不是还说得出“竟无一个是男儿”这样的话，如果依然如故，那么习近平与影片中那个冷血的契卡领导人也相差无几了。

习近平因对苏共的无知，造成“竟无一个是男儿”之叹，那么他亲身经历的文革，父辈在毛手里遭受斯大林式的清洗与迫害，其血腥残酷也足够认识到这个政权的残酷野蛮了。习近平父亲习仲勋与刘子丹，高岗三人为陕北红军创史人，救了中央红军毛的一命，结果刘子丹被整肃，高岗被自杀，习仲勋被下狱，所有陕甘边区的干部无一幸免，这样的残酷，习近平竟能无动于衷，还心心念念要为毛树碑立传，走毛路，其心是何其的变态。

1946年中华民国进入了“和平民主新阶段”，中国宪政民主的大门，已经打开。不仅有国际的强力支持和人民的热切期待，中共甚至都已作出过交枪的响应。但毛的枪杆子主义占了上风。他嫌在国民政府“做官”不过瘾，不惜血染中华，打平天下做皇帝。无视一个合法政府怎能容忍一个武装割据的特区存在，内战的实质无异于造反作乱。历史已证明，毛共以武力推翻合法政府后，建立的是一个无法无天、残民以逞的独裁政权，其施政之苛暴，超过了有史以来的暴政的总和。正是中国人的懦弱才被共产党强暴几十年还不罢休。如果男儿英雄汉多起来，中国早就不这样了。1980年代初期让中国人民憧憬的改革，是改变“一党专制”，是废除人民日报前总编辑胡绩伟提出的“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党军的法西斯

独裁政治”(废除“三个一”，是中共在未执政前就提出的政治诉求，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912页。但共党执政后，不但没有废除“三个一”，反而增加了“一个党军”，所以胡绩伟称之为“四个一”)。然而习近平政权仍然是坚持“四个一”，这从他的南巡讲话中表露无遗。中共至今毫无还政于民之意，企图打造一个“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共党法统。

中共要求吸取前苏联“亡党亡国”教训，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1964年7月14日中共中央发表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文写到：“苏联特权阶层控制了苏联党政和其它重要部门……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中共已经判定苏共是一个罪恶累累的、损害人民利益的政党，把“打倒苏修”的口号写遍全国，还要解放包括俄罗斯人在内的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世界2/3的人口；现在俄罗斯人民自己解放了自己，中共却说俄罗斯人的解放是“世纪大悲剧”，批判戈尔巴乔夫是叛徒，批判苏共党员“没有一个是真男儿”。当年中共要打倒苏共，现在苏共自己倒了，中共又说苏共不该倒，出尔反尔，开了一个国际玩笑。

苏联亡党的真正教训是特权阶层的三个垄断：真理的垄断、政治的垄断、经济的垄断。但是，中共要吸取的不是这些教训，他们要吸取的是特权利益集团被颠覆的教训。如果“出现颠覆性错误”，特权利益集团就再也没有机会对张海超、吴远碧、郑艳良等社会底层人进行榨干最后一滴血式的抢劫，就再也不能做吃里扒外的“裸官”，就再也不能“吃喝嫖赌全报销”，就再也不能“夜夜做新郎”，就再也不能享受“嫖宿幼女罪”的法律豁免权，就再也不能躺在“干部病房”里受贿，就再也不能把“性福”建立在开胸验肺、剖腹放水和钢锯截肢之上……总之，颠覆性错误，就是导致红色江山不能代代相传的错误，它是党的错误，不是国家的错误，国家不存在颠覆性错误。它对“太子党”来说，只有坏处而没有好处；它对张海超、吴远碧、郑艳良这个阶层的人来说，只有好处而没有坏处。

鲍彤等人驳习近平：“十四万人齐解甲，竟无一人是男儿。”此言出自五代后蜀亡国宫妃费氏之口，她抱怨后蜀不战而降。一千多年前一个养尊处优的贵妇当然不会明白那14万后蜀军队为啥不愿誓死保卫一个和他们并无关系的后蜀王朝。然而今天再去责难1991年的俄罗斯“竟无一人是男儿”，不是无知便是偏见。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一个臃肿腐败、罪恶滔天的政权难道不应该解体吗？这个吃人的苏共难道不应该彻底终结吗？那些看起来无动于衷的2千万苏共党员，恰恰是明白事理、顺应时代潮流的男儿，即便有几个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小丑，如制造“8.19政变”的内务部长普戈，倒是最终走上了饮恨自杀的不归路。

习近平错了。苏联有男儿，如果你这里说的男儿是能一呼百应的伟人，那当年红场上叶利钦站在坦克上发表讲话，抗争军管当局，千万人响应，真男儿也。如果说的是保卫共产党的人，那么，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也站了出来，一人面对全国老百姓的反对，也是真男儿也。如果军人开枪了，苏共政权就能保住吗？六四的经验不能无限重复，一个靠坦克和刺刀维持的政府是不能持久的。事实上，苏共解体不是少数政客的选择，它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人民的意愿，其根本原因是苏共的腐败和脱离人民。没有人愿意去为一个腐败的政府殉葬。

苏联变天，其实从斯大林死后就已开始，其间经历38年的演变，到戈尔巴乔夫执政6年而瓜熟蒂落。在苏联发生的一切，只是反映从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到列宁的暴力革命、斯大林独裁专政，再到二战后修正主义泛起而后民主化转型——这条历史规律而已。在毛邓顽固派统治下，苏联的改革被极端地妖魔化，并转化成从反右到大饥荒、文革的巨大灾难。毛白白一

生只做了两件事：打败国民党、发动文革。这两件事其实是一件——崇尚暴力。毛自认一生，就是整人、杀人，他以杀戮为乐。他信奉列宁、斯大林，只因他们是两把杀人的“刀子”。坐井观天，完全无视时代的进步。治国瞎折腾，一无是处，终于发动反修，死于反修。毛把偌大一个国家一个党，拖到万劫莫复的绝境。中共当局只看到反修、文革给党和国家造成的损害，而不敢承认，毛邓之反修，政治上反动、道德上忘恩负义的恶劣性质。

资中筠驳斥习近平：怎么总结苏共被替代的历史？一个出发点是，不管苏共怎样伤害了俄罗斯民族的元气，伤了多少人，都不管，就关心他怎么被替代了。假设从这个角度出发吸取经验教训，注意民生也好，反对腐败也好，目的还是维持千秋万代的统治。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马克思是以怎样有助于发展生产力和社会的进步为标准的，不是说什么样的做法有助于维持某个王朝继续下去。如果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总结苏联经验，从推动历史进步的角度来看，苏共党员和军队的觉悟挺高的，他们有进步的思想。如果从忠于王朝这个角度来说，就会责备苏共为什么没有忠贞之士。这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总结历史的角度。人民到底是手段还是目的？从根本上来讲，这决定了两种不同的历史观。

2013年4月13日胡德华驳斥习近平：现任俄共的总书记久加诺夫认为苏联共产党的垮台，源于苏共对于政治权利的垄断，对于经济和一切资源的垄断，对于真理的垄断。他这么一说，我觉得垮台就没有什么了，值不得大家悲伤，也不值得难受。我知道在俄罗斯选举一人一票，俄共得票百分之十几，只能说明绝大多数俄罗斯人民不拥护俄共。怎么办呢？……至于说苏联人民竟无一人是男儿，那么我想知道什么样的人才是男儿，是不是手握现代化的武器，驾驶着第三代主战坦克向着手无寸铁的苏联人民开枪开炮，横冲直撞的军人就叫男儿呢？我恰恰觉得有着反法西斯光荣传统的苏联红军，对于下达开枪镇压百姓的命令，敢于抗命，不怕上军事法庭，这才是英雄，这才是男儿，所以我觉得苏联红军都是男儿。……我们应像蒋经国在台湾，反省对二二八起义的镇压，反省戒严，反省特务恐怖统治，求得反对派和台湾人民的谅解，选下后再选上来。像南非总统曼德拉对白人种族主义都采取民族和解的态度，没有流血，没有仇杀，没有清算，大家结束过去的幸，共同创造了南非的未来。

张雪忠驳斥习近平：习先生“竟无一人是男儿”的说法，表明了他视戈尔巴乔夫为“敌人”。首先，苏联的崩溃，其主要责任并不在于戈氏的改革，而在于此前70多年蒙昧主义和反人性的专政统治。戈氏的失败，最多只是未能拯救一个早已病入膏肓和奄奄一息的红色帝国。其次，戈氏的失败，与其说是因为他启动了改革，不如说是因为改革得不够彻底。戈氏在改革后期对腐朽和顽固的官僚体系做了太多的妥协，从而为1991年“8-19”反改革政变准备了组织和人事基础。再次，直接导致苏联解体的原因，并不是戈氏的改革，而是“8-19”反改革政变。这次政变的政治后果，是使戈氏作为苏联总统手中的权利，转移到了叶利钦以及其他加盟共和国领导人手中。最后，即使戈氏是一个失败的改革者，他今后的历史地位仍将远高于他的几位前任：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

芦笛驳斥习近平：习总根本不可能知道花蕊夫人的诗。然而前不久他却发宏论曰：“最后戈尔巴乔夫轻轻一句话，宣布苏联共产党解散，偌大一个党就没了。按照党员比例，苏共超过我们，但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这其实不是他的原创，而是某个毛左“理论家”兼“历史学家”说的；在一篇谈论苏共亡党亡国的烂文章中，这厮引用了这句诗，被习总看在眼里，便接过来说。习总就好这一口，其实也是文盲的通病……他的其他惊人言论都这样，可谓“无一字无出处”，那什么“我们现在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难民，你们还要怎么的”，据说也是听来的。没文化不打紧，智商低下就难办了。习总傻，就傻在不知道

同一句话，从不同身份、年龄、性别的人的嘴里讲出来，效果可以完全不一样。这句话，民间毛左“学者”讲得，身为党国领袖的习总就万万讲不得了。

首先，习总这不是辱骂普京那前苏共党员不是男儿么？我记得这话是他在出访俄罗斯前说的，这就是中国国家主席对准盟邦示好的亲善姿态？

其次，共产国家有谁是男儿？当年打倒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邓小平、四人帮，有哪一次有过哪个男儿起来反对过？批斗习仲勋时，几千万党员，竟无一人是男儿出来抗争。出席 8 届 11 中全会的代表中，据说只有陈少敏一个女子反对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那的确确是“除却伟大领袖外，更无一人是男儿”，自人民的好总理、朱德、叶剑英、李先念、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下，统统不是太监就是女人。湖南 11 岁幼女遭强奸后被逼卖淫上百次，母亲唐慧上访三年，公检法“竟无一人是男儿”出来主持公道……白让习总爬到中共的最高位置，竟然连共产党国家的“组织原则”都不知道。

第三，习总这段话，不是号召全国人民起来造反，推翻现代中共修正主义统治集团么？习总就算是完全彻底的文盲，毕竟是毛时代过来的人，总不至于不知道伟大领袖口中的“修正主义”何所指吧？那就是苏联。既然连苏联都是“资本主义已经复辟”的修正主义国家，那如今的中国算什么？苏联再“修”，无非也就是在工厂里搞点“利润挂帅，物质刺激”，在集体农庄中给社员们增加点宅旁菜园而已，几曾如中国那样，在农村废除集体经济，在城市大搞私有化，在短短三十年中就培育出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强大的富可敌国的大资产阶级？……毛主席的噩梦早就加倍成真，马列主义的党早就变成了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早就改变颜色了。习总到底是不是男人，为何坐视山河变色？

所以，窃为习总计，您最好还是牢牢记住据说是林肯说的这段名言：**Better to remain silent and be thought a fool than to speak and to remove all doubt.**“宁肯保持沉默而被人视为傻子，也不要开口乱说，从而让众人对自己是傻子再无任何怀疑。”

习梦斯人--中共历史民间版（5）

1. 谎言大国谎言党温家宝被骗失眠

习近平上台后多次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人们以为他的最高指示也许真能为中国带来一些新气象。然而，国人又一次大跌眼镜。事实上，说谎大国，弄虚作假已是积重难返的痼疾，只要是共党，不说谎就无法执政。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国家统计局、中国教育部、中国社科院以及中国科学院都成了说谎机构。暴力和谎言是中共夺江山、坐江山的两大“法宝”，暴力靠谎言鸣锣开道和包装掩饰，谎言则须依赖暴力维持生命。谎言欺骗人民，这是由中共邪恶的本性决定的，共产党的一切宗旨、信仰都是谎言组成的。回顾中共的历史就是一部充满谎言的历史，不说谎，不欺骗人民，中共就丧失执政的合法性。因此，不管谁掌权，也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或者将来，只要中共存在一天，就必定要靠说谎才能生存下去。

中石化、中石油近两年的行径已经失信于整个国人。有几十亿美金投资非洲南美的油田，有几千万人民币装修自己公司的大吊灯，就不知道体谅百姓们的苦衷。2012 年国际油价最高的时候，美国油价 4 美元一加仑，中国油价 6 块钱一升。后来国际油价暴跌，美国油价 2 美元一加仑，中国油价 6 块钱一升。最近国际油价略有升高，美国油价是 2.5 美元一加仑，

中国油价竟一口气冲破了 6 块钱。说什么与国际接轨，中国油价压根涨上去就没落下过来。偶尔落下来，又迅速涨回去！中石油股票就圈了亿万中国人的钱，油价又抢了亿万中国人的钱，最近天然气还要逼宫涨价。还说什么民族企业要支持。要不是垄断经营，谁支持这么贪婪的中国企业。美国企业想着社会责任，信誉形象，回报民众，持续发展。中国国有企业就想着千方百计的从老百姓里抢钱，牌子大的大抢，牌子小的小抢。石油垄断企业利用其政治资源获得了全方位的垄断，并且不交地租、少交资源租，还经常获得政府补贴，每年占中国人民的便宜高达 6000 多亿，同时又没有严格的制约机制，致使蒋洁敏等多位中石油高管迅速腐败。他们一定会后悔曾经身处中石油的垄断而无有效监督的环境。

蒋洁敏个人财富已达数百亿，在中石油将所有的石化项目都非法承包给自己人，个人的年收入数十亿。他将多个上百亿的巨型石化项目违规发包给上海惠生公司，而惠生公司正是周永康的儿子周斌的公司。蒋洁敏通过周斌的岳父母输送给周家百亿美元以上利益。具体方式均在国外进行，或通过加巨价收购油田天然气田，或垄断油田设备采购，由蒋将中石油需求及收购采购对象确定后，告诉周斌的马仔吴兵，尔后全通过周斌妻子王婉父母开设由美国信托人出面持有的美国公司在中间赚一道，利润又全留在瑞士银行以逃美国税。

中石油吉林石化、广西石化、抚顺石化、项目资金挪用亏空数目惊人，问题堆积如山，一查就倒。中石油四川石化是有史以来最黑的项目，380 亿元的投资至少有 300 亿进入了个人的腰包，整个项目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豆腐渣”工程，但因为中石油和相关的供应商大都有通天的能力，所以无人敢查，无人敢问，最后只能是一堆废铁。而中石油八个石化项目，无一例外，全部有问题。中石油广西石化公司副总经理（挂任钦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王学文于 2010 年突发交通事故被灭口，也直接与蒋洁敏和周永康有关。蒋洁敏曾帮薄熙来制造政绩。薄熙来当辽宁省长，蒋洁敏推动中石油集团在辽宁扩建及兴建了两个千万吨级的炼油厂；薄熙来到重庆后，中石油集团又在重庆投资 150 亿，建设一个产能 650 万吨的炼油厂，后来又宣布将这一项目的产能提升至千万吨级。实际上无论在辽宁还是重庆，设大型炼油厂都不经济，因为当地不产石油，也不靠近石油产地，运输成本相当高，原油部分还从国外进口。投资这些巨型项目不是为经济效益，而是为了给当地政府增加政绩。

2007 年初春，冀东油田便对外宣布，发现了规模储量达 10 亿吨的南堡油田。蒋洁敏还声称，“随着勘探及开采的工程展开后，预期实际储量可达 75 亿桶”，并表示“未来 5 年内将投入 400 亿元。”当时持反对意见的油田技术老总被直接拿下，至今还没有恢复职位。时任中共总理的温家宝事先就接到报告，并在 5 月日号就视察了冀东油田。他说，“40 多年来中国石油勘探最激动人心的发现。听到这个消息，我兴奋得睡不着觉。”消息传出后，举国欢腾。几个月后，中共当局证实，油田的实际储油量远远少于 10 亿吨，可采储量只有 6 亿多桶，是蒋宣布的 1/5，不足原估计的一成。与其配套的曹妃甸的石化项目也处境艰难，一一落空，债务激增。当年蒋洁敏的谎言，最终在现实中形成了连锁的“蝴蝶效应”，不但坑害了无数股民，也将曹妃甸拖下了水。不过，蒋洁敏却靠着所谓的“10 亿油田”这一耀眼“政绩”，在 2007 年 5 月底被提升为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总经理。

不过，温家宝也不是第一个被骗的总理。1998 年，安徽南陵县委书记倪发科造假粮库库存，骗倒当时的总理朱镕基。尽管后来被朱镕基发觉，倪发科还是官运亨通到副省长。

另外，中共统计局也承认了有统计数据弄虚作假的问题。像云南陆良县今年上半年上报的 2.1 亿元投资完成额之中，只有 2 千万元属实，其余 1.9 亿元属虚报。邢天行说：“造假的根

源是中共。因为中共的历史就是用谎言建造起来的，一切都是为了它的政治需要服务。为了它的政治需要，它一切都可以造假，它鼓励官员造假。这样一来它就形成了一个官场的风气，就是大家都是在造假当中追求升官发财。”香港《东方日报》认为，如果要以一个字形容中国，那就是“假”。香港媒体用民间的顺口溜：村骗乡、乡骗县、一路骗到国务院，来形容大陆官场的光怪陆离。中国沦为谎言大国，社会道德沦亡，根源正是中共。

泱泱大国沦为谎言大国，社会道德沦亡，根子就在中共。

2. 共党为了权力（利益）而说谎

马克思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的支配的”即不存在着思想自由。统治阶级“作为思维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而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2页）。既然人的精神活动可以被纳入到冷冰冰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过程，那么在“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和分配”的意识形态必将大规模侵入“精神生产资料的生产和分配”，也就是说，作为功利性的精神产品，必然带有功利性，就不可能中立、客观。不客观就是主观，主观就是非科学，非科学必然崇拜谎言。

马克思和恩格斯因在《费尔巴哈》中要求革命家必须说谎：“每一个力图取得自己统治的阶级，如果它的统治就像无产阶级的统治那样，预定要消灭整个旧的社会形态和一切统治，都必须首先夺取政权，以便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普遍的利益，而这是它在初期不得不如此做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8页）。可见，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最重要的使命之一，就是为了得到并确立自己对历史和现实的解释权，就是把新的统治者的利益说成普遍的人民的利益，以便对社会实行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说成”这个词有“甲是甲，经过说，可以成乙”的意思，这里的“说”具有100%改变事物客观属性的性质，“说成”就是谎言。无产阶级革命总是打着代表社会绝大多数人利益的旗帜，原本是个赤裸的“阳谋”、圈套——无产阶级掌权前的统治阶级都代表富人的利益压迫穷人，只有共产党掌权后才时时刻刻代表无产阶级并维护穷人的利益——这是典型的虚假宣传，真是无耻之尤。因为人都有弱点，都是自私的。如果他代表其他人的利益，他就可能将这些利益据为己有或据为小集团所有。那些精神上的东西即便是抵挡得了一时物质的诱惑，也不可能永远挡得住物质的诱惑。无产者一旦通过暴力取得财富的支配权，如果没有法律和社会力量的制衡，其贪得无厌只会超过被其推翻的权势者。马克思对共产党人的厚颜无耻的吹捧、说教违背了人的自私性原理，任何违背人性原理的运动、主张和思想所导致的结果，最终都会给人类带来灾难。

利用民主制度的宽容来达到共党独裁的目的，一方面享受民主制度给予共产党人的人权，另一方面利用民主社会的自由来夺取政权并反人权，是马列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就像恩格斯自己说的那样：“如果说有什么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然后就翻脸不认人：“我们的党一旦掌握了国家的政权，就应该干脆地剥夺大土地占有者，就像剥夺工厂主一样。这一剥夺是否要用赎买来实行，这大半不取决于我们，而取决于我们取得政权时的情况，尤其是取决于大土地占有者先生们自己的态度。我们决不认为，赎买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容许的；马克思曾向我讲过（并且讲过好多次！）他的意见：假如我们能赎买下这整个

匪帮，那对于我们是最便宜不过的了”（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

这番言论让人联想起扮羊入室后嗜血不止的恶狼嘴脸。可见信奉共产主义的这个党要多恶毒有多恶毒，要多坏就有多坏，根本就不是人。不论他是否暴力夺权，人民未来的悲惨都可想而知，已垮台的苏联、东欧共产主义，他们曾经给这些国家的人民带了怎样的灾难！

苏联体制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庞大而无处不在的共党官僚，成为骑在人民头上的“新阶级”。马克思总结的“巴黎公社”原则，要求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工资不得超过技术工人最高工资，要求全民普选，人人平等，没有官民之隔，人民是主人，官员是“公仆”。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也重申了这些原则，建政之初说了不少空话大话。但实际上无论是苏联，还是后来的东欧卫星国及中国，都不能将“巴黎公社”原则落到实处，也无法落实。为了维护虚假的“人民政权”，苏联在建政之初就推行严厉的书报检查，1920年列宁将俄200多位顶级知识分子驱逐出境，自后党的宣传部严密控制舆论，箝制思想。若开放报禁允许批评揭露，共党政权就站不住。列宁说：“我们必须使用所有诡计、阴谋、欺瞒、狡诈、非法手段、隐蔽手段，并掩盖真相。”俄国思想家普列汉诺夫称，十月政变使他看出了列宁残忍狂暴的面目，临终前夕他口授了一份《政治遗嘱》预言了俄国社会的基本走向。在遗嘱中，他认为“列宁为了达到既定目标什么都干得出来，如果有必要，他甚至可以同魔鬼结盟。”

蒙蔽历史真相，垄断历史文本，是维持专制统治的重要手段。苏联的《联共（布）党史》，就是围绕着为斯大林专政的合法性辩护而撰写的。当代俄罗斯已经彻底否定了斯大林的谎言史。中共过去也是以这部历史为国际共运标准文本，所以整个一代中共“官史”基本上建立在谎言的基础上，真正起到了“灭史”的作用。如今俄罗斯揭露了真相，否定了这部著作，就是“灭”了共党政权所建立起的神话，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

3. 共党伪装术

共党的宣传就像是手里拿着一个坏了芯的红苹果招摇撞骗的江湖骗子，他只告诉这个红苹果的仅有的一块好皮如何鲜艳夺目，却从来不让别人看到被他捂住的已坏透的另一面。

青蛙为什么是绿色？北极熊为什么是白色？是生存需要伪装。伪装自己是中共一惯伎俩。干的是抢劫权力与财富，说的却是“为人民服务”，由此造成言与行的分裂。如果赤裸裸地把抢劫为生暴露人间，恐怕中共早已被社会淘汰了。宣传工作的美化，使这个抢劫党变成“一心救中国”的党，使毛泽东变成“人民大救星”。这种美化被强大的思想灌输，即“赤化”，送到千家万户。基层党组织，哪怕只有十来个党员，也要设组织委员与宣传委员，组织管抢劫，宣传管美化，配合默契。尤其是，这种颠倒是非的灌输往往贴上理论标签，有马恩列斯毛的主义印记，再加上邓理论、江代表、胡科学的帮衬，布下一座迂回曲折的迷魂阵，陷入其中是不容易摆脱的。现在有多少人能参透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的实质——一党专制？有多少人能参透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玄机——维护党专制？那是毛邓画饼充饥之术，不能参透个中奥秘就会陷入其中而不能自拔，上当受骗而不能自觉。

对共产集团而言，什么“共产主义原则”，什么“社会主义理论”，什么“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全都只是欺世惑人以维持其统治的工具。为了自己的特权统治，这个集团卑鄙到可以随时出卖自己祖宗的衣钵和砸烂先烈的牌位，可以出卖其统治下的人民、土地，甚至可以引外国共

产党军队来屠杀本国人民，如 1929 年的斯大林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中共党员就帮俄罗斯军队杀中国人。在共产党人眼里，世界上一切包括民族、国家、良心、正义等等都不过是“共产党万岁”的手段，随时都可以践踏的。事实证明，共产党可以为权力出卖一切原则和理想，但绝不会为任何原则和理想放弃一分权力。

中共这个黑帮集团，从井冈山时代起便是由一帮满脑子封建帝王思想的野心家、土匪、军阀和政客所组成，其内部为争权夺利，充满了残酷的你死我活的帮派斗争（中共美其名为：路线斗争）。这个团伙内部充满欺诈、告密、暗杀、造谣中伤、诬陷、拉帮结派……

早在 1942 年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就确立了“党性第一”的新闻报导原则。为此，党报“要在自己一切篇幅上，在每篇论文、每条通讯、每个消息……中都能贯彻党的观点，党的见解”。举凡一切新闻消息、评论照片都必须以是否符合党的利益为标准而加以取舍。

垄断真理的中宣部对意识形态实行全面专政。“牢牢地控制媒体，把媒体变做一个战斗的工具，并且把所有从事媒体的人变做党的喉舌”；这是延安整风以后共党确立的一个原则，由毛泽东创立，先是掌控全党舆论，1949 年后就掌控全国舆论，实现“舆论一律”。党魁们喜欢说“舆论导向”。党魁和官员们坐在办公室里，看着他们自己导向出来的报纸和各类的“情况汇报”，非常高兴，便以为自己的路线是正确的了，95%以上的人民都是拥护自己的了。袁世凯要当皇帝，想把舆论导向得对自己有利些，朝思暮想，苦于无法。他的儿子灵机一动，特意编了一些假报纸来给老子看，哄他父皇，真相揭穿后，袁世凯气死。如果袁家人的智商能够达到共党那样的水平，把“普天之下，率土之滨”的所有报纸、杂志、新闻社、出版社、电台、电视台……统统都控制起来，管理起来，领导起来，使天下的报纸统统成为维护中央的、“导向”的报纸，那又何劳袁大公子另行编几张好看的假报纸呢！

4. 共产主义就是假大空

共产党的谎言欺骗主要表现：一是美化自己，往自己脸上贴金；二是抹黑对手，将其妖魔化；三是强奸民意。为了这些他们可以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人民”一词意味着部分民众被划为不可接触的贱民，“国内革命战争”实指武装颠覆合法政府，“解放”就是奴役，“镇反”是消灭政治反对派，“毒草”实指自由的言论与写作，“反修”实指反改革，“自然灾害”回避了人祸饿死人，“一国两制”掩盖着社会主义的失败……这种魔咒般的概念符号，以至这些符号所暗含的荒谬的逻辑与编造的“史实”，都在频繁的毒害人们的大脑。

共党分子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造假能手，一部共党史就是一部谎言史。由于俄国的精英要么被驱出境，要么遭杀戮，苏共便实行愚民政策：不许人民与国外亲友联系，不许阅读外国报刊。广大群众完全与世隔绝，根本不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列宁、斯大林的名字被广泛地用来命名街道工厂城市等，帕米尔有一个高 7495 米的山峰改名为斯大林峰，另一处高 7134 米的山峰被称为列宁峰，马克思峰高为 6726 米。一张“毛主席去安源”的画像，挟个雨伞，一副忧国忧民的面孔，真实的历史却是李立三去的安源。

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在为其父所写的传记中有这样一段话：“从我的学生时代起，我就一直努力探索，想知道共产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但却一直茫然无获……我一直想请老爸给点启示，弄清共产主义的性质，但直到现在也没能得到一点明白的回答。我懂得了，连他本

人对这个问题也是不太清楚的”。勃烈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发表回忆录说，总书记勃烈日涅夫曾对自己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听的空话。”私下说“共产主义是骗人”的勃烈日涅夫，非常重视意识形态工作。他强调：“做意识形态工作，要舍得投入人力、物力、财力”。勃烈日涅夫崇尚虚荣、生活腐化。他一生获得 114 枚勋章，曾破例为自己颁发 4 枚“金星奖章”，并先后拥有 7 个情妇。

一位莫斯科的科学家说，“意识形态可以起两种作用——或者作为一种象征，或者作为一种理论，两者不可得兼。我们的领导人把它用来作为一种象征，作为断定其它人是否忠诚的一种方法，但它并不是这些人身体力行的理论”。好比赵高在金殿上指鹿为马，以此测试群臣对他的紧跟程度——忠心。赵高指鹿为马，并不是要考验群臣的理性思维能力有多高，而是要考验群臣是否已放弃理性、放弃独立思考，当驯服的奴隶。专制统治者考虑的不是根据理性来认识世界，而是怎样摧毁人民的独立思考，以践踏理性来巩固专制统治。老百姓要想活下去，就要放弃理性、放弃思想。指鹿为马，就是为了强迫人民放弃理性，甘当奴隶；久而久之，也就成为不思想、只会喊“万岁”的奴隶了。

赵高的指鹿为马，希特勒的国会纵火案，都是极权专制制度所派生的谎言。戈培尔“谎言重复千遍也会变成真理”，完全是强权政治的逻辑。而北京政府又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中共在造神过程中确立了“领袖是真理的唯一化身”的教条。因此，中共最高领导人如果在位的话，是不可能真的认错的；其权力的合法性来源就在于他的“一贯正确”，一旦认错，就会造成合法性的丧失而下野。领袖为了确保自己的权力不受威胁，就必须禁绝一切不同的力量乃至不同的声音，鼓励吹牛拍马。中国已成为一个“万般皆下品，唯有马屁高”的马屁国，成为一个“千破万破，马屁不破”的马屁精的乐园。如果马屁心态成了一种普遍的人格，拍马屁成了国人谋生手段，就会使真诚者无法存活，就会使专制者干起丧尽天良、祸国殃民的事情来一路绿灯、畅通无阻，从而给整个国家和整个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

林彪说过：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1971 年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流露，他痛感自己受了欺骗，所以，把林彪、陈伯达称为骗子。但他缺乏清醒的自我意识，正是他自己的存在为骗子的产生创造了条件。毛泽东仅凭自己的意志，在没有条件搞社会主义的地方强行搞社会主义。搞了几十年，终于邓小平也不得不承认：“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出于对自由、民主的恐惧，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拼命反对资本主义。搞不成社会主义，又不许搞资本主义，结果搞的是非驴非马的主义。连社会主义都是假的，还有甚么不能造假？

温家宝说：“众所周知，社会主义的宗旨和原则是消灭一切阶级压迫和一切阶级剥削，建立公平正义的社会。”这是马列主义谎言。自古以来的各国都有政府，有政府就必有统治阶级。因此，永远不可能消灭统治阶级。共党把别人的统治叫做压迫，而把它自己的统治叫做领导；这完全是文字游戏，愚弄民众。共党说国民党压迫中国人民，于是煽动农民推翻中华民国进行“解放战争”。如果“解放”与自由无缘，那就只能是一场赤裸裸的叛乱，其结果往往是更大的“枷锁”和压制。中共发动的“解放”，一开始就是反革命，仅仅只是以暴力和谎言支撑的叛乱而已。那些所谓的“解放”，仅仅只是蛊惑人心的口号，特权才是中共孜孜以求的目的。反特权的王实味被中共杀害了。用一党极权专制取代民国的宽松专制，让财富从资本家手中转移到党贵手中，用暴力胁迫人们改变自己的信仰、观点和立场，那不是“解放战争”而只是叛乱战争。中国二十世纪形形色色的“共军”都是叛乱军。毛泽东在 1948 年 8 月将国民革命第八路军改名为共军。共军的名字产生在国共内战时期，共军建立的目的完全

是为了打内战夺取抗战果实，所以说共军外战外行，内战内行。一个为打内战而建立的部队不配叫“共军”，因为它没有解放一个中国人民，反而在内战中造成了近千万中国同胞的无辜死亡。毛的军队可叫内战军、自相杀戮军、也可叫共军，但是绝没有理由叫共军，“共军”的名字是彻头彻尾欺骗！1949年后，共党成为中国的统治阶级，成为有权的特权阶级，而其他所有大陆中国人都沦落为无权的平民阶级。权贵的阶级压迫仍然存在，共党并没有消灭阶级压迫。只不过把国民政府的统治变为中共的压迫而已。几千万中国人白白地做了共党的炮灰。与国民政府相比，中共的压迫是更残暴、更蛮横。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人在贫穷和恐怖中生活了几十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之后的大饥荒，6千万中国农民活活饿死。文革又是害死了2千万人。如今的强制拆迁又逼死人无数。

5. 共产体制导致假大空泛滥

因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违背了人性，违背了人类社会的正常秩序！公有化必然导致大破坏和大减产！而共党为了证明自己的主义真，就只有通过谎言——亩产十万斤的“卫星”产量来证明共党的优越！例如：1956年9月，中共首任粮食部长章乃器回浙江老家看望乡亲，乡亲们纷纷反映干部虚报产量，使老百姓吃了大亏，许多人饿肚子。当时有人问他：“你对家乡印象怎样？”章乃器说：“我在中央耳闻(下面汇报)目睹(报纸报道)，浙南地区粮食自给有余，还有外调，颇感高兴。可是回来一看，群众粗粮不够，细粮更缺，个个面黄肌瘦。这次我回中央一定如实汇报。”事实上，共产主义一开始就是靠欺骗起家的！马克思指责资本家剥削工人，而他自己却在搞奴隶制，强奸自家的奴隶保姆，虚伪之极！这是多么荒唐、多么堕落的党魁！所以，林彪对共产社会一言以蔽之曰：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

中国官方的统计历来是儿戏。各单位一把手的话就是圣旨，谁不服从谁下岗。一个单位几套账，应乎上级检查的是一套，对付各副职的是另一套账，一把手个人还有一套账。财会人员也分知己与外围，外围的财会人员看不到真账本。曾任国家统计局局长的薛暮桥后来承认，1958年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就有“两本账”，要反“左”可以用一本账，要反右就用另一本账。1959年庐山会议前夕，许多省委书记都装着两套材料上庐山以便应付毛泽东。

1998年朱镕基总理到安徽省的南陵县查看了粮食仓库，芜湖市官员吓坏了，因为南陵仓库里是没有一粒粮食，于是一天一夜的突击，从周边的四个县的粮库里调运了1031吨粮食，装满了南陵的仓库，朱镕基看见粮满仓，高兴的不得了，以为自己的农业政策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就是地方的狗官们的手段，哪怕你是个总理也骗你没商量。当时一个叫做于永华的粮站的站长还告诉朱镕基，说有一个乡，总共是2300亩耕地，而年产粮食1.5万吨，可叹的是朱镕基没有动脑子算一算，无论是一年种了几季，一亩地的年产量竟然是6500公斤。1958年是亩产万斤粮，到了1998年，就与时俱进到了亩产1.3万斤粮了。

捷克小说家米兰·昆德拉说，共产主义是一个弥天大谎。党把它描绘得那样美好：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按需分配。这一“神圣谎言”的目的是：既然将来美好，今天人们就应忍受贫穷、灾难，牺牲现世，换取共产主义的天堂。党为了走向天堂，采取任何手段都是必要的，包括用机枪杀、用谎言骗。党用机关枪把人们赶向天堂，但在通往天堂的路上建起了一座坟墓。罪恶并非由犯罪分子而是由热情分子造成的，他们确认自己发现了到达天堂的唯一通道，为了坚决地捍卫这条通道，不得不处死许多人。这是一个给所有人洗脑，让人们失去记忆的世界。极权统治的最终目标是造就一个“孩儿国”，让人民像孩童那般天真烂漫地按规定的节奏跳舞。在这个孩儿国中，任何一个有记忆的人，都难免被整死。米奇尼克说：共产主义是

谎言，而我们追求真理；共产主义意味着驯服，而我们坚持独立；共产主义是奴役、恐惧和书报检查，而我们要求自由；共产主义摧毁传统，而我们认同传统；共产主义是不公不义，而我们相信公平与正义；共产主义是掠夺、是懒惰、是贫穷，而我们追求理性、效率和繁荣；共产主义压迫宗教，而我们主张良心自由。总之，不论你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是传统派还是现代派，不论你是喜欢社会主义还是喜欢资本主义，你都应该反对共产主义。

共产制度的谎言欺骗也决定了它“必然灭亡”的命运，因为每一种控制说穿了就是过滤真实信息，制造虚假信息，一开始蒙别人，最后蒙的是自己；使得共产国家的思想、文化、科技事业相对落后。在这种综合国力的比拼中，虽然独裁者可以依靠特务活动来窃取政治、军事、经济的情报，以弥补其思想、文化、科技上的原创性活力不足，但始终是处于文化科技上的盲从跟风的劣势地位。而在这种劣势地位下，每当美国人民在科技文化上有重大发明创造出现时，都会让独裁者心惊肉跳，恐惧不安。在这种情形下，里根总统放出了一个“星球大战”的烟幕弹来，就让独裁者的心情十分紧张。虽然美国政府的决策几乎是放在玻璃罩里进行的，虽然这个“计划”仅仅停留在纸面上，虽然里根政府对于计划什么事情都没有干，这就让苏俄的独裁者冷汗如雨。独裁者本质上的心虚和自我恐惧，促使他们做出了过敏性反应。于是他们就在美国这个子虚乌有的计划上，拼着老命，也要与美国竞赛一番。生怕美国人真的在哪一天里，把战争打到了外层空间去了。于是，就自动地拿出了 40% 以上的国民收入，投向了与美国的这种“军备竞赛”之中。这样荒唐的结果是，苏共就加速地自取灭亡啦！

6. 从马英九的统一条件看中共的欺世盗名

2012 年马英九先生第二次当选台湾总统之后，就提出他的两岸和平统一的条件：“中国统一不应该是谁吃掉谁；国家统一后应该实现全面民选；谁选上谁当政，无论国民党、共产党、还是民进党。一次没选上不要紧，四年之后可以再次竞选。选上的，认真治国；选不上的，负责任地在野监督，同心同德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2013 年新春，连战要求允许国民党在大陆设立党支部。习近平总书记会见连战时探讨到中华民族的同一问题，连战提出允许国民党先在广东省，福建省，海南省建立中国国民党党支部建设，并参与五年后政府竞选。习近平答复称：将会充分考虑并尽快在年内给与答复。

马英九反对“一国两制”，那只剩下“一国一制”了。是搞“一党专制”的一制吗？这绝不可能。那就是“多党制”的一制了；各党平等，和平竞争，谁在大选中获胜谁就上台执政，这才是适应世界潮流的可行办法；又是代价最小，人民得益最多的办法。所以，“一国一制”的方案是对中国民主的一次有力推动，是中国社会向着现代化转型的一次历史性跳跃。将权力真正还给全体中国人民，让他们来决定；只有做到“天下为公，人民最大”（吴伯雄题字），才能成就真正的和平统一大业。这无须费一枪一弹。

从马英九统一条件，可以看出国民党民进党的胸怀、肚量、底气和胆识！

中共口口声声说，它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是代表先进文化的，如果言行一致，实践自己的诺言，就应当接受“民主统一”、“和平统一”的路线，就应当放弃“一党专政”与“武力攻台”的旨意（试问：民主与专制，哪个代表先进文化？）！唯其此，两岸才能尽快统一，大陆亦会走上民主化的大道。虽然在此过程中，中共将会失去私利与特权。两者相权，孰轻孰重，

不难判断。台湾总人口仅 2300 万，人家尚且不惧；共产党你号称八千万，台湾各党派总和都不及你的零头，你怕什么呢？你怕老百姓不投你的票，这就充分说明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三个代表”是假的，你这个谎言党最害怕的是人民自由投票！

中共领袖其实都是靠着官员的腐败来掌控他们的，因为这样，官员们才会听话，不听话的就立刻以腐败的名义清除了。若真是个清官的话，到时候要处理起来反而借口都没有。所以，中共官场腐败其实无可能去除的，除非领导人不靠着这个来掌控官员。若都是清官的话，那么中共何惧言论自由、选举自由和结社自由呢？

暴力土改、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无一不是兽性十足。中共行事一律盗用“人民”名义，哪怕是打家劫舍……，国号亦称“人民共和国”，脸皮之厚，实属空前。共产运动、专制独裁，害人无数，其心之黑，或已绝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三个代表”——始终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利益，真是莫名其妙！你的利益，我的利益，我们大家的利益什么时候授权共产党来“代表”了？这是不要选票的强行代表，这是赤裸裸地强奸民意！在你不知情更没有授权的情况下，有人却在那里起劲地喊他代表你什么的时候，正是你的权利被他悉数剥夺的时候；在众人不知情更没有授权的情况下，有些人却在那里起劲地以众人的名义干什么的时候，正是众人的利益被他尽情享用的时候。这就是共产党欺世盗名的实质——满足极少数权贵利益的需要！

又如，“先富论”，为什么一些人会比其他人“有条件先富”？“先富”的能带动后边的穷人富吗？事实上，中国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证明了“先富论”的极大欺骗性！现实中，那些大量先富起来的党官，不是连一点“血汗工资”都不肯付吗？不是不管工人的职业病和社会保险吗？不是动用国家机器野蛮拆迁吗？期待中国一代富人去“带富”中国的穷人仅是黄粱一梦而已。穷人要致富，能指望政府呢？中国经济几十年持续高速增长，可是医疗、教育、住房、养老这些福利制度一个个取消了。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都还保持了这些福利，甚至连中国老百姓最后那点活命钱——社保基金都敢拿走，国人还能有什么指望！政府早就告诉大家：要找市场，不要找市长。把年过半百的下岗工人和无依无靠的失地农民打发到市场去了。如果一个政党以少数人先富起来为目标，那么必然是建立在多数人受剥削的基础上。

“一切为了人民的利益出发”，不过是共产党用来巧取豪夺的最大遮羞布而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私利”云云……“全心全意”本身就是世界上最大的谎言！因为政党都是由人而不是由神组成的，只要是人就会有与生俱来的自私和残忍。说世上竟有这么一个崇高无比的政党，它的成员都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除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之外，本身没有利益追求——这全是自欺欺人的神话。共产党人没有自己的私利，也就是说“全心全意”为自己服务都做不到，怎么可能“全心全意”地为他人服务？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组织都不可能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可见，共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一个欺世盗名的虚假宗旨！中国共产党党章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事实上不是人民的忠实代表。官方宣传：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官员是人民的仆人。可这就怪了：仆人武装到了牙齿，主人赤手空拳，主人身上偶尔带把刀都被仆人定性为凶器。天底下，还能找出这样窝囊的“主人”和这样强悍的“仆人”吗？

共党最虚伪在于明明是强迫全国之百姓受制于几个党之魁，却偏偏要众百姓承认是百姓自己的选择，是历史的选择，是民族的万幸！思想“统不统一得了”，党魁并不真正关心，他们

关心地是自己编造的“理论”就是一块试金石，谁敢说个“不”字，谁敢不把“理论”挂在嘴上，贴在脑门上，谁就是“异己者”，必须下课！即使这个理论是狗屁，那也得承认是真理！很有些秦朝那个“指鹿为马”的典故之重演。明明是“糊弄”人的谎言，却要普罗大众必须接受，必须承认，必须歌功颂德！这就像一个恶棍公然挑起一坨屎，硬说是块蛋糕！你说是蛋糕就是蛋糕吧，可该恶棍非得要你吃下去！而且吃下去后你还必须说是蛋糕不是屎巴巴，还要你连称好吃好吃！共产党就是这样硬把一坨坨臭狗屎说成“蛋糕”，还逼着人们把这些东西吃下去！谁敢说那不是蛋糕是臭狗屎，那你就离“屎”不远了！

那些明明是祸国殃民的措施、明明是窃国肥己的当权者，却被万众一辞地颂扬；所以，这个组织才会无耻地宣称自己的伟大光荣正确，无耻到说自己的伟大就在于“能纠正改正自己的错误”因而伟大；无耻地自封自己要带领全国人民如何振兴民族，无耻的宣称自己“代表了”绝大多数人民，更无耻地标榜没有自己就没有“新中国”……最要命的是，在共党的威胁利诱下，百姓得从小就对这些“欺世盗名的学说、主张、口号”顶礼膜拜，三呼万岁，还得无条件地认可这些世界上最无耻的谎言是世界上最好的真理！

“欺世盗名”是共产党当政以来中国呈现出来的最高时尚，是共产党最爱的“皇帝新衣”！一个国家，被一个完全以谎言加暴力作为统治工具的政党控制着，那么这个国家的民必苦，世必乱，家必亡！这就是欺世盗名之共党最终带给中国人民的必然结果！

7. 崔永元：我曾相信谎言

我曾相信红军“长征”去陕北是为了打日本，后来发现陕北根本没有日寇，红军去陕北只是为了逃命、为了苏援。我曾相信毛主席领导八路军打败了日寇，赢得了民族独立；后来发现原来是国军的浴血奋战和美国的帮助才打败了日寇。我曾相信 1949 年共产党建立了新中国，后来发现 1945 年国民党就建立了新中国，后被内战打烂。我曾相信毛主席领导的打地主分田地是为人民除害，后来发现绝大多数地主的财产都是辛勤劳动所得，他们却受到令人发指的虐待和抢掠。我曾相信志愿军抗美援朝是保卫国家，后来发现联合国军根本不是要侵略中国，而是阻止战犯金日成吞并韩国。我曾相信越南自卫反击战是自卫反击，后来发现是因为越南推翻了柬埔寨波尔布特政权——一个杀害了本国 1/3 人口（含 20 万华人）的红色高棉恶魔集团。我曾相信饿死 6000 万人的 1958-1962 大饥荒是天灾及苏联逼债的结果，后来发现那些年风调雨顺，是毛的大跃进、赶英超美、支持世界革命造成的。我曾相信黄世仁欺压白毛女，后来发现那只是杜撰出来的故事。我曾被孔繁森、焦裕禄、雷锋的事迹所感动，后来发现那些只不过是人为塑造的典型。我曾相信领导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公仆、人民勤务员，后来发现那些只是他们贪污腐败(抢劫吸血)的遮羞布。

我曾相信人大代表代表人民的意志，后来发现他们大部分都是领导和亿万富翁。我曾相信民主德国的人民当家做主，后来发现民主德国的人民冒着枪林弹雨奔向联邦德国。我曾相信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是个民主国家，后来发现那是个地球上最专制的封建王国。

我曾相信万恶的资本主义人情淡薄，唯金钱至上，后来发现比尔盖茨、巴菲特把全部财产捐给公益事业。我曾相信美国总统大选是有钱人的游戏，后来发现不仅克林顿出身贫寒、就连一个祖籍非洲的贫穷移民的儿子通过自己的努力也能当选美国总统……

我曾相信五毛痛恨美国，后来发现美国打的都是邪恶政权，就连五毛吹嘘的英雄王立军都跑到美国使馆避难。我曾相信美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后来发现中国有钱的、有权的都移民去了美国。我曾相信伊拉克人民拥护萨达姆，因为他每次得票率都是 100%；后来发现美军一来，他比人口还多的塑像都被人民推翻并踩在脚下。我曾相信美国打伊拉克是为了石油，后来发现伊拉克最大的油田合同被中石化拿去了。

原来南泥湾种的是鸦片，方志敏原来是个绑匪，贺龙不是两把菜刀起家的，刘文彩不是恶霸地主，中美合作所是用来抗日的，半夜鸡叫是假的，雷锋也是吹出来的，刘文学、白毛女、邱少云、赖宁、黄继光统统都是假的，现在连铁人王进喜也是假的。

当发现了这些真相，我震惊了，原来我一直活在谎言之中！

党的副主席李德生的秘书刘家驹说：史观改变了，我今天才发现：从井冈山时期开始，朱毛的前委和军委之争，是一场毛要控制军队之争；1931-1932 年间，根据第三国际的指令，两次莫须有的清除 AB 团、社会党，杀掉自己人 11 万；红军长征不是播种机，宣传队，而是一路打砸抢；四渡赤水不是毛泽东的神来之笔；张国焘没有分裂党另立中央；抗日战争是游而不击；朝鲜线战争是为金日成火中取栗……

1935 年 1 月的遵义会议由中央总负责人博古主持。毛泽东就“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作了演说；朱德讲了红军的宗旨、性质、任务和纪律；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讲了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意义。红军所到之处以“打土豪，分田地”为名大肆烧杀抢劫，滥杀无辜，恣意侮辱所谓“土豪劣绅”、“地主”家之女眷（实则所谓“土豪劣绅、地主”可以随意认定，说你是，你就是。“看上”你了，你就是）无所不为。更软硬兼施强迫青壮年入伍，不从者即杀。严道生有一郑姓朋友，其女儿郑娴雅当时才 17 岁，是个高中生且多才多艺。被红军强拉去作“宣传”工作，为其画漫画、写标语等。后来随军前进途中，郑娴雅吃不了那个苦，便停下来要回家。于是她被以“叛变革命”罪而遭杀害。后来发现她遗体时，不但全身被脱光，显然受到了性侵犯，而且被剜去双乳，令人惨不忍睹。其父母见状痛不欲生。对人哭着说“杀人不过头点地，为何如此糟蹋她”？这真不知是什么野蛮人的野蛮“文化”？

一再修改的党史，众多事件也不断被篡改，只给我们留下了一堆历史垃圾。

8. 漏网大地主与四大恶霸地主

中共在割据时期搞过土改，“建国”之初的土改声势浩大，富家闻风丧胆。在农村要找一个被错划为地主成份的不难，但要找一个漏网的小地主就难之又难。刘少奇出身地主，周恩来的出身是旧官僚地主，邓小平也是。有谁能躲过土改的法网？有！毛泽东在他的自传中交代是富农出身，在小学课本中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出身农民家庭，从小热爱劳动。可是许多历史数据显示并非如此。在香港出版的《中共党政军结构》一书中指毛的父亲是一个亦农亦商拥有 80 多亩水田的地主。中央党校党史研究室档案披露：1952 年 7 月土改时毛泽东父亲拥有 148 亩土地、2 个池塘，被评为地主，上报省委改“富农”，土地篡改为 48 亩，池塘改为一个。1964 年 5 月“四清”又改为“上中农”，由张平化签字。显然毛泽东欺骗了全国人民，也欺骗了他自己的党。1952 年底，以诗人吉洪诺夫为首的苏联文化代表团访问中国时，曾去韶山特向毛泽东的父亲敬献花圈。其时中国的所有地主、富农都被打翻在地踩上一脚，

斗得肝脑涂地，而毛的父亲却获得殊荣挂上桂冠，真是好一个漏网大地主！

只要一提到地主，人们就会不由自主、不约而同地想到刘文彩、黄世仁、南霸天和周扒皮这四个人。不过，从现今已披露出来的有限资料来看，这些人物的原形，都有着他们的正反两面，而黄世仁是因创作需要虚构的。据《中华读书报》2002年4月3日发表的《白毛女的故事》一文介绍，《白毛女》的题材来源于晋察冀民间一个关于“白毛仙姑”的传说。不久，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周扬看到了这个剧本。很快，周扬决定由鲁艺创作并演出一部大型舞台剧，就以“白毛仙姑”为题材。创作班子很快搭了起来，新剧本确立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样一个新的主题。黄世仁这个地主形象是创作出来的。

“白毛女”原是民间传说中的一个惩恶扬善的仙姑，为了“教育”人民而被胡编乱造为“苦大仇深”的被压迫阶级典型。戏中贯穿复仇思想——“千年的仇要报，万年的冤要申。”由于它的煽动性太强，竟然发生过士兵观看演出的时候举枪差点打死“黄世仁”的事件。

戏剧《白毛女》让黄世仁遗臭了万年。但经过记者对黄世仁的家乡河北省平山县进行详细调查，从群众那里得知了历史上那一段传说的真实面目。黄世仁的爷爷黄运全，本是一个老实贫农，经过一辈子的省吃俭用艰苦创业在40岁的时候买下了15亩薄田，然后辛勤劳动惨淡经营最终将105亩地传给了他的独生子黄起龙。黄起龙念过私塾知书达理，聆听祖训秉承父业，低调做人，几十年来，将黄世仁的爷爷黄运全留下的100亩地扩大成千亩良田。并且有了仁、义、礼、智、信5个儿子。黄世仁是长子，自然接了父亲的班。黄世仁自幼好学，学历至相当于现在的高中。黄家五兄弟在当地名声颇好。黄家仁人善心，经常周济邻里，行善积德。在当地是有名的黄大善人。黄世仁有一妻七妾，儿女成群，家庭和睦（当时的法律允许有一夫多妻，黄世仁的婚姻状况不属于违法也在当时的道德规范之内）。

杨白劳，黄世仁的发小儿（结拜），杨白劳的父亲杨洪业是当地有名的豆腐大王，人称杨豆腐。杨家豆腐以质好价廉著称。杨洪业将他的豆腐事业传给他的独生子杨白劳之后，于41岁英年早逝。杨白劳承接父业之后，辛劳程度超出了他当公子时候的想象。又染上了赌瘾毒瘾，豆腐事业从此一路向南。当地百姓都很看不起他。大春，贫农，一个小痞子，无赖。喜儿，杨白劳的独生女儿，一个喜欢吃豆腐的胖懒妞。

《白毛女》把黄世仁描述成为富不仁横祸乡里的恶霸，强抢民女强奸喜儿，最后在人民群众的吼声中被镇压了。杨白劳因欠黄家巨款无力偿还喝卤水自尽，喜儿据说在大山里呆了若干年须发皆白最后被大春救出。大春参加革命结束无赖生活。

事实是：黄世仁在杨白劳欠下巨额赌债无力偿还又遭债主追讨的时候立字据借给杨白劳大洋1000元（相当于现在的10万人民币），然后又收留未成年的喜儿。杨白劳欠钱躲债吃喝嫖赌无脸见人最终误喝卤水不治身亡。黄世仁念在同杨白劳多年的情份上厚葬杨白劳，并且收养喜儿。黄世仁没有强抢民女。《白毛女》创作者杨润身回忆，“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在情节上提出了不少再创作建议。如：歌剧中的杨白劳是腊月外出躲账，但杨润身清楚地记得，当年他父亲是拼死拼活挣够欠地主的利息，主动向地主还息。按照过去的社会道德习惯，穷人还清债息就可以安度春节。剧中杨白劳、喜儿、大春三个劳力，完全可以还清黄世仁的债息，躲账有欠真实。杨润身就与两位编导商讨，由杨白劳躲账改为主动还息，但黄世仁为霸占喜儿，强词夺理，要求本利全还，逼杨白劳走上绝路。这样一改，更加增加了观众对黄世仁的仇恨。”于是，根据上级制造仇恨的需要，编剧们颠倒了杨白劳欠债不还的基本事实，

又把为富不仁的帽子扣到黄世仁头上，再给黄世仁编加了强奸喜儿这么一段苦大仇深的剧情。于是，全国人民对地主的仇恨成功挑逗起来了，在全国掀起土改运动，杀地主，抢地主的田地财产，霸占地主的妻妾。人家都说窦娥冤，其实，黄世仁比窦娥还冤。

文革时期，每年的除夕，广播中都要播出“革命样板戏”《白毛女》，以提醒人们不要忘了“万恶的旧社会”。在大雪纷飞的除夕之夜，人们排着长队去领取严格按人头配给的一点年货，就在此时，无处不在的喇叭里却传出了幽怨的《白毛女》的旋律。要让人们在与“旧社会”的对比中获得虚幻的满足，并产生由衷的感恩。辽宁省新金县武装部副政委王立龙是个“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标兵。1968年4月，他带了两名助手到下面公社去寻找阶级斗争的新情况。当他一听说有个大队党支部书记同一个姑娘许连荣有染时，马上断定这就是阶级斗争！是敌人向共产党干部施了美人计。因为许连荣长得比较漂亮，许的哥哥读中学时，曾被诬参加“反动组织”判3年管制。在“革命样板戏”《白毛女》中，杨白劳被逼按指印，回家对女儿无法交待而自杀。而实际并无被逼按指印的事，这戏是当年延安的文化人编出来的。而今天的真实故事是：许连荣被严刑拷打，被打得死去活来不得不“招供”，“按指印”后被放回家。当天晚上，许氏一家，老夫妇、两个儿子及三个女儿，7口人一起上吊死亡。许连荣腰间别着一份遗书，要求对她的尸体进行检查。检验结果是：她还是个处女。

真正的悲剧在现实中一直上演着，一演就是60年。如果说中国历史上有一个时代真正把人变成鬼的话，那也只有中共的统治下，无数的人一夜之间被剥夺了人格尊严乃至生存权利，被殴打、被关押、被驱逐，甚至被残杀，60年来，中共杀害人民的屠刀从未放下过。在此意义上，“白毛女”的所谓人变鬼鬼变人的主题，倒成了某种令人恐惧的谏言。

“南霸天”原型本是善人，从未欺压百姓。《红色娘子军》中南霸天是另一个十恶不赦的大地主。南霸天的原型是海南陵水县当地一个叫张鸿猷的地主。张鸿猷的孙子张国梅说，在他爷爷死后4年，红色娘子军才组建。当时，拍电影的人说他家房子气派，又是大地主，选在这里拍电影真实。于是，就在他们家拍了几个镜头。张鸿猷堂兄张鸿德的孙子张国强是目前唯一健在的见过张鸿猷的人。他说教师世家出身的张鸿猷是个善人，他没有欺压百姓，家里也没家丁、枪支、碉堡，只有几个请来帮他四姨太带小孩的小姑娘。

红色娘子军的第一任指导员王时香老人也曾回忆说：“我们连长庞琼花，就是电影里的吴琼花。她是贫农出身，并不是南霸天家的丫环，也没有南霸天这个人。”

在共产艺术作品中，除了“高大全”式的英雄人物，一定要有阴险狠毒、专事破坏的“阶级敌人”。如全国家喻户晓的地主“周扒皮”——辽宁大连瓦房店的周春富，在土改中被杀害了。当地老人说，他虽然有小地主刻薄、吝啬的通病，但没有听说过半夜鸡叫的事情。在当地，与周春富有过接触的老人都知道，“周春富这人无论吃的还是穿的，都很寒碜，裤腰带都不舍得买，是用破布条搓的”。周春富腰间常年捆着破布条，“从不闲着”，他一辈子最大的努力就是勤俭，然后买地，为周家积攒了一大份家业，这份家业包括40天（约合2413亩）土地，还有“四大坊”——油坊、磨房、染坊、粉坊以及一个杂货铺。

说起地主周扒皮《半夜鸡叫》，几代中国人几乎无人不知。故事讲的是老地主周扒皮为了剥削长工，半夜时把头钻进鸡窝学鸡叫，引逗窝里的鸡也跟着叫，然后他以鸡叫为由喊长工们下地干活。小学课本中的《半夜鸡叫》选自自传体小说《高玉宝》，被用来进行所谓的“忆

苦思甜”教育，号召人民一定要仇恨“万恶的旧社会”；并拍成木偶故事片，成了儿童思想启蒙的教科书。但只要用常理推敲，就会发现《半夜鸡叫》的真实性大有问题：

假如周扒皮真的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半夜假装鸡叫、催促长工到地里干活，那四周漆黑一团，把长工们轰到地里干什么？从木偶片中，我们可以看出长工们是下地锄草。天那么黑，草苗难辨，是不是周扒皮给每个长工发一副“夜视镜”呢？这只会把庄稼踏坏，妨碍了庄稼的自然生长。周扒皮半夜把长工轰到地里去锄草，却又无法锄草，白白浪费人力资源，时间一长必把长工身体拖垮，日后到了抢种抢收时咋办？周扒皮如此没事找事瞎折腾，是不是患有“精神病”？周扒皮把脑袋钻进鸡窝里学鸡叫，鸡也跟着叫，那叫声着实让人怀疑。因为，人的脑袋钻进鸡窝里，鸡们（公鸡、母鸡）只能是惊恐地叫，而绝不会是悠然、从容不迫的公鸡报时。假如周扒皮天天晚上那么折腾，白天他还监工不？监工，不得把他累死！当然，高玉宝告诉人们，长工们下地之后，周扒皮回屋睡觉去了。可是，这样一来，他不担心长工们到庄稼地里怠工或睡大觉吗？长工不是地主的奴隶，他们有人身自由，对雇主有选择的权力。周扒皮待人苛刻，长工们可以弃之而去。至于“天下乌鸦一般黑”，不过是抽象的理念。作品用抽象的阶级斗争观点看问题，把地主与长工的关系混成了奴隶主和奴隶的关系。

一位早年在大连新闻单位供职的退休记者说：“我那时担任农村部记者，有机会到高玉宝的家乡采访，当时高玉宝所写的那个周扒皮原型的地主已死去多年。但他的后代在农村境遇非常凄惨，整天被人叫作‘地主崽子’。当时陪同我一起采访的乡干部还帮我找到了村里几位年纪大的老人，以帮我了解《高玉宝》这部小说创作过程中的一些细节。当时的交谈大出我的预料，《高玉宝》中的周扒皮根本就是杜撰的，‘半夜鸡叫’根本就是连影都没有的事。一位姓阎的老人对我说：半夜鸡叫？我这一辈子都没离开过村子，我怎么就没听说过？从古到今，谁听说过农民深更半夜去种庄稼的？人长了猫眼睛吗？那不是去祸害庄稼吗？一位老大娘则说：高家那小子（指《半夜鸡叫》的作者），真是造孽；本来某姓人家（周扒皮原型）在村里还呆得住，他那个书一出，某姓人家算是出了名，每次搞运动，上面都安排人斗他一回。人硬是窝囊死了。现在他家的儿子孙子还动不动被人打，被人骂。”可怜几代中国人，就这么在“半夜鸡叫”中被骗了一代又一代，让无中生有的仇恨在心里发了芽。

四大地主中，唯一的真实人物是四川的刘文彩。真实的刘文彩绝对算不上好人，但他有令人称道的一面。刘文彩被官方描写得比阎王爷还坏。其实，刘文彩是个大慈善家。刘文彩的胞弟是大军阀刘文辉。1930年代，刘文彩依仗刘文辉的势力，垄断盐巴、药材、棉纱等行业，获取暴利。他还在刘文辉掩护下涉足鸦片贸易，成为毒品大王。1940年代刘文彩开始济困扶危，乡里修桥补路不必说，他还曾捐献过一座当时在四川省属一流的师范学校，比现在的希望学校强百倍。刘文彩再度成为舆论焦点的一个事件是：大邑县安仁中学即原来的文彩中学，一度盛传要被拆，舆论顿时哗然。刘文彩修建的文采中学，占地两千多亩，校产总值3.5亿多法币，折合当时美金200万以上，当时在四川地区乃至在全国私立学校中都是最大最好的。征地时为使百姓利益不受损失，刘采取的是两亩地换一亩地的办法。学校建成后，刘从不干预教育和教学，只在春秋开学典礼上简单说几句，大意是要学生们发奋学习，将来报效中华民族。再一个就是他对子女及亲属要求极其严格，文采中学的校训规定，校产是学校的校产，刘家子孙不得占有。刘家子孙仅有的权力就是每年对学校的财务进行一次清理，仅此而已。校方2009年12月底发表声明，表示不会破坏这座历史建筑。此外，刘文彩每遇逢年过节都要对贫困人家走访和接济，乡邻之间纠纷也要请他调解，因为他办事公道正派。他还投资修建街道，现在未撤除的两条街道仍不失当年之繁华。刘文彩的孙子刘小飞说：“刘

文彩被说成是恶霸地主，但是全县民众说他是‘刘大善人’。1992 年中共大邑县县委统计历史上谁给大邑县的贡献最大？结果是刘文彩，贡献最大的第一个人是刘文彩，例如，成都到大邑的公路是他修的，万成堰水利工程是他修的，还有当地的发电厂和水电厂。”

最需要指出的是：刘文彩的家中从来就没有设什么“水牢”、“地牢”、“行刑室”。“水牢”原本是存放鸦片的仓库，而“刑具室”、“行刑室”只不过是刘家摆放瓷器和年货的储存间。编造出住过刘文彩水牢的冷月英，后来有记者找到她，她拒绝正面回答，情急之下脱口而出：“你们追着我问什么？又不是我要那样讲的，是县委要我那样讲的。”

中共从井冈山开始就实行一条仇视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政策。窃取政权以后，变本加厉，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这些运动无一不是以消灭知识和知识分子为目的。但是，这个不要脸的中共反动统治集团居然还以伟光正、三个代表自许。简直不知羞耻为何物！可怜的一点教育经费，除保证特权阶层集中的大城市大办贵族学校外，更让中共统治集团千方百计克扣、贪污、挪用，于是剩下的当然只有危房、只有豆腐渣工程，在 2008 年的四川大地震中只有学生、儿童被大面积的谋杀。震塌了这么多校舍、震死了这么多学生和教师，按民国时代的标准，教育部长、建设部长是应该杀头的。1932 年，刘文彩的哥哥刘文辉被蒋介石任命为西康省委员会委员长、西康省政府主席。他十分重视教育。1930 年代，摄影师孙明经发现当地的学校校舍大都宽敞明亮，学生衣着整齐，令人耳目一新。而一些县，政府办公房却破烂不堪。于是孙明经好奇地问一位县长：“为什么县政府的房子总是不如学校？”县长回答：“刘主席说了，如果县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孙明经留下许多珍贵的照片，至今尚可查到。其中有一张是义敦县县长立于县政府前的留影。一座用石头砌起来的低矮平房，破败不堪，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不得不用树桩支撑起来，这便是义敦县政府。然而，县长神态平和，丝毫看不出他抱怨。另一张照片，是 1930 年代德格县的一群小学生的合影。学生们身着整齐的校服，气宇轩昂、精神抖擞，猛地一看还以为是日本人。

9. 奥巴马驳共党“先进性”之画皮

人民主权说已为普世公认，没有哪一种价值观能与之对抗。因此，无论是传统型还是马克思主义统治者都不会反对人民主权，并标榜自己政权的目的是人民幸福。但他们又声言，只有他们才能真正代表人民，而其他政治势力都只会误导人民。其不合理性就表现在这里，为何只有他们能代表人民？对于这个问题，这两类政权的统治者都认为，因为他们比被统治者更优秀。至于原因，传统型的统治者认为是由于血统，马克思主义的统治者则认为是因为他们具有无可比拟的“先进性”或“正确性”。因此，统治者共党的利益高于劳动大众的利益的价值观就悄然形成了，因为统治者代表了被治者的根本与长远的利益。

只有现代极权集团才不断地吹嘘自己的先进性。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云：“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这样，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就天然地代表了无产者的根本与长远的利益，共产党就成了无产阶级的当然代表，并确立它对无产阶级夺权运动的当然领导地位。第三国际共产党的专制独裁，正是从这里找到理论根据的。“代表……利益”应该由谁来加以确认？没有。只是自己说了算，我说我是什么就是什么，真他妈的“黄婆卖瓜，自卖自夸”。由于这个无比荒唐的“自夸”，成了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诸人强奸无产阶级的阶级意志、镇压

人民的一贯伎俩和手段。它的逻辑是：我是共产党，因此我代表着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最高利益；你若反对我，你就是人民的敌人，因此是反动派、反革命，必须予以消灭。

《共产党宣言》说：“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推动运动前进的部分（编者注：“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最先进的和最坚决的部分，推动所有其他部分前进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比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优越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共产党人被马克思说成了无所不知的神——救世主，共产党人“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马克思打倒了旧宗教里的神，塑造了新的神——共产党人。共产党人不但“胜过”被称为“无产阶级群众”的芸芸众生，而且“胜过”“各国工人政党”。这样，共党就被吹成了工人阶级最好的代表；工人阶级就失去了任何自主权，每个工人都丧失了罢工游行权。

“先进性”理论导致了独裁。共党宣称它代表无产阶级，它比群众更懂得他们的利益所在，这是它掌权独裁的理由。“先进论”作为一种政治哲学的返祖现象，使人不免想起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的高论：人之所以必须分为主人和奴隶，就在于主人对双方的共同利益有着特别的洞察力。中共一向追求自己具有“领导”人民的天然权力，这一权力是基于它创始那天起自命为“无产阶级先锋队”、后来自封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而来。可见，虚构的“先进性”神话，是共党支撑“绝对领导地位”的政治伦理。

马克思提出无产阶级专政即共产党专政，而专政的本意就是独裁。列宁厚颜无耻地说：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只有工人阶级是一切阶级中最先进的阶级，而共党又是先进阶级的先锋队；共党集中了无产阶级的一切优点，是先进中的先进，自称伟大光荣正确；共产党天然地占据了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即使犯了严重的错误，其地位也不可动摇，因为它代表最先进的无产阶级，又掌握了最先进、最革命、最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所以，全国人民和任何组织都必须服从共党的领导。而共产党又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来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这样就自然会演变成群众专政就是阶级专政，就是共产党专政，就是领袖专政了。党的领袖更是先进不得了，是先进的N次方，不能违背；否则，就是彭德怀的下场。党魁肩负着领导共党的大任，共党肩负着通过“淘汰”一切劣等阶级来解放全人类的大任，不受法律约束；既然如此，就没有必要对“天然性善”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袖进行监督约束，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独裁专制了。可见，所谓的先进性理论不过是论证共党领袖永远先进、永远正确，为共党领袖独裁找借口而已！

“先进性”理论导致了导致终身制和世袭制。共产分子一生献身于“革命”事业，于是乎就有了终身革命家，必然实行终身制，也就是一旦为官终身享受特权。为了永葆政权不变色，就必须让自己人世代代掌权，所以干部必然是世袭制。中国目前太子党就是明证。可见：马主义的“先进性”谬论就是封建等级制的复辟。朝鲜共党的金家王朝就是典型！朝鲜共党已经在宪法和党章中规定了“白头山血统”的世袭制，删除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再挂羊头卖狗肉了，赤裸裸地宣布这个政权就是金家世袭王朝。这样一个在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指引下的国家，终于建成了人类历史上最落后、最黑暗的金家奴隶制。胡锦涛号召向朝鲜学习，就意味着把中国拉回改革开放以前，让权贵集团上升为奴隶主，把13亿老百姓变为毫无人权保障的贱奴。如果说朝鲜是一家世袭，中国则是几家共同世袭而已！

马克思颠倒黑白地把穷人说成最先进的，其它阶级都被说成是反动的；因为共党要依靠盲从、容易被煽动的无产阶级来建立独裁的党国，而其它较为富裕的阶级往往保守、独立、不喜欢独裁专制，所以被马克思视为“反动”。狡诈的共党对幼儿园的儿童都灌输热爱共产主义党的思想，而禁绝一切相反的信息。因为一张“无知”的白纸最容易描绘出“美妙”的共产主义图画。这就是共党重视青年少年而排斥、打击知识分子的原因。这就是“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来源，知识越多的人越容易识破狡诈的共产主义的骗人伎俩。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是共党国家反对知识分子、进行残酷的阶级斗争的理论根据。马克思的《资本论》不承认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创造价值，只承认物质生产部门的生产劳动创造价值；说什么商业职工、银行职工不创造价值，是挪用了物质生产部门的工人所创造的价值，更不承认教师、律师等知识劳动创造价值了；还说地租、利息是剥削收入。这样，地主、资本家与店员、知识分子就成了寄生虫和半寄生虫，属于被消灭之列。因此，所有共党国家都迫害知识分子。

所谓无产阶级不过只是马克思吹胀起来的气球，所赋予的“先进性”之类也不过是画在气球上的獠牙，吓唬人或许有点用，经不得半点推敲。马克思的“凡有产者必定是剥削致富，必定在道德上败坏；凡无产者必定受剥削，必定道德高尚”是毫无事实根据的。马克思主义的反普世价值比起法西斯的反普世价值的不同之处在于，法西斯主义坚持日尔曼民族、或大和民族是高级民族、优秀民族，因而有权把其他“劣等”民族踩在脚下加以奴役甚至杀戮。而马克思主义坚持劳动阶级是进步的阶级，因而有权把非劳动阶级视为反动的一帮踩在脚下加以专政。马克思主义比法西斯主义还有有过之而无不及之处，它把这种反普世价值的所谓体力劳动至上的价值立场树立为道义的最高标准。“工人阶级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先进的阶级”完全是谬论，此谬论的必然得出“体力劳动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搞出工农大众大专觉醒分子政的“文化大革命”。恩格斯也说过：“在一切稍微长久的革命时期中，广大的人民群众很容易轻易轻信那些拼命挤到前面来的少数人的纯粹的欺蒙”，这些人号称“无产阶级革命家”，所行之“无产阶级专政”不过是中世纪专制暴政的现代版本。

共产党是“先锋队”的观点，是一种过时的“精英论”观念。所谓“先进”总是针对落后而言的，亦即假定大多数人是落后的，人民是不“先进”的，不能当家作主，而必须由一个“先锋队”来统治。“先锋队”理论实际上是一种等级制和反无产阶级大众的理论——这种打着无产阶级旗号的专制理论，实际上自相矛盾，却成了所有共党党魁实行残酷专政的理论依据。这种理论把人的智力分为高低不同的对象，实际是古代“上智下愚”思想的现代版。这种理论也常挂着民主招牌，实际上违背了民主的根本原则——人人平等。民主政治的根本原则是人人平等，是人的“本性”平等，不得以智力或道德高低而区别对待。“先进性”颠覆了平等性。“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就是对人的平等“本性”的公然挑衅！人的性质是天生独立、无差别的。在物理法则上，分子间的无差别在际间联系里就必然是平等的。在自然法意义上的平等人际联系中，从来就没有“先进”与“落后”、“代表”与“被代表”等属性。由此可见，“党的先进性”说教，从根本上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天然平等性。

政治权力产生于平等，只能以平等的原则平等地获得；暴力抢夺、霸占并以“宪法”的形式永久垄断则违背了平等原则。在现代社会，究竟由哪个党执政是由人民群众来决定的。一个政党是否代表先进是要接受实践检验的。由谁来检验呢？当然只能由公民的选票来检验。换句话说，要由人民群众来授权，因为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如果不由群众来选择、来决定，那就根本谈不上民主政治。民主制度的前提是：与被统治者相比，统治者并不具有质的优异性，统治者或治理者的权力或权威并非出自某些更高的、人民所不能企及的品质，而是仅仅

出自被统治者的委托和信任。无论任何“群体”、什么“党派”，多么“先进”、多么“伟光正”，都不能给其掌握的政治权力赋予“先进”和“伟光正”的性质！给政治权力的任何“装饰打扮”，只能突显当权者的流氓本性；只能证明其权力来源是非法的！

中国特色“核心价值”与普世价值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普世价值从只承认人人平等，共党却将人类分裂为“优”与“劣”的对立。共党是分裂人类、破坏社会和谐的高手。中共历代党魁的讲话都暗含着一种武断中共先天就具有“先进”与“纯洁”的政党优越性；中共霸道地自封为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先锋队”，甚至是“大救星”，始终以自己“先进性”幌子，凌驾于人民性之上。共党一直在教育中国人，它是中国人民的优秀代表，人民无论如何都不如它。在1964年7月14日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中，毛泽东邓小平说：“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是无产阶级意志的集中者。无产阶级政党，也是唯一能够代表占人口90%以上的全体人民利益的政党（问中共：90%以上的人民投了赞成票吗？典型的强奸民意）。……”这说明中共一直以优秀自居，歧视广大的中国人民和中国其他党派。中共武断性地将平等的人与人关系，按其党性意识扭曲成改造与被改造关系。中共历史上就强调要“改造知识分子”“消灭有产阶级”，就是一次次以党性的特殊性向人性的普遍性宣战。在如此强调党性统治的意识形态中，就不可能承认世界上存在相同的人性伦理与人权价值。

中共历来自榜的“先进性”只是一种神话，它不仅仅是一种主义的虚构，而且在实践上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天然平等性。从毛泽东江泽民到胡锦涛再到习近平，都在鼓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继续强调“党性”意识，虚构“主义”伦理的等级优越感，将自己从群众性中分离出来，霸道地认为党性高于人性，共产党人比民众“先进”，先进党注定要教育、领导落后的群众。眼下那些最时髦的“保先、保洁教育”，其实就是在“为人民服务”幌子下，确保其高高在上，独占权力的自我功利塑造和自我优化运动。如此优化党性，人性就必然缺失；权力唯我独享，就必然贪婪腐败。从毛泽东开始神话“党的先进性”，并在“为人民服务”的金字招牌下玩女人，到胡锦涛时代“八荣八耻”幌子下成克杰、陈希同、陈良宇所有腐败高官背后都有不少叫床女人，他们都打着共产党人“先进性”幌子，掩盖其腐败性。薄熙来的贪婪、狠毒、无耻……等等无不来自于共党文化及其制度。薄熙来是完全地喝着共党精神乳汁长大的，他个性里的一点一滴都能在共产主义制度里寻出源头。

从生物基因学说的视角看，这种先锋队理论毫无道理。共产主义的任何信徒，无论是所谓的导师马克思、列宁，还是曾被捧上天的毛泽东、邓小平，或者政治局领导成员，与人类其他成员相比，既不天生多长一个脑袋，也无任何基因优势，凭什么就是“先锋队”、“先进文化、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没有道理可言！党的先进性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是共党自说自话。自己把自己吹捧成“先进”，违背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谦卑精神，是狂妄、无耻的表现。

任何政党都是人的组合，本是由具有相近观点的个体组织起来，以体现不同的阶层或集团利益的政治集团。直言不讳地讲，政党就是利益性的帮派团体。那么政党“党性”从何而来？其实，所谓党性就是一部分人组织起来谋取权力与利益的功能性，除此而外，别无其它，任何政党自造“先进性”都是伪命题。在西方国家，一个政党只表示有那么一群人有着相同的理念，组成一个组织；根本不存在哪个组织比另一个组织优秀的问题。美国哪个政党敢说“我们是这个国家的优秀团体”？在民主制度下没见过哪个党派可以自封为某个阶级甚至是人民群众的领导。你是不是领导、能不能执政，要由选民们投票来决定的。在民主制度下，任何党派、团体与个人，不管你的信仰、财产、教育与反映哪个阶级的诉求，在选民面前都是平

等的。没有领导与被领导之分。预设“领导”（所谓“领导阶级”、“领导党”）并强迫民众服从，这本身就是专制。今天，全球只剩下极少的共产国家，要以“优秀党”自居剥夺其它政党竞选执政的资格，强制公民必须服从其“绝对领导”；如果你持有异议而不衷心拥护，就是反革命。这是现代党权专制主义逻辑。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名义上属于人民实际上属于共党！人民只能服从共党的领导而不能全民票决，简言之即不能民主。同时，中共也在选举方面歧视中国人民，它一直试图教育国人，中国人民素质低下，不可能进行民主选举，只有共党才能搞装模作样的假选举。共党自封的“领导权”充分暴露它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垄断特权，对一切它不满意的异议、异动，包括要求实现宪法明载的公民自由、民主权利，一律实行“专政”、暴力镇压。人民由此沦为奴隶！中共的“领导”与民主是对立的，凡是它坚持“领导”（即控制）的事业，它实行的一党执政，均与民主大相径庭。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中共进一步借助“先进性”与“纯洁性”洗脑，并由此建立起强制民众“被代表”的政治迷信，已经成为阻碍中华民族政治现代化进程的最大障碍。

共党的“先进性”就是流氓的霸道性。“先进性”成了暴力压迫和专制统治的口实。谁占据了“先进性”谁就拥有了统治的合法性，“先进性”被设定是以对“不先进”、对“落后”的役使为出发点的，设定“先进性”是为了欺负那些“落后”的和“不先进”分子，剥夺了其他社会成员的主体性，推翻了社会的平等性，拒斥了社会的正义性。希特勒当年曾以“优等民族”理论要统治世界，给国际社会带来灾难性后果；马列主义以“先进阶级”消灭“落后阶级”的运动，同样给人类造成巨大伤害。一切自我标榜为“先进分子”的人统统都是独夫、匪徒。正如奥巴马竞选总统连任演说时说道：“任何政党都不具有先进性，都只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只要不受制约，他们一定会成为犯罪率最高的人群，会成为人民的敌人。”

中国官场是个实实在在的流氓社会！哪个作反腐报告的不是千万亿万的巨贪？中国的贪腐已天怒人怨。两组数据揭穿了中共“保持先进性”完全是一个骗局。

据法学教授陈忠林的研究，从 1999-2003 年最高检察院与最高法院报告等相关数据可以推算出，中国普通民众犯罪率为 1/400；国家机关人员犯罪率为 2/400。而司法机关人员犯罪率为 6/400。换言之，国家工作人员犯罪率比普通民众的犯罪率高一倍；而惩治犯罪的司法人员的犯罪率则是普通民众的 6 倍。司法腐败表明中国的政治制度已烂到了根子上，无药可救。此外，根据 2005 年的“两高报告”，2004 年：普通民众犯罪率增幅为 9.5%，国家机关人员犯罪率增幅为 17.8%，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因侵犯公民权利而导致犯罪的增幅为 13.3%。可见，中共的国家工作人员与司法人员是最需要防范的犯罪群体，“先进性”不过是自命不凡。剥掉他们的伪装，就会露出一个“性”乱、贪婪、残暴的本质。他们先进在比普通老百姓享受得更多，占有得最多，先进“性”欲满足得最安逸，日子过得好得多！在大跃进饿死了 5 千万民众后，在文革毁灭了一切文化后，在天安门广场的坦克机关枪扫射了学生之后，在数百万婴儿喝了三聚氰胺毒奶之后，除了邪恶性之外，还什么先进性可言？

世界上凡以虚假的先进性名义要真实地永恒领导一切，都是黄粱梦而已。纳粹当年以“优等民族”要消灭“劣等民族”的反人性意识形态来统治世界，曾不可一世，最终被人类社会共同埋葬；苏共统治者以“先进阶级”消灭“没落阶级”的反人性意识形态发动世界革命，70 多年声势浩大，结果共党在全球被清算。人类历史真实性已经对此做出了最客观、最公正、最权威的终局裁决——人性是不可战胜的。今天，全球只剩下几个另类的党性国家，还在以“先进党”自居，而剥夺其他政党存在资格，强制社会所有组织与公民必须服从其“绝对领

导”，又能维持多久？中共只有放弃自我神化的“先进性”，接受普世性，放弃优越感，接受平等性，承认政党在没有委托、没有授权之下只能代表自己，不能强行代表全体民众，才能发生敬畏人民的根本性执政意识转变，中国的民主化变革才能踏上征途。

10. “双规”显示了超级法西斯的黑邦政治

一党专政的独裁政权历来都建立在谎言和欺骗的基础上，独裁者害怕人民了解真相。中共开动一切宣传机器，歪曲、伪造、屏蔽、篡改历史真相，从托儿所幼儿园起便对人民进行洗脑教育。对历史问题如此，对现实问题更是如此。“双规”便是中共欺骗人民的手段之一。中共中纪委和各级纪委利用“双规”这把双刃剑既惩治了贪污腐化，又打击了无辜；既用作内斗工具，又是镇压异己的手段。事实证明，“双规”本身就是贪污腐败的另类温床，用来敲诈勒索、打击报复。双规是中共内部使用的任意拘留、刑讯逼供和非人道的惩罚制度。

在民主国家，都有独立的监督和反贪机构。检察官被授予对涉嫌贪腐官员调查的权力。如丹麦议会设有大法官，专门代表议会监督各部门的官员，大法官由议会选举产生，议会为大法官的活动制定规则；但在大法官行使职权时，议会也不得干涉；大法官的权力大于总理和大臣，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对他们进行有效的监督。芬兰的议会督察员和政府司法总监是国家和政府机构中的最高监督官，一般由著名法学家担任，他们的主要职责是依法监督总统、内阁成员以及政府高官是否遵守法律、是否履行职责。

台湾检察官陈瑞仁是这样调查总统阿扁的。第一次询问是在总统府，从下午4点问到晚上9点，中途没有用晚餐；第二次在官邸，从晚上9点问到隔天凌晨1点半，中间也没有休息。这让人想起当年克林顿总统被独立检察官斯塔尔穷追猛打，在白宫地下室内，向大陪审团提供了近4小时的证词……检察官出于调查需要，可以传讯任何人。如果有人拒绝作证，就有可能以蔑视法庭罪被投入监狱。克林顿总统的几位故旧好友就因为拒绝作证而饱受牢狱之苦。但是，调查完毕，调查对象仍然回归到自己的位置，即总统照做总统，议员照做议员。陈水扁家族的贪腐，在中国大陆不算个啥，他比大陆的一个居委会主任的贪腐都少，却引起了全岛的声讨和政坛的震动……台岛社会的公开透明、民主与法制、司法的独立运作和有效制衡，不但让大陆人民打开了眼界，而且把大陆政权比照得太渺小、太卑劣了。

发达国家的监察、审计部门要么隶属于议会，要么隶属于司法部门，没有隶属于行政部门的，更没有隶属于政党的。中国的监察部门隶属于共党，不能监察书记；中国的审计机构隶属于政府，审计局很难查处首长。所以，中国的监察部门、审计部门最好归属于人大。

在中国，不仅检察官没有权力直接传讯在位高官，而且人只要被纪委“带走”，便很长时间杳无音信，不知下落。湖南郴州市纪委书记曾锦春敛财8000万，他给私营企业发重点保护单位的牌子，40万一个，不买就“双规”；他让法院一周内判一个案子，法院没做到，他就把法院院长、两个副院长、一个庭长4个人“双规”了。什么叫“双规”，简单一点说：党组织及领导如果认为某个党员（及个人）有问题，就对此人宣布在“规定地点”及“规定时间”坦白交待。“规定地点”或是某一饭店、某一住宅，不是公安、安全部门的看守所、监狱。此人被监禁在“规定地点”内，失去人身自由，有专人看管，不准与外界联系。

在当代的文明的法治社会，只有法院才有权经过审判来剥夺一个人的自由，警察机关只能依

法临时地限制人的自由。如警察实施宵禁和拘留。世界上从没有一个政党有权力可以对个人（譬如其党员）剥夺自由，只有中共可以剥夺个人自由，这是典型的黑社会做派。

中共的“双规”是法外法，直接违反了中共自己的宪法。《宪法》第 37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它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河北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原党组书记、董事长梁云才，2005 年 5 月 7 日，在“双规”期间突然死亡……香港的《东方日报》说，仅仅 2003 一年，就有 120 多位官员在被“双规”期间自杀。著名的中国艺术家、异议人士艾未未，就曾质疑自杀现象。2009 年他在博客中写道：“县委书记‘自杀’了。官员在双规期间身亡，当然没有遗嘱，当然不必公开，当然无需验尸，当然不是他杀。‘双规’是非常灰色地带，当然是死的不清不白。”这种超越法律权限的“双规”是对人权的侵犯。

国人非常震惊地发现，自 2012 年 3 月 14 日温家宝公开谈论王立军事件起，致公党党员、大连实德集团的老板徐明先生，突然失踪了，至今下落不明。人们推断：中共把徐明秘捕了。试问：中共是依据哪一条法律来剥夺徐明的自由的。如果一个政党认为必须由它来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的权利，才能有效地解决问题，就表明这政党是黑社会的法西斯政党。

中共国的 82 宪法第 131 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但党政机关和工作人员的刑事案件侦查权、“双规”权全被各级纪委夺走；这既违反“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宪条，又导致许多罪犯和犯罪集团逃避了检察院的立案、侦查、公诉而逍遥法外。

“王子犯法，庶民同罪”，官员既然犯了法，那你就用法律手段解决，偏偏搞什么“双规”遮人耳目！因为“双规”可以免得党内丑闻外扬，可以随时对官员们采取措施，从而保证了上级的权威。生活上放荡淫乱的李岚清当中共十五届政治局常委期间，跟着江泽民干了很多坏事，而且利用职权乱搞男女关系外界反响太大，多次被迫做检查。2001 年江泽民当政期间，山东泉城济南揭发出一起涉及 40 亿人民币的大案，此事轰动全省，惊动了中南海。经查其中至少有 10 亿元被李岚清的儿子吞掉。这贪腐大案死罪，在江的干预和保护下化为乌有。江泽民保护了贪腐书记程维高，程维高却用“双规”、监狱迫害那些举报者。钱其琛之子钱宁从法国卖给台湾的幻影 2000 新型战机的交易中拿到了 10 亿美金的回扣；中纪委秘密“双规”钱其琛父子，最后为了党的“伟光正”，此案不了了之。

因此，中国的改革方向是：撤消纪委，改党内反腐为司法反腐。所有腐败案由检察院负责受理，公安负责侦查，法院负责审判，三者互相监督相互制约。所有腐败案从受理、立案调查到结案统一实行电子化管理，建立首问负责、限时办结和责任追究制度，无论司法办案中牵扯出来的还是媒体披露出来的或是群众举报的腐败案件都要做到件件有落实。

撤消政法委。由中共各级政法委员会领导公安局、检察院、法院，是造成中国普遍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徇私枉法，滥用职权的根本原因。党委书记、政法委书记想保的人，就是犯了罪，检察院也不能立案侦察；法院对重大案件更是依党委书记、政法委书记的决定进行判决。其结果只能是公安机关经常乱抓人、严刑逼供甚至滥杀无辜，法院不能独立审判、枉法裁决非常严重，冤假错案堆积如山。82 宪法规定，司法权由法院和检察院分享，公安工作是行政权的一部分，由政府行使。中共中央关于中共政法委员会的职责规定，等于由中共的各级委员会行使国家司法权和部分行政权。早在 1982 年党的 12 大上就明确承认“党不是权

力组织，也不是行政组织和生产组织”，这就是说党无权对国家机关和人民群众发号施令，很显然，党的政法委无权管理法院。今天是撤消的时候了。

11.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没有自由平等

马克思主义有 2 个特点：“公”和“暴”。“公”指的是马克思虚构的“人性大公无私”，“生产资料公有制”等；“暴”指的是阶级斗争的暴力性，共产党的排他性即伟光正，无产阶级专政的独裁性、世袭性。“公”是马克思主义的目的，“暴”是马克思主义的手段。

马克思主义达到“公”的目的是不择手段的，就必然导致其手段的残暴化。为了达到夺取政权和剥夺私人财产的目的，共党必然要践踏人类一切文明的价值观和伦理底线。列宁斯大林血腥手段就不必说了，遗憾的是至今有人说马克思的手段的非“暴”，是“自由平等”。譬如吴江先生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非常重视自由的。曾经坐过而且正在坐共产党监狱的郑茜午说：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命题，实际上就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把自由看作是未来的理想，他说：“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是马克思论述其自由的一段名言，为许多人反复引证。

殊不知，马克思此言乃否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每个人有获得自由的可能性。他认为，只有消灭了资产阶级后，在“一个联合体”即共产主义社会里，每个人才可以获得自由。可见：马克思所说的自由是未来的自由。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是消灭私有制、搞全面计划经济的社会，在 1944 年就被哈耶克定为《通往奴役之路》。马克思主义恰恰导了奴役。吴江先生说马克思主义的自由思想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事实上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共产社会没有自由平等，只有暴力和奴役，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

其实，马克思极端鄙视自由人权。马克思在凡是涉及到权利或自由的地方，除了嘲讽外，什么都没有，他对人权根本没有概念。如果说马克思早期所说的自由还有反专制的含义的话（譬如马克思说过“没有出版自由，其它一切自由都是泡影”；列宁也说：“人民的自由”，“只有在人民真正能毫无阻碍地结社、集会、创办报刊……的时候，才能得到保障”），那么在 1848 年前后，马克思的自由却是包含了专制的含义，即工人阶级要受我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控制即专制。必须注意：马克思早期的自由思想只是马克思不得志时的一个片段、一种权术，其目的是沽名钓誉而已，不是马克思的根本思想。马克思根本思想是“暴”，即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极为好斗，他经常重复的一句话是：“世上再没有比噬咬敌人更大的快乐了。”马克思内心清楚得很：离开了不受限制的国家暴力，共产主义不过是痴人说梦，甚至连尝试都不可能。《共产党宣言》赤裸裸地宣告：“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马克思以“阶级”、“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等大话来推行思想独裁，扼杀不同的流派。马克思始终以无比蔑视的姿态，迫害那些主张走温和道路的共产主义者如魏特林、克利盖、蒲鲁东等，还彻底打击无政府共产领袖巴枯宁等。马克思嘲笑巴黎公社的失败经验是对敌人太手软了，暗示没有在肉体上杀一大批。恩格斯说：“机关枪、大炮是最有权威的东西。”列宁说：“暴力比 100 次辩论更有效。”毛泽东说“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毛把马列主义归纳为“造反有理”。

可见，暴力专政思想是共产党的根本思想。

许良英指出马克思除早期外，对民主、自由概念一直是嘲笑、批判和否定。虽然在《共产党宣言》中也说了句“以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话，但这不过是进入共产主义天堂后的一种理想。而他一再强调，走向这个天堂的道路，只能是“专政”、“暴力”。恩格斯更说，有国家就没有自由。因此，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暴政不是没有根据的。

马、恩不仅没有建立过共产党，也没有建立过社会民主党。是由李卜克内西与倍倍尔创建了社会民主工党，他们起草的《哥达纲领》，遭到马、恩的批判。恩格斯在给倍倍尔的长信中说：“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之所以需要国家，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马恩全集》19卷7页）。列宁的《国家和革命》就是以此为经典发挥而成的。而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中把要求普选权、人民机制等称之为“陈旧的、人所共知的民主主义的废话”，并反对宗教信仰自由，认为党必须“把信仰从宗教的妖术中解放出来”。文中那段共产革命的名言是：“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的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许良英指出：“直到1875年，马、恩依旧在大力宣传共产主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8年后，马克思就去世了；去世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曾改变这些基本概念。”针对21世纪初叶流行的所谓“马恩晚年放弃暴力革命”的观点，许良英指出：“由于社会民主党在议会选举中的胜利，恩格斯对它刮目相看，在他去世前5个月的1895年3月，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序言中说，可以‘利用选举权夺取我们能夺得的一切阵地’。李卜克内西就此撰文，宣布可以放弃暴力革命。可是立即遭到恩格斯的批评。他于1895年4月3日给法国拉法格的信中说，‘李卜克内西看到的只是黑和白，色调的差别对他来说是不存在的。’意思是说，议会斗争与暴力革命不是黑白不兼容的。由此可见，恩格斯从未放弃暴力革命思想。”

12. 共党是典型的金字塔形的等级官僚制

苏共是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出来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开幕的1903年7月30日为苏共的建党日。1900年，列宁主张把党的领导权集中到“十余个聪明人”（即“先进”的职业革命家）手中。阿奇莫夫批判道：列宁的党既不是农民的，也不是无产阶级的，列宁的党只代表他自己，这样的党将会缺少社会基础；其结论是：一个缺乏社会基础的党要想有机会掌权，只能实行恐怖统治。1904年列宁主张：党应当是工人阶级的先进的部队，党应当按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各个组织服从中央；中央委员会有广泛的不受限制的权力，可以散解下级委员会或剥夺某个党员的权力等。

普列汉诺夫抨击道：“这简直是紧紧套在我们党的脖子上的绞索，这是波拿巴主义”；“他们显然把无产阶级专政和对无产阶级的专政混为一谈了。”1904年6月25日火星报登载老革命家查苏利奇的话说：“对列宁来说，党就是他的‘计划’，是他实现计划的意志。这是路易十四的思想，即朕即国家朕即党，列宁就是党。”

马尔托夫说列宁拟定的是“过分的集中制原则”，规定严格的党纪就是“农奴制”，会把党变成“凶恶可怕的工厂”。阿克雪里罗得称列宁的原则为“专制的官僚主义的组党方式”。对此，

列宁回答说：“我们党不仅是一个等级制的革命者组织，而且还是等级制的工人群众组织（列宁全集俄文版第3版第6卷第147页）。当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罗莎·卢森堡对列宁的“集中制”提出批评，斥其为“极端的集中主义”，“企图用官僚制使年轻的工人运动处于知识精英的役使之下”后，列宁在1905年将“集中制”更改为“民主的集中制”。

但换汤不换药，汤里只有集中没有民主。列宁说：“集中制要求中央和党的最遥远、最偏僻的部分之间没有任何障碍”，“中央有直接掌握每一个党员的绝对权力”。中央如何掌握基层的每一个党员呢？它靠的是分层的军事化管理，于是党中央成为统帅部，下设各级党委和支部，建立金字塔型的组织系统，服从领导被上升为“党性”，否定党的纪律则被认定为“否定党性”，可以党纪处分并开除。这种集中制是一种带有强制性的组织管理，其形式正如马克思·韦伯所指出的那样，是具有一种金字塔形的等级官僚制。

在民主集中制下，党的书记取代了党委、领袖取代了全党，坚持党的领导变成了坚持少数高级党员甚至党的领袖一个人的领导。1920年列宁写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他认为，民主集中制的关键是“中央服从领袖”。领袖站在金字塔尖顶上，以伟大领袖为核心，围绕着核心向外辐射，一层又一层实行科层制领导。

在共党的极权统治下，人民从未当家作主，行使国家权力意志的是党魁而非人民。共产党为国家唯一的政党；党魁集治权、军权于一身。由于服从领袖、突出领袖，社会主义各国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个人崇拜，最突出的是斯大林和毛泽东。1956年，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并开启了改革，这却被毛泽东斥为“现代修正主义”。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竟公开说：“相信毛主席要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到盲从的程度”。林彪精炼地以四个字来概括民主集中制：“服从-纪律”。东南西北中，服从毛泽东，结果是领袖一人犯错就导致全国犯错。无条件服从领袖，是假定领袖天生正确，不会犯错；领袖指挥着党，党又是战斗化的“部队”，“部队”各级“指挥员”更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共党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是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这还罢了，第三条却是“全党服从中央”，这问题就大了，只要有人在一届中央中占定了位置，以后的人事安排和政策路线，就都由他说了算，因为是“全党服从中央”，这样就形成了下一届党委的人选，都是由上届的领导指定的，这包括下一届大会的代表、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都是由上一届总书记决定。甚至不可思议的是，就连下一届委员会要干什么和怎么干，也要由上届的委员会事前决定，比如说，十八大的政治报告是十七届的总书记做了，十八大要贯彻什么精神，也是由十七大的总书记决定。这同父传子的“家天下”如出一辙，却不仅仅是党天下而已，因为它已经变成共党内的独裁者控制的组织了。

根据著名的“二八定律”，一个政权的存在不一定取决于多数人民的拥护，只要统治者获得有组织的、掌握制裁手段的少数骨干成员的拥戴即可。具体讲，统治者只要控制了全国公众的20%（即这20%的人听从他的指挥），剩下的80%公众就自动被控制住了。因为80%的无组织的、无反制手段的人，害怕20%有组织的、有制裁手段的人。对这20%的骨干份子也并不需要全部控制住，只要控制住了骨干份子中的20%—— $20\% \times 20\%$ ——即4%的中坚份子，剩下的16%的骨干份子同样自动被控制住了，道理同上。以此类推，对这4%的中坚份子也并不需要全部控制住。只要牢牢控制住了中坚份子中的20%—— $4\% \times 20\%$ ——即时0.8%的铁杆份子，剩下的3.2%的中坚份子也同样自动被控制住了，道理亦同上。

若用符号“→”表示控制，则有如下关系

领袖集团→0.8%→3.2%→16%→80%

（核心人物）铁杆份子中坚份子骨干份子普通公众

中共正是自觉不自觉地运用这一定律来统治全国人民的。在全国 13 亿人口中，只要控制了其中的 20%(20%×13 亿)，即 2.6 亿大多数青壮年公民，剩下的 10.4 亿老人、小孩、没有文化的家庭妇女，就自动被控制了。2.6 亿青壮年男女公民中，只要控制了其中的 20% (20%×2.6 亿)，即 0.52 亿党员，剩下的 2.08 亿非党青壮年公民就自动被控制住了。0.52 亿党员中，只要控制了其中的 20% (20%×0.52 亿)，即 0.104 亿党员领导干部和军队警察，剩下的 0.416 亿普通党员就自动被控制住了。依此类推。事实上，中共掌握地方实权的乡级以上干部约 400 万人，军队、武警、公安合计 600 万人，总合刚好 1000 万左右。

中共核心集团→1000 万党政军警人员→5000 万党员→2.5 亿青壮年→13 亿公民。共党实际上控制了国家一切活动；党员资格是担任高级公务员和高级官僚的先决条件；党的地方领导为地方政府中的权势人物。少数控制共产党，也就是少数人控制整个中国。

共党政制的核心“民主集中制”，就是一个欺骗性制度。列宁最初提出的是“集权制”，并明确说党组织要象战斗“部队”，根本没有“民主”二字。只是因为党内马尔托夫等人的质疑，列宁才加上了“民主的”定语，不过是修饰一下。强调军事化“服从一纪律”的“民主集权制”，在“地下党”时代行用情有可原，但执政后推向全国就产生了“国家官僚制”。又民主又集权，自相矛盾本身就说不过，但却被吹嘘为超越资产阶级民主的“最大”、“最好”的民主，实际上是打着民主的旗号行集权专制之实。推行“民主集中制”的共党都是反民主反人类的黑帮魔鬼集团，苏共垮台后在苏联东欧都重新推行议会民主制。中共不但至今仍死抱苏联“地下党”时代的组织原则不放，还把“民主集中制”写进党章和宪法，“地下党”的“民主集中制”还成了“人大”、“政协”这样公开的民意机关的组织原则，而且 8 个假党——所谓的“民主党派”，也如此照搬，这十分荒唐可笑！其实，“民主集中制”就是要求方方面面的层层服从，是把整个国家建成等级森严听从命令的大部队，体现的是典型的“国家官僚制”，是一个早已过时了的僵化落后制度，其本身就是该灭亡、被淘汰的对象。

13. 中国政改的三个错误认识

应克复说，第一个错误认识：决不搞西方那一套。此话为邓小平多次强调，为后邓领导人一再重复。吴邦国在 2011 年的人大会议上提出了五个不搞：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吴的“五不搞”言论受到国内外舆论的一片谴责。“决不搞西方那一套”，乃是不搞政改、不搞民主的遁词而已。

辛亥革命前后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人开始的时候向西方国家学习，结束帝制，开创共和。这是民主主义之新路。无论是北洋政府和民国政府，都没有断送这条西方化的道路。不久，十月反革命之风吹到中国，一部分中国人向俄国人学习，走了另外一条路——俄化之路，即反西方化的道路。结果返回到了专制复辟的老路。起点是 1920 年中共成立。中共的旗帜是

俄化，赤化，共产化，左倾化。中共夺取大陆政权之后，将这条祸国殃民之路推向全国。对这一点开始有所认识大约是“文革”之后的事了。经过一番痛苦的挫折，许多中国人有了觉悟，认识到不能继续走中共所误导之路，应当皈依西方自由民主之路，皈依人类普世之路。中国人的这个觉悟，共产党是无法改变的。中共编织的谎言与欺骗早已被事实所粉碎。摆在中共面前的，不如及早幡然悔悟，与人民一起，走人类普世之正道。

邓小平是说过“不搞三权分立”。但是，三权分立只是一种政治模式，是现象而不是本质。透过现象抓本质，三权分立背后的东西我们不能不要，必须得要。什么东西？三权分立的背后是制衡。分权的目的在于制衡。我们知道，权力过度集中一定会成为祸害，要防止权力祸害社会公众，防止滥用权力的罪恶发生，就一定要对权力加以必要的制衡。这种制衡是两方面：一个是不同功能之间的权力相互之间的制衡关系，所以决策立法、执行与司法分开。这种制衡都需要，没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之分。其实权力制衡原理在社会生活方方面面都在用，为什么？因为它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规律，无关乎主义。最简单的例子是体育比赛。大家都知道定比赛规则的人不能当裁判员，当裁判员的人不能去踢球，踢球的人不能自己制定规则，体育比赛中有没有分权制衡的问题？肯定有。

又比如，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有些人认为那是正宗的社会主义），一个单位里报销钱，得到领导那儿签字，拿到了签字才能到会计那里报销。会计一看签字了，审下来没有问题后给你做账，出纳才会给你钱。签字是一个人，也就是决策者；下面是审核的、监督的一个人，会计者；执行的是一个人，给你钱的人。这是不是三权？是不是分立的？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哪个单位没有这样的工作部门？

再比如前几年我到成都做农村民主的电视节目，讲到村民委员会办事时，村民要进行民主监督，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村委会主任拿着公款买东西报销，报销时村民监督小组监督他，这已经是分权制衡了。但是，在监督小组内部互相之间还制衡，农民们把村民理财小组的公章分成五瓣，每个人拿 1/5 的章，五个人意见一致，把五瓣章用橡皮筋捆起来，这个章才能盖成圆章，钱才能报回来。如果有一人提出这个钱不合理，就甭想报帐。所以制衡原理在社会生活中方方面面都在用，不在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在学理上探讨规律性现象，形成学理分析和论述最先是自由主义学者们提出的，但不等于这个东西就是自由主义专有，实际上是社会生活中的规律现象人们发现了、认识了。

第二个错误认识：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实现“党政分开”。“党政分开”问题自 80 年代以来为官方与学界经久热议。实际上，“党政分开”是个伪命题。什么是执政党？谁都明白：是拥有政府权力的政党。现在要求这个党与政府分开，井水不犯河水，还像个执政党吗？所以，解决现行政治体制弊端的出路，不是实行“党政分开”，而是要改变一个党永久地垄断国家权力的状况。可以比照一下境外，在民主制下，那个在大选中获胜的政党获得了上台执政的资格，这个党便组织政府，操控行政大权，也可以认为是“党政不分”了，为什么人们没有抨击其“党政不分”呢？原因恐怕在于：第一，它是经过大选，获得选民们认可而合法上台执政的——执政具有合法性；第二，它的执政年限是有限的，在下一轮大选中是否继续执政，有待选民们的裁决——执政具有暂时性；第三，它所拥有的权力仅仅是行政权力，并且受到立法权与司法权的制约与监督——执权具有有限性。执政党在这“三性”的制约下，不可能拥有“绝对”、“无限”的权力；可想而知，不论什么政党上台执政一般不可能罔顾法律、滥用职权、无视民意、践踏人权。在这种政治体制下为官一般比较尽职、守法、廉洁，夹着尾巴做人。而中共的大小官员，一旦有权便迫不及待地以权谋私。

在“党政分开”这个伪命题上喋喋不休是浪费时间。解体、剧变前的苏俄及东欧诸国，其党政模式与现实中国践行的党政模式是同宗同类的。随着民主化的转轨，这些国家解脱了陈旧的党政模式，以往这一模式下的种种弊端也随之消散。我们从中得到启示的是，在维持现行政党体制下，企图消除这一体制所衍生的各种弊端，一切努力都将徒劳。当然，公务员分为方向性的政务官公务员和中立性的技术官公务员，前者随执政党变化而变化，后者与党派变化无关，依法终身工作直到退休。从公务员制度改革来说，“党政分开”还是有意义的。

第三个错误认识：以党内民主带动国家民主。90年代以来逐渐流行“党内民主可以推动国家民主”一说，而且颇为许多人追捧。胡锦涛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也声言，“发展党内民主是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这种设想是一种空想。

中共的组织原则是“集中制”（堂而皇之的称谓是“民主集中制”），其权力运作规则是“服从”。所以，这一制度的本质是“服从”，是“集中”，是“服从”“集中”。民主呢，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就是民主在中共党内的命运。所以，中共80多年的历史中都不可能正常的党内民主（中共执政后更甚）。中共党内要实行民主，首先要废止“集中制”而推广“民主制”。对中共来说，有这种可能性吗？实行党内民主，党员应享有民主自由的权利，他们对于党的决策、指令与党务工作，可以自由发表意见，他们可以监督与批评党的领导人乃至党中央的领袖。这意味着在党内允许存在不同的意见派别。这就与中共历来所强调的“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训律相抵牾了，还要不要中央的权威？

实行党内民主，党的代表大会应当是党内最高的权力机构，只有代表大会有权制定和修改党的章程，只有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有权选举（和罢免）中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以及中央军事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总书记与中央书记处，并有权审议、批准中央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中央办公厅等部门的负责人。与此同时，地方各级党的领导人，也应由地方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而不是由中央直接指派和任命。以往，党的代表大会名义上是党内最高权力机构，实际上徒有虚名。党的重大决策及重要人事安排都是由党中央少数乃至个别核心人物在代表大会之前作了安排，代表大会只是将之“走过场”，使之合法化，并无实权。要使代表大会成为名副其实的最高权力机构，比如，由它来直选（还不像国民党那样由党员来直选党的主席）党的总书记，行得通吗？

总之，实行党内民主，共产党就得废弃原来那套体制、机制，就得脱胎换骨，进行一番大换血；也意味着放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还有邓小平理论）作为指导思想，这还算是共产党吗？现在中共当朝者有这个胆识吗？中共当朝者的历史使命是保党、保天下、保特权，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要在党内民主上推出真切的举措。

再说，党与国家是两个不同的组织实体。党内民主与国家民主，其内涵与外延各不相同、两者在民主机制和运作上没有内在的逻辑关联。比如，国家民主的底线是政府民选，以体现主权在民。而政府民选的前提条件是要有多党制（不是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有了多党（至少是两党）推举的候选人，选民们才可以从中选举认为合适的人选。一党制下也可以搞选举，但候选人只能由该党推举，选民因此无从选择。在选举的起点上就扼杀了选举。一党包办下的选举，选来选去，结果都是这个党的人。这种选举过程和选举的结果，都体现主权在党而非主权在民。即使党内民主有某些进步，如果国家政治体制仍是“一党专政”，那么，国家权力仍只能在老轨道上运行；政府仍为一党所控制的政府，人民代表大会依然是贯彻一

党旨意的立法机构，民主党派依然是“老子党”领导下的“儿子党”。枪杆子呢，更是党的命根子了。总之，一切照旧。台湾当年如果只搞党内民主，台湾就不会有多党民主了！

当然，党内民主当然有它的意义。党内生活的民主化，自由化，多多少少无疑有利于党所作出的决策更切合实际些，减少主观性、自利性和近效性。党内民主搞好了，可以遏制党的腐化堕落，在管理国家事务中可以少犯错误，其治下的民众可以少受不幸。

明智的领导者应明察大势，顺应民心，以国家的前途和人民的福祉为重，放弃一党之私利，废弃党禁，创立多党竞争的新局面，才是唯一的出路。

应克复先生忽视了：全世界共产党政权没有一例是由于其自身政治改良，而成为自由宪政民主国家的，到今天为止，没有一例。原盗国窃政的共产党全部要么烟消云散，要么改名换姓，要么寿终正寝。共党党国体制不可能进行实质性改良，因为它是一种反人性、反自然、反人类的极度虚伪、极端野蛮残暴的极权暴政，因而必须彻底抛弃终结之。

14. 人民为大反党无罪

人民最大，党的人民性由自由公正的大选来检验

人民为大。胡绩伟（1916-2012）问：“究竟是党伟大还是人民伟大？”答：“人民伟大”。理由是：党会犯错误，人民不会犯错误，所以，党没有人民伟大。1979年3月，胡绩伟强调：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胡绩伟认为：没有人民性就没有党性，应当从加强人民性来加强党性；党性和人民性是统一的，在不能统一时，人民性高于党性。主持报纸的人，应牢记人民性高于党性，不应当仅仅服从党性，而要把人民性放在第一位；当党与人民发生冲突时，应毫不犹豫地站在人民一边，使党性服从人民性，坚持人民至高无上，做到“人民为大”。

人民高于党，党服从人民，人民最大；这是当今人类的基本常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所以，人民高于党，人民性高于党性，不存在与人民性处于同等或更高地位的党性。没有脱离人民性的党性，即：不存在独立于人民性的党性。人民性高于党性，就只能是党性服从人民性，党服从人民，绝不能本末倒置，而让人民（性）服从于党（性）。无论什么党性都必须服从人民性；背离人民性即违背人民利益的党性是反动的、腐朽没落的，必须坚决反对。

党性是否正确，是否结党营私，只有用人民性来检验，人民性是检验党性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检验党是否具有人民性的科学的标准是自由的公民投票。党的人民性，在于是否得到多数人民的拥护；得到了多数选民的支持，才具有人民性！只有获得了人民多数票的党才能暂时称为“代表了人民的党”；执政党一旦丧失人民性即人民的选票必须下台！

那些没有经过人民自由投票或未获得人民多数票的党不能自称“代表了人民”，否则就是强奸民意。中共就是这样一个一直强奸民意的流氓党，其流氓性来源于中共的老子——苏共。在汉语世界，中国大陆是唯一的独裁国家。台湾是自由政体；香港、澳门和新加坡都属部分自由的政体（自由之家 2012）。

人民是至上的，人民主权是至上的，人民是国家最高权力的主体。政党必须服从人民，而不是人民服从党。一个真正走向现代化的国家，不是政党管住人民，不许人民乱说乱动；而是人民管住政党，不让政党胡作非为。政党必须诚心诚意地匍匐人民脚下，人民才能自由公正地选出称心如意的执政党。在公民社会里，公民是主人，执政党只不过是公民挑选出来的“管家”和为社会服务的“公仆”罢了。主人对管家或仆人满意，就让你留任，不满意就打发你走路，这是天经地义。只有人民的自由选择，才能决定某党是否可以合法地获得执政地位。由谁来领导？领导人民干什么？怎样领导？都由人民来决定！至于领导的好坏？是否继续领导下去？由人民的选票来裁定！也就是说：党执政的合法性在于是否得到多数人民的拥护；得到了多数选民的支持，才有执政合法性！“得民心者才能上台执政”。政党上台，只能依靠人民的选票，不能依靠坦克机枪上台。也就是说，共党是否执政或者继续执政必须服从人民的自由票决；1918年共党老祖列宁就用机枪扼杀了人民投票产生的议会。放眼世界，每一次执政党的更替，无不与民心向背息息相关。一切高于人民的政党组织都是违法的，必然灭亡！上世纪末，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支持，苏共和东欧共产党的垮台了。

没有任何一个民主性的政党在宪法中写入要坚持该党的领导的，没有哪一个党的执政地位是永恒的，一切皆取决于人民的选择。杰弗逊说：民主政治的一个基本特征是不能“根据一次投票的结果就心安理得地拜倒在一个人的脚下。”人民可以选你，也可以不选你；以前拥护你的，以后也可能不拥护你，拥护不拥护全在于人民群众的自愿。人民选你，你就执政；人民不选你，你就下台；若还以所谓的宪法序言来坚持“党的领导”赖着不下台，就是窃国篡权！中共 82 宪法通过后，法学界就宪法序言有无法律效力问题，发生一场争论。主张有法律效力的理由是，序言应与正文同样有法律效力，序言是由非法律规范性的文字写出的。反方驳斥说：有人说你犯法了，你会反问我犯了哪一条，如果说你犯了宪法序言了，这是很可笑的。张友渔辩解时说至少宪法序言的最后一段应有法律效力。最后一段文字是：“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张的辩解更说明宪法序言没有法律效力。因为这段话内容又写入宪法第五条，这段话有必要写入宪法正文正说明宪法序言没有法律效力。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所以，不能以党的利益、国家的利益来取代人民的利益。茅于軾说：“国家的利益要服从人民的利益，绝不可叫人民为空洞的国家利益去牺牲，否则就会上当，上希特勒或东条英机的当。”人民最大，人民为重，国家为轻，政党更轻。假如连这个最基本的顺序都弄颠倒了，还侈谈什么“建设现代化国家”！

共党霸道地认为党性高于人性，高于人民性，处于社会“领导”地位，注定了群众要“被代表”。那些所谓的“保先教育”，其宗旨就是向其党徒灌输永远垄断政权的霸权意识。这种文化中一再神话党是先进的，污蔑群众是落后的，“先进性”的党注定要带领群众前进。共党之所以打击异见分子和知识分子，就是源于自封的这种“先进性”或“正确性”。事实上，共产党的党性，就是要求党员必须把党的利益、党的权力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也就是说，党的利益永远高于一切；而党的利益实质上又是党的领袖、党的干部和政府官员的私人利益，最终表现为党棍的兽欲压倒一切。孟子讲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现代中国变成了“党为贵、社稷次之、民为轻”。即：党最大，国家为轻，人民更轻。

蒋经国指出：世上没有永久的执政党，企图永久执政是反人类的！任何国家都不可能万岁，政党更别指望万岁，只有世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劳作的人民才是真正的万岁！世上不会有永远站在时代前列的政党，更没有永世不可动摇的执政党。即使这个党的创始人真的具有纯正的理想和高尚的情怀，随着环境和地位的改变，对权力的迷恋和对财富的贪婪，同样会使这个党蜕变得齷齪不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中共北京市委平反被毛泽东定性为“反革命事件”的1976年天安门群众运动，人民日报写了一篇社论《人民万岁！》胡乔木大发雷霆，指责胡绩伟“企图建立一个民主党来改造共产党”！

胡绩伟当时提出的“人民性高于党性”的思想是多党竞选的理论基础，在邓小平看来，胡绩伟的观点动摇了中共的领导。如果人民比党伟大，就能够决定中共的领导地位和对错，那么中国就不能一直坚持中共的领导，而必须采取竞选执政了。1981年，时任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批判了胡绩伟的观点。胡乔木的“党性”就是指服从党的领导替党说话，维护领袖的权威；人民性就是替人民说话，就是民主，而民主了，党还怎么领导？胡乔木的“党性高于人民性”的歪理邪说为64大屠杀壮了胆。可见，胡乔木追求是党领导下的“民主”即一党专制，而胡绩伟追求是人民自由地选择“领导党”！胡绩伟遭到批判后，人民日报社长的职务也被撤了。但他的人民性高于党性理论却深入人心，特别是深得新闻工作者心。在被中共说成是1989年那场“动乱”期间，人民日报的记者在游行中打出了“别逼我们造谣”的横幅标语。六四事件后，胡绩伟被撤销一切职务。

胡乔木说，如果党不高于国家，怎么保证党的领导？关于这一点如果从思想上去理解，则是正确的。就是说，党要领导得正确，应当比国家、比一般国人站得更高一些，看得更正确一些。但这还是“应当”，而非事实上已经做到了的。事实上是否正确，则有待于实践的验证。如果把“应当”更换为“总是”，那么就会产生优越感，思想上就会产生盲目性，从而导致瞎指挥，强迫命令，家长制。政党即 Party（社交聚会），是由 Part（部份）转化来的，是在一起开会的一群人而已。一个政党无论多么庞大，在全体国民中毕竟是一小部分即，党的领导集团更是一小撮。用极少数人制定的准则去规范人民的思维，经验证明只能导向荒谬。大跃进时期，毛泽东要求党报放卫星、报道“万斤粮”、“十万斤粮”的消息，结果大饥荒饿死数千万人。党总说它在前头指导着我们，然而事实上它是在用那过于臃肿的身躯遮挡着人们探寻真理的视线；党总认为它才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然而不幸的是，这台火车头已动力不足而且方向错误，在更多的时候是靠人民推动着才往前走。政党的心术是浅陋的，人民的理性是健全的；政党的认识难免有局限性，它可能与客观实际、与全体人民的意志不完全一致。习近平胡说八道：“没有脱离人民性的党性，也没有脱离党性的人民性。”有时候真理不在共产党一边，而在党外人士一边。譬如：人口问题的真理就在马寅初一边，黄河三门峡建坝问题的真理就在黄万里一边，如此等等。切勿陷入“权力真理”论的误区，以为有权就有真理，权力越大拥有的真理就越多，享有最高权力就拥有一切真理了。迷信政党就跟崇拜皇帝一样，都是臣民意识而非公民觉悟。把全部希望寄托于“好皇帝”出现，是古代人的局限；将所有权力交付到“好人党”手上，是现代人的愚昧。为了防止执政党的错误意见祸国殃民，党的领导决策、措施应当通过法定的民主的程序来加以实现。

只有那些结党营私搞阴谋诡计的流氓集团，才把党性置于于人民性同等地位甚至凌驾于人民性之上，比如原德国的纳粹党，本质上就是以党性取代人民性，进行虚假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宣传，把德国和世界引向战争灾难。中共也是这样的法西斯。“三个代表”认为党性就是人民性，党始终代表人民的利益，这是新世纪的谎言，这就把党性和人民性等同了。这样一来，党干任何尚天害理的事情（如64屠杀）都是代表人民的意愿的，人民就成了共党的

奴隶，公民合法权屡遭共党践踏。在如此强调“先进性”共党集团垄断的中国，就不可能承认世界上存在的“人人平等”的普世价值，就不可能承认人性相通使得不同的人群能够共享一样的自由。否则，他们的“先进性”何以自圆其说？由此可见，所谓“三个代表”的“先进性”鼓噪，从根本上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性。因此中共在文化上维持“先进性”的努力，注定是要颠覆人类社会的平等性而逆人类历史潮流而动的。透过中共的作为，可以认清中共的本质：中共是一个推行言论禁锢的独裁统治的政治暴力集团，是一个不敢多党公平竞争、接受公民选择的黑社会暴力集团。国家一旦被这血腥的暴力集团所掌控，社会就倒退到人吃人的野蛮时代，人民就会有无穷无尽的苦难。前三十年前搞公有化饿死5千万人，罪恶巨大，后三十年搞经济大掠夺毁我中华江山，断我中华血脉，罪恶同样巨大。

党要与人民保持一致，而不是人民与党保持一致

那时，人民日报副总编王若水（1926-2002）也在宣传“人民性高于党性”。他认为：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民主集中制的实质就是服从，在实际生活中就是全党全国服从一人，即党国的领袖。“民主集中制”最大的弊端就是权力“过份集中”，导致领袖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的独裁的局面，导致了大跃进、文革、64等灾难。因此，必须以中央必须服从全党（党代会）来制衡中央的权力。他主张：中央服从党代会，党代会服从全民公决。改革措施是：必须废除“全党服从中央”，而将其名正言顺地颠倒为“中央服从全党”。可见：“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是一个多么错误、荒谬的口号。它完全颠倒了中央与全党的关系，是共党不能实现党内“民主”的根本原因。

中共要求全国人民“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更是蛮横无理，强人所难，这等于否定了“人民为大”的“人民主权原则”。中共82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即：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所有的党派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或工具！公仆服从主人是普世公理；所以，党应服从人民，而不是相反。党要忠于人民，而不是人民忠于党；党要接受人民的监督，而不是人民受党的监督；党要与人民保持一致，而不是人民与党保持一致。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是平等的，永远不要企图用暴力手段或所谓的宪法手段，让别人臣服在自己的领导之下，否则就是邪恶。只有邪教才控制人的精神，让人连思想的自由都没有。

曹思源说：要求全国人民“政治上、思想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是反动的，这完全颠倒了主仆关系！我雇一个佣人，难道我天天要与佣人保持一致吗？哪有主人服从仆人、与仆人保持一致的道理？可在文革中，有一句响彻云霄的口号：“一切学习毛主席，一切服从毛主席，一切紧跟毛主席”，最后是“一切为了毛主席”。“一切为了毛主席”就颠倒了主仆关系。毛主席应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如果亿万人民一切都为了毛，毛主席不就成了主人了吗？人民反倒成了仆人了？这样一条颠倒主仆关系的反动口号在中国居然流行十多年之久！李洪林指出：“不是人民应该忠于领袖，而是领袖应该忠于人民。”当领导者要求被领导者效忠，国家就已不再是共和；当国民效忠领袖，就失去了自由表达的权力！一个要人民效忠的领袖，绝对不是为人民服务的领袖！他已经成了人民的奴隶主。毛就是这样的奴隶主！

请注意：民主社会要求执政党跟大多数公民保持一致，而不是公民与执政党保持一致。不是人民必须同执政党和政府保持一致，而是执政党和政府必须同主流民意保持一致。否则，执政党就得下台！民主意味着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高于一切，政府必须民选，总统必须人民授权。在民主时代，政党有权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却无权把自己的主张强加给全体公民。

所以，党不能掌管教育文化研究舆论等精神活动领域，因此，必须取消文教领域里一切党派组织！人民享有充分的结社、集会和游行示威的自由，监督政府和执政党。例如美国人民监督政府，是通过出版自由来体现各界群众的意的。民主制度只能使国家的开销大大降低，许多庞大的开支都可以省，例如虚假宣传的宣传部，毫无作用的文化部，党办的各种说谎报纸，网络警察，共产党层层机构，各种面子工程……都不用搞了，这么多巨大的开支都可以转用在教育、医疗、交通以及其他百姓的福利上。美国没有官方通讯社、官方报纸，除了一个对外广播的“美国之音”是官办，没有对国内宣传教化的官办电台和电视台，在州和地方也是如此。两大政党没有自己的机关报和电台、电视台。没有控制舆论、审查书报的机关和制度。舆论导向不是在官方，而是在民间，不是官导民，而是民导官。总统、国务卿放下身段向民间问计，了解老百姓的意见和要求，调整施政方向，改善政府的工作。

习近平应该知道，文明国家是通过独立的调查公司来统合社会“意识形态”的，公民希望国家有怎样的发展、对执政党与政府有怎样的意见，或对领导人的满意度等等，均可以通过科学调查的方式，使意识形态成为公开数据，以此来制定决策，调整施政方针。执政党要遵从、顺应公民社会的意识形态，而不是公民被灌输或纳入到某党的意识形态中。一旦将某党的意识形态当成真理，必然会将真正的代表社会主流民意的意识形态当成异己的思想加以排斥、打击，以维护党贵集团的利益。在信息越来越多元化、自由化的今天，试图用马列意识形态来维护稳定，保持思想统一，只会是刻舟求剑、自欺欺人。

反党无罪废除专制

自由主义主张在中国实行自由的选举制度，最根本的目的不是要推翻共党，也不是要由自己来坐龙庭，而是要把权利还给人民，把共党是否继续执政的选择权交还给人民，由人民用手中的选票来决定。中共既然自信永远伟大光荣正确，以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自居，为什么要畏惧人民的选举权呢？只要共党真正为人民所信任，仍然可以通过公正选举继续执政。如果只是嘴巴上讲得美，行动上却伤害了人民利益，因此而被人民选下去了，这也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宪法精神得到尊重和体现，与自由主义推翻不推翻没有因果关系。

所以，必须取消非暴力性质的“颠覆国家政权罪”即反对共党罪！茅于軾指出：“以颠覆国家的罪给百姓判刑也是值得怀疑的。国家是不可能被颠覆的，只有政府里的执政者可能被颠覆。如果这个国家的执政者给百姓制造灾难，为什么就不能颠覆？我们都说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是符合正义的。这说明政府是可以反的，只有人民是不能反的，”事实上：多数人民制定的法律也是可以反的，如“违宪审查”就是挑剔、裁决多数人民通过的法律。常识告诉我们，政府不是国家，反对任何一届政府都不是反对国家；恰恰相反，反对非法政府或合法政府的非法政策，是每个公民义不容辞的责任。理所当然的，中国政府也不是中国；反对中共政府这个非民选的非法政府更不是反对中国，反而是爱国主义的表现。

各国宪政史表示，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于合法公平的选举。而公平的选举只有在所有不同政见都有公开竞争机会的前提下才能实现。必须确认：反对任何政党都是无罪的！这样，各个政党间公开竞选才有可能，民主政治才有可能！政治反对现象是由于人与人、团体与团体之间在利益、观念、文化等方面的差异造成。有差异必然带来不同的意见，赞成与反对也由此而生。反对是社会生活中非常普遍、非常正常的现象。所以说，是否承认公民的反对权是民主政治与专制政治的一个根本区别。反对是民主的关键，正是反对的自由导致了不同的施

政方案的涌现、导致了党派政策的不同，提供了政治市场中的显示机制；从而为人民自由选择能代表民意的指执政党奠定了基础。民主社会里，怀疑党、反党与“结党”都是每个公民的天赋人权，没有哪个党不许他人怀疑和反对的。你的政策主张合人的意，人家就赞成；你的政策主张不合人的意，人家就反对。只要不采取暴力或犯罪的形式，任何和平的、公开的对任何政党的反对都是人民的天赋权利，是无罪的。

应克复指出：反党有罪还是无罪，是专制国家与民主国家的一大区别。民主国家，反党无罪！在民主国家，公民有组织不同党派自由，反对党是合法的，这是现代民主的精华所在。用胡适的话说，是“近代民主政治制度的生死关键”。在美国，民主党反对共和党，共和党反对民主党，是受法律保护的，你怎么反也是没有罪的，200 多年来，也没听说有什么颠覆罪！在台湾，国民党反民进党、民进党反国民党，都是天经地义的。现代政治的精髓就是不同见解的争辩，要争辩就必须有对立的另一方。政党无权要求公民对它无条件地支持，除非它是黑社会。惟有共党国家有“反党”、“分裂党”的罪名，可见，共党就是极端专制的黑社会。徐四民先生说：大陆中国国内多年来有一个“反党罪”的概念，这在海外是不容易理解的。黑社会定出的罪名，本来就是反人类的行为，人类岂能赞同这种莫须有的罪名。所以，不许反党就是反人类，就是人类公敌！不能反对的政党是因为它垄断了政权，成了赤裸裸的暴力集团；不许反党只能证明：人民生活在地狱，官方搞的是是一党专政的极权主义。一个政党若是独揽一切权力，只跟自己对话，不许他人异议，这个政党就是一党专政的霸权主义的，也就是专制极权主义的党。专制国家，反党有罪，而且是大罪重罪。不准反共，连对共产党说一点批评，提一点建议，也要定你一个“右派”的罪名；而且，其获罪人数几百万之巨，为一切专制政权所望尘莫及。多少仗义执言而被当做反革命、反党、反社会主义遭受牢狱之灾甚至付出生命代价。在一党专制的极权社会，人只有服从党的义务而已。在无坚不摧的党权面前，人变成了一种没有尊严没有人格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

拒绝反对，就是把自己视为“伟光正”或真理化身，属于“理性的自负”。北京大学的闵维方书记所谓“老师不能散布错误言论”之说，显然是基于当权者的优越感，容不得老师批判当权者的错误。柏杨说过：“掌握权柄的人认为：只要没有人指出他的错误，他就永远没有错误。”在中国社会，当权者永远不会错。谁在台上，谁就代表了正确。一个自认为“一贯正确”不允许批评的政党，动辄就给人扣“反党反政府”大帽子的政党，就是一个没有自我纠错能力、一错错到底、一烂烂到底的政党。体制内没有纠错机制，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这伟光正的当权者的意志和手中的权力犯错甚至是犯罪。多少生命？多少灾难？多少不幸？多少牺牲？都均由这种一党独裁的体制制造而没法阻止。在这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领导下，历史的记录只有两个字：灾难。“反党有罪论”是中国人心中的一个死结，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一座大山，也是窒息了几代中国人的思想牢笼！

托克维尔最为看重的、认为最有效的反对暴政的措施就是少数派的合法反对权利。2012 年新春时节，马文瑞之女马晓力高喊：“建国以后的很多历史表明，我们实行的还是皇权政治。现在的官民矛盾突出恰恰是缺乏党内民主，党内监督机制。三权分立为什么不能搞？共产党为什么就不可以被监督？”2012 年 6~7 月的网上调查显示：97.5%的网民认为“不管谁当领导，权力都要受到制约”，97.2%的网民同意“当前中国社会的不公平现象很严重”。9 成以上的网民赞同“人人都有权批评政府”。可见，民主宪政是人心所向！

假刘亚洲说：“在过去战争年代，我们自己就是‘反对派’……难道我们执政 60 多年以后反而失去了自信心，不能容纳‘反对派’的存在？我倒是认为，我们不但要容纳国内“反对派”

的存在，而且欢迎海外一切所谓的‘敌对’人士回国！无论这些人是不是有所谓的‘政治野心’，他们要想获得老百姓的支持，也就是根据他们在海外宣扬的‘一人一票改变中国’的理念，如果他们无法在中国土地上为百姓谋福利，为中国的进步和富强作出贡献，他们不需要我们抓捕判刑，也会被他们所主张的选票所抛弃。既然我们有信心，让过去最大的敌人国民党都成为我们的朋友，为什么还惧怕海外那些少数的反对人士呢？”“国共现在已经不是敌对状态了，我们自己反而要和自己的国民所组建的组织成为敌人……我们过去一直骂国民党独裁，而我们现在的民主党派都是国民党执政时期成立的，没有一个是共产党执政后成立的。而在台湾的国民党已从革命党转型为民主政党了，人家不仅允许反对党，还让他们来竞选，虽然失败了一次，但是又通过选举重新执政。我们现在，打击镇压反对党的成立的作法，一个是没有法律依据，而是违背我们共产党立党的宗旨。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党，群众成立政党，在现有的体制下不可能取代我们共产党执政，只能是参政议政。而参政议政只会帮助我们更好地执政，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共产党、国民党以及一切的政党，现在都不是敌对的政党了，而是代表一部分人民群众同质性的政党，将来完全可以为中国的统一和强大而共同做出自己的贡献。”中共如果想建设平安中国，就必须废除敌对思维方式，废除“颠覆国家政权罪”、废除一切专制制度。假刘说：“腐败分子才是我们的真正的敌人，是全民的敌人，而所谓的反对派人士，甚至反对党，在新的政治思维下，都不是我们的敌人。”

15. 人民最大废除反人民的共党宪法

2008年3月22日国民党主席吴伯雄在台湾大选胜选后的群众集会上说：“没有一党独大，只有人民最大！只有人民手上的选票最大，没有一个政党比人民大！”

“人民至上、人民为大”的思想，不仅成了中国国民党人的原则和方向，而且在台湾更是家喻户晓的常识。可是，在大陆中国确是完全相反。2008年5月27日中国国民党主席吴伯雄在南京中山陵题字，全文是：“天下为公、人民最大”。有人说：吴伯雄委曲求全，连中华民国的年号都不敢写，连人民选出的总统马英九也被他称为先生，可见“人民为大”是假。我觉得吴伯雄是在嘲笑大陆，因为他用大陆的年号，当然是嘲笑那些时时处处标榜“人民”政府的官员的内心深处是以“人民为小”的，人民在中共官眼里只是“屁民”。

中共官方常说“党领导人民”如何如何，这个说法是错误的！“人民”是一个整体的概念，是集合性质的名词。人民是至上的，人民主权是至上的，人民是国家最高权力的主体。“党领导人民”的提法意味着党凌驾于人民之上。违背了“人民至上、人民为大”的原则！

中共1982年宪法序言规定“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领导”的本意是领路，但在此处显然不是“领导”的本意，而是“领导”的引申意，即管理、控制以及统治等意；在日常生活中，“领导”就是首脑、老板的意思。谁拥有国家的“领导权”，谁就是国家主权的拥有者，就是国家的“老板”。在宪法序言中通过赋予中共的领导地位，就把“主权在民”巧妙地转换成了“主权在党”，就剥夺了人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自主权。这和中共宪法第二条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相互冲突的。

“人民共和国”的含义，就是人民是家的主人，国家由人民做主，由人民共同管理，否则就不配叫“人民共和”。宪法和法律规定公民享有广泛的民主和自由权利，却又规定公民必须服从某党领导，这还能叫民主吗？这是把“主人”和“公仆”的关系颠倒了。82 宪法序言

规定了共党和中国人民的关系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也就是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这意味着党大民小、党主民仆，民只有服从的份。现在将党的领导置于人民当家作主之上，造成的不是“党的领导”与人民主权兼容，而是人民的主权被中共所篡夺，人民是假主权，“人民主权”不真。在“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人民主权”和“党领导”的“政党主权”之间，二者必居其一，不能二者同时并真。因为最高权力只有一个，要么掌握在党的手中，要么掌握在人民手中。国家主权归属也只能是一个，要么是人民，要么不是人民。“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是南辕北辙的两个原则，根本不能结合在一起。在宪法规定特定政党领导人民之后，它关于“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条文就成了永远无法兑现的谎言。

从 82 宪法的第 1 条到第 130 多条，没有“共产党领导”这五个字，从头到尾找不到。有些人说宪法别的不要看，就看序言，序言就讲“党的领导”。其实，序言的内容是讲中国共产党领导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只是历史叙述。里面有一段“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这是对未来的期望。序言不是法律规定，而且序言里没有写“共产党必须领导人民和国家”；而且删除了以前宪法中的共党领导人大、领导政府、领导军队的条款，因此，今天共党领导人大、领导政府、领导军队做法违背了 82 宪法，是非法的！更何况中共党员在国民中是少数，党员不是由公民选举产生，共党也不是经过公民选举产生的群体，共党不应在宪法中享受发号施令的特权。党只是社团性质的组织，即使选举获胜，党也只能向国家推荐干部，却不能以党的名义指挥国家，更不能向国家机关和社会发号施令。1957 年民主人士黄绍竑就说：“党不应直接向人民发号施令”。60 多年过去了，共党依然向人民发号施令。2007 年 12 月 26 日，胡锦涛提出要“始终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这“三个至上”就是“做了婊子还能立个大牌坊”，实际上只不过是“领导至上”，它的同义词是“民众至下”！中国大陆的现实是：天下为一党之私有、人民为一党之小妾。人民时时都得服从某党之领导——不能乱说乱动。胡绩伟主张人民性高于党性被整倒，党宣称其党性高于人民性，可见，在党心里，人民连小妾都不如，只是“草”而已。

政治权力必须来源于合法的人民授权，这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规范。现代政党竞争政治是民主的一种形式，各个政党之间的平等竞争是法治的最基本的要求；各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一律平等，不应有什么领导党与被领导党之分。众所周知：每个社会成员的权利和义务一律平等是现代法治社会的一项基本原则，由此原则出发，任何政党都不得强制公民服从其领导。因此，把某一政党规定为国家政权的领导者从根本上侵犯了非党公民的基本权利。它使党的成员在“决定由谁来统治”这一根本国家事务上享受了超过其它公民的政治权利，从而已在本质上颠覆了“人人平等”这一法治原则。所以，中共的宪法序言保证“共产党的领导”违反了法治的平等原则。宪法序言规定中共领导人民，就意味着人民无权选择执政党，断绝了其他政党执政的可能性；中国就算不上是“共和国”。宪法既然对国家领导人搞终身制，对党执政也不该搞终身制，所以，必须删除宪法中的“党领导”条款。所以，为了最基本的社会公正，必须立即废止由某个特定政党永远享有统治国家的不公正状态，而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首先在宪法里剔除由特定政党领导人民的序言。

中共 1975 年、1978 年的宪法第 2 条规定：“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国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这种把一种意识形态搞成了国教，同法西斯分子宣扬的“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毫无二致。1982 年宪法取消了 1975 年宪法第 2 条关于国家指导思想的规定。中共 82 宪法序言却规定：中国人民必须在马列主义的指引下前进。宪法这种规定就是剥夺了公民的思想自由、言论的自由和信仰自由。如果公民不同意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就成为违法犯罪行为。这不是搞思想治罪、文字狱吗？

无论是中共的 54 宪法还是 82 宪法，都在“宪法”中贩卖共党的私货，首先写上“吾党权威至上”和“马列毛真理至上”的“紧箍咒”，让“宪法”其它条文化为乌有。这是什么宪法？简直是对宪法的莫大嘲弄与讽刺！中共国的 82 宪法序言的实质是一党执政的论证书，渗透着党文化和党意志，浓缩着毛、邓专制主义的精粹。序言主旨不符合立宪的宗旨，应从宪法中加以删除。中共国的宪法没有对制止违宪法律与违宪行为设置相应机构（如宪法法院），使宪法的权威性有效性大受损害，甚至成为虚设。82 宪法中有的条款与内容成为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与文化体制改革的障碍。如第一条，第三条，第六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六十一条第二款，第六十二条第五款等。按宪法规定，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由此推论，哪些议案需列入大会议程，哪些议案、法案需经大会表决和如何表决，应由代表大会来决定的。也就是说，代表大会有权讨论一切它认为必须讨论的问题，有权决定一切它认为需要决定的问题。可是，全国人大组织法却规定，议案是否列入大会议程，由主席团审议决定。这就是说，全国人大只能讨论主席团决定的问题。主席团决定不讨论的，即使全国人大中的多数代表认为必须讨论的，也无法讨论。这显然是违宪的法律。所以，为了保障人权，与国际社会接轨，必须废除充斥了一党专制的落后野蛮的宪法及其法律！

习梦斯人--中共历史民间版（6）

16.抱弹击鼓传花中国政府依然是个不合法的“临时政府”

共党通过野蛮的暴力推翻一个他认为非法的旧政权，建立一个由自己授权的新政权，其执政地位和手中的公权力完全是自封的，并非来自于公民的授予，因而不符合宪政民主的要求，不具有合法性！但是，他们置若罔闻，因为在他们看来：既然整个国家是共党打下的基业，党天下就顺理成章了，哪怕将自己打下的江山社稷传承千秋万代，也是无可厚非的！

洛克指出：通过暴力或欺骗建立起来的政府，决不是合法的政府，因为这种政府是暴力斗争中取胜的一方建立的；因为这种政府的统治权靠一部分人剥夺另一部分人的权利而维持，不是由全体社会成员共同推举的；所以这样的统治必定导致不满、反抗和争斗，从而如同洛克所说，“奠定了永久混乱、祸患、暴动、骚乱和叛乱的基础”。

真正的革命者一定要认识：国家政权不是抢来的，它的基于人民主权，是人民根据社会契约将个人权利的一部分转让、认同而形成的一种确定的、统一的权力。而且国家政权也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必然与一定的义务相联系。政权的行使者必须承担起保护人民主权、保护民主政体、保护人权自由的职责和接受人民监督的义务。只有具有真正的革命意识，才能进行真正的民主革命，才能取得民主革命的真正成功。

革命推翻暴政后，只有让每个社会成员“自由、平等、独立”地参与到设置政府的活动中来，自由地选择“统治者和政府形式”，最后按照多数原则作出决定，实施“人民主权”并授权政府行使统治权，只有这样成立政府才是合法的政府。当专制独裁的暴政横行时，人民有权暴力推翻它，但是，推翻旧政府以后，必须按照上述办法来设置合法的新政府。

洛克要求人们分楚：革命是一回事，设立政府是另一回事；革命可能是非暴力的，也可能迫不得已而使用暴力，但成立合法政府，只能通过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共同协商、按多数原则作出决定的办法来成立。没有经过此合法途径产生只能是临时政府，所以，今天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政府依然是一个不合法的“临时政府”。

姚立法 2007 年 3 月 5 日发送了致吴邦国、胡锦涛等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公开信，论证其代表资格不具有合法性，指出：中国的人大是非法的，中国的政府也是非法的。张木生说胡温中央是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现在定时炸弹传到习总书记手里，这“定时炸弹”就说明了中共国政府的临时性。由这两个人的结论就可推出：中国政府是个不合法的“临时政府”。

中国不是一党一派的领地，更不是一家一姓的乐园。中国是不同信仰、不同观点、不同生活方式的所有华夏儿女的共同家园。全中国各民族、各地区、各阶层人民团结起来，完成自三皇五帝以来从未有过的历史性变革，将所有同胞从落后愚昧的党权专制下解放出来，在自由的空气中呼吸，在正义的阳光下生活，让中华民族潜藏的勇气、智慧和创造力最大限度地释放出来，这才是两岸人民共同期盼的真正伟大的解放战争。

17. 大骗子胡锦涛习近平

2002 年 12 月 4 日，胡锦涛在首都各界纪念宪法公布施行 2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宪法是我国的根本法，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都要模范地遵守宪法，严格按照宪法办事。2004 年 9 月 15 日，胡锦涛在首都各界纪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 50 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依法执政，首先要依宪执政”。2004 年 9 月 25 日，刚刚接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胡锦涛同志签署命令，授予张定发、靖志远二人上将军衔，这一做法明显违反了宪法第 93 条规定。根据宪法第 93 条规定，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及其主席胡锦涛无权授予任何人任何军衔，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江泽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签署授予公民军衔的命令，除非胡得到了江泽民的明文授权。由胡签署这一命令，是以党代政、党政不分。可见，胡锦涛是个言行不一的大骗子。

2012 年 11 月 23 日，刚刚接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委员、第二炮兵司令员魏凤和同志颁发命令状。

习近平这样做是违反宪法的。因为授衔是一种国家行为，只能由担任国家职务的人行使。习近平当时仅仅当选了中共的中央军委主席，不是国家的军委主席。国家中央军委主席仍然是胡锦涛。82 宪法第 93 条规定，国家的军委主席领导军队。按理说，上将授衔应该是国家军委主席胡锦涛的权力。官方新闻稿并没说胡锦涛授权给习近平！新闻稿里面连“国家军委主席或副主席”字样都没有出现！在中共眼里：“党指挥枪”是天经地义的。其实，“党指挥枪”是违反宪法的。1982 年宪法第 29 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属于人民。这一宪法条文表明，共军不属于任何政党，而属于人民。把军队认定为中共所有是错的，是违反宪法的。共军是中共创建，但并不等于它永远属于中共。孙中山先生说：共和国建立以后，革命党应把军队交给政府。如果中共可以拥有军队，那么其他政党也可以拥有军队，国家还不乱了。“党指挥枪”是中共在夺权时期的方针，不是现行宪法规定，军队不应遵循这一违反宪法的政党方针。由中共的军委来领导军队就违反了 82 宪法的第 93 条。可见，军队国家化是由宪法决定的，“党指挥枪”是没有宪法法律依据的。中共出尔反尔，自己强奸自己的嘴巴。土匪永远不行法治，不行法治就是骗子、土匪。

习近平在考察南海舰队时强调“要牢记，坚决听党指挥是强军之魂”。这个军队消耗国防军费是民脂民膏，凭什么只听共产党的话。当今世界非共产党国家都是军队国家化。军队是国家财政养着的，军队是国家的卫士，不是党的卫士。当今世界有五千多个政党，如果政党都有听自己指挥的军队，那么就该有五千多支军队，恐怕世界真的会生存在枪林弹雨之中。

枪被党掌控，被党指挥只有一个对内的目的——镇压人民。表明向来“英明的”共产党缺乏自信。在国内，虽然有 8 个民主党，但这 8 个民主党都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而且是“文化团体”，没有一条枪；虽然有 56 个民族，但 56 个民族都没有民族武装；虽然有 8 亿农民和诸多知识团体，他们都是赤手空拳的，规定买菜刀实名制，他们就按规定出示身份证。面对和平家园的和平人民，共产党应该有一百个放心才是。请问：今日党要指挥枪干嘛？

“党指挥枪”是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提出来的，其目的是为了排斥朱德的领导。因为当时毛是中央委员，朱德不是。朱德和陈毅一度通过民主选举解除了毛最高指挥权。后来是周恩来代表中央恢复了毛泽东的权力。毛把“民主选举”称为“大民主”，范围大了不容易控制导致毛落选了，所以，要搞“小民主”即“民主集中制”即毛操纵下的会议投票，从此“民主集中制”和“党指挥枪”就被说成了中共的最高原则了。其实，中共“枪指挥党”，毛泽东因为有井冈山的军队，接连废除了博古、张闻天的总书记职务。在邓小平时代，党的总书记是胡耀邦和赵紫阳，他们代表“党”，而邓小平只是“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代表“枪”，邓小平这个军委主席，废黜两届党的总书记，立了一届新的党的总书记，还又“隔代指定”了第四个总书记，还好意思说这个党不是被“枪”指挥的吗？而胡锦涛当了党的总书记之后，由于江泽民仍然是军委主席，所以其行动处处受制，十八大之后，习近平一定要既当总书记，又当中央军委主席，才可以有所作为，都证明了中共是被枪杆子指挥的党。

中国的统治者制定国家大法，但他从不遵守。1949 年毛建政后，实行的是政府领导军队的体制，因为毛是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 20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统一的军队，即共军和人民公安部队，受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统率。按照 54 宪法，毛的国家主席应该 4 年就轮换，到 59 年才把国家主席给刘少奇，说明了他违了宪。1954 年宪法规定国家主席领导军队，58 年毛强调党领导一切，搞党指挥枪，强奸了宪法。1959 年刘少奇任国家主席。刘的国家主席被毛篡夺了军权，这是严重违宪，由于经过 57 年反右，全国鸦雀无声，刘屁都不敢放，直到被打倒，刘手举宪法本，要求人们尊重宪法！55 年反胡风，57 反右，刘少奇怎么不强调尊重宪法，晚了，刘被整死，林彪被逼死，国家主席这一职位干脆被取消。可见，中共一直以非法手段管理社会。周琦说：“中共是巨型的黑社会组织，不是政权；而是企业集团，到各国访问谈的都是生意，中共在世界各地有那么多产业，它演变成商业集团，有权就可以买到一切，又有军队、警察、特务，很可怕。它做的事情都暴露它的非法性，总有一天，人民会站出来否定它的合法性”。

“党指挥枪”是党魁独裁的骗子伎俩，依靠枪杆子搞独裁的党魁，怎么会尊重宪法？2012 年 12 月 4 日，中共在人民大会堂集会纪念宪法（82 版）公布施行 30 周年，习近平在会上发言要求维护宪法权威，捍卫宪法尊严。若习近平真维护宪法权威，就不能高喊“党指挥枪”，因为宪法取消了“党指挥枪”权力。75 宪法、78 宪法规定中共领袖领导军队，82 宪法取消了它，规定是国家军委领导军队并向人大负责！习近平明明是宪法的强奸犯，却高喊“维护宪法权威”，不是大骗子是什么？习近平这么一忽悠，2012 年 12 月 14 日，包括张千帆、江平、张思之、贺卫方在内的 70 多位中国学者发表《改革共识倡议书》，呼吁中国社会对改革的方向达成宪政共识。2013 年元旦，北京《炎黄春秋》杂志发表了社论《宪法是政治体制

改革的共识》，1月10号上午突然被封网。2013年元旦，《南方周末》发表了新年献词，原本《南方周末》编辑部的《中国梦宪政梦》被中共枪毙了。随后是“七不讲”禁令，全面封网，乱抓人，网络文革再现！这说明了大骗子习近平又是大流氓！

中共本来就是靠欺骗（笔杆子）和镇压（枪杆子）起家 and 保政权的。“党指挥枪”，是反人民的，是反人类的兽性法则！辛子陵也是个大骗子。前2年，他一直在散布习近平在中共内部会议上否定毛泽东。难道是习近平叫他干，以此收买人心。

18.南周事件习帝击碎宪政梦

早在一百多年以前，实行宪政已是中国朝野上下有志之士和有识之士的共识。1922年5月，由胡适起草，蔡元培、李大钊等16人联署的《我们的政治主张》就国家的政治改革提出过3个基本要求：第一，我们要求一个“宪政的政府”，因为这是使政治上轨道的第一步。第二，我们要求一个“公开的政府”，包括财政的公开与公开考试式的用人，等等。因为我们深信“公开”(publicity)是打破一切黑幕的惟一武器。第三，我们要求一种“有计划的政治”，因为我们深信中国的大病在于无计划的漂泊，我们深信计划是效率的源头，因为我们深信一个平庸的计划胜于无计划的瞎摸索。胡适等人当年提出的前两项要求，21世纪的中国已完全有条件实现，至今却无官响应，“宪政”依然是飘渺的梦想。

2013年1月5日，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发表讲话，强调不能否定前30年历史。他说：“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并且把“两个不能否定”上升到了共产党生命延续和民族复兴的高度。江泽民和胡锦涛上台伊始，都不约而同地到红色根据地朝拜，以表明自己的红色正统，但都不敢提前后三十年关系的敏感问题。习近平一上台便底气十足、旗帜鲜明地提出“两个时期”“互不否定”，决非偶然。

“两个时期”关系问题一直是近些年学术思想界争论的热点问题。在邓小平时代，思想界的主流观点是否定“前三十年”，承认毛泽东治国失败了，以证明“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共产党的“后三十年”，其左手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行一党独裁；其右手是改革开放，中国的GDP跃居全球第二位；但官员贪污腐败、贫富两极分化，由于统治者总是在自觉不自觉地扩大自己的权利，逃避自己的义务，并将它们转嫁到平民阶级头上，因而不可避免地加剧了这两个阶级的对立。由于掠夺是一切专制者的天性，反掠夺也就成了广大人民的天性。社会矛盾极其尖锐。专制发展的最初表现是腐败。越到后来，统治者的掠夺愈加疯狂，人民的生活极度艰难，一切美好的幻想都已破灭；而统治者愈加穷奢极欲，挥霍无度，玩物丧志，财政入不敷出，国家机构丧失组织性和战斗力，一党专制的国家政权开始摇摇欲坠。这时候，一场大的社会革命的大风暴眼看就要来了！怎么办？出路何在呢？

近些年来，出现了两种新的思潮，都主张抛弃邓小平的改革模式。一种是传统的毛左派，全面肯定“前三十年”的毛泽东时代，完全否定“后三十年”的邓小平资本主义路线。与此相对的是宪政民主派，他们肯定三十年来的市场化改革，否定“四项基本原则”。

邓小平模式的特点是政治上独裁，经济上自由，并不能算是独特的发展模式。在东亚“四小龙”经济起飞阶段，无不实行这种模式。但东亚“四小龙”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中产阶

级形成之后，都逐渐过渡到比较稳定的宪政民主体制。中国也不可能例外。

荣剑在《宪政与中共重建政治合法性》中问道：“在枪杆子、笔杆子和钱袋子都已失去了有效控制国民的情况下，要想重新取得国民的认可和支 持，难道舍宪政还有其他路径吗？”

冯胜平说：今天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最缺乏的也是安全感。他们做裸官，做噩梦：共党在，他们不安全，随时可能被“双规”、被 查办；共党不在，他们更不安全，暴民会清算他们——“民主之后挂路灯”。无时不生活在恐惧之中，他们比中国社会中任何人都更期待宪政。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最大的动力是贪婪和恐惧，平衡两者的最好制度是宪政。

习近平选择的是唱民族主义的“中国梦”，以示习时代与胡时代的不同。胡锦涛任内，主唱“和谐社会”，然而，十年下来，中国社会不是更和谐了，而是更不和谐了，警民冲突不断，官民对抗升级。原因在于，胡所言“和谐”，是要民众放弃抗争，顺从官府；而民众所理解的和谐，是期待官府让步，顺从民意。如此南辕北辙，十年荒废。“和谐”二字，沦为笑柄。如今，轮到习近平，提“中国梦”，官民双方也出现不同解读。官方的解释，就是“富国强兵”、“船坚炮利”；民众的解读，就是权利平等、机会平等：中国梦不是贪官的梦，不是黑帮的梦，不是独裁的梦，不是专政的梦，不是强拆的梦，不是审查的梦，不是屏蔽的梦；中国梦是民主的梦，是宪政的梦，是选举的梦，是自由的梦，是民富的梦。一个“帝国梦”，一个“宪政梦”，官民分野，再度南辕北辙。十年之后，哪一个梦成真？

《南方周末》1984 年创刊；每周 4 出版，全国发行。“正义、良知、爱心、理性”是该报的基本理念，自出刊以来深受广大民众、特别是知识人群的欢迎。它一直是中国深具公信力的严肃大报，也是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新闻周报，每期发行量稳定在 120 万份以上。而且几乎全是读者自费订阅，不像《人民日报》靠中共硬摊派给机关、企业、团体公费订阅，否则便无“买主”。《南方周末》多年来以其正直敢言深受中国广大民众的喜爱。当年的孙志刚事件就是由该报打响了讨伐违宪恶法《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条例》的第一枪，终于迫使当局停止了实施多年的这一害人恶法，不知拯救了多少穷苦人的生命。

《南方周末》2013 年新年献词原是《中国梦，宪政梦》，其中有句云：“兑现宪政、限权分权，公民们才能大声说出对公权力的批评；每个人才能依内心信仰自由生活；我们才能建成一个自由的强大国度。”这些话充分反映出普通民众的心声；反映出多年来民众对无监督、无制衡的公权力不断恶性膨胀的担忧，因而渴望对公权力加以限制。

但正是这些朴素而饱含真理的文字，不知伤害到了谁家的既得利益。这篇已经在编辑部内完成了编审手续并已交付排印的新年献辞，突被“卡”了下来，然后由中共广东省委新上任的宣传部长庾震先生，亲自对该期内容全面审查，大肆阉割，“自由”“宪政”字样被执行三光政策，全都抠除剔尽！见报时，题被改为《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梦想》，成了歌颂习的“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什么“毛站起来”、“邓富起来”、“江胡强起来”的“超越汉唐”之“盛世”，而不再是中国人的“宪政梦”了。当这个被庾部长糟蹋得面目全非的《南周》及新年献辞与广大读者见面时，《南周》媒体人傻了眼，不知是怎么回事。读者更看见头版上竟然出现了诸如“2 千年前大禹治水”这样的“新发现”；众所周知 2 千年前是汉朝，大禹先生居然还健在！而且不退不休，继续工作，如此极具中国特色的奇迹恐怕“境外敌对势力”也会被吓晕的。接着又有读者发现，这个篡改后的新年献辞《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梦想》的第二段上说“这是我们第 1057 次和你相见”，但头版上却明明写的很清楚，这是“第 1507

期”。莫非庹部长相当于一个不识数字的白痴不成？

正如俗话说“纸是包不住火的”。2013年1月3日《南方周末》采编人员通过微博发表了一个抗议声明，对枪毙他们的原来文稿的庹部长等人表示不满和抗议。这件事情发生也是在中共的历史上，尤其是在中共的媒体的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这立刻在互联网上引起轩然大波，民众一边倒地支持《南周》，对庹震的恶劣行为进行谴责嘲弄，甚至用“庹”字的谐音将其称为“一砣屎”。1月4日，52名《南周》前实习生联名写公开信，呼吁庹震辞职并公开道歉。那些掌控“喉舌”的宣传部长，其实和中共中央编译局被免职的局长衣俊卿一个样，工作中“满嘴马列”，生活中多是“满腹盗娼”，如今网上已有传闻庹震5年有6个情妇。庹震之流的倒行逆施，虽激起民愤，纷纷要求其引咎辞职，却也受到少数毛左份子的追捧。被称“高级五毛”的（《环时》主编）胡锡进、孔庆东、张宏良借机起哄，声称“南周事件”是什么中国“买办汉奸”势力在美、日支持下在广州发动“叛乱”。广东省委书记、政治局委员胡春华连夜开会，中共也在京召开宣传部长会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讲话。

广大网民大声支持《南方周末》编辑部。但网上的这些文字，很快便遭到封杀，被一一删除。如北京学者贺卫方教授在微博中公开呼吁：拯救《南方周末》，敬告当局插手此事人员请用文明说服人，莫做历史罪人。这样一条理性、平和的微博帖不到几分钟的时间便遭到删除。而许多公开表示支持《南周》的学者、教授、律师、网民、艺术家均不同程度的遭到恐吓、骚扰。甚至来大陆发展的台湾著名影星伊能静因在微博上发表支持《南周》的言论，不但微博被禁言两天，还遭到警方传讯。但可贵的是一个弱女子却能以坦然胸襟面对强权的欺凌。伊在博文中说：“我去喝茶了，希望茶好喝。”她还说：“你的暴怒，让我懂得自己正确。你的掩饰，让我相信自己正直。你的疯狂，让我看见自己清醒。你的杀戮，让我知道自己活着。”伊能静的这最后一条微博被网友大量转载，博得广泛支持。有网友赞曰：茶，喝茶，请喝茶；女，美女，美侠女。“五毛”们气急败坏，于是将伊的泳装照发到一家官方大网站上，并冠以“伊能静泳装诱宅男”这样带侮辱性的文字。手段之下作，令人愤慨。

《南周》事件被认为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最离奇的新闻管制事件。中宣部在全国封杀噤声，命喉舌发文向南周拍砖，并强制报刊转发表态。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国内宣传管理者应该“踏准节拍”，这关系到“中央形象”。中青网发表评论说南周是“党报事业一部分”，是传达党的方针政策的媒体。向来被人们嘲弄为“五毛党”党中央机关报的《环球时报》自然也不会闲着，于2013年1月9日抛出一篇奇文称：“新闻自由做不到毫无底线，这从我们在生活中说话不能毫无底线有类似之处。”《环时》用此种偷换概念的语言伪术把“新闻自由”的概念，偷换为说话“毫无底线”。相反，庹震作为一名党官，却越俎代庖去干“编辑”、“主编”的事，对一家媒体的新闻稿件擅自进行删改，而且改得谬误百出，其所作所为才是“毫无底线”的行为。接着《环时》又称：“各国的新闻报道都有各自的边界和禁区。比如美国的媒体都不能歧视黑人，不能攻击犹太人，不能违背美国的国家利益等等”。按照这一逻辑，中国的新闻媒体就不能谈宪政梦，不能谈兑现宪政，不能谈限权分权，不能谈对公权力的批评。这就是中国新闻的“边界”和“禁区”。原来期盼宪政民主，就等于是宣扬种族歧视，倡导限制公权，就是违背国家利益！这就是美国与中国的不同“国情”！

国际记者组织发声明，谴责中共的新闻检查制度。台湾、香港、澳门的新闻记者协会发表共同声明，谴责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强行改稿，呼吁新闻自由，要求调查事件真相。台湾负责大陆事务的官员呼吁中国改善新闻环境。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美国“一直在捍卫和支持新闻自由，无论是针对中国的新闻从业人士，还是针对在中国工作的外国记者”。

美国《华尔街日报》于1月5日大幅报道“南周事件”，认为是中共对新闻及言论自由进行“官方审查”（officialcensorship），有意操控媒体，迫使《南周》封杀原有的新年献词。类似的批评在西方媒体不胜枚举。《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络版1月16日发表中国学者马勇的文章《晚清政府是怎样管理媒体的？》文章列举了清廷从1906-1911年间颁布的出版法，称赞1908年“《大清报律》的颁布让人民自由办报的权利得到了落实。”这段历史故事告诉世人，早在一百多年前的清朝，中国人的办报“自由梦”已成实现。而在今日中共治理下，媒体人连表达“自由梦”的梦想都被中宣部拦截、摧残。南周事件再一次表明，政府对新闻的管理是如何落后于时代：傲慢的权力不仅要管思想、管言论、还要管梦。

备受蹂躏的南周员工宣布罢工，并向外界求援，成百上千的民众到广州大道中289号的南方日报大院门口声援，高举的标语牌“新闻出版自由才是真改革”，声援《南方周末》众多人士被当局非法关押，引起国内外的强烈关注。让人想到1989年的游行示威。最后是胡舒立出面找到王岐山，在王岐山的指示和胡春华的具体调节下，当局与南周抗议者达成妥协，参与罢工的南周人获口头应许不被清算。记者们才恢复工作。

南周事件暴露了中共机器的老旧和不可理喻。人民的自由尊严、国家的宪政民主成了中共笔杆子（中宣部）和枪杆子（政法委）攻击的目标，中共已经成了人类的公敌。历史上大凡独裁者都极端神经质，俄国的、中华的、阿拉伯的，非洲的概莫能外。中共执政更胜一筹，整个一副“卧榻之下，岂容他人酣睡”的霸道和自不量力。广东维权人士郭飞雄因参加2013年初的挺《南方周末》行动，在8月23日被抓，罪名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

中共公开否定宪政，其目的就是通过否定宪政来扼杀国人的梦想与追求。宪政就是立一个根本大法，政府权力不能侵犯人民的权利——比如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平集会与结社自由……否定了宪政就等于完全把个人的权利给剥夺了，将来真的可能说个话就可以治罪了。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不是某个党派的，中共以自己集团的意志绑架全国人民，倒退到秦朝的禁言时代。网上有人就此特作新歌《我的帝王心》一首，借“国母”彭丽媛之口唱出习近平的心声：江山常在我梦里，/体制已多年未改进，/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帝王心。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帝王心；/我的祖宗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特权印。润之、小平、/陈云、泽民，/在我胸中重千斤。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心中一样亲。流在心里的血，/澎湃着专制的声音，/就算活在新时代，也改变不了/我的帝王心。

在“七不准讲”之下，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复兴梦”将一夜回到辛亥革命之前的“帝王梦”，那就是复兴到大家跟着皇帝一起做梦、全国只有一个皇帝可以做梦的年代。

自习近平上台之后，反对宪政的论调一浪高过一浪，民主宪政居然成了中共眼中不共戴天的眼中钉、肉中刺。这个被全世界大多数国家和人民所接受的政治模式，为什么令中共领导人如此厌恶，如此痛恨，犹如芒刺在背，寝食难安？这是因为民主宪政符合人类的共同愿望，政权由人民的选票产生并由自由的舆论监督。如果中国一旦实现了宪政民主，像邓小平、江泽民这样任由个人意志大搞隔代钦点的封建接班现象，根本无法出现；带有世袭制特色的所谓的中国第几代领导人，没有一点合法性。所以，中共仇恨普世价值、仇恨民主宪政，因为这两样东西会使他们的权力荡然无存！中共的反宪政浪潮，彻底颠覆民主立宪和共和价值的根本追求，就是公开站到中华民族百年来为宪政浴血奋斗历史的反面，那么必将导致改革路子彻底堵死，革命闸门再次开启。习近平的“帝王梦”，会越梦越离谱，但肯定也像当年毛

泽东妄想充当共产主义世界领袖一样，落得众叛亲离，以失败而告终。

19. 共党是民主宪政的死敌

据悉中共 18 大政治报告中的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之说，当初很多人都以为是胡锦涛的观点，但据北京政治圈的人透露，这句话出自于习近平，18 大政治报告是习近平主导的。他南巡讲话就是沿袭这个说法。习近平南巡讲话曝光，使所有期望他政治改革的人都大吃一惊，说没有想到他比胡锦涛当年还左。党内民主派普遍失望。一些民主派老同志骂他不肖之子，说他对不起其父习仲勋，“不知他死后有何面目面对老父”。

什么是封闭僵化的老路？这显然是指毛泽东时代的老路，但习近平不敢真的批毛，将那条老路祸国殃民的丑况公开抖出来，反而在十八大报告中歌颂毛泽东“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这岂不是给封闭僵化的老路化妆成为伟大的开路先锋和奠基石，自相矛盾！

什么是改旗易帜的邪路？说穿了就是不走民主宪政道路，也就是中共自招的“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在胡习脑子里民主宪政既是西方政治制度模式，那便是邪路。他们根本不明白，民主宪政固然发源于西方，却是中国近百多年来无数民主先烈不断前仆后继的追求目标。这些先烈包括魏源、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陈独秀、胡适等等。甚至连毛泽东等中共领袖在反对蒋介石独裁时也都要求实行民主宪政。民主宪政从英、美、法开始，现已普及全世界，连旧日苏联、东欧和蒙古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北非、中东一些阿拉伯国家都要走宪政道路。台湾不是已经实行民主宪政二十多年了吗？国内人民不是都引颈盼望将台湾民主移植到中国大陆吗？只有胡习才闭着眼睛瞎说宪政是邪路！

胡、习觉得宪政是邪路因为民主宪政是一党专政的天敌和克星。有了民主宪政就没有了一党专政，也就没有了他所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一党专政的别名。它挂着社会主义羊头，卖的却是“党领导一切”的专政。事实上，党不是领导一切而是控制了一切。在一党专政之下，什么“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以人为本”、“和谐社会”、“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以及党内民主和政治体制改革等等，全都是空话废话。前中共理论家、福建社科院院长李洪林指出：民主自由是人类的普世价值，民主和社会主义不兼容。名学者贺卫方认为，“从马克思理论本身说，共产主义当然无宪政”，“在宪法中确认一党长期执政就是对民主的否定，实施这种宪法本身就是反宪政”。中国的前途，除了用宪政民主取代一党专政，别无出路。

宪政要求：政治权力的取得、行使与更迭应当遵循正当的法律程序来获得公民的自愿同意。未经公民同意就上台的执政就不是宪政。因此，宪政国家不存在永远的执政党。任何宪法都不应赋予任何执政党以绝对的、不受限制的、专横的权力。这正是宪政所要求的。所以，宪政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党是可以“消亡”的，宪法里不会规定任何政党是万年党，其“存亡”、“兴衰”靠选票来决定，否则那就不叫宪政民主，而是一党专政。比如美国的联邦党，早就“亡”得无影无踪了。可是要让一个执政党在选票面前服输，在民意面前退场，那就离不开军队国家化，军、警非党化；党军、党警跟宪政不兼容，否则，军队是忠于某个政党的

党军，警察是忠于某个政党的党警，谁能担保这个政党不迷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用刺刀、警棍定输赢而无视民意呢？所以讲宪政，就不能不讲军队国家化，军、警非党化。

宪政是一切暴政的天敌。宪政是关于权力设防的学说。它要防备暴政，不论这种暴政是来自政府还是来自民众。因此，必须通过宪政来限制政府的权力，以免多数派压迫少数派。宪政是人民管理国家、管理社会的一种政治体制，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人性、最有效的一种政治体制。宪政就是把统治者关进笼子里，并加以驯化，把他们从统治者驯化为执政者，完全并永久剥夺他们手中作恶、专横的权力。一句话：宪政就是限政，就是驯服统治者防止权力作恶，就是公民的权利与自由的最大化，政府权力的最小化。

专制主义就是一种日心说的宇宙论下的政体，宪政就类似于银河宇宙论下的没有中心的秩序。太阳系是什么，就是所有星体围着红太阳转，而太阳占据了太阳系全部质量的 99%。这就是专制制度下的政治结构。51%的控股都不行，你一旦大起来了，太阳的引力就不够了。那秩序就崩溃了。所以你告诉共产党，说你政治上开放一点，没有危险。其实这话也不太真实。对共产党来讲，放开的确有危险。但不是人民有危险，是他自己有危险。

1982 年，有人问彭真，究竟是党大还是法大？他想了一会儿说：应该是党大。所以，无论是宪法还是具体法，都不在共产党的眼里。所以它是否定宪法的，有宪法但不实施宪法。社会主义国家无一不是一党专政，宪法从来就只是掩人耳目的摆设，宪政无从谈起。所谓的社会主义，实则是列宁、斯大林主义野蛮血腥的党专制；其实质就是对民主革命的反动，是人类历史上一场巨大的灾难。在俄罗斯人眼里，列宁斯大林创建的苏联，就是俄罗斯和其它各族人民的大监狱。而所谓的中国的社会主义，不但源自苏联，在野蛮和血腥上，比起苏联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此一个蛮不讲理的野蛮政权，当然最忌讳“宪政”了。

在“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宪政”这五个体现普世价值的关键词中，中共对其它四个词早已先后脱敏和解禁，唯有“宪政”至今仍然是中共执政后的一大禁忌。1949 年之后，从中共 8 大到 18 大的历届政治报告中，全无“宪政”二字之踪影。

上海《东方早报》2012 年 5 月设立了“宪政启蒙”专栏，由童之伟教授和张千帆教授轮流供稿。然而，开办不到一个月，就被当局生生叫停。

《炎黄春秋》2012 年第 12 期刊登了“改革共识论坛”上部分论及宪政的发言，原本预定在 2013 年第 1 期上后续刊出的发言，被当局下令不准再登，胎死腹中。

2012 年 12 月 4 日，中共在人民大会堂集会纪念宪法（82 版）公布施行 30 周年，习近平在会上发言要求维护宪法权威，捍卫宪法尊严。那么习近平为何只提宪法，禁提宪政？其实，中国现行的宪法肯定了所谓的“四项基本原则”，这也正是习近平“任尔东西南北风”都要坚决捍卫的东西。习近平只搞选择性行宪，只抓“四项基本原则”，却罔顾人民的基本权利。要实现宪政，其宪法就不会再允许中共的“一元化领导”。这便是习近平最想抵制的政治改革。由此可见，那种把习近平要尊重宪法，误读成“宪政梦”是多么滑稽。

十天之后的 2012 年 12 月 14 日，包括张千帆、江平、张思之、贺卫方在内的 70 多位中国学者发表《改革共识倡议书》，呼吁中国社会对改革的方向达成宪政共识。倡议书对现行宪法序言做了专门的说明，认为“1982 年宪法序言明确规定了‘共产党领导’，但是‘领导’

并不等于全面包办或直接干预政府事务”。该倡议立即遭到来自官方的打压，网络相关言论被删除。2013年5月以来，《红旗文稿》、《环球时报》、《光明日报》及《人民日报》等官方媒体连续发表反对宪政的文章，掀起了新一轮宪政问题讨论。在这场讨论中，前述倡议书的部分联署者改变了意见，认为现行宪法存在内在矛盾，应该修改。

2013年元旦，北京《炎黄春秋》杂志发表了社论，题目是《宪法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共识》在1月10号上午突然被封网。2013年元旦，在广州的《南方周末》发表了新年献词，原本《南方周末》编辑部的戴志勇已写好了《中国梦，宪政梦》。他是这么写的：“兑现宪政，限权分权，公民们才能大声说出对公权力的批评；每个人才能依内心信仰自由生活；我们才能建成一个自由的强大国家。”不料这篇《中国梦，宪政梦》被枪毙了。

2013年5月21日，互联网上出现《求是》杂志的子刊《红旗文稿》首发杨晓青的《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打响反宪政第一枪。该文开宗明义反对《南方周末》提出的“中国梦，宪政梦”，称宪政属于资本主义，并坚决反对“宪法和法律至上”。

其实，民主、宪政是人类的共同梦想。古希腊人早就开始了对法治与宪政的探索，而古代希腊的城邦民主制度正是从西亚的腓尼基人那里借鉴的。可见，民主宪政与西方文化之间是不能划上等号的。宪政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用法律的形式限制统治者的权力，“把权力关进笼子”。因为统治者一旦握有无限的权力，就会祸害百姓。宪政产生于对统治者握有无限权力——也就是专政（或曰独裁）的反抗。这种理念第一次付诸实践当数1215年订立的英国大宪章。13世纪的人不可能有什么“资本主义”。所以，宪政并非“资产阶级”的专利。

宪政是专政的对立物。列宁定义的专政，就是统治者不依靠任何法律而直接凭借暴力实行的统治。而宪政并不全盘否定统治者的权力，但要求这种权力必须受到法律的授权和规范，按照一定的程序，有限制的行使。宪政的精髓是立法依据公民意志、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依法治国。台湾的民主成功至少也证明中国文化决不是与民主制度冲突的，“国情”之说已彻底破产。杨断言“宪政不符合我国的国情”，因为中共的宪法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品尝过“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的人都见识过“不依靠任何法律”“直接凭借暴力”的专政。毛泽东“动一动小指头”，直接招致刘少奇林彪的灰飞烟灭。仅因刘少奇问题而受株连的“案件”就有2.6万多件，被判刑的达2.8万多人。按照叶剑英副主席1978年12月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说法，“整了1亿人，死了2000万人，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令十多亿人不寒而栗。“六四”杀爱国学生，根据“宪法”哪一条？任意拆迁，《物权法》不过是装璜。这就是杨的所谓“国情”！贺卫方说，“杨言之价值就是清楚地告诉我们不要再抱幻想，让我们知道，建设一个宪政中国最关键的障碍何在。同时也让我们反思，过去30多年改革开放实践与理论所回避的一个死角在哪里，社会中的种种弊端的根源是什么。”评论员李铁则说，“杨晓青火了，她在党报发表文章，说宪政只能资本主义搞，社会主义不能搞。也就是说，要搞宪政，得先把社会主义灭了。”

中共用资产阶级或西方来贬低宪政，殊不知自己根本没有制度文明的野人。过去假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其实其观念还处于野蛮的皇权专制时期；而现在则是最卑鄙最无耻的共党“权贵”而已。哪有资格抨击以宪法为规则，以宪政为宗旨，讲遵纪守法的资产阶级？毛泽东毫不隐晦地说过，他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秦始皇意味着什么？私权而已。李鸿章在为李提摩太译作《泰西新史揽要》一书作序时写道：“我邦自炎农唐虞以前，以天下为公；嬴秦而降，以天下为私。以天下为公则民主之，以天下为私则君主之”。毛泽东哪里会喜欢秦

始皇？其实是喜欢私天下而君主之！“君主之”在中国从来就不缺少信徒，嗜权如命者朝野皆有。只要毛泽东阴魂不散，“党主之”就将继续下去；宪政连梦想都不行！

2013年5月22日的《环球时报》则发表社论，指责“宪政”最终是要削弱、否定中国既定的发展道路，实际上是绕了个弯，用新说法提出中国接受西方政治制度的老要求。

2013年5月29日，《党建》杂志发表郑志学的《认清“宪政”的本质》，称“‘宪政’主张指向非常明确，就是要在我国取消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政权”。“郑志学”是“政治学”谐音，他企图用“颠覆”罪来否定三十年来中国法学界、政治学界的成果。

从1990年代到2000年代，宪政派已经在法学界占据主导地位，受其影响，李克强在2004年，李源潮在2006年，温家宝长期以来都曾经讲过宪政话语。中宣部批宪政，不仅仅是与自由民主宪政派为敌，也是与身居院长、所长、主任的法学界权威人士为敌。更不要说他们把讲过宪政的现任和离任高官置于何地了。红二代发言人张木生就嘲弄眼下官方意识形态对于中国特殊性的过分强调，他的名言是：不能因为别人都说要吃饭，就偏说我们要吃屎。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许崇德在《宪政是法治国家应有之义》一文中说：“宪政即民主的政治。”“片面地把宪政定义为资本主义，又编造出宪政提法会招致西化的神话，误导舆论，欺蒙领导，挥舞大棒其意欲重启反右派运动的作派很不合时宜。”“否定宪政”的思潮“对我国宪法危害更烈”。如果“否定宪政”的思潮泛滥成灾，中国的下一步，就会有人公开地、高声地要求“恢复帝制”。宪法不是纲领，不是规定未来的奋斗目标，宪法的每一个条文，都必须实行，这就是宪政。在闭关自守的农业经济时代，没有宪政、没有法治，国家依靠帝王的权威，可以维持社会生活中的某种道德秩序。在工业经济时代，当经济发展时，人们中弥漫着“一切向钱看”的风气时，没有宪政、没有法治，必将使全社会的道德风尚愈来愈低下。中国现在贪官污吏、假冒伪劣层出不穷，其根源就是没有宪政、没有法治。现在对贪官污吏的“双规”，也是违反宪法第37条的。事实上，今天中国宪法，仍然有许多不民主、不完备的地方，现行宪法中有许多“非法律用语”，如“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用“鼓励”、“提倡”、“将要”的语句——“鼓励自学成才”、提倡五爱、“将继续在共产党领导下”“将来时”语句，以及“军委主席”与“国家主席”职位的分离等等文字和条款，都需要修改。实施宪政，还包括按照宪法规定的程序修改宪法。

厦门大学法学教授、以民法见长的徐国栋更痛斥反宪政者是挑战人类文明底线。“宪政不仅近代有，更可追溯到古代。柏拉图《理想国》译名大错，《论国家》也不对，其原意就是《论宪法》。西塞罗《国家篇》也应译成《论宪法》。《罗马政制史》其实就是罗马宪法史。杨晓青郑志学之流的文章是对整个人类历史的无知，挑战底线。”

李步云更声称，“李光耀一本文集封面印上我国某领导言论‘民主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还有人鼓吹‘人权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这都是欠缺基本理论常识所致。民主与人权当然具有抽象性普遍性，不能以经济水平落后、特殊国情而加以反对。”

最高法院前办公厅主任周道鸾则聚焦司法改革，痛批中国司法改革十年来停滞不前，司法对外不独立，对内也不独立，司法地方化行政化，只有审理权力而没有审判的权力，只有行政编制没有法官编制。现在是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最佳时机，只能前进不能后退。

5月30日《党建》发表《不能把宪政作为我国基本政治概念》；5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西方那套理论不反映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一文，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角度亮明反对宪政的立场。6月1日《求是》杂志发表署名夏春涛的文章《思想西化，党和国家就会走上邪路》，将提倡宪政作为西化的代表，是要使中国走上邪路。6月13日《红旗文稿》发表了汪亭友《对宪政问题的一些看法》，再次将宪政归结为资本主义的统治工具，并称“西方国家恰恰是寄希望于中国宣布实行宪政，从而以之作为突破口，逐步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对上述文章的广泛转发，加上其他文章，构成第一个批宪政高潮。

第二次高潮出现在2013年8月。8月1日新华网奉命转发了王小石一篇博客文《中国若动荡，只会比苏联更惨》，此文为中国宪政描绘了可怖前景，不但引起众多中国网友批评，也令俄罗斯人惊愕。8月5日、6日、7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在头版“望海楼”专栏连续刊出署名马钟成的文章：《“宪政”本质上是一种舆论战武器》，他认为宪政是一种工具，是美国人用来瓦解社会主义国家、共产主义国家，瓦解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武器、一个心理武器、一个政治武器。《美国宪政的名不副实》，无法与社会主义兼容。他在中国反宪政，却反到美国的宪法去了。《在中国搞所谓宪政只能是缘木求鱼》。这马钟成就是忠诚马克思主义的这么一个人，马钟成写了三篇文章，他批评美国的意味很重，反对宪政。8月19日和20日，求是理论网又接连从海疆在线网转发了高翔的《宪政潮是对十八大精神的挑衅》和郑里的《“宪政”理论是对中国改革的干扰和误导》。这一组文章来势凶猛。

反宪政者将宪政的内涵归纳为：第一，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第二，司法独立，违宪审查和宪法法院。第三，多党轮流执政。第四，议会财政。第五，有限责任政府，即小政府大社会。第六，自由市场经济。第七，普世价值，包括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西方价值观。第八，军队国家化。第九，新闻自由。如此反对不外乎三个理由：不符合马列主义、不符合社会主义、不符合中国国情。反宪政的人们表面上打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的三面红旗，实际上他们只需要打出蒙昧主义这面旗帜就够了。

1970年代末中国步入“改革开放”以来，蒙昧主义主旋律一直用三种试剂鉴定一切事物：是马非马、姓社姓资、是中是西。他们立下的标准是，非马列的东西不能要、西方的东西不能移植、姓资的东东是毒物，然后要求专政机关用专政手段将这些东西都灭掉。这样的“主旋律”实在蒙昧得可笑！因为稍微有点常识、稍微懂点逻辑的人，都知道这三种试剂互相排斥，不能用到一块。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肯定都是西方的、而不是中国的。按照“是中是西”的鉴定结果，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在剿灭之列。孔孟之道和拜祭祖宗等“中国特色”，肯定都不符合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按照“是马非马、姓社姓资”的鉴定结果，孔孟之道和拜祭祖宗等“中国特色”也都在剿灭之列。三者互相矛盾，互相抵消，互相剿灭，其实最后剩下的，就是他们觉得哪个符合自己的利益，就行了。其实，这是毫无标准可言的。

2013年6月10日，冯崇义、杨恒均的网文《拒绝宪政是断绝中国的前途》，作者认为“反宪政体现现代蒙昧主义”，“实际上，中国不是要不要承认宪政，是否可以否定宪政，而是中国已经到了不作出宪政民主的制度安排，就会彻底糜烂，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6月21日，网络上出现被多次转发的蔡霞的《推进宪政民主关键在党症结也在党》一文，这篇近3万字长文，征引大量史料。作者称：“如果再不下决心启动政治改革，推进宪政民主建设，社会矛盾的激化将使执政党丧失改革的可能机会，政府也不再会有回旋余地。”

2013年8月9日《经济观察报》发表了胡德平的文章“破解《旧制度与大革命》之问”，8月11日党媒《人民网》等转载时，将标题改为“胡德平谈读《旧制度与大革命》：绝不可忘记过去革命”。胡德平说：文革时“当党中央已经无民主可言，宪法等于一张废纸，刘少奇手持宪法，都无法拥有主席的发言权。”他还说：“有宪法必有宪政，无宪政，宪法也不神圣。这是惨痛经验的总结。”文章最后警告：不改革可能会发生革命。

胡德平之后还发表文章说，毛泽东1940年说的“像现在的英、法、美等国，所谓宪政，所谓民主政治，实际上都是吃人政治”这些话，被现在某些人翻出来后，用以否定宪政。德平说，这是1939年8月苏德签署《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后，共产国际向各国共产党发出指示，将德国和英法的战争定义为帝国主义的战争，暴露双方制度的吃人本性。毛是从共产国际指示出发，才讲了“英法吃人宪政”这过激的话。在抗日战争中，毛的宪政观十分明确。1940年毛泽东起草通电《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言及“政府宜即开放党禁，扶植舆论，以为诚意推行宪政之表示。昭大信于国民，启新国之气运，诚未有急于此者。”习近平一上台，就大反宪政，恰恰是数典忘祖、倒行逆施的荒唐之举。就在1940年2月20日的宪政促进大会上，毛泽东说：“我们今天开的这个会，叫做宪政促进会。为什么要‘促进’呢？……就是因为有些人，他们不进，躺着不动，不肯进步。他们不但不进，而且要向后倒退。你叫他进，他就死也不肯进，这些人叫做顽固分子。……现在的宪政，也是这样。要是顽固派仍然反对宪政，那结果一定和他们的愿望相反。这个宪政运动的方向，决不会依照顽固派所规定的路线走去，一定和他们的愿望背道而驰，它必然是依照人民所规定的路线走去的。这是一定的，因为全国人民要这样做，中国的历史发展要这样做，整个世界的趋势要我们这样做，谁能违拗这个方向呢？历史的巨轮是拖不回来的。”毛泽东在70多年前的这番话，就好像是说给后生小子习近平这一顽固分子听的！连不少“红二代”都认为：习近平反宪政的举动败坏了共产党赖以维系民心的理论根基，起到了“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反作用。

于建嵘说：“反对宪政，就是否定人类政治文明。因为这是全人类的，不是一个国家的，宪政的核心价值是保障民权、限制公权，要求任何组织和个人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这是现代社会的基本规则，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反对宪政就是在为滥用公权张目，就是在为贪腐背书，就是在为回归封建专制制造舆论，就是企图把中国引向社会动荡。”

反宪政言论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危害。一是破坏宪法效力，助长宪法虚无主义。2013年8月22日影响力中国网首发了张千帆的《宪法实施与长期执政》，称：“反宪政必然意味着反宪法”。他批评反宪政论者是“要把宪法沦为无需落实的政治口号、说了不算的一纸空文”；是在告诉国人宪法“只是欺骗人民的文字游戏”，“国家权力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社会主义不讲依宪法执政，不讲宪政？那么社会主义怎样治国，像毛泽东说的“和尚打伞，无法无天”？4月13日燕赵都市报《近期3名维权农民被碾死均被迅速定性为事故》：3月27日，河南中牟县农民宋义和在自家承包地里，试图阻止闯入的开发商铲车，被碾压致死；3月30日，湖北巴东44岁农妇张如琼，在与当地高速公路施工方交涉时，被施工人员驾驶水泥罐车碾头而死，现场惨不忍睹；4月3日，四川西昌市64岁村民宋武华，被重钢西昌矿业有限公司的推土机碾压致死。连人命关天都置之不理，宪法根本就不被众多官员所遵守。

反宪政言论第二个方面的危害是：颠覆政体合法性基础，使执政权力丧失法律根基。国家权力必须来自法律授权，法律赋予国家合法性和权力正当性。如果宪法是一纸空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存在合法性都会有疑问，那么它们通过的法律也没有正当根基。换言之，假如真是按照反宪政论的主张，那么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完全没有法度的国家。

反宪政言论第三个方面的危害是：破坏了社会稳定，动摇长期执政的社会基础。如果宪法没有效力，政府权力不受宪法约束，人民的宪法权利得不到保障，那么平民百姓的基本利益就处于朝不保夕的状态，随时都可能受到公权力剥夺。有企业家正在抛售股票，想一切办法将资产转移海外。政治倒退引发企业家的不安全感，大量企业会出现雪崩一样的撤退、抽逃资金，以规避政治迫害的风险。这样的无宪政无法无天的社会不可能幸福、安宁、稳定，而是必然充斥着怨气、不公、仇恨和冲突。社会悲剧和恶性事故此起彼伏，集体上访和大规模群体性事件愈演愈烈。试问这样的国家如何统治？长期执政如何可能？

中共反宪政的本质就是保权贵、反人民。北京市委宣传部长在 2013 年高校暑期哲学社会科学骨干学习班上的训话：“一、今后高校教师若敢批评党和政府，评职，课题一票否决。二、批评党的人丧尽天良，党给你吃给你喝，你还骂党？三、号召高校教授开博，拥护党，干得好的，给予奖励。四、什么人才搞宪政？满清，袁世凯，国民党蒋介石，晚清推动宪政，结果灭亡了；袁世凯推动宪政改革，结果也灭亡了；国民党推动宪政改革，最后被共产党打败了。我们共产党能搞吗？”表面听起来这好象蛮有道理，但是实际上经不起推敲。中国过去 100 年的宪政改革失败了，并不意味着中国未来的宪政失败。放眼地球，世界上的现代发达国家中，没有哪个不是宪政国家，都是宪政让它们进入到了富强、良序的国家行列。为什么自然资源更丰富的拉美远落于美国？公元 1500 年，拉美拥有整个美洲的最高级文明形态，而美国还是一片荒蛮之地。1800 年拉美跟美国还相差无几，而今天拉美人均 GDP 仅为美国的 1/5。拉美缺乏宪政体制落后于美国的关键因素。

旅美政治学者方绍伟对此评论说，这场“宪政争论”是中国政治改革道路冲突的一次总爆发，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宪政的含义其实可以简单归结为搞“党在法下”；其实就是要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根本，解决“党天下”无法无天、鱼肉国民这个大问题。“社宪派”要改良，“西宪派”要革命（不一定是暴力革命），“反宪派”则什么都不让。“西宪派”和“社宪派”中以为“中央还可能不同声音”的幻想可以破灭了。

20. 习近平给国人穿“破鞋”

习近平 2013 年 3 月 23 日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抛出了一句鞋子论，“我们主张各国和各国人民共同享受尊严，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着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中共媒体乍闻此言如获至宝，认为涵义深刻，充分体现了新一届中央的“三个自信”。但这句话的真实意思不过是说，中国的政治制度是好是坏容不得别人多嘴，只有永久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党和政府”说了才算。

习讲鞋子是否合脚，不必外人去说三道四，应问穿鞋的人。这话不错。脚是鞋子的标准，人是万物的尺度，在某种程度上，这层意思本来也是不错的，但万不可绝对化。习把这句话用错了地方，把制度、道路这些具有公共性、普世共性、各国均可相互参照相互学习的公共事务比作他人莫问的私人“鞋子”，这种比喻既无理，又蹩脚，完全不恰当，十分荒谬！凡是喜欢用不恰当的比喻的大凡都是骗子，习近平就是这样一个大骗子。

既然合脚不合脚的定论，应由穿鞋者回答，穿了中共多年鞋的任何人，都有资格与权利来说评说中国的手艺和鞋德。毛泽东给中国人造的鞋，用马克思的招牌，列宁的样式，苏维埃的

符号，而且还是一双跑鞋，他吆喝当时 6 亿人大跃进去超英赶美，却把山砍光，不许人逃荒，饿死 5 千万。之后又不断内斗，至少付出 8 千万的人命代价；才改穿邓式鞋。而这邓式鞋最合部份权贵的脚，权贵们说今天这鞋合脚，出现众多暴发户、亿万富翁，如：江泽民家的电讯、曾庆红家的能源、李鹏家的煤和电、周永康家的石油、贾庆林家的京城房地产、李长春的文化产业、陈云后人的银行金融、朱镕基后人的证券融资、王震后人的金融投资和军工贸易。但大众却穷的叮当，人民总觉得是在穿小鞋，难受。因共官贪腐横行，无恶不作，百姓有如穿上三寸金莲的小鞋，痛得 13 亿人民天天在呼在喊，逼出群体反抗运动无日无之。中共每年虽花 7 千多亿维稳费，中国社会却越维越不稳。习近平问过那些上访喊冤涌向北京的上访户，你们的鞋，合他们的脚吗？灰霾（锤南山说雾霾应改称灰霾）将半个中国弄得乌烟瘴气，上万头死猪变黄浦江为“猪”江，这生态鞋，也合中国人的脚？南非的种族隔离早取缔了，你们的城乡隔离制仍坚持，农民穿你们的歧视隔离鞋也合脚吗？可见，由“习共党穿了合适的鞋”，推不出“所有中国人或大多数中国人都得穿这鞋子”！现在，习近平上台，给中国人制造了一双中国梦的法西斯梦鞋，更是一双通向死亡的乌托邦鞋。

习的鞋论是想以中国特色的鞋，去抗御普世价值而已。拥有普世价值的民主宪政制度，恰是最灵敏的反应脚的痛痒机制。因为那些代表民意的议员，是民选的，天然就要反映民意民声。他不代民发声，民众的鞋不合意，脚被挤痛夹痛，议员就会被罢免下台。而中共却是相反的，人民代表是任命的，只对任命自己的上级官僚效忠，怎会去关注与反映民众的痛苦与需求？那么，这民众不合脚的愤懑与怨恨，就只能陈积到难以忍耐时去上访去投诉。人家有宪政民主，传媒舆论也可为民发声，而中共传媒全面垄断，只许充当党的喉舌，只准赞党，于是，民怨沸腾，群体事件蜂起。中共镇压反抗的民众，外国批评，习用“鞋”论抵挡。

习的潜台词是：“鞋子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中国的体制已经被我们脚实践了，适合得很，外国人（美国人）没有资格说三道四、指手画脚？不仅没有资格，也没有相应的知识基础和切身感受：中国特色的鞋子又没强迫你们西方人穿在脚上，凭什么说它不合中国人的脚呢？”依然是那副“吃饱了撑的”山大王“骂大街”的架势。这种“骂大街”鄙俗俚语，毫无道德文化理念，毫无现代文明意识，习拿来为离心离德的中共政权遮羞，一切作恶多端的法西斯杀人狂也可以用这句话对自己伪装，这是面对普世价值大潮无地自容的拙劣狡辩。

鞋子论完全是理屈词穷的无奈推诿，是失败者的哀鸣。当年马列被苏共强行灌输给中国的时候怎么没人嗷嗷鞋子论？老毛疯狂颠覆东南亚、非洲的时候怎么没有鞋子论？邓小平敞开大门改革开放的时候怎么没鞋子论？因为那时候愚昧的中国还不知道特色的道路已经山穷水尽。今日习近平企图用鞋子论麻痹觉醒的中国人是不可能的。人民的脚是不可以任何意志改动的，不可能让人民的脚缩小了去适应共党的破鞋子。只有换一双新的鞋子，来适应人民的脚。人民不高兴的时候一到，就会踢开共党独裁的旧鞋，穿上一双宪政的新鞋。

从毛泽东搞马列破产，到邓小平的特色修正主义打左灯往右拐，到胡锦涛的和谐社会千万别翻船，再到习近平的模糊破鞋子论，就是一句话，马列主义破产了！中国的政治骗子们就鼓捣出特色、代表、和谐、破鞋子论企图蒙混过关。这句话的出笼，体现了中国被世界孤立的自我解嘲，体现了当局对中国价值观的胆怯，习的论调好比辩手被对方驳的体无完肤。这显示：中国的独裁者真的走到山穷水尽开始语无伦次的境地了。中共若不脱下专制独裁的鞋，不仅永在世界孤立，也难走进现代世界文明国家之列。

21. 习总宰制羣众

在马列经典和共产国际文件中没有群众路线。这个概念的发明权属于中共，发明者是毛泽东。

“群众”自古是专制帝王对百姓的贬称，意谓百姓是需要有人领导的一群乌合之众。《史记·礼书》有“宰制万物，役使羣众”。中共发扬帝王思维，于 1929 年 9 月 28 日开始用“群众”一词代称百姓。林彪说：“主席就是最大的‘群众’，他一个人顶亿万人，所以和他的关系搞好了，就等于对群众搞好了，这是最大的选票。”《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第一次提出了“群众路线”这一“秦始皇加斯大林”的概念。此后毛泽东集大成，成为最擅长“群众路线”的中共领袖。在延安整风的“审干运动”即“抢救失足者运动（即抓特务运动）”中，“群众路线”经过文字修饰和理论概括，被载入《中共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然后全面阐明于七大。毛的七大报告和刘的《修改党章报告》，都对它用浓墨重彩作了表述。它随后在华北各地斗争地主的土改运动和党内军内的“三查三整”运动中发挥了威力。到了八大，它被邓小平在《修改党章报告》中重新提出。但“大跃进”之后，邓小平把“群众路线”贬为“大轰大嗡”。群众路线在文革中走到顶点。

群众路线，本质是无产阶级专政，形式是人民民主。群众路线和群众运动可以配套成龙，水乳交融，合二为一。群众路线的所有权不属于公民，它属于党，只能专门属于党。共党宣布，群众路线姓“社”，公民社会姓“资”，两者是水火不相容的。群众路线和公民社会，的确风马牛不相及。所以，在需要实行群众路线的地方，一定不允许公民自由选举，不存在自由的公民舆论，不欢迎公民监督。所以，在需要凸现党的领导、凸现社会主义的时候，特别在需要讨伐不同的声音的时候，群众路线就应运而生，是得心应手百依百顺的传家宝。

群众路线还有一个小小的妙用。邓小平在五十年代的某一次正式会议上说的而且正式登了报的，大意是：大家决定，有个好处，错了大家负责。领导的责任被推得一干二净。

如果说，中共为革命党时，将没有加入共党、共青团组织的百姓称为“群众”，可以理解；但建国后，中共国的四部宪法（1954 版、1975 版、1978 版、1982 版）都承认国人有公民身份，中共就应该放弃必引发阶级斗争的“群众路线”了。称宪法保护下的百姓为“公民”，显然要比叫“群众”多一些尊重。而“公民社会”，更比“群众路线”科学。

众所周知，中共国宪法中，“群众”指群体，而非个人。习近平重申毛泽东的“群众路线”，证明了其心中没有活生生的具体的中国人，只需要习来当领袖的乌合之众。习这般留恋毛氏“群众路线”，表明他从未有自由民主意识。在 1954 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群众”出现 11 次，皆是作为区分与国营经济团体有别的民间经济群体，并非指个人，如“合作社经济是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其中“公民”出现 36 次，皆是界定个人权利。到了“宪法 2004 年修订版”，“群众”下降为 9 次，“公民”增加到 51 次，全是关于保护国民个人的权利与义务。这也就是说，经过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逐渐告别毛泽东时代以“群众”为标志的臣民社会，走向公民社会。这一趋势即使在胡锦涛时间，也没有倒退。而在习近平“登基”后，倒退到连“公民社会”都不许在大学课堂讲！

习何以亲“群众”远“公民”？因为羣众好宰制！或许因为宪法赋予“公民”许多明确的自由民主权利，而这些权利是中共被迫写上装门面的，从不想真正实行。如“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若实施，中共必无法搞党天下。所以“公民有言论、出版、

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至今都不予兑现。如若“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实施，还会有遭强拆者自焚吗？若“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落实，还会有截访、黑监狱吗？

在 2013 年 4 月 19 日政治局会议上，习近平强调，这次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主要任务聚焦到作风建设上，集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6 月 18 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强调“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要求党员干部要“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进行“大扫除”，这是整风运动的开始。“洗洗澡、治治病”的幼儿园用语意在告诉 8 千多万党徒：不要害怕，我不搞运动整人；并限定整风层次为“县处级以上干部为重点”。

习希望在红朝历史上占住“中兴之主”的坐标，因此会追求更好的政治形象，最后的结果就是形式主义超乎官僚主义与享乐主义。“群教”运动本是搭一个形式主义的大舞台，哪有不上演形式主义节目的？说“群教”是要“集中解决形式主义”，岂非习白痴痴人说梦！中共官员开口就是“用脚丈量民生、用心贴近民意、用情化解民忧、用力赢得民心”，可见一个空前的“群教”形式主义灾难已经到来。以至于 6 月 1 日网上有了一个部队干部以《关于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几点思考》叫苦连天：“在我们部队就因为有的战士不爱听报告而讲出了‘不怕飞机加大炮，就怕政委作报告’的怪话。”

享乐主义在党内普遍化并流行社会，反映了整个体系的末日心态。共官说：“我们共党一党还弄不好，再来多党就更乱了！中国就这德性，中国人就这命儿！”既然每一天都可能是共党的末日，那么，在吃喝玩乐中渡过每一天，也成了党官的普遍心态。从原铁道部长刘志军到 2013 年春泰州官员因享豪华公宴被民众围堵的处级干部都是此类心态者，尽管后者被围堵时给百姓下跪求饶。疯吃豪喝已经不是作风问题，而是信仰危机的表现。

习近平一面要求其属下艰苦朴素、“反对四风”，一面自己带着夫人海外华丽亮相，频繁换装，其奢靡风头不仅超过中共历代党魁，还要借公共资源媒体肉麻捧彩“第一夫人”，岂不是自我掌掴，自我讽刺？习主席大搞父亲的纪念活动，挥霍公款，劳民伤财！可见：习近平倡导的“八项规定”只是“选择性勤俭”，“马列电筒只照他人不照自己”？

在 6 月 22-25 日连续 4 天政治局会议上，习强调必须维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政权安全大局”；“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带头自觉维护中央权威，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即绝对服从习。习的独裁已使常委们开会死气沉沉，没有人敢表示异见。

7 月 1 日，中共省委书记胡春华召开全省工作会议，在会上响应习近平“除四风”。7 月 2 日，中共喉舌新华网等对此转载报导。7 月 2 日，一度“摇摆不定”的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向习近平紧急低头，在召开“整风”会议上称，要敢于揭短亮丑。

面对腐败问题猖獗，2013 年 9 月 23-25 日，习近平亲自坐镇，河北省官员互相揭短，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被笑称为新时代的“批斗会”。“批斗会”播出后，官媒以文革方式突出报道这些官员如何“很斗私字一闪念”，比如“省长张庆伟自我批评：在八项规定前，我也讲排场摆宴席”、“纪委书记批省长不尊重干部”、“宣传部长自我批评：春晚花 330 万请大腕太浪费”……官媒大肆吹捧，刻意暗示党内民主有新进展。但是，民意不认同，有在基层工

作的河北低阶官员说：“几个（省委）常委都装得很像，真事儿似的。你怎么不说组织提拔方面的事情？不说常委们安排了多少自己的人呢？”更有人举例说：前政治局常委贾庆林的三弟勉强在次等高中毕业，但一边做生意一边当官，已经在河北省官至正厅级，任省属渤海开发区常务副主任。据说，贾的三弟已经“拿到了习近平那样的博士学位”。

习借整风驱逼地方势力臣服中央。习推出的领导干部“批评与自我批评”生活会，沦为欺骗与自我欺骗的“互哄会”。在生活会上，大家都避重就轻走过场，最后都皆大欢喜，大家都是贪官，谁没有把柄？事实上反对党就是最好的监督机构，包脓养疮是任何团体和个人的本能。批评与自我批评方式，填补了没有反对党的纠错机制，但自从“统一思想”的歪理出来后，批评与自我批评迅速演变为表扬与自我表扬，结果自然是你好我好，满园长草。

法国赛尔奇·蓬多瓦兹大学副教授张伦说：“这次在河北召开的民主会，虽然叫民主，但与我们理解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是风马牛不相及。它不是尊重公民权利，通过一个有效的、健全的、符合宪政原则的方式来选举领导人、监督领导人。习的这样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不仅不能解决问题，从长远角度看，只能进一步使问题恶化。”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毛泽东时代治党的法宝，在毛时代后期更是整人的法器。习近平这一做法被外界称为中国官场的“文化大革命”。中共历次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运动无非是让中共各级“干部和群众”彼此承认自己是坏蛋或混蛋，只有中共现任党魁是伟光正的，坏事或错事都是党魁下面的人干的。而且中共发动的历次“批评和自我批评”运动都是以残酷打击批评者而告终。例如：延安整风杀了反对特权等级制的王实味；1957年整风导致数百万人被打成右派，中共至今拒绝道歉，拒绝做出一分钱的赔偿，甚至拒绝补发“右派”分子一分钱的工资。

习近平 10 月再度援引毛泽东称赞的 1960 年代的“枫桥经验”，能让百姓不需要上访就得到公平与幸福。更给人以刻意回归“前三十年”的正统老路之感。

2013 年 8 月 22 日，湖南网民杨盛响应习提出的“要容得下尖锐批评”的号召，发帖劝谏习不要学毛泽东。在 QQ 群里上传了他自撰的对联，上联：“子骑父作马，父愿子成龙，梦想实现。”下联：“君欲国维稳，国盼君宪政，倒退学贼。”杨盛还为这副对联配上了两幅图片，一幅是习近平的出巡照，附上他的一条语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放在这幅图片下面的另一幅图片是已故的习近平之父、中共元老习仲勋文革时被挂“反党分子”牌子遭游街批斗的历史照片。这条图文并茂的帖子上传后刚两个小时就被网监删除。9 月 5 日晚上，邵阳市国保将杨盛从家中带走，随后邵阳警方发布了对杨盛行政拘留 9 天的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称杨盛在 QQ 群中下载图片并配以诗词，“在网络上公然侮辱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志，在网络上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

罗茜认为，杨盛在网上发表的对联没有侮辱习近平之意，主要是敦促这位领导人实行宪政。杨盛的“倒退学贼”一语，只是在委婉的规劝习近平不要走毛泽东的文革老路，网络上常见批评者将毛泽东称为“毛贼”。他表示，邵阳市警方采用文革的斗争方式来解读，是“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像造反派斗走资派那样不准对方说话分辨。

现年 57 岁的杨盛在 89 民运期间参加邵阳市工人自治联合会，后被判刑坐牢半年。邵阳市工自联当时的主要领导人就是 2012 年 6 月被官方认定上吊自杀、但留下许多明显疑点的李旺阳。2009 年 11 月 26 日，邵阳市政府管辖的武冈市常务副市长杨宽生的跳楼自杀案也是疑点重重，留下许多悬念。当时在家乡担任中学教师的罗茜因为质疑官方作出的杨宽生自杀身

亡结论和帮助死者遗属维权而被劳教两年。

22. 共党对抗普世价值

“价值”是衡量人类行为善恶的道德准则。不同的人类社群可能产生不同价值。例如古代中国所实行的“三纲六纪”，规定君对臣民，父对子女，夫对妻，都有绝对的统治权，包括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同时规定“男女授受不亲”，即男女之间不可随意交往。这些人伦准则，在古代希腊雅典城邦就不存在，因此这些价值是中国社会所特有的即“特色价值”。

普世价值是人类共同崇奉的文明价值，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共同诉求。特别在全球化时代，普世价值的认同对于各民族国家和谐相处无疑是一个文化前提。人类有区别于禽兽的共同特性即所谓“人性”，例如：趋利避害、珍惜生命、惻隐之心、对真善美的追求等等；正是这些共同的本性，人们才可能相互勾通和交流，才能够通过交流勾通而取得谅解和共识，从而形成一些普遍性的价值观即普世价值。譬如：在人与人交往中，要求不许说谎（即诚信），是任何不自取毁灭的族群都必须遵守的，因此，这类价值就具有普遍性或普世性，可称之为普适的或普世的价值。自由、平等、人权、正义等，跟吃饭、性交、追求美等本能一样，是不分民族和地域的，是普适的普世价值，因此也是绝对的。

人类社会其实只有两种规则，一种是“丛林法则”，另一种是“非丛林法则”。“丛林法则”指的是一个社会遵循弱肉强食的规则，武力成为决定命运、决定生死存亡的决定性力量。而“非丛林法则”就是“普世价值”，是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博爱宽容等等。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半“普世”文化，最皮毛的体现就是“天人合一”，强调遵循“天理”良心。中国古代的帝王均称“受命于天”，是要讲“天理”的，这就限制了皇帝滥用暴力，也即是与“丛林法则”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能够胡作非为、欺凌民众。辛亥革命之后没几年，马列主义传入中国。马列主义是世界上最有高度、最有影响力的“丛林法则”；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唯物无神，无一不与“丛林法则”相吻合。马列主义算不上什么宇宙真理，因为马列主义本质上属于“丛林法则”，偏重于人类的兽性罪性，甚少体现人类的善性。

自由、民主、人权、宪政起源于西方，是人类共同的财富、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与共同梦想。却被中共坚决拒绝了。拒绝了普世的民主理念就没有任何民主。空喊“社会主义民主”而拒绝西方民主的邓小平，说完了一切动听的言辞之后就是开枪屠杀。中共不承认人权原则的普适性，拒绝世界舆论对他们的谴责。在他们看来，只要强调所谓的“家有家法”的特色，就可以置任何普适原则于不顾，就可以为所欲为了。这是一种十足的流氓家天下的逻辑。

1994 年前后，中美入世谈判最艰难的时刻，美方突然向中方提出：在全世界都实行双休日的今天，中国必须尊重人权，也给中国人双休日，并把这一项作为入世条件之一。1995 年 5 月 1 日后起我国开始实行双休日工作制。李光耀在 2001 年 1 月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说，“某些儒家价值已经差不多过时，遵循儒家传统的社会要紧随全球化的步伐前进”。李光耀承认“英国殖民地的价值”，并且声明“主动走出去满足全球化的标准”，实际上就是承认“全球价值”。2007 年 2 月 26 日，温家宝说：“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温的讲话中有问题。一是“科学”是价值中立的，不属于价值范畴。二是“法制”应改为“法

治”。温多次讲普世价值时，总是以“社会主义”、“党的领导”为前提的，像司法独立、新闻自由、财产公开等民主措施都要在“党的领导下”，那是自相矛盾的大丑闻！

实际上，我国社会的价值准则体现着普世价值的诉求。国内有些人，刚开完北京奥运就攻击普世价值。北京奥运的口号是什么？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这不是普世价值是什么？可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在 2008 年 10 月的一次会议上强调：“我国有一些人大讲要与‘普世价值’接轨。”“我们要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不搞任何盲目崇拜，不能将西方的价值观念尊奉为所谓的普世价值”。“科学卫士”司马南在 2008 年 6 月说：现在“普世价值还停留在神话阶段，它所具有的价值是神话价值、理想价值。”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新城在 2008 年 9 月 16 日的《光明日报》的一篇文章中说：“他们鼓吹的‘普世价值’并不是人人所固有的或上帝赋予的，而是由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的。”

党贵们认为：自由、平等、人权、公平、正义等价值观是西方价值观，是美国搞和平演变的精神武器，因此，中国人要坚决拒绝，不被境外敌对势力所利用。这些人脑子里运用的依然是毛泽东的“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的”的阶级斗争标准，连假民主的“演戏”都不行；所以，中共绝不给人民话语权，自今都没有民办报纸电台电视台。

专制主义者绝不承认人类对自由、民主、平等有共同的追求上。他们极力强化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国情区别，强化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传统、文化的区别，强化阶级与阶级之间的道德对立，把共通的普遍的人性阶级化，挑拨不同人群和阶级之间的对立和仇恨，妄图用自己所构思的有利于维护自己专制的观念来塑造、愚弄专制制度下的国民，从而使自己从中渔利！

共党反对普世价值起源于马克思的阶级斗争邪说。马克思断言“人性就是阶级性”，在阶级社会中不会有超阶级的共同的人性。马克思说抽象的“人”是不存在的，只有地主和农民、资本家和工人，人一出生就打上了阶级的烙印。马克思否定“抽象的人性”，但绝不否定“抽象劳动”。马克思在论具体劳动时搞出了一个抽象劳动，为什么在论具体人性的时候又否定抽象的人性呢？可见，马克思的“抽象”分析完全是机会主义的；随心所欲的，逻辑上前后矛盾、不能自圆其说。设若人类只有阶级性而无普遍人性，那么人类社会就无法进行任何交流和勾通，也就不可能取得任何谅解和共识。事实上：人的阶级性才是后天人为追加的，而且常常是无中生有的。任何人一生下来就是赤裸裸的，除了大声哭外就是“一无所有”，因此，任何人生来就没有阶级性的，只有共同人性——自由（哭闹）。所以，否定共同人性（或曰超阶级的人性）是错误的。否则，中国政府不会在 1998 年签署《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了。

所以，共党就不相信平等自由。2011 年 4 月 24 日，张木生的《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一书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与会军队少壮派宣称：“民主、自由、人权、人生而平等”，这都是“一些没有实质意义的概念”；“我是一个军人，讲什么东西都跟安全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国家安全”，至于“普世怎么普世，我表示怀疑。”乔良将军发言说，“人生而平等，人什么时候生而平等，卢梭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吗？说在上帝面前生而平等，像我们这些人根本不信上帝，我们怎么接受人生而平等，其实人从来没有生而平等过。”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者对人不讲平等的，他们总觉得比别人高人一等，他们先进、英明，比别人优秀，是上天特选的优胜者。他们在斗争所谓的阶级敌人时毫无人性和同情心，在对权力物质的分配时同样不讲平等，理所当然地享受种种特权。可见，马克思主义是平等、自由、民主的死敌。

在共党看来，超阶级的普世价值绝不可能存在。关于平等的几种重要原则，诸如“人人生而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乃至“分数面前人人平等”，都是毛泽东坚决否定的。毛还否认“革命面前人人平等”，在毛时代，有千千万万的人想革命、要革命，有的本来还是老革命，结果却被视为不革命以致反革命遭到了迫害。由于阶级斗争的长期泛滥，人人平等的超阶级的人权思想至今未普遍确立。什么“无产阶级人权”不同于“资产阶级人权”等荒唐说法依旧流行。阶级主义、种族主义、爱国主义等学说都是充满身份偏见的等级学说；以此类邪教学说立国创法，欲求人权平等，实乃缘木求鱼。

反之，我们再看相信上帝和基督教的人怎样看待财富和既得利益，他们在生前做大量的慈善事业散尽所有的既得财产，救助穷人和需要帮助的人，因为基督教说，有钱的人进入天堂比骆驼穿针眼还要困难。在民主社会主义国家，资本家比工人收入仅高两三倍，公务员收入在社会上是中下等。因为，在那里，人人平等思想深入人心，已为人民普遍接受。那些相信平等理念的国王、总统会轻易地交出权力和既得利益，包括那些放弃马克思主义而追求人道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者，都会主动地交出权力和既得利益。

23. 习近平拒绝政改

中共唯一的出路：学习国民党，走蒋经国的道路

习近平讲：政改要非常稳妥的，要可以执行的，拿出的方案要各方面都能够接受，才能改。要照顾大老们的利益，但又要满足小老百姓们的一些呼声，习近平怎么摆得平呢？他只能装白痴：大骂“屁民”二百五。有人讲：改革亡党。共产党看到了。可是不改革也要亡党啊！哪个快？现在等于是比哪个方式亡党的速度快和慢。共产党最后会被扫进垃圾堆里去。

唯一既能满足改革又能挽救本党不灭亡的例子，就是台湾的国民党。蒋经国就走了这光明的道路。他改革了，他就宣布我蒋家子女不从政，不竞选总统；国民党的高官要经过民选上来。他 1987 年去世，李登辉上任以后，到了 96 年举行总统直选，国民党输了，连输两届，到了 2008 年才选回来。国民党没亡党，没被清算，没有人头落地。党禁、报禁开了，大家自由竞争。台湾乱了没有？没有！台湾死人了吗？没有！为什么共产党不走这条路？共产党不走这条路，最后必然会自取灭亡。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政党必然自取灭亡！

试问：中共会放弃党权而推动政改吗？它会放权吗？不可能放！因为共产党这批人的教育、经历，他们的目标是跟国民党不一样。国民党里相当一部分人能够接受儒释道三家的想法，能够接受西方文明的基督教，他还相信人应该走善，不应该所有的事情都走恶，“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国民党高层相当一部分人相信这个。共产党呢？斗得你死我活。它们到任何时候坏得很，都到这个年代了，已经是 21 世纪的 2013 年了，时时还想到马克思主义，说共党是人类最先进，非共党的人都比它愚蠢，只有中共才能带领世界人民进入全球共产主义时代。真是天下第一荒谬！骄傲的共党不能与非党人士“人人平等”，共党就不可能开放党禁搞自由大选！不是有一篇网文说，薄熙来的岳母写了一封信中共当局，她在里面讲：“在我死去见马克思之前，让我见一下薄熙来”。一个不放弃马克思的党是不可能平等竞争的。

现在习近平高喊“民族复兴”口号，也就使得中共明显的走上法西斯道路，以向外扩张来转移和掩盖国内社会矛盾。“民族复兴”首先要在中华民族内部复兴，而不是向外扩张。中共继续迫害中国民众和中华民族的时候，实行一党独裁法西斯专政，中华民族是不可能复兴的。

纳粹希特勒德国的彻底失败，德意志民族受灾受难就是个例子。

习近平否定胡耀邦、温家宝，拒绝政改

人类政治史是一部不断从独裁专制向民治民主发展的历史。在 21 世纪，一个国家的政体已不是理论（主义）的问题，而是两种制度的选择。越是强调坚持自己制度特色的国家，距离人类普世民主政治就越远。中国大陆和朝鲜的政权交接就是例证。

据报：2011 年 1 月，江泽民在杭州对习近平等说：这个世界上究竟有没有普世价值呢？答案是有的。既然有，我们就不能回避，就要正面面对。习近平哪里听得进去！

2012 年 3 月 14 日，温家宝暗示唱红打黑是文革，他对记者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习“南巡”时暗批温家宝的普世价值，习说：“有人把改革定义为往西方普世价值、西方政治制度方面改，否则就不是改革。这是偷换概念，曲解我们的改革。我们……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2012 年 2 月，胡德华在接受《阳光时务》的专访时强调，胡耀邦的改革是为了民众，而邓小平的改革是为了共产党，邓小平和胡耀邦的最核心区别，在于一个救党，一个救民。在百废待兴的时候，这两条路是重合的，但是很快就会分道扬镳。今天的高层是沿着救党的路线走了下来。“18 大”召开前 11 月 1 日，有人在会场挂出了中共前主席胡耀邦的画像，但很快就撤掉了。习近平出任总书记后，2012 年 12 月 7 日第一次出外考察是去广东深圳。其深圳之行曾一度被舆论看好。他在到访罗湖渔民村的前一天，居委会前小广场上摆放的邓小平、胡耀邦、胡锦涛三人图像，但在 12 月 8 日欢迎习近平的仪式上，胡耀邦照片却被囑临时取下。这是习近平向外界发出的强硬信号，他不会搞胡耀邦式的“自由化”改革。

人民要求废除压倒人权压倒人民压倒一切的党权。2012 年 12 月 16 日，在北京举行了关于 2012 年司法制度改革的研讨会，他们要求取消政法委，要求改革，要司法独立，要执行宪法。北大教授袁刚认为根本改革是把中共党权拿掉。改革要把从苏联传到中国来的“民主集中制”，苏联的一党专政啊，通通拿掉，把权力还给老百姓。

中华民国的宪法讲：权力是属于全体国民的，权力来自于全体国民，没有任何政党。因为中华民国 1946 年的宪法是由民社党的主席张君勱先生主持起草的，他受周恩来的委托，受国民党代表王士杰的委托，受这两个大党的委托，由一个小党来起草的。起草之后，这两个党代表都满意了，国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共产党却发动战争了，它不干了。可见啊，你这个宪法你光要人家写，你自己不执行，不把军队交出来，不把军队国家化，非要这个特殊的，要留个一、二十个师，一百多万的军队要跟国民党对垒，内战发生了。

中共的宪法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人大来行使权力，人大是最高权力机构，可是这个最高权力却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控制着全国人大，那国家的一切权力也就是在共党手上。75 宪法明确写了党领导人大，82 宪法把这条删了。可是人大委员长开口闭口总强调“接受党的领导”，把人民代表大会弄成了党代会，成何法统？2011 年 3 月 10 日吴邦国在全国人大第十一届第四次会议上说：“总之，我们的一切法律法规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制定的，我们制定的一切法律法规都必须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有利于

巩固和完善党的执政地位，有利于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吴邦国表达了中共一条道走到黑的决心：“中国的法律是党制订的，党制定法律都必须有利于加强党的领导、巩固党的政权，同时这些法律还要能有力地保障中共控制整个中国。”法律最基本的功效应该是保障人权维护社会公正和平。中共却脑残般地标榜中国的法律是用来保政权维护共党的特权的（共党领导权）——保共党拿着政权四处吃喝嫖赌，保共党紧握枪杆子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世界上任何一部正的法律都必须是建立在基本的人类道德良知基础之上的，都必须能够代表大众、代表民心。而中共的法律是根据自己的意志制定的，中共本身就是谎言、暴力的代表，其法律有什么公信力可言？有人说不是有人民代表参与立法其中吗？试问今天的所谓人民代表有几个是代表人民的呢？即便是有，他们的话又有谁听呢？连所谓“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人大也要“加强党的领导”，人大立法实际上变成了党立法。党的领导自中共建政以来，其实一直就强得很，毛泽东主政时已是强得不能再强，现在还要再加强，一点儿也不肯放松，其实就是不肯转换体制机制，等于不要政治体制改革。如果共产党控制着全国人大在实践中不改掉，不拿掉，改革就是骗人！所以，现在改革就是回到 1946 年中华民国的宪法轨道上去，按照当年的宪政精神来重新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胡、温十年执政，政治上因循守成，不敢有所作为，缺乏魄力和开创性，最后两年推出的两项所谓“大”的“改革”——社会管理体制和文化体制改革，令人啼笑皆非。改革的手术刀一再挥向社会，而就是不敢对准党，不敢在关节眼上有所突破。可谓是举措乖张，进退失据。

2013 年 84 岁的山西农民申纪兰再度当选人大代表，从 1954 年至今连任 12 届人大代表，被民间揶揄为“人民被代表”的“活化石”。她的名言是：“当代表就是要听党的话，我从来没有投过反对票。”她还说，“我们是民主选举，我不跟选民交流。”另外她主张网络要服从党的管理。2013 年 3 月 6 日新华网评《质疑申纪兰有点不太厚道》：“从申纪兰几十年的代表之路来看，她也是一位值得信赖的‘代言人’。……网上有声音质疑她的履职能力，甚至拿‘从不投反对票’说事，这种质疑其实没有道理。”既然人民代表从不投反对票不可置疑，那么由人大来决定国家大事就是骗局，宪法成了一纸空文。

申纪兰是省妇联主任，正厅级干部，其夫曾是城建局长，一个孩子是交通局长，一个孩子是粮食局长，女儿是师级军官。她开了一家房地产公司，注册资本 5000 万，申是董事长。2008 年销售破 6 亿，利润 7000 万。汶川地震，申捐出“一生积蓄”一万元，被评为道德楷模。朱欣欣认为，以申纪兰为典型的投机分子与中共当局是欺骗民众的利益共同体。

2012 年的第 11 届的全国人大，总共 2987 名代表，中共官员占了 90%，而无党派的知识份子仅占 6%到 8%，工农劳动阶层只占 0.8%到 2%，这也就说平民代表不到 10%。从根本制度上来观察，中共政权根本不代表全国百姓的，它仅代表中共官员自己。由此可见：中共的人大绝不是人民的代表大会，而是官僚冒充人民代表的集会，其成员绝大部分都是当官的，即使不是当官的，也都是由官方指定的，这样的“人大代表”连军阀时代的猪仔议员都不如，猪仔议员本身并不当官，只是被官方雇来充当代表替官方讲话而已。现在的人大代表们，本身绝大多数就是官，连雇佣的形式都免了，怎能发挥对官权的监督作用？

真正有代表性的人大，其代表必须由人民选举出来，在普选基础上产生，这样，才能成为宪政民主的议会，才能发挥权力制衡作用。可以肯定，习近平绝对不可能改变现有官式人大的性质，因为习近平本身就是集党政军权于一身的寡头，怎能有民主宪政念头。

习近平 2012 年 12 月南巡时呼吁共党要有崇高共产主义理想，“决不能在根本问题上出现颠

覆性错误”，否则无法挽回。他指出：苏联崩溃就是源于“很多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改革”；示意他不会在中国实行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改革。“不能改的，再过多长时间也是不改，这不能说不改革。现在，重大改革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更需要全面考虑、协调推进”。特别是 2013 年 1 月 22 日，他在中共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舆论只关注他高调反腐，却忽视他特别指令“政治纪律”，强令全党与其保持一致，从根本上否定了党员应有的异议权利，丝毫没有表现出现代化国家领导人的宪政民主执政意识。2013 年 6 月 28 日至 29 日习近平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发出“最高指示”：“选人用人反对简单以票取人”。这充分表达了习近平的拒绝宪政的“票决民主”的反动立场。

汪洋说过，改革就是要拿刀来割自己的肉，谁能设想，习会拿起刀来割自己的肉，砍自己的骨？事实上习近平现在所想的只是怎样巩固自己的寡头帝位。从历史上来看，倒退的结果必然引发革命。清末慈禧虽镇压了“百日维新”，如同邓小平镇压“天安门民主运动”一样，镇压后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开放。慈禧死载沣摄政情况就不同了。载沣忠厚，但不学无术，见识短浅，是一位庸碌的皇族子弟。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根本无能料理国政，上台伊始就开始全面倒退，加强皇室权力，成立皇族内阁，收回咨议局议员议政权，连袁世凯都被革职养病。引起汉族官员的极大的愤懑，令立宪派绝望，结果不到 3 年就把清皇朝给弄没了。盘点今日习近平与载沣何其的相似，共产党的江山也必将亡在他的手上。

24. 图穷匕见的意识形态战

《南方周末》的《中国梦宪政梦》被枪毙后，《南方周末》的工作人员进行了示威。围绕该报的对抗和要求官员公开财产的运动提醒了领导人，中共高层曾开会讨论了《南方周末》抗议等问题，称之为颠覆党的阴谋。2013 年春季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纲上线，杀气腾腾，将这些年来所有与中共中央稍有政见不同者统统打入敌对阵营。“美国领导的西方反华势力一个接一个地参与进来，并和国内的异见分子相勾结，以所谓新闻自由和宪政民主之名对我们进行诽谤攻击，他们试图瓦解我们的政治制度，这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2013 年 3 月 29 日，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精神曝光。这个会议强调不能允许反毛言论在媒体出现；坚持反党、反国家、反民族立场的所谓“新三反人员”不能继续留在媒体；要求从事舆论宣传工作的，不转换立场的就换人。

2013 年 4 月 22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即中共中央 2013 年 9 号档），或称《2013 年全国宣传部长会议纪要》。该文件分三部分：一，情况；二，问题；三，对策。所列的 7 个问题为：1. 讲宪政民主会颠覆国家政权。一些人利用“宪政梦”歪曲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称“宪政民主是唯一出路”。宣扬宪政民主的要害，就是以宪政民主否定党的领导、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终实现改旗易帜，颠覆国家政权。

《南方周末》事件就是明目张胆的挑衅。所以，民主宪政（包括司法独立）不要讲，要讲政法委办案。2. 讲普世价值会动摇中共执政理论基础，排除党的领导，逼党让步；所以，普世价值不要讲，要讲中国特色。3. 讲公民社会的要害是在基层党组织之外建立新的政治势力，从而瓦解党执政的社会基础，所以，公民社会不要讲，要讲社会管理创新。4. 新自由主义反对国家宏观调控，会导致彻底私有化和完全市场化，会改变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所以，新自由主义不要讲，要讲公有制基础上的宏观调控。5. 西方新闻观反对党一贯坚持的“喉舌论”，

是要摆脱党对媒体的领导，搞公开化，用搞乱舆论来搞乱党、搞乱社会；所以，新闻自由不要讲，要讲党管媒体不变。6.“历史虚无主义”，要害是针对党领导下的历史问题，否认人们已经普遍接受的事实；其突出表现于极力贬损和攻击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全盘否定毛泽东领导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作用，目的是削弱甚至推翻党的领导的合法性。所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错误不要讲，要高举毛邓旗帜。7.歪曲改革开放的种种说法则认为，改革中出现了官僚资产阶级、权贵资本主义。江的“三个代表”，以自命的先进性来强行占有理论制高点，而三个代表真正包容的是让资本家等新权贵进入党内，使权贵资本主义成为合法存在。所以，质疑改革开放不要讲，要讲中国梦，免得揭穿“社会主义”的假面具。

而针对这些问题的对策包括：1.必须坚持“喉舌论”。2.必须坚持指导思想是马列毛与特色理论。3.今后不能允许反马列毛言论公开地堂而皇之地在媒体上出现，宣传战线将清理反党、反国家、反民族立场的“新三反人员”，“不换立场就换人”。4.对媒体要加强管理与引导，媒体人要有鲜明的政治立场，要有清醒的政治头脑，要坚持客观真实性原则，要对社会负责。不能成天全版面报导负面东西，对正面的却视而不见。5.加强党对媒体舆论的领导，要从培养新闻人才抓起，凡有“新三反”倾向的不准在高校教授新闻专业。

文件中还充满了文革式语言和思维，如，西方反华势力和境内“异见分子”不断挑战我主流意识形态，炒作官员财产公开，网络反腐，媒体管理等敏感话题，挑动对党和政府的不满；他们在我国境内培植反政府力量，在境外炮制反动政治出版物，对我国进行西化分化和“颜色革命”；意识形态领域渗透与反渗透形势依然严峻，等等。

中办文件级别虽然次于中共中央文件，但也需要全体常委签字，已不单是刘云山和他的文宣系统的事，显然是习近平的意见。9号文件说，“要严明政治纪律，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允许散布违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言论，不允许制造传播政治谣言及丑化党和国家形像的言论”、要“确保新闻媒体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一致的人手中”。

网民说，“七不准讲”概括起来其实就是一句话——不准讲文明。1930年代，进步文人写出一副讽刺国民党专制独裁的对联，上下联：

江山是老子打来，谁让你开口民主闭口民主？

天下由本党坐定，且看我一枪杀人二枪杀人！

《2013年全国宣传部长会议纪要》的“七不讲”，可以概括到三个自信中的理论、道路、制度内容里。例如普世价值可以列入“理论”之中，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司法独立包括在“制度”里，而党的历史错误与权贵资产阶级则关系到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因此“七个不讲”的规定，恰恰说明了“三个不信”，也就是九号文件否定了18大报告。

他们为啥不敢讲？不敢讲普世价值，因会给非法统治带来覆灭；不敢讲历史错误，共党已经对历史问题的真伪对错不感兴趣，感兴趣仅仅是是否有利于掌权而已。例如：中共内部教育片《苏联亡党亡国二十周年祭》提到，戈尔巴乔夫倡导的公开性（指把政府信息公开，让人民知道真相包括党的历史），从根本上动摇了苏共执政的地位。不准讲“党的历史错误”就将邓小平置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因为邓主导在1981年发布《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

的决议》，就是要求全党要认识中共执政以来的种种错误，不要重蹈覆辙。现在七不讲是否要推翻邓小平的这些观点？不敢讲人权，因人权完善后权贵对人民的剥夺就烟消云散；不敢讲司法独立，因司法独立意味着权贵再也不能胡作非为；不敢讲民主，因统治需要人民授权。鲍彤表示：“这七条中的任何一条，都是违宪的，都是和共和国的本质水火不相容的。”

而且，这“七个不讲”不是讲讲而已，在宣布以前，早已经有不准讲的警告与行动。例如习近平早已讲不能否定毛泽东，那就是不准讲“党的历史错误”，于是批毛的经济学家茅于軾出去讲课，毛左们就纠众不许他讲话，不管他宣讲什么主题。所以他的演讲会不是被迫换地方，就是被迫取消。警察没有出来保护公民权利，因为不许讲公民权利，又怎么保护？

雅安发生强震，努力建设公民社会的一些 NGO 组织到灾区赈灾，黄琦被扣，不许他去；对赈灾做出贡献的李承鹏，则被五毛们丑化，否定他们的努力与成绩。

至于司法独立，当然也不许说，在一党专政下，任何“独立”都不可以说，因为独立意味着摆脱党的领导。大法官王胜俊说“昨天和一个从美国回来探亲的同学解释我国的司法制度，说到我国的法官都等同于官员，是有行政级别的，对方问：“那你们的首席大法官是什么级别？”我告诉他是副总理级，对方大惊：“还有比这个更加荒唐的么？”我说：“还有，他没有上过法学院。”当政者是“维稳”当先，所以上访人士与维权人士仍然纷纷被拘押。连异议人士张林的 10 岁女儿张安妮也难逃一劫，成为中国最小的良心犯！

“七不讲”比起吴邦国 2011 年所讲的“五不搞”更彻底、更全面、更荒唐。国内大学教育不讲普世价值、不讲新闻自由、不讲公民社会、不讲公民权利、不讲党的历史错误、不讲权贵资产阶级以及不讲司法独立；但讽刺的是，那些高官和有钱人子女前仆后继远赴国外留学，肯定不受七不讲限制，没有钱只好留在国内的学生，“知的权利”一再被打压。七不讲同样是一种愚民政策，习近平企图运用政治高压、民智未开加上个人崇拜，造就强人统治。习近平抱着炸弹击鼓传花而自招灭亡。民间对他所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至今可以一扫而空了。

2013 年 5 月 17 日，《人民日报》发表《乱贴“国家资本主义”标签用意何在？》；5 月 18 日，布坎南《自由的界限》的汪丁丁序言被发行者撕掉后发售，创图书审查新特技；5 月 24 日，《人民日报》发表《思想纯洁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保证》（强调思想纯洁性，唯有如此，才能“保持对共产主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从来就没有普世民主资产阶级民主虚伪》、人民网开设《无德无信美国人》专栏。5 月 28 日，财经网发表《警惕基层干部群体“被污名化”》、《人民日报》刊出《中共出台 16 条意见加强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光明日报》推出“要将西式民主从普世知识降为地方知识”。

2013 年 6 月 7 日《中国社会科学报》以对李殿仁中将采访的形式，发表了《微博——宣传思想文化的新阵地》，其中提出：“三股思潮尤其值得注意。一是政治上的宪政主义。按照政治学常识，所谓宪政，是以‘多党制、三权分立、议会民主’三个要素为支撑，要害是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取消人民民主专政，让中国政治与西方接轨。与我们党和政府所讲的‘落实宪法、维护宪法权威’根本不是一回事。一些所谓自由派公共知识分子，把‘中国梦’解读为‘宪政梦’，利用微博阵地，网上网下互动，国际国内联手，试探新一届中央意识形态底线，负面影响极大。”另外还对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与历史上的虚无主义提出了批判。

这种官方主要媒体高度一致反对宪政，军方高级将领出来阻止宪政传播，大学教师出来指名

道姓要求以开除党籍来惩罚主张宪政的个人等一系列事件，显示中国正进行着一场全方位、立体性、大规模从理论到现实对宪政的围剿，是一场有计划、有预谋、有组织的全国性的“文革”性质的政治运动。只要国人对中国大陆六十余年来的历次大规模政治运动还保持有丁点的记忆，那么这次反宪政风潮的深层政治背景就不言而喻了。

2013年5、6月，是中共的“倒宪政月”。到了7月，中共开始集中火力倒“公民社会”了。最有力的证明就是，新公民运动的领军人物许志永被抓，维权的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被封；与此同时，所谓“顶级谋士”胡鞍钢再抛谬文，盛赞人民社会优于公民社会。

许志永因2003年为孙志刚事件维权而闻名，近年来参与呼吁官员财产公示、教育平权，倡导新公民运动等，一直是官方的眼中钉。7月16日，警方正式拘押了许志永，罪名是“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这是个莫须有的罪名！许志永的友人郭玉闪、滕彪等，也都在许志永出事之前，被控制在家。舆论普遍认为，许志永此次被抓捕跟他公开倡导推动官员公示财产有关。许志永自4月12日起，就一直被软禁在家中，谈何聚众扰乱秩序！探望他的人因许志永居住的小区内、楼层内、电梯内，到处是监视的看守，而不得入内。许要理发也不准外出，就连探望他的律师也被关进派出所。许志永过去屡次被拘押，但这一次，当局似乎发狠了。许的早期维权合作者郭玉闪说：“我估计当局会对许志永进行刑事判刑”。

鲍彤说：对许志永先生的陷害是个可怕的信号。这个信号意味着向国人、向全世界宣布：中国的公权力是不允许监督的，谁企图监督中国的公权力，谁就是中共的敌人。习刚上任时强调要遵宪守宪、要以法治国，不过是个大谎言。拘捕许志永和取缔传知行，没有任何法律根据。这类没有法律根据的事件最近发生得十分频繁，如，原定4月22日在北京召开的李慎之先生去世10周年纪念会被取消，一些知名自由派学者的微博被删被取缔，主张官员公布财产的部分公民被拘禁，曾成杰被长沙中级法院“秘密处死”等等。习从他接管权力以来，他的很多行为，比如对新公民运动的打击，超过江湖时代的残酷与铁腕。

德国之声2013年7月19日援引德媒《许志永遭拘押的信号意义》文章指出，许志永事件极可能标志着中国当代政治的一个转折。许志永是个温和的维权人士，他曾给习近平写了两封信，主张温和理性建设性地推动民主和法制，但是在当局的眼里，“温和”的许志永却是洪水猛兽，非打压不可。不仅如此，一批像许志永一样“温和”的为宪法权利大声疾呼的维权人士被冠上“谣言罪”，遭到了当局的镇压。的确许志永是一个符号式的人物，代表体制内外的那些温和改良派的失败，这便为更多“扬佳式维权”模式遍地开花提供了土壤。从不久前厦门公交宝座的陈水总，到北京机场引爆炸药的冀中星，再到广西计生局砍杀干部的大桥村村民，都是这一现实确凿无疑的背书。目前的中国社会民怨沸腾，犹如一座随时可能喷发的火山，而中国各级官吏都抱着“击鼓传炸蛋”的心态，能腐败一天是一天。

胡锦涛时代一直容忍的在公共政策研究领域享有良好声誉的北京 NGO “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2013年7月18日上午被民政部门取缔，并搬走600多本书和办公用品。强行取缔理由是“擅自以民办非企业单位名义开展活动”。这也是无中生有！因为传知行2007年注册时既没有申请过“民非”，也没有以“民非”名义开展活动。创办人郭玉闪说，该所曾参与帮助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2008年“毒奶粉”事件、2009年的“邓玉娇刺官”等事件的维权活动，在公民参与、转型经验研究等方面，有重要影响力。因此也是官方的眼中钉。

至于胡鞍钢的文章《人民社会为何优于公民社会》，是由《人民日报》海外版2013年7月

19 日头版刊发的。胡鞍钢说，与西方公民社会相比，人民社会更具优越性，人民社会由公有、公益、公平、公正等原则组成，“市民”注重的是私利，“人民”注重公利，但是并不排斥私利。胡鞍钢这几年，一直扮演著中共批判普世价值的马前卒。他的这篇文章，和过去的几篇文章一样，一经问世，立即遭到网友几乎一边倒的批评。连人民网也批斥道：“人民社会，首先必须是公民社会，否则，人民社会就是‘国家社会’，很烂的提法还自以为是！”

在中共的字典中，人民是个有着强烈鲜明阶级性的概念，人民是和“阶级敌人”对立的。你是人民还是敌人，完全由党来决定。党在高兴的时候，人民被抬出来忽悠几下，让十三亿人民享受一下做十三亿颗‘永不生锈螺丝钉’的光荣和乐趣，让党妈独自一个来操刀当螺丝批，愿把人民往哪儿拧就往哪儿拧。但是只要党妈一不高兴，人民连螺丝钉都当不成，立马成了敌人。党官可随心所欲地对任何人实行侵权乃至迫害。而公民社会，公民身份的厘定不是政治而是法律，因而它是一个受法律保护的概念。公民社会的人不分阶级，更没有敌人一说，尽管它也有罪犯，但他们不是敌人，敌人主要是指外族入侵者。民主社会无法凭借政治权力把任何一个公民打成敌人，正如罪犯也只能由法律制裁而非由政治裁定。

中共从倒宪政到倒公民社会说明，中国的政治环境正在急剧恶化，执政当局为了维护一党专制，不惜让整个社会付出大幅倒退的代价。其实在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南海就陆续抛出一系列保守、倒退、反动的提法和政纲，比如保持“党的纯洁性”之类“皇帝的新衣”。

25. 中宣部已把媒体逼回“甲骨文”时代

中共“党管传媒”是其赖以生存的“优良传统”。延安整风运动期间，毛泽东就通过镇压“内奸、特务”，铁定了党领导下的“舆论一律”。新闻出版作为“党的喉舌”，不仅要发出党的声音，还要控制别人的声音。为了“把握舆论导向”，早就按苏共的一套设计，其执行机关——中共各级党委的宣传部。到了 1960 年代，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提出“四个统一”指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统一思想，统一指挥，统一步伐，统一行动，一切听从伟大统帅的召唤。这个“四统一”，可称之为“军国主义”，希特勒、斯大林做得出色，毛泽东就更做绝了。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的管制下，中国媒体已逼退到隐晦的“甲骨文”时代。

2010 年“两会”期间，发生了湖北省长李鸿忠抢夺女记者录音笔事件，中宣部对此下令让媒体噤声。人们给《南方周末》写了一封电子信，质问他们“为什么哑巴了？”没想到编辑却很认真地给我回了一封信：“您说我们没有反映李鸿忠事，也是。不过也不尽然，因有明确禁令，不能违犯。但我们曲笔传达了。请您花多几秒时间回味下面这个漫画及小学生来信。”那幅漫画的标题是《新款录音笔：超级防抢》，画面是一只手握住一支带有钢刺的录音笔，录音笔的铁链子铐在那只手的手腕上；小学生来信的标题是《做错事就该道歉》。

面对中宣部多如牛毛的禁令，各媒体不得不在字里行间玩起了文字游戏，用双关、隐喻、联想等手法，隐曲地来传递可怜的真实信息，以求得良心上的安慰。2011 年 7·23 动车惨案第二天，中宣部就下令，要求媒体以“大灾面前有大爱”为报导主题，不质疑、不展开、不联想，对事故原因不要挖掘，死伤数字以权威部门发布为准，不要做反思和评论等等。7 月 29 日，遇难者“头七”当天，中宣部下达了第三道禁令：鉴于 7·23 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境内外舆情趋于复杂，各媒体、网站要迅速降温，除正面报导和权威部门发布的动态消息外，不再做任何报导，不发任何评论。这道禁令使上百家报刊连夜撤稿改版。但是，7 月

30日这天，多家报刊依然刊发了已经编辑好的版面，或以“甲骨文”的方式与中宣部博弈：《厦门商报》头版用火车头穿插巨大的“恸”字。上海《青年报》头版开天窗抗议，只放了一张温家宝鞠躬的照片，以及出事动车D301和D3115两个编号，最下边则是一行小字：2011年7月23日20:34。独特的版式胜过千言万语。上海《东方早报》也罕见地以纯文字、大幅留白、变换字体大小的方式，摘录温家宝答记者问：“政府最大的责任，就是保护人的生命安全”，“救人，铁道部是否做到，要实事求是回答”。

中国媒体不但已经被逼退到“甲骨文”的时代，也被逼成“梁上君子”，被逼到“躲猫猫”的游戏中，被逼得用诗歌、天气预报、广告、漫画、字号、天窗来代替新闻。

2013年伊始，就发生了《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据说刘云山及其辖下的中宣部某些负责官员不顾一切地力挺广东省委宣传部长庹震，并为此发出了战斗号召：“党就是要管媒体”，“党管媒体是铁打的原则”！刘云山在年初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说：南周事件是境内外反华势力勾结，是对“党管媒体”原则的挑战，企图打开对中国意识形态渗透的突破口等。刘云山说，“新闻媒体同武装力量、政法力量一样，是执政力量，必须掌握在党手里，苏联垮台、东欧解体就是因为放弃了党管媒体的原则，对这个问题一定要有高度自信、高度自觉和高度清醒”。因为南周事件闹得声名狼藉的广东省委宣传部长庹震更是紧随其后，首次提出“广东地处改革开放和意识形态斗争‘两个前沿’”，大有重提阶级斗争的意味。

刘云山是山西忻州人，薄熙来、薄一波父子也是山西忻州定襄县人，忻州曾经是晋察冀红色根据地。刘云山是中共老革命干部的后代，他的父母在内蒙古当官，父亲是薄一波的下属。刘云山与薄一波的提拔有很大关系，早在1985年即已被作为“省部级干部第三梯队人选”成为最年轻的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当时只有38岁。刘云山91年升任内蒙古赤峰市委书记，1993年被提拔进京任中宣部副部长。2002年丁关根退休后，江安排刘云山接班中宣部长，同时升任政治局委员。2010年下令封杀Google一事，是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周永康下达指示并监督下进行的，中宣部长刘云山则是负责协调向Google施压的人。刘云山的儿子刘乐飞曾担任国企中国人寿(ChinaLifeInsurance)的首席投资官，管理着1万亿元人民币的资金。刘乐飞随后运营着高达48亿美元的中信产业投资基金，这也是最大的国有基金之一。刘乐飞管理的“绵阳科技城产业投资基金”规模为90亿元。

温家宝警告不能以法西斯方式管制媒体。温家宝表示，党管媒体就是要媒体更好地发挥舆论引导和监督的作用，就是要确保宪法赋予人民群众的言论自由权利，而不是像法西斯那样，逼着媒体造谣生事！现在有一些人总是把自己的个人行为，说成是党的行为；用党的旗号来掩盖自己的错误和荒唐，这种做法是非常危险的。要记住，党不是任何一个人，反对任何一个人，并不就是反对党，也不是反对党的领导。比如说薄熙来，他曾经就是共产党，而且曾经是政治局委员，可是我们能够说反对薄熙来就是反对共产党吗？所以我们必须坚决反对这种歪风邪气，不能再允许这种现象继续存在，否则我们的党就没有希望了！其实，如果是一个民主国家，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党管全国媒体的怪事。一个党可以管自己党内的媒体和出版物；即使如此，它也要按照国家宪法及有关法律来管，而不能任意胡作非为。

2013年初南周事件爆发后，中宣部向全国媒体禁令，要求编辑记者“不得继续在网络上发言支持南方周末”，但媒体编辑们则是“道高一丈”。新闻大户网易网站用五条“今日焦点新闻”组成了“藏头诗”：南方周末加油。《新京报》网络版1月9日，头条为《我们还是在被动的位置》，曲线声援《南周》。然而，在1月4日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日本记者提

问发言人华春莹：“《南方周末》新年献词被广东省宣传部删改，是否有悖于中方提倡的新闻自由？”华称：“中国不存在所谓新闻审查制度，中国政府依法保护新闻自由，也充分发挥了新闻媒体和公民的舆论监督作用”。华春莹完全是用谎言欺骗世界。

原《南方都市报》总编辑程益中在接受德国之声记者专访时披露：“2003 年初萨斯（SARS）盛行期间，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的禁令有时一天多达 30 多条，甚至对头版等重要版面稿件内容、排版位置及标题字号、图片的规格大小等等，都做出明确规定。”“直接由官员打电话去报社某一个负责人，单线跟他联系。然后指示他们必须这样做那样做，但不准他们说这是谁指示的，这是谁下令的，反正你们就执行。……所有人事任免、去留都操控在他手中，他们就利用利益的杠杆来进行调控，秘而不宣，但是非常的有效。”

中共的新闻审查制度是由体制决定的。《南风窗》总编朱学东在《京华时报总编朱德付离职启示录》中说：“近十年间无数的天才报人折戟沉沙，无数的悲欢离合……无数心怀理想的报人，最终如不是投靠招安，投身‘体制内’的怀抱，洗白‘体制外’的身份，无外乎三个宿命：或身首异处，马革裹尸；或偏安一方，潦倒终身；再或是佯狂装傻，架鹰走狗！”

26. 习近平愚民《南方评论周刊》被迫停刊

2012 年 12 月 17 日，《南都周刊》49 期《起底王立军》系列调查报告刚上市，立即被有关部门责令全部收回。因为其中的《从铁岭到锦州》、《打黑真相》等八篇文章，通过对“王式打黑”胜过黑社会抢劫的铁证列举，让人看到“人挡杀人，佛挡杀佛”、心黑手毒的王立军并非只是王立军，也不仅是薄熙来，而是全中国政法系统的缩影，更是中共全党的典型细节。《南都周刊》没有投鼠忌器，或者故意投鼠砸器，自然遭到严厉整肃。

5 月 2 日，习近平给北大考古系学生回了一封官样文章的信，而北大校方则做出了非常肉麻的反应，表示要至少要“开三次会议来学习”习的回信。相关报道在网民中引起极大反感，评论栏出现了对习近平大量嘲笑和责骂的文字，网管机构不得不全面清除。

在习近平给北大学生回信要求青年“为中国梦奉献力量”3 天后，2013 年 5 月 5 日，《南方都市报》的《南方评论》突然失踪了，定于每周日 4-8 个版面的时政评论周刊当日一个字也没有！报上没有任何解释。读者电话询问编辑部，回答是“因为稿件问题不出”——所谓“稿件问题”，当然不是没有稿件，也不是编辑部未通过，而是“大样”未能通过上面（宣传部）的审读。个中细节，因众所周知的原因暂时无从明说。

继《南方周末》元旦社论被撤版事件，又出现了“中国梦禁止《南方评论》，5 个月内出现两起南方报系评论遭禁，这表明中国大陆的舆论监督环境每况愈下，跌到 30 年来最低谷。可见，习近平对待新闻自由的容忍度，比胡锦涛还要低得多。如果说一个时代改革开放的关键标尺在于民间言论自由度大小，那么，现在可以说：在“胡不如江”后，又来了“习不如胡”，今日中国的人权趋势明显一代不如一代！

有人怀疑《南方评论周刊》此次被迫停刊与上海大学教授朱学勤评论傅高义新着《邓小平时代》一书有关。传言本期《南方评论》原拟发一组讨论《邓小平时代》的独立评论。傅高义《邓小平时代》是一部解读中国梦的一家之言。朱学勤的评论有助于人们判断《邓小平时代》

的真正价值。他认为，傅高义在《邓小平时代》一书中的贡献有两点：一是否定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并没有进行什么总设计，而只善于“摸着石头过河”：肯定群众的改革建议与民间实验，只是一个对百姓的探索说“可以”的“可以先生”。二是披露傅高义《邓小平时代》的个别史料独到，“比如 1989 年戒严开枪之前，有同僚担忧世界舆论尤其西方人的反应，邓以他独特的语言风格回答：‘西方人会忘记的！’”邓如此惊世名言却被事后证明，“邓先生赢了！他看西方要比西方人看他，准确得多。”

显然，朱学勤的评论中，有官方不许提及的六四事件，有与官方不一致的邓小平评价。这也就显示，习近平的中国梦，是建立无声的中国——全国只有习近平一个人的声音和思想，百姓只能有回声与掌声。连学者也不能例外，只能“吟罢低眉无写处”！

习近平如此厌恶言论自由，他把精力放在什么事上呢？5 月 6 日，《人民日报》回答了这一问题，其新闻“习近平曾给陕西小学生回信、市委书记亲自送信”，让人看到一个崭新的“写信皇帝”——2007 年底成为储君以来，习先后给下面写了近十封信，其特点有四：

收信的对象主要是学生与基层官员，如：2013 年 5 月 2 日，习给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2009 级本科团支部全体同学回信；2011 年 7 月，习给杭州市小营巷小区党委回信……。

基本上只给视察过、见过面的人回信，如：2010 年 8 月，上海市徐泾镇民主学校八（一）班的农民工子女收到习近平的回信。2007 年，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习近平看望过他们。

回信从不直寄，而须经各级领导批示学习后再转交。如：2009 年 11 月的一天，原山东寿光任县委书记王伯祥奉令从潍坊赶往山东省委组织部，从省委组织部长手中接到习的回信。习 2011 年给山东蒙阴县小学生的回信，也由山东省委宣传部长亲自送到当事人的手中。

收到回信要制造声势浩大的感恩活动。如：2010 年，习近平曾给陕西太白县鹦鸽镇中心小学学生包俊丽回信，对当地震后重建的成就感到欣慰。陕西省委书记、省委秘书长对回信作出批示，宝鸡市委书记赶到鹦鸽镇中心小学，亲手将信交给包俊丽。收到回信当晚，学校所在县的县委为此灯火通明地开会；后来鹦鸽镇中心小学修建了“习近平副主席的复信”雕塑。回信的内容刻在土黄色的雕塑上，上有习近平微笑着的头像。

回信全是表扬与鼓励。习近平读到的来信与自己写的回信，全是假大空官样文章，毫无真情实意。据说 2008 年重庆小学生收到的习近平回信，其中赞扬了薄熙来……。

许多百姓读了上述消息怒发冲冠，难怪全国千万访民的上访信都送不到习总案头，习近平从不接见上访者，从不收看普通的人民来信！习新政当然不会将精力放在政治体制改革上，而只会致力于以避实就虚的“转作风”来重振个人迷信，自我造神。如此“中国梦”，全然仿效毛泽东，试图倚仗树立个人权威来救党救国。如此发展下去，二次文革不远矣。

27. 国际社会称中国无自由

中国是全球控制言论最严厉。1993 年 12 月 20 日，联合国大会决定将 5 月 3 日设为世界新闻自由日。据世界保护记者协会 1993 年的年度报告称：全球被囚禁的 90 名记者中，27 人

关在中国监狱中，约占 1/3，独占鳌头！国际新闻工作者组织“记者无疆界”公布的新闻自由度世界排行榜：2003 年新闻最不自由的国家是朝鲜，中国为倒数第二，接近朝鲜。

总部设在法国巴黎的国际知名新闻自由监督组织“记者无疆界”于 2013 年 1 月 30 日公布 2013 年“全球新闻自由指数”排行榜，在 179 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排名 173 位，居倒数第 7 位；在亚洲国家中，排位仅高于朝鲜（位居倒数第二）。台湾居 47 位，韩国居 50 位，日本居 53 位，香港居 58 位，新加坡居 149 位。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是天赋人权中最重要的权利之一，目前许多民主国家均承认新闻自由的重要性，包括台湾在内的 66 个国家和地区被评定为新闻自由国家和地区，中国被评为没有新闻自由的国家。

“记者无疆界”组织 1985 年由 4 名法国记者创立，1995 年在法国注册为非营利组织。在亚、欧、美、非洲的 15 个国家设有 16 家办事机构，其全球范围活动目前主要关注互联网审查和新闻媒体；其次是对记者提供物质、经济和心理上的帮助。该组织网站列出的五大使命，包括监督和反对全球范围内对信息自由的打压，反对新闻审查和限制信息自由，对遭迫害的记者提供援助，对战地记者提供安全协助等。该组织在联合国拥有谘商地位。“全球新闻自由指数”考虑各国和地区的媒体多样性、媒体独立程度、当地法律、媒体审查、媒体工作透明度及新闻设备等范畴，计算出每个国家、地区的新闻自由指数。每一年用评分确定世界各国的新闻自由程度等级，然后按照分数详细排名。获得的分数越小表示这个国家的新闻自由度越大。例如蝉联冠军的芬兰得 6.38 分，中国得 73.07 分，朝鲜得 83.90 分。“记者无疆界”组织将如下因素作为标准：一个国家遇害、被放逐或被迫害的新闻从业人员的数量、电视或广播媒体是否存在垄断现象、政府是否对媒体施行审查制度、媒体在社会体系中的独立程度，以及外籍记者在采访中所要面临的障碍等。评定主要以该组织向其成员国的新闻从业人员发放的调查问卷为依据，同时也参考学术界、法律界和人权活动家的意见。调查问卷上的问题主要包括是否有记者受到人身威胁、媒体是否面临来自其它社会组织的压力等。

2013 年 4 月 19 日，美国国务卿克里向国会提交《2012 年度各国人权报告》，特别是揭露了中共当局舆论封杀的大量事实。该报告指出，中共当局限制对政治敏感话题的讨论，毫无学术自由可言，一些独立的智囊团、研究小组或研讨会迫于压力被迫取消某些涉及敏感话题的会议。在公开演讲、学术讨论和媒体评论中发表政治敏感言论的人仍会遭受惩罚。政府经常性地监视讨论政治或敏感议题的知识分子、学者和持不同政见者的集会。

2013 年 5 月 3 日，国际非政府组织“记者无疆界”公布 2013 年新闻自由“公敌名单”，有 39 人和组织被列入其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取代胡锦涛，被列其中，这是由于中共不断加强对言论自由的打压，在最近一段时间还加强了网控。美国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 2013 年 7 月 24 号公布的一份报告说，中国已经是世界上对因特网控制最严厉的国家之一。

2013 年 5 月 13 日，美国副总统拜登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时说：“中国的问题很多，他们缺少开放和公平的法律体系、充满活力的风险资本市场以及创新思维”，“这一切的关键是另类思维。你不能在一个你不能自由呼吸的国家运用‘另类思维’你不能在一个你不能挑战权威的国家有‘另类思维’，因为进步只有来源于对权威的挑战。”

拜登这些话引起在场中国学生的不满，他们起草了一封信，要求拜登作出正式道歉。这让人想起一个笑话。法国使臣罗杰斯在出使中国时对中国皇帝说：“你们的太监制度将健康人变成残疾，很不人道。”没等皇帝回话，贴身太监姚勋抢嘴道：“这是陛下的恩赐，奴才们心甘

情愿。怎可诋毁我大清国律，干涉我大清内政？！”

拜登该不该道歉？国内媒体和各大网站进行了异常激烈的交锋。《北京日报》发表《以中国自信对待“拜登式傲慢”》，被网民誉为“日人民报”嘲讽。《人民日报》大概觉得这是抹黑美国人、掀起反美舆论的良机，其官方网站“人民网”于5月22日隆重推出“无德无信的美国人”的新专栏，号召“将大家在美国遇到的美国人与事的另一面呈现给大家，帮助大家全面认识美国 and 美国人”。在反美达到高潮的毛泽东时代，尚且知道分化和瓦解敌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把“美帝”与“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美国人民”严格区别开来，当今喉舌为达到愚民目的，竟然蠢到不分青红皂白将美国人一网打尽的地步，自然遭到舆论的强烈反击，讽刺“人民网”和美国支持中国抗战的段子在网上漫天飞舞。

事有凑巧，5月25日，接连发生数起“无德无信”的新闻，只不过主角都是中国人：第二届天津国际马拉松赛，组委会居然在开赛之后，把冠军奖金由5万美元变为5万人民币，多位选手拒绝领奖。赛后上百名参加选手在终点处迟迟不愿离开，僵持6个小时，指责天津国际马拉松组委会“没有信誉”、“丢人丢脸”的骂声一片。埃及三千年前的卢克索神庙的浮雕惊现中国游客刻下“丁锦昊到此一游”的中文字样，被网民称为国耻。

继菜刀、弹弓实名制等实名丑闻之后，为防止市民戴口罩抗议当地的炼油项目，昆明当局实行“买口罩实名制”（名义上只有昆明下辖的安宁市工商局下发通知），销售各类口罩须执行实名制购买登记，要求商户详细记载购买者姓名、身份证号码、购买口罩类型、数量、购买日期。管制对象不仅是药店，也包括超市、劳保用品店等，如有人购买较多，商家还要及时上报。该措施将至少持续到6月初的中国——南亚博览会闭幕后。这种滑天下之大稽的蠢举，连《人民日报》也看不下去了，于其官方微博发出质问：“买口罩为什么要实名？刚刚开博的昆明市长（李文荣）能不能解释一下原因？”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非常气愤：“老百姓让官员实名公开财产是犯罪，官府让老百姓实名买口罩，这算什么？”

要求拜登道歉的中国留学生，可谓中共长年洗脑结出的精品，洋装虽然穿在身，心依旧是向党妈妈献媚、拼命捞取政治资本的功利心。官员、校长强奸幼女的恶行，官场普遍腐败的黑暗现实，被污染的土地、水、空气、粮食，强拆民房引发的血案，他们充耳不闻，“不能自由呼吸、不能另类思考”是活生生的现实，拜登何错之有？

“红会2千万善款被指用于给王振耀办研究院”、“本田女撞女童，拒道歉称‘钱多后台硬’”、“骗子冒充红会人员骗走白血病患儿的1.8万元救命钱，疑红会泄露患儿信息”……，“无德无信”的真相、恶劣的国际影响、强大的反对声浪，迫使“人民网”将“无德无信的美国人”的专栏更名为“你不了解的美国人”。网友嘲笑说：无德无信的美国人，不能说完全没道理。比如那些拿了美国国籍，依然在中国当官、当代表当委员的，就是无德无信的美国人。需要补充的是，这些“无德无信的美国人”和那些移居美国的腐败官员的情妇、亲属一样，才是真正的“你不了解的美国人”。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一个连本国人权都肆意践踏的独裁政权，怎么可能赢得国际社会的尊敬？美国副总统拜登关于中国没有自由的演讲，实为自由世界鄙视中共专制政权的真情流露。应该道歉的不是拜登，而是中共，应为饿死5千万人民道歉，并向死于红色暴政下的林昭等民族英烈谢罪。

28. 习厉王搞网络文革 fface"/>

中共有关智囊总结出：二十多年前苏共就是亡于对传媒的放松，中共必须从中汲取惨痛的教训。更早些年，中共正是利用国民党对传媒的放松而钻了空子，利用各种媒体大造舆论以帮助夺取政权，这是中共的成功经验。现在政权在手，中共当然时刻谨记此中要害。早在 2012 年周永康在内部讲话就说：“我们正在进行一场没有硝烟的激烈战争，它的战场就在互联网，如果我们失败了，共产党一定会下台。”他要求“要不惜任何代价，打赢这一场战争！”2012 年 7 月 31 号，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海外版就刊发了《中国真正的挑战是未来 5-10 年》文章，正式推出今后一个时期，要重点防范“维权律师、地下宗教、异见人士、网络领袖、弱势群体”的“新黑五类”，这成了防范敌对势力的重点内容。

中共管制新闻媒体概括起来有三个方面：组织控制、话语控制、财政控制。2012 年 11 月 5 日，中共北京互联网协会党委成立，42 万家互联网企业必须服从领导，这是全国第一个互联网党委并称是一项“重大创举”，为推动全国互联网属地建立党组织。特别是应用高科技手段，中国当局在网络世界中筑起强大的“防火墙”。中国网络封锁与监视系统的前身是中国公安部建设的“金盾工程”。经过十几年的不断强化，当局对互联网的封锁和监视不断增强。目前在中国大陆境内，实行严格的网络审查制及大规模封锁国外网站。

习近平上台不久，2012 年 12 月 18 日《人民日报》为强化网络管制，就在头版发表评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仅警告网民，还威胁网监：“开放的中国需要文明法治健康的网络世界，不管是监管部门还是广大网民，都应该珍惜这个平台。”暗示已经寒风凛冽的网络，还要面临更大的整肃。接着国务院法制办官方网站就发布了由新闻出版总署草拟的《网络出版服务管理办法》，该“办法”规定网上不得含有的内容包括：“反对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的”、“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等等。随后，全国人大常委会迅即通过《网络信息保护》方案，借口保护“隐私”，给网络媒体带上紧箍咒。

在 2013 年新春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中宣部常务副部长雒树刚强调：要把新闻媒体领导班子建设摆到更加重要的位置，确保新闻媒体领导权始终掌握在“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人手里；还要加大新闻队伍教育培训力度，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自觉遵守政治纪律、宣传纪律。此外，雒树刚还要求，进一步提升网络管理水平，切实做好网络意见领袖团结争取工作，切实加强微博管理；加强对出问题报刊的管理，落实谁主管谁负责和属地管理原则，进一步加强对这些报刊的管理。

2013 年 2 月 9 日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刊登的武汉大学教授虞崇胜《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要破除六大思想禁锢》文章，被新华网清除。虞崇胜的文章强调，要破除“搞民主就是搞资本主义”的思想禁锢，要破除“权力分立和制衡是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形式”的思想禁锢，要破除“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成果就是照搬资本主义政治模式”的思想禁锢。

2013 年 2 月 20 日，新华网“焦点栏目”又转发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路”的清醒——抬头看路：“前后两个三十年”绝非割裂》文章，重提“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中国又面临着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为习近平时代“拒腐防变”首要任务——以“反和平演变为纲”背书。习近平把这场争夺舆论阵地的斗争看作是共产党和所有批评共产党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习说，自由的网络言论会滋生内乱，意识形态工作搞不好也会亡党亡国。习近平动员中共官媒向网络展开了意识形态宣传战。因此，他主导了这场“网络文革”战役。

2013 年 4 月 11 日，陕西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任贤良，在《红旗文稿》撰文《统筹两个舆

论场凝聚社会正能量》，各网站均予转载，杀气腾腾要规制新媒体，占领舆论新阵地。

2013年4月29日，党媒《光明日报》高调刊登了重庆警备区司令员朱和平少将的文章，题目是《要坚守意识形态的“上甘岭”》。此文呼应习近平接受苏共倒台教训，强调今天的中国正在跟美国进行殊死的意识形态争夺战，这一争夺战的激烈和残酷程度，犹如1950年代初中国出兵到朝鲜半岛支持金日成发动侵略战争，中美两军在朝鲜的上甘岭进行的你死我活争夺战。这就形成了悖论：既然《求是》鼓吹中共政治模式全球最佳，岂会又被逼到“上甘岭”？当年的上甘岭战斗是志愿军伤亡惨重大于敌方，最终整个朝鲜战争也是中国伤亡4倍于对手，如此不以保护人民的生命为第一宗旨的体制，岂能说“政治模式全球最佳”？

所谓“抗美援朝”不过是毛泽东帮助金日成侵略韩国的一个非正义战争。这场战争不仅使几十万“志愿军”葬身异国他乡，而且中国还被联合国视为侵略者。此次战争完全不是朱和平说的什么“立国之仗”，更谈不上“确立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倒是再一次在世界面前展示中共“人海战术”草菅人命的惨烈。现在朱和平把这“上甘岭精神”用到坚守中共意识形态上来，这不就等于承认中共的意识形态很原始很落后吗？！如果一个意识形态需要以“上甘岭精神”来坚守或维持的话，那这个意识形态还有继续存在的必要和可能吗？

朱少将还说：西方敌对势力对我们的渗透攻击无孔不入、步步紧逼。他们利用宣传媒体鼓吹西方文化思想；利用非政府组织，以公益、慈善、援助的面貌出现，每年邀请所谓的“明日之星”免费去美国参观访问、进修和学习；政府出资赞助学者到中国巡回讲学，传播美式文明、宣传美国文化，推销西方文化理念。这种“文化殖民”如同“温水煮青蛙”……。朱少将这个言论，难免让习近平以及许多中共领导人觉得脸红难堪。因为他们就以所谓的“明日之星”都曾经到美国参观和学习，其子女更是在美国被“温水煮青蛙”多时。

朱少将高喊什么“思想文化阵地是国家的核心阵地，事关党、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如果丢失，就会丢了老本，政亡人息”。此乃绑匪的危言耸听，实为共党集团代言。清除了马列文化又经历了政党轮替的中华民国的台湾亡了吗？不但没亡，反而生机勃勃。

“要坚守意识形态的‘上甘岭’”展示了他军人干政、强军保党的军国主义的叫嚣。他对军队的民主宪政的标志特别恨之入骨。他说，“西方敌对势力……鼓吹所谓的‘军队非党化’、‘军队非政治化’、‘军队国家化’，妄图改变我军的性质宗旨，对我意识形态核心阵地构成严重威胁。”中共当然要牢牢掌握枪杆子，要用枪杆子来强奸民意。枪杆子一出来，立刻就摆平了。“文革”时就搞了“军管”，1989年就搞了戒严和屠城。朱和平文章中明确无误地表明：中共又一次地举起了血淋淋的屠刀。

2013年9月16日，军委副主席许其亮把“亮剑”的矛头直指网络，他在出席四总部一次会议时说：“要积极抢占网络这一意识形态斗争的新阵地”，“筑牢防范敌对势力渗透破坏的防线”。9月18日《共军报》发表文章把加强意识形态工作上升到战争状态：“只有像当年守上甘岭那样，铆在意识形态斗争阵地上、战斗在最前沿，才能打赢这场不见硝烟的暗战，夺得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这完全是照搬军内著名的大嘴巴空军大校戴旭的说法。几个月前，戴旭就曾表示：“网络就是捍卫国家利益的上甘岭，我不会后退半步的！”用“你死我活”这样的文革语言来形容中共目前面临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挑战，足可以说明中共面临的有关其执政合法性的信任危机越来越严重。

军队系统关注网络，应集中于网络间谍问题、军事情报安全问题，但却对网络思想舆论问题大发议论，甚至发出严厉威胁。网络思想舆论问题说到底网络上的笔杆子问题，枪杆子对笔杆子发出威胁，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用枪杆子来对付笔杆子，是现代文明社会最不可取的行径。宣传部门够强大了，实在不自信还有警察和安全部门，军队是否以不掺乎为好？军报甚至军委领导直接对网络声色俱厉地威胁，太不利于军队形象了！

习厉王再亮剑

习近平较之他的前任，更加大监控互联网的力度。为了加强网络管控，中共政府不惜雇用成千上万的人在国家、省和地方各级实施电子通信监控。政府重点监管社交网络，微博，视频分享网站等工具。互联网公司也雇用成千上万的检查员执行中宣部指令。据悉有超过 14 个政府部委参与到这些活动中，导致成千上万国内外的网站，博客，手机短信，社交网络服务，网上聊天室，网络游戏，电子邮件被审查。据中共当局数据统计，中国大约有 2.7 亿微博用户，所有的微博网站必须设立内部的审查团队，按照中共当局的指令过滤敏感帖子。

习近平在加强舆论管控的同时，更加大维稳力度，镇压民主人士。仅 2013 年 3 月份以来，北京公民因推动官员财产公示已先后有 10 人被刑拘，安徽省异议人士张林的女儿张安妮因被当地警方剥夺受教育权利，激起海内外众多维权人士和爱心人士的声援和帮助，许多人被抓、被殴打、被失踪。而在 4 月 29 日圣女林昭的祭日当天，又有众多民主人士被殴打，被传唤、被控制在家中无法前往。短短一月之内，包括民主人士、异议人士、维权人士、维权律师、行为艺术家、藏人同胞以及全国各地访民在内大约有 229 人被监控。

2013 年 5 月 24 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紧急下发《关于加强新闻采编人员网络活动管理的通知》，要求加强新闻采编人员使用网络信息、开通个人微博等网络活动的管理，规定采编人员设立职务微博须经单位批准，未经批准不得发布通过职务活动获得的各种信息。

2013 年 5 月份以来当局对宪政和公民社会的来势凶猛的批判，对新公民运动主持人许志永的拘押和宪政教授张雪忠的被停职，对公知大 V 的禁言，对网络的进一步打击，都是习近平主导的。很多网站迫于严峻的形势，已经对过去几年的一些敏感文章进行自宫，甚至连曝光重庆淫官的人民监督网负责人朱瑞峰的微博和网站也都被关闭。

昔日周厉王专制暴虐，把许多民营行业改归王室所有，民冤沸腾。厉王却用特务手段窃听人们的谈话，将批评者皆定罪诽谤和反叛，即行下狱或处决。百姓一时间“道路以目”——见面只能用眼神交流抗议，敢怒不敢言。周厉王只高兴了三年，就在“国人暴动”中被放逐到彘地了。这一幕如今不幸又在中国重演！今日习总不仅大举国进民退，逼得外商巨贾“弃华投欧美”，掀起大陆撤资潮，而且厉行“一切舆论归官府”，清网并大捕网络意见领袖。根据“杀戮无辜曰厉”的谥号传统，网民认为抓人止谤的习大人，可提前谥号“习厉王”。

万科集团董事局主席王石的微博以一片高楼皆笼罩在蒙蒙灰尘之中的照片来显示空气指数差，但不能说“空气质量差”，否则就犯散布谣言罪。王石此微博强烈表达了对习的愤怒。以百姓对空气质量也不能随意评说，淋漓尽致地讽刺了习党何等暴虐！

有些人总以为习近平反宪政只是一时糊涂，或为权臣胁持，屡用“子产不毁乡校”苦口婆心劝其悬崖勒马。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则刊登《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谈谈人民群众的历

史决定作用》一文，借中国历史中周厉王的故事讲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道理，并批评现在一些思想糊涂的领导干部以为“有了权，就有了一切，谁掌握了权力，谁就能决定一切”。文章还表示，那些不把人民群众放在眼里的领导者，人民群众也不会把他们放在心里！这篇文章话里话外之音，相当玄妙，似乎在暗讽第五代“箝制言论”的做法不得民心。

2013年7月11日下午，习近平特意到西柏坡拜毛，称红色政权“接力棒”已在自己手上，发出“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的“两不变”宣言。习近平在西柏坡与江泽民、胡锦涛一模一样，都强调要牢记和弘扬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所说的“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如何做到“两个务必”？毛紧接着说：“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习的潜台词则是搞整风、整党等政治运动。“两个务必”只是“西柏坡精神”的一种招牌，“西柏坡精神”的精髓是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强调的“与不拿枪的敌人作拼死的斗争”。原来这“不拿枪的敌人”就是反动知识分子。

为此，在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高调纪念了反自由反人类的亚纳耶夫等男儿。习专门选在这个日子发表讲话，充分暴露了其反宪政民主的反动嘴脸。习的“819”讲话，就和胡锦涛2004年接任军委主席后，指示向朝鲜学习的“919”讲话一样，都是反宪政、反政改的路线宣示。习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8.19”讲话，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有人分析，自邓小平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后，近三十年来，这还是首次有中共党魁把舆论工具和意识形态的斗争提到如此高度，也由此可见天天高唱“三个自信”的习近平，对共产党学说是如何的不自信，才如此要大动干戈地采取暴力手段来对付网上日渐增多的不同意见。

接着习近平指出“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要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的重中之重来抓。”可见他最怕的就是现在的网络没办法完全控制。习要求党和媒体建立一支强大队伍占领新兴舆论阵地，宣传思想部门要“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

习的“毛左”嘴脸不仅原形毕露，而且其杀气腾腾的凶相也显现无遗。据称，在“8.19”会议上，刘云山向31省部级宣传部长发布向网络宣战的动员令时，习近平有一句恶狠狠的插话：“有一小撮反动知识分子，利用互联网，对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政权造谣、攻击、污蔑，一定要严厉打击。”根据中共惯用的手法，每当高层认为形势不稳、权力患失加重之时，都会先用笔杆子管控舆论，再用枪杆子即警察跟进镇压。

令人愕然的是习的措辞“反动知识分子”，这个说法自从文革结束以后，就不再在中共政治词典里出现，现在却在最高领导人的口中复活了。陈子明认为，习把敢于表达独立见解的公知定为反动知识分子，直接动用专政工具进行抓捕的举动，出手之快超过了毛泽东反右时的引蛇出洞。他说：“他沿袭毛泽东在1957年的宣传官员会议上讲话的那种精神，就开始给知识分子定调子，扣帽子。一小撮反动知识分子嘛。……他只要给你定了反动知识分子，你利用网络，他就要抓你。你利用媒体，他也要抓你。你上街举牌，他也抓你……关键是他给你进行了敌我定性。”“在习近平打通“前30年”和“后30年”之后，从“不给普世价值留空间”这种叫嚣来看，他们所心仪的“中国模式”不是接续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而是接续毛泽东式的“亮剑”与“谁战胜谁”。陈子明表示，可以断言，如果让这种模式得逞，势必把中国引向新的“大跃进”和新的“文革”，甚至引向新的世界大战。”

在把知识分子视为仇雠的问题上，毛泽东、习近平真可谓是一脉相承的，而且还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以言治罪上面，一代更比一代狠，因为毛泽东也没有让军队出面禁止言论自由。由此可见，所谓中国梦是一场权贵集团所导演的法西斯专政噩梦，也被网民称之为“习梦撕”，是习近平自己践踏法治、无视人权、撕裂了他所描绘的虚幻春梦。

习总“8.19”讲话后，中宣部长刘奇葆高调表示要把习近平的讲话当作“重大的政治任务来完成”。8月21日，共军总政治部就发出学习贯彻“8.19讲话”的通知，称习近平总书记阐述了一系列重大问题，其中包括“正面宣传和舆论斗争”。8月23日，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秦宜智传达习近平讲话，更为直白地提出：“一手抓思想引导，一手抓舆论斗争”。8月24日，《环球时报》刊出评论《舆论斗争，不能回避只能迎接的挑战》。8月30日，《环球时报》的母报《人民日报》以“人民日报编委会”（这种署名方式是该报自1946年创刊以来首次）发表学习“8.19”讲话的文章，提出“有效引导舆论、积极开展舆论斗争”。此后，“舆论斗争”、“意识形态斗争”、“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便频频见诸报端。可见这个说法是出自于习近平的。“舆论斗争”的方式不是争论，而是“亮剑”，就是带枪的警察行凶抓人。《人民日报》视网络如洪水，9月2日强调《意识形态领域干部要敢于对网民亮剑》！“敢于亮剑”这个口语化的说法从此闪亮登场。同一天，北京日报《不给普世价值留空间》更是气势汹汹：“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你死我活。斗争才能生存发展。敢于斗争，敢于亮剑，才是我们当前势在必行的选择”；如果不搞意识形态斗争就会出现当年苏联亡党亡国、东欧剧变等，甚至叫嚣“尤其是对一些人极力宣扬的所谓普世价值、宪政民主、新闻自由等，任何时候、任何渠道都不能为之提供空间和方便，该管的要管起来。”9月4日《人民日报》刊登官方新华社社长李从军的文章，誓言“旗帜鲜明地进行舆论斗争”、《共军报》同一天也刊登《夺取网络舆论斗争的主导权》的文章，说明党和军的两个喉舌一起“杀气腾腾地向网络舆论发出了宣战布告”。9月10日起，新华网、人民网陆续刊发31位省级宣传部长的“表态”，“对所有宣传思想文化阵地，都要做到可管可控”，并称“敢抓敢管、敢于亮剑”。前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研究员吴伟认为说：“终于图穷匕见，杀气腾腾，不可一世了。”

浙江宁波科技大学客座教授谓贤分析说：“战线是指敌对双方军队作战时的接触线。共党已习惯于战争思维：思想战线、理论战线、新闻战线、司法战线、公安战线……是战线，就要找到‘敌人’予以‘打击’，并尽一切手段抢占‘制高点’以‘维稳’。”

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秋风表示：“还亮剑呢？你看看你手里都是什么？除了票子、手表，恐怕就是二奶、房子、外国护照吧。都亮出来吧。”北京的王江松教授说：“我看也就是虚张声势，它真那么干，互联网死翘翘，所谓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北京著名学者陈子明认为当前局势犹如“反右运动”重来，他在《德国之声》上撰文表示，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不是半个世纪前的总体性社会、单位社会，政府已经没有了毛时代的那种掌控能力。只要民众觉悟了，又敢于起来抗争，最后的结果是，想要“不给普世价值留空间”的人将遗臭万年。北京思源社科研究中心总裁曹思源对此质问道：“想否定自己是人类一员？”一天津年轻人嘲笑道：“这是与世界文明为敌，公然与全人类为敌！”

《环球时报》发表署名朱继东的文章《要敢于整治网络造谣大V》，文章称“要坚持对网络谣言进行长期打击，尤其是对那些在外部力量支持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微博大V等所谓异议人士造谣、传谣的行为，更要坚决整治。”

2013年8月20日是公安部启动打击网络谣言专项行动的日子，在公安部的统一部署下，各地迅速成立了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公安厅（局）负责指挥行动，宣传部门负责引导舆论。一个月多月来抓捕数千网上敢言者，甚至连初中生网民，都施予刑拘手段。仅海南和河南两省在半个月内有600多人被警方处理。各地纷纷拘禁“网络造谣”分子，连闲扯雷锋和狼牙山五壮士的网民也被拘押，在微博错报了交通事故死亡人数的网民，也归入严打对象。一位中国网民因为在网上询问某地是否发生了命案而被投入监狱。

秦火火曾质疑罗援少将在中越战争前调动工作形同“逃兵”，以及全国残联主席张海迪拥有日本国籍等，都使中共恼怒。官方将秦火火质疑神化雷锋也作为罪名，用来恐吓网民，太无耻。2013年8月21日的中央电视台在报道秦火火事件时说：“秦火火诋毁、污蔑孔庆东、司马南等等爱国学者。秦火火一方面造谣污蔑毛泽东和共产党，另一方面却极力美化蒋介石、胡耀邦和美国。”中央电视台播出新闻节目中，竟把为薄熙来鸣冤叫屈的孔庆东、司马南被尊为“爱国学者”，而被孔庆东、司马南、吴法天他们这帮人诋毁污蔑的人多了，其中韩德强还当街扇了一个老人的耳光，而吴法天曾经通过左派联盟的网络会议密谋诋毁抹黑李承鹏，要把他打成汉奸，只不过因为其中一位参加内部密谋的人士看不过眼，捅了出去，这个密谋才流产。如此行径，警方却不抓人，央视也不报道，却把开明的前总书记胡耀邦作为反派人物与蒋介石、美帝相提并论。此文革风格的话语一出，立刻就有很多的抗议与投诉，像潮水一般涌向央视，但央视不予理睬且不说，相反又连续播放了两天。

60岁的薛蛮子是一个网络大V。这位推动政治进步的美籍华人8月23日在北京因嫖娼被抓，央视新闻联播用了足足3分钟来绘声绘色地详细报道，而前不久发生的上海高等法院法官集体嫖娼一案，则在新闻联播中声影全无。薛蛮子就算真的嫖娼，也只会影响自己家庭和谐，法官集体嫖娼，却事关贪腐、司法公正。喉舌们，到底持着什么样的新闻价值观？

中央党校的蔡霞教授在共识网指出，逮捕薛蛮子和打击传谣的运动都是公权力的滥权行为。蔡霞教授将抓捕薛蛮子的动机和一些官方媒体为官员罪行的诡辩放在一起看，发现是有人将公权力当作私器，用来庇护少数人的违法和迫害大众的权力。公权力最需要社会的集体力量去规范限制，去净化除污。马克思说：“国家不过是靠社会供养而又阻碍社会自由发展的寄生赘瘤”；恩格斯说：“国家再好也不过是获胜的无产阶级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这意味着国家没有任何道德优势可言。公权力在道德上的唯一义务，就是接受社会的监督和制约，而没有反过来挑剔国人的道德、对国人进行道德拣选乃至进行道德审判的权力。这是现代政治文明的一个基本原则，不搞清楚，公权力就还要在这个问题上搅浑水。

从“秦火火”到薛蛮子，他们的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的标签，那就是政治反对派，中共当局一直梦想着江山永固，以往只是打击激进的反对派，如今，就连在国内网站上活动的温和反对派他们都无法容忍了。打击“秦火火”等人标志着当局针对网路言论自由的新一轮打压已经开始，不管是墙外发言还是墙内发言的网民，稍有不慎，就可能被以“造谣”、“传谣”、“诽谤”、“寻衅滋事”甚至“嫖娼”等各类罪名拘捕。

还有更雷人的事，广东公安的一个公关处副处长发布官方微博《谣言必须打，打击须依法》，居然被上级撤职，因为他的说法不符合斗争大方向，全国大搞清网运动的时候，讲的是雷霆万钧的声势和力度，什么依法不依法，都和中央精神相左。

谣言指没有事实存在而捏造的谎言。不能将不实的言论统统称之为谣言，谣言必须具备主观

捏造这一前提。而现在的情况是，只要是不实的言论，官方就说是谣言，倘若按照这种标准，那官谣则数不胜数，“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都算是谣言了，而历史上的名诗人使用夸张的修辞手法所写的诗也是谣言了。不难设想，以当前的官方标准衡量，每个人都会是或都将是造谣、传谣者。古人云：“谣言止于智者”，现在人则说：“谣言止于真相”。的确，在某些公共事件发生后出现过谣言倒逼真相的情况，这就不能单怪造谣者，而是最该怪真相的缺位，要追究责任也应该首先追究官方。

中共本身就是靠说谎、造谣起家的党。1949 年前曾捏造“四大家族”等政治谎言，1949 年后则有“亩产 10 万斤”一类的官谣。现在官方公布的各种统计数据不过是数据化的“谣言”而已。1950 年，明明是金日成出兵侵略南韩，却污蔑南韩侵略北朝鲜。习近平在 2010 年 10 月 25 日还重申抗美援朝战争是保卫和平、反抗侵略的正义之战，依然在贼喊捉贼。中共才是最大的有组织造谣、传谣者，立二拆四、秦火火等制造、传播的“谣言”与该党以往的种种大谎大骗相比仅为九牛一毛。然而，该党从来不愿承认其说谎、造谣，而是坚称自己伟大、光荣、正确。实际上，有利于它的话无论如何虚假都不会被定为谣言，而不利于它的话无论如何真实都可能被打为谣言。这就是“谣言党”反网络谣言的本质。

9 月 9 日下午最高法院院长周强抛出新规定：网上“造谣”言论被转发 500 次以上就算违法，公安机关有权抓捕。消息传出后，网民舆论一片哗然。中国网民纷纷指出：“两高”这种无视基本法律和法治原则的司法解释，等于是敲响了中国法治的丧钟，使中国重新倒退到 30 多年前可以由公安机关随意抓人定罪的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时代。

“两高”的解释给了警察无限自由的裁量权。同“反革命”一样，这是赤裸裸的“口袋罪”，以后警察要抓人用这个帽子往你头上一扣就行了。两高在发布解释的同时特意说明，“行为人不明知而发布转发的不构成诽谤罪。”两高的这种说明是让中国的警察机关牢牢掌控着公民是否犯罪的裁判权、判定权，中国由此正式成为一个警察国家。

中共的网络写手表示：就是不能给错误的言论和谣言留空间，中国宪法所保障的言论自由从来就不包括发表错误的言论和谣言的自由。批评者指出：中国当局和其支持者的这种说法是无知得可笑；对付错误言论和谣言的文明手段是正确的言论和开放的信息而不是监狱；而当今世界文明国家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所谓的言论自由，主要是指错误的言论、以及当局所不喜欢的言论自由。假如说言论自由只是指当局所喜欢的言论自由，那就等于是说秦始皇暴政下的中国也有高度的言论自由，因为人民依然可以自由地发言赞美统治者；这种言论自由的说法显然是一个笑话。在专权社会里，即使皇帝老儿提倡人们进谏，人们也未必敢进谏。因为他一火起来，别人的脑袋就要落地，谁知道皇帝老儿什么时候翻脸。

许多观察家指出，近来中国当局展开的名为打击网络谣言、实际是打击中国当局不喜欢的网络言论的运动；中国两高的最新司法解释是根据完全不懂法律、也不尊重法治的法学博士、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指示精神做的。中共当局有意掀起以言治罪旋风，想让网民噤若寒蝉，从而实现“维稳”的目的。清代的“文字狱”广遭后世诟病，即使是中共官方编撰的历史教科书都对其嗤之以鼻，然而，“文字狱”在互联网时代再度死灰复燃，以言治罪成为打击异己的有力武器。在以往，最常见的以言治罪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或“颠覆国家政权”，后来又出现了“诽谤”、“造谣”，如今，“传谣”也成为罪名，而“寻衅滋事罪”也破天荒地用到在互联网自由发表言论的网民身上。

让习近平大丢颜面的冲击性事件是甘肃天水市张家川县发帖少年杨辉被刑事拘留。由于舆论强烈反弹，甘肃警方不得不释放杨辉。为了保全面子，甘肃警方对外发言称：被释少年是刑事拘留改为行政拘留，行政拘留期满且杨辉认错态度较好，才予释放。稍后，甘肃警方又不得不对张家川县公安局局长白勇强的行贿问题作出响应，称白勇强已被免去职务。白勇强曾以人情方式对其上级史居平（天水市公安局副局长）行贿五万余元。史居平因贪贿在今年上半年被判刑时，判决书提到了白勇强向其行贿情节。受贿者被判刑而行贿者仍端坐县公安局长位子，对中共不是绝妙讽刺又是什么？而这样的人又能积极“打网”，不是说明“打网”的终极目的是保护腐败又是什么？这一波抓捕浪潮之凶猛，既超过了两年前周永康主持的“茉莉花”恐怖事件，也超过了胡温十年任内抓人数量之总和。让人慨叹中共政坛是一蟹不如一蟹之外，更加凸显的则是一代狠过一代！习近平的“秋季网络大扫荡攻势”，震惊了许多曾经历过 30 多年前四人帮即将覆灭时那场同样凶猛的打击谣言专项行动的人士。或许，这场疯狂的大扫荡，将会成为这个红色帝国末日来临的前奏曲。这是黎明前的黑暗。

在民主国家，公民有质疑政府机关、人民团体和公众人物的权利，即使其中有不实之处，也属于民事自诉案件，当事人可就受侵害事实向法院起诉。这是任何一个法治国家的常识，而只有像中国这样的专制国家才会以暴力禁止人民说话，甚至动用警察和军队来干涉言论自由。因为诽谤罪是自诉罪，必须由被诽谤人主动起诉，法院才可受理，否则法院不能主动受理，其他机构更无权介入。如果有谣言传谣危害社会，首先是谣言受害人运用法律保护自己，而不是公安局自己给别人按上罪名去抓人。说谣言了郭美美、红十字会、张海迪，郭美美、红十字会、张海迪完全可以去法院告他们，蹊跷的是郭美美、红十字会、张海迪都不出来，而是公安局和央视出头。这是公权力侵害公民，搞有罪推定，以执法之名行压制社会言论之实。公权力肆无忌惮地压制公众言论，势必激起反弹，是要把公众逼到搞街头政治。

频频制造文字冤狱只会让更多向往自由、法治、宪政、民主的人士义愤填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离开中国，从而出现了“第三次移民潮”，主要的去向是新西兰、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等，而理由是污染、食品安全、公共服务、司法不公、子女教育等等。著名地产商任志强表示，移民的理由很多，但最重要的是安全感。

尾声：习总梦霸全球

1. 共党“球王”梦伪装成“中国梦”

马克思说：“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共产党宣言》这段话涵义深刻：1）共产党人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从“彻底的决裂”到“推翻全部”，马克思主义这种暴力的彻底性，确实是“一个都不宽容”。这种要用暴力消灭社会已有的所有文明，不论好坏清除一切制度的做法，确实邪恶到了极点。

2）“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意味着暴力消灭有产者。马克思全盘否定整

个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要砸烂整个旧世界。如果旧有一切（精神文化的；物质的；制度的）都否定了，人类岂不是又回到史前类人猿时代，需要从头再来，社会还能进步？

3)“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显然是“画饼充饥”的诱骗。2010年9月天才物理学家霍金指出：地球将在200年内毁灭，因为“人类基因中携带着自私、贪婪的遗传密码，人类对于地球的掠夺日盛，资源正在一点点耗尽……”这使我们联想到，马克思关于未来美好共产主义社会的描绘（如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不过是闭门造车，远离现实的乌托邦。

无产者在“获得整个世界”之前只是党魁的炮灰，他们地位甚至不如带锁链的奴隶。他们随时会被以“AB”团等罪名被杀害。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就通过肃反运动杀害了10多万红军。这些“无产者”即使坐了江山，依然会因权力之争被残杀，如文革内乱。

当然，“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的可以理解为“三垄断”：垄断权力、垄断财富、垄断思想。《共产党宣言》中确实有“三垄断”思想。可见，共党是一帮最疯狂的权力动物(霸权迷)，垄断了国家和社会一切，他们企图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夜晚管做梦！

4)“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复诵读着这句话，令人周身发凉，太恶毒了，它的危害性远远超过纳粹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全世界的乞丐、叫花子、无家可归者、身上一个硬币都没有的无产者联合起来！联合起来干什么，用暴力强行消灭私有制，抢银行！杀富豪！用暴力强行消灭私有制就是土匪主义。土匪主义就是一种破坏、侵犯、消灭私有产权的主义！私有产权是人与生俱来的天赋人权。消灭私有制意味着人们没有了“追求幸福的权利”，意味着共产主义是来破坏人权原则的，而不是来维护人权的。消灭私有制的性质就是土匪、强盗性质，其目的是为了建立专制的极权社会！所以，《共产党宣言》就是人吃人的土匪宣言。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也就是说：“全世界无产者”都是共党的炮灰，你们“联合起来”，共党就是“地球王”，共党党魁就是世界领袖，就是“全世界无产者”的导师。毛泽东自封自己是“第三世界”的领袖，也就是“全世界无产者”的导师，其“地球王”的野心路人皆知。问题是，这样的世界导师，全世界只能有一个。19世纪的世界导师是马克思，马克思死后是恩格斯，其后才轮列宁、斯大林。斯大林死后，毛泽东、赫鲁晓夫都想当世界领袖，于是中苏分裂，反目为仇，兵戎相见而发生了战争。这就解释了苏联和中共对外输出共产主义，扶植别国共产党，到头来都是反对自己的“地球王”冤家。如今朝鲜政权就宣称自己当之无愧的“地球王”，美帝南朝鲜都不堪一击，征服全世界是十拿九稳的。

中国梦即传统的中国皇帝的梦：中国皇帝一直以为自己是世界共主，是天下的领袖，但他们没有共党的“三垄断”制度和摧毁一切传统的野心，他们靠施仁政而来远人。习近平把“共党球王梦”说成是中国梦，这显然是愚弄中国老百姓，让民众效忠他这个当代帝王。

“共党球王梦”是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一直在做的：中国要在经济科技军事实力上赶超美国；赶超的方式，就是搞“三垄断”，用苏式政治制度+美国的科技。中共认定，中国要富国强兵，要成为世界超强，唯一的道路就是他们这伙人永远统治驾驭全中国民众，最大限度地根据他们的理想意愿调集动用享用全国资源，让他们对国民生杀予夺，随意让国民做出牺牲，然后拥有同美国旗鼓相当的实力，他们作为中共领袖，不但在国内万民跪拜一呼百应，而且走遍世界到处施威。从1955年开始，毛就热衷于超英赶美的“球王梦”。一开始是25年甚

至更多一点，到了 1958 年则脑子发烧发热，把这个赶超计划缩短为 5 年 3 年甚至两年。老毛痴人说梦大言不惭地声称：我们搞社会主义，要体现优越性，如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结果这个牛皮吹出去没多久，中国就陷入大饥荒，最终饿死 5 千万人。而事发当年，凡反对及怀疑者，皆被打成右派。今日，中共当局依然梦呓连连，把腐败顶透、危机深重的现实看成处处莺歌燕舞，赶超美国指日可待！

江泽民的亲信迟浩田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复兴，当然不会局限于我们在这片国土上，当然要扩展到全世界”。习近平现在带领共党搞“民族复兴”，要做“地球王”，却伪装成“中国梦”，按照中共权贵内部的讲法，就是要把美国变成在共党领导下的第二个中国。这是对全世界、对全人类带来不是和平而是战争，这非常可怕的。

习梦斯人--中共历史民间版（7）

2.中共颠覆美国却倒打一耙

2013 年 10 月，一部由中共军方制作的宣传片在网络热传。这部影片警告说，中国正在遭遇来自美国的威胁，中国自由派代表贺卫方、茅于軾在影片中被点名批判。10 月底在中国大陆网站上被屏蔽，部分讨论内容也被删除，疑遭宣传部门封杀。

92 分钟的纪录片《较量无声》由中共国防大学、总政治部保卫部、总参谋部三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关系研究所联合推出，国防大学信息管理中心 2013 年 6 月制作。总策划是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代表了军方立场，发出了军人激烈干政的危险讯号。

影片在开篇介绍了苏联倒台的经过，有叶利钦公开退出苏共的场面；影片骂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是叛徒。片中还罕见出现“六四”事件中天安门广场学生与军警对峙的画面。

影片描述苏联垮台后美国战略目标的转移，指责美国企图用 5 条战线颠覆中国：1.政治渗透：千方百计影响政治走向；2.文化渗透：企图改变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思想观念；3.思想渗透：依托舆论心战瓦解民众思想基础；4.组织渗透：培植代理人集团掩埋定时炸弹；5.政治干涉和社会渗透：培植反对力量扩大颠覆基础。

中共不仅利用这 5 条战线搞垮美国，中共还收买了许多政客、特务、华文媒体如世界日报、文学城等；而且还利用美人计、华侨、派遣间谍搞垮美国。前苏联培训出的美女性间谍统称“红燕子”，一度令敌国政要闻风丧胆。作为徒弟的中共，后来者居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1927 年周恩来说：“为了革命的关系，我们有时必须象妓女一样”去套牢敌手。斯诺登就是中共的美人计拉下水的。韩秀自传体小说名为《多余的人》，讲述了她作为中美混血儿遭受的歧视和侮辱。最令她难以承受的，是身为舞台剧演员的母亲将她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不顾一切地虐待陷害她。例如，小女孩被仇视她的母亲用烟头烫伤、孩子高烧时不准他人去请医生。母亲还用一把大剪刀，恶毒地将少女韩秀只穿过一次的郁金香花裙剪成碎片。原来，1940 年代，这位女演员曾在重庆为中共效劳，是周恩来领导下的女谍，曾以美色把一位美国左派外交官拉下水。她本应受到中共的奖赏，却因和另一个美国军人——“中国人民的敌人”生下了韩秀，因此无法在 1949 年之后的红色中国飞黄腾达。所以，这位红色女演员狠心残害自己的女儿以向中共表达忠诚与悔恨。在文革疯狂年代，她的母亲竟然多次写材料，向有关部门揭发和诬陷女儿是“美帝国主义的孝子贤孙”，韩秀因此于 1967 年从山西农村亡

命到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最戏剧性的是，韩秀到美国后两年，怀着宽恕之心把母亲接到美国。这位母亲经常在韩秀上班时跑到中国大使馆，并在韩秀的电话机里安装窃听器。这位共党女谍不仅没慈母的胸怀，而且是自私、变态、恶毒的象征。

常委俞正声的哥哥俞强声是特务头子康生的干儿子，曾任中共国安部北美情报司司长，1986年携带机密文件叛逃美国，导致中共在美国潜伏40多年的间谍金无怠暴露被捕。金无怠发出呼吁，希望中共当局能与美国政府谈判，像美国与苏联以前曾经做过的那样交换间谍，让自己回到中国。但可惜的是中共却卸磨杀驴、过河拆桥。中国驻美国大使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这样说：“金无怠事件是美国反华势力编造的，中国政府爱好和平，从来没有向美国派遣过任何间谍……”为中共立下卓越功勋的金无怠就这样被中共无情的抛弃。1986年2月，绝望中的金无怠在看守严密的监狱中用购物用的塑料袋套在自己的头上窒息而死。此后，整个中国在美国的间谍网几乎损失殆尽，中国在情报战线开始处于被动地位。邓小平为此大怒，两年后，俞强声到南美某个国家去旅游时，被中共五名特勤人员追到海中溺毙身亡。

中共要防堵一大堆西方东西，西方价值观、西方敌对势力、西方文化。习近平胡说：西方所谓普世价值不过是对我们搞渗透的口号，不过是和平演变的阴谋。他们目的就是要同我们争夺阵地、争夺人心、争夺群众，最终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18大讲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这么自信，就没必要防渗透反和平演变啊。

中共一贯叫嚣美国敌对势力对中国渗透，真是贼喊捉贼。美国行得正，根本不怕中共和平演变它。在2011财政年度中国有800多个官方媒体记者在美国工作，而美国的官方媒体只有2个人获得中方签证。中共在华盛顿建立了中文电视台，CCTV4可以在美国随便看，中共的国家形象广告可以在时代广场随便放；中共的孔子学院可以在美国随便开，有40多个孔子学院；中共的五星红旗可以在美国随便飘，中共的红歌可以在白宫随便弹，中共的反美爱国游行可以在美国随便游，《中国可以说不》可以在美国随便说，《中国不高兴》可以在美国随便印，《建党伟业》可以在美国公映。中共的网络防火墙全世界最先进。但很奇怪，从来没有听说西方要抵制东方价值观、东方敌对势力、东方文化侵略。这说明了一个真理：有自由的地方不用防火墙。有90%以上的中共中央委员的子女亲属居留在美国。而美国在中共只有骆家辉大使，他坐经济舱，上便餐馆，简装旅游，在五毛提示下，向中国公布了他年年在美国公布过的个人年收入和财产债务。究竟是谁在渗透谁，谁想要打倒谁？美国始终是中国人民朋友，而中共所有头头们却始终心怀叵测地反美和掠夺中美两国人民，图谋打垮或搞垮美国，做世界老大。在2011年美国民众占领华尔街时，派几个中共特务摇晃五星红旗。胡锦涛得意忘形地在奥巴马欢迎他的国宴上，让被收买的朗朗演奏反美歌曲《我的祖国》，以为美国在金融经济危机打击下，再也起不来了，中共要统治世界了。中共的这些小打小闹的渗透无损于美国的伟大宽容和大度，反到反映出中共的无耻、可怜和低级下流。

事实上，苏共和中共一直都在千方百计地想搞垮美国，然而其反人民、反人类政权的本质，怎么能摧毁一个强大的先进的人民亲手选举出来的自由民主的政府呢？奥巴马说：“上帝赋予所有人平等和自由的权力。对于那些依靠腐败、欺骗，压制不同意见等手段，巩固权势的人，我们提醒你们，你们已经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可见，根本的问题是中共“已经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共党一开始就是“反人民，反人类，反天理”的无恶不作的反动派。

刘上将主导的《较量无声》片子试图把美国描绘成一个专事捣乱，完全邪恶的帝国。如果美国只是一个完全邪恶的帝国，那中国为啥要搞改革开放和邪恶的美国交往？为什么这个邪恶

的帝国能够吸引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和全世界人民包括中共高层大多数的子女亲属，都要来美国旅游，学习，甚至移民？为什么中共有 118 万裸官，而绝大多数都在美国？难道这些中国人是都喜好美国的邪恶而厌恶中共的善良？

姚监复说，中国所谓民间战略家东方毅曾写过一本名为《雄主与拓展》的著作，书中阐述的观点比纪录片《较量无声》更为激进，而中国军委副主席以及中国核工业部前部长曾为此书作序、评论。“他的结论就是中美必有一战，刚才你说（颠覆中国）五条，他的书写了七八条，而且要准备打仗、如何还击。”姚监复表示，中国对美的战略思想没有“改旗易帜”，而是一直沿用毛泽东时期的指示，即“做两手准备”。他说，“一手就是谈判，另一手就是准备打仗，战则能胜。不然中共为何搞核潜艇核弹呢？所有军人都是准备打仗的。”

纪录片《较量无声》在批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通过各种渠道渗透中国时，出现了刘晓波、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南都》周刊、茅于軾、贺卫方、夏业良等学者、机构的画面，批判他们是美国美国的“帮凶”——在中国进行颠覆活动的代言人。

2013 年 1 月 13 日，被认为军内鹰派代表的少将罗援开通新浪微博，头一条就声称自己要借此“占领重要的舆论阵地”，此般高调迅速引发网友关注，BBC 则形容这是一篇“战斗檄文”。罗的“红二代”背景随即浮出水面：他的父亲罗青长曾任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长期负责情报工作。更重要的是，罗援与刘少奇之子、总后勤部政委刘源的关系非同寻常，2012 年《南方窗》杂志曾有一篇报道，形容罗、刘二人“是一起在兵营中摸爬滚打过来的发小”。2 月 23 日，罗援在微博上提出“内惩国贼”的口号，目标直指主张走宪政之路的自由派。

2013 年 6 月 4 日，中南大学教师孙锡良通过微博提出停止贺卫方党籍问题，他说：“北京大学现在必须做一件事：停止贺卫方的党籍。理由很充分：贺要求中国必须立即实行宪政，不能再搁置下去，而且他又限定宪政完全与社会主义无关。在这种直截了当的表示下，北京大学还能无动于衷吗？共产党还要无动于衷吗？要么承认贺卫方正确，要么让贺卫方退出共产党，没有兼容性，我等结果！”虽然这招致了众网民斥责，但这主张反映了毛左的立场。

北京大学的法学教授贺卫方因为曾发表“共产党一直是非法的”，“希望共产党形成两派、实行军队国家化”的言论，被影片《较量无声》指称为“党内少数腐败分子和政治变节分子，或公然损害国家利益，为西方利益集团服务，或公开发表反党、反社会主义甚至卖国的言论，疯狂程度，令人瞠目。”贺卫方说，我说过这话，那不过是发自内心地希望我国能走向民主化，而民主不正是我国宪法明确规定的么？

在影片中，茅于軾的“罪名”是公开为汉奸汪精卫“翻案”。茅于軾表示，《较量无声》中对他的指责纯属无中生有，他从未给汪精卫翻过案。不过，茅于軾说，中国军方借这部影片对他进行批评，他并不意外。他说，“我说武器比毒品更有害，全世界都禁止毒品生产交换和运输，但全世界对武器生产交换和运输却没有任何限制，这是我确实说过的。道理很简单，毒品只是害自己，武器害人害己，到底你发展武器是救中国还是消灭武器救中国。”茅于軾声明，想颠覆中国的绝对不是他茅于軾而是中共。“我觉得他们在颠覆中国，我在保护中国。要裁军是联合国的宗旨，怎么这些人发昏到这种地步呢？”

1949 年中共颠覆了中华民国，而且颠覆了中国人的“祖国”。2013 年 10 月 1 日清晨，中共“央视”五频道的播音员施丹小姐在节目开始一张嘴竟然是：“观众朋友，首先共同祝愿大

家在我们祖国诞辰 64 周年的时刻心情快乐！”祖国仅 64 岁？央视另一频道一位播音员，更十分深情地哼起一首歌“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这就是说，1949 年 10 月 1 日以前“中国”竟然还未出生！至于此前之中国，被中共称为“万恶的旧社会”！这清楚地表明，中共政权=国家=祖国。这与封建时代的“朕即国家”一模一样。这就充分说明，中共的“爱国”就是爱党服从党！中共还通过国家暴力恐怖不断地颠覆中国人的思想。把中国的“人”字颠倒成了“丫”字，中国人成了中共权贵的通房丫鬟，成了中共的屁民和奴隶。

《较量无声》公开批判有些政府部门，“利用国家资源为西方思想文化渗透鸣锣开道”。既然文化领域、党政机构如此不洁，是不是要再来一次文革的军管、支左？网民反问：“既然如此，中国为什么要买那么多的美债，并且是美国的最大债主？这不是‘资敌’吗？！”“又说美国现在是战略伙伴的关系，又说是颠覆我们，究竟那种说法是对的？如果说美国要颠覆中国，那为何中共的高官要把他们的钱、把家人都送到美国呢，做卧底吗？”林子旭认为，影片的功效是欺骗老百姓，因为目前中国社会危机四伏、矛盾重重，老百姓对中共怨声载道，中共巧妙的将这些民怨转嫁给了美国，这样中共就可以获得一些喘息的机会。

这部名为《较量无声》的作品得到中国左派和民族主义者的热捧，但外界批评该片充斥着冷战思维和煽动话语，把一些国家人民追求自由与民主的言行都妖魔化，甚至把因缺乏民主法治而导致的腐败，以及中国近年发生的维权事件和公民抗争等，都归为美国的阴谋和渗透。该片还无中生有地指责美英驻香港领事馆是半公开的反华基地，参与策划香港的社会运动。与此前中共反击普遍价值的舆论战如出一辙，是以网络互动方式进行洗脑宣传。

美国为什么世界第一？答：没有共产党。

冯骥才说：美国没有组织部，所以没有买官卖官；美国没有国土部，所以没有强拆，美国没有铁道部，所以没有黄牛倒票；美国没有宣传部，所以记者可以探究真相；美国没有文化部，所以文化繁荣；美国没有广电总局，所以能拍出大片；美国没有科技部，所以科技发达；美国没有国家民委，所以民族和睦相处；美国没有宗教局，所以宗教能济世利民。

美国两党也开代表大会。四年一次，在各城市轮流举行，一般选择室内体育馆，由各州党组织推举代表，大家欢聚一堂，选举党的总统候选人。所有党代会的费用全部由政党自己筹集，国家不给一分钱。每次党代会，场外的示威活动是一大景观，通常示威者人数远远多于党代表。可以说他们是不请自来的非正式代表。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可以随便加入。只要你登记选民时勾一下就行。不要交党费，党也没什么决定要你服从，没什么纪律要你遵守（守法就行），没什么秘密要你保守（又不干坏事），更没什么东西要你牺牲。当然你也不用对党忠诚，可以随便叛党，也可以随时回来。领导一个超级大国的政党居然那么不严肃。

美国是历史上总统遭暗杀最多的国家，共有 8 位。他们是林肯、加菲尔德、麦金莱、肯尼迪、杰克逊、富兰克林、杜鲁门、福特、里根。其中前 4 位不幸身亡。但政府并未藉此搜缴武器，限制人民自由，大举实施维稳。因为美国人知道，这是民主的必然代价。民主的目的主要不是用来保护领导人，而是用来保护老百姓。

1998 年印度尼西亚排华，1200 多华人惨遭屠杀，1000 多妇女遭强暴。中共表示不干涉别

国内政，并在国内封锁所有相关消息。最后，在美国武力威胁下，印度尼西亚当局才收敛了迫害华人的兽行，事后印度尼西亚华人打出“宁做美国狗，不做中国人”的条幅。

美国富人喜欢到中国领养小孩；中国富人喜欢到美国去生小孩。美国市长见了谁都要讨好；中国谁见了市长都要讨好。美国老百姓可以搞婚外情，官员不可；中国官员大搞婚外情，老百姓不可。美国知识分子以批判政府为使命；中国知识分子以歌颂政府为使命。美国批判政府最厉害的知识分子得大奖；中国歌颂政府最厉害的知识分子得大奖。美国学校没有政治教育，而精英都很爱国；中国学校强调政治教育，但精英纷纷移民。

习近平 819 讲话：“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它防线就很难守住。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10 月 15 日刘亚洲在《共军报》发表文章《牢牢占领意识形态阵地》。文章指出，意识形态较量的实质是争夺话语权的较量，谁控制了话语权，谁就能引导民众。文章称，上世纪 60 年代之前，谁掌控了纸质媒体，谁就拥有话语权；上世纪 90 年代之前，谁掌控了电视媒体，谁就拥有更多话语权；而进入新世纪后，谁掌控了互联网，尤其是微博客资源，谁就拥有最大的话语权。刘的“投名状”永远成不了真理。

一个政权的稳定是靠掌握话语权吗？戈培尔掌握了绝对的话语权，并没有挽救希特勒的灭亡。齐奥塞斯库被杀是因为没有掌控媒体、没有少编造谎言吗？恰恰相反，所有专制政权都是奴役人民的政权，他们要掩盖自己的邪恶，只能编造自欺欺人谎言，正如苏联总理雷日科夫所说：“无论在报纸上、新闻还是讲台上，都谎言连篇，我们一面沉溺于自己的谎言，一面为彼此佩戴奖章。”问题在于专制独裁者编造谎言容易，而圆谎就难上加难，久而久之，就矛盾百出，前言不搭后语，当谎言都无法维持而被民众一眼看穿时，就只能倒台。

美国电台报纸书刊都是民办的，说啥写啥都由民做主；中国电台报纸书刊都是党办的，说啥写啥都由党来审定。白岩松说：“在美国，谁都可以办电视台，但政府不可以。在美国，什么报纸杂志都能找到，就是找不到党报党刊”。按照刘的逻辑，一个没有话语权美国政府一天也存在不下去。事实是对刘上将最好驳斥！

3. 共党的唯一目的就是一党独裁、永远垄断政权

共党“第一要务”就是掌握政治权力。马克思主义的常识是什么？是永久地独霸政权。独霸政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最基本的常识。《共产党宣言》说：“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和其它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目的是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这说明夺取政权并永久地独霸权力是共产党的最起码的目的。

共党的所谓革命，其目的是攫取国家政权。因为在他们看来，国家政权是可以抢来的，是从枪杆子里面出来的。谁取得了国家政权，谁就取得了实施专制的特权，谁就可以以天下奉一人，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私欲。独占国家权力对统治者具有极大的诱惑力。1966 年 5 月 18 日林彪说：“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1967 年 1 月 22 日发表了毛泽东审定的《人民日报》社论说：“有了权，就有了一切；

没有权，就没有一切。千重要，万重要，掌握大权最重要！”毛把国家权力说成“是一个护身的法宝，是一个传家的法宝”，而不是社会的公器。国家政权就被视为党私有。

共产党的唯一目的就是一党独裁、永远垄断政权！政权不在自己手里的时候，共党为夺取政权而斗争！一切为了夺取政权，提出民主纲领却不是为了实现纲领，而是为了夺取政权。譬如：1944年3月12日周恩来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逝世19周年大会演说道：“我们认为欲实行宪政，必须先实行宪政的先决条件。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有三个：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开放党禁；三是实行地方自治。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很多，但目前全国人民最迫切需要的自由，是人身居住的自由，是集会结社的自由，是言论出版的自由。”政权到手之后，共党为永远牢牢抓住政权而斗争，丢掉民主口号是因为害怕丢掉政权，发展生产力也是为了害怕丢掉政权，“发展是硬道理”都是谎言、是放屁！譬如：2008年刘晓波要求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开放党禁、实行地方自治而被共党判了11年的徒刑。

权力不仅使人腐败堕落，还会使人变成谎话连篇、颠倒黑白、指鹿为马、心黑手辣，甚至谋财害命无恶不作的邪恶魔鬼。共产党人是比尼采所说的权力意志还要狂妄、还要极端千万倍的狂徒。共党党魁都视权如命，为争权，杀得天昏地暗，血肉横飞，一旦夺得，就小心翼翼生怕丢失。共党怀抱不可转移的权力，又唯恐权力转移，因此而惴惴不安，患上一种失权过敏症。人民表达意志的批评监督、请愿示威，动不动就被说成“夺权和反夺权”的斗争；甚至人们练练法轮功，都被看作颠覆活动。在他们的关于权的定义中，从来就没有“人权”这个词，甚至也没有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这几个词。在共党专制者的心目中，邓小平称得上一个成功的厚黑榜样。他用自己的成功证明：面对成千上万手无寸铁的民众，要不怕流血，敢于大开杀戒；面对全世界舆论的齐声谴责，要敢厚着脸皮顶住，充耳不闻。只要保住了权力，其余一切都好办，到头来别人会自动转向，如果能抛出物质的诱饵，不愁没有人拿出良心作交换。暴君生前声威显赫，即使奄奄一息，犹能一言九鼎，死后亦备极哀荣。

共产党过去革命的目标就是为了夺取政权，取得政权后则是千方百计巩固延续政权，为此要对权力设定禁区进行垄断，不容任何人染指。共产党的作风就是绝对地崇尚权力，追求权力，不断地向上爬几乎是中共官场大小小人等孜孜以求的目标。中共高官和他们的子弟们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权力”是他们的原则，崇拜权力是他们的思想方法。这一点使他们不同于宗教。宗教是权力为信仰而存在，共党则是信仰为权力而存在。为了保住权力，他们可以改变信仰，可以是共产主义，可以是民族主义，也可以打出民主旗号。无论什么旗号，都是夺取政权维护政权的幌子；他们视百姓为工具为炮灰为屁，操控民众，让民众为他们贡献一切直至牺牲生命的这一原则是不会改变的，否则他们早就引咎下台了。

永远牢牢地抓住政权，是共党纲领背后的纲领，生命之上的生命，目的之中的目的。共党“硬道理”、“第一要务”就是垄断政权、“坚持党的绝对领导”。中共本质特征上是一个与人类为敌的马列邪教，它要依靠权力维持对人民的统治。一旦失去权力或者权力被约束，它就等于失去了一切，不仅统治保不住，欠下的血债也将要被清算。这是中共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放下的。一向无法无天的中共岂能愿意站在笼子里低人一等地跟人民说话？外国人可以实现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去，但共产党绝对不会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去！要想限制权力，只有把共产党关进笼子禁止起来，这才是根本解决之道，也是中国人的愿望。不是让它在里面养老，而是交付人民审判，最后彻底清算清除，从根本上铲除这个毒类、恶类。

4. 共党的霸权罪（垄断国家权力罪）

公共权力就是社会通过其代表建立起来的支配服从秩序，以实现其成员共同利益。所以，权力 **power** 姓公，为社会大众所公有，这样就有了公权力之说；而自然权利 **Rights** 姓私，所以有个人权利之说；权力与权利除了公、私之别之外，还有强制与自愿的区别。

政权的公有性决定了国家权力为该社会的所有居民大众所有。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有权决定国家由哪一个党来领导！今天的中国不是一家一姓之中国，也不是一党一派之中国。任何党都不能自封为领导党而强迫人民接受其领导。也就是说：是否接受某党的领导，应当依靠民心即应由广大选民自由票决，而不能由“宪法”规定；只有人民的自由选择，才能决定某党是否可以执政。对于某党所提的候选人，选民有权投赞成票，也有权投反对票。每一张反对票对于执政党的执政地位无疑都是一个负面因素；但是，只有当反对票同样受到法律保护，选举制度才是民主的，获胜者的执政地位才是合法的。这就是相反相成的道理啊！

如果要以宪法的强制力来确保中共的领导地位，那就要对每一位敢对共党投反对票的人予以法律制裁，那就等于剥夺选民的自由投票权，那就意味着共党反民主、反人类。可是中共的霸王“宪法”序言规定，中共是中国人民的领导者和中国历史命运的掌控者。这意味着，国家恐怖主义性质的专制权力，迫使所有中国人无条件服从中共官僚集团的政治统治，从而剥夺了人的最基本的政治权利——政治选择权，造成“选举”没有实质意义。

共党宣称只有它能领导人民，显然违背了人民意志。现行宪法规定由一个特定政党来领导人民，这就造成了这样一个荒唐的政治现状，即非党的人民永远无权选择和监督党的领导人，而党的领导人却永远有权统治他们。共党把己党的领导地位放在第一位，要人民天天念经一样表示服从党的领导。由于人民无权自主更换执政党和政府领导人，党事实上异化为骑在人民头顶的异己势力；当局把一切不同政见者都施以惩罚与迫害，这就造成了政府权力彻底非法化的局面。这必然造成党权的终身制和永久制，必然造成大陆社会特权横行和政治极端腐败。中共害怕人民与其分享权力，不允许人民有结党的自由，只容许几个接受它领导的“民主党派”的存在，不允许民主党派和人民对它的所作所为进行任何监督。让自己来监督自己，这可能吗？这些党官不是圣人，不可能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而不动贪婪之心。被抓的腐败分子只好抱怨自己抱错了大腿，站错了队或运气太差而成了内部派系斗争的牺牲品。

毛泽东说过：“我们必须相信党”，也就是说不能怀疑党（魁），更不能反党！这就神化了党魁。毛泽东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又说：“东西南北中，工农商学兵，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便奠定了共党的霸权地位。莫非连人民对它的批评监督也要受其领导吗？“你们可以批评我，但必须根据我的指示来批评；你们可以撤换我，但必须经过我的批准”。这说得通的吗？只要党是领导一切的，它就可以颠倒黑白、指鹿为马，小民就必须助纣为虐，为共党的错误唱赞歌，“以人为本”“反腐倡廉”不过是骗人的把戏。“本”早被共党所吞噬。党领导一切，党即本。这就使公有的国家权力异化成了一党之私，这就是篡夺了人民的权力，共党犯了霸占国家权力罪（垄断国家权力罪）。

人是一切关系的本，这是一个自然事实，不是外力强加。事实上，整个社会都是人的派生物，包括政权、政党。人的存在乃是大自然的事实，是生命存在了之后才派生意识的，又从意识里派生出政党，所以政党不是自然界的客观事实，它仅仅是人实现生命需要的一种手段和形式，它有什么资格来领导一切呢？“人”的存在生出“意识”，“意识”生出“政党”，这“政党”是“人”的孙子，它怎么倒过来霸占一切呢？党领导一切，人就倒了霉。只要党是领导

一切的，他们就只对党的存在负责，即使杀人也在所不惜，1989年天安门杀了一回，19年后又在拉萨再杀。何哉？“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个原则决定的！

共党的罪恶体现在阶级斗争，暴力反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财产制度，毁灭一切传统、道德、宗教、习俗、习惯和文化等等，是马克思原教旨决定的。从法律上看，共产党员都是标准的罪犯。从国际法上看，共产党犯下了反和平罪、战争罪、反人类罪、群体灭绝罪；从内国法上分析，各国共党都犯有杀人罪、群体屠杀罪、抢劫罪（抢劫公私财产罪）、诈骗罪、贪污受贿罪、酷刑罪、信仰灭绝罪、宗教迫害罪、破坏自然环境资源罪。共党对中国人民犯下了十大罪：一，分裂中华、颠覆国家政权罪；二，策应日寇，汉奸资敌罪；三，勾结苏俄，出卖国土罪；四，制造饥荒，虐杀国民罪；五，引进马列邪教，毁灭中华文化罪；六，逆天悖德，破坏自然环境罪；七，消灭私人财产，摧毁民心道德罪；八，劫掠国民，培植贪官污吏罪；九，输出革命，祸害别国人民罪；十，迫害民主，垄断国家权力罪。

5.要“两杆子”的中共

毛曾直言不讳：他的政权依赖两个法宝，枪杆子和笔杆子。文革时期流行林副主席语录：“枪杆子和笔杆子，都是革命的‘两杆子’，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都靠这‘两杆子’。”

笔杆子在共产党的词典中就是谎言，让人们生活在谎言中不明真相：纵然在地狱，也以为在天堂，纵然做鬼，也以为幸福。制度性谎言是社会主义野蛮制度的根本标志。皇帝拿破仑说，“三张敌对报纸比一千把刺刀更可怕”；所以，他极力实现对报纸的控制，使其为己所用。同样，“皇帝”毛泽东 1959 年就说，“一个高级社[即生产队]一条错误，70 几万个生产队，70 几万条错误要登报，一年也登不完。这样结果如何？国家必垮台。就是帝国主义不来，人民也要起来革命，把我们这些人统统打倒。办一张专讲坏话的报纸，不要说一年，一个星期也会灭亡的。专登坏事，那还不灭亡啊！”那时，毛泽东把农民赶进食堂，结果饿死了 5 千万农民。造成河南饿死了 900 万的省委书记吴芝圃因紧跟毛泽东批判彭德怀有功，易地做官，1962 年 4 月被毛泽东调任中南局书记处书记，负责文教工作。而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人因如实讲出大跃进中的饿死人的问题而被打成反党集团。

但是光有笔杆子制造谎言是不够的，共产党深知只有刺刀架在天空时谎言才能成为成功的谎言。这就像赶羊进羊圈一样，羊前面是谎言的羊圈，羊后面必须是刺刀和鞭子，这样羊才能乖乖的进他们谎言的羊圈。这个枪杆子加笔杆子，刺刀加谎言正是共产党统治的本质。这两个杆子统治着的国家实际上是一座大监狱、一座活火山，这个被他们压在地层和火山下面燃烧着的滚烫的岩浆，正是中国十亿以上的水深火热的老百姓。

共党政权是比满清专制政权要腐败、残暴、专制得多的暴权，仅从一个侧面就能证明。1792 年，满清政府最高层官员 53%是满族人或蒙族人或其它少数民族，43%是汉人；在中层大约是对半，各 50%，而到基层县一级的官员近 90%是汉人。由此可知：满清政权虽然专制，但是它还分权，还把好多权力分给汉人，分给其它少数民族。可是共党政权是一统天下，把所有的权力都牢牢掌控在中共一党手中，它靠共军、武警以及法院、警察、监狱，就是军、警、法、司所有的国家暴力机器，以及控制所有的媒体，对全民进行全方位，无恐不入的极权恐怖统治。所以共党政权是比满清政府要专制不知多少倍的流氓政权。

全世界有过 90 个共产党，其中 44 个共党夺取了政权，这 44 个共党政权无一例外，全部

都是极权专制暴政。唯有一个共党政权它的罪孽不是那么深重，就是 1971-1973 年的智利阿连德共党政权，因为这个政权是当时智利全国自由大选产生的政权。这是全世界唯一的一个没有杀太多人的共党政权，只是经济上搞得一塌糊涂垮台了。其它所有的共党政权都是杀人如麻，都是犯下一系列的共产暴政的罪孽，全部都是一犯再犯。所以说全世界共产党政权都是罪恶魔鬼的化身，共产党是披着羊皮的狼，而狼绝对无法改变吃羊的本性。

国际共运史无可辩驳地证明：所有的共党都是极端自私自利、残暴无耻、虚伪至极、道德沦丧、抢劫成性、杀人如麻、毫无人性而充满兽性的；同时道德高调唱得最动听、口头说的与内心想的背道而驰，亦即人人说假话、尔虞我诈、不仁不义；共党政权纯属依靠暴力恐怖、欺骗封锁信息来维持其流氓暴政的。正如斯大林承认的那样：“共产党党国体制能够生存，唯有对其人民包括高级官员完全与世隔绝才有可能”。朝鲜、古巴、中国、越南之所以还在苟延共产体制，最重要的原因是严密封锁信息并用虚假信息欺骗公众。

在一个一党专权的社会里，不受制约的权力是自由、公正的敌人。绝对的领导权扼杀了任何自由思想。在这样的社会里，没有自由，没有平等，没有善，权力当道，肆无忌惮地人权自由。思想灌输成为权力者执政乱国、执政祸国、执政殃民的基本要务，通过思想灌输达到控制人的精神的目的，使人成为行尸走肉，把人降到了动物的境地。外在的权力强制无处不在，无处不有，无处不渗透，无处不洗脑。它如同奥维尔《1984》里的真理部，真的可以假，假的可以是真，有可以为无，无可以为有，真理部是谎言的制造者和灌输者，党魁是真理的发源地，他看着真理部，也在凝视着所有人。党魁在看着你，让你魂不附体。也就是说：党主宰了人们的思维。“党主思维”就是以一党的立场作为最高的评判标准，以一党的利益作为全民的价值取向。在“党主思维”的强力操控下，从来就没有正常的是非观。当国家的分裂状态最有利于这个党时，它会为“分裂有理论”制造出千百条理由来；而当政令统一的环境更便于党阀权贵掠夺财富时，它又鼓动人民为“统一神圣论”献上了无数赞歌。它把历史上纵情抢劫放火誉为农民起义的“伟业”，今天它又把镇压抢劫放火当成“大业”。这样一个连是非善恶都找不到定论的国度，如何能够光明磊落地自立于世界国家之林！

独裁者控制言论和钳制思想久了，连他们自身也被这种单向性宣传灌输所愚弄欺骗。由于共产党靠暴力夺权，其政权不是建立在“人民同意”的基础之上。由于其政权没有民意的合法性，所以就特别需要控制言论和钳制思想，以欺骗愚弄人民，让人民变得老实听话。由于共产党人先天性的“防民之心、甚于防贼”的心理，所以就需要用“高墙森森、宫禁严严”来把自己禁闭起来，以免被仇恨的人民所掀翻。经过长期的禁闭生活，他们自然就成了脱离社会、脱离人民“晋惠帝”司马衷啦。经过几代的愚昧和劣质化的繁殖积累之后，他们会变得越来越愚蠢、弱智和低能。就像九斤老太所说的那样：一代不如一代。

习总上台时哀伤苏共死时“竟无一人是男儿”，发誓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是玩违宪的枪杆子把戏。以领军为其第一要务，竟成为中共的最崇高事业。习近平“登基”后在 2012 年 11 月 16 日下午首次主持中央军委的第一次扩大会议上，就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确保“枪杆子永远在忠于党的可靠人手中”。2013 年 1 月 28 日习近平视察北京武警部队，他一口气提出“三个绝对”：要求“确保部队绝对忠诚、绝对纯洁、

绝对可靠。”“要深刻认识当前维稳形势的复杂性和武警部队在维稳工作中的重要性，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保持箭在弦上、引而待发的高度戒备态势，确保部队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习搞武力维稳对内镇压，是要做一个能挽救共党灭亡的“真男儿”。

毛说夺取政权需要“二杆子”，一是枪杆子，二是笔杆子。习近平上任后即先掌控枪杆子，前大半年都一直在安抚与收买军方，等到“枪杆子”稳妥放心之后，又来炫弄“笔杆子”。习总发誓要坚持党对舆论媒体和精神领域的绝对领导，这是玩违宪的笔杆子把戏。凡是实行意识形态的管制地方，都是因为那里的制度背离了人性。如果放任人性的自然发展，其制度就会被人性否定，所以共党才强调“意识形态的救亡图存”。在一切需特别强调意识形态的国度，其政权必是反人民的。所以，习政权当然是反人民的。习近平 2007 成为接班人，2008 年就抓了刘晓波，2013 年他又抓了许志永，难道习还想再制造个诺贝尔奖？

习近平一手抓暴力维稳，一手抓红色“中国梦”意识形态宣传，依然坚持“不走邪路”的僵化立场，导致今日中国贪污腐败，正义沦陷，民怨沸腾，群体事件不断。

6. 习近平——拿破仑三世转世

在习近平心里，有一个梦想，要成为造就千秋伟业的人物，只有“一边倒”，回归马列毛，施展霹雳手段，才能实现这春秋大梦。到 2021，在中共百年史上，彪炳史册的将是三个人，一个是开疆建业的毛太祖、另一个是奠定国基的邓世祖，再一个就是实现“中国梦”的习圣祖。这也凸显出习近平身上带有毛泽东式的行为举止，无怪乎京城人称其为“习泽东”。在文革结束 40 年的今天，习近平大量使用毛的语言，这说明，习近平是多么地落后与腐朽!!!

习近平就任国家主席不到一星期，就急急忙忙地跑到俄罗斯朝拜半独裁者普京。习近平出国前故意打扮成毛泽东模样公开亮相，得到帝国毛左和权贵红二代们的一片欢呼，这不是要公开拉普京下水扮演斯大林吗？普京在看清了习近平的来意后，于是，就给习近平“一瓢凉水”作为见面礼。普京派一位对华强硬的新手部长迎接伟光正的新掌门人。诸位想想，俄国派一位“对华强硬的新手部长”而又不是俄国中央政府的官员来接机，是瞧不起习近平！普京摆明与习近平的中共划清界限，用心良苦。更麻烦的是俄罗斯的普京夫人没有全程出来配合咱习夫人演出，习夫人从一下飞机就落单儿，除了陪同参观一圈克林姆林宫外，习夫人出去活动也在跑单帮。如果说这是普京故意在明处给习近平难堪还不如说这是普京故意在暗处给习近平使绊儿。外交场合上从来都是讲究对等的，对等的礼遇该是常态。而普京夫人却故意冷遇习夫人放她鸽子，这其中必然少不了玄机。

爱因斯坦曾言：天才的专制主义者总是由白痴来继承。习近平继承毛泽东的专制衣钵，真是白痴一个。习近平装作毛的派头去俄国见普京，去俄国之前在国内还要公开以“毛派头”亮相宣传，人家只能“敬鬼神而远之”。这是习近平一心想学毛而错估形势的自作自受，世界上任何一个真正的民选总统会跟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套近乎呢？当然，中共和习近平为了给自己装面子，忽悠中国老百姓，不得不派新任副总理汪洋先期抵达俄罗斯，然后为习近平接机，助阵的意味甚为浓厚。就是说，你普京不重视我，我自己重视自己，自己欢迎自己还不行？过去老江和老胡在访问美国加拿大等国时，要花大把银子收买华侨和留学生到机场列队欢迎和喊口号。中共要造假给中国老百姓看哦。不知中共的莫斯科大使馆这次是否胡规习随，

发钱给当地华侨和留学生组织欢迎习主席夫妇的队伍？据说，胡锦涛某年访美，华盛顿的中共大使馆给到机场欢迎人每人发 50 美金，而芝加哥领事馆是为了节约还是中饱私囊，给欢迎的人的钱要少得多。结果引起不少芝加哥人到领事馆上访，闹的很不愉快。

苏共倒台，按照习近平的标准，普京当时也是拥护叶利钦的，不是男儿，为什么现在又要朝拜普京？一个骗人民、欺压掠夺人民、反人民的中共头头，如果不为民做主，就没有广大的民意支持，甚至被金三都玩得团团转，还能不被普京玩弄于鼓掌之上？

马克思说拿破仑三世（1808～1873）没有拿破仑的雄才大略，却处处模仿他的伯父，显得很可笑。也就是说，他没有伟人之才，却有伟人之志，父辈“轰轰烈烈”的伟业，总是令他神往，而志大才疏的结果，自然令人可笑。现在已看得很清楚，习近平对毛的崇拜，不是他父亲曾被毛迫害这段家庭经历所能改变的。他把这段苦难看作是天降大任于他所必要的磨练。当然，习近平和拿破仑三世一样，对自己并没有真正的自信，这也就是他为什么把巩固个人权力的希望，寄托于国民的奴性和农民的愚昧，而不是民权意识的觉醒。

拿破仑三世首先靠选举成为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总统。在 1848 年 12 月 10 日的总统选举中，他取得了压倒性优势，以 560 万票击败了仅获 150 万票的竞争对手。因为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投了他的票。因为在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把土地分给了农民，拿破仑制定的《民法典》（1804）确认了农民小块土地所有制的存在。他们把拿破仑与他的侄子联系在一起，农民的轻信使他当了总统。在总统任期内，路易·拿破仑政绩显著，逐渐流露出称帝的野心。1852 年 11 月，法国举行全国公投，97%的人都支持路易·拿破仑称帝。于是 12 月 2 日他黄袍加身成为拿破仑三世，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改造成了法兰西第二帝国。路易·波拿巴是通过相对公正的竞选上台的，他在选举中获得的支持度，远远超过日后的希特勒及纳粹党。他敢于直接面对农民和工人等“劳动人民”发表演讲，反倒比工人出身的社会主义政党的领袖们更受底层民众的欢迎。信仰圣西门主义的群众是其主要支持者，他们甚至称拿破仑三世为“社会主义皇帝”。拿破仑三世关注基层人民，其著作《消灭贫困贫穷》为他赢得了工人和农民的支持。他在位期间，确实也致力于改善基层的工作环境，在 1864 年，他甚至不顾大商人和企业主的反对，赋予了工人以罢工权。

与之相比，习近平的王位是一个小圈子黑箱操作的结果，并不是他努力争来的，更不是民选的结果。在习近平被确定为王储的中共 17 大上，他的出线被视为黑马，是中共党内各派系平衡、妥协的结果；更是共党统治进入末期之际，以“选蠢”为标准来选择接班人的体制的产物。以习近平的那点能耐，他根本不敢参与竞争性的选举。即便是展开党内选举，他也不是李克强、王岐山的对手；甚至也不是身陷牢狱的薄熙来的对手——如果让习近平与薄熙来到天安门广场上对百万群众发表演讲，鹿死谁手，犹未可知。进而言之，如果中国有了真正意义上的选举，习近平这个胸无半点墨的“假博士”，面对刘晓波、许志永这样的学识渊博、以民主自由为旨归的“真博士”和反对派人士，必然是无言以对、一败涂地。

拿破仑三世贵为皇帝，权力却受到内阁、法院和议会的制约，他无法实现绝对专制；而习近平却是“无冕之王”，其权力之大，让古今中外的帝王瞠目结舌。习近平刚刚掌权，就致力于扼杀有限的言论自由，集中火力打击网络上的自由派言论，将中国变成“一言国”，连初中三年级的学生都因为在网上转发信息而被警方拘留。另一方面，中共虽然自称无产阶级先锋队，却将真正的无产阶级工人和农民都踩在脚下。习近平上台后，连一点象征性的民生政策都不愿实施，不分给工农大众分毫改革的红利，医疗保险及社会福利等全都一塌糊涂。他

对底层沸腾的民怨熟视无睹，等到火山爆发的那一刻，他再要后悔却来不及了。

拿破仑三世执政期间，法国经济获得了高速发展。历史学家指出，拿破仑是第一个将经济放在头位的统治者。他希望能通过以下措施，提升巴黎的卫生状况和生活质量：建造一个现代化的污水处理系统，改善卫生；设计出一种新的住宅，以容纳更多居民；在全市兴建公园，以免基层市民在星期日只能去酒馆渡日。这个由奥斯曼男爵主持的计划，最终使巴黎成为了一个由林荫大道和绿地公园组成的城市，成为欧洲乃至全世界最美的城市。

与之相比，习近平连推动经济改革的能力和魄力都不具备。习近平在基层任职期间，其经济政策朝令夕改，成绩单不堪入目。比如，习近平在河北省正定县任县委书记期间，并未踏踏实实、因地制宜地发展地方经济，而是与薄熙来一样喜欢搞一些面子工程。他主导了作为影视基地和旅游点的“红楼梦大观园”项目，大兴土木，劳民伤财，留下了巨额财政赤字。该项目在短短几年之后就夭折，成为人迹罕至、芳草萋萋的断壁残垣。如果是在民主国家，如此低能的地方官员一定会被问责而下台。但是，习近平靠着父亲的荫蔽，不仅没有受到任何惩处，反倒扶摇直上，加官进爵。虽然当时的河北省的领导对其不以为然，拒绝提拔他，他却能通过父亲的关系，转到福建省任更高一级的地市级官员。

习近平唯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积极对外扩张。邓小平制订的韬光养晦的政策已经过时，习要像毛泽东那样四面出击。于是，反日、反美、南海和东海问题逐一浮出水面。习近平自恃与军方关系深厚，远远超过江泽民和胡锦涛，所以要利用军方中的鹰派势力，到国际社会耀武扬威。于是，那艘从乌克兰买回的中看不中用的废物航空母舰，成了习的一颗定心丸——比习近平稍稍聪明一些的胡锦涛和温家宝，当时尽管还在其位，大概心知肚明这是一个天大的笑话，便让习独自一人前去主持其首航仪式，他们刻意放弃这个可以扬眉吐气的场合，躲得远远的。而习近平就像《皇帝的新装》中的那个自以为是的皇帝一样，以为海军大国的梦想就此实现，真是“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而这一点正是习近平与拿破仑三世最为相似的地方。1870年拿破仑三世的国内政策本来风生水起、欣欣向荣，其个人威望也臻于顶峰。偏偏他要进行不切实际的对外扩张，终于给自己以及整个帝国敲响了丧钟。拿破仑三世热衷于改变世界政治地图，在亚洲、非洲等地大肆殖民，畅通无阻，遂以为天下无敌，比作为战神的伯父还要了不起，故不惜军事冒险；结果，诱发普法战争，9月2日战败被俘，政权土崩瓦解，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今天的习近平亦认为他可以仿效毛泽东改变世界格局，要来一场世纪豪赌。习近平与拿破仑三世的性格相似并非偶然，因为法国与中国都有迷信中央极权的传统。这个传统让法国成长为成熟的民主国家的道路极端曲折，也正是这个传统让中国的现代化吃尽苦头。中国的专制传统以及共产党的党文化，只能孕育出习近平这样的“猛人”——他的思维方式和语言方式全都停滞在毛泽东时代，你根本无法用一种现代的、文明的方式来与之对话。

所以，今日由习近平掌舵的中国，比昔日由拿破仑三世掌舵的法国的状况还要危险，几乎处于盲人骑瞎马之窘境。梁京认为，与拿破仑三世相比，习近平的才学还不如他，因此，如果习近平不能迷途知返，他给本国和其他国家人民带来的灾难，有可能会超过拿破仑三世。

拿破仑三世的身上有很多优点，偏偏就是有一个巨大的缺点：刚愎自用。然而，仅仅这一个缺点，就让他所有的优点统统归零，就让他所有的成就全部化为乌有。与之相比，习近平几乎一个优点都没有，偏偏还有跟拿破仑三世一模一样的大缺点：刚愎自用。这几个月以来，习近平的诸多或内部或公开的讲话，都清晰地表明，他已经听不进身边的智囊和文胆的意见，要一意孤行将中国带入无边的黑暗之中。所谓“自作孽，不可活”，150年前的拿破仑三世，还能够流亡到英国过最后几年寓公的生活；150年之后的习近平，在即将到来的大厦倾覆、“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的时刻，这个地球上还有他的存身之处吗？

7. 习近平的联俄压美梦

习近平任国家元首后首访俄罗斯，中国舆论将其夫人随夫出访拉高到代表了中国软实力。难道中国的软实力就那么不值钱？那么虚弱？那么没有内容？没有内涵？照此推论，习近平就代表了中国硬实力？一个国家除了军队为硬实力，其它的一切力量都是软实力范畴。习夫人有那么大的力量？中共腐败政权将一国软实力浓缩在习夫人一个人身上，太脆弱了吧！

2013年3月23日的“普京向彭丽媛献花”，让“彭丽媛陪同习近平出访展示中国软实力”的大吹大擂达到高潮，但习近平在大陆网民心中的评价却再降谷底：习新政百日没有任何行动实质指向政改，唯一扎实的“第一夫人出访改革”，只是造势彭丽媛“代表中国软实力”，吹嘘“中国第一夫人将成世界第一夫人”，其独霸地球野心昭然若揭。

习先生未坐中共皇位前，人们不知其人品。刚刚坐上中共皇帝位就让人大生恶感。难道真如市言所传，习总书记是一位习阿斗？是另一个毛新宇？最近党媒高调宣传七常委，其实是集中突出习近平，一口气发布他个人历史和家人的照片近30幅照片，其它常委连李克强都只有几张官式相，家人没有露面，有的文字都不提到。

习近平2013年3月22日与普京会谈，先是恭维普京有个性，自我作践，肉麻恭维对方：“我觉得，我和您的性格很相似。”这句话并未引起中文媒体的足够重视，却受到了俄罗斯媒体的格外关注。在许多俄国人看来，这句话不仅有惺惺相惜、引为知己的意思，还有向普京套近乎的意图，甚至于有一点奉承和巴结的意味，这当然让俄国人感觉很受用。

众所周知，中共虽然公开尊奉列宁、斯大林为大宗师，曾经甘当苏共的徒子徒孙，但是，对后斯大林时代的赫鲁晓夫、勃烈日涅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人，中共高层从不掩饰他们的蔑视以至厌恶。可以这么说，自从斯大林去世以来，还从来没有哪一位俄国领袖像如今的普京这样受到中共党魁发自内心的理解、认同、钦佩和敬重。

习近平攀比普京，并不值得国人为之骄傲。身居高位者如果非要找一个对照的目标，他们通常会找一位名垂千古的古圣先贤或英雄豪杰。古有王莽自比周公，诸葛亮自比管仲乐毅，近有袁世凯自诩“中国华盛顿”（称帝时又自诩“中国拿破仑”），毛泽东自诩“马克思加秦始皇”，李登辉自比摩西，被比者都是自比者眼中高山仰止、难以企及的历史伟人。就拿普京来说，普京本人以沙俄彼得大帝为楷模，他最心仪的称呼是“当代彼得”。而如今习甘比普京，虽然做“中国的普京”也并不丢人，但中国主席相对于俄总统就跌了身份。

当习近平说出“我和您的性格很相似”的时候，除了向普京认亲、与俄国套磁之外，还有赶超意思呢！习一如毛泽东一面对斯大林高呼万岁，一面在心里在发誓超越老大哥，以“中国道路”报仇雪耻。一句话，今日习近平的心态如同毛泽东一样，压根不愿意中共国在世界屈居老二。然而，这种“生当为老大”的山大王雄心，正是毛泽东害苦中国人的“个人意气”。一个国家需要一个元首，一个世界也必须有个领头，明知人家已略胜一筹，却硬是不服气，要去争锋推翻，这只能害己害民。假如当初毛泽东能甘当美国老弟，中国不会有死伤几百万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也不会有饿死 5 千万人的“大跃进”和 2 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文革。可以说，中国 60 多年的苦难，皆是毛泽东不甘心当老二的帝王心在作祟。胡锦涛十年“国在山河污”，与不甘心“世界经济老二”有关系；习近平上位 6 天就公开媚俄批美，更是“毛病”大复发，企图借俄抗美，确保自己任期内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2013 年 3 月 23 日，习近平在莫斯科出席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建馆启动仪式。这是他三年前访俄时向普京提出要求，并由普京为他今天认祖归宗一手操办、安排的。为此，习近平在建馆启动仪式上表示，“代表八千多万中共党员和十三亿中国人民，向普京总统等俄方领导人和所有重视和支持这项工作的俄方朋友致以衷心感谢。”

百年来最坑中国的就是俄国！苏共扶植的国共两党内战多年，民死千万。斯大林则坐收渔利，“吃了被告吃原告”，拿走中国 400 多万平方公里国土！国共两党在“中原逐鹿”中两败俱伤，只有苏俄永远获利。即使“新中国”了，苏联又骗中国人上朝鲜战场，以过时军火收中国银子。今日俄国又想以“普京梦”与美国争老大，又哄中国按照“普京计划”做“中国梦”，以帮助俄重回世界舞台中心。“反复必起祸”——若再次想利用俄国抗美争老大，必然重蹈毛悲剧！毛泽东为争老大，晚年自废“中苏友谊万古长青”，与美建交，反修抗俄！如此朝为密友暮为敌，让全世界笑话中国人“言而无信，不知其可”！

江泽民时代中俄签订了边界协议，确认了俄方已占数十年、约三、四个台湾大的地方永远划归俄方，换来俄方给中共“先进军事科技共享”。卖先进米格战机、苏-27 战机（并在中国设引擎生产厂）、加加林用的太空仓、宇宙飞行服……等给中共，帮中共培训航天员、帮送火星探测器上太空（因火箭发射失败而暂告吹）……等。

如今的俄罗斯对中国这个暴发户，感觉很不舒服，一直都在暗助印度牵制中国。普京上半身热情拥抱习近平，下半身早就把腿借给别人绊着中国！俄制战机历来分三等：一等的自用，二等的供印度、越南等国用，三等的供中共享。人们不会忘记，多年前中共曾重金礼聘印度工程师来华修理米格机，当即使其飞行速度提高 1 千米/小时。在南海问题上，俄罗斯更是积极出口先进武器给越南，最近还卖给越南大量高精装备，如导弹、潜艇。

综观中共历史可知：中共一向企图借苏俄先进的军事科技的“襁褓”来实现其称霸亚洲、称雄世界的帝国大梦。虽号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其产品多属低端系列。如号称世界最大汽车产出国，但关键部件如引擎等仍靠进口……，国防产品就更依赖俄国和以色列。将来俄国油、气输到中国，连经济命脉都捏在俄国人手中……。看来习近平的“帝国大梦”难圆，充其量是个俄国的马前卒！常言道：螳螂在前，小心黄雀在后。

据俄新社 8.12 日报道，在刚刚过去的周末，俄罗斯警方在 8 个大区逮捕了 1000 多名非法务工者，其中包括 570 名在克拉斯诺达尔温室中工作的中国人，这些劳工将被处以 92 万卢布（17 万元人民币）的罚款，并被遣返回国。习的联俄反美梦是“好梦多磨”了。

2013 年习近平携妻周游美洲,6 月 7 日频频向奥巴马献媚,居然说出“中国梦与美国梦相通”这样的梦话来。人民网却说《中国梦与美国梦七大不同》,竟然煽了习近平一个大嘴巴!所谓习近平的中国梦,不外乎党天下家天下,不外乎“打天下坐天下”的皇帝梦!程晓农说:习近平的中国梦不是老百姓的梦,而是中国统治集团的梦。他们的梦是如何保住政权,保住红二代们父辈打下的江山不会在他们这代人手里流失。习近平实际上是在为中国的红二代们掌管政权。所以他提的口号和方针,相当程度上是符合红二代们的利益,符合官员们的利益,但是并不符合中国老百姓的利益。而“美国梦”则不然,它源自《独立宣言》,强调“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强调“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当政府一旦追逐滥用职权、强取豪夺这一目标,足以证明它旨在把人民置于绝对专制统治之下时,那么,人民就有权利,也有义务推翻这个政府,并为他们未来的安全建立新的保障”。

如果说,习近平的“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他鼓吹中美同梦,便无异于“实现中国梦必须走美国道路,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美国精神,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美国力量”,那么,请问习近平该把中国共产党葬往何处?或者是否鼓励中国民众推翻这个把人民置于绝对专制下的政府,以便实现美式“中国梦”?独裁人物,总是生活在梦中。而民众,早已是梦醒时分。

美国梦的特点是民主即限权,限制政府的征税权。西方民主历程的第一步就是抗税——“无代表,不纳税”的运动。相比之下,中国苛政猛于虎,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甚至吃个馒头还要交 17% 的税,刺激经济陷入刺激贪腐的怪圈。

8. 中国越来越不和平混乱加剧

总部设于澳洲悉尼的经济与和平研究所于 2013 年 6 月 11 日公布世界上 162 个国家和地区的 2013 年全球和平指数(GlobalPeaceIndex,简称 GPI)排名榜。其中,冰岛、丹麦及新西兰占据三甲位置,日本是第 6 位,澳洲居 16 位,不丹居 20 位,台湾居 26 位,古巴居 65 位,中国居 101 位,北朝鲜居 154 位,阿富汗居末位。

全球和平指数是一套用作测量各个国家或地区的和平程度的指标,旨在衡量全球和平状况。它是澳大利亚企业家、慈善家史蒂夫·基莱利亚于 2007 年创立。它根据各国国内及国际冲突、社会安全保障、军事化等三大类别,通过 22 个独立指标,以世界各国的军费支出、军警人数和武器进出口、国家因组织性冲突死亡人数、联合国派遣人员数、入狱人数、国内外争端、犯罪和恐怖袭击的危险性、人权状况、政治稳定性、被迫离乡背井人数、与邻国关系等指标,衡量各国的和平程度。相关数据数据取自国际战略研究所、世界银行、联合国各机构等权威组织,并加以综合分析。总分为 5 分,愈低分代表这个国家愈和平。例如今年冰岛得 1.16 分,台湾得 1.54 分,中国得 2.14 分,阿富汗得 3.44 分。这样根据评分就能对各个国家及地区的和平程度及生活稳定程度进行横向比较,也可作跨时间的比较。例如 2012 年全球和平程度骤降,较 2008 年减 5%,显示目前全球的和平已比以往退步。2012 年暴力冲突估计造成全球 94600 亿美元经济损失,相当于 11% 全球生产总值。统计公布全球和平指数,期望能引发及影响国际领袖,使他们能就和平问题作出反应。

经济与和平研究所是一个国际智囊团，致力于让全球关注和平，并将和平作为促进人类福祉与进步的一个积极、切实可行的手段。它所公布的结果受到各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包括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联合国等认定与采用。2013 年全球和平指数新增了四个国家（科索沃、南苏丹、东帝汶和多哥），使国家总数达到 162 个，覆盖了全球 99% 的人口。

全球和平指数揭示八种标志着一个社会和谐安宁的“支柱”。这八大相互依存的“和平支柱”是：运作良好的政府；完善的商业环境；资源的公平分配；承认他人的权利；良好的邻国关系；信息的自由传播；高的教育水平；低的腐败水平。

全球和平指数的第一个排名榜于 2007 年 5 月 30 日公布，那年中国排在第 60 位。2008 年排 67 位，2009 年排 74 位，2010 年和 2011 年均排名为 80 位，2012 年更降到 108 位，由此可见中国和平状况每况愈下。2009 年，新西兰荣膺“全球最和平国家”美誉，伊拉克则连续 3 年列倒数第一。中国名列第 74 位，日本却赫然名列第 7，在亚洲国家里高居榜首。报告这样评价日本：首先，该国内政稳定，诸如暴力犯罪、有暴力倾向的示威、杀人率等指标均为世界最低水平，因而得分较少（这项评比和中国的高考相反，得分越少越好）；其次，报告认为，日本尊重人权，法律严格禁止携带枪支，“二战”后政局一直稳定；再次，日本军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较低。报告承认，日本每年用于国防的费用相当大，达到了 480 亿美元。日本装备优良的自卫队走出国门，参加国际人道主义救援和维和行动，包括颇具争议的赴伊拉克维和，始于 1946 年的禁止武器出口的规定也于 2004 年被推翻，但报告解释说，日本武器出口数额不大，多年的军事化也一直没有进展。2011 年世界和平指数，日本排名第 3 位，中国却跌到了第 80 位，最末为索马里。近年来几个大国削减了国防开支。例如，美国将军费开支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大约 4.6% 削减到 4.1%，而中国却大增军费开支。不仅如此，中国镇压人民的维稳开支竟年年超过国防开支；再加上无官不贪的严重腐败，防火墙的禁止信息自由传播，人权状况的恶化以及与邻国关系的紧张，其和平指数排名就直落到百名以外了。可以预见，中国沿着这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滑下去将愈滑愈落后！

9. 人类发展指数——中国越来越落后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 2013 年 3 月 14 日公布最新世界上 187 个国家和地区的人类发展指数排名榜。其中，挪威高踞榜首，澳大利亚位居第 2，美国是第 3，韩国居 12 位，香港居 13 位，新加坡居 18 位，俄国居 55 位，古巴居 59 位，泱泱大国中国在中共统治 64 年后竟然居第 101 位！台湾不是联合国会员国，不在排名榜内，若加入排名居 22 位。

人类发展指数是巴基斯坦经济学家赫布卜·乌·哈格和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库马尔·森将经济指标与社会指标相结合，于 1990 年创造的。同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了首份《人类发展报告》，将人类发展定义为持续扩大人类的自由、选择与能力的过程，认为对一个国家福利的全面评价应着眼于人类发展水平而不仅是经济状况。该署并从 1990 年起首次采用了这两位经济学家在综合考虑健康、教育和收入水平的基础上创造的人类发展指数（简称 HDI），从而改变了传统上以国内生产总值（简称 GDP）作为经济指标来衡量各国发展水平的做法。

《人类发展报告》指出，现代人类发展的重大目标是：确保当代人民和子孙后代能过上健康和充实生活的权利，论述了可持续发展与平等（公平正义）的密切关系。

人类发展指数是在下列三个指标的基础上计算得出的：1、健康长寿，用出生时预期寿命来衡量；2、教育程度，用成人识字率及小学、中学、大学综合入学率共同衡量；3、生活水平，用实际人均 GDP（购买力平价（美元））来衡量。上述具体指标几乎包含了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因而可以比较完整地反映出人民的生活现状。人类发展指数提出了人文发展状况的概念，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通过分析人类发展指数，可以发现一个国家社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为经济与社会发展提供经改和政改的警示。

中国位居第 101，表明中国人民的实际生活质量与世界其它各国相比，并无明显进步；说明中国的教育、医疗、平等水平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也即经济发展的成果被少数权贵资产阶级侵吞去了。这不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与世界相比的落后程度吗！这也就是为什么联合国已经采用人类发展指数（HDI）24 年了，而中共一直只强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原因。中国的 HDI1990 年是第 65 位，2010 年是 89 位，最近三年一直是 101 位！

早在 1993 年，联合国在当年的《人类发展报告》中明确指出：“发展以人为中心，发展围绕‘人’转。”中共与此相反，强调“发展是硬道理”，人围绕“发展”转。

胡锦涛执政十年来中国的道德滑坡骇人听闻，不尊老不爱幼，老人跌倒无人敢扶早已不是个别现象；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泛滥，炮制假论文、拥有假学位不再被人耻笑；假烟假酒假药早已沦为小儿科；地沟油、霉大米、毒牛奶等等才能吸引媒体的关注和大众的眼球；各行各业和人与人交往的“潜规则”已升华为“潜文化”，深入了社会肌体的每一寸骨髓。更可悲的是，在中国人权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被冲击殆尽，异议人士刘晓波、艾未未、余杰、陈光诚等的遭遇就是最好的例子；上访、截访、强拆、城管殴小贩等等成为中国的专属词汇。

食物中毒死亡者每年达 20 余万人。2012 年 4 月 15 日在由中国科协召集的《食品安全宣传大纲》编制工作启动仪式上指，最近一项食物中毒监测显示，中国平均 6.5 人中就有 1 人食物中毒。2013 年初国人在香港抢购奶粉的报道和图片不时登上外国平面和电子媒体的版面，一个连无毒奶粉都生产不出的大国，即使航天员频频上天，于民众又有何意义？4、5 月份国人又开始到香港抢购大米。共产党号称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先让人民对奶粉与大米有自信，是否比空谈理论、道路、制度，更符合人民的需要？中共当局对土地的掠夺、对农民的剥削、以及对环境的破坏都酿成中国粮食（镉污染）危机。中国粮食自给率只有 70%，30% 要靠进口，而油料自给率只有 30%。只要中国去国际市场上购粮购油，国际市场就肯定涨起来，所以对全球的粮食安全构成严重的影响。

有毒食品已经 100%的覆盖了全部行业，每天人们咽进肚子里的食物究竟是什么，只有天知晓；中国的饮食业已整体上不足以提供合格的食物。没有人可以逃脱饮食不安全的笼罩，即使人们自己养鸡、养猪、种菜，也还要难逃已污染的饲料、农药、化肥以及土壤。许多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标榜的“放心肉”、“放心菜”、“放心油”等等，其实是让人们“吃什么都在吃毒药”。今天看似物资极大丰富的“盛世中国”，其实与物资极度匮乏的“三年自然灾害中国”殊途同归——昔日三年大饥荒，因缺粮而饿死 6 千万人，而今无食不污且有有毒的局面，则让亿万人不明不白地病倒，以温水煮青蛙方式死亡。

2009 年发生在石首市的军警抢尸案，又证明了共党是一个无毒不干、无恶不作的犯罪集团。据知情者的揭发：因为死者生前曾向经营者索要欠发的两个月工资，遭到拒绝后，于是说出要举报经营者贩毒的内幕，从而遭到灭口的结局。于是被害人家属为了追究死亡原因，坚决要保护尸体；结果当局出动了军警强抢尸体。为此引爆了数万民众的护尸抗暴行动。虽然最后抗议被镇压下去了，但是人们还是从酒店的大楼内，发现了三具尸体，和在周围发现了大批注射的针管。由此而断定这个酒店是一个以毒品贩卖为营生的窝点。而且根据网民们的调查，更发现此酒店的经营者竟然是公安局长、市领导班子干部的夫人们……

由此看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不仅仅是单纯的性恶霸、贪污腐败，还得加上秘密毒品贩卖，从而造成毒品泛滥；如今又回到了它们在延安种植鸦片、制造毒品、贩运毒品的老路上了。胡锦涛收买澳大利亚大毒枭胡杨当中共特务，并在国内交给他百公斤毒品作为活动经费，结果胡被澳大利亚政府抓获判重刑。在共党的统治下，国有企业公然在奶制品中添加毒品三聚氰安，不仅毒害国内婴幼儿，而且毒害了全世界的消费者。

政府大叫食品安全，而监管又形同虚设，毒奶粉事件爆出，假疫苗又出现；瘦肉精刚去，又来地沟油……中国官员队伍如此庞大，执法部门如此之杂多，早已是举世无双，但是政府监管因为官员腐败而依然是处于“无政府状态”。

诡异的是，对于社会服务基本缺位的中国政府，在监控压制百姓上访等民主诉求方面却是空前的强势、越位。2012 年 2 月 29 日《新京报》又揭秘：河北近日组建 1.5 万人的“十八大维稳官军”——“一场干部下乡运动正在河北声势浩大地展开。2 月 10 日开始，1.5 万多名干部将进驻到 5 千零 10 个村。……所有干部在维稳期间都与原单位脱钩。”这消息告诉人们，为何食品安全、交通安全、生产安全都失控了呢？因为干部都抽去维稳了。这种维稳压倒服务，维稳压倒一切，正是造成政府半身不遂的重要原因。2009 年度全国维稳经费达到 5140 亿元，超过了当年的国防预算 4806.86 亿元人民币。2010 年群体事件有 18 万件，比 10 年前增加 3 倍多。全年的维稳费用约 6000 亿元，超过了全年的军费。而且，越维稳越不稳。全国各地访民人数不断猛增！2011 年全年人数突破了 1.5 亿，其中 94.6% 访民的诉求是基本合理的！2011 年的维稳开支是 6293 亿元，比国防费高出 200 亿元；2012 年的维稳预算达 7017 亿元，比 2011 年又上升 11%。2013 年的维稳费为 7690.8 亿元，超过军费预算近 500 亿元。由此可见，防人民比防外敌还给力。中共统治集团是人民的死敌！梁启超曾说：“我国万事不进步，而独防民之术突于先进国，此真可为痛哭也！”

2011 年中国信息化蓝皮书显示，我国宽带速率仅为全球平均水平的 1/3，而资费却是发达国家的 3 倍。全球宽带接入平均水平为 5.6Mbps，而中国平均下行速率仅 1.8Mbps，排全球第 71 位；同时由于我国的宽带市场竞争不充分，资费较高，平均每 Mbps 接入速率费用是发达国家的 3-4 倍。宽带费用方面，台湾免费上网，国内固网宽带用户上网 1M 带宽每月费用实际折合 13.13 美元，是越南的 3 倍、美国的 4 倍、韩国的 29 倍、中国香港的 469 倍。

同样的产品，国内价格是国外价格的几倍甚至几十倍。中国企业是抢钱的，虽然如今人民币兑美元是 6.8 比 1，但是中国进口的商品物价，全是按照 8 比 1 换算计价的。中国百姓一点也没有享受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好处。2012 年“3.15”前夕，浙江省消保委调查发现：进口红酒批发价约为口岸价的 20 倍，零售均价约为口岸均价的 37.5 倍。据报道，中国国有企业进口引进成套设备一般比国际市场价格高出 60-300%，如从意大利引进皮鞋自动生产线，国际市场价 200 万美元，中国 600-720 万美元；一套年产化肥 50 吨的设备，国际市场价格

2.2 亿美元，中国国有企业花 4 亿美元引进。差价落入了中国官员的腰包。一辆奔驰轿车，进价 8 万美金，加上运费不到九万美金，折合 60 多万人民币，但大陆现在奔驰的卖价是 200 多万人民币，这 130 多万的价差就让能搞进口的各部委和央企挣了。其余像汽油高级奢侈品等均同此例。美国物价相对稳定。美国 2010 年的食品 CPI 比 2009 年上涨 0.5-1.5%。

中国人的收入只有美国人的十几分之一，但是中国的平均房价却比美国的高得多。同样价钱的一块地，美国是一家别墅住一个人，我们是高楼大厦住 1000 个人。美国一套房子的平均售价是 20-30 万美元，大约是 100 多万人民币，而且美国所指的这些房子都是国内所说的上下两层带车库的别墅（House）。但京沪深三市随便 50-60 平米的小户型，就 100 多万。一个中国人倾其一生的劳动所得甚至掏空全家族积蓄，也不够买房。合理的房价与家庭年收入之比，世界银行的标准是 5:1，美国是 3:1，日本是 4:1，悉尼 8.5:1，伦敦 6.9:1，首尔 7.7:1，东京 7.9:1，新加坡 5:1，而中国 30:1，北京上海杭州等地甚至达到 40:1。

中国的房地产寿命最多 70 年，而发达国家普遍是 200 年以上，各地官僚和黑心地产商勾结，不断制造虚假 GDP，反复拆建，每年浪费几千亿以上。2008 年汶川地震 5000 多名死难学生家长的“封嘴费”高达 3 亿多元人民币，为此他们也失去了为孩子上访喊冤的权利！

1994 年韩国汉江大桥坍塌，韩总统金泳三得知情况后说：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悲痛地向死难者表示悼念，并要求一定要查明事故原因追究责任，市长引咎辞职，总理递交辞呈。2012 年 8 月 24 日，刚通车一年耗资 18 亿号称“百年工程”的阳明滩大桥坍塌，哈尔滨市 Z 府称：桥坍塌原因是车辆超载，下一步将追究超载车辆责任。这座花费 18.82 亿元，2009 年 12 月 5 日开工建设，2011 年 11 月 6 日建成通车，能承载每小时为 9800 辆车流量的阳明滩大桥，竟然被三辆一起载重 500 吨的大货车压垮，这不得不令人震惊。而在震惊之后，人们也不得不问，哈尔滨桥梁垮塌，曝露了贪官有多少？

在中国最牛逼的事情：车“超载”了，车胎没爆，桥却压塌了。出动万人，击毙一逃犯，数百人立功。花 18 亿，塌一大桥，无一人负责。每个倒塌的桥面上，必然趴着数不清的蛀虫。管你塌不塌，捞完走人。过个车大桥坠毁；打个雷高铁追尾；下个雨满城泡水；开个会全国戒备；生个病债台高垒；读个书全家受累；眨个眼肉价飙升；上个访有去无回；喝个奶时毒肾败肺；摆个摊城管砸毁；炒个股终生后悔。中国人说：“我们读世界上最贵的书，看世界上最贵的医生，住世界上最贵的房，吃世界上最毒的食品，干世界上最长的工时，交世界上最多最高的税费，享世界上最少的权利，养世界上最多最滥的官，买世界上最贵的油，付世界上最多的买路钱，可还要做世界上最美好的梦。”

环境污染。一提起环境污染，人们多会想到北京的雾霾天气。中国环保部副部长吴晓青 2012 年 3 月就指出：中国“环境总体恶化的趋势尚未得到根本遏制。一些重点流域、海域水污染严重，部分区域和城市灰霾现象突出，农村环境污染加剧，重金属、化学品、持久性有机污染物以及土壤、地下水等污染显现”。环境损失（包括财产性损失和健康损失）占中国 GDP 的比重为 4-11%。2011 年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人民币 2.5 万亿元左右，约占 GDP 的 5%到 6%。中国在 2012 年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环境损失高达 2.5 万亿至 3 万亿元。

不仅自然环境恶化，社会环境同样恶化。犯罪猖獗，犯罪率是前 30 年的 10 倍以上，各类恶

性案件层出不穷。1979年到2003年，每万人刑事案件由5.5件增加至34.1件，增加了6倍，以年均7%的速度递增，如果再考虑到立案标准的不断降低，差别更为悬殊；中国人从原来不知道防盗门窗为何物，到现在防盗窗已安装到了楼房的七层以上；由于流氓遍地防不胜防，全国企业早已不再安排女工上下夜班；全国有91万武警，800万以上保安，警察数量是前30年的十几倍。中国已成警察国家，耗费大量人民血汗养这些青壮劳力。

中国每年非正常死亡人数超过320万。2000年以来中国每年的非正常死亡达320万人，包括200万自杀的人中死亡的28万，污染死亡的75万等等。中国每年约有20万人死于药物不良反应，每年医疗事故死亡20万人，每年工伤事故死亡约13万多人，每年死刑执行近万宗，各类刑事案件死亡年均近7万人，每年过劳死人数达60万，每年因大气污染死亡38.5万！每年有近30万人，因交通及工业意外事故死亡，其中因缺钱失救而死亡的占40%，人民医院无钱不医、见死不救已成医疗常态。以上合计约230.5万！

社会死亡率不断上升，每10万人死亡数由1979年的4.4人增加至10.6人，以年均3.5的速度递增；2003年卫生部公布的传染病发病率比上年上升6.7%，死亡率上升了37%。全国爱滋病人数从前30年的0人增加到目前100多万人，吸毒人数从0增加到300万人以上。按一个显性吸毒者背后起码有7个隐性吸毒者来计算，中国吸毒人口2千万。中国大陆每年吸毒耗资大约在200亿人民币以上。因而由吸毒引发的社会犯罪层出不穷。

性早熟现象已经蔓延到了学龄前儿童，未来的身体和寿命可想而知；中国妓女已多达2000万，其中职业妓女就有400万，性病更是不计其数。约2000万少女被迫卖淫，创造的收入占GDP总量的6%。2004年暮春，钟南山在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分组讨论会上说：“广州很多疾病发病率的快速增长都和食品安全有很大的关系。现在广州的肠癌、妇女宫颈癌、卵巢癌的发病率呈现出了快速增长的趋势，而这些和农药、添加剂、防腐剂和促长剂的过量使用都有很大的关系。由于近年来食品问题越来越突出，男性的精子浓度已经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以前男性精子浓度是五千万到一亿算是正常，现在三千万都算正常了。现在男性的精子浓度比40年前下降了将近一半。如果不采取相应的解决办法，再过50年，很多人将生不了孩子。”从这个方面来讲，我们这个民族正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着集体无意识地慢性自杀。

国情

京官，县官，村官，官官腐败；

国道，省道，乡道，道道收费；

国税，地税，杂税，税税有理；

学士，硕士，博士，士士无用；

影星，歌星，体星，星星脱衣；

河水，江水，海水，水水污染；

面粉、米粉、奶粉，粉粉有毒；

牛奶，羊奶，二奶，奶奶伤人；

股市、楼市、车市，市市伤心；

农民、市民、股民，家家难民；

中行、建行、农行，行行出事；

央府、省府、县府，府府作假！

香港成报说：一个国家的食品有多毒，就代表这个国家的人心有多毒！一个国家的水源有多脏，就代表这个国家的官员有多脏！一个国家的空气有多差，就代表这个国家的政府有多差！一个国家的维稳有多重，就代表国家溃烂程度有多重！一个国家的官员家属从哪里往哪里跑，就代表世界上的制度哪里最差、哪里最好！

中国物价不仅只是全球最贵的国家，也是有毒食品最多的国家，劣质产品汗牛充栋却卖出天价。中国人还要天天呼吸有毒空气，喝有毒的水，吃天价水果和蔬菜。《CNN 金钱网站》2013 年 5 月报导，3 个中国富豪中就有 1 个在国外有投资。这比 2011 年中国高净值人士在海外投资的人数增加了近 1 倍。这些海外投资者大约有 60% 计划增加海外投资。

加拿大智库佛瑞塞研究所(FraserInstitute)公布 2013 年世界经济自由年度报告书，香港与新加坡蝉联前 2 名，台湾排名第 15，马来西亚则跃进 3 名，以 7.06 分排第 68。美国排名 17，日本与韩国并列 33，印度排 111 名，中国大陆则为 123 名。

10. 中国将成为全球最穷的国家！？

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说“我在中国当驻华大使这几个月，感觉在中国办任何事情，能够很顺利办好的只有两种人：一是有钱的人；二是有权的人。百姓再大的事在官员那里都是小事，百姓一年的收入赶不上他们的一桌饭钱，中国百姓的付出是世界上最多的，他们的心里也是世界上最善良的。”骆家辉对中国人的几点评价，经典且耐人寻味：凡事喜欢抢，从出生抢床位，到临终抢坟地，从头抢到尾；在小事上能忍气吞声，但在小事上却斤斤计较；能通过关系办成的事，绝不通过正当途径解决；计较的不是不公平，而是自己不是受益者；动辄批判外界，却很少反思自己；自己爽不爽没关系，反正不能让别人爽；不愿为执行规则所累，宁愿为适应潜规则受罪；不为长远未来谋福，愿为眼前小利冒险。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 2012 年春季在美国著名的哈佛大学发表演讲，对将来的中国发表预测：20 年后，中国将成为全球最穷的国家。她给出的依据是：

1) 从申请移民的情况看，中国 90% 的官员家属和 80% 的富豪已申请移民，或有移民意愿。一个国家的统治阶层和既得利益阶层为什么对自己的国家失去信心？令人费解！

2)中国人不了解他们作为社会个体应该对国家和社会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更不知道对国际社会应负的责任和义务。所受的教育，或者是宣传媒体基本上都是仇视或妖魔化他人或他国，让人民丧失理性和公正的判断。

3)中国人是世界上少数没有信仰的可怕国家之一。全民上上下下唯一的崇拜就是权力和金钱，自私自利。没有爱心、失却同情心的大国能获得国际社会的尊重和信任吗？

4)中国政府所谓的政治，除了欺骗人民，背叛人性，没有其它东西。人民大众过去是权力的奴隶，现在演变为金钱的奴隶。这样的国家如何赢得尊重和信任？

5)大多数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学到过什么是体面和尊敬的生活意义。对民众而言，唯有获取权力或金钱就是生活的一切，就是成功。全民腐败、堕落、茫然的现象，在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

6)肆无忌惮地对环境的破坏、对资源的掠夺，几近疯狂。这样奢靡、浪费的生活方式，需要几个地球才能供给？怎么不能让他国担忧？！

她说，中国政府不能总是把注意力和民众的关注转移他国，制造敌人，把自己的压力转嫁给外部世界。应当顺应时代潮流和人类文明趋势，主动变革，关心民生，重视民主，不能不负责任地推拖和压制。否则，中国只能越来越不稳定，将会出现大的社会动荡和人道灾难，20年后，中国将成为全球最穷的国家。这或将是全人类的灾难，同样会是美国的灾难。

11. 习白痴骂“屁民”二百五

2013年1月底，大范围雾霾袭击中国中东部，全国灰霾面积高达130万平方千米，覆盖1/7国土面积，中央气象台首次发布全国雾霾蓝色双预警。北京的气象台2013年3月6日早晨9点钟，空气污染的指数PM2.5的浓度是200，属于“不健康”的级数；中午13点，美国驻华大使馆测到北京市的PM2.5达到283，属于“极不健康”的这个级数，所以建议要采取防护措施。杭州市市长邵占维2013年3月6日在北京突然去世，浙江省代表团的代表指责说：邵占维可能是因为工作压力太大、太劳累。而北京空气（质量指数）PM2.5的浓度又达到了“极不健康”的级数，所以他们的质疑邵占维的死因和空气有关。

2013年3月4日下午，习近平到驻地看望出席政协会议的科协、科技界委员。中科院院士、政协委员姚檀栋当面向习总背诵民间讽刺北京雾霾严重的《沁园春·霾》：“北京风光，千里雾霾，万里尘飘……空气如此糟糕，引无数美女戴口罩”，现场一片笑声，但媒体没有报道习的反应。两天后的3月6日，习总在参加大会议分组讨论——上海代表团讨论时以“淡定体”反击姚檀栋。习近平说说，“小时候在北京，那个时候沙尘也很大，戴着口罩骑车去上学。到学校之后，口罩上都是厚厚的黄沙子。到了冬天，加上煤烟气，情况就更遭了，那个时候没有PM2.5，但是有PM二百五。”他的话让全场人都笑起来。报道还引述习的话说，“老问题解决了还有新的问题，但在问题面前也急不得，用生活的淡定去面对这些问题。”

习近平要求代表“淡定”面对北京空气污染。什么叫“淡定”？就是不把 PM2.5 浓度高的雾霾当作一回事，不要大惊小怪。网民感叹地说：从“天堂”杭州到“地狱”北京，叫人如何淡定呢？邵占维来自于“天堂”杭州，现在到了“地狱”北京就突然去世了，这怎么能淡定呢？“250”在中国话里是指：脑袋不灵光，或者白痴。虽然开会的代表听了这么个双关语都笑起来了，可是在中国老百姓的眼里一点都不好笑。因为这关系着人民的生死，人命关天啊！拿民众关心的健康问题开玩笑，真是残酷的冷血动物！

习近平在儿童时代，他的雾霾是“PM 二百五”，这没什么可以当作笑话来讲的，因为你那时候太小，根本就不懂 PM2.5。习不知 PM2.5 危害远远大于“PM250”的沙子，犯了常识性错误。网友说，PM 二百五用口罩挡得住，但 PM2.5 却挡不住，国家领导人怎么对民众的健康漠不关心呢？！习近平把儿童时代的风沙用“PM 二百五”讲出来，人们听这话是非常反感的，觉得习近平这人没有人性，是在在辱骂“屁民二百五”。更重要的是，习傲慢拒不接受院士批评，反而要求人们“淡定”的看待 PM2.5，所谓“淡定”就是要民忍受、忍受、再忍受，忍受与日俱增的无数腐败与形形色色专制！这就表明了他现在作为国家主席、中共总书记对待生态环保是个“二百五”，是生态环保知识的白痴。他不想在环保上有所作为，他整天思考的是如何保住党的权力，避免做“亡党亡国”之君。在 2013 年财政年度内，中国军费开支预算为 7201.68 亿元，比去年的预算 6503.11 亿元增长 10.7%，但去年的实际军费开支为 6691.28 亿元。这是中国连续 25 年保持军费预算两位数增长的强劲势头。以军事开支计，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军事大国。虽然今年环保开支预算大幅增加 12.1%，但仍不到军费开支的一半，表明当局对军费开支极为重视，人民的生命健康就为此牺牲、让路吧！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广州的医学科学家钟南山说：雾霾比萨斯更可怕！因为萨斯你可以隔离，把人们从医院里搬出来隔离起来；而大气的污染任谁都逃不掉的，因为人总要呼吸吧！他说全世界 1802 个城市的名单里面，在全中国空气最好的城市是海南海口市，可是它的排名也在倒数的第 273 名。世界上污染最严重 10 个城市 7 个在中国。中国周围的国家和城市都受其害，香港受害最深，现在站在太平山上已看不到香港市容了。在人们的生存都受到了威胁的当前，讨论 GDP 是无意义的。绿色环境才是保障一切的前提，人最关键的是呼吸清洁的空气，吃卫生的食物，喝健康的水，这些都不安全，幸福感就没有了。

直径在 2.5 微米以下的微颗粒物，被称为 PM2.5 颗粒，它的直径不到人的头发的 1/10，即便你戴了口罩都可以穿过口罩进入你的肺部，被吸入人体后，它就直接进入到支气管干扰肺部的气体交换，引发各种疾病。这些颗粒进入血液，其中有害的气体、重金属等溶解在血液当中，对人体的伤害更大。有数据显示：PM2.5 每立方米增加 10 个微克，呼吸系统病的住院率就会增加 3.1%，灰霾不仅造成呼吸道疾病，而且对心血管、脑血管、神经系统也有严重的伤害，对产生癌症也有直接或间接的作用。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2008 年有 1270 万人是得了新的癌症，有 760 万人死亡，19%是环境因素，而其中空气污染是首要因素。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标准，PM2.5 它是每立方米少于 10 是安全的，如果这个数字高过于 20，那就是属于污染超标了。而中国的 143 万平方公里的地区全部都是高过于 50 接近于 80。中国大陆的空气如此糟糕呢，是因为 2011 年中国消耗了 38 亿吨的煤，占全球总量的 47%，几乎等于全球其它国家的消耗量的总和，煤炭是今天中国 PM2.5 糟糕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温室气体引发全球变暖的一个因。再加上大量的汽车排气等，PM2.5 就更高了。

2013 年两会期间，美国驻北京大使馆所发布的北京 PM2.5 的数据达到 522，就是说超过了 52 倍。雾霾会危害人体呼吸系统、神经系统和心血管系统，很容易造成肺癌。在北京，男性的肺癌发病率超过了 10 万分之 76，女性的肺癌发病率超过了 10 万分之 48，这个数字在全世界都是很高的。北京十年来肺癌增加了 60%，空气污染是主因：首先，机动车辆是北京市 PM2.5 的最大的来源，占 25%；其次就是燃煤和外来空气输送污染，各占 20%；第三，油气挥发和局部的煮饭、煮菜所排放出来的废气也有快速上涨的趋势。现在中国大陆的老百姓是在“空气末日”中挣扎，这也是“世界末日”的另外一种景象。

大气污染已经严重地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汽车排放早已证实是元凶。而汽车拥有量大于中国的发达国家却没有中国式的污染程度，这说明中共漠视大众的健康问题。长期以来由于国内成品油的含硫量远高于国外——为欧洲的 15 倍，于是国内的灰霾天气和 PM2.5 上升。外国曾经有烟草企业由于无提示吸烟危害健康，被法院判赔吸烟的癌症患者巨额款项。而作为极力提倡油价向国际接轨的中国大型油企，也应向被空气污染的受害者作出赔偿！

恰恰相反，中共有意掩盖 PM2.5 值或报假的 PM2.5 值，甚至打压和制止民间测试 PM2.5。环境破坏造成的空气污染，已经构成迫在眉睫的全民生存危机。中共环保局这些年一再把妖雾弥天的重度污染公布为“轻微污染”，使得北京市民都把美国大使馆公布的 PM2.5 数值当作权威标准。而中国官方总把这个关乎大众生存的问题加以政治化，一再指责美国“居心叵测”，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到官方媒体都痛斥美国驻华使馆“违反维也纳国际外交公约”想“搞乱中国”。北京环保官员更声称美国使馆公布的空气数值“不符合中国标准”，是“不科学”。美国大使馆关心北京空气质量，本是件利民的大好事，监督空气质量好坏，不是关系着每一个人切身利益吗？现在，北京的空气污染很严重，医院呼吸道病人爆满，雾霾中车祸频出，似乎老天出面来说，不是美使馆弄鬼，而是北京当局造假祸害百姓。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寿龙曾在微博中说，“根据国际法，美国大使馆及其上空属于美国的领土和领空。所以，美国大使馆检测和公布其空气污染指数，不是干涉内政。我们批评美国大使馆检测数据，才是干涉美国内政。”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从 2012 年 5 月开始也在其网站上发布 PM2.5 值。上海环保局局长张全 6 月 1 日宣布，美领馆的做法不合法。美国大使馆新闻发言人表示，安装空气质量监测仪是为了方便在美国的中国公民了解每日出行的空气状况；没有干涉中国内政，因此不会停止发布相关数据；如果中国也发布美国城市的空气质量数据，美国不会反对。面对美国的“盛情邀请”，中国外交部随即发表声明，称中方无兴趣公布美国城市空气质量数据。美国 1997 年制定的 PM2.5 浓度标准是每立方米少于 65 微克，2007 年标准提高到少于 35 微克。而中国 2012 年初制定的空气质量标准，才开始了 PM2.5 日均值每立方米少于 75 微克的标准，以前没有测量过 PM 的值，使得公众只能参考美国使馆的数据。吴晓青直言，如果采用美国制定的最新标准计算，即 PM2.5 浓度每立方米小于 35 微克，在已开始试点监测 PM2.5 的城市中，多数城市的空气细颗粒物含量都超标了。中国官员私下里表示，美国使馆此举促进了中国空气质量的监测工作。

根据中国法律：中国政府机构有权发布空气质量报告，但没有规定其他组织不准发布，一般而言，法无禁止即为合法。如此看重美国使馆发布的数据本身就是对自己数据不自信的表现，只有直面空气污染现状才是解决问题之道。中国“空气质量报告”应该是以保证居民健康为目的，而不应该为了“光辉形象”而掩盖空气污染的事实。国人需要的是健康的生活环境，而不是一份自欺欺人的空气质量报告。有网民在微博上埋怨说：“自己不公布信息，还不让其他人说，这就是中国的政治逻辑。”还有网民更调侃地问：“空气有特供吗？”

2013 年 1 月 30 日，温家宝总理强调，最近的雾霾天气对人们生产生活和身体健康都造成了影响。萨斯在 2003 年发生的时候，胡温可以把北京市长孟学农，还有卫生部长张文康撤职，但是影响 8 亿人呼吸的雾霾竟然没有一个人下台，没有一个人承担责任。中国国家环境保护局的第一任局长曲格平把污染直接了当的归罪于中国“不计代价地追求经济增长”和中国的政治体制。在胡锦涛执政的 10 年，能源密集，高污染的石化、水泥、钢铁厂等重工业建设再度兴起，把中国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污染国。曲格平说：“在这样逐渐增加的压力之下，控制污染的所有行政命令和科技手段都不够了。”于是，中国就笼罩在雾霾之中。

其实，联合国开发署多年前就发布报告称，中国每年因空气污染导致 1500 万人患支气管病，2.3 万人患呼吸道疾病，1.3 万人死于心脏病。在全球污染最严重的 20 个城市中，中国占了 16 个。世界银行中国污染报告称，中国每年约有 75 万人由于空气污染而早亡。

王维洛说：“2009 年 12 月温家宝出席被称为拯救地球最后机会的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之前中国政府玩弄文字游戏，承诺将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导致达成初步协调方案。就在大会举行前一个星期中国公布了真实的目标，不但不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反而大幅度增加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绝对量，导致初步协调方案破碎，大会从一开始就陷入混乱。在最关键阶段，温家宝如幼儿园小孩一般两次拒绝美国总统奥巴马的邀请参加最后谈判，导致哥本哈根会议的最终失败。这次会议的失败导致人类共同拯救地球的活动倒退起码 20 年，可能是失去了最后的机会。这是温家宝任总理十年期间最大的错误或最大的一个罪行。”

中国发展模式所导致的环境死局，最主要表现在空气、土壤与水源这三大污染上。首先是严重的空气污染。目前，中国二氧化硫排放量世界第一，年排放量近 2000 万吨，二氧化碳排放量世界第二。有关部门监测的 343 个城市中有 3/4 的居民呼吸不到新鲜空气。生态经济学中心主任帕齐拿表示，中国每年向大气层排放约 600 吨水银，差不多占全球非自然水银总排放量的 1/4，中国是全世界非自然排放水银最大的来源。帕齐拿指出，中国增加排放水银入大气层的同时，北美和欧洲国家恰恰正努力减少排放水银污染大气。由于受到来自中国的有毒空气污染，富士山顶的汞（水银）含量升高。“每次汞浓度升高的时候，风正好都是从中国大陆吹过来的”。其二是土壤污染。中国接近 1/10 的耕地遭到污染；是世界三大酸雨区之一，1/3 的国土被酸雨侵害；沙化及强沙化趋势土地面积达 45.3 亿亩，占国土面积的近 1/3，每年还要增加 1 万多平方公里。其三是水源污染。中国年度污水排放量为 400 多亿吨，世界第一，超过环境容量 82%。另有中国水土流失面积高达 356 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 1/3 还多。中国污染的根源于邓小平理论的“发展是硬道理”，“GDP 挂帅”！

50 多年来，中国的 GDP 增长了 10 多倍，但矿产资源消耗却增长了 40 多倍。单位 GDP 能耗比发达国家平均高 47%，产生的污染是发达国家的几十倍。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环境已经到了极其严峻的预警时代，以至于发展到今天这样的死局，让全国民众无一幸免地人人吃毒、喝毒、吸毒，不少网友在网上呼吁要尽快离开中国。对此，一些头脑清醒的中国问题观察家纷纷发出警告说，环保问题将是中国最大的不稳定因素。

中国持续重度污染的雾霾天气是对中共天天吹嘘的“中国模式”的嘲笑：中共的绝对领导与控制破产了，天，中共就领导不了！几十年来，中共只扩张与巩固党权，不要人权，陷亿万

民众为党奴，丧失产权和一切人的权利。各级官员也不可能像地主刘文彩那么热爱乡土，捐出百亩土地办中学。他们只会驱赶农民建点政绩花架子工程哄哄上级。雾霾频出显示中国模式已难再吹牛下去了！从前皇帝也讲“奉天承运”，可中共逆天行事，会比一个个皇朝败亡得更彻底！从中共打江山坐江山以来，毛泽东吟的“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现在已弄成江山如此糟糕，引无数权贵竞逃跑。北京的“空气末日”促使外国人离开北京。外资撤离中国是 2009 年以来的大趋势。2013 年上半年前往北京的外国游客同比 2012 年减少了 14.3%至 214 万人次，这是继 2008 年来入境人数首次出现下降情况。

可以预料，当中国大地的生态环境持续恶化，中国民众为了生存，必定会起来反抗制造生态恶化的元凶——中共政权。在生态环保上与全国民众对抗的是中共政权，如此不关心生态环保，不想尽一切办法去改善生态环境，那么中共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12.中国永远赶不上俄罗斯人的生活质量和档次，一百年后也赶不上！

北京城里的临时工、农民工；50 平米住 26 人，60 平米住 48 人；呼吸都是相互的废气呀！——俄罗斯哪有这些现象？人家不富，但安定、康乐；没有暴力拆迁。一位老华裔在市区有一片园子，一个一百多平米的旧木房子。占用单位是有钱的电信局，给他 200 平米的新楼房，他不认可，经过法院打官司一年，得到了 400 平方米新楼房，升值几十倍（园地属于个人，土地可以买卖）。俄罗斯人每年都有有薪的免费疗养、渡假期。这是中国人可望而不可及的。俄罗斯除了人人有房住，汽车平均一家二台以上。特别是日本、德国的二手车，质量好，价格便宜的很！工作可以随便挑选，许多工作没有人愿意干。

中国永远无法比拟的是，俄罗斯和独联体各国，遍地是医院。每 4 人就拥有一个医生或护士。在大医院里，名医也要每年强行休假 4 个月（六成工资），以减少费用。普通市民小病小伤在街区医院诊疗，医、药分离，病人拿处方到药店自己交费购买药品。而任何人（包括外国人）有了急诊，拨打 03 救护车，10 分钟内一定到达，救护车紧急处置是免费的。感冒发烧到 38℃，就可以要救护车了。救护车根据你的病情，分别送到不同的医院，立刻住院。在美国救护车出一趟，听说很贵。而俄罗斯救护车免费，住院病人所有的医疗、诊断、住院都免费以外，不需要陪护，吃饭也都是免费的！这一点，中国农村什么时候可以追上？

俄罗斯公民有权免费接受费用高达 15-30 万美元的复杂手术服务。但是，针对这种高科技手术实施的是配额制。有的时候，患者需要排队等待几个月时间。如果不想等待，那么可以自费做这种手术。当然，在特殊情况下，医务人员有责任立刻免费为患者做手术。在俄罗斯，所有急救项目都是免费的，而且值得一提的是，那些来到俄罗斯的外国人，也享有这样的权利。法律规定，患者除可获得所有急救医疗服务外，按照医生开出的单据，门诊和住院医疗也是免费的。但是，如果是公民自愿进行的医疗项目，比如整容手术，则需要付费。

国家针对一些疾病所需要的药物也是免费提供的。俄罗斯网络上曾对一位患者的情况进行了报道，这位姑娘患有粘稠物阻塞症。这是一种对肺部具有致命性质的疾病。在手术前一年，这位姑娘一直靠呼吸机维持生命。最后，她找到了供体，移植了肺部。经过半年的康复治疗她的健康恢复了。整个医疗所需要的费用都是由国家承担的。目前，这位姑娘已经生了两个孩子，过着正常人的生活，曾经的痛苦也变成了记忆。

国家和各雇佣单位共同承担公民健康的责任。从这些单位征收的一部分社会税用于正在工作公民的医疗服务，而那些不工作的人，比如老人、孩子和残疾人的费用，则由国家从地方预算中支付。俄罗斯的强制医疗保险体系就是这样运行的。除了这种强制医疗保险外，俄罗斯还执行自愿医疗保险。这种自愿医疗保险单的费用由个人支付，价格是每年 500 到 1500 美元。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可以独立制定自己的保险项目，比如对可能的职业疾病进行保险，自行选择准备就医的医疗机构。整个医治过程由保险公司来进行监控。

俄罗斯不需要到处买军火，只卖给中国大量二流军火，占七成；卖给印度一流军火，占两成；卖给阿拉伯国家军火，占一成。所以，实际人均得到的更多实惠。

《华尔街日报》曾发表社论《俄国的复兴》赞赏说，现在俄国的状况可能是彼得大帝时代以来最好的。跟列宁斯大林的共产时代比，更是天壤之别；跟当今中国比，也是远远走在了前面。只是跟英美等西方成熟的民主国家比，俄罗斯还有很多问题，但这些问题，都不是民主化和自由经济带来的，恰恰是共产主义的后遗症还没完全消失造成的。

但俄罗斯再回到共产时代已完全不可能。斯大林们的共党被叶利钦政府查禁取缔，后来合法成立的新的俄国共产党，也表示赞同民选制度等；首次国会选举，他们拿到 40% 席位，第二次选举，其支持率降到 25%，第三次只有 12%。在 8000 万选民注册的俄国总统大选中，87% 的选民说，他们可以自由表达意见；俄国有选举和言论自由。

在俄罗斯，没有听说像中国那样成群结队的上访者，更没有把上访喊冤的百姓关押迫害的。也没有报导说政府可以强行拆毁民房，百姓无处喊冤告状的。在俄国，总统每年开 1 次记者会，最近这次，有俄国和西方等 1200 名记者参加，话题不限。而中国的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从来不敢公开自由回答问题。习近平当上国家主席首次亮相，不敢接受记者提问，更不举行记者会。中国政治不仅黑箱作业，领导人都像是没有吃黄连的哑巴。

普京的竞选纲领中明确提到，互联网不能进行监控，要让公民都感受到被尊重。在俄罗斯，发行少于一千份的刊物，不需要进行任何登记；言论自由受到《俄罗斯联邦大众传媒法》保障，根据此法律成立了数千家私有的大众媒体，取消了新闻检查制度。

而习近平只有凭借意识形态的空洞口号来为自己造势壮胆，所谓“中国梦”、所谓“特色鞋”纷纷出笼，还搬出破烂不堪的“整风”“清党”的法宝，继续加强新闻媒体的检查和控制，企图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巩固和重塑自己的一统独裁天下。

习近平搞的是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而不是权力制衡建设。中共利用自己的党章与宪法，强制人民接受它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三个代表”与“领导核心”，至今不敢回答是谁封其为“先进”？是谁委托了其“代表”？又是谁授权了其“绝对领导”？——一句话，在没有选票箱的中国，是谁赋予了一个党永远执政的合法性？

2008 年 12 月，梅德韦杰夫签署《反腐败法》，自 2009 年起俄罗斯开始执行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时任总理的普京与总统梅德韦杰夫分别在政府与总统府网站公示个人财产与收入情况。普京还发狠话：不愿意公开财产的官都是贪官，不愿意公开财产的就开除。

俄罗斯杜马 2012 年年底通过法案，禁止各级公务员、军人及其配偶和未成年子女在国外拥有不动产和银行账户。2013 年 5 月 9 日《禁止国家官员及其配偶和未成年子女拥有海外资产法》正式生效，3 个月内，政府官员和国企高管中，拥有国外账户者必须关闭账户，拥有外国发行的有价证券者必须割让，否则将被停职、免职或辞退。除政府官员外，该禁令适用人群还包括担任现职的法官、议员、军人、检察人员、内务部工作人员、市级行政长官，以及参与竞选总统、州长、联邦和地区杜马议员、联邦委员会议员的候选人等。

2013 年 1 月 1 日生效的《俄罗斯政府法》，要求所有的官员每年都要如实申报自己财产和收入情况。这些申报通过媒体公布，以便接受公民监督。2013 年 4 月 2 日，普京签署命令，规定财产申报的最后期限，并宣布“拒绝申报财产者将被解除公职”。4 月 12 日，俄罗斯政府网站公布了总统普京、总理梅德韦杰夫等中央官员 2012 年的收入和家庭财产情况。

2013 年 4 月 28 日，习近平却在全国劳动模范座谈会上，面对各行各业基层人士，侃侃而谈“诚实的劳动创造财富”。他没有也不可能谈到的是，民众劳动创造的财富，正在被国家侵占和腐败官员非法地吞噬：1949-2009 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32.4 倍，国家财政收入却增长 985 倍，所赚的钱都进了政府、企业、富人和贪官的腰包。

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访华，于 2013 年 10 月 22 日与中国网民举行在线交流。当中国网民问到官员申报财产问题时，俄总理回答说，俄罗斯通过了关于公务员公开申报财产法律，要求公务员申报他的开支，收入和开支要平衡，如果不相符就有问题。俄罗斯最近还通过一个新的法律，是关于公务员在外国拥有资产的法律。一个公务员从现在开始就没有权利在外国拥有资产，包括股份，而且他要关闭在外国银行的账户，因为这些官员要制定国家经济政策，所以一定要跟自己的经济一起分担风险。作为俄罗斯国家领导人，梅德韦杰夫带头公布了个人的财产。他认为，国家领导人申报财产，是国际通行的做法，没什么特别的，很正常。

不料，此言触动中共的敏感神经。10 月 23 日，中共官媒《环球时报》则反唇相讥，指俄国官员公示财产未能有效打击腐败，并指有关制度不符合中国国情。文章说，目前要求中共官员财产公开，后果将非常严重，一旦在互联网上进行财产公示，将吸引全社会的注意力，必将激发数不清的争议，引发无数爆炸性焦点，造成意识形态危机，那是中共无法控制的。一位中纪委官员说：披露官员财产会引发民愤，可能引发社会动荡。

一向语出惊人的《环球时报》曾发表“允许适度腐败”论，今次为中国不推行财产申报制度辩护，并不令人奇怪，但该报指有关制度无助反腐则令人啼笑皆非。财产申报制度由二百多年前的瑞典首创，受到广泛推崇，如今世界上有一百多个国家实行这制度。中国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研究财产公示制度，至今都不能兑现。说到底是因为来自官僚阶层的阻力太大。官僚阶层利用手上的权力，获得大量财富，他们不想让这些来历不明的财产曝光，自然将财产公示制度视为洪水猛兽。柏杨指出：所谓的中国“酱缸文化”的标准之一，就是“以官的标准为标准，以官的利益为利益”。执政当局口口声声与国际接轨，学习国外先进经验，实际上是选择性采用，凡有利自己的就推行，美其名曰“符合国际惯例”，凡不利自己的则拒于千里之外，声称“不符合中国国情”。“中国国情”成为当局拖延或拒绝改革的托辞，掩盖制度性腐败的遮羞布。鲍彤说：“公布是解决腐败问题的根本办法，不公布是掩盖腐败问题的方法。公布得罪的是腐败分子，不公布得罪的是中国老百姓。中国特色就是不能公布、中

国特色就是公布不了、中国特色就是掩盖起来。”

13.英商旅居中国 17 年后离开“我的中国梦已醒”

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高唱“中国梦”之际，旅居中国十多年、被喻为中国通的英国著名出版人马克·基多 (Mark Kitto) 却坚决地向世界高呼：“我的爱已逝，我的中国梦已醒 (I have fallen out of love, woken from my China Dream)。”曾热爱中国的基多，惊觉“中国梦”只是“富强梦”，他无法忍受一个没法治、没思想自由、食物安全无保障的社会，为了下一代，他决定举家回英国。

《苹果》近日消息，在距离上海 3 小时车程的浙江莫干山，基多将经营了 9 年的咖啡馆和小旅店的家私搬走，他说：“我不会再回来，我曾经热衷的中国梦已经破碎。”他哀叹自己的中国梦已醒，因为中国人见钱眼开，只追求物质财富，政府只担心人民是不是控制在其股掌之上。基多亦无法容忍子女在一个充满考试压力、与及虚假历史宣传的教学环境下成长。

基多 2012 年暑假在英国《Prospect》杂志投稿《你永远成不了中国人 (You'll never be Chinese)》一文，透露今年会与广东妻子，带着两个分别 8 岁和 10 岁的子女回英国。他选择说再见更多是源于对当下许多浮躁社会现象的忧虑。“当今中国社会只聚焦于一个方面：金钱。”在他所居住的小山村，“人们从不问我和我的家人是否健康，他们关心的是我们的旅馆能赚多少钱，我们的车、宠物狗花了多少钱。”此外，基多的忧虑还有“所呼吸到的空气和伤害我们身体的食物”。在他看来，中国的教育系统更像“一个测试中心”，几乎没有体育和课外活动，“这里并没有这样一条大道，能把孩子培养教育成发明家和革新者，但这恰恰才是教育的最终目的。”基托的子女在中共洗脑教育制度下，上学第一天就被迫看歌颂共军的宣传电影，还得持续接受宣扬共党精神的“雷锋”故事。基多和他的中国妻子几经考虑，最终决定带着两个孩子回到英国。基多透露离华意向后，浙江地方政府深怕他的文章会打击外国投资，在他去美国期间不断骚扰他的妻子，甚至他一周后返家仍质问他的意图，结果只是令基多对中国更失望。基多表示，大批于 2008 年奥运期间来华的外国商人，都无法忍受空气污染、食物和食水安全问题而撤走，“我看不到中国是一个长远发展事业和定居之地”。

曾在白金汉宫侍卫队任职的英国上尉马克·基多 (Mark Kitto)，大半辈子在中国逐梦，却以失望告终。他在杂志撰文，对中共领导多有批判，也对教育及社会价值观颇有微词，更受不了强烈的排外情绪和狂热的民族主义；……马克在伦敦念大学就是中文本科，1986 年再到北京进修，之后曾经在中国经商，最近 16 年完全在中国生活，娶妻生子。他在中国的老外圈子里小有名气，曾在北京、上海、广州发行《That's Beijing》、《That's Shanghai》、《That's Guangzhou》等英文杂志，一度自诩为中国的媒体大亨。他对中国的感情很奇特，即使媒体事业遭合伙人背叛，并在诉讼中失去一切，他还是安之若素，在莫干山脚经营附有 3 间客房的民宿咖啡馆。2009 年，也不过才 3 年前，他还写了一本名为《中国杜鹃》(China Cuckoo) 的书，美国版名为《追逐中国》(Chasing China)，深情讲述他的中国梦。

14.共产制度把人变成鬼，自由制度把鬼变成人

傅苹：年龄：55 岁；原籍：中国南京（现为美国籍）；现职：美国 3D 软件公司 Geomagic 首席执行官；学历：苏州大学中文系；经历：文革时因父母被下放农村，独力在照顾妹妹；10 岁时被人打昏、惨遭轮奸；在南京劳改队做童工 10 年；1977 年入读苏州大学，其间因“思想反动”被送劳改。1983 年赴美国；获伊利诺大学计算机博士；1997 年创办杰魔（Geomagic）3D 软件公司，2005 年获美“年度企业家”称号，2010 年加入美国总统奥巴马“创新和创业国家顾问委员会”任委员，2012 年获美国政府颁“杰出美国人”。

美籍华人企业家傅苹近日在美出版回忆录《弯而不折：一命两世界》（Bend, Not Break: A Life in Two Worlds），成为海内外舆论关注焦点。作者忆述自小在中国受迫害，挨饿受冻遭轮奸，读大学又因“思想反动”被送去劳改；1980 年代她赴美求学，靠自己努力打造出世界级软件公司，她被白宫聘为智囊，获颁“杰出美国人”称号。内地网民惊叹“自由民主制度可把鬼变成人，社会主义的专制制度可把人变成鬼。”傅苹作为成功的华裔女富豪，近年已享誉海内外，但她的书 2013 年 5 月初在美出版后，仍引起轰动。美国《福布斯》（Forbes）杂志、《世界日报》等专门采访报道；网络书城亚马逊重点推介；内地的腾讯网、天涯网、凯迪网等纷纷转引，不少报道都强调“昔日中共劳改犯，今日奥巴马智囊”这一焦点。

批评一胎化致溺杀女婴。傅苹在书中和受访时透露，她出生在书香世家，父亲是大学教授，她 8 岁时正值文革，父母被送去劳改，她和妹妹留城里挨饥受冻，10 岁时她更惨遭轮奸；在南京劳改队做了 10 年童工。文革结束她考入苏州大学，大二时她任校刊总编辑，因发表文章“一名共产党员的自首”，被指“思想反动”遭撤职。大学临毕业，她又因毕业论文写中国一胎化政策致农村溺杀女婴严重，经媒体报道震撼全国，她又被送去劳改。出来后当局视她为“麻烦”，赶她出国。

1983 年，25 岁、从没读过英文（当时她只会讲“help me”等三句英语）的傅苹，带着 80 美元只身赴美。在机场买票时还差 5 美元，一名美国人代她付了钱。来到无亲无故的美国，她半工半读，做过保姆、餐馆侍应、住蟑螂出没的公寓，先在新墨西哥大学学英文，后选计算机专业，并最终获得伊利诺大学博士学位；之后在多家公司任编程工作。

1997 年，傅苹创办杰魔公司（Geomagic），开发 3D 软件，成功被国际品牌采用，更成为美国国家宇航局的专用软件。2005 年，傅苹获美国杂志“年度企业家”奖；2010 年获邀成为白宫“创新和创业国家咨询委员会”（National Advisory Council o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的委员，成为奥巴马的智囊。2012 年，美国政府颁予她“杰出美国人”称号，是继美国前劳工部长赵小兰后第八位获此荣誉的华人。

傅苹的传奇经历引起内地网民热议，有网民感叹：“这就是两种制度优劣比较！”

15. “三自信”掩盖三大危机共党已成为“过街老鼠”

传统专制国家“主权在君”，现代极权国家“主权在党”，主权在这个党的统帅、领袖。这种国家也声言民主，但这种民主是党作主，民不能作主，完全是一种假民主；是专制、极权的

伪善言说。主权在党，就不可能有民主，不可能迈向现代文明。主权在党，形象的说法是“党天下”。这是大右派储安平在 1957 年说出的大实话，他从此罹难失语。

主权在党，党高于人民，高于国家，高于其它一切党派团体。全体人民，所有国家机关，一切党派团体，都要无条件地服从党的领导。这是非法的。宪法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实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党，党才是权力的源泉。宪法上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实际上，党的中央特别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才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人大充其量是次高国家权力机关，或者说是通过党的决议、指令、建议的“橡皮图章”与“表决机器”。按宪法规定，各级政府（行政机关）是由各级人大授权并对人大负责，实际上，各级政府大员是由党提名、指定，交人大通过，因而政府实际上对党负责。这一切都是违宪的权力。中共十二大（1982 年 9 月）党章承诺：“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实际上，中共经常超越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共产党若放弃这一特权，共产党也就不存在了。2002 年中共十六大，江泽民在向大会所作的报告中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其实，这三者是无法统一的。既然党是领导者，当然是党说了算，人民的呼声再高、再强烈，也是作不了主的（而且还要遭到威胁和弹压）。至于党与法的关系，当然是党大于法，党高于宪法。所以，党、人民、法三者中，第一个要素否定了后两个要素。

2005 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了《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大讲“中国特色”的民主，共列出 4 条，第一条云：中国的民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其它三条笔者真是懒得抄录）。其实，这种“中国特色”的“民主”了无新意。1956 年毛泽东早就说过：“我们主张有领导的自由，主张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在中国，这种“民主”已“民主”了半个多世纪了，国人对这种“民主”已有深深的感受，《白皮书》的作者是枉费心计了。

如果说，1950 至 70 年代，人民由于愚昧，生生死死做了几十年的“驯服工具”，那么，1980 年代以来，人民在渐渐醒悟之中，“主权在党”开始受到挑战。

1990 年以来，中共基层权力失控，社会群体性事件增加。官方公布的数字：1993 年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只有 8709 宗，到了 1999 年则超过了 3.2 万宗，2003 年达到 6 万宗，2004 年为 7.4 万宗，参与人数超过 376 万人，亦即每 7 分钟发生一次。2005 年则超过 8.7 万宗，亦即每 6 分钟就发生一起大规模群众抗议事件。2006 年则有 9 万宗。2008 年发生了 14 万起群体性事件，到 2010 年为 20 多万起了。2006 年之初，1950 年代被打成“右派”者向中共提出应向“右派”道歉与索赔的要求。这是维权运动的新发展，也是民主社会来临的好兆头。因为近代民主制度的降临正是以人权观念的确立、入宪并与人们生活须臾不离为标志的。

当代中国的“权利运动”使中共的统治陷于三大危机：一是专制统治的合法性危机；二是专制思想的合理性危机；三是权贵对社会财富占有的正当性危机。第一个危机来自民众对“一党专政”的否定，是统治制度的危机。第二个危机来自民众对马列原教旨主义的抵制，是统治思想的危机。第三个危机是来自民众对权贵掠夺、侵犯国民财富的抗议，是统治者特权享受的危机。这都是 89 民运所不能比拟的。89 的请愿者期望当局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邓大人的回应是，举起屠刀，格杀勿论。今天，习近平当局所作所为是企图向毛式极权统治的回归，还能指望什么呢！民众只有依靠自己理性、坚韧、沉着的斗争，中国才有希望。

2013年3月在中共政治局常委会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中，习近平称中共正面临挑战的严峻性、紧迫性，并表示，今后两年是中共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动向》2012年5月份消息称，时任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习近平在中共中央、国务院部委办书记、部长政治学习班上，称当前中共存在三大危机：政治危机、政局稳定危机、民心党心危机。

2006年9月初，网易有个网民调查：如果有来生，你愿不愿意再做中国人？高达65%的参与者表示：“来生不愿再做中国人”。理由是做中国人太憋屈，生不起，活不起，死不起（买不起昂贵墓地）。随后，这个网民调查在另一家实行严格会员制的网站的结果是，90%多的人表示不愿再做中国人。2013年3月香港《明报》做的同样的调查，说来生不再做中国人的竟高达92%。理由同样，说做中国人没有尊严、没有公正、没有希望。

尽管中共与美国搞人权对抗，邓小平说“你（西方）的人权和我的人权不同”，但仍有2200万中国人想移民美国。2013年220万中国人移居美国。

从2000年到2004年，移民美国的中国大陆人有30.7万，移民速度仅次于墨西哥。目前居住美国的中国大陆移民总数已超过200万。这些事实已雄辩地证明，许多中国人是多么渴望做亡国奴！有网友叹道，如果国家不属于人民的，那还不如没有。难怪有人声言：死也要死到国外去，难怪有人拿到绿卡后喜极而泣：终于可以不做中国人了！没有自由没有人格的人民，不如亡国奴；不把人当人看的国家，不如殖民地；血债累累罪恶滔天的主权，有不如无！一个人需要的是生存和自由；没有生存和自由的主权要它何用？

2013年春天发生了两个具有代表性的事件，中国男子宋东涛拼死闯入日本美军基地，要求加入美军，反攻中国解救乡亲；在3月5日的学雷锋日，《青春雷锋》在南京首日上映，出现了“零票房”的尴尬局面，四场未卖出一张票。此两件事，反映当局已没有了公信力。

2013年5月9日贺卫方说：地方政府在征地拆迁等方面为所欲为，老百姓无处讲理，无法诉诸于司法解决问题，只好上街、上访、自焚。“我觉得一个国家走到今天这一步，如果让自己的国民都是有这样一种绝望感，实在是太可怕了”。政府对像清华大学朱令案这样受到广泛关注的案件根本无法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结论，令老百姓绝望；专家参与有毒食品的研究和生产，令人绝望。他说，这个社会已没有一种信任，谁也不相信谁，互不信任。

习近平谈“中国梦”时，强调“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并且自称有三个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标准马列是公有制、计划经济、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经济方面完全脱离人类社会现实，把人性简化成一大二公无私奉献，理性万能计划一切；政治方面亦无任何科学的权力制衡制度建构，把人性简化成善恶二元，无产阶级是天使资产阶级是魔鬼，魔鬼当权万恶不赦，天使专政就和谐盛世。二十世纪实践证明，公有制名曰公有实为一小撮官有，计划经济就是官家垄断一切资源掌管小民生死，无产阶级专政就是野兽专政。毛泽东说的“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它不但是“西化”邪教产物，且早就破产，否则何必改革开放？邓小平说：“摸着石头过河。”何来理论自信？

前三十年共党疯狂整人，上亿中华儿女非正常死亡，那路可不是一般的邪。后三十年权贵资到处抢钱，绞尽脑汁榨取各种税费，垄断资源、能源、电信等几乎所有轻松赚钱的行业敲詐亿万消费者，抢去土地盖房子高价卖出迫使亿万新移民终身为奴。习近平搞折衷：“文革”

拥护者不应否定改革开放，改革开放者不应否定“文革”，这样的折衷，既使“文革”的 10 年浩劫造成的苦难得到肯定，也使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使党内权贵疯狂掠夺民脂民膏以暴富事实得到掩饰。他不敢合理合法地否定“文革”，又不敢大胆明确地否定“暴富”，抹煞尖锐的社会矛盾，这是他的执政特点。邓小平说：不管黑猫白猫，“不争论”姓资姓社，只要“三个有利于”就行；何来道路自信？如果习总的道路论成立，如果按照“两个时期不能互相否定”的指示，不能以改革后否定改革前，那么，怎样理解邓公讲的“积重难返”？怎样理解邓公的“拨乱反正”？改革究竟是改什么？

唯一还在苟延残喘的是一党专政的制度，只是这个“共党”制度是挂羊头、卖狗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号称根本政治制度，全国人大号称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可谁不知道那是橡皮图章？多党合作制度，那八个花瓶除了消耗点财政之外有多大意义？江泽民曾要以 2000 千万美元收买孙中山孙女孙穗芳回国当人大付委员长，被孙拒绝，孙说，她要自由，不要当中共的花瓶。举凡中国弊端，如官场腐败、贫富分化、环境污染、假冒伪劣、道德沦丧，哪样不是一党专制制度之祸？一党专制制度必然破产，这就是共党非要推出“七不讲”的原因。只要七不讲松口，一党专制制度就要土崩瓦解。习近平以为搬出毛泽东，就可以红色江山万代传——真是白日做中国梦了。习近平所谓“三个自信”早就是“三个破产”了。

只有不自信的人才会见人就喊“我自信、我骄傲”。中共不断高喊要坚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越性”，在心理防御机制意义上解释，不过是一种自我“合理化行为”，来寻求暂时内心平衡，以自我欺骗的方式，给自己的行为赋予正当性。更准确地说，这就是心理学意义上最典型的“甜柠檬机制”，即自己做不到或没有的东西都是无价值的，而自己所拥有的东西都是特别好的。中南海正是因为其权力来源于指定和世袭不被普世认可而遭人蔑视，所以才会高高翘起脚尖走路，不断声称“自信”，以求与世界上的现代化民选政权比肩。中共的所谓“三自信”就是中国特色的“阿 Q 心理”的现实写照。在中共历代当家人自捧“奉天承运”的“三自信”阿 Q 心态中，从不承认分离权力与制约权力的普世价值，也从不承认“一人一票”的人民权利，因而他们的合法性也就从不被普世价值与本国民众所承认。

理论空白，道路迷失，制度癌症，自信何从而来？正因为没有自信，所以，王立军叛逃美国领事馆。那个六四时力主赵紫阳下台的陈云，其儿子在京城戒严以前得到消息，就把自己的孙辈全都送到美国去了。那个痛斥学生的发言人袁木，其女儿在六四后也移民美国了。中共没有自信！2013 年 10 月 21 日习近平在欧美同学会成立 100 周年庆祝大会引用邓小平的“我们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的说法欺骗留学生归国。习说，截至 2012 年底的 30 多年来，中国出国留学学生 264 万人，回国 109 万人。以此计算，仍有约 6 成留学生滞留在国外。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的负责人称：“我国流失的顶尖人才数量居世界首位，其中科学和工程领域滞留率平均达到 87%”。近年出国留学更有低龄化的趋势。教育部公布：2013 年国内有近 100 万名考生放弃高考；其中，出国留学的高中毕业生近 20 万，而这一人数正以每年 20%-30% 的速度在增长。这折射出中共官员早已准备“弃船而逃”，这是一艘按苏共模式建造的专制船。

2012 年 3 月 25 日，梁振英击败唐英年与何俊仁，以 689 票当选为香港特别首长。700 万人香港——689 人选出梁振英。特首投票当天，3 千人在场外游行高呼“打倒共产党”。4 月 1 日，民阵发起“豺狼当选，港人愤怒，抗议中联办乱港”大游行。15000 名香港民众在西环游行：声讨中联办及梁振英。有人指出，北京一直不想中联办成为港人的示威目标，可是今次特首选举暴露了西环如何高调插手，“西环治港”令港人震惊之余，也令港人将抗争矛头

由中环转向西环，西环是共党的办事处。香港人胆怯，只能用“西环”代替“共党”。

2012 年 9 月，中共操控反日话题热炒钓鱼岛，但没想到是它所想操控的各地反日游行，竟然迅速演化成砸车、烧车、冲击政府的大规模破坏现有秩序的暴力事件。游行中竟然还有人打出青天白日的旗帜，而“自由、平等、民主、宪政”的横幅也随之出现，这些更令中共当局惶恐不安。随后中共当局便尴尬地高喊“理性爱国”以平息事态。越来越明显的迹象是，受中共所操纵的大陆民族主义的矛头也正在转向中共自己，这对于它是一个巨大灾难。

2012 年 11 月中共 18 大权力交接犹如惊弓之鸟，只能借助于全国部署维稳与 24 小时监控机制来“击鼓传炸弹”。在此情势下，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中仍宣称“全党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习近平登基后不久，就在国内宣传不伦不类的“三个自信”，正好说明了没自信。突如其来的上海黄浦江数千头死猪恶讯传入两会，中共官员们不知所措。环保部管不了空气、管不了雾霾、管不了水质，也管不了土壤，最后连死猪也管不了。对于雾霾北京之事，习近平也只是以 PM250 自嘲而已，还奉劝诸位淡定过日子。

2013 年 2 月 5 日《求是》杂志刊文《只有到中国才能看到未来——中国正迎来自信时代》，文章大言不惭地称“今天的中国处于 1840 年以来最好的时期，今天的中国有 1840 年以来最好的制度，今天的中国是全球各主要国家中发展最好的国家。这三个事实判断，就构成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坚实基础。”各大网站转载时，纷纷改题为《求是：中国政治模式全球最佳》，讽刺习夜郎自大。

中共为了制造“自信”假象，中共最高喉舌人民日报《人民论坛》，处心积虑地炒作、拔高习近平的“三个自信”。2013 年 4 月 15 日，特别推出网上民意调查问卷《“信心.信念.信仰”调查》。当日共有约 3000 人参与了调查。以下是北京时间 4 月 15 日上午 12 时 07 分的调查结果：“1、您是否赞同中国共产党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加快推进改革”，选择“不赞同”的高达 75.40%；“2、您赞同‘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利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说法吗”，选择“不赞同”的为 82.33%；“3、您赞同‘只有中国共共党才能带领人民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说法吗”，选择“不赞同”的为 83.85%；“4、您对中国一党执政、多党参政’的制度怎么看”，选择“不赞同”的为 81.32%。

调查结果是：80%民众反对共党、90%民众不信中共那一套。这个官方调查来的民意结果，在中共一贯强求一致的喉舌媒体出现，引发社会舆论极大反响，也令中共当局瞠目结舌，相当尴尬！这个事件的标志性意义在于，中共的“三个自信”炒作，终于被自己的喉舌所展示出的真正民意彻底否定了。这个官方主持的民意调查本来想为习近平的“三个自信”炒作、拔高。不料民众以最鲜明的态度给出答案：绝不赞成中共的领导、中共的制度、中共的道路、中共的理论。习近平执政当局还敢再拍着胸膛，说要“尊重民意”的弥天大谎吗？至此，共匪应该确信无疑，在中国如果一旦实现民主大选，自己权力就注定寿终正寝。对此，中共当局恐慌至极，恼羞成怒，随即命令关闭该网页，至北京时间 4 月 15 日下午 2 时左右，《人民论坛》该项调查结果与投票网页全部关闭，网络上有关的内容全部被删除。这项民意调查虽然昙花一现，却彻底摧毁了共党的自信，沉重打击了习近平的“自以为是”。由于中共官方调查到这个“意外”结果，“以后这样的调查估计是不敢再搞了。”由此可见，如今的中南海所谓“三自信”，在恶评如潮的真实民意潮流中已经溃不成军，成为笑柄。

新加坡《联合早报》曾发表佛学院助理教授纪赟题《中国政治前途面临艰难抉择》一文称，“看看网络上的言论，无论是各大门户网站、论坛、博客或者微薄，任何只要与政府、官员、富人、权势这几个关键词相关的新闻之下，都会是海水一样泛滥的愤怒留言。如果这些汹涌澎湃的留言代表民意的话，那无疑中国就像一座等待喷发的火山口。”

16. 习近平剽窃中国梦

中国国防大学军队建设研究所所长刘明福写了一本新书《中国梦》，由“著名战略家”刘亚洲中将作序推荐，更增加了它的分量。这本书鼓吹中国不光是“和平崛起”，而且应当“军事崛起”，作者强调“没有军事崛起的经济崛起是危险的崛起”，要建立起全球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必须和美国争夺“冠军国家”，因为“中国有做世界领导者的优秀文化基因”。作者写道：“成为世界第一，作头号强国，是中国 21 世纪的大目标。”“如果不能成为世界第一，不能成为头号强国，就必然是一个落伍的国家，是一个被淘汰的国家。”

不要认为这是一个战争狂人的热昏呓语。中国的军队是受中共“绝对领导”的党卫军。没有“组织上”的指示或批准，哪一个官兵敢这样口出狂言？而且在一个没有出版自由的国家，没有中宣部核准，谁能出书？古今中外，军队都只是战争的工具，只能服从执政者的领导，不应该干预国家政策。古人云：“兵，凶器；战，危事。”它关系人民生死和国家存亡。真正的政治家和军事家都知道这条真理，所以要严格控制军队，极其谨慎地对待战争与和平问题，怎能容忍一个军人信口开河？然而这位大校居然这样做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只能是二者之一：其一，这是中共的决策，这位大校不过是把它写出来而已。外交是内政的延长；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一党专政的中共，天生与自由民主为敌。在中国民主化之前，中共的反美国策不会改变。对内独裁，必然对外扩张。

其二，中共虽然反对自由民主，但执政者尚未丧失理智，知道自己羽翼尚未丰满，不宜过度张扬，所以仍然“韬晦”，在国际舞台上还注意分寸，常把“不称霸”挂在嘴边，但军方日益骄纵，放肆干政，以提高自己在政治上的地位和特权。这种趋势如果发展下去，就会把国家推到军国主义的绝路上去。然而中共当局为了坚持不得人心的一党专政，只能日益依赖枪杆子，以致“党指挥枪”已经不太灵光，慢慢演化成“枪指挥党”了。

这两种可能性，无论哪一种，对中华民族都是一种灾难。核子战争不必说了，就是常规武器的战争，也足以造成巨大的伤亡和破坏。就是光进行军备竞赛而不打仗，也必然破坏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加深社会矛盾，酿成政治危机和社会动乱。也就是说：《中国梦》所煽动的“当不了头号强国就要被淘汰”的“危险”，乃是一种虚构。而滋生这种狂热煽动的温床本身，却正在酝酿一场真正危害中华儿女的灾难。

在共产主义破产之后，传统说教已遭到厌弃。中南海所能求助的思想武器，就剩下民族主义狂热了。在这种政治需要下，自然有人献上高调以取媚当局，而调子最高的当然非军方莫属。《中国梦》就是这样应运而生的。“六四”屠城已把军队的形象彻底摧毁，粉饰“军民鱼水情”的莺歌燕舞再也引不起观众的兴趣，于是只剩下宣扬军威这一着来刺激人们神经了。只

可惜这一着也收效甚微，这种赤裸裸的好战言论，在网上引来的担忧和批判远比它所煽起的无知狂热多得多。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已经能用冷眼看待这种丑陋的表演了。

2011年4月24日，张木生的《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一书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暨研讨会。中共总后政委刘源为该书写序说：“新文明、新文化，往往以战争为起始。”“战争来自人的欲望，人欲不灭，消灭不了战争！”“谁都逃不脱、躲不开战争。”并说：“统一中国的力量，来自无穷的征战。皆知其所害，不知其为利之大。战争造就‘大一统’！不战，哪来的大一统？不武，怎会有民族大融合、血统大融合、文化大融合、南北大融合？历史——血流成河、泪流成河，不废江河万古流：中华民族的历史，仍是生于斯、长于斯、葬于斯，各民族共同创造融合而成”。因而，刘源要求国人随时准备开战：“时下，‘阶级斗争’不愿再提了，说历史是人类斗争史，没错！古籍连牍，青史满篇，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我琢磨，称之为人类对立统一的历史（或斗争团结史），好像该完整全面些？对立统一也罢，斗争团结也好，其最高级、最极端的表现形式就是战争！”

刘源还表达了中共对杀戮的顶礼膜拜，表露了对本·拉登的同情，并说战争是经济和政治的自然延伸。并声称“不杀生，人活不到现在！”刘源在文章中说：“用我不值钱的命换你值钱的命，以命抵命！不再费劲刺王公，就叫妇幼炸平民！飞机撞大楼、路边人肉弹，同样不拿杀敌当杀人，玩的就是这心跳；打得新鬼烦冤旧鬼哭，此恨汹汹无绝期！”“拿破仑也铩羽奔北，本·拉登却得意高歌，谁也别笑话谁。”“战争，是有组织的大规模谋杀（敌）人，是变着法儿的蓄意打（敌）人。”刘源还大肆宣扬军国主义、殖民主义，“一朝动武，生杀予夺，铁血统治，永远是征服者！”“征服，亦即驯化。文明的核心是人对人的驯化，没开始驯化动植物，就已驯化人，从娃娃抓起。”刘源说：“让我们重新干起。”

习梦撕人：（8完）“习胖”学“金胖”，“强军”仿“先军”

17. 习梦撕人：（8完）“习胖”学“金胖”，“强军”仿“先军”

习近平上台之后，发现中国百病丛生。于是，急病乱投医，好的不学，偏学坏的，而且学最坏的——刚刚30岁的毛头小子金正恩，成了让习近平“不耻下问”的老师。在习近平看来，金家王朝实现三代世袭，铁桶江山没有一点裂纹，其权力操作一定有超凡脱俗之处。给习近平最大启发的，显然是金家王朝的“先军政治”。习近平一旦大权在握，便东施效颦地掀起了一场“强军运动”。越来越多的中国网民将习近平与大多数中国人所强烈鄙视的金正恩相提并论，因为公众和网民认为习近平跟金正恩越看越相似，其相似之处包括：

- 1) 习、金两人都肥胖，而且两人都喜欢炫耀自己喜爱体育运动；
- 2) 习、金两人都是靠自己的老子而不是靠选民的选票当上了执政党和国家元首；
- 3) 习、金两人都是不学无术、志大才疏，但又刚愎自用，无知无畏，除了老调的宣传和铁腕的镇压之外，治国的理念、思想和政绩乏善可陈。

所谓“先军政治”，是北韩与“主体思想”并行的政治理论和指导方针。这是一个综合性的政策，其内容是“在国家事务中，一切工作以军事为先，以军事为重”。“先军政治”的推行，使得朝鲜人民军的地位空前提高。西方媒体则评论说，这是北韩军国主义化的重要表现。后来，北韩陷入经济困境，进而发生惨绝人寰的大饥荒。1990年代以来的几波饥荒中，数百万北韩民众被活活饿死。活下来的人只有两种，一种是军人和干部等特权阶级，另一种是善于从杂草和树木里吸收营养的强悍百姓。“先军政治”不得不为经济改革让路。

金正恩接班后，又回头走上了“先军”道路。2013年4月，北韩发表了战争宣言：“敌人应该放明白，在天下第一名将金正恩元帅的时代里一切都截然不同……北韩革命武装力量的首轮打击，将摧毁美国本土和夏威夷、关岛等太平洋作战区内的美帝侵略军基地，同时夷平霸占南北韩美军基地、青瓦台等傀儡统治机构和伪军基地，彻底歼灭侵略者，让挑衅者变成灰烬。”这种语言是从毛氏语言中偷学来的，如今“出口转内销”，成为习近平学习的楷模。

习近平接任中央军委主席后，多番强调“从严治军”，中央军委更是下发《中央军委加强自身作风建设十项规定》，明确要求军内宴会不得饮酒、军委委员不得擅自题字、坚决纠正用人上的不正之风等等。在该《规定》中，还有一项具体要求：全军和武警部队55岁以下的团级以上领导和机关干部、未有基层任职经历的干部和连职以下机关干部必须“当兵”和“蹲连”。干部“当兵”，要戴列兵军衔，与连队官兵实行“五同”（同吃、同住、同操练、同劳动、同娱乐）。“蹲连”是下到连队，一般住在班排。“蹲连”重点安排在“小、散、远、直”单位（指人员较少、高度分散、远离机关的基层单位和团以上机关直属单位）和执行重大任务单位。《共军报》发表评论称，部队领导当兵蹲连是军方优良传统，既可有助于了解基层实情，亦可防治庸、懒、散、奢等“机关病”。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后期至六十年代初期，共军曾兴起领导干部下连当兵的热潮。1955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提出全体干部每年参加体力劳动一个月，军官每年下连当兵一个月。

但是，“毛式治军”的策略，早已不合当今时势。习近平如此刻舟求剑，可谓愚不可及。习近平拒绝走民主宪政之路，声称共产党可以“自我反腐”，岂非自欺欺人？党的腐败无法解决，又怎能要求军队“一片冰心在玉壶”？以上诸多规定，最终只是“雷声大、雨点小”。举例来说，毛泽东的孙子毛新宇，肥胖如猪猡，与金三胖宛如孪生兄弟。弱智的毛新宇居然官拜少将，号称共军最年轻的将军，可见军队的制度、规则在太子党面前形同虚设。那么，毛少将会奉命到基层“当兵”和“蹲连”吗？毛少将会与普通士兵一起操练和劳动吗？如果毛太孙身体力行，相信他一定能成功完成减肥计划。等着看毛新宇几个月后的照片，真情就将大白于天下。若毛少将的肥胖指标降不下来，习近平“下基层”的号召就是大话连篇。

2012年12月，习近平开始上台后的第一次“南巡”。总共4天时间，到部队考察就占了一天半。7日习还感慨苏共倒台时，党员比中共多“但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人出来抗争”。所以，他发誓要始终永远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接着，习用一天半时间考察了广州战区，去部队基层又占了2/3。习近平特意乘“海口号”导弹驱逐舰出海，并在甲板上告诉水手们，“中国梦”对于国家来说是“强国梦”，对于军队来说是“强军梦”，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坚持富国和强军相统一。因此，一是要记牢坚决听党指挥，这是强军之魂；二是要记牢能打仗、打胜仗是强军之要；三是要记牢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是强军之基。

据中国官媒披露，“海口号”由中国自行设计制造，是“代表中国海军水面舰艇最高水平的

第三代导弹驱逐舰，曾两次赴亚丁湾护航，两次荣立集体二等功”。习近平在“海口号”上宣布其强军政策，显然是刻意为之——这样的言词，与当年希特勒上台后的叫嚣如出一辙。

习近平把军队作为他的权力基础，提出“中国梦”的政治口号，以“强军梦”来实现“中国梦”。官方对“中国梦”的定义是“中华民族的复兴”，这个词在某种程度上，重复了 1912 年推翻清皇朝时的早期领导人的一些说法。但是通过这个词也赋予了明显的军事内涵，习近平把它变成了自己的说法，也就是所谓的“中国梦”就是“强军梦”，希望在 2049 年实现。现在，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为了侵犯中国的领土、领海、领空，要来主动打中国；相反地，中国现在要建设强大军事力量，就必然要把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摆在末位而牺牲人民的生命财产！习近平正在扩军备战，急剧向外扩张中共势力。中国海军的军力近年来迅猛发展，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中国军舰的数量有可能在 2020 年就超过美国，占世界第一位。中国的海军军力要达到三个目标：2015 年，建造大型军舰的能力要居世界第二位；到 2020 年，潜艇、水面的战舰和其他军用船只的生产量，居世界第一位。到了 2020 年，中国海军的船只生产的数量、质量要达到俄罗斯 2013 年的水平，2030 年将要达到美国 2013 年的水平。

由此可见，中共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各个方面，都在向法西斯化急遽的转化。

为什么习近平一上台就要如此强烈的做“强军梦”呢？

其一，习近平认为中共不能走苏联的老路，深怕苏共亡党亡国的结局在中国重演。因此，习近平现在紧紧抓住“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个救命符，防止亡党。

其二，中共军队实在贪污腐败透顶，买官、卖官，难以成为捍卫中共政权的党卫军。不整顿军队、腐败军队将要拖垮中共，一只没有战斗意志的腐败之师，不可能有战斗力？

其三，中共军队高层，多年来有“军队国家化、军队非党化、军队非政治化”的思潮，强力要求脱离共产党的领导和控制。习近平现在非常害怕军队高级将领离心离德、拒绝做党卫军，因此习近平藉着整军、反腐败这个借口，要对中共军内具有“军队国家化、军队非党化、军队非政治化”思潮的一些高级将领加以整顿、加以整肃。

其四，习近平在中共党政系统内缺乏深厚的人际关系，其政令难以在政党系统中贯彻，所以习近平就藉军队来实现其“中国梦”，来推行其政令。中共党政系统极端腐败，习近平上任三把火的反腐，要打老虎，要打小苍蝇，那么依靠谁呢？他想依靠军队来反腐。

知情人士说，刘亚洲是经常私下与习近平会面的少数军官之一，这些人帮助形成了习近平的战略世界观。习近平在中国将领中建立了明确权威的同时，支持在国际关系事务上采取更强硬的方针，以及军队在中国发展过程中发挥更突出的作用。

其五，习近平借用“强军梦”来推行其外交政策。《新华社》报导，他对政治局委员们说：“我们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在中国，“核心利益”一词，意思就是主权问题。中国为了主权问题不惜一战，这已经表现在中国和日本在钓鱼岛上的一些行为，以及在南海对菲律宾和越南一些行为，已经表现出来用“强军梦”强军来推行它的外交政策。

“强军梦”是不可能治理好中国。因为军队不可能对经济、金融、工业、农业、服务行业、国际贸易、文化、教育、艺术、医疗、科学研究、和生态环保等等起主导作用；这些主导作用都是普通百姓或是工人、农民、科学家、教授等等起作用。并且军队是消费单位，不是生产单位，不可能产生利润，所以再强调“强军梦”也不可能实现“强国梦”。

现在习近平把“中国梦”等同于“强军梦”，这才是真正在做白日梦。从历史角度来观察，“中国梦”是要恢复中国历代最强盛时代的向外扩张国土以及当时的国力吗？习近平能梦想恢复成吉思汗横扫亚洲、欧洲两大洲的本土吗？这似乎是真的在做梦！这不就是要制造国际上所讲的所谓“黄祸”吗？这简直是在制造麻烦嘛！俄国强占中国国土高达 150 万平方公里以上；从蒋介石起，都没有承认满清割给俄国的中国领土；可是中共的党魁江泽民和叶利钦签订了《中俄边界条约》，承认清朝时割给俄国的国土，全部永久地划给了俄国；这是中国史上最大的卖国案。既然习近平要圆中国梦，那就应该把江泽民出卖的国土从俄国人手上拿回来，否则，习近平所讲的“中国梦”是假的、是骗人的。

习近平想吸收苏共瓦解的教训，要防止它，可是他没有想到，他的“强军梦”正是苏共走过的。所以习近平想避免亡党，想借“中国梦”、“强军梦”来挽救中共，是做白日梦。

18. 习黄梁美梦霸全球

传说刘邦的母亲梦见自己与蛟龙交配而生下了刘邦，刘邦就是龙子，就是天之子。中国的天子就是皇帝，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皇帝当然不承认普世价值的“人民主权”论，而是谎称“君权神授”（党权马授），所谓“王者父天母地，为天之子也”，把皇帝称为“真龙天子”，把皇帝的权力说成是“天意之所予”，皇帝就是“奉天承运”，“替天行道”，代表上帝来统治天下万民的，是地球王。天子居住在地球的中央，其直辖地叫做中国，占天下大部；其周边都是落后的边鄙小国，都叹服中国的文明，服从中国天子的领导，其典型形式就是万邦来朝，跪拜中国天子。这就是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这就是自古以来的中国梦。

中国的皇帝一直以为自己是世界共主，是天下的领袖。英国的马戛尔尼率 700 余人使团于 1793 年 7 月抵达中国，要求建立对等的外交关系和通商关系。清政府的官员要求英国人觐见天朝皇帝，必须恭行“三跪九叩”之礼。而英国人却认为，民族国家一律平等，跪拜有辱国家尊严，绝不能接受。因为英国是基督教国家，人民只跪拜上帝，而不跪人。对无限忠诚的英王陛下，也只好单腿下跪之礼。双方争执不下，乾隆皇帝最终“开恩”免去了马戛尔尼“三跪九叩”之礼，采用觐见英王时单膝下跪的礼节。皇帝内心不悦，他们请求被一一驳回了。1840 年 6 月，英国 4000 人的远征部队抵达中国，清军被打得一败涂地，实质是无人愿意保护满族天子。英国人的要求一一满足。中国梦破碎。中国近代衰落史开始了！

所以，2012 年 11 月 29 日，中共七常委在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习近平说：“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就是中华民族历代以来最大的梦想。”习近平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江泽民在 2000 年首先提出的。于是“中国梦”遍全球！

在 21 世纪的今天，竟号召“实现中华民族复兴”，难道要回到汉唐盛世？当然不是！习近平要复兴是中国的天子梦——做地球王！其身边的人解释中国梦时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 2020 年的“中国梦”，2021 年经济总量将接近美国，就是现在水平上翻一番，从 50 万亿翻到 100 万亿；GDP 超美做世界老大是 2049 年的“中国梦”。中国科学院“国家健康研究组”2013 年 1 月 8 日对外发布《国家健康报告》第 1 号称，国家健康是中国超越美国最大、也是最重要的“本钱”，中国预计到 2049 年一定能够全面超越美国。中共权贵以为：超过美国的 GDP 而成为世界第一，美国没落无可挽回，中国“崛起”不可阻挡，“中国模式”天下无敌，再不能“韬光养晦”，要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的领袖与霸主。

“全面超越美国”是不可能的。在未来的岁月里，即使中国在 GDP 和科技上超越美国，但在精神文明包括政治制度道德文化方面，无异白日作梦。美国精神里面，包涵了世人公认的民主宪政等普世价值观念及政治制度。具体而言，就是民主大选、三权分立、思想独立、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等等。对不走“老路”与“邪路”的中共来说，可能实现吗？当人民没有民主自由，备受党官权贵欺压而怨声载道，政治腐败道德堕落日深，社会矛盾尖锐，亡党危机一触即发，国家肌体根本就不健康，中国又靠什么去“全面”超越美国？！

自从习近平的“中国梦”被热炒以来，官方舆论就一直在宣扬军方的“鹰派”主张。中共少将、“红二代”鹰派代表之一罗援，在中央电视台四频道与军事频道，多次发表好战言论，强化“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血腥”立场。罗援声称获上级特别批准而高调亮相。

当今中共，名义上重民生，其实是将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力用于扩张军备，周边示强，发展航母，挺进远洋。习近平的“中国梦”的本质，就是要复兴前苏联那样的红色帝国梦。这些年来，中南海在包括联合国在内的所有世界舞台上，均与普世价值主流对抗，与主流文明逆反。习要把中国从 19 到 20 世纪割地赔款的耻辱走出来。在南海和东海争端上，中国人派出民间船舶和渔船当作准军事支持。习近平上台后走强军路线，大力发展中国的军力，在外交政策上日趋强硬，将钓鱼岛、南海岛屿等争端统统上升到国家核心利益高度。

甲午战争后，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条约没有明确包括钓鱼岛。1895 年 1 月，《马关条约》签订前，日本单方面并入钓鱼岛。二战后废除《马关条约》，因条约中没有列明，钓鱼岛也就没有被列明为应归还中国的领土，而由美国托管。日本在甲午战争后，单方面将钓鱼岛据为己有，不符合国际法的“先占”要件，谈不上“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但是，中国长期失去钓鱼岛控制权，又没有把握二战后的机遇，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是中国当政者的失职，是中华民族的历史遗憾。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既然丧失了时机，就要尊重实际控制线。对实际控制线的尊重，就是对和平的尊重。凡是不尊重领土的实际控制线，小则引发冲突，大则引发全面战争。

两百年来，中国被夺去的领土很多。仅被俄罗斯夺走的就不止百万平方公里，外蒙古独立更是百年之内的事。如果算这些旧帐，会引发与俄罗斯的全面战争，这是每个中国人都明白的道理。既然和俄罗斯的旧帐不能算，为钓鱼岛不惜一战又有什么依据？

2013 年 1 月 14 日《共军报》在头版头条报导，共军总参谋部颁布新年的指示要求，全军和武警部队今年都要“强化打仗思想”，“做好打仗准备”。1 月 18 日，国防大学教授、央视特邀军事评论员张召忠少将对凤凰卫视说：中日钓鱼岛发生战争，日本将在 30 分钟内被解决掉。这是在为发动对日战争火上加油。1 月 20 日的《共军报》又在头版头条发表《准备打

仗，先向‘和平积习’开刀》的报导。2月4日，《环球时报》网刊出刘源的《确保战略机遇期，战争是最后选项》的讲话。他说“战争对军人是唯一选项，但对国家则是最后选项。”他不是真正反战，而是“机遇”未到。但必须做出战争姿态，进行“讹诈或者叫威慑，兵拉过去给你看，包括军演。最后迫不得已才攻城，才去打被占岛礁。”刘源毫不掩饰在钓鱼台问题上是要讹诈日本。然而，他们要讹诈的，不也是“中国人”吗？他们希望“诈”出更多的军费，塞满军头的荷包。人民负担不是更重了吗？俄中从2013年7月6日起一连8天在日本海进行空前大规模的海军联合演习，一方面对抗美日在北美的联合海军演习，更明显的是直接剑指日本及东南亚诸国。这显示出中共要“收复”琉球群岛（见近期《人民日报》）“收复”越南的欲望（见戴旭空军上校在深圳的演说）。连一向为中国说话的李光耀，不但赞成美国留在亚洲驻军，在他最近出版的新书中还说：亚洲许多中小国家很担忧中国可能想恢复昔日的帝国地位，他们担心可能再次沦为不得不向中国进贡的附庸国。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勇敢地对习近平讲：“中国或得到钓鱼岛，但会输掉名誉和世界地位”。

习天子高歌中华复兴称霸全球，其目的是收拾人心，让民众紧跟他。一个独裁国家，他在外面可以没有朋友，但不能没有敌人。为什么要给一个国家的国民树立一个民族的敌人呢，因为恨，是一种有力的凝聚剂，就像打架，你总想去拉几个同伙，这样你和同伙之前的感情就感觉无比亲密了，你们有着共同的恨，是战友，是同志。所以独裁者会给自己国家的人民洗脑，教人民去恨一个共同的敌人，这个敌人最好在国外如日本、美国，这样当国内出现危机的时候，只需把这个敌人亮出来，就可以转移矛盾，一致对外，就可以保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不受威胁。对于那些国内的异见分子，就给他们贴上标签，说他们是被境外敌对势力收买的人——汉奸，是需要打击消灭掉的！——希特勒就是这么干的，共党更是这么干的！

中共出于意识形态上的需要，过份渲染美国遏制中国。美日欧既是中国生产技术的提供国，也是中国产品的接受国。如果美日欧联合遏制中国，中国经济就不可能正常发展。中国经济奇迹的产生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改革开放，二是和平环境，两者缺一不可。没有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的出口型经济不可能取得成功。中华民族的核心利益是维护和平，依靠战争不能使中华民族复兴，只会把中国变成普世价值之外的异类，葬送民族复兴的机遇。

中共如果不改变利用民族主义转移国内矛盾，以及用大国主义的态度推行霸权，就可能走上军国主义的战争道路，那不但是世界的灾难，最终还是中国人民的浩劫，因为中国再强大，总不可能征服世界。外国专家认为：如果中日一旦因此爆发战争，中国可能会输，日本纪律严明、专业程度很高的军队不需要美国的干预。而共军正如习近平那样“你们吃喝玩乐，把钱装进了自己的腰包”，共军腐朽不堪，怎能打仗！今天，日本既是经济强国，也是军事强国。中国海空军与日本单打独斗没有获胜把握，更不用说与美日联军作战了。如果中日战争爆发，也可能像一百多年前的甲午战争那样，拥有军事优势的中国因为腐败而战败，推动戊戌变法的诞生；再因为戊戌变法的失败，催生了辛亥革命。中共倒台是必然的了！

19.中共帮苏共摧毁对手

1929年，斯大林的军队侵略我东北，中共帮助派其党徒叶剑英等潜入苏军帮助苏共摧毁其对手——国民政府。中共公然“武装保卫苏联”，是中国有史以来的最大的汉奸集团。

中日全面战争的鼓动者，实际上就是苏共。日本南犯，就减去了日本对苏俄的威胁。台湾史学家披露，“卢沟桥事变”根本就是中共华北局一手导演、制造的“战争引信”；道理很简单，中日两国都反共，只有干起来，共产党才有活路。所以朱毛在陕北一坐稳，大力宣传蒋介石不抗日，鼓动青年学生起来闹事，最后爆发了“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确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格局。1937年7月，毛泽东见时机成熟，民气可用，密令华北局搞事，乘夜绑了个日本兵，引诱日军搜查宛平城，再偷放鞭炮让国军误以为日军开枪，一个“恼羞成怒”，一个“奋勇还击”，8年抗战于是开打。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7月3日北京电视台的《社会透视》播放了“七七事变”专辑，惊爆了不少内幕。当时，驻扎在北京的中国守军为29军，原属冯玉祥（冯的夫人李德全是共产党的老卧底，后曾担任中共卫生部部长）系人马。其中有不少中共地下党员，29军副参谋长张克侠是老地下党，他侄子在节目中回忆“当时张克侠接到顶头上司刘少奇命令，认为北平的态势敌弱我强，应该主动出击，就爆发了7.7事变……日本方面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证词：“1937年7月7日晚10时40分许，日本步兵第一连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在北平西南12公里卢沟桥北侧，永定河左岸荒地进行夜间军事演习（搜查失踪士兵）。演习结束后，在河畔龙王庙方向突然响了三发枪声。随后清水节郎中队长等人，看到在河畔和卢沟桥城墙之间，有人用手电筒发出明暗交替的光亮，随即判断中国士兵用暗号互相联络。”这是中共地下党别动队搞的特殊活动！日军在城外找不到失踪士兵，才坚持进入宛平城搜查，听见枪响，越发担心失踪士兵的安危，当时已是深夜，中国驻军拒绝要求，于是发动炮击。日本陆军省兵务局长田中隆吉作证说：卢沟桥事变是共产党在卢沟桥两边放枪挑起的，是共产党勾结日本驻天津特务机关的果实。芦沟桥事件是中共为了执行共产国际“保卫苏联”的命令干出来的。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当时民国政府还蒙在鼓里，中共中央却在芦沟桥事变发生1小时后就发出了号召全面抗战的《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一个已经不到8000人的新生党派，在没有手机、没有E-mail的年代，能迅速扑捉到全面抗日的信号？

1937年7月底，日本侵占了华北的两大主要城市：北平和天津。对斯大林来说，日本迅速占领全华北是对他的空前威胁。日本大军现在完全可能北进，沿着几千公里的边境线进攻苏联。斯大林已经宣布日本是苏联的头号敌人。现在，他起用了一个长期潜伏在国民党高层的红色代理人张治中将军。张治中在回忆录里说，1925年他“完全同情共产党这一边”，被视为黄埔军校“红色教官”。他向周恩来提出参加共党，周在“请示组织后”告诉他，要他留在国民党内，“稍待适当时机”，说“中共保证今后一定暗中支持你，使你的工作好做。”1930年代中期，张治中跟苏联使馆特别是武官雷邦，保持着密切的秘密联系。卢沟桥事变后，正在青岛养病的京沪国防区负责长官张治中，马上返回南京，就任京沪警备司令官要职。这时他开始竭力劝蒋介石在上海发起大战，蒋介石没答应。当时蒋已把军队从上海周围调走，以便不给日本人借口在这里开战。8月9日，经张治中一手挑选的派驻上海虹桥机场的部队，打死了日本海军陆战队官兵各一人，然后给一个中国死囚犯穿上中方制服，把他打死在机场大门口，以造成日本人先开火的假象。日本人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张治中以“上海的形势突然告急”为理由，率大批军队在12日清晨占领上海，定于13日拂晓向上海日军发起攻击。蒋介石两次去电叫他“不得进攻”。张14日电蒋：“本军决于本日午后五时，对敌开始攻击。”但张午后三时就提前下达了总攻击命令。四时，炮兵、步兵一齐进攻。同一天，中国飞机轰炸了日本军舰。据现有材料，蒋介石没有下轰炸的命令。蒋五时后来电说：“今晚不可进攻。另候后命。”张治中只得服从。他选择了另一条路把蒋逼上梁山。15日，他越

过蒋直接向报界发表声明。他先称日本“侵沪舰队突以重炮轰击闸北，继以步兵越界袭我”，再说他决心反击。在高涨的抗日情绪下，一直不愿在上海跟日本人大打的蒋介石不得不于第二天下令：“预定明拂晓全线总攻击。”但蒋介石实不愿意打，18日，他又传令停攻。张治中不予理睬，19日继续进攻。22日，大批日本增援部队到来，全面战争终于打响。

中日全面战争使莫斯科欣喜若狂。外交部长李维诺夫当即对法国副总理布拉姆说，他和苏联“都对日本向中国开战感到开心极了，苏联希望中日战争打得越久越好”；以便渔翁得利。为了保护这位贡献巨大的红色代理人，斯大林把和张治中直接联系的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与武官雷邦随即召回国，处死灭口。愤怒、无奈的蒋介石当然怀疑张的真实身分，开战后不久就逼他辞了职。但蒋介石为了自身的利益像对待邵力子一样继续使用他。1949年蒋逃往台湾时，这两位都留在大陆。中日全面战争的爆发立即给毛泽东带来了好处：蒋介石答应了他迄今为止在谈判中始终坚决拒绝的条件，即让红军成立独立的指挥部。虽然名义上红军受蒋介石统一指挥，但蒋不能发号施令，只能提“要求”。中共现在合法化了，可以在国民党地区开设办事处，出版报纸，政治犯也被释放。持续8年、夺去2千万中国人生命的日本侵华战争，带给毛征服中国的机会：蒋介石的政权被极大削弱，毛占领了大片土地，建立起一支130万人的大军。抗战开始时，国共军队的比例是60比1，结束时是3比1。

在八年抗战中，国民党军队担负了在正面战场上抗击日军的全部重任，先后与日本军队进行过22次大会战。在国民党的600万军队中，有340万人为国捐躯，其中将军就有224人；黄埔军校毕业的5万名军官，有一万多死在了战场上，10万开赴缅甸与日军作战的中国远征军，活着回来的还不到1/3。而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抗战中阵亡的还不到国民党的1/10，死在战场上的将军也只有左权和彭雪枫两位。另外，为了抗战，蒋介石夫妇曾多次亲赴前线慰劳官兵，夫人宋美龄甚至还差点被炮火击中。而整个抗战八年，毛泽东一天也没有离开过他的延安窑洞，一次也没有去过抗日前线。美国为中国军队提供了大量的人员和作战物资。如陈纳德将军的飞虎队，就在中国领空击落了2600多架日本飞机。还有从缅甸往中国西南大后方运送军用物资的中缅公路，还有从印度飞往中国的驼峰航线。这条穿越喜马拉雅山的生命线，抗战时期为中国运送了数以万吨的军用物质。在极其艰险的条件下，美国空军先后有450架飞机和1500名飞行员永远地留在了这条航线上。

有一支部队，抗战八年几乎未向日军主动进攻过，但是1940年他主动偷袭驻黄桥的国军敌后游击第89军，89军伤亡1.1万全军覆没，司令韩德勤被板垣征四郎称为顽强中的顽强，赶走89军后他们占领了黄桥，几天后日军来犯黄桥，他们未放一枪撤守黄桥，日军轻易占领了他们一直未攻下的黄桥，这支部队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

随后，中共又在苏联斯大林的帮助下颠覆了中华民国。1949年底毛泽东冒着严寒，坐着专列，千里迢迢奔向莫斯科。在斯大林的咄咄逼迫下，毛向斯大林举手全面投降，乖乖地承认斯大林的所有侵华要求。毛于1950年1月2日急电周恩来迅速赴苏。在莫斯科，由周恩来亲手签订了66项丧权辱国的条约、协定、议定书和补充协定，全面接受了苏联的侵华要求。周恩来出卖了中国神圣领土外蒙、唐努乌梁海，还出卖了新疆和中国的东北。中共一直推行卖国主义路线，出卖割让了超过3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给周边国家。1960年代末，苏联又策动并支持台湾反攻大陆，却遭到了爱民的蒋介石的拒绝。

袁红冰（1953～）指出：中共的全部历史证明，中共官僚集团是中国历史上最彻底的卖国集团。为了中共政权的生存和安全，中共官僚集团不仅向外国割让大片国土，而且用国际条约

的方式承认历史上俄国侵占中国广大领土的合法性。更不可饶恕的是，中共官僚集团背叛了文化的祖国。中共建政后的历史，既是中国沦为马列主义精神和文化殖民地的精神亡国的过程，也是中共官僚集团以马列主义的名义摧残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过程。在颠覆中华传统文明方面，毛泽东所起的作用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人物。被冠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名的中共暴政，绝对不是“第二共和”。中共暴政本质上只是用专制摧残人权，用独裁毁灭共和的反人类罪犯集团的统治。将中共暴政同“共和”的概念联系在一起，既侮辱了共和的概念，也根本歪曲了事实真相；将中共暴政称为“第二共和”，是共产分子为混淆专制与民主、独裁与共和之间原则界限的一个思想阴谋。袁红冰说：血写的历史和铁铸的事实证明，中共官僚集团是中国苦难的根源，是社会大悲剧的根源，是社会不公正的根源——中共官僚集团是万恶之源，是人民的公敌；只有彻底否定中共官僚集团的专制统治，中国才能摆脱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和文化殖民地的命运，中国人才能摆脱精神亡国奴的地位和中共暴政的政治奴隶的地位，才能重建中国文化精神，实现中国人普遍自由、幸福的社会理想。历史和现实都已雄辩地证明：共产党特别是共产党官僚集团，乃是中国的耻辱，乃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乃是万恶之源。勇敢地揭露中共暴政的罪恶，才是对中华民族最深挚的爱；终结中共暴政用以犯罪的政治权力，才能拯救中华民族；埋葬中共暴政，才能洗刷中国在共产党政治逻辑下蒙受的百年耻辱。千年易过，共产党政权的罪孽难消。

袁红冰号召：“驱除马列，重建中国；否定暴政，确立民权；实行法治，宪政民主；各族共和，创建联邦。”——即还政于民，还权于民，还地于民，还财于民，自治共和。

20.毛泽东妄图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做地球王

二次世界大战后，人类对于“制止战争”已不再有任何疑问。而整个人类也分成了两个阵营，一边是厌恶一切战争的民主自由阵营，另一边是对他国实施无情的全面战争的共产恐怖阵营。毛泽东本人为了当上世界领袖，在国力根本不逮的情况下，同时对抗两个超级大国，全力发展核武器，向第三世界输出“毛式革命”，天天高喊“准备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使中国陷于准军事化的极权体制，全体国人既要勒紧裤带、过清贫的物质生活，又要在随时准备打仗的准动员状态中绷紧神经、摩拳擦掌搞魔鬼训练。中共党魁毛泽东鼓吹要打核战争，狂呼为了消灭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而实现全球性的共产主义，死 2/3 的中国人也值得。拉美共产匪首格瓦拉鼓吹，只要能消灭美国，牺牲全部的古巴人或美洲人都在所不惜。

1957 年 11 月 18 日，毛泽东在莫斯科举行的全球 64 国共产党大会上发表即席演说称：“有人说中国人爱和平，我们说不对！我们中国人好斗。我们不应当害怕战争。我们不应当害怕原子弹和导弹。原子弹是纸老虎，设想一下，如果爆发核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 27 亿人口，可能损失 1/3；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死一半还剩一半。对于中国，如果帝国主义对我们发动战争，我们可能损失 3 亿人。那又怎么啦？战争就是战争。不消几年，我们将比过去生产更多的婴儿。我怕谁去。死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 27 亿，一定还要多。”全场听众被震惊得鸦雀无声，唯有宋庆龄笑出声。

无人料到毛泽东会说出此疯狂的狂言，都不理解。真是宇宙的总魔王！在场的意大利代表英格劳（Pietro Ingrao）后来对记者说：大厅里听众感到震惊、生气，感到“人”对毛泽东无非是数字，死人他满不在乎，核战争他毫不介意，还挺欢迎。南斯拉夫首席代表卡德尔听毛讲

完后想：“再清楚不过了，毛泽东想要战争。”波共总书记 Gomuka 对毛的发言极为反感，捷共总书记 Novotny 拿着咖啡直哆嗦，说“毛泽东说他准备牺牲 3 亿中国人，那我们呢？我们捷克一共只有 1200 万人，我们将在核战后死得一个不剩，将不会有任何活人，留下来传种接代。”这导致了后来很多东欧国家不再跟着中国走。毛提出的政策太具冒险性、战斗性，而东欧的很多国家不愿意打仗，这个跟苏联是比较一致的。就连信仰斯大林主义的法国共产党也很反感。这种强硬的反帝立场当时便遭到波兰等国的激烈抵制。

毛反驳了希望改善人民生活的倾向，说：“有人说穷是坏事，我看穷是好事。越穷越要革命。人人都富裕的时代是不堪设想的……热卡太多了，人就要长两个脑袋四条腿了。”他的观点跟斯大林死后共产世界不希望战争，更在乎生活水准的风气背道而驰。

1958 年毛多次在各种会议上说：准备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打核战争，中国准备牺牲掉 2/3 人口即 6 亿人中的 4 亿来赤化全球。一个自称是人民的大救星，预谋让他的国家里每个 3 口之家都死掉两口，真是一个魔鬼！没有死的 2 亿中国人并不是毛泽东对自己的同胞还残存一丝仁慈的结果，是因为毛需要这 2 亿中国人去为他接收全世界。

1958 年 6 月和 8 月，毛先后向军队和地方领导人表露了自己的雄心壮志，就是要“把地球管起来”。1958 年 6 月 28 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小组长座谈会上说，大跃进胜利，中国成为先进强国后将向太平洋扩张，最后独霸全球。他说“现在太平洋不太平，只有我们占领了太平洋才会太平。”讲到这里，林彪插话说，“x 年后，我们必须建设强大军舰，准备在日本、菲律宾和旧金山登陆。”毛接着说，“我们建成这样的军舰要多久？1962 年我们炼出××吨钢铁时，有 xx 万台工作母机，生产能力就大了”（数字在文献原件中略去）。

可见：中共称霸全球的第一步就是打败日本、菲律宾并占领日本、菲律宾。由此可知：2012 年反日示威浪潮以及与菲律宾的冲突都是中共蓄谋已久的。

1958 年 8 月 4 日，毛泽东在河北徐水县说：“现在看来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把地球上的人通通集中到中国来粮食也够用！将来我们要搞地球委员会，搞地球统一计划，哪里缺粮，我们就送给他！”1958 年 8 月 17-30 日在北戴河举行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当年钢产量比上年翻番，达到 1070 万吨。8 月 19 日，毛泽东又对一些省市书记们说，“目前太平洋实际上是不‘太平’的，将来归我们管了才算是‘太平’洋……将来我们要成立地球管理委员会，为全球制定统一计划。”此后的《人民日报》多次鼓噪要“统一全世界”，要“成立地球管理委员会”、“搞地球统一计划”。为达此目的，《人民日报》还宣传说：“大跃进是为了中国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赶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成为世界上最先进、最富强的国家之一。”由此可见：大跃进、大炼钢铁都是为了发动世界大战而独霸全球。

21. 江泽民的超级法西斯梦

江泽民上台后，高举起民族主义旗帜，高调地纪念鸦片战争，叫嚣：“民族复兴：21 世纪是中华世纪！”2003 年，江泽民让何新拟好提纲，请钱（乘旦）、齐两教授备课，大讲大国崛

起历史经验教训，让政治局形成决议：“中共要走二次世界大战前德国、日本快速发展的道路”；实质是让中共为江泽民搞的“中华世纪”背书。拍了《大国崛起》的电视系列片，走德日法西斯之路的底牌不敢露，怕舆论谴责。其实二战后德、日达到世界经济体第二、三位，比二次世界大战前快得多；表面上学德、日二战前经济发展，实质上仿效军国主义镇压机制。江泽民等中共领袖再三表态：“我们决不走三权分立的英美式的发展之路”；却从来不敢说：“我们决不走独裁的德日式的军国主义道路”，更不敢说我们要“走德国、日本在二战后的更快速发展的民主之路。”江泽民私下挂在嘴边的是“跟我们相比，希特勒是小儿科！”言下之意：跟希特勒相比：江统治的人口更多！志得意满，溢于言表。关于中共的正式名称，江授权亲信迟浩田上将在军内讲演中说：“我党高举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大旗，叫民族社会主义即纳粹主义。”实际上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都是与希特勒法西斯的一些组织类似或相同的，并且这两个名字也取得很相近，中共是共产党，相信社会主义、马列主义，而希特勒的是叫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也挂了社会主义牌子。

在 2006 年 2 月 26 日，迟浩田做了个内部讲话，题目是：《战争离我们不远，它是中华世纪的产婆》，他说，“我们的‘发展’，指的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复兴，当然不会局限于我们现在这片国土上，当然要扩展到全世界。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党的老一辈带头人刘华清同志，及我们党的年轻战略学家何新同志，都反复强调了世界文明中心转移论。”“我们是谁最先提出民族复兴这个口号。就是何新同志最先提出来的。”“按照西方学者宣传的观点，全地球的人类，都是发源于非洲同一个母亲，所以无所谓哪个民族的种族优越性。但是按照我们大多数中国学者的研究，我们中国人与地球上其他人种不同，不是发源于非洲，而是独立发源于现在的中华大地。大家熟悉的周口店中国猿人，就是我们祖先的一个发展阶段。……我们众多从事考古、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历史研究的专家认为，东北红山文化、浙江良渚文化、四川金沙遗址、湖南永州舜帝文化遗址的新发现，进一步清晰了中国早期文明的生存状态，证明仅中国稻作农业文化的历史就可以推到 8000 年至 1 万年前，从而打破了‘中华文明五千年’的成说。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是‘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进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同一实体’。这就是我们引以为傲、自称为‘炎黄子孙’的中华民族。如果说当年希特勒德国鼓吹他们日尔曼民族是地球上最优越民族，那么我们的民族要比他们优越多了。正由于我们民族的悠久历史，我们的民族早就扩散到美洲和环太平洋区域，这就是美洲的印地安人和南太平洋各个地域的东亚人种。”

“何新同志在 1988 年写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如果说，世界主导中心自 18 世纪以来位于西方的欧洲，从 20 世纪中叶又转移到美国的话，那么，到 21 世纪，世界主导中心将转移到地球的东方。这个“东方”当然主要是中国。类似的思想，刘华清同志早在 1980 年代中期就提出来了。……所以，如果说 19 世纪是英国的世纪，20 世纪是美国的世纪，那么 21 世纪就是中国的世纪。……上世纪末我们在北京建立了一个中华世纪坛，在新世纪到来的那一刻，党中央领导集体在那里高举周口店火炬，举行了迎接中华世纪的誓师大会，就是要按照历史规律，把实现中华世纪做为我们党的奋斗目标。后来我们在 16 大的政治报告中，写进了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还在新党章中明确规定，我党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些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体现了我们党的胆略。大家知道，过去马克思他们可从来没有讲过，共产党是哪个民族的先锋队，也没有讲过，民族复兴可以做为共产党的口号。”

“现在的中国与当年的德国相比，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都认为自己的种族最优越，他们都有受列强欺凌的历史而有复仇心理，他们都有崇拜自己权威的传统，他们都感到生存空间严重不足，他们都高举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面旗帜所以自称为‘民族社会主义’，他

们都崇拜‘一个国家、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

“德国的法西斯主义虽然也强调高度的集中，但注重的只是元首个人权力，却忽视中央班子的集体领导，所以希特勒后来众叛亲离，从根本上动摇了纳粹党的战争能力。我们所以与德国不同，是因为我们是彻底的无神论，而德国原来是个天主教和基督教国家，希特勒只是半个无神论。希特勒虽然也认为普通老百姓的智力低下、所以应该由领袖说了算，德国老百姓那时虽然也非常崇拜希特勒，但德国不象中国这样有广泛的崇拜‘圣人’的悠久传统。我们中华社会所以历来崇拜‘圣人’，就是因为我们不崇拜任何神。你崇拜了神，就不可能崇拜人，除非你承认谁是神的代表，就像中东一些国家一样。而你一旦承认了谁是圣人，当然你就要由他领导你，而不是由你来监督和挑选他。这就是我们民主集中制的基础。所以，说到底，只有我们中国，而不是德国，才是对抗西方议会民主制的可靠力量。”

希特勒因为战争时树敌过多失败。“德国当年的三条经验，却是我们在完成我们历史使命、实现民族复兴时应该汲取的。这就是牢牢抓住民族的生存空间问题，牢牢抓住执政党的领导，牢牢抓住当‘地球之王’这个大方向，紧紧拧住这三个问题不放。”

“‘六四’平暴后我们一直在考虑如何防止中国和平演变以保住共产党的领导权，我们想来想去，想不出好办法。如果我们拿不出好办法，中国的和平演变将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就会成为历史的罪人。经过我们党的深刻反思，我们终于得出结论：只有把发展起来的国力转变为打出去的拳头力量，带领人民走出去，才能永远博得中国人民对共产党的拥护和爱戴，我们党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六四暴乱使我们认识到，必须把国家的建设发展同准备打仗、带领人民走出去紧密结合起来！所以从那时以后，我们的国防政策就来了一个 180 度大转弯，我们越来越强调‘平战（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结合’……我们公开强调的仍旧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是事实上经济建设是以战争为中心！”

“我们不惜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也要带领人民走出去，保证我们党的领导地位。无论如何，我们中国共产党是不会退出历史舞台的！我们宁肯要这整个世界甚至整个地球与我们党共存亡也不会退出历史舞台!!! 现在不是有什么“核捆绑”理论吗？就是说核武器把整个世界的安全捆绑在一起，要死大家死到一起。我看事实上还有另一种捆绑，就是我们党的命运与整个世界的命运捆绑在一起，如果我们共产党完了，中国就完了，世界就完了。”

迟浩田还讲，中美关系就是冤家路窄、你死我活的关系。所以，解决美国问题就是解决其他一切问题的关键。为了消灭美国，不仅准备先下手为强开打核大战，而且还研发了比核武器更为厉害的杀手锏——生化武器，准备大打生化战！迟浩田说：“小平同志还健在时，中央就高瞻远瞩地做出了正确决策：不发展航母战斗群，而集中力量搞灭绝敌人人口的杀手锏。”迟浩田公然宣称要对美国“清场”时，要将在美国的几百万华人也一起“清”掉。理由是这些人受资产阶级自由化影响太深，如果留下他们，今后还要搞运动改造……迟浩田残忍地说：“中国人不杀中国人，我们怎么能解放全中国？”也就是说，要是留下海外华人，“清场”怎能实现？“用果断手段在美国‘清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美国这块土地腾出来……如果生物武器偷袭成功，中国人民将在对美斗争中付出最小牺牲代价。但是如果不成功或引发美国的核报复，中国恐怕就要遭受损失过半人口的灾难，所以我们要做好大中城市的空防准备。但不管怎样，为了党和国家及民族的前途，我们只能大胆往前走！不管有多少艰难险阻，不管要作出多大牺牲！人口即使死了过半，还能再生出来，而共产党一旦垮台，就一切都完了！永远完了！”迟浩田的此段话与 1957 年毛泽东在莫斯科叫嚷的“不惜死 2/3 中国人

打一场核大战，剩下 2 亿人建设共产主义”的言论，其漠视生命凶残兽性，完全相同！

事实上，垂死中共比毛时代中共还要凶恶，而朱成虎的讲话就是注脚！朱成虎扬言：如果美国介入台海战事，中方将首先使用核武，令美国数百城市夷为平地，即使中国西安以东遭到摧毁亦在所不惜。迟浩田宣称共产党高于人类和世界，“如果历史一定要我们选择：是死中国人还是死美国人？是保全几亿中国人的生命重要还是保全我们党的生命重要？我们只能选择后者。谁叫我们是中国人？谁叫我们是共产党员？从我们入党那第一天起，党的生命就是高于一切！历史将证明我们的选择是正确的。”若“共产党完了，世界也完了”。既然党的生命“高于一切”，为中共苟延性命，不惜动用生化、核武作殊死一战，就不奇怪了！视人类生命如草芥，将西安以东和数百个美国城市夷为平地，将中美十亿人化作核尘，正是迟浩田讲话中关于党的生命高于一切的形像表达，两者在凶残与疯狂上一脉相承。

迟浩田讲话扯去了一切伪装，让世人看到了一个赤裸裸的中共：“马克思指出，暴力是新社会诞生的产婆。所以战争就是中华世纪诞生的产婆。”血腥淤塞于每个毛孔，邪恶充盈在每个细胞，它要死中求生，决战人类，这就是讲话的主题。

22.胡锦涛透露：中华世纪就是中国称霸全球的世纪随后共产全球

2009 年 10 月以后，胡锦涛在中共内部座谈会上讲：“我们在上一世纪末，在北京建立了中华世纪坛，向全中国人民吹响了开创中华世纪的号角。但怎样才算是实现了中华世纪呢？我们关起门来打开天窗说亮话，就是全世界都由我们党领导和安排，不仅从思想、文化、经济及政治上，也要从组织上有保证，为全地球制定统一计划。只有到了这一天，我们才可以说，中华民族，世界革命人民，现在有了的，就等于永远有。……我们完全有权力提出，在全世界共产主义实现之前，必然要经历一个中间时期，这个时期，就是中华世纪……只有经过中华世纪，世界社会主义才能站稳脚跟，才能进一步前进到共产主义。”

在这个谈话中，胡锦涛提出要实现“民族复兴”，要把 21 世纪变成“中华世纪”，且直言不讳地说：“全世界都由我们党领导和安排，不仅从思想、文化、经济及政治上，也要从组织上有保证，为全地球制定统一计划。”如果他的愿景能够成功，那么中共官员们从六四以来 20 多年中捞取积累的天量财富，不仅能够今天有而且能够永远有。胡锦涛执意在 60 周年大阅兵的队伍中设置毛泽东思想方队，显示了他确实是毛泽东的薪火传人和隔代弟子。

胡锦涛透露中共上世纪末在北京建立“中华世纪坛”的目的，就是预示 21 世纪是“中华世纪”，全世界将由中共来掌舵，这是毛泽东生前的伟大梦想，也是当前中共奋斗的最低纲领。为此，他不打自招地承认，目前正在快速崛起的中国和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纳粹德国几分相似，中共党旗上的镰刀锤子虽然老得掉牙，但坚决不能丢掉。

在谈到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的发展时，胡锦涛显示出锐利眼光和独到见解。他说毛泽东对记载改朝换代的古书研究得多，所以总是“破”字当头，强调一个“打”字，整天研究如何领导全世界人民开展武装斗争，推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而邓小平因为留过学，所以更注意利

用人类文明的所有成果壮大中共的力量，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驾驭巨人，最后打倒和取代西方巨人。这里，胡锦涛引用未发表过的邓小平的生动语言和词汇，一语道破邓小平和毛泽东穿的是一条裤子，他们的战略目标完全一致，只是实现手段有所不同，从而也揭示了邓小平在掌握中共领导大权后，为何急于抛出“改革开放”的政策，宁愿把中国变成全世界的“血汗工厂”，牺牲生态环境和数以亿万计打工者的一切权益，也要引进港台和国际资本的天机。由此可见，胡耀邦和赵紫阳当年根本没有领悟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的真正目的，他们最终下台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而胡锦涛确实心领神会这位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别有所图，所以他被邓小平钦定为中共第四代领导人也就毫不奇怪了。

邓小平在六四以后提出的 32 字国际方针：“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抓住机遇、有所作为”，虽然土八路气味十足，却被中共当作葵花宝典、救命指南。“韬光养晦”这个充满阴险狡诈含义的贬义词常被拿政府津贴的网评员，当作中共在国际上委曲求全、出卖牺牲中国利益的借口。胡锦涛不仅自己迷信“韬光养晦”，而且指出毛泽东也是“韬光养晦”的信奉者。在抗战时期，中共军队在南泥湾开荒种地，这并非像中共一直宣传的那样，是为了生产粮食，而是迷惑欺骗“敌人”。这个“敌人”不是当时正用铁蹄蹂躏中国大好河山的日本鬼子，而是正在同日本侵略者进行浴血奋战的国民党政府。这样，中共成功地隐藏了军队实力和意图，积蓄了力量，在以后的国共决战中取得了胜利。为此，胡锦涛自鸣得意地说，“韬光养晦”是一门非常高的斗争艺术。

毫无疑问，胡锦涛把毛泽东著作读得滚瓜烂熟，是毛泽东斗争哲学的衣钵传人。在这个谈话中，他引用了以前未发表过的，赤裸裸展现中共暴力本质的毛泽东语录：“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他深深认同文革中广泛流行的革命理论，夺取政权和保卫政权要靠枪杆子和笔杆子，只有在全世界范围内消灭帝修反，中共的革命事业才能取得最后胜利。胡锦涛也对邓小平在中共“大跃进”饿死数千万民众之后，主持写作和苏共胡搅蛮缠的《九评》印象深刻，以至于在五十年后中国和世界都风云巨变的今天，仍然念念不忘。毛泽东的一个批示：“我们这一代青年将亲手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使他兴奋了好多天而夜不能眠，决心参加这场决定谁胜谁负的最后斗争。这段极其感人的抒情文字是胡锦涛革命心路历程的真情流露，是他共产主义世界观形成过程的真实写照。

胡锦涛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非凡能力，在他提出的“和谐社会”这个口号中得到充分体现。在谈话中他阐述了这个口号的目的和作用。第一是稳定党在中国的执政地位；第二是增强中共在全世界的影响力；第三是对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敌对势力起麻痹作用。为此，他踌躇满志，沾沾自喜，认为西方民主国家一定会像抗战胜利后的蒋介石和他的盟友美国一样上当受骗，让中共夺取在全世界的胜利，实现毛泽东的伟大理想，完成中共的历史使命。

胡锦涛不厌其烦地讲了他和其它中共领导人，如何发展光大了毛泽东的“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三大法宝”。第一是牢牢抓紧党的领导。果断出动国防军，不惜杀人流血，一举粉碎了轰轰烈烈的六四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对民众进行了“三个代表”的思想洗脑教育。广泛扶植了高校中的“新左派”，配合党批判西方的“普世价值”观。为此，胡锦涛发明了一个为专制主义辩护的新颖理论，即西方民主自由那一套有助于发明创新，但中共独裁制度更加适合应对突发事件，适合对敌战争，从而决定一个民族的生死存亡。胡锦涛明确指出，在军队的教育中，随时随地把枪口对准老百姓维护稳定，捍卫中共执政地位，是军队新的神圣使命。在互联网方面，他提倡既积极利用新技术封锁过滤对中共专制统治不利的信息，也大量雇用网上警察和网上评论员，散布对党和政府有利的虚假信息和评论，并且专门

组织编写混淆是非的稿件文章，提供广大民众消费吸收。胡锦涛透露中共在井冈山、延安和上海设立了三大干部培训基地，源源不断地生产与民众为敌的中共党徒。中共还在世界各国建立孔子学院以增强党的影响力，发现培养中共的同情分子和海外积极分子。胡锦涛是一个只信仰暴力革命的共产党人，从来没有喜欢过孔子。像毛泽东一样，砸烂孔家店的口号已经深入他的骨髓。中共在广泛布设的海外中文学校中，无孔不入地发放中共组织编写的免费中文课本，使从小生活在海外的华人下一代，也在党文化的香风毒雾的熏陶下，不知不觉地站在中共的立场上思考问题。中文学校也是中共组织动员来自大陆的新一代华裔美国人在美国大小城镇挥舞五星红旗，向其它族裔的美国人示威游行的最佳场所和出发地。

胡锦涛说，发展经济具有三大好处。其一能够使中国人民吃饱穿好娱乐好，得到了满足的人们就会拥护共党。其二解决了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几亿中国贫民的不满和造反问题。他们被锁定在各行各业、大大小小的血汗工厂里面，绝不允许组织自由工会，也不允许在社会上串连，维护自己少得可怜的权益。他们生产出无穷无尽的全球最低价优质商品，供应世界各国比他们悠闲得多的穷人，从而使西方人民赞叹这十几年中共所取得的经济奇迹。其三可以出动中共控制的巨无霸国营垄断企业，像联想和中金，比垮西方大公司，走向全世界收购投资他们的买卖，使西方资本家和高级知识分子也不得不对中共刮目相看。

谈起中共军队胡锦涛激动万分，因为他的老师毛泽东有一句名言：“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军队是中共专制独裁的命根子。在谈话中胡锦涛第一次透露，中共正在研制或已经拥有某种终极武器。它也许是生物武器或基因武器，也许是激光武器或微粒子武器。中共现在就像已经获得原子弹的北朝鲜，吃了一颗定心丸而有恃无恐。胡锦涛又谈到不流血的战争手段，自豪地提到在西方金融界和经济界，在西方政府上层都有党的同情分子。刚去世的萨马兰奇、基辛格和比尔·盖茨之流可能都是他想象中的例子。为此，他回顾了中共的战争岁月。在第二次国共战争末期，共军席卷整个东北和华北，收缴了海量被作废的金圆券。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不顾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死活，决定把这些金圆券偷偷地运到江南地区，抢购各种民生必需品，致使物价飞涨，民怨沸腾，从而把国民党政府推到火山口上，彻底搞垮了国民党的抵抗。中共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比日本人恶毒百倍。

六四以后，邓小平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预言中美战争不可避免，但只会发生在“第二个历史时期”，在此之前的几十年是和平年代，即“第一个历史时期”，可以发展经济，壮大力量。胡锦涛把邓小平的分析和毛泽东关于利用帝国主义发动世界大战的历史机遇的教导结合起来，要全党充分作好准备，在“第二个历史时期”，把帝修反打平，统一全世界，胜利地推进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他再一次回顾了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如何利用美军观察组的军用飞机，巧妙地把中共高级军政领导干部从延安火速送到各个前线，一举扭转了战略劣势，从而取得内战胜利的光荣历史，为参加座谈会的中共干部打气。+

当前，中共最害怕的就是“颜色革命”，因而把宣传民主自由价值观的民众和知识分子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污蔑他们是西方国家在中国的别动队。这些年来，中共对提倡维护民权的热心人士，采取“时收时放，收放结合”的办法，既严密控制他们，又不激化矛盾。在谈话中胡锦涛兴致勃勃地详尽解释了这个“收”和“放”所包含的两方面行动。一是对民权人士人身自由的收和放。“收”就是在一定情况下把他们抓起来，收在拘留所和监狱一段时间，或是让他们在家里或旅馆里或政府办公室里“喝茶”，不准出门一段时间，把中共自己制定

的法律条款当儿戏。“放”就是放民权人士出来，让他们在中共特务 24 小时的监视下活动，展现特务泛滥成灾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二是对忧国忧民人士言论的收和放。“放”就是在一定时间内允许这些言论在社会流传。中共的目的一是通过“新左派”和网上五毛党之流进行胡搅蛮缠，把民众思想搞乱，堕入五里雾中，辨不清好坏是非，从而增强所谓的抵抗力。二是引蛇出洞，把这些言论的同情者都吸引出来，在他们的档案里记上一笔，划清敌我，并使他们从今以后找工作困难。三是欺骗外国人，造成中共改革开放后政治控制有所松动的假象。胡锦涛夸口说，党通过各地公安局、互联网管理部门、维稳办公室、打黄打非办公室、610 办公室和信访工作室，编织了一个严密的控制网，从而能够牢牢掌握整个中国社会。把信访工作室作为这个控制网的一部分表明胡锦涛认为所有上访民众都是闹事者，是异议反动分子，中共根本不会真心解决这些人的困难和问题。

在谈话中胡锦涛还特意提到在“第一个历史阶段”，经济发展占第一位，环境保护占第二位。如果经济发展的步伐慢下来，就会影响到中共的军事斗争，中共就有可能丢掉政权，中共干部现在享有的灯红酒绿莺歌燕舞，包括自己的小安乐窝就会丧失殆尽。这就是为什么中共每一层官员都以 GDP 这个马首是瞻，不惜牺牲环境和资源、牺牲矿工生命，牺牲几亿打工者的生活和家庭。经济是否能够快速发展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

胡锦涛强调了统一战线工作。所谓“统一战线”，就是中共赖以起家 and 夺得政权的隐蔽、欺骗、颠覆对手的地下工作。胡锦涛举例说明中共“三大战役”的胜利完全是潜伏在蒋介石身边和国民党国防部以及军队里的中共秘密党员的功劳。当中共取得全国胜利后，成功地领导党的地下工作的刘少奇顺理成章地当上了中共第二号领袖。最近中共报刊杂志广泛地报到了蒋介石的机要秘书、中共地下党员沈安娜的故事，可能因为胡锦涛在这个谈话中提到沈安娜这个名字。胡锦涛透露轰动一时的电视连续剧《潜伏》是中共出资拍摄的革命传统教育片。他指出，虽然中共早已取得政权，但统一战线工作仍在继续，工作范围也超出中国和中国人范围，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力范围。中共的统一战线包括内部和外部两大部分，公开和隐蔽两大部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共把统一战线搞到了全世界。海外华人社团和媒体有许多为中共工作的人，有的专业，有的业余，他们都有多份工作，帮助党监视被流放到海外的中国人，影响和引导美国的舆论界。胡锦涛透露这些被中共收买的人是通过互联网用加了密的电子邮件和中共国安局交流信息的，无需寄信和使用无线电电台。

在这个谈话的最后部分，胡锦涛论述了中共和人民的关系问题，得出了党比人民重要这个结论，因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此，他提出对那些留党察看の下台干部，不管他们占有多少财富，只要对党忠心耿耿，就重新使用他们。

23. 中共霸权梦必然被粉碎！

中共霸权梦者们忽略的关键因素就是，美国并不是孤立的一个国家，而是世界诸多军事同盟的盟主。2009 年仅北约 28 个成员国合计人口约 9 亿，GDP 达 36 万亿美元以上（7 倍于中国的近 5 万亿），其军事开支合计超过世界的 70%。再加上美国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的同盟，人口合约 11 亿，GDP 合计约 43 万亿（至少 8 倍于中国），无论是在经

济、政治还是在军事上，中国拿得出什么来抗衡取代呢？问题的要害，正在于中国的极权制度——对于自由和民主等普世价值的极端恐惧、深刻敌意与绝对拒斥，使中国在今天的世界上极为孤立，几乎不可能有什么真正靠得住的盟友。中国当局否定普世价值的存在，用两千多年前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世界观”来解释今日世界，是为了愚弄老百姓，以维持自己早已被世界潮流彻底淘汰了合法性的极权统治。它把今日的国际社会曲解成一个根本无是非、无道德、无正义的丛林世界，把极权中国伪装成其中的一个道义上的“正常”国家，仅靠一套老掉牙的“远交近攻”和“以夷制夷”之类的把戏来应付当代国际关系，凭借信息封锁和新闻管制骗过了国内一些人，却如何骗得过整个国际社会？一个对自己的骨肉同胞都无比残忍的意识形态和专制政权，对“非我族类”的外国人外族人究竟会如何对待，于情于理，本不难推论。事实上，从中共 1956 年力压苏联出兵血腥镇压匈牙利人民的民主运动，70 年代支持“红色高棉”对柬埔寨施行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本种族灭绝”，到今天仍冒天下之大不韪，独力为恶贯满盈的北韩金家小朝廷输血撑腰……世界一直在见证：这个政权行事从来就没有过任何道义上的底线，怎能不人见人怕？有多少国家真正相信它会“和平崛起”？有多少国家会乐见其军事上日渐强大？有多少国家会愿意接受魔鬼党的领导？

今天中国最为拿得出手的，只能算是那个以中俄为核心的 6 国“上海合作组织”了。从种族、地缘、历史、文化和宗教各方面，俄国都并没有非与极权中国结成真正战略同盟不可的理由。在多次要求加入北约被拒后，俄国终于在 2010 年 11 月同意加入北约的欧洲导弹防御系统，双方并书面承诺不再将对方视为敌人，再一次证明了中国某些人的“联俄抗美”是多么荒唐的一厢情愿。2013 年 3 月国家主席习近平主动首访俄罗斯并公开承认江泽民出卖中国领土的中俄边界条约是一种卖国行为，可以说是卖身投靠；可是俄国人在有些国际问题上并不是支持中国，例如南海问题上对中国和越南的争端采取支持越南的态度，大量卖给越南军火。习、普元首会，普京又将中共玩弄于股掌之中。中共要油气，俄罗斯要高价！中共要买俄罗斯新武器，俄不但要高价又怕中共仿制。结果是中共要什么没有得到什么，两魔头聚在一起，只是你好我好大家好，闹剧一场，无任何实质意义。

中国之所以处于今天这种“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可怜地位，根本原因无它，正是孟子所谓的“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叛之”。就连自古以来一直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韩国、日本和越南诸国，虽然同为亚洲人黄种人，也宁愿从大洋彼岸引入美国来阻止极权中国在东亚建立它的地区性霸权。对比一下三八线两边两个朝鲜的迥异现实，以及它们各自的“后台”，这些亚洲国家的选择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就连新加坡的李光耀也毫不犹豫地公开呼吁美国更多地参与亚洲事务以制衡中国。

今日中共政权之人心丧尽，又岂止“亲戚叛之”而已？就连那些正在国内掌权的官员，都手持多国护照，随时准备抛弃中共国而叛逃！他们之所以至今还“暂住”中国，无非是为了利用自己垄断地位，榨取一切还可以榨取的利益，直至那“最后一桶金”。为此目的，他们不惜诉诸任何手段与伎俩，其中之一，就是这个极权中国的霸权梦。

中国历来就是一个亚洲国家，对境外的政治影响力主要集中在东北亚与东南亚，从来就没有扮演过与当年不列颠帝国和今日美国类似的世界角色。时至今日，那种一谈世界历史就只知“中”“西”对举，我一半你一半，你我轮流坐庄的思维模式，仅以亚洲论，也是对印度、波斯、阿拉伯等其它重要国家与文明的全然无视与无知，表现的正是世界知识的缺乏。照着“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加上“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的土产宿命论，就认定今日的世界霸权是“非我莫属”而且是“物归原主”的中华民族的复兴，可以说是世界历史盲。

将如此荒诞的梦想鼓吹为现实的国家目标，当然是一个大骗局。在共产政府眼里，普天之下，莫非敌国，每一个认可自由与民主的国家都是对自己的潜在威胁，“亡我之心不死”，从前是“C型包围圈”的一环，今天更成了“O型包围圈”的一环——其实无非是对内的“施虐狂”引发的对外“被迫害妄想症”而已。中共以一个不可能达成却在价值上压倒一切的国家目标，强迫亿万中国人永无止境地当共奴，从而使权贵的私利最大化。

这个大骗局对世界和中国都极具危险性。共产主义必须消灭一切“反动阶级”，共产中国的世界霸权梦则可以牺牲世界上所有“非我族类”之人。当它付诸实行，其排他性与侵略性必然对世界和平造成严重破坏，共产中国亦必然因此而成为世界公敌与人类公敌。在由此而来的争战中，世界人民的生命财产必将遭受巨大的损失。但更直接更紧迫的危险和损害却不得不由中国人民来面对和承受。战端未开，国人已苦秦久矣。孟子曰“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央视大火夜，万众欢腾时，亿万中国“屁民”视那些权贵“精英”和他们的“国家”为无物，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以如此国民与世界为敌，开战之日即是败亡之时。即使其时国力确实已达世界第一，一个极权的中国最终仍将不可避免地被击败——就如几乎征服了整个欧洲大陆的法西斯德国可以说已是当时世界第一，最终却仍被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所消灭；玉石俱焚之际，中国人民生灵涂炭，又不能不是最大的牺牲者。

24. 中共是人类最大威胁

首先，共产党的极端权力欲望和控制欲望及其侵略本性是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共党，无论从其整体而言，还是从其死硬的党魁、党徒而言，都是权力欲极强、控制欲、占有欲极强的东西，也就是侵略成性的东西。

共产党比尼采的“权力意志”理论描述的还要极端千百倍。在内部，共产党徒们为了争夺权力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灭绝人性，不择手段，内部倾轧和血腥斗争充满整个共产党史；对外，侵略与对外控制也同样充满了整个国际共运史。红色苏俄立足未稳便急于向世界“输出革命”。苏俄打着“解放全世界，解放全人类”的旗号，实质是为了侵略全世界，奴役全人类，利用共产主义的形式，在全世界建立其共产主义的支部，颠覆各国政府。共产中国实际上就是苏俄政府一手建立和扶植起来的侵华得力工具，在大陆颠覆了合法的中华民国政府。苏俄侵略占领了相当于 110 个台湾的 344 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包括江东六十四屯、唐努乌梁海、新疆北部、外蒙古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俄对外侵略的程度不亚于希特勒，战后，苏俄控制了整个东欧国家，以至于几乎控制了半个世界。

这一切都是由于共产主义的反人类性决定的，是其企图控制一切的极端狂妄的“权力意志”决定的。或许有人会说，那中共的权力欲和侵略性可不明显啊。其实，中共在邪恶的毛泽东时代，在实力如此弱小的情况下，就一直梦想著称霸世界，毛一直以“世界领袖”自居，其出兵朝鲜、支持越南共党、支持红色高棉、宁可饿死数以千万的老百姓也要搞原子弹、提出所谓的“第三世界”理论等等，无一不是在强烈的侵略欲望支配下做的。

今天世界上的许多恐怖主义组织和破坏地区稳定的武装组织，都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有的甚至受到中共的暗中支持。中共依然要耗费巨资收买许多小国为己所用，处处暗中支持许多地方的“革命”恐怖组织，企图输出革命，侵略外邦，控制它国。共产党的意图，就是“唯恐天下不乱”，就是要“浑水摸鱼”。中共对柬埔寨红色高棉残酷屠杀 1/3 国民的滔天罪行负有支持和教唆的责任，直到今天中共仍在阻止对红色高棉的刽子手进行审判。中共的狡猾外交，中共的暗中策划，无疑是当今世界和平的巨大阻力。

如果说核战争仍然是高悬于人类头上的毁灭之剑，那么最有可能引发这场毁灭灾难的，一定是共产党。其侵略成性、其非理性的独裁机制，就是核战争启动的最大的定时炸弹。今天，人们担心核战争会威胁整个人类的生存。其实，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核试验与核竞赛，其背后就有中共的黑手。朝鲜不断地进行核试验，而朝鲜的主子正是中共恶党。中共独裁者所掌握的核武器，也严重的威胁着人类的安全。因为中共控制下的军队和武器，并不为人民所拥有，也不为人民所掌管，而完全是“党指挥枪”，随时都只服从于恶党的一己私利。那么，当这个恶党在垂死挣扎之时，其操控的核武器就是对人类的严重威胁。中共虽然一直对外欺骗说其核武器是用来“维护世界和平”的，是用于“保卫国家”的，可这些都不是真的，因为这些武器和军队都掌握在一个完全只顾自己私利和极端独裁的黑社会流氓“政党”手里。

与此同时，共产党的“统战”和“宣传”迷惑了全世界人民，在和平时代，它讲“和平”可能比谁都讲得多，比谁都高调，可是你别忘了，在共产党的辞典里，“一切都是手段”，只要能满足它的权力欲和控制欲，它是没有任何立场和原则可言的。如果你认为共产党真的把“和平”当作是其立场和原则，那你就一定是上了它的当了。

人类能幸存至今，不是源于（人类）权力萌发了善心，而是源自（人类）权力的无能。如果共党掌握了这种“控制阳光/控制空气”的技术能力，那么，这样的技术除了被用于对境内人民的财富掠夺，还必定会用于对境外敌人的征战。只要对敌方实施断光、断气，就能实现“简洁的杀戮”。那么做的后果呢，大致是人类被消灭得差不多了，并且会连带殃及池鱼、殃及百兽，一同毁灭，或命悬一线。权力的嗜血性格、权力的不被约束，导致的后果就是如此的不堪设想！万幸的是，中共政府现在只能控制我们脚底下的土地，却还没能控制我们头顶上的阳光和空气！没法检测我们头颅内的想法！否则，我们人人都是活在“剃刀的边缘”，随时会命悬一线、随时可能被权力“玩死”！

其次，共产党的邪说和行为是毒害世界人民的精神鸦片。共产党的存在本身及其对外强力施加影响的过程，都使世界人民的精神深受其毒害。人们已经知道，共产邪恶主义是根本否定、根本破坏一切传统文化和普世价值的，是反宇宙、反人类的，也是根本破坏一切民族文化的，它以“党性”灭绝人性，以“权力意志”灭绝道德良知，它为了利益不择一切手段的做法，随意践踏人权和法律的做法，软硬兼施的流氓做法，等等，都在污染整个人类的精神，许多人在不知不觉中都受其影响毒害，有的甚至在效仿其肮脏做法。可以说，对当今全人类的道德下滑和犯罪率上升，共产党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人们还不知道的是，共产党的“党文化”洗脑全国之后，中国人的思想都或多或少发生了变异，中国人无论是从政、经商，还是个人生活，包括恋爱、婚姻、家庭生活，无一不带有共产党那套“强力占有”和“斗”的思维，以及奸诈、说谎那一套行为。

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特别是政治家和商人，在与共党接触、交易的过程中，也都在逐渐地

淡忘了自己的原则与立场,受到了共产党的收买和欺骗,被共产党玩弄于股掌之上而不自知。当今的世界是全球一体化的世界,当今是信息时代和互联网时代,共产党的精神污染对全人类的威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严重,更为可怕。

再次,共产党正在加剧破坏全球生态环境的平衡与和谐。共产党的极端欲望和蔑视天地自然的邪说,使其破坏起自然环境来比任何人、任何组织都更为严重。

共党是反宇宙的邪灵,是“反动”野蛮的总代表;其“与人斗”、“与地斗”、“与天斗”的邪说,使其对天地自然的破坏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严重百倍。它为了“政治利益”,通过邪恶的“政治总动员”,可以一瞬间“使江河断流”、“使群山让路”,使大片森林被毁;共产党的官员们,根本不顾及子孙后代的根本利益,只听总头目的发号施令,于是到处大兴工程,到处不计后果地滥砍滥伐,根本不顾科学原理和生态平衡,只讲其邪恶的“政治”,如三峡工程就具有严重的隐患,其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是极其严重的。

生态环境是全球性的,不独是中国的事。中国的生态恶化和环境污染,必将给全人类造成巨大的灾难。而在共产党的体制下,要想改善生态环境是绝对不可能的。只要共产党还存在,中国的生态环境就只会继续恶化,从而给人类的生存空间带来严重灾难。

第四,中国国内矛盾的发展。2001年,胡文海杀十四人,被官方定为暴徒,被人民捧为英雄。2008年“7.1”,杨佳杀民警6人,伤5人,被民众捧为义士。2010年,数百人冲击法院,祭奠枪杀三法官的朱军。2012年,云南巧家一妇女,不满政府征地拆迁,怀抱1岁小孩,在便民服务大厅点燃炸药包,实施自杀式爆炸。2013年5月,安徽女子袁利亚在北京坠楼身亡,引发千人游行。1992年邹斌见义勇为被打残,母亲邹后珍为儿子讨说法,遭报复住房被拆;邹后珍不肯屈服,2012年邹斌被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1994年郭起真举报马桂臣利用职权侵占公有楼房,遭到打击报复,1996年揭露公安机关将无辜的百姓当作特大杀人案真凶关押,却被送到监狱。2006年唐慧11岁的女儿被轮奸,唐慧为女儿讨说法,2012年被劳动教养。2008年杜懿锦在部队伤残,各种待遇不落实,母亲桑淑玲维权反被打,2012年上访中央后被关黑监狱。上访的人,仅仅是露出来的冰山一角。权利被侵犯,没有站起来的人何止是站起来的人几十倍。这些人只是在静静的等待革命的机会。历来革命运动,都是由一个事件引发很多不满现状的人参与,最终形成一股推翻现状的力量。这些不满现状的、权利被侵犯的人,不管有没有站出来,对现有政权都是一个威胁。从这些年的发展来看,这个威胁正在变得越来越强大。共产党有如惊弓之鸟,日夜担忧人民的反抗!

当今世界,人类受到多种威胁,包括核战争、恐怖主义、环境污染、能源危机等等,可是没有一种威胁比共党对人类的威胁更严重、更具根本性。中共以流氓手段来搞经济,如:中共在购买外国飞机时,把飞机订单与收买、拉拢相结合的肮脏手段,就是经济界的最可耻之举,必将破坏人类活动的正常原则,给整个世界布下重重危机。中共的存在或许会给个别人、个别国家带来一时之利,但人们一定要清醒:中共的存在,是对全人类根本利益的最严重威胁。如果人们纵容共党为祸下去,它终有一天将会毁灭整个人类。只有全球人民共同努力,才能彻底解体这一全人类的头号公敌——共党。

25.郭国汀:中西方之间的根本区别(括号内的文字为编者所加)

中西方之间的最重大区别是什么？许多人会象背乘法九九表一样，不假思索地回答：民主和不民主的区别（准确地说：应该是宪政民主和非宪政民主的区别）。其实，宪政民主和非宪政民主只是某种深刻原因的结果之一，这是我移居美国以后的第一项重大发现。

通过关注一些细节，我深深领悟到：中西方之间的最重大区别，是残忍（幸灾乐祸）和非残忍（同情心或博爱）的区别。中西方的社会体制都是建立在这两个有区别的基础之上。

上个星期五，如小象一般的美国白人胖女工罗琳，扛着一包东西跨出厂门时，忽然一个踉跄连人带货重重地摔倒在地，“Oh, MyGOD! AreyouOK?” 周遭四五个美国人工友，不管是白人还是黑人，都喊了起来，我跟出来看时，早有二个白男把罗琳搀扶坐起来，检查她的伤势，幸好只擦破点皮，贴了工友递来的创可贴后，罗琳站起来墩墩地走了。

我注意到这几个人没有一个笑的，罗琳摔倒的样子有点滑稽，就像昆明动物园中卧倒在泥里打滚撒欢的母象，但是美国人却笑不出来，显然是同情心压倒滑稽感，这是一种惯性。我以经验保证：她要是在中国这么摔上一跤，保管引起观者的哄堂大笑；如果她摔倒在中国街头，不仅会遭到嘲笑，而且断不会有人来搀扶和安慰她。

我见罗琳跌倒心里犹有滑稽感，这说明我身上仍有中国人的劣根性，但这次我心里没有太多的笑意，这说明赴美以后，我已经进化了。

以前在中国，无数目睹有人跌倒而众人大笑的场面。

1995 年夏的一个星期日，我冒着酷热，骑车从广西大学到南宁市新华书店去买古典音乐磁带，回来时在朝阳路上，见一个衣衫褴褛的骑车男人，忽然从车上鱼贯而下，摔了个狗吃屎，原来他的烂单车整个前轮都脱落了，霎那间半条街都笑翻了，但当时没有一个人帮扶摔倒者。观者那快活的神态，犹如偷看了最精彩的马戏表演，我虽然没有驻足，在车上也笑出了声，那人伤得怎么样既不知道，也没放在心上。多年以后，我才懂得以这种心态为耻。

1996 年大学毕业前夕，在校内进行体育五项达标测试，我在五十米跑时摔了个狗吃屎，两只膝盖、一对手肘皆皮破血流，在场测试的几十个大学生都哄笑起来，简直比手淫获得高潮还快活，只是没有一个人过来问候两句，同宿舍那个稍有同情心的周某某似乎看不过眼，对平时和我关系还好的玉林佬罗某某说：“要不要陪他到校医院一趟？”罗某某一口回绝说：“这点小伤要什么紧？自己去自己去！”边说，边去树荫下可口可乐去了。我当时内心在大骂白眼狼的时候，竟不曾想到自己和罗某某等人是一路货色。

1998 年春，我作为桂林电视台记者，跟随桂林市委、市政府考察团，去广东省“考察”农业，归途中被锈钉刺入脚掌，但同车的桂林日报黄记者、桂林电台朱小姐、桂林临桂县农业局阳局长、临桂县公安局某警官，统统无动于衷，车到桂林后，连顺势送我到人民医院的事都不做，我不得不于夜色中，自己打的到桂林市人民医院清洗伤口、打破伤风，他们则驱车到象鼻山下的酒楼，点菜吃饭去了。

这就是中国人的残忍本性（国人的生活缺乏快乐，故只能把他人的痛苦当自己的快乐）。

2002 年秋，我和一个江西来的异议友人骑单车行在桂林市东环路上，恰撞见一直黄狗窜过马路，被一辆小货车撞倒刮入车底，碾压得吱吱惨叫，幸而保住了小命，拖着残肢一瘸一跳穿过花圃隔离带，跳上人行道跪着哀号不已，看来伤势不轻，众人都围观欢笑起来，一个男的指着狗鼻子笑骂曰：“舒服吧？还乱穿马路没有？”一百多年前，在菜市口围观凌迟死刑的人群，肯定也是这副样子。这就是反映华人残忍劣性的典型事例。

有人会说：这是“党文化”现象，是中共毁坏了中国道德的结果。那么，如何解释远在中共上台之前，出现在中国的种种残忍现象呢？英国左派思想家伯特兰·罗素早在 1920 年代初就在北京街头，目睹了中国路人围观嬉笑一条伤狗的一幕，他所见到的，和 80 年后我见到的，惊人的相似。对于中国人的这种残忍，罗素百思不得其解，这也成为罗素对中国人的所有好感当中，极不协调的一道神秘的阴影。只是 1920 年代初，中共的影响有几分？

若硬说这种残忍这是共党文化造成的，那么太监制度、凌迟死刑登堂入室，成为国家正典的时候，共党又在哪里呢？要知道，为保帝王对后宫的性垄断，而集体割除男仆生殖器的残忍传统，全世界只有中国才有，而且绵延达两千年以上；而凌迟这种把人一刀一刀割死的千刀万剐酷刑，成为国家明正典刑长达一千年的例子，全世界也只有中国才有。

刺或玻璃扎进肉里稍微深点，把玻璃和刺挑出来时人都会痛苦不堪，甚至得上医院上麻药、做小手术才行，可想而知那种把人一刀刀割死、剐死的死刑会痛苦到何种程度！据说“规范”的凌迟得割上三千多刀，如果太快把人割死了，刽子手要受处罚。千刀万剐，稍微设身处地、将心比己都会不寒而栗、于心不忍，只有魔鬼才想得出来、并且忍心去实施这样残忍肉刑！那种视地狱般哀号惨叫血淋淋凌迟为正常的头脑，只能说是一种不正常的头脑，这种头脑彻底丧失了设身处地同情他人的想象力。这是什么造成的？现在还说不清楚，我怀疑是中国人头脑中缺乏营养造成的，与食谱有关。其中之一就是喝茶过多过浓，导致头脑频繁营养缺失，于是产生种种恶毒的想法。例如：广东人、福建人嗜好浓茶是出了名的，所以广东连活吃猴脑都敢，而福建人民风之贪鄙、恶毒、无赖……简直无以复加。

一个民族，既然连大量割男仆生殖器、千刀万剐都可以堂而皇之地供奉起来，上千年地熠熠生辉，那么对共产极权的灾难——什么“镇反”、“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文革”……又有什么不能承受的呢？而“计生”、“严打”、“六四”、“强拆”等邓江胡超法西斯暴政，就简直是“小康”了。相反，对建立在人道主义基础上的宪政民主，反倒稀奇、过敏，总觉得手足无措、格格不入……所以“八九”的机会就这样丧失了……

残忍和非残忍是中、西方根本区别的基础。人道主义是宪政的基础：欧洲人中世纪时都远没有秦、汉、明、清那样残忍，走出中世纪时就告别了残忍，所以开创了宪政文明；中国人一直在残忍的污泥中打滚，所以现在还实现不了宪政。欧洲的人道主义是基督教带来的，中国则根本没有民族性的宗教信仰。所以，中国横遭共党浩劫，至今未了，既是偶然，也是必然，与东欧“卫星国”不同，中国之赤化，非纯由外部势力强加，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苏俄最先欲赤化的是土耳其，花了几亿美元，结果怎么样？中国实在不争气。

极残忍的传统在中国堂皇存在上千年，儒家不可能没有责任，儒家就是一种人道主义匮乏的学说，从以言治罪诛杀少正卯的孔子，到私设公堂、酷刑逼供的朱熹，到王阳明、曾国藩，

大儒而残酷者比比皆是。中国唯有的一点人道主义是佛家和道家的影响，相对优容而文明的李唐、赵宋，皆尊道家而非儒家；搞儒家理学登峰造极的是明、清。有儒家传统的共党国家的专制都很稳固，如：中国、朝鲜、越南，东方国家中只有蒙古随东欧和平演变，蒙古恰恰是传统上的佛国而非儒国，这是一个甚勘玩味的现象。

26. 中华民族精神上烂掉了！国民素质低下是怎样炼成的？

经常有朋友问这样的问题：“你长期生活在德国，你觉得中国人和德国人有什么区别？”估计他们期待我这样回答：德国人严谨，中国人做事不太认真。然而，我的回答却使他们感到意外：“最大的区别是，中国人说话声音大，德国人说话声音低”。

说话声音高低和道德水准有什么关系？我的回答是：有一定关系，尽管不是全部。判断一个人是否道德，有一个基本的标准，那就是：你的行为是否干扰了他人。如果你只是在自己家里吼叫（在隔音良好的情况下），这不存在道德问题。但是，如果你在公共场合，例如在大街、餐馆、商场、公共汽车上大声聊天，大声打电话，那可以肯定地说：这有点道德上的问题。因为，即使个别人喜欢听他人的隐私，但也一定有人不想听你说话。如果你把自己的声音狠狠地灌进了不愿意听你讲话的人耳里，这就是不道德。

我在德国期间，曾在德国联邦统计局人口研究所实习过。每天中午都到统计局的大餐厅用餐。吃饭的人不少，大概有 500~600 人左右。尽管如此，整个餐厅非常安静，偶尔也只是听到刀叉在盘子上的轻微撞击声。和我一起吃饭的几个德国人，虽然也聊天，但嗓门压得很低很低，旁边餐桌的人几乎听不见。德国人说话声音低，并不是他们的嗓门不好，而是父母从小就告诉小孩：“嘘！请小声说话！”这样的场景我在德国人家里经常看到，至今记忆犹新。那么，德国父母为何觉得高声说话不文明呢？你只要看看他们的中小学课本就明白了。他们也有——门相当于“政治”或“中小学生道德品质的课程，名字叫“Ethik”，就是《道德伦理》。名称虽然相似，但教的内容却不是热爱什么党，热爱什么主义，而是一些非常普通的做人准则。他们也不教孩子：“只要主义真，杀了 xxx，还有后来人！”主义这玩意儿难道比生命更重要？再说，凭什么说你那个主义就是真的？

在当今的中国，除了高声说话，还有很多不太文明的现象：说假话、见死不救、遇见陌生人不说话不打招呼、关门时根本不看后面是否有人、贪污了还觉得自己是贵族、随地吐痰大小便、不排队……而在德国，说假话要付出一生的代价，看见别人有困难主动上前询问，遇见人不管是否认识，都会微笑点头，在电梯里会打招呼：早上好！关门的时候会看后面是否有人，如果有就会一直把门扶住。至于贪污腐败，随地吐痰这样的事情，对他们来说简直是奇闻。去过德国的人都知道，在公共汽车上经常会听到“对不起、没关系”这样的话。说话的原因只不过是汽车摇晃，身体轻微碰撞了一下而已。

难道是德国人天生就比中国人素质高？恐怕不见得。如果德国民众天生素质真有那么高，就不会听希特勒忽悠而残害犹太人了。真正的原因是联邦德国成立后，政府制定了一套规则，让民众自觉提升素质。比如说：德国有法律规定，不管是任何建筑物(应该是家庭除外)，如果建有厕所，任何人都可以进去大小便。当然还免费提供手纸。即使是豪华的餐馆，你一样不能阻止乞丐进去方便。你说上厕所这么方便，还有人乐意随地大小便吗？除非这个人神经

有问题。再如：关门时不小心把人撞了，你得无条件赔偿，还得帮人医治。还有遵守交通规则、按秩序排队等等，这些做法都是依法治国的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良好的行为就变成了习惯，一旦大家都养成了良好的习惯，这个社会就变得文明起来。

中国人天生素质低的说法是错的。只要把时间移到“解放”前来观察，你就会发现，那时的国人还是不错的。人与人在胡同口见面，不管是否认识先问你：“吃了吗？”听起来土气了点，但也富有人情味。我比较喜欢古代中国人抱拳施礼这种做法，很有文化底蕴。可惜今天都不见了。今天的人与人，比的只是谁比谁更牛逼，谁贪污的钱多谁就很有本事。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今天的中国国民素质严重倒退了呢？原因是共党造成的。

中国人缺乏人性——吃人几千年，“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不尊重他人的生命，野蛮；中共教人首先是尊重党，其次是尊重党纪国法，最后才是尊重人的生命。人性化教育的次序决然相反：尊重他人的生命第一，国法第二，党应该排在末位。

张雪忠说：1949年10月，毛泽东率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建立了专政体制。这种以恐怖为主要统治手段的体制，具有蒙昧主义和反人类的双重性质，完全无视人类社会的任何文明和道德底线。它不但要无所不用其极地迫害本国人民，而且还要把迫害他人变成每个人的生存之道。持续十年的“文革”，将斯大林式专政体制的蒙昧主义和反人类的特质发挥到了极致，并使整个国家处于一种灾难性的崩溃和瘫痪状态。为了重塑政权的合法性，邓小平在经济领域进行市场化的改革，而在政治领域保留了毛泽东的专政刀子。对于以自由和民主为主要诉求的八九民主革命，邓小平选择了坦克屠城。在“六·四”之后的二十多年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狂热已彻底消退，但自由、民主却成了政治生活中的禁忌，中国的党政官僚体系完全丧失了任何形式的理想主义因素。整个官僚体系开始了一场针对国民和自然资源的双重掠夺。各级党政官僚为了确保权位的稳固，在对民众采取维稳措施时，可以完全不顾法律的约束。各级政府经常使用的所谓维稳手段，实际上纯粹是明目张胆的刑事犯罪。官僚体系对民众穷凶极恶的掠夺和不择手段的镇压，使整个国家的道德伦理遭到了彻底的败坏。

中共以诈执政，只有谎言才能公开说，公众活动成了“假面舞会”，大家不敢说内心真话。一个长期依赖谎言的专制极权政体，造就了一大批言不由衷、表里不一、双重人格的人。这架谎言机器把每个人都炼成了“说谎者”。制度性谎言摧残了亿万人的心灵世界。谎言制度化繁衍出虚假、欺骗一系列的罪恶。在车站机场等公共场所，经常会听见警察的“良好”忠告：“请不要相信陌生人，请不要把包交给陌生人看管”。当然，让陌生人看包的确不太可取，但是所有人都不相信，你说这个社会成了什么样子？简直是人人自危！这个忠告告诉大家：这个社会完蛋了！既然都这样了，还建立什么和谐社会？政府天天喊为人民服务，是人民的公仆。可是你看政府哪栋办公大楼不威严、不豪华？积土成山、聚水成河。天天这么假宣传，民众也只好说假话以待之，于是，中国国民的道德素质也就低下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共对中国的破坏，不仅仅是经济的崩溃，更是道德的沦丧和文化资源的毁灭。

日本是世界上犯罪率最低的国家，安全根本不是问题。中国人总是说，你帮我看着东西。可

日本人不明白，东西你看它干嘛。在日本的机场、饭店、宾馆等各个地方，经常可以看到放着没人看的行李，旁边人来人往，并没有人觉得东西不安全。陪同的人告诉我们，在日本没有人家装防盗门，窗户上也没有防盗网，因为他们不担心会被盗。街上停放的自行车、摩托车，有些是上锁的，很多是不上锁的。日本真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日本是世界上最公平的国家之一。日本的基尼系数比较低，大约是 0.285，属于世界上收入差距最小的国家之一。日本是世界上最廉洁的国家之一，一直处于最清廉的前 30 个国家之列。日本是世界上人均寿命最高的国家，女性的平均寿命为 85.33 岁，男性为 78.33 岁，均创下全球最高纪录。日本具有很高的国民素质，有几点特别突出：一是讲礼节。对人非常有礼貌，赴约非常守时。日本人的鞠躬世界闻名，商场、宾馆、饭店总可以看到服务人员对客人鞠躬致谢。在日本几乎看不到无礼的举动或粗鲁的行为举止。二是重信用。日本人诚实守信，在商业买卖中几乎不会发生欺诈行为，坑蒙拐骗的事情绝少发生。日本的企业也以讲究信用、产品质量精良著称于世。三是严格自律。日本人的口头禅是“不给他人添麻烦”，每个人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并尽力做到尽善尽美。在日本看到街上的小汽车，都是擦得干干净净，每家每户每个商店门前也都是收拾得干干净净，这也是“不给别人添麻烦”的具体表现。在日本的大街上、地铁里，看到的上班族都是西装革履，日本人喜欢穿西装是一种自律的文化要求。日本人工作负责，讲究效率，勤勉敬业，精益求精，工作中加班加点成为常态，而且都是人们的自觉行为。四是团结精神。日本人具有一种团队精神，大家都融入到集体行为之中，为了集体的利益，甘愿放弃自己的个人利益。日本民族始终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意识，有非凡的适应能力，有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这些都是日本取得卓越成就的重要因素。

日本和德国一模一样：对低收入的人群，孩子免费上幼儿园，还可以享受免费午餐。日本幼儿园对小孩的教育均一视同仁，不因为种族、肤色、性别和国籍的不同而有所差别。幼儿园老师坚决拒绝收礼。日本让最穷的孩子也很有尊严：比如孤儿住的是两人一间的单元房，里面有厨房、卫生间。日本 1947 年就颁布了《儿童福利法》，只要是孤儿，不问国籍，全部由政府收养，保证完成高中教育。日本教育从小就开始让学生讲诚信。对于老师的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孩子们可以自由发挥；他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必顾忌老师的想法，更不需要撒谎而讨老师的欢心。当然，在日本拾金不昧是很平常的事。日本如此，世界其它文明国家也如是。他们对教育的重视并不是给学生洗脑，而是让学生长大之后给政府洗脑，要让政府知道，每一个公民的权利是不可侵犯的，政府存在的目的就是要为公民老老实实地服务。

与文明国家相比，中国幼儿园是不平等的，有贵族式的幼儿园，有平民式的幼儿园，有农民工式的幼儿园，中国的孩子一上幼儿园就知道人是不平等的。中国的双语幼儿园每年赞助费 3 万元，每个月伙食费 1500 元，还有园服、书本费啥的，每个月要 5000 元。中国的孩子从小就看到别人送礼，看到自己父母给老师送礼，从小就懂得和学会了“送礼学”，学会了腐败。正如资中筠所说：“国民党统治大陆的时候是官场腐败，学界、文化、新闻等领域没有全腐败，所以被推翻了社会还有救。而现今各行各业都腐败，连小学生都知道要家长给老师送礼，以便对自己好一点。他们长大后就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对了，不会在乎什么公平正义，而是认同腐败的规则。这就是整个民族从精神上烂掉。”

1946 年，有三个女孩报考清华落榜，这让人看见了中国教育界的公平和良心。落榜的女孩是：清华建筑系主任梁思成的女儿梁再冰，文学院院长冯友兰的女儿冯钟璞，校长梅贻琦的女儿梅祖芬。但是现在，每个大学招生办手中有一大把机动名额，据说就是为了照顾系主任以上关系户的。在中共的统治下，教育界已经没有了公平和良心。

2011年7月网络上一篇名为《中科院院士段振豪包养二奶，养私生女》的网帖，迅速将院士候选人、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段振豪推上了风口浪尖。发帖人正是段振豪的妻子曹霞，并称掌握着他“以科研经费供情妇花销”的证据。2012年，段振豪因贪污罪被判有期徒刑13年。铁道部窝案当中的张曙光案在北京二中院开庭时，他在庭上称索贿2300万系因参评中科院院士“需要花钱”而未果（第二次只差一票）。早在两年多前，新京报记者就曾接到张曙光参评院士存在造假的举报，并进行了调查。张曙光申报中科院院士材料中的部分个人专著，涉嫌由专家团队完成。此外，张的一些论文涉嫌挂名造假。黑幕因案情而曝光，中科院竟称“未曾收到与张‘花钱参评’的相关投诉”。没有相关投诉说明入围者或是花钱成功或是有九巨头“写条儿”而过关，哪里还有投诉之举？想投诉的该是张曙光，但他又不想将事情搞大而作罢。若非受案件牵连，百姓岂能知晓评中科院院士也如买官那样靠花钱！院士选举之前，候选人所在单位召开学术讨论会，以考察咨询的名义邀请相关院士，一路上好吃好喝好招待，临走时再送一笔不菲的会议费。据了解，每轮至多60位院士当选，但全国具有初评资格的行政部门就有100多家，平均一个候选人耗资十几万甚至上百万不等。可靠的消息源称：入选中科院院士花钱买路“只能算是近十年的新动向”，而能够绕过普通程序入选的（美其名曰“极特殊贡献条件”）是政治局常委“写条儿”，一般委员不行，还没这个影响力。人们将中共与其老对手国民党相比，颇耐人寻味地说：“国民党在大陆统治时也腐败得不得了，但司法腐败不严重，学术腐败一点没有。”

习近平念博士生导师孙立平教授曾发表一篇警世论文：《中国社会正在加速走向溃败》。他认为中国社会的腐败不仅仅是贪污，连社会肌体的细胞都坏死了；维稳是法治的大倒退，维稳不择手段，成了授权作恶。2013年他在《财经》年会上的发言，题为《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已经发生，逼迫中国进行改革》，他认为社会体制虽然没有改变，但社会生态已经发生变化，这才是社会改革的动力，形势比人强，革命正在静悄悄地到来。

《差距》各打五十大板，对乎？

章立凡在《中国有软实力吗——读王冲新著〈差距〉》一文中说：“2012年反日游行，钓鱼岛还没收回，中国人自己先打起来了。爱国愤青们砸了上千日系车，不仅同胞财产受损，日资企业的损失也得赔偿。这笔帐当局是怎么算的，我搞不明白，但赔偿肯定得由纳税人负担。难怪有句老话：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

“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表面上看，各打五十大板，实际上主要是在指责人民——老百姓！似乎老百姓该承担主要责任！

恰恰相反：政府该承担主要责任！

第一，仇日思想、反日舆论都是官方灌输和发起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充斥着仇日思想，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充斥着反日舆论。

其次，若是官方不允许的游行，往往在酝酿阶段，其策动者就被逮捕了，几乎不可能公开游行；反日游行是官方鼓励并发起的，其后果、责任肯定由官方承担！

第三，“打砸抢烧”从1919五四游行以来就一直存在，尤其在文革时期最普遍、最野蛮。其

责任主要在共产党！共产党反对普世价值，不讲人权，只讲暴力斗争和摧毁私有财产，必然是“打砸抢”。1919 五四游行搞“打砸抢”的激进分子不都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吗？

第四，当代中国人的道德堕落实源于共产党。共产党以消灭私有制为己任，不尊重财产权必然导致是非颠倒、道德沦丧。在所有的共党国家里，共产主义都使人们丧失了职业道德，丧失了对社会的公德心。物质占有欲是出于本能，而要尊重别人的财物却必须经过学习。这个道理，从儿童心理学里就可以懂得了。由此可知，如果某人发觉别人不尊重自己的财产权，那么，他也会不尊重别人的财产权，而且更滋长其贪得无厌的本性。这就是共产国家道德沦丧根源。随着中国转型为市场经济，由于没有牢固树立以尊重财产权为基础的市场经济道德，导致了水货泛滥和毒食品横行。

第四，当代中国人的残忍冷血、幸灾乐祸的主要原因是阶级斗争的“你死我活”哲学。人们从“你死我活”的巨大反差、强烈对比中获得刺激、快感：有人跳楼，楼下的看客竟然高呼：“快跳”！温州某地一女子跳河，上千人围观。难道这上千人里面没有一个会游泳的？由于时间过长，落水女子已溺水身亡。荆州大学生在长江边跳水救人身亡，却要先交钱后捞尸？中国人为何如此冷血？专制者负主要责任！由于缺乏信仰，使得人们没有罪恶感，没有亏欠和内疚感，只要犯罪不被知道，就是无罪，这导致中国人在内部矛盾分歧时，在人性中的残忍和冷漠。在中国，政治斗争是罕见残酷而无情的，政治斗争让中国一代一代的人失去人性。古代中国有喝人血的义结金兰、有吃人肉的刑罚如“醢”，今有喝人血、吃人肉的阶级斗争。正是专制者的表率作用，让中国人变得如此冷漠、残忍、内斗；专制者花天酒地、无恶不作，才导致国人愚昧、素质低下。